殖民政权



主编 孙邦

副主编 于海鹰 李少伯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伪满史料丛书

殖民政权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伪满史料丛书
殖民政权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3.375印张 插页4　560 000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206—01907—2
D·567　定价:平15.00元　精18.00元

序

刘云沼

反映伪满洲国历史的十卷系列丛书，在久久期盼中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项巨大工程，可喜可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序幕。一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伪满洲国的历史，是我们祖国六分之一的领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华儿女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英勇斗争、抗日救亡的历史。回顾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蒙受屈辱的历史，使我们懂得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萎靡难以腾飞，落后必定挨打；不能崛起，必然陷入沉沦。今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反腐败斗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胜利完成四化的宏伟蓝图是何等的重要。

伪满洲国史料丛书是全国第一部有关伪满洲国史料的大型系列丛书，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八五”计划的重点书目，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它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扩大文史资料的社会影响和利用价值，必将推

动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全书共十卷，选用了一千二百多篇文稿，共五百五十多万字。从“九·一八”事变写起，到殖民政权、伪满军事、经济掠夺、日伪暴行、伪满文化、伪满社会、伪满人物、抗日救亡、伪满覆亡等，各卷既是独立成卷，又有内在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如此浩瀚的史料，涉及到东北沦陷后十四年的方方面面，十卷丛书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殖民统治的概貌，又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详尽记述。同时，这又是一部以口碑史料为主，首次披露的史料丛书，与所有有关伪满的学术研究专著、论文及档案资料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作者大多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具体史实为根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充分证明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实质。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整个伪满洲国内幕的实证，既然是史料，又限于作者个人的所见所闻，虽然它是真实的，也难免有疏漏，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文字量过大，在编辑过程中必须有取有舍，有详有略。在取舍详略之间，考虑不周之处，在所难免。至于编辑上的疏漏和差错，也是少不了的。无论如何，构筑如此浩瀚的史料工程，又文出多人，几经易稿，都是费了心血的。如此巨篇，如果没有全国各级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鼎力相助和广大学者、专家、文史工作者的辛劳，特别是我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多年来对伪满洲国史料的锐意搜求，是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在我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的史料工程的。只有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各方面专家的指导和参与，才使这套丛书更加专题化、系列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民政协确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群体，在挖掘整理文史资料上有独特的优势。

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提出，要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十卷伪满洲国历史丛书，就是这样一套回顾历史，启迪当代，教育后人的好教材。我们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有必要研究在我国东北曾出现的最野蛮最残酷的殖民统治。因为今天的中国，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及家乡，在半个多世纪前遭受的那一段苦难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什么国仇家恨统统说不清楚。用这些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激励革命意志，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重温历史，并不仅仅是回顾历史，而是以史为镜，教育后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伟大的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搞这样一套历史丛书，对加强中日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日本仍有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还在念念不忘过去他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一直留恋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甚至为东条英机等战犯涂脂抹粉，企图篡改、歪曲历史的

本来面目，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绝对不答应的。

斗转星移，历史毕竟早已翻开新的一页，耻辱的历史已经过去，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在世界东方，让我们引古鉴今，奋发图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不息。

谨以此书告慰无辜殉难及为国捐躯的千万个英灵。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

编辑说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于1932年又炮制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从此，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十四年之久，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浸透血泪的一页，永远记住它，具有特殊意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战败时，销毁了他们在中国的大部分档案资料，战后，在日本又有别有用心的人不断撰文著书，歪曲历史，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亚洲的罪行。因此，揭开历史迷雾，系统地揭露、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种种罪行，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真相，是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经过多年来搜集、挖掘，征集了大量亲历者口述整理或撰写的有关伪满的稿件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开始编纂工作。编辑过程中坚持领导、学者和编辑人员密切合作，经过多次论证、修正及精选精编，终于完成了《伪满史料丛书》。全书共分十卷，约550万字。收入1200余篇文稿，基本囊括了有关伪满的方方面面。

一、丛书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的文史资料为主，辅以历史学者

的论著及有关的档案资料。

二、丛书按内容类别分卷，各卷内又分若干专题。由于某些文稿内容往往涉及到多种专题，为保持资料完整起见，采取了集中编排。如有关“细菌部队”的文稿，均收入《日伪暴行》卷中，其它卷、专题不再收入。另外，某类稿件稿源丰富，又涉及到多方面，则根据稿件内容，分别收入所侧重反映的专题内。如有关“劳工”类的稿件，主要反映“劳工苦难”的稿件收入《伪满社会》卷中；关于“人力掠夺”收入《经济掠夺》卷中；有关修筑军事工程后劳工被残杀的稿件收入《日伪暴行》卷中。

三、丛书由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各卷均有专人负责编辑。

四、丛书选用部分日本战犯、伪满汉奸及日本历史学者等的供词或文稿，但其中某些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选用时作了适当的删节，保留史实部分，或加编者按、注释予以批驳。故请读者批判地阅读。

五、编辑体例

1. 丛书框架结构视内容而定，各卷分别采取列一层题、二层题，一、二层题并存的三种形式。

2. 对入选文稿或资料，基本保持原文格调。如需对原文改动，主要是采取删节或压缩。

3. 丛书的数字、年代的使用，以 1986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不定数使用汉字。

4. 丛书注释分三种形式：作者简历注为 * ；凡属作

者或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解释性文字，均加（ ）；其它注释一般采用脚注圈码，不用文后集中注释。

5. 凡属繁体字、古体字和异体字，除有特殊含义（如姓名）外，均改为通行简体字。

6. 文稿出处置于该文稿之后，一律注明“摘自”某某刊物或书籍。

六、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为此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指导并做了大量工作；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兄弟省、市、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给以了热情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望读者对丛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和指正。

卷首语

本卷虽为伪满《殖民政权》卷，但由于资料选编分工的原因，另外还有经济、军事等卷面世，故本卷突出重点，专意从政治角度编选，目的在于揭露这一殖民政权的傀儡性实质。

众所周知，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它按照日本政府确立的殖民统治基本方针，操纵伪满洲国。关东军在伪满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通过伪总务长官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控制大权，与此相匹配的是还实行次长制，即从伪中央各部到各省市县，正职由中国人汉奸充当，起掩人耳目的屏风作用，副职为次长，一律由日籍官吏充当，掌握实权。由于关东军奉行“内部指导原则”，主要活动在上层秘密进行，公开的活动不多，故在本卷中，直接涉及关东军的材料不多，其太上皇的地位与作用，在有关总务厅和火曜会等资料中能透示出来。

伪满的地方政权是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曾先后进行多次调整，以便于分而治之，本卷中反映县级政权情况的资料较为充实，而有关省级政权材料较少，只好暂时付之阙如。

残酷的司法统治是伪满政权的一大特点，本卷选编了较多警务、法院等方面的资料，从中可见这一殖民政权所具有的镇压职能，即残暴性的一面。

作为日本的附属国，伪满政权本无什么外交可言，

但既为伪满洲国，关东军就尽力在外表上把它打扮成独立“国家”的样子，故也有一些涉外活动。我们选编了其中一些典型资料，目的在于揭示，面对这一殖民政权，国际各大国之间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角逐。

协和会这一特殊的政治教化组织，与伪政权互为表里，干了许多坏事。本卷编选多为协和会的日常活动，至于它打着“宣抚”旗号，组织特别工作班从事特务活动，乃至和日本、汪伪有关组织联合搞所谓兴亚提携活动等，限于资料，也没有系统编入。

总之，本卷编选以三亲史料为主，资料丰富充实，内容真实生动，可信性强。

编　者

目　　录

一、伪满中央殖民政权

二、伪满地方殖民政权

三、伪满警察

四、伪满宪兵、特务

五、伪满法院、监狱、警校

六、伪满协和会

七、伪满的“外交”

一

伪满中央殖民政权

我第三次做皇帝[1]

爱新觉罗·溥仪

“重登大宝”和初次访日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允许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在一次同武藤的例行会见中，出乎我的意料，他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

---

① 本文是作者所著《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第六章的几节。

—— 编者

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1933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目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投老翻教岁月轻。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指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五百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遗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就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年的3月2

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3月24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27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5月31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愤激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地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地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做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地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是看做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的。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这时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空军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份，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象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象有

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3月1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上，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举行过登极典礼（1934年3月1日）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给了婉容（我的皇后）一个宝冠章。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乎所以。如果这是我的那种情绪的起点，那么到1935年4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机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14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号来迎接，并派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舰时，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　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　永固东方。

在航行的第4天，看了一次70条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天涛，　碧苍一色天地变，

此行岂仅览山水，　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是到住所回拜。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同裕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给他父亲“大正”天皇上坟。我到日本陆军医院慰问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又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献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离东京的那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说：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

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4月29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

“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在5月2日我还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那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郑孝胥起草的。

关于这篇充满奴化毒素的伪诏书的出现，也曾有种种“非个中人不易得知”的内幕。那就是我这次到日本，从东京游历了京都、奈良以后，到了须摩的“武库离宫”，准备回东北前，当时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对我说，在“回国”之后，应当发表一篇“诏书”来表示对日本的感谢，并要把这种精神传

告于“全国人民”(从这里更可以看出伪诏书的颁布，已早经日本关东军和政府军部内定)。当我回长春以后，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诏书”的草稿给我看；同时专门操纵我的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也替我出主意，说道“在这‘诏书’里面，应当添上‘依赖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的字样。”于是我亲笔加上那几句话。吉冈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我从这次对各伪大臣、参议讲话以后，再没有过这样的随便讲话，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至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对我限制一天比一天严。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后来只有每年末规定的“政务”上奏(这时还有伪总理张景惠的侍立)和在伪宫举行的形式上的参议府审核年终预算会议以及逢年过节举行庆祝时见见面，再不能如以前的随便来见我。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的就更严，连我见亲属也受到限制。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其他凡是从华北来的不论是亲属或非亲属都只能在年节与我生日时向我庆祝时行礼，不许个别谈话。这是由吉冈安直写在条子上交伪宫内府大臣熙洽照办的。另外“帝宫”里还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个木牌，没头没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

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吉冈安直的高压电线

关东军好象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象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1932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份只是关东军高参，从1934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象是“内廷行走”，又象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名称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问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的。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年，也必须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说，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认为他最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以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作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这样时间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了，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

想干，因为中岛比多吉（任“执政府”的谘议）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没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份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作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预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个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了一首诗，又请我题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就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经常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自然，“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我们又都有现成的作点心的师傅，彼此送

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象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

“这个机器也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在中国话里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与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1934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

虽说不能以手足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1936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在纸条上写好。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的宴会上，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辈，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的！嗯！”

有的书上说，吉冈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连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并没什么非谈不可的

事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呢。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我的恐惧

经过14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帐，都在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冈安直更绝口不提。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和“满洲国通信社”的新闻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荡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导。一直到1936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关东军不但不想再瞒我，而且有时还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凌升案就是一个例子。

凌升是蒙古（达斡尔）的贵族，前清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他做过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的顾问，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划东北为14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刚同我结成亲家

（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订婚）。不久，我忽然听说他被关东军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来了。他象谈论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说："前两天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记得，是凌升。他勾结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谋叛变，关东军已经将他正法了。"

"已经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错了。他的翻译官连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错，杀了。"植田也狞笑一下，点头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该杀一儆百！"

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冈的意思，告诉人赶快把说好的这门亲事退了。

一连许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得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再后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兴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

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象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对我说："咱们的护军，好象很遭关东军的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统辖的宫内"翊卫军"，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300人的部队。当初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为了这个目的，熙洽给我从旧东北军中调拨了一些兵士，我又叫人从京津、内蒙一带招募了一批青年，这样编成了这支部队，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这支队伍成立后，"军政部"不肯发供给，连枪支也不给，我从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应它，并且枪支弹药也是自己派人买来的，因此就遭到了关东军的忌讳。以前，我并不怎么注意到这件事，可是现在发生了"杀一儆百"的凌升案，加上佟济煦这一说，我全想起了，也担起心来了。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事情也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日里。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今长春市儿童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还

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护军这次却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本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还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作了。

应该提一下的是，我为了建设未来的军队，同时还送过一批青年到日本学陆军，其中包括在学习院（日本贵族子弟肄业的高级中学）毕业的溥杰和润麒。可是这批青年学成回来之后，除了溥杰和润麒之外，我也无权支配，都在“军政部”的分配下，“化”到日本人指挥下的“国军”和军事机关里去了。

还有，1936年，日本人在内蒙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见过，他曾送过我钱，还给过溥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作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了没有？"

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真的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里打打网球。我走到院子里，忽然看到迎门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见了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了打了，赶紧叫人快擦了去，然后急忙回到我的卧室里，心里砰砰跳个不停。

这行粉笔字，引起的恐惧更大了。我怕日本人发现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一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这行字是谁写的呢？显然在我这"内廷"之中，是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1936 年在接连的恐惧、忧虑中过去了。到了 1937 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我已没有了 1932 年长城战争时等着日军进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宫的心情，而是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忧。这一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

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到1935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于天潢贵胄的传统优越感，觉得爱新觉罗的正统男子如果选汉女为之配，已是破例；如果同外国人结亲，更是祖制所无的；何况日本关东军是不是在打主意，要制造一个混着日本血统的皇帝，如若是更要提防呢。我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快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双方都同意了，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说关东军希望他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为了日满亲善的大事，他既为皇帝陛下御弟，自然应该出头做这个亲善的表率。最后他说："这是军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进行那边的亲事了，至于在日本方面的活动，有我为你张罗，你等着就是了。"

本来已接受了我的劝说的溥杰，现在又接受了吉冈的意见。据他后来自己说，几年的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对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所以吉冈一说，他就点了头。

吉冈说服了溥杰，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给溥杰办理同前妻离婚的手续。因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冈扑了个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骗他，便拿出日本军队的威风，叫日本宪兵把住唐家的大门，他自己闯进内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来。这两个弟弟再三说明姊姊确不在家，他没了办法，只好叫这两个弟弟替他们姊姊具结，承认同溥杰离婚。为了牢靠，他又把当地的警察派出所长找来，签字作证，这才算完事。

吉冈办完了这道手续，在日本的本庄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

来了。他们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这户人家，经过一番奔走和准备，1937年4月3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伪满“立法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也只是略动一点，绝不多动一口。

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也曾想到，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象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等，越来越不值钱了。

四大“诏书”及其他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说来，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材，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贴贴，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

“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

“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嗯，应该致默哀！”

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儿作了。

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得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站起来，向着南方深深一躬，低头闭眼。

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

这些恭维谄媚的词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犯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

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前面已经说了。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1940年，事情却要从1939年说起。

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在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冈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嗯，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该相同，哈！”

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作，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鼓峰和诺门罕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希望我要考虑一下。

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的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

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它。

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恨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是让我非常气愤的。

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作自己的祖宗，这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1940 年 5 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这次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有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 8 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

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既然是陛下愿意

如此，我只好从命了！”

我心里想：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斯漫游奇境记》，觉得真象爱丽斯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裕仁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艺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帝宫”旁修了一所称之为“建国神庙”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规定的，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全东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个这种“神庙”，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走过这种地方，都要行90度鞠躬礼，并且立以法律，违者严惩。因为人们都厌烦它，不肯向它行礼，所以凡有神庙的地方，也都是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象《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终于悄悄丢下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

在全东北的人民耻笑、暗骂中，我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回诏书不再是郑孝胥（这时郑已死了两年）的手笔，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写的日本味的中国文言。其中有这样两

句："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成了以后每次"诏书"都少不了的谀词。

为了让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首先接受这种神道思想，让我们真正奉信这邪门歪道，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请来一位著名神道专家叫筧克彦的，据说是位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给我和大臣们讲课。这个神道专家讲课时带来了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一张纸上，画着一棵树。他讲道："这棵树的树根，是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紘一宇，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了一碗清水，旁边又画了若干酱油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醋瓶子等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等。说明全世界尽管有各种宗教信仰，但都不纯粹，只有日本神道才纯正如同洁净的水。别的宗教的发源本是来自日本的神道（净水），可是已经夹杂了各自的派别，所以不是净水，而是酱油、醋。……"还有不少奇谈，详细已记不清了。后来我听到关于一贯道的说法，想起那棵大树来，觉得好象有点相象。这个筧克彦给日本皇太后讲课时，她听着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伪大臣们，有的虽道貌岸然，也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兴睡着了。伪军政部大臣于琛澂，绰号叫于大头的，听道的时候竟歪着大头打起呼噜来（后来不久不知为什么竟被撤了职）。

这位筧克彦临走，还给我留了一大套画着大树和酱油瓶的书，总有一尺多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也同时宣战，由我颁布的"时局诏书"。这第三个诏书也是佐藤知恭的手笔。这时吉冈安直又来见我说日本天皇已发出诏书，

对美英宣战，跟着就把伪满支援日寇的侵略的“时局诏书”草稿给我看，并说当日晚间就必须在“宫内府”召集全体大臣、参议等开御前会议，并希望我在开会时亲自宣读这个“诏书”，另外还要说几句话表示伪满洲国应尽全力支援日本“圣战”的决心。

这个伪时局诏书的原文如下（原无标点，是我后加的）：

>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昭诏尔众庶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些恭维谄媚的词令，和“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一用起来，顺理成章。

我见了每次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死生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

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便忙不迭地说：

“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去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

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的屈辱，是写在第四个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

在这个“十周年”（1942年）的前夕，吉冈和我说：

“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那就没有区别。所以，应称作亲邦，同别的国家就有区别了。”

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真正统治者，“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也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年诏书”就出来了：

>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之民。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奉天承运之祚，垂统无穷。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尔有司众庶，亦咸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终始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按规定成了“日本”的代词。

这样自认是他的儿子还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伪总理张景惠代表伪满，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份，就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是写在“亲书”里的。

1944年，日本的败相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在倒棚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说，“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

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来，“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记得好象这回没有听到他的嗯、哈，可见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混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下，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后来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又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也都捐献了等等的话，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我后来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见，他们的地毯还是好好地铺着，究竟吉冈卷了我的地毯是为什么，金银首饰拿去了多少，我自然是不敢问了。

我又自动地拿了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拣一切可搜拣的东西。交不上来的，还要受体罚。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愈临不利，掠夺东北人民的物资财富也就越多。有一次伪满各省伪省长正在长春照例开会，吉冈抓着这个机会，便建议让我召见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当面鼓励他们：“要节约，多生产粮食，尽全力支援日本皇军圣战。”我一一照办了。以后，伪总理张景惠在日本人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授意下也演了“双簧戏”，发表称赞我的“敕语”的所谓“总理谨话”。到了1945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陷入衣不蔽体，食无粒米的境地，多次的“粮谷出荷”、“报恩出荷”的掠夺，弄得农民们更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3 000担，

大米30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

本来这次打算让我亲自带去，到“亲邦”进行慰问，我听到关东军有这个意思，心中怕得要死，因为日本已开始遭受空袭，我很怕在日本遇见炸弹。我不敢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我可以不去，派一个慰问大使就可以了。于是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的补正

溥杰

《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刊有溥仪所写《我第三次做皇帝》一文，其中有两项我认为应加以订正和补充。

（一）第6至第7页所载伪“回銮训民诏书”中，有三点与当时伪“诏书”的原文有出入：(1)“……以达今兹”应是“以逮今兹”；(2)“兹幸致诚悃……”应是“兹幸亲致诚悃……”；(3)“与友邦一心一德”应是“与友邦一德一心”。因我当时在伪军中任伪军官时，不但每年5月2日必须有一次纪念这一可耻勾当的仪式，即在我任伪连队军官及任伪军校连长、队长时，也须在例行对兵士和军官学生的“精神讲话”、上学课的时候，经常要背诵这篇东西或引用其中的“重要之处”，所以根据当时深入脑中的回忆予以订正。

（二）第14页从第5行到第10行，记吴沆（原误为沅）业

被日寇惨杀事，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稍有出入。

1943 年至1944 年，当我在长春伪治安部参谋司第三科任科员时，有一天一个人忽来我家见我，见面后即仓皇地从衣兜中掏出一张长方形纸条，上有潦草的铅笔字迹，上面写着："我现被押在日本宪兵队，受尽惨酷非刑，实在生不如死。你认识日本军人很多，望念在驻日本大使馆同事一年之谊，设法救我出来；如办不到，即请设法让我快些死掉。……"等等，末署有吴沆业三字。我看完大吃一惊，但为了自己保全自己，就顾不得什么朋友之谊，遂严厉斥责来人说："你怎么这样大的胆子，这是什么事，你胆敢向外通风报信！"我说完便在他面前将纸条烧却，催他快走，并劝他要设法辞去看守之职远走高飞，他当然是惊慌失措地走去。后来听阮振铎（曾任伪驻日大使）对我说，吴沆业终于死在日寇的宪兵之手。吴遭祸的主要原因，据说是"他曾将伪满的秘密情报卖给美国驻日大使馆的人员"。这件事的经过就是这样，并没有求我转求溥仪营救他的事。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

溥杰忆往

溥杰

敢怒而不敢言的伪执政

我在学习院第二年的暑假时曾回到伪"首都"长春。这次回国与往日大不相同，沿途备受招待，有的呼我为"御弟"，有的则以"殿下"相称。到了沈阳，先赴日本的关东军司令部去

见本庄繁。他是一个身材不高、满脸假笑而官气甚足的人。

我在沈阳滞留两天之后，便到伪首都"新京"（即长春）。到站之后，见有中国兵沿途布岗，从车站直到伪执政府。伪组织的"新贵"和"遗老"们也都到站欢迎。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郑重待遇，致使我两眼一酸几乎滴下泪来。到了"执政府"，见了溥仪，出我意外，他并不怎么高兴。他阴沉地对我说："他们曾有推我当大总统的话，我不乐意。现在虽当上'执政'，已和他们约定好，先作一年看看再说……"我说："我认为与其当大总统不如当执政。"我的意思是，以皇帝而当大总统，未免有失身分。溥仪当然也是和我同有此感。不久，上角利一（直接操纵溥仪的关东军代理人）来见溥仪，只见他笑嘻嘻地对溥仪说："刚才关东军对阁下提出抗议，说派武装士兵到车站，是违反武装人员不得入附属地的协定，请阁下今后严加注意，不要再这样做……"

虽然上角是把关东军的严命以谈笑出之，但溥仪也嗒然变色，对他表示了歉意。因为这是溥仪为给我装饰场面，才把临时拼凑而成的"翊卫军"（即伪禁卫队的前身）派到车站一带，不料却碰了大钉子。我觉得溥仪有些可怜，同时也对关东军的骄横态度感到愤慨。

有一次我们站在"政府"的楼门口，看到满载全副武装日本兵的两辆卡车，一前一后护卫着日本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如入无人之境地闯进来。有一个亲戚悄悄对我说："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态度就是如此。"我听了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凡是日本军官到来，溥仪总是随到随见。有一次，日本的一个校级军官带着他的朋友来参观"执政"的大客厅，来时既未知会溥仪，也不经过任何手续，便直接找溥仪的用人吴长鸣要钥匙开门，吴也未告诉溥仪便开门延入。溥仪在当时对日本

"客人"敢怒而不敢言，在他们走后，便把满腹闷气，泄到吴的身上。我当时深深感到，这同溥仪在北京的紫禁城，甚至同在天津做"关门皇帝"时的处境相比，都有一种"不可说"的味道。还有一天，一个大个子的日本宪兵军官，光头穿着西服来找溥仪"闲谈"，由我担任翻译。溥仪又讲了一遍"先作一年看看，然后打算避位让贤"的照例的"政见"。那个宪兵军官听了满脸堆笑地说："阁下出任执政，乃三千万民众所推戴。这不是一年、二年就要息肩的问题，而是有关'新国家'的前途的问题。"我和溥仪听了大有啼笑皆非之感。

我这次在长春住了约20天之后，仍回日本，准备在学习院毕业后，投考陆军士官学校。

毕业归来所见

溥仪为了扶植自己的羽翼，就以个人名义将我和润麒以及从"侍卫官"、"侍从武官"中选出的溥佳（我的叔伯兄弟）、张挺（清末湖北提督张彪之子）、马骥良（熙洽的外甥）、毓峻（我的侄子）、裕哲（远房本家）、赵国圻（贵福之子）、孙文思（孙其昌的侄子）、祁继忠（溥仪的心腹用人）等10人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35年我毕业回来之后，立即以伪陆军中尉的资格到长春去见溥仪。这时我感到他自从当上傀儡"皇帝"之后，开辟自己前途的信心和对于当前生活的兴趣，以及在政治上的权力，都在一道溜向下坡路。例如我第一次到伪"执政"府见到溥仪时，虽然他因未达到当"中兴皇帝"而有些不如意，但还经常"召见"伪满的大官等闲谈，有时还留他们同吃便饭，而且每日走出内院到前面办公室去"办公"。这次当了傀儡皇帝，反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除了固定接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

参谋长、伪国务总理和伪参议府议长以及经常见见自己的家属之外，就几乎谁也不见。为办公而特意兴修的“勤民楼”，成了“门虽设而长关”的“冷宫”。早起逐渐改为晏起，应签名画可的公文，也不看内容就盲目签可，甚至经常坐在恭桶上，由“当差的”将成叠公文、毛笔、墨盒一并拿来，逐个在公事后尾签个“可”字拿走了事……这一切一切都使我深深觉得溥仪是爬得越高，自己的活动范围越窄，而且是意志越发委靡不振。

见过溥仪之后，当然要到伪军政部报到。在这里，我初次见到了“军政部大臣”张景惠和“军政部最高军事顾问”佐佐木，印象极深。张景惠是马马虎虎、结结巴巴地对我作了一场“训示”了事。佐佐木则用温和的态度对我说出一套尖锐的“训辞”。他说：“在满洲国没有贵族，你虽是皇帝陛下的令弟，也应以一个‘满洲国’的普通军官的身份来为‘国军’尽力……”并着重说，“应以万嘉熙为戒”①。最后又说了一套软的：“你是多年受到日本教育的人，现在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望你能为日满亲善作出活的模范……”然后将伪“建国功劳章”和“访日纪念章”特别“颁赐”给一无“建国勋劳”二非“访日扈从”的我。

我们这批新毕业回来的军官，又赴沈阳，在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当了一个月的见习军官。这里，上有日本军事顾问的严密控制，内有“红帽箍”② 把生杀予夺的人事调动权和教育、生活

---

① 在我参加伪军之前，万嘉熙在伪禁卫步兵团任中尉团附，因为与日本人青木等发生口角，深招日本人之忌。恰巧该团出一中校团附缺，溥仪因不知军队中的阶级关系，便对伪军首领言，可以万继任。日本顾问闻而大哗，认为这是万蛊惑溥仪想往上爬，并说“此风断不可长”，就在“虽不反满，其实抗日”的“罪名”下将万由“禁卫步兵团”的中尉团附远调为热河“讨伐队”的军官。这是日本关东军在溥仪当上伪陆海军（当时伪江防舰队在日本海军的控制之下名为“海军”）大元帅之后，限制他对伪军开口的一个下马威。

② 即“应聘官”，为聘来的日本退役的校级军官，因有日军制服，帽上有红箍，故云。

等各方面的权力都紧紧抓住，其下更有“日系军官”——即加入伪军的基层干部的势力，渗透到每一个兵的身上。伪军中的中国人，不论阶级大小，都得奴颜婢膝地应付层层的“上司”。稍一不周，轻则丢掉“饭碗”，重则被烙上“反满抗日”的“罪名”，立刻便有杀身之祸。而我们这批从日本新毕业的伪军官，在日本方面看来，是可供利用的工具。在一般伪军官看来，则是纯粹的“二鬼子”。特别是因为我同溥仪的关系，更被认为是一个“不平常的存在”。当时伪军官们个个花天酒地，我当然也不例外。有一次，一个同我相识的妓女曾对我说：“我曾认为‘满洲皇帝’是日本皇帝昭和的弟弟‘太和’，现在我才知道你们并不是日本人。”可知当时一般人对于我们的看法。

一个月的见习期满，我被派到长春伪禁卫步兵团当排长。这个团的任务，就是专门保卫傀儡皇帝溥仪。

乌烟瘴气的“禁卫步兵团”

伪禁卫步兵团初名“翊卫军”，虽号称军，实际上只有三个步兵连，是在伪“执政府”成立前夕，由熙洽从吉林省的公署卫队和公安部队中拼凑而成，送到长春的。当时官不识兵、兵亦不识官。开到长春才临时逐个点名着手编制。有的本是二等兵，因在输送途中私自在肩章上添上一颗星，便算是正式的上等兵，胆大的添上一条金线便成为军士。夜间站岗时，狡猾的兵藏在床下便可以躲过去，而傻些的便须连站几个钟头无人替换，以至有人以“请客”使别人替代站岗，有时则发生穷吵恶骂、甚至拔刀动武，有的兵肩扛轻机枪宿娼，入房即将武器支于门外。有的因争风吃醋用步枪打死人，携械而逃……兵既如此，官自可知：最初任“翊卫军”司令官的，是前清肃亲王善耆的第七子宪奎（当时改名金璧东），是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

包办下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伪政权成立后，便一跃而爬上伪铁路警备司令官、伪长春市长、伪翊卫军司令官等等要职，而且是身兼数差，骄横招摇不可一世。有一次他检阅军队，见一班长不顺眼，便喝令卸下背囊离队前跪，拔出军刀就要亲手砍头，经大家苦苦哀求，才免一死。

后当宪奎之弟宪原继任时，虽较乃兄稍识相些，但在官兵眼中，仍是一个“相当的人物”。有一次同他的团附玉祺因为争权夺宠大闹摩擦，双方几至火并。因玉祺为熙洽派去的人，玉祺便找靠山作“秦庭之哭”，宪原遂受到熙洽的奚落，当时即改变态度，同玉祺拍肩携手偕赴酒楼。兵士都说宪原会作戏。

在我到该部队时，不但已由“翊卫军”降为“禁卫步兵团”，而且日本顾问，应聘官和“日系军官”的势力亦逐渐渗透进去，旧军阀的遗风虽尽除去，但殖民奴才的空气，却涨满全团。有一次伪军官饮宴，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叫佐佐木的军需官，竟抱住伪团长郭文林大亲其嘴，在当时却赢得日本方面的称赞，说该团长“深得士心”，堪为“日满亲善”的榜样。

我就是在这种空气中，在该团尽了一年“拱卫禁阙”之职。

我同日本女性结婚的前因后果

我在伪“禁卫步兵团”当了一年的排长之后，日本关东军当局为进一步“深造”我，便使伪军政部派我赴日本陆军专门学校去留学深造。所谓“深造”含有两种目的：一是为造成我在伪军中的“资格”，二是为了促成我同日本女性结婚。

我同日本女性的结婚，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早就定好的圈套。因为我素抱“师重耳假秦援入主晋国”的痴心妄想，所以虽知这是一个陷人坑，自己也甘心情愿往下跳。

我在伪“禁卫步兵团”时，溥仪曾同我谈过此事，并对我

说："看样子，日本军部很想让你同日本女性结婚。这样一来，内外受制就越发不好办了。不如趁他们还未下手之前，你赶快同中国的女性定了婚……"他并找出几张他选剩下的照片给我看，我也看中了其中的一张，便由溥仪向北平方面联系，因为该人早已同别人有了婚约，便只得作罢。

后来又想到溥仪的妻子郭布罗·婉容的表妹，看过照片后我很满意，溥仪遂特请她母女到长春，经过几度磋商已有眉目，乃为吉冈所闻，立即把我找去，对我说："关东军方面都希望你同日本的女性结婚，因为这同'日满亲善'前途大有关系。最好你不要同中国人订婚，日本女性我负责给你找……"我在当时思想斗争得很厉害，但最后还是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次日见到我的哥哥溥仪，向他汇报此事，他也只能长叹一声完事。

吉冈为了先搞断我同唐怡莹间悬而未决的关系，以便给我与日本女性结婚开辟道路，便自告奋勇，带了一名日本宪兵，跑到北平唐的家中，想以日本兵的势力迫她屈从。因唐不在，便立时暴露出法西斯军人的凶相，喝令宪兵将唐家的大门关上，抓住唐的两个兄弟，勒令他们签名盖章，写一份承认唐同我断绝关系的证明。并抓来当地的警察署长，逼他在声明中列名。

我一到日本，给我作媒的便出现了。一个是在"九·一八"时期曾任陆相的南次郎大将，一个是在"九·一八"时期曾任侵略我东北的日本法西斯军头子的本庄繁大将。此外，日本的皇族方面，如北白川宫大妃、和朝香宫陆军中将，也对我作出了种种暗示。如请我到家吃饭，暗使服部少将调查我的私生活并特使女儿出来见面……南次郎和本庄繁还为争取对我结婚的"包办权"，演了一出"争媒"的丑剧。他们都愿意自己推荐的人，能中"雀屏之选"，都各自把自己"藩阀"（即日本德川时代的各地诸侯，明治以后，虽有"废藩"之举，但当地人

仍有地域之见）中的女性相片大批送来，我只看中了本庄所荐的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孙女浩。吉冈闻讯，便借正式出差之名赶到东京，推本庄为大媒，开始向嵯峨家交涉。其实嵯峨家并不知此事，这张照片是由他们的一个亲戚，为使她的儿子免服兵役而向本庄讨好独断送去的。当时，浩母女正在戏院观剧，忽闻此事，大惊。浩和其母曾有“即便是关东军，也无权强迫人家的婚事”之语。后在本庄等软硬兼施的说服下，才答应“先见一面再说”。吉冈曾对此大发牢骚，对我说：“什么华族不华族，日本的女性有的是，成不成没关系，我替你找好的！”

及我和浩在她外祖母滨口家相见双方表示同意后，吉冈特对我说：“在‘皇帝陛下’没有正式许可之前，对外绝对不要发表。”我对吉冈说：“我现在已和嵯峨浩定了婚，不使北白川大妃知道，将来一旦发表，似乎说不过去。”他说：“没有关系，将来大妃如果知道，你就说：‘关东军命令我不得事先向任何人发表！’”

为了加重宣传的色彩，选定在1937年4月3日——日本“神武天皇纪念日”的那天，在东京军人会馆举行结婚典礼。浩在从他的祖父家赴军人会馆时，从东京的杉并区大宫町到九段为止，中野、杉并两区的小学生都被动员出来摇日、伪国旗夹道欢呼以为点缀。举行仪式时，溥仪还特派伪宫内府大臣熙洽带着诏书前来参加。演完恭迎“敕使”的一幕后，便在“靖国神社”由贺茂宫司用日本结婚仪式举行结婚典礼。这一幕过去便是大开喜宴。日本的皇族竹田宫夫妻，当时的内阁总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及各阁僚夫妻，日本宫内省的松平宫相，直武侍从长，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众议院议长富田，还有三个大将，伪驻日大使谢介石以及前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远藤柳作、驹井德三和前内阁总理广田弘毅夫妻等共400余人皆来参

加。大媒本庄致词，大谈“日满亲善”等等之后，林铣十郎和谢介石等致祝词，最后日本外务大臣佐藤带头三呼万岁，这幕用以大事宣传的婚礼才告结束。过了几天日本天皇裕仁的母亲，还特意把浩召入宫中，“勉励”有加。

这次结婚的费用，全由伪满“宫内府”所出，“宫内府”次长入江贯一和“宫内官”加藤某亲来主持一切。并由“帝室财产”中拨出50万元存于银行，以年息两万元作为豢养这一对宣传工具的“生活费”。

在我们刚刚结婚不久，伪国务院立即发表了“帝室继承法”。大意是：“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以孙继之，无孙以弟继之……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打算使“日满混血儿”去当伪满的傀儡头子。同时再以“天照大神”作为“皇室”的祖先，以便借宗教侵略来达到武力所不能办到的阴谋并吞目的。妄想以这种自欺欺人的如意算盘，麻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更企图给同化灭种开辟道路。

我在伪军中的特殊地位

1937年我从日本陆军专门学校结业后，被调到沈阳“训练学校”（其前身即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任上尉教官。我借同溥仪的关系，利用同日本“华族”是亲戚的关系，以“日满亲善标本”为幌子，打着自己向上爬的如意算盘。我成了多方拉拢的对象。

在中国人的伪军官中，有的称我为“士官老前辈”，有的呼我为“小老弟”，特别是在留学过日本陆军的人，更对我表示“亲热”。中级以上的老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得过且过”，志在保存饭碗，有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特别是在敌伪末期，贪污行贿、走私贩毒几乎成为常事。在下级

的伪军官中，特别是在刚毕业的少尉中间，绝大多数对日军表示愤慨。有的参加了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也有极少数接近人民革命方面，还有的消极抵抗，甚至同“日系伪军官”公然对立，至于甘心跟敌人走的究竟还是极少数。我在当时既和日本顾问、“日系军官”圆融无间，又同伪军官串通一气，自鸣得意地以“日满桥梁”自居，觉得自己是个“超然”的存在，更加强了以“日满亲善”为己任的“信心”。

1942年秋至1943年冬，我在伪治安部参谋司第三科当了约一年的参谋科员。“治安部”的伪大臣为于琛澂。

当时，我是在第三科第二班任班长，专门担负伪军的教育训练和伪军事学校的工作。那时，被认为在军事、政治方面比较重要的科，如第一科（作战）、第四科（宗教）、第五科（航空）和第六科、第七科（铁路警，归关东军指挥调动，由伪军事部供经费）等，上层则是日本人，甚至全是日本人。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五册）

伪满时代的溥仪

爱新觉罗·毓嶦*

周克让　李澍田　吴大虹　整理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举国上下无不义愤填膺，而

* 爱新觉罗·毓嶦溥仪的远房侄辈。其父溥伟与溥仪系同曾祖兄弟。1932年，溥仪爬上了伪满执政的宝座。毓嶦则来到长春，在“宫内府”学习，陪伴溥仪，直至伪满覆灭。嗣后，在苏联战俘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都和溥仪在一起，是溥仪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毓嶦是吉林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

溥仪却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宠儿，被偷运东北，充当傀儡戏的主演，紧锣密鼓，在长春粉墨登场，这场丑戏共演了14年之久。

1932年3月，溥仪身穿大礼服在“新京”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执政府开始时，是在原吉长道尹公署旧址，后迁到原吉黑榷运局和盐仓旧址（即今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及其西院长春市第70中学和回族小学）。发表了《建国宣言》，据说这个《宣言》，是张勋复辟时“辫子兵”的参谋长万绳栻起草的。

当时北平的旧王公子弟们，听到消息，纷纷蠢蠢欲动，认为又有了“盼头”。溥仪开始拼凑班底，招揽“旗罗伞报”，俨然还要以帝王自居。我就是这时，以充当“护卫”的名义，被召到长春来的。

初见溥仪

1932年8月初，溥修从天津静园派溥仪的原侍从福隆阿（当时40多岁）到北平找我们，并规定日期到前门车站集合。我们乘火车到塘沽，改乘轮船经大连，再换火车抵长春，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这一行人有：马元通（旗人，后充警卫处警卫）、毓英（旗人，后充承宣科科员）、晏光（旗人，后充伪满飞行队中尉）、庄王府溥绍之子毓恕、怡亲王后代恒枢载澜之子溥俭（即我俭六叔），加上我共有二十多人，下车后，住在站前一个小旅馆，等候第二天入“宫”叩见“天颜”。阴历八月十六日上午，由福隆阿率领这一帮八旗子弟到伪宫内，按着皇宫的规矩，由奏事官派随侍吴天培（溥仪由天津静园带来的贴身侍从之一）引入，就在这天上午，在缉熙楼正式“引见”。溥仪站在楼上的晒台，身穿蓝色长袍，头戴瓜皮缎帽，还戴着他那个特制的近视墨镜接见我们。这时，跪在下面的这些八旗子弟，囿于传统的宗法观念，确实是“战战兢兢”地接受了“召见”。我

们在楼下院内先行“三拜九叩礼”（拜三次，每次叩三个头，故称三拜九叩礼），然后跪着聆听“圣训”。但是并没有听到说啥，只听说：“你们都来啦！以后好好学习。”又告诉吴天培：“其他人都下去，叫溥俭、毓嵣留下。”溥仪就退回楼上西南角他的书斋。吴又把我们叔侄引上楼。我们一进楼看见趴在楼门旁的两只大狮子狗，吓了一跳。吴说“不要怕，这是从天津带来的，可‘仁义’啦！”上楼往西走，在他那不大的书斋里，再行那繁琐的“三拜九叩礼”。礼毕，溥仪叫“起来”。这回不象方才跪着听了，而是站着低头听。为什么单叫我们爷俩？原因是他人都不是近族，以示对我们惇邸的重视，用这个来笼络人心。溥仪问我们都多大岁数啦？念过书吗？在京时常见二位主子（指荣惠、敬懿皇贵妃）吗？而且问得还比较亲切。当我们一一“上奏”后，便说：“下去吧！”我们这些被召见的，全都安置住在“中和门”东边那两间房。虽然这里与溥仪近在咫尺，但象远隔重洋一般。不久这些人全部都参加了军事训练班学习，以备给溥仪当“护军”，作他的守卫亲兵。

军事训练班

溥仪办军事训练班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他自己的亲信武装。他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他也作过恢复“大清江山”的美梦，所以还要象前清那样，宫廷门外设御林军。而这些人又必须是他的心腹，一旦需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假若再扩大武装力量的时候，这些人又可以成为他的亲兵骨干。

我们这个军事训练班，是溥仪自己决定成立的，由警卫处长佟济煦负责。佟是郑孝胥任北京小朝廷内务府大臣时，带入宫内充当“堂郎中”的亲信，后来跟溥仪在天津，侍候他，并专给他照相，又跟随来东北，是宫内的大管家。班主任是一位

东北讲武堂毕业的侍从武官叫金纯善，专管军事训练和学习；又派严桐江来管理班内总务。严与李国雄（大李）、赵荫茂、曹宝元、吴天培等都是在1921年前后收进来的。当年黎元洪任大总统，对宫内有所放松，小朝廷就一方面解除了些太监，但又偷偷地收了一些男童仆。这些人入宫侍候溥仪，后跟到天津静园，现在又随来东北，是溥仪的亲信随从，一直跟到伪满垮台为止。

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一）军事学，由伪军政部派来两位助教担任：一位是李学明中尉，一位是魏树桐少尉。（二）“四书”、“孝经”、“掌故”，由近侍处长陈曾寿教。陈是前清翰林，在天津静园时，与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等同为溥仪的“股肱”。他这次跟溥仪来东北，原想当个大官，结果没弄到手，溥仪只好安置他到身边，以示优隆。他讲“掌故”都是依据《东华录》，虽然他的湖北口音难懂，但讲的材料丰富、娓娓动听。当陈老师不在时，掌故部分，由商衍瀛讲。商老师也是清朝的遗老，广东驻防旗人，清末翰林，当过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还和张学良有过联系，是东北卍字会的名流。这时也来到溥仪身边，所以也给我们学生讲课。（三）“数学”，由宫内府警卫处职员谭老师讲授。（四）日语，由掌礼官岸名幸基（日本人）教，学习时间是一年。成员除了前述的八旗子弟外还有从天津带来的随侍霍福泰。他是沧州人，会武术，后来也成了溥仪的亲信随侍，一直跟到大栗子沟，最后还为“善后工作”而奔走。

训练班的那个院，后来改修同德殿（今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当时的房子是原盐仓的青砖瓦房仓库。我们学习的这段时间，也是溥仪为当“皇帝”做准备的时期。当我们学习结束的时候，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皇帝登基”。

“护军事件”

1934年3月，“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也由“执政”变为“皇帝”。这时，他的亲兵——护军也成立了。

护军总队队长由佟济煦兼任，下分三个队：第一队队长是吴天培，第二队队长是李国雄，还有第三队。佟戴少将肩章，吴、李戴中校肩章，与伪满军不一样，肩章是顺着肩的。护军共300人，其中有三部分人：（一）由天津带来的原在静园的护卫，多是沧州人，都会武术；（二）从东北招的蒙古族，胳膊粗，力气大；（三）由军事学习班训练出来的八旗子弟，除毓恕因考第一，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伪满末年，当伪军少校，我们从长春出逃前，他来宫中串门，也跟去大栗子，后来听说他投奔他姻亲蒙古卓王，解放后，在西安从事建筑工作，现已退休）外，全部当了护军。我被分到二队当上等兵，俭六叔当少士班长。我们这些宗室多在这个队。

伪皇帝登基，去长春西郊祭天，那些场面，我虽未亲临其境，但他们出出入入，也有所了解。记得3月1日那天，在其伪宫内府勤民楼举行“登基大典”。在此之前祭天时，溥仪穿的是清朝的朝服，由赞引官宝熙引导，后扈官胡嗣瑗随后，回宫后又换上大元帅军服。因为那时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在中和门西侧站岗，这地方很重要，所以不是一般地站大岗，而是近在咫尺，为“皇帝陛下”护驾，如同过去在宫内的“乾清门七品带刀侍卫”一样。

寒来暑往，为溥仪站了3年岗，不知何故而得到了“圣眷”，把我和溥俭调离护军，一同到宫内，与新从北平来的我们惇邸的子弟共同读书。这时，这支护军，仍然存在。第二年，也就是“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蓄谋搞垮这支溥仪

的私人武装。1937年6月28日，趁星期日护军放假，去逛大同公园（今长春市儿童公园）时，日人制造摩擦。据护军们回来讲：当时，他们欲买船票准备划船，旁边并没有日本军人，只有几个穿便衣的日本男男女女野餐，后来这些人也去争购船票，因而与护军发生争吵。日本人放出狼狗咬，被这些会武术的沧州人和胳膊粗、力气大的蒙古人给打败，并踢死了狼犬。旋即关东军宪兵队出动，逮捕了护军多人，并用电话通知宫内府。最后还是溥仪告饶，派佟济煦赔礼道歉。这就是“护军事件”。善后的处理是佟济煦当了替罪羊，罢职丢官，警卫处改组为皇宫近卫处，换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为处长；人员减少，变为警察性质；原来的长枪一律收缴，改佩短枪。溥仪这一点点可怜的私人武装，也不准存在了。这也是日本主子有意识地给他的高级奴才一点颜色看看。

伪宫廷院内的布局

伪皇宫虽然面向南有两个大门，但同德殿前面的那个大门，从来关闭，只走西边的大门（即今长春市第70中学的西南角大门），然后再从面向西的兴运门入院。入门左侧有宫内府（尚书府也在这里办公），通常以中和门为界，以北为办公事的地方，叫“外边”，以南就是溥仪居住的地方，叫“内廷”。缉熙楼就在内廷，而勤民楼则属于外廷，溥仪就在这里接见和“办公”。后盖的同德殿，则是溥仪“便见”的场所。对比起来，同德殿还现代化一些，接见外宾，有时就在这里。但在此处被召见的人，又均须从中和门那幢房东头的小角门穿过去东院。象日本裕仁天皇的弟弟除了秩父宫亲王是1938年5月来访时，同德殿尚未竣工外，其余的如1940年6月来访的高松宫亲王，1942年8月来访的三笠宫亲王，还有1939年5月来访的昌德宫李王垠

和1942年6月来访的日本皇族闲院宫春仁，以及后期的几任关东军司令官，就都是从这个小角门到东院去觐见的。

1943年春，汉奸汪精卫来东北，溥仪是在勤民楼接见的。当时未等溥仪下座，汪抢先向溥仪行三鞠躬礼，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傀儡戏两个主角的合演。溥仪因与汪有杀父之仇，在汪未来之前，曾很伤脑筋，不接见吧！又怕日本人见怪，最后，还是看在日本主子的面上，真个化敌为友了。随同来的还有汪的秘书溥僡（恭亲王溥伟之弟），也同汪一齐行了鞠躬礼，因而受到了宗室人们的普遍谴责，说他怎么能同汪精卫一样呢（意思是应该行三拜九叩礼）？汪来东北时，到处声嘶力竭地高喊："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永远是同胞。"颇又迷惑了一部分人，甚至还有人认为"汪精卫不一定是真心给日本鬼子当傀儡"。溥仪在宫中还对汪赐宴。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帝室御用挂"这个名词是日本语，有的翻译为皇帝机要秘书，我看不如说是皇帝的看管人或大管事更为妥切。

这位日本军人，是个矮个，高颧骨，留个日本式小胡子，长得一脸横肉。据说溥仪在天津时，他经常出入静园给"讲时事"。后来，溥杰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他当战史教官。我是1937年认识他的。当时，他只是中校军衔，不过他军服前经常挂着参谋带，因为他还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出入宫内，高傲无比，对我们学生从不理睬。10年间，逐级晋升为陆军中将，他是溥仪的监视人。溥仪对吉冈安直是言听计从，吉冈就成了关东军和溥仪中间的传话筒。溥仪每次接见外人，他是照例参加，站在最前面。对宫内看管很严，例如有人求见溥仪，由兴运门入内，先到奏事处，正东面就有与吉冈通气的日军宪兵队，看得

清清楚楚。假如奏事处引见，经过中和门时，日本宪兵队更要严格记录。总之院内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记录，只有我们学生例外。“七·七”事变前，还不严格，以后一天比一天紧，甚至溥仪到了沈阳被苏军俘获，吉冈在旁边还向苏联将军要求允许溥仪去日本，日本的宪兵曹长浪花还一步不离，一直到通辽下飞机，才被迫与溥仪分手。他与溥仪谈话，不用翻译，有时用他那日本式的英语与溥仪交谈，经常使用的是“协和语”。

建国神庙

1940年，溥仪去日本庆祝日本神武天皇2 600年大庆，接回来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器：八咫镜，天丛云剑，八坂琼勾玉。这3件东西的模制品，在日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

溥仪秉承关东军太上皇的意旨，在同德殿东南角院外，又修了一座用白木头造的建国神庙，进院子的通道上铺了白、红、绿三色的雨花台石子，在庙内供上了那3件宝。现成立了一个祭祀府的机构，由退役的前关东军参谋长、宪兵司令官、陆军中将桥本虎之助任总裁，清廷的旧臣沈瑞麟为副总裁，还为此颁布了一个《国本奠定诏书》。每月初一、十五日，溥仪带头去神庙祭祀，全东北的人民也被迫每日向神庙遥拜。这种愚民的事情，一直搞到伪满垮台为止。

溥仪与日本人

溥仪和日本主子的关系，是傀儡和主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七·七”事变前后又有所不同。以前日本人在形式上还留点面子，有些重大事情，还要走走“御裁可”的过场，一些伪大臣们还要不断地去勤民楼觐见。那时候每天都唱“国歌”（据说是郑孝胥作的词）：“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只有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这些鬼话，固属荒诞不经，然而却如实地道出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万恶罪行，也逼真地勾勒出一副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形象。尽管如此，那时溥仪为了当傀儡皇帝，确实在骨子里真跟日本人“一德一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主子对这个傀儡在形式上也不怎么需要了，索兴“过场”也不走了。所以在溥仪的心中，就是维持个“皇帝”名义，“保命”就行，对日本人更加奴颜婢膝。假戏还得真唱，这样的场面很多，如伪满后期，“大东亚战争”已经筋疲力竭的时候，吉冈来和溥仪谈，要他对“圣战”有所表示，溥仪满口答应，并立即执行。他下令把伪皇宫的铜物器皿、宫灯、楼梯扶手等都卸下来，进行“金属献纳”；把自己的一些不值钱的日用品，也交出来表示他个人“献纳”的忠心。但是真值钱的好东西，包括他的白金表却都藏起来。还听说他第二次访日时，见了日本皇太后，又行礼、又搀扶，极尽阿谀之能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4年春天，在同德殿南晒台上，他接见日本青年“敢死队”时，我们几个在他身后不远的屋内偷看热闹，亲眼看到庭院内站着一帮龇牙咧嘴的“肉弹”，他们都是准备“玉碎”的日本青年兵。溥仪在上边，一面讲话，一面痛哭流涕。我们这几个都感到他在那里“演戏”，由于这种闹剧，演习惯了，所以虚伪也仿佛真的一样，表演时动作自如。在大栗子听到日本宣布投降时，那个动作可以说是最后一次登峰造极的表演。

（摘自《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伪满宫廷见闻琐记

孙喆甡

傀儡皇帝上场

（一）"帝出乎震"，袍褂登场

1932年5月，溥仪以伪满洲国元首——执政的名义，堂而皇之地会见了"国际联盟调查团"。在短短的20分钟内，按照日本人事前布置好的一切，象鹦鹉学舌似地和调查团长李顿做了简单的对答，既替日本人侵略打了掩护，也为自己脸上擦了粉，得到日本侵略者的赞赏。实际上，日本人早向国联调查团行了巨贿。溥仪和调查团长李顿的对话，也只是假戏真做，走走形式，掩人耳目而已。

日本人为进一步利用溥仪，于1933年10月通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正式通知溥仪说，日本准备承认溥仪为"满洲帝国皇帝"。消息传来，溥仪如承"天封"，一时竟忘乎所以，准备自己"龙袍加身"；股肱之臣，也都要翎顶袍褂起来，开始演一出大登殿了。然而事情并非尽如人意，日本人只是同意他当"满洲国皇帝"，并不承认"清朝复辟"，反对"龙袍玉带"、蟒袍花翎，要求溥仪只能穿着大元帅正装礼服登极。最后经过"行走"们反复周旋，达成调和，于1934年3月1日的早朝，在长春（改称新京）南郊杏花村筑起的一座土垒的"天坛"上，让溥仪穿上特由北京送来的保存了二十多年的光绪当年用过的龙袍。溥仪仿照祖制，象做戏一样怪模怪样地行了告天即位大礼；然后回到宫内府，又卸下古装的龙袍，换上陆海

空军大元帅正装礼服，登上“勤民楼”大厅，举行登极典礼，当上了新“皇帝”。典礼上，由宫内府大臣宝熙，侍从武官长上将张海鹏（绰号“大麻子”）站在两旁，分由侍从武官、侍卫官们陪列两侧。正厅由国务总理秃翁郑孝胥为首，率领文武百官（日、满混杂）进行朝贺，溥仪“龙颜”大悦，如登春台。当晚大摆家宴，宗室觉罗三代同堂（来自京、津各地的载、溥、毓三代），行三拜九叩大礼。

为了庆祝这次大典，“举国”欢腾，宠赐优加，向官员们颁发了胸佩式的银质褐色圆型圈边的“大典纪念章”，正面是双凤朝阳，中间四个大字：“帝出乎震”，背面是康德元年3月1日大典纪念。

（二）过海成龙，溥仪访日

溥仪登极重称皇帝之后，诚然是头脑发胀，想入非非，果真梦想恢复祖业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察到日本人“皮里阳秋”，与当初请他出关的承诺条件大相径庭。他心里狐狐疑疑，感到不是滋味。然而退一步想，日本人在对他恢复帝制上还是履行诺言的，他们事事不撒手，也许是因为邦基未固，需要“友邦”“无私的”援助。他有时也打卦问卜，若逢“乾乾卦”象，便兴高采烈，认为是大吉大兆；若遇“水火未济”，就感到懊恼，大失所望。

1934年4月，溥仪不知爻出什么喜卦，忽然得到关东军通知，日本天皇裕仁邀请伪满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以敦两邦友好之情。溥仪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为了“日满亲善”，当然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邀请。按照关东军的计划，按日、按时“启驾东游”。在大连登上日本战舰“比睿丸”。在飞机舰队的护航下，飘飘然横渡日本海，直抵东京附近的横滨登陆，受到隆重的“礼遇”：鸣礼炮21响，乐队作乐，裕仁亲自迎接，检阅仪仗队，然

后设宴招待，元老重臣们拜谒祝贺。这些，足以使溥仪认为真是“以诚相见，亲同手足，昭如日月”了。裕仁的母亲、“皇太后”，还一破常规，在后宫里宴请了溥仪，乃至亲贵的妃嫔们也是隆礼倍加，极为尊崇。这就使溥仪更认为自己和裕仁真同兄弟般的平等了，自己在满洲的地位和裕仁在日本的地位也一样是“至尊至贵”的，日本人对自己也应该是象对天皇一样的“忠诚”。溥仪昏昏然了，所以一回到满洲，他便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文曰：“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朕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与友邦一心一德”，“人类福祉必可致也”。继又下令，立即把在京（长春）的简任官以上的官吏，不分国籍民族全部召集来，溥仪亲自训话，发表了兴高采烈、忘乎所以的讲话，宣示“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皇帝陛下和天皇陛下“亲同手足”云云。复用推理逻辑得出：“日本人不忠于满洲皇帝，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满洲人不忠于日本天皇，也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

伪满宫廷内外

伪满的皇居宫廷，是溥仪办理政务和起居生活的地方，为了区别于日本东京的“皇宫”，改称“帝宫”。而实际一般人仍多称之为“皇宫”或称“宫内府”。

（一）帝宫所在及建筑物情况

伪宫坐落在旧长春市的东北方向，系原长春“吉黑榷运局”的旧址。当地人俗称“盐仓”。因此有人说，溥仪住进了盐仓，必要成为一条咸（闲）龙。榷运局原有三幢二层楼房，还有平房若干间。伪满成立后用做“执政府”，后又经修缮整理，

增建部分房屋，便用作宫内府了。

宫内府　正大门面南开放，院庭分内、外两层。外层由2.5米高的宫内府围墙环筑而成。墙身下接台座，上接墙帽，各有“水刷石”条带框一条，中间抹赭赤色墙心结合而成。大门正面系三组共六座不等高式的方形门柱对称分列两旁，中间一组最高，安装有对开双扇铁花门一组。比邻一组稍低，分列左右。各装有单扇铁花门一樘。铁门下均装有滑动门轮，开闭在铁轨上滑动。门柱上均装有照明灯，实用美观。另一组接墙门柱与铁门门柱之间，有弧形抱壁相连形成整体。宫内府外观虽非雄伟壮丽（尤其是与北京紫禁城相比，连一座王府也不如），但远近相望，红墙铁门整肃壮观，也十分醒目。由正大门西行约100米处，另开有侧门一座，系禁卫军机关部队通常出入的通道。门内庭院，前半部有禁卫军司令部各科室礼堂、会议室、饭厅等，后半部则为禁卫步兵团兵舍及应有的附属建筑。另有骑、炮兵连驻军在南岭兵营。

由宫内府正大门北行是一段上坡路，约80米处则系“帝宫”所在，另有围墙，较外墙为高，森然庄重，紧密严实。正门曰：“承光门”，面西而设，与南向的正大门成90度角方向。内外围墙均修筑有了望岗楼、哨所，常年有哨兵守护。另有巡察线路，巡察检视官兵游动其门，日日夜夜，常年不懈。

进入“承光门”帝宫内部，主要建筑有：“三楼”、“两殿”，及一切应有的附属建筑，如膳房、花园、球场、滑冰场、假山、防空地下室等。

“三楼”系原榷运局旧有建筑。“两殿”为伪满新增扩建的房屋。主要建筑均由溥仪亲自命名定称。三所楼房曰：勤民、缉熙、怀远；两殿曰：同德、嘉乐。

勤民楼　是溥仪平时理政办公和节庆日举行典礼朝会宴飨

的地方。“勤民”，采“勤政爱民”之意。把他自己的办公室又命名曰“健行斋”，是取自《易经》“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义。开始“登极坐殿”，打叠精神，“日理万机”；可是时间不久，便感到“勤政无权皇帝假，爱民乏力空有楼”了。此楼下还有贵宾室、候见室等。

缉熙楼　“缉熙”，出自《诗经》“于缉熙敬止”，希国家达到光明和乐的境地。在“中和门”之内，为溥仪寝宫后室，属于内廷，按章非承召见之人，均不得擅入。溥仪和婉容就分居在这楼的东西两头，但很少见面。贵人谭玉龄曾住此楼下，白天谈谈笑笑、说说唠唠，但夜晚，仍各归各室，互不相扰。除皇后（婉容）、贵人（谭玉龄）外，楼中还有少数眷属。溥仪特设的中药和西药房也在楼内。楼下还专设有小客厅一处，原为接待皇亲国戚、勋臣故旧，谈心叙事之所。可是日后，常来常往，经常出入这里的，却是一个自称和溥仪是“脚趾”关系的“准家属”，帝宫内头号日本特务大总管、太上皇、皇帝的“御用挂”（专属之意），名叫吉冈安直的日本军人（中将）。

怀远楼　“怀远”，自然是对祖德宗功，有慎终怀远之意。是供奉祭祀觉罗列祖列宗的祖先堂所在，也是供佛诵经做佛事的场所，因此文圣孔子、武圣关帝和如来佛都各占有堂位。此外听说还有对清朝肇业有过恩德的人和神也享有奉祀等等。尚书府也在怀远楼上设有办公地方。

溥仪受制於人，过着傀儡生活之后，心灰意冷，悔愧万端，无以自拔，经常跪在列祖面前忏悔，到佛堂上祈祷求救。

同德殿　寓“同德相求，同心相应”之意。原本为显官重臣们讨论研究国家大事、论政决策的地方。然而事实证明，国家大事却有人另在东京研究讨论；决策则多由关东军司令官、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制定。问及“总理”有关国务的事宜，“总理”

只能回答说："总务厅长官在办"。问及各部大臣"总长"，依样答复是："次长正在办"。而总务厅长、各部次长则是"清一色"的日本人。实际讲来，溥仪以下伪满官员，只能喊"日满一德一心，建设王道乐土"；掌权的都是二号人物，什么"次长"、"次官"之流。中国人的什么总长、大臣们，除了拿薪水吃饭以外，什么都没有份儿，也没有可做的事。谈到拿薪水，还有一段插曲。事情发生在伪满建国伊始。一次国务会议上，讨论所谓的"给与令草案"，关系到各级官员的薪俸标准问题。草案早由总务厅印好，即会分发给总长们讨论，走走形式，准备定案颁发，照令实行了事。本来，若事不关己，总长们已经明白：提出异议，也是自找无趣，因此一向都是"举手赞成"。而今天，总长们一看草案内容规定，"日系"的薪俸比"满系"高得多，一般的同等官要相差40%。就以各部次长（日本人）为例，比满人的总长也要高得多。利害攸关，大官们忍耐不住了。此中自恃有点靠山的、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有师生之谊的财政部大臣熙洽首先提出异议说："我们既然是一个复合民族国家，就要一德一心，各民族就该一律平等。为什么在薪俸上，日本人要享受特殊待遇？这个草案定得简直不合理！如果说是个'日满亲善'，就该有亲善的表示，拿高薪能算亲善吗！"继之，丁鉴修等也纷纷发言，要求不分厚薄，"一视同仁"。结果日本人的"总务厅长"驹井、人事课长古海说话了，说："要想一视同仁讲平等，须先看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当然待遇要高；何况生活程度也不同，日本人生来就是吃大米的，满洲人吃高粱米就是上上的。要讲亲善，给日本人高薪才是亲善吧。"大家听了憋一肚子气，当然不满，闹个不欢而散。结果还是关东军作出了决定：为了满足总长的利禄要求，把总长们的薪俸额一律提高，和日本人的次长们平等（同一标准）。但是，

驹井传达说："日本人为了帮助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这是应该感激的。因此，决定在薪俸之外给日本人官吏以特别津贴。军方已做出决定，不能再有争执了。"多数大臣们认为已加了码得了利，不想再找无趣。独熙洽自恃系日本留学生（士官毕业）和军方人有些联系，很不平气地说："我争的不是钱，不过我要问问，日本人在哪个地方建设王道乐土？不是在我们满洲国吗？谁请你们来的？没有满洲人，你们有能力就能建设吗？"这一言冲了驹井肺管，不禁拍案大吼道："你还是一个满族人，你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用生命之血从俄国人手里夺来的。你懂吗？"这一闹，熙洽憋一腔闷气，回到家里把恩赐给他的30万元"建国功劳金"摔到地上，叫家人交给张燕卿、谢介石转退给关东军以示抗议。而谢、张二人揣情度势，一怕到关东军那里碰钉子，二又见钱眼红，何不一举两得，干脆来个"二一添做五"各得15万元。同德殿，有殿无德空悲切。

嘉乐殿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嘉乐殿和同德殿一样，都是皇帝即位后新扩建的殿堂，采用民族形式，宫殿彩色，修得有些"古香古色"，别有雅致风味。本来是举行集会的地方，可以说是召宴群臣欢聚，赐酒开筵乃至大喝香槟酒，大吃山八珍、海八珍、燕窝鱼翅之所。然而真正的嘉乐并没有。溥仪逐渐精神空虚、心绪日烦，到后来连荤都不想吃了，还有什么嘉乐之兴呢？

建国神庙　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名义上是参加日本神武天皇纪元2600年大庆，但真正的使命则是迎接"新祖宗"，日本的建国大神——"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是个什么神，勿庸多谈，日本天皇就是大神的神裔，因此每代天皇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称天皇为"现人神"。日满既然是精神如一

体，就不能不奉祀这位“干祖宗”。大神具体有3件宝：八咫镜、御汰刀（另名记不清）、八坂琼曲玉（被溥仪说为勾玉的）。

溥仪把干祖宗迎接回来，遵照太上皇的意旨，先在宫内府修建起日本神社式的“建国神庙”，以此做榜样，伪满到处都建起日本式的神庙。在宫廷内设立了“祭祀府”，置“祭祀府总裁”，规定每逢初一、十五，以溥仪为首，连同关东军司令官以及“满洲国”的官员们，均参加致祭。全国各地也都遵章按时致祭。另外还要求凡路过“神庙”附近的人，都须面向庙，立行90度鞠躬礼，以示崇敬。然而由于中国人“纲常伦理观念”最深，这项要求引起了人民极度的反感和厌恶。因此凡有神庙的地方，行人都绕道而行，表面上“敬鬼神而远之”，背地里则是“骂不绝口”。东北人对此厌恶反感，不言而喻。

溥仪对迎接“天照大神”这件事，也是象在“疮疤上捺了一把盐”，苦痛在心。他在第二次迎神访日归途中，曾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后来从不穿规定的祭祀服。据溥仪自己的记叙，他每去“神庙”行祭之前，总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北京坤宁宫（紫禁城里过去祖先所在地）行礼。

（二）宫廷内的机关人事和职责

伪满皇帝的宫廷，虽比不上北京紫禁城的宫廷和日本裕仁的宫廷那样“富丽堂皇”，机构也不及前二者的臃肿复杂，但相对一般机构而言，它也还是庞大的，而且内部情形反而复杂得多。兹简述如下：

宫廷内设有“宫内府”、“尚书府”，后又有“祭祀府”。之外，还有侍从武官处、护军、禁卫军等机关部队，负责保卫宫廷和皇室。

“宫内府”设有总务处、内务处、掌礼处、近侍处、侍卫处、警卫处、秘书处等，据估计从事各项业务的职员，就有七百人之多。

“宫内府”大臣先后有沈瑞麟、宝熙、熙洽，次长是日本人。

总务处先是许宝蘅，后来也换了日本人。

内务处长先后有商衍瀛、罗福葆、刘杰三等人。

掌礼处长不详。秘书处长胡嗣瑗、陈曾寿等人（陈曾任皇后婉容的老师）。

近侍处长先后有陈曾寿、佟济煦、溥佳、毓崇等人。

侍卫处长先后有工藤忠（日系）、溥佳（改名金智元）、陈懋侗等人。

警卫处长先是佟济煦，护军事件后换日人长尾吉五郎。

“尚书府” 大臣先是郭宗熙，后任袁金铠、吉兴等人。外有秘书官长，日本人。

“祭祀府” 总裁是日本人桥本虎之助，副总裁沈瑞麟。

侍从武官长先是张海鹏，后任张文铸。

侍从武官处 是皇帝侍卫机关，对溥仪人身安全直接负责。侍从武官长则系专陪伴溥仪的最高武官，一向由上将军衔的老资格武官充任。每当“御巡狩”、“御临幸”，以及举行各国典礼仪式时，武官长必在皇帝身边相伴随，以示皇帝的尊严威仪，并保证其安全。武官长以下有若干名侍从武官，一般由上校、中校军官充任。调任的侍从武官必须先得溥仪的同意，因此以亲属贵戚出身的人居多。通常在溥仪例行各种典礼仪式时，作为伴行人员相随，负安全保卫责任。

禁卫军 原称翊卫军，后改禁卫队，归伪军政部直辖，专任宫廷内的安全保卫警护戒备责任。设有禁卫队司令部，下辖禁卫步兵团、骑兵连、炮兵连等部队。通常除承担宫廷警卫戒

备外，还有派出仪仗兵或随行警卫兵的任务。军官中有少数日本人的校尉级军官，被称谓“日系”军官，实则是放在军队中的监军、特务。禁卫军首任步兵团长郭文林上校是蒙古族，后作兴安省军管区司令官。继任禁卫队（改称后）队长是步兵上校任广福，后期任第四军管区少将参谋长。再后禁卫步兵团长是步兵上校于宗谦（于芷山之子）。1936年后，禁卫军扩设司令部，先后由陆军中将李文炳、王克震、张明久等充任司令官，直至日本投降。

护军　不同于禁卫军，不属于军政部管辖，也不在宫内府编制之内。护军共有300人，完全是由溥仪私人的帝室费出钱养活的贴身亲信武装卫兵，专负帝宫内皇室的安全警护之责，大部由满、蒙族人所组成，不分兵种，平时训练以武术拳脚，扑打擒拿或枪击为主，由警卫处领导。护军军官一般称“武官”，实际就是教师爷，没有日本人。这支武装表面是皇室的卫队，但溥仪豢养他们真正的目的却是以其为基干核心，以便将来扩大自己的亲信武装势力。这支卫队也可以说是皇室的羽翼死党，因此很受日本人的警惕和猜忌。所以关东军对此也十分瞩目，这就是后来发生护军事件的内在原因。

侍卫处　处长以下有侍卫官若干名，在宫内府编制之内。侍卫官分一、二、三等，均由皇帝国戚或勋臣后裔充任，经常出入内廷，为溥仪身边更亲近的武官。

“日本宪兵”　在溥仪帝宫之内，负有保证宫廷安全和溥仪人身安全的责任。除有上述侍从武官处、侍卫处、警卫处、护军、禁卫军等机关部队以及武官等等外，更有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宪兵”。这一小撮来自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特派的一群官不官、兵不兵的人，名义上是保护皇室、保护溥仪的，实际上则是宫廷“监狱”里的刑警狱卒。他们在“御用挂”的直接指挥

下，监视着宫中的一切。

现将在溥仪身边宫廷里的高官近臣，人事关系简介如下：

沈瑞麟（后任祭祀府副总裁）：清末遗老，辽宁地方绅士，有财有势，与袁金铠等在张作霖时代名噪一时，炙手可热。

熙洽：字格民，觉罗远支宗室，早年参加宗社党，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张作霖时代曾充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的参谋长，伪满成立后任财政部大臣，后调任宫内府大臣。

宝熙：字瑞臣，宗室豫亲王多铎九世孙，翰林出身，曾官拜礼部侍郎、府中令等职。

胡嗣瑗：字琴初，贵州人，翰林出身，历官翰林院编修、内阁左丞。伪满特任官宫内府秘书长等职。

陈曾寿：字仁光，湖北人，进士出身，历官监察御史、学部侍郎，皇后婉容的老师。

佟济煦：福建闽侯人，历官内务府堂郎中。

商衍瀛：翰林出身，历官懋勤殿行走。

万绳栻：复辟时张勋定武军参谋长，历官内阁右丞。

郭宗熙（尚书府大臣）：字侗伯，翰林出身，张作霖时代黑龙江省长。

袁金铠：字洁珊，辽阳人，秀才出身，历官四品京堂，张作霖时代军、政两署秘书长，一贯为张出谋划策，深得信任。

罗福葆：字君羽，罗振玉之子，日本留学生。

溥佳：宗室亲贵，贝勒，载涛之子，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改名金智元。

陈懋侗：陈宝琛之子。

吉兴：满族，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伪满先任第二军管区（吉林）司令官，后调宫内府大臣。

张海鹏：张作霖盟兄弟，绿林好汉出身，张作霖时任洮辽

地区镇守使，伪满初任第五军管区（热河）司令官，后调第一任侍从武官长，绰号“张大麻子”。

张文铸：旧东北军旅长，伪满第二军管区（黑龙江）司令官，后接替张海鹏任侍从武官长，晋上将军衔。

伪满皇帝的权力和地位

1934年3月1日，就在溥仪受命“登极称帝”的同时，颁布了所谓的伪满“组织法”（相当于宪法性质）。“组织法”里明文规定：“满洲帝国由皇帝进行统治”，即由皇帝统揽统治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均归属于皇帝溥仪；“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不负刑事责任，国务上也无回答之责。一句话，皇帝拥有最高最大的权力却无任何承担的责任或过失（不受法律限制）；“皇帝还拥有统帅权”以及发布各种法令和命令，即有统率陆、海、空军，颁布“紧急令”，掌握大赦、特赦权等。

但是，实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代理人——关东军司令官，为了充分控制溥仪，真正掌握统治伪满的大权，极力夺取皇帝头上的太上皇的地位。一扫伪满“组织法”中规定的内容，于1936年9月18日，即日本侵入东北5周年之际，另起炉灶泡制了一篇名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文章，其中有一节专门阐述日本天皇、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皇帝之间的瓜葛关系。其文曰：“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日本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皇帝的天职。”本着天皇意旨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合理化建议”，为了保全伪满皇帝之尊严和溥仪这块“金字匾”，在关东军内部特设了一个“第四课”，溥仪身边挂上了一个“御用挂”。

（一）皇帝的地位和尊严

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这是组织法上的明文规定。具体表现在“御巡狩”、“御临幸”时的威仪；奉祀“御真影”和奉读“诏书”、“敕谕”的严肃。在一切满洲人的面前确是如此，在内宫亲族奴仆面前就更是如此。然而在太上皇内部指导的面前，溥仪就完全失去了皇帝的尊严，更谈不到不可侵犯了。

御巡狩 所谓“御巡狩”就是溥仪遵照关东军的意图、指示，每年到外省或外地进行观察巡视。这是宣示日满“一心一德”、皇帝尊严的一种假戏真做的形式。从宣布出巡到御驾出宫，经过沿途到达目的地，到处警卫森严、繁礼缛节，十分庄重。后台操纵和导演的是太上皇关东军；配角是国务总理和有关大臣、军管区司令官、省长、市长之流；跑龙套的是随行的警卫、侍从官员以及各地方的警备部队等等。

1938 年一次去奉天巡狩，出巡之前，“首都”（长春）车站内外先行安全大检查，对来往乘客严加盘询检查，对通行便路严加封锁；到处加设岗哨，同时把车站内外的建筑、室内室外打扫净洁、粉刷见新，以示敬重。出行当天，机关、部队、学校，以及沿途铺店门面均悬挂伪满五色“国旗”。沿“车驾”通路先满布军警，面向外立，禁止路人通行；另有军警巡察，监视两旁店铺或住户有人出入，禁止有人在窗口上探头张望。在宫内府正门外马路旁，有由禁卫步兵团派出的“仪仗队”，捧持军旗、持枪佩刀，排列整齐。车驾通过时，奏号音，军官行撇刀礼，士兵行据枪礼（上刺刀），确是威仪赫赫、无上尊严。车驾出动前，全市即广播：“皇帝陛下启驾出宫！”在车驾之前，最先头是浇道泼水的净水车，再次是军警乘坐的插有小旗的导行车，然后就是所谓的“卤簿”车列。车列前头是“警察总监”，坐着一辆红色敞篷汽车，随后有四辆全红色的三轮摩托车护卫

在"銮舆"的两侧．车上乘坐的护卫军官四人例由禁卫军指派少校或上尉军官佩带勋章、手枪充任。

万寿节　（正月十三日溥仪诞辰）祝寿的仪礼形式：伪满的万寿节即溥仪的诞辰纪念日，系旧历正月十三日（后改阳历2月16日）。从历史上看，封建皇帝的生日是当时一件大庆贺日。不独是当朝的文武大臣都要煞费一番心机，投其所好，就是商人、投机分子们也要挖空心思，争作一笔应时的生意，从中渔利；甚至也仿效日本"天长节"（天皇诞辰）一样，在全国放假一日。然而溥仪在伪满时期，万寿节的庆祝却从未象祖制那样辉煌煊赫。具体情况是：一般在皇宫勤民楼内举行祝贺仪式。每年万寿节，在长春的有资格参加祝贺的文武官员们，当日按时分批进宫朝贺，宫内府禁卫军军官以上均有份参加。

届时，勤民楼礼堂内悬灯结彩，倍极装饰，为庆祝仪礼准备好一切。通常大厅里铺着大红地毯，靠北墙根用丝帷幕装设成一个讲台似的地方。中间放有特制的饰有"兰花御纹章"的御用高背椅。前来参加祝贺的臣子们佩带进宫标志，依次进入勤民楼礼堂，排列整齐。然后伴随奏乐声，溥仪亲临台上，祝贺的人们行90度祝寿礼。溥仪以半躬礼答礼后，静立台上。乐止，臣子们抬起头来，一睹"天颜"。既无祝词，也无答词。礼成．溥仪退下。然后就位赐斟，各饮祝寿酒一杯，即将各自的酒杯作为祝寿的纪念品携带出宫。

酒杯历年不同，但均系特别烧制的瓷质品。记得有一般圆型杯，外面有黄色镶框带"寿"字的花纹，内杯底有团龙金色花纹；有细筒高脚式圆口杯，外面釉质，黄色框边花纹，中间镶有红色寿字，杯内有金色"御赐"两字；有方斗型平底带把杯，四面黄色花纹，内壁素白，杯底有"兰花御纹章"。这些杯造型比较精巧，内杯均用黄缎布包好，外有方盒木函，上盖顶

有金色“御赐”字样，以黄丝绦带十字绑结而成。

万寿节对外虽很简略，但在后宫内室仍袭祖宗旧制：盛开家筵、祝礼拜寿，倍极隆重，一律行跪拜礼，但也只限皇亲内戚才能参加。

为了庆祝溥仪生日，对宫内府禁卫部队也例有惠赐酒肉，以示恩宠。

（二）皇帝的权力

首先，溥仪有权发布各种法令和命令，读读伪满洲国史，就可知道溥仪裁可发布的法令和命令为数实多，难于记叙。就其荦荦大端，溥仪自1934年3月到1945年8月15日，颁发的“诏书”就有六种之多，如1934年3月1日“即位诏书”；1935年5月2日“回銮训民诏书”；1940年7月15日“国本奠定诏书”；1941年12月8日“时局诏书”；1942年3月1日建国10周年诏书；1945年8月15日“退位诏书”。

其次，溥仪的例行公事有：每月有三次关东军司令官的例见；每周接见伪国务总理一次——听取伪国务院工作报告；每周接见伪参议府议长，听取他对国务会议的意见报告。

所有这些都是例行公事，纯系装模作样，自欺欺人。什么事都是关东军方面决定了，写在纸条上，叫他念一遍他就念，叫他签名就签名，叫他裁可就裁可，什么条约、诏书、敕令、法令，概莫例外。

（三）危言震主，杀鸡给猴看

1. *凌升之死*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是原张作霖独霸东北时代的东三省保安司令部顾问兼蒙古宣抚使。迨日本侵占东北，凌升曾为“劝进”的请愿代表，到过旅顺面谒溥仪。由于有功于伪满建国，便当了伪满兴安省省长，在蒙古贵族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威信。而凌升自幼是一个王孙公子，自尊自贵

惯了。从历史上说，他父亲算得是清室的重臣旧勋。满族、蒙族一向都是北方民族，相互依存拉拢，上层人物中结亲联姻之事屡见不鲜。伪满成立，凌升表现忠诚，愿为“大清”复国尽力。溥仪为了加强自己力量，进一步结好满、蒙间关系，便允把四妹韫娴（人称四格格）许配与凌升之子，结成亲家之好。谁能逆料，以伪满皇帝亲家、伪满洲国兴安省省长地位的凌升，竟突然被关东军逮捕了。逮捕原因，据军事法庭宣布的罪行是：勾结外国（指苏联）图谋叛变，反对日本。真正的事实谁也不清楚。但宣布的罪行十分严重，依法当诛。结果宣判死刑，而且是“斩首示众”。

后据确凿可靠的传闻：凌升之死根本谈不上什么“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实则就是在省长联席会议上，不知深浅地发了几句牢骚话，抱怨日本人太跋扈，至使他这个省长有职无权。这就是“叛逆”，确有点“反对日本”的气味，使他一言丧命。无怪乎做为亲家的溥仪皇帝感到震惊！留在心灵上的却是一个“怕”字。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对溥仪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需的！”这一件事使溥仪浮想联翩，他想前思后，悟出了一条奥秘，日本人衡量每个人的唯一标准即是对日本的态度。他不禁想到被人称为“老豆腐匠”、胡子出身的“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竟最受日本人的宠爱，原因是他十分聪明地会做奴才，专长于替主子说有利的话。例如，日本人说日、满“一德一心”，张景惠就说：“日、满两国是两只蚂蛉（蜻蜓）拴在一根绳上。”日本向东北“拓殖移民”，廉价强购农民土地，遭到伪满官民一致反对，张景惠却说：“满洲土地多，但人是老粗没知识，日本人用新技术来开荒”是“找饭大家吃”。日本人夸他是“好总理”，直到伪满垮台。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粮

草接济困难，进一步向伪满洲国实行压榨，强行征购农民粮谷，美其名曰“支援圣战”。而征购价过低损害农民元气过甚，因此农民反应强烈。部分“大臣”们将此事提到“国务会议”上研究，日本人当然反对。就在这关键时刻，这位“宰相”又出来排难解纷了，他不急不躁地说：“皇军在前方出人卖命，我们在后方拿点粮、流点汗不流血，谁轻谁重，还用说吗？少吃一口粮，勒勒腰带不是什么都有了吗？”内阁首班这样一说，大家只好嘿然通过。这个老豆腐匠，早在张作霖独霸东北时，同样官运亨通。他曾是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还兼任过哈尔滨“工大”校长。有一次因为“工大”学生闹学潮，他以行政长官的资格到学校去进行威吓，大发雷霆，并大骂校长“混蛋”坚决要严惩不贷。有人提醒他：你就是校长，他才悻悻作罢。

2. 会晤德王　由日本操纵的“内蒙自治军政府”的首脑德王原是蒙古王公，早年就和溥仪有过交往。1937 年到长春找关东军联系事务，借机请得关东军同意，允许他到伪皇宫探望溥仪。旧友重逢，互道别情；同病相怜，倾诉心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一王、一帝，视景伤情，大有寄人篱下之感。这对“难兄难弟”，话说得离了本题，不免相对黯然，发起牢骚来。谁知“窃窃私语，墙上有耳”，二人所言竟一五一十地被传送到关东军。关东军的替身所谓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竟毫无忌惮地捅开德王与溥仪的私语，提出质询：“昨天陛下会见德王谈了些什么？”溥仪一听，顿感大事不妙，若按实说来，一条绳上系两个蚂蚱，谁也逃脱不了，悸慑于凌升之死，溥仪“急中生智”，假装胡涂死不承认，硬说是否德王说了什么假话云云。因为两个傀儡发怨也颠覆不了“皇军”，无关大事，吉冈就顺水推舟，警告警告，落个好人，就不再穷追了！又是一场惊心动魄事件，溥仪真乃不寒而栗。

3. 护军闯祸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如果说凌升事件对溥仪的威慑是在远处的闪电，而1937年6月的“护军事件”就等于在溥仪的面前打了个响天雷，使他不能不感到惊骇了。

护军是溥仪近身的亲兵。6月28日是星期天，护军部分人员休息，借假日，有二十几人结伴去“大同公园”（原名儿玉公园）①游玩，被经常在暗中监视的日本便衣发现。通过密谋，日本人无事生非，蓄意寻衅，由关东军驻军抽派一个班，两名参谋带领扮成便装游客，假来公园游玩，结果以争租游艇为由，打起架来。日本人摆出柔道架式，护军则使出武术功夫，柔道毕竟不如武术高，结果闹事者被打得落花流水。关东军恼羞成怒，放出了警犬。护军见势不妙，被迫踢死一条狼狗，然后冲出重围，逃回宫内府了。人们哪能料想，日本人摆的却是“连环套”。日本宪兵跟踪而至，勒令护军头目警卫处长佟济煦立即交出肇事的护军人员。佟济煦是一位遗老旧臣，一直追随溥仪身边，可说是忠心耿耿，但官大胆小，特别怕日本人。他耳朵里，早充满了可怕的消息：什么把百姓当土匪枪毙呀，抓去修国防工程的劳工全部被杀害呀，连曾给溥仪充过英文翻译的吴某，也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捕失踪等等。因此他看到日本宪兵就眼睛发直，四肢瘫软起来。他本来“口吃”，越发急越眨眼，额头冒汗，脸颊抽搐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唯唯听命，惶惶然把那些护军交日本宪兵带走。一群可怜的青年护军被推出宫廷大门之外，任日本人宰割去了。以后听说，他们受尽各种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大扛等等，逼迫他们供认有“反满抗日”行为。这些护军咬紧牙关，拒不承认日本宪兵的欲加之罪。日本人无可奈何，向宫内提出三个条件：（1）由护军头

① 作者回忆有误，“大同公园”解放后改称“人民公园”，现称“儿童公园”。“儿玉公园”为今长春市“胜利公园”。

头警卫处长佟济煦出面，向被打受伤的关东军参谋赔礼道歉；(2) 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永不复用；(3) 保证以后永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甚至迫使溥仪将佟济煦革职，另指派日本人长尾接替，把原有300人缩减为200人，并一律不准配带长武器。

这场恶作剧表面看来是惩治护军肇事，但实际在骨子里就是要把溥仪身上的一点翎毛拔掉。联想溥仪御派遣的两批留日学习陆军的学生（几乎都是皇亲国戚，勋贵后裔，目的是以护军为基干部队，以留学生为铁良、良弼式的骨干人物，扩大自己亲信武装）也被日本人剥夺了使用权，统改由伪军政部分配。这样就把溥仪的凤凰翎毛拔净。实际内情并非如此简单，远在公园肇事爆发之前，早就埋下了导火线。1934年3月，溥仪即皇帝位之后，7月间在北京的醇亲王载沣为庆贺溥仪登极，探望儿子近况，带着溥仪的弟妹们来到长春（伪都新京）。宫内府的大臣官员们到车站奉迎并由警卫处长佟济煦率领一队护军到车站仪仗助威。结果关东军用大使馆名义下令：以旧有约定，在铁路两侧一定范围内不准日军外任何武装进入为理由，向宫内府提出抗议，并要求溥仪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溥仪以一“国”之君，在自己的首都范围里，用自己的亲信武装，去迎接自己的亲生父亲，竟然会受到如此奚落！但他却只能逆来顺受，唯唯诺诺。而大臣们也能安之若素，不以为耻。何况这件事是发生在皇帝即位之初，正是溥仪还未访日之前。

在此前不久(指护军事件)，一个家住通辽回家探亲的护军，带来了一百个鸡蛋，到长春下车时同一个日本人相撞，日本人看出是护军（呢军服、大帽徽），就一把将筐抢下，摔到地上，一时鸡蛋汤流泻满地，观者如堵；日本人还把护军帽徽扯下进行侮辱，护军气冲肺腑，但在车站范围内孤掌难鸣，只得忍气吞声回到了宫内，将经过情况向佟处长作了汇报，佟济煦不但

不敢吭一声，反而责斥他多事。

满、蒙结盟破灭，日、满亲善有方

溥仪同蒙古王公结亲的目的原是加强满、蒙同盟，巩固复辟基础，进而抗衡日本力量。岂知结盟苗头一露，凌升先被斩首。可是日本人很熟悉历史，想出了“昭君和亲”的办法，最初是把主意直接打到溥仪身上，想给溥仪娶一位日本姑娘作“贵人”。由于溥仪顾虑重重，婉言谢绝。继而他们又考虑溥仪不一定能生太子，就以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和亲目标改换到“御弟”溥杰身上。

（一）“御弟联姻”，“日本昭君”来满洲

溥杰是溥仪同母所生，自幼即在溥仪身边伴读多年，两人既是手足亲兄弟，又是“恢复祖业”的志同道合者。早在清帝失国，军阀角逐时期，溥杰就有投笔从戎的意愿。当时由于客观环境多变未能如愿。但溥杰投笔之心不泯，而溥仪复国之志长存。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充实股肱之士，溥仪早在去伪满之前，即亲送溥杰和三妹丈郭布罗·润麒去日本学习军事。其后，溥杰、润麒均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毕业回国。溥杰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很多日本人，其中有一个日本教官吉冈安直，与溥杰交往甚深。就是这个人日后成了溥仪的“御用挂”，挂在溥仪身边十年，对所谓“日满亲善”起过极为特殊的作用。他为溥杰和亲，也出过“三姑六婆”的气力。

异族人婚配早已有之，日本人嫁给中国人也不足为怪。然而日本贵族从来极少外嫁（只有朝鲜李王垠），而满族皇室也例不娶外人之妻。日、满皇室间唱和“亲善”，结婚则不能不另有其目的，不然为什么在溥仪极为不同意而溥杰也非出自自主的情况下，却结成了这样的姻缘呢？日本关东军起草的伪满“帝

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有儿子继承帝位，太子六岁须去日本学习。如果皇帝无子，皇帝的兄弟或兄弟的儿子也可以继承帝位。”所以给溥杰娶个日本贵族，醉翁之意何在，不就“路人皆知了”吗！

溥杰夫人（日本皇太后懿命为“王妃”）嵯峨浩是嵯峨天皇的后代华（贵）胄出身。通过国策的决定，经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皇室一系列策划、酝酿、选评之后，即由当时任日本天皇“裕仁”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此人就是侵占我东北的首魁，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出面为媒，直接牵线，将溥杰与嵯峨浩结合在一起。嵯峨浩其年23岁，当时在东京的贵族学校女子学习院学习书法、绘画、插花（日本花道）和钢琴，多才多艺而又年轻貌美，作为和亲的使者，是符合标准的。溥杰开始心存犹疑，但在情逼势迫之下，不容推辞，只好顺水推舟。及至一见嵯峨浩才貌双全，也就爱慕倾心了。1937年4月，在东京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伪满派有专使按礼参加。回到伪满首都长春（新京）后，又特在“军人会馆”大礼堂内举行结婚披露宴会，参加人又多是“衮衮诸公”。我当时虽官小职微，但以近水楼台腆与其列。婚姻披露主持人，还是那个大将本庄繁男爵。大婚既成，嵯峨浩循例就被定尊为满洲国皇弟溥杰的“王妃”了。

嵯峨浩在“于归”来满洲国时，受到日本皇太后（即贞明皇后）的召见，嘱告她安心侍候溥杰，应发挥日本的“妇德”，为“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做出表率。为了不负皇太后“懿命”关切之殷，嵯峨浩随夫更名为爱新觉罗·浩，表示决心要为“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做出榜样。缘此，她到满洲之后，一切都遵以宫廷礼法，在家族之中、夫妻之间、兄妹之间，一切公私之间，都确保其妇德，进退得宜地出入于宫廷之中，颇得左右一般人的尊重。更由于她耳闻目睹，察觉到日本人所谓

的“亲善一心”并无真意，而处处表现出日本人高出中国人一等（甚至连溥仪和她丈夫溥杰也受着窝囊气），使她十分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活的礼品，其奈国事何！解放后，溥仪、溥杰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爱新觉罗·浩毅然回到新中国，与溥杰和美相处，正为中日友好而共同努力。

（二）“御用挂”吉冈安直的来历及其行径

吉冈安直，日本鹿儿岛人，陆军士官学校三十几期学生，陆军大学毕业后在1931年之前，曾任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大尉参谋。当时为溥仪进讲过“时事”，有一面之识。后来溥杰到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恰逢吉冈安直在该校任战史教官。这个武士道分子熟读兵书，深怀韬略，很懂得放长线钓大鱼、“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把自己的野心和日本的霸业国策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地和溥杰拉关系，然后利用同溥杰的双重关系（师生、朋友）穿针引线，铺路搭桥，博得溥仪的好感。而后吉冈进一步向溥杰游说，关东军有意调他到满洲，出任军方与溥仪之间的联络人，无异于暗示溥杰，打通关节，里外其手，以遂其愿。果然此方“灵验”，溥仪去信表示欢迎。有了皇帝的属意，吉冈如鱼得水，便耍起他政客说客的诡辩术，穿梭于溥仪与关东军之间。以溥仪的关系取悦于关东军；又以关东军为虎皮，显威于溥仪。一箭双雕，名利两收；既轻取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头衔，又荣膺伪满皇帝的“御用挂”（后来定名）之职（“挂”这个字在日文中说来并不难解，如“联络挂”就是联系人；“兵器挂”就是军械股一科系之意。但“挂”到“御用”上，实在是一个创新）。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这个“挂”掌握在吉冈手里，挂在溥仪身上，其作用之大，涵义之广，真是无法形容。用溥仪的话说：“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溥仪）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

礼、训示臣民、举行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吉冈先是往返游动于伪皇宫与关东军之间，后来居然把日本皇室和溥仪的帝宫直接连在一起，往来于皇室之间，成了公开的“亲密的”“内亲”使者。不但溥仪要仰他鼻息，就是关东军内部他也炙手可热。可以说，他包办了伪宫的一切。他在帝宫之内，翻手为云覆手是雨，可以任意出入“中和门”窜进“缉熙楼”，一直挂在溥仪身上10年（1935年至1945年），把溥仪挂得头晕目眩，四肢麻痹，连自主的意识都消失了。这个日本武士道特务，对溥仪又拉又打，直到伪满灭亡，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获为止，他一天也未离开。忽怪乎“福贵人”李玉琴说：“吉冈是缠在皇上身上的一条毒蛇、贴树皮。”

吉冈其人不独是阴谋家、军事家、政客、策士，还会英文，也能说“协和话”（半拉子中国话），又会水墨丹青。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特下功夫画一幅墨竹，请溥仪为他题字并郑孝胥题诗。画以字贵，诗以人名，于此，画中有名人的诗，诗之上有皇帝的题字，更贵重的是“印章”。他把“三全其美”的画，敬送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转眼间，日本报纸上刊登了这幅画，宣扬一番，并称吉冈为“采笔军人”。于此，吉冈声望倍增，由“贴树皮”一变而为文武双全的“儒将”了。

吉冈挂在溥仪身上的另一杰作，就是打通溥仪思想，迎接“天照大神”来满洲。当然，关系这一改祖换宗的大事，不是吉冈所能决定的。就是关东军酝酿此事，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研究，才作出决定的。由于溥仪“敬天法祖”思想根深蒂固，骤然提出改换祖宗是难能接受的，因此吉冈便刚柔并济，打通溥仪思想。这样一来，溥仪对这件痛心的事，既抗拒不了也谢绝

不了，只有通过吉冈的疏导，啼笑皆非地接受下来，以庆祝日本神武天皇2600年大庆为名，恭迎“大神”来满。

吉冈还有一套奇怪的逻辑推理。1934年溥仪访日，受到日本“皇太后”的隆重而亲切的接待。吉冈对溥仪说：“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光荣！”又对溥杰说：“我和你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而论，也算手指与足指的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1936年前后，吉冈的话变了：“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啊！”

溥仪在小天地内的所作所为

溥仪跳进虎穴之后，曾为“恢复祖世”而发誓说：“将忍耐一切艰苦困难，兢兢业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并深切地记住他老师陈宝琛的教导，坚决把懒散的习惯改掉，以资振作自强。所以把自己从政办公的楼命名为“勤民楼”；自己的办公室命名曰“健行斋”。乃至“登极称帝”，根据“满洲国组织法”的规定，他即认为：“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皇帝的权力也是至高无上”的。溥仪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牢牢把住统治满洲国的大权，不容许溥仪插手。最生动的事实就是郑孝胥罢了官，溥仪亲举臧式毅为继任总理，结果关东军给了他一个软钉子，硬把“老豆腐匠”推上台。不但如此，相继而来的就是皇帝宫廷内的人事，溥仪也无权自主了。宫内府、尚书府乃至后来的祭祀府大权都操纵到日本人手里，最后警卫处长也换上日本人，连日本宪兵也进宫了，幸而还只是在中和门之外。

日本侵略者残忍诡诈，他们把满洲看作日本在中国的“生命线”。对待傀儡溥仪，其方针是：举凡政治、军事、人事等大

权，绝不让溥仪染指，而对溥仪的私生活享受则尽可能予以满足。他们每年拨给溥仪的帝室费用达80万元，其价值相当于200万公斤猪肉，称为“内帑”。至此，溥仪也只能关上门在中和门以内缉熙楼这块小天地里，在一小群皇亲显贵和侍奉奴仆中称孤道寡。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六辑）

继承帝位的密约

日本广播协会《昭和记录采访组》
天津编译中心　译

爱新觉罗家族

溥仪的父亲载沣有三子七女。载沣是清朝第九代皇帝光绪的弟弟。因光绪皇帝无子，慈禧太后决定立载沣的3岁长子溥仪为清朝第十代皇帝，年号为宣统。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溥仪九个弟妹中的两位，第一位就是溥仪的二妹韫和。她在1932年满洲建国时同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结婚。

我们是在北京市鼓楼甘水桥居民委员会文化站的一间会客室约见郑氏夫妇的。因为他们居住的两间房屋过于狭窄，才借用了居民委员会的会客室。1933年郑广元从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携夫人韫和在日本住了两年。作为“满洲国”总理的孙子和皇帝的妹妹，他们有着显赫的青春时代。

韫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皇上指婚的”。在清朝的宫廷制度中，只有皇帝有“指婚”的权力，即由皇帝指名决定婚姻的

一种独特的宫廷习俗。韫和还告诉我们："皇上同我们不是兄妹关系，而是君臣、主从的关系，见皇上时要跪下磕头。"

韫和给我们讲了许多宫中的珍闻轶事：她是在摄政王府长大的，幼年时有3个乳母。摄政王府在清朝覆没后，成为孙文的夫人宋庆龄的宅邸等等。

我们约见到的另一位是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78岁）。他每日护理着身患重病的夫人。爱新觉罗·浩夫人与溥杰共同走过了曲折多变坎坷的一生。

爱新觉罗·浩（原名嵯峨浩）1937年4月与爱新觉罗·溥杰成婚。她出身日本名门华族，她的父亲嵯峨实胜侯爵与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一位局有血缘关系。

同溥杰会见的时间是上午10时，我们提前来到了他的家中。当时溥杰还在医院未回来。几年来他每日在医院陪伴护理长期患肾功能衰竭的浩夫人。他乘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准时在约定的时间回到家。与我们预料的相反，溥杰是一位身高不到1.6米的小个子。溥杰用十分流利的日语说："让你们久等了"。交谈时，溥杰说的日语中经常出现只有在日本军队中使用的郑重其事的言词。对此，我们在《严密会见录》中得知，溥杰早年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

在溥杰的客厅里，还悬挂着他19岁的爱女爱新觉罗·慧生的生前照片，照片前摆着祭品。爱新觉罗·慧生在19岁时，因婚姻不幸双双情死于日本的伊豆天城山。

日本战败后，溥杰作为战犯被捕，长期被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爱新觉罗·浩携两个幼女回到了日本。从此他们夫妻离散，音信不通，过着中国、日本两地牵挂的战后生活。

中学三年级的爱新觉罗·慧生日夜思念父亲，开始专心学习汉语。给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写信询问他父亲的情况。在周总

理的妥善安排下，溥杰给他远在日本的女儿写了回信。这样中日之间开始了通信。

然而，在1957年溥杰临近获释时，爱新觉罗·慧生因婚姻不幸情死于日本。终于失去了生前再见父亲的机会。

“这是慧生留下的唯一纪念。”

溥杰指着客厅一隅悬挂着的一幅绘有鱼的水彩画，告诉我们说这是慧生在中学时画的。

溥杰的婚事

根据《严密会见录》，证明日满亲善一体不可分的是爱新觉罗·溥杰与嵯峨浩（爱新觉罗·浩）的婚事。这是1936年1月13日南次郎大使与溥仪举行例行会见时，由南次郎提出的。

这一天，南次郎以十分神秘的神情对溥仪说：“今天有两件事要奏告陛下，但说话声千万不可泄露到窗外。”南次郎所讲的两件事之一，是劝已经31岁而未得一子的溥仪皇帝再娶侧妃。溥仪应允命大格格（皇后生母之姐）等人选妃，目前正在物色人选。第二件事就是溥杰的婚事了。

大使：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是给溥杰早日完婚……自古就有政治联姻，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也是首先考虑到溥杰的终生幸福。

皇帝：言之有理。溥杰也对自己讲过，完全不考虑人种上的差别，而要考虑到两国邦交。若同日本的皇族喜结良缘，不只是本人满意幸福，也是两国的无上幸福，并向两国国民做出真正的日满亲善的表率。这确是好事。

事前得到情报，察觉到关东军意图的溥仪，竟先由自己口中提出溥杰可与日本人联姻。

溥仪在日趋懦弱的背景下，又发生了一件使他颇感震惊的

事件。这就是在内蒙古的中心城市海拉尔发生的一般称为“海拉尔事件”又称“凌升事件”的事件。

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凌升是“建国元勋”之一，凌升之子同溥仪的四妹韫娴决定结婚。然而凌升在1936年4月突然被关东军逮捕。

逮捕凌升的理由究竟是他对关东军专制独裁的统治抱有不满以至惹恼了关东军呢，还是他与外蒙古联盟谋求蒙古民族的团结独立？还是以俄国的间谍罪名被捕的呢？众说纷纭，一时真相不明。最后，关东军以凌升向俄国和外蒙古提供日满军事机密情报的间谍罪，宣判了凌升死刑。凌升被处以斩首之刑，这是关东军对反满抗日者杀一儆百的做法。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对溥仪说：“处死凌升是为了杀一儆百。对于凌升的处罚未夹杂任何政治因素，只是遵从法律的威严，依据他的罪行程度，秉公而断，未掺入丝毫恩怨。”

凌升的父亲贵福来乞求溥仪拯救凌升时，溥仪恐被牵连拒绝与贵福见面。

对溥仪来说，使他感到阴森可怕的莫过于凌升事件了。他深深地领悟到，在关东军的势力之下，自己的命运也不例外。

在1937年1月25日的《严密会见录》中，记录着一年前由南次郎大使提出的溥仪皇帝的弟弟溥杰的婚约才算告成。

大使：今天拜见陛下，是将溥杰婚事的进行经过禀告陛下。关于联姻之事，经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大将、朝鲜总督本野的未亡人以及其他各方人士的尽心竭力，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在众多的候选人里最后选中一位佳丽，她现年24岁，学习院① 毕业。订于1月8日，按日本的相亲方式与溥杰见面。对方讲若为

① 学习院：1877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一所专为皇族、华族子女实施教育的学校。

日满两国的亲善，就同意这桩婚姻。溥杰也对此颇感满意，东京的“三格格”也表示赞同。陛下若恩赐许可的话，这桩婚姻就算成了（将嵯峨侯爵家的家谱及嵯峨侯爵长子，即浩姬的父亲嵯峨实胜的身着大礼服的照片和浩姬的双亲身着日本和服及浩姬本人的照片介绍给溥仪，并说明嵯峨侯爵家是继五摄政之后的名门世家，有着被称为大臣家的家世）。

皇帝：很好。溥杰本人满意，又是经各方面人士的充分选定，我同意。并对大使为这桩婚姻付出的格外努力，深表感谢。

这一天，经溥仪的敕许谈妥了溥杰的婚约。可是，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溥仪坦白了他内心对自己的弟弟溥杰与日本女人结婚的恐惧。

“这一定是一项阴谋，日本人想要笼络住溥杰，想要一个日本血统的孩子，必要时取我而代之。”

然而，结果溥仪还是在关东军的安排下，承认了溥杰的婚姻。

1937 年 4 月 3 日，溥杰与嵯峨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婚礼。溥杰的婚姻使溥仪的恐惧心理日益加深，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记述了自己的重重忧虑。

“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曾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前途算过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做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已详细记述了这段历史背景，作为史书或读物已无多少兴趣了。在关东军的授意下，“满洲国”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

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然而，关于帝位继承问题，在《严密会见录》里，记录着关东军与溥仪之间交换的令人吃惊的密约。

溥仪的密约书

溥杰结婚的一个半月前即1937年2月17日，皇帝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溥仪的书斋——健行斋举行例行会见。溥仪首先说道:“由宫内府大臣为首的帝室大典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大典草案，已于昨日上奏。因这份草案同以往看到的并无不同之处，只要大使认可，可令国务总理和宫内府大臣正式上奏，由参议府决定。”植田关东军司令官通览了草案，表示同意。在此基础上，植田说:“在帝室大典中，最重要的是决定了继承帝位的问题，是值得庆贺的。”说着植田拿出一份事先由双方一致达成的备忘录，请溥仪在上面签字。

请求在备忘录上签字时，林出刚要打开装有备忘录的纸袋，陛下说，事后再签吧。便把备忘录置于桌上。

这是林出贤次郎在《严密会见录》里，所记录的溥仪当时的言行举动。溥仪在关东军司令官的面前，显露出如此露骨的感情，这还是第一次。

话题转到溥仪选定侧室的问题上，溥仪对此事向关东军司令官充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关东军司令官破例地接受了溥仪的想法。

大使：我充分理解陛下的尊意。

皇帝：那么，就在方才说的备忘录上签字盖印吧，于是溥仪在一式四份的备忘录（备忘录的文字均是中文）上签了字，填好日期后，由林出盖了御印。其中的两份递交给溥仪本人，另两份交给大使保存。此时已接近零时30分（署名的墨迹不轻易

干）。

《严密会见录》记录了署名之后，墨迹未干时包括林出在内的三人打哑巴禅，而此日会见是在“三人大笑”如同往日一样，无任何障碍地告终搁笔。但是，这反而愈加显露了签署帝位继承法的备忘录时这场有点窘迫的气氛。

溥仪给关东军司令官签名、盖印的备忘录如下：

备忘录

康德皇帝无皇子时，有关皇位继承应得到关东军司令官之同意，并按以下顺序决定。

（1）康德皇帝和皇后无皇子并被确认时，继承皇位应依遵天皇之睿智决定之。

（2）康德皇帝无皇子时，决定继承皇位应依遵天皇之睿智，继承皇位之圣旨，由皇帝宣布之。

（3）历代皇帝亦依此规定。

康德4年2月17日

满洲国皇帝

溥　仪

节略

（1）皇帝无子，并被确认时，经关东军司令官之同意，侧室可入宫内。

（2）皇子之教养人员，以日满两国人格高尚者充任之。

（3）皇子于适当时期留学，在学习院学习之。

（4）皇子必须成为军人，皇帝之女必须下嫁军人，若有皇子不能成为军人，皇帝之女不能下嫁军人之特殊情况时，须经关东军司令官同意，予以决定之。

（5）侧室非皇族。

（6）历代皇帝亦依此规定。

康德4年2月17日

满洲国皇帝

溥　仪

《严密会见录》中，图示着盖有皇帝御玺之处的记号。备忘录雄辩地证明了“满洲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国家。

在北京见到溥杰后，我们忽然想起假设一下当时的历史。皇帝与皇后虽未得一子，而在皇帝与侧室得一子，溥杰夫妇也得一子时的关系又将如何呢？

然而，溥仪、溥杰这兄弟二人终究都未得一子，围绕《帝位继承法》的权力之争也就不存在了。“满洲国”的崩溃，避免了溥杰夫妇再次成为日本关东军政治工具的可悲命运。

爱新觉罗·溥杰与嵯峨浩的婚姻确实是由关东军一手安排的。然而，经历了50年的岁月，溥杰夫妇已结下了超越国境的深情挚爱，度着宁静的余生。

（摘自《皇帝的密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溥仪不敢住同德殿

于励治　孙贵田

1934年，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以后，要给他在南长春（指现在长春的地质宫）修正式的皇宫。溥仪当了“皇帝”，自己感到住盐仓（当时人们把榷运局混称为盐仓）很不体面，所以他提出还是先给我修建一个小一点的地方住住吧！后来，也有的说，修建同德殿名义上是溥仪提出来的，实际是通

过溥仪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提出来，溥仪也同意了的。

同德殿名字的由来是取日、“满”同心同德的意思。因而，宫殿的造型、设计就特殊。乍一看，宫殿好象是中国式的建筑，实际上不是。那时，屋顶上黄瓦的瓦头都刻有“一德一心”的字样，瓦脊是日本式的，中国式的瓦脊头大半是龙咬的形式，而日本式的就是伪宫现存的样式，瓦筒才是中国式的。日本关东军用这种式样表示日、“满”“一德一心”，真是挖空心思弄出来的“杰作”。

由于溥仪疑惑日本人要在新殿中安窃听器，所以落成之后，他并未去住，这也是对所谓“一德一心”的绝妙讽刺。

（吉林市政协供稿）

伪宫内府的日本人

赵健平*

一

关于溥仪身旁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情况。很多人都知道了。但伪宫内府先后还有许多日本人任职及其活动，就鲜为人知了。其实最先到伪宫内府的日本人，是所谓“支那通”（即“中国通”）的日本浪人。他们大都是很早就到中国来的，会讲中国话，熟悉中国情况，在他们之中多数人与日本特务系统有一定关系，在中国大肆活动兼做特务工作。

* 作者系熙洽之子，曾任伪宫内府近卫处总务科科长。

这一部分人随溥仪由关内到东北来的几个人，可以做为代表，如工藤铁三郎，后由溥仪令其改名的工藤忠，表示对他个人忠心耿耿的意思。工藤在前清时代曾在陕甘总督升允那里干过事，后又在旧军阀张宗昌那里混过。通过日本军部介绍又与溥仪联系，随其到东北，也算是溥仪的“亲信”之一。在伪执政府时，他充任侍从武官，在伪宫内府时任侍卫处长。1941 年，他到了停年之时后退官，但仍任宫内府顾问官。这是个仅有名义不支薪的名衔，在有典礼时到伪宫参加仪式。工藤会中国话，但说得不太好，一般应用也还勉强。他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倒很熟悉，溥仪对他也很重视。他下班后常到“内廷”，陪同溥仪闲谈、打球、吃饭……也常到驻府日本宪兵班的屋子，闲谈、下棋、吃饭，顺便也可能作些“汇报”工作。表面上看，他对中国人倒常表示好感，相当客气。他经常穿着长袍、马褂，戴帽头，俨然一个中国式“土绅士”。工藤爱吃中国饭，他说比日本饭强多了。也许这些假相，使伪宫内一般中国人对他没有恶感，认为他虽然当了处长，但不拿架子，不发脾气，对属下倒也客气。其实这正是他圆滑之处，也是日本浪人的“特色”吧！

此外，还有上角利一、清宫，他俩也是由关内来东北的，住在府里，由府里供给食宿，生活相当优裕。他俩也会中国话，也常同溥仪见面、谈话，不过还比不上工藤，溥仪对他俩不太重视。上角住了 1 年，看看没什么意思，没得到相当地位，在 1933 年便走了。清宫也仅在掌礼处当 1 名礼官（荐任官），1935 年到 1936 年间病故。以上三人属于比较高等的浪人。至于林田英七郎等小角色，仅在府内弄个下级官吏，林田先当警卫士，后任日语翻译官。他们都没有能飞黄腾达，这可能是因为资格的限制吧。

1934 年，日本殖民当局安设了 1 个日本人次长，名之为辅

佐大臣办事。宫内府首任次长为入江贯一，年约60余岁，是由日本宫内省转来的。伪宫内府掌握大权的日本高级官吏，大都是由日本派到东北来的，通过关东军人事部门同意而任职的。他们在国内都有相当地位、身份和学历，有的原在日本各省（即部）内任职。所以到伪满后都以特任官或简任官任用，特任官为次长级，简任官为处长、局长、秘书长等。次长入江贯一、秘书官长武宫雄彦、会计审查局长加藤内之助等人都属此类人物。他们待人接物、处事都还明白、客气，心里如何想法就不知道了，在表面上可以叫你下得去。

还有由当时伪外事官署转到伪宫内府的高级官吏，如后来担任伪宫内府次长的鹿儿岛虎雄、荒井静雄，总务处长小原二三夫，都属于此类人物。总务处是掌握文书、人事大权的，首任总务处长小原二三夫是由新京邮政总局长转任到宫内府来的，他是日本帝大系里的一个人物。

另外还有从“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转到伪宫内府的一班人，他们中许多人在东北日久，歧视中国人，自命不凡，具有优越感，有的人还有吸大烟的恶习。不过他们占据高级地位的不多，多是中下阶层的位置。在伪满头一两年，日本国内的人，尤其有资历的人来的不多。缺者为贵。所以日本官吏中满铁系占多数，而且具有一定的势力，后来从日本来的人逐渐增多，他们有些吃不开了。在伪宫内府的满铁系日人也多是为上级日本人支配驱使的下级官吏。

还有一类人是由警界转来的，有的原在满铁附属地任警职，他们人数不多，大都担任伪宫中技术方面的工作。如消防队长佐藤三郎、卫生股长川崎若二、防空股长伊藤等。

二

在伪宫内府的总务处里管人事的科是“综理科”，事关重要，自然也换用了日本人。首任的科长是由尚书府秘书官转任的冈本武德。这个人号称“支那通”，在中国住了很久，先在关内各地，后来到东北。中国话说得很好，并且精通中国文学。他在尚书府秘书官任内事情不多，清闲时把中国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译成了日文，印书出版发售，发了一笔小财。他充当管人事的综理科科长，倒很尽责，不象处长小原二三夫那样马马虎虎。冈本也看出小原处长的马虎劲，所以有些事情就独断专行，也不通过小原而自行作主办理了。小原也不过问，乐得个清闲自在，倒也没发生什么矛盾。内务处里的会计科是掌握财政的，自然也要换用日本人。会计制度变得更加严了，各处不能各自为政，均由会计科统一管理。首任会计科科长是松本，是个年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也不是学会计的，对会计业务是个外行。但他手下有事务官、属官等辅助他。松本虽然隶属于内务处，但是不听命于内务处处长商衍瀛，而是听命于日本人的总务处长，商衍瀛对他也无可奈何，听其自然而已。

日本人对伪宫内府的人事、财政部门控制住后，便轮到警卫部门了。当时的警卫处长是佟济煦，日本人久拟更换，因溥仪不同意而未实现。1937 年发生伪宫护军在大同公园与日军官兵殴斗事件，而迫使佟济煦“引咎辞职”。换上了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他是由民政部警务司长转任而来，原系退役陆军少将。这个人架子很大，见了中国人不爱搭理。对于转任此职，不算满意，认为无事可做，也没有多大实权。不如警务司长统辖伪满全国的警察厅、警务局、警务科，那么威风十足。而警务处的大小范围、权力不出伪宫这个大院，没有什么油水。长尾吉五

郎大不高兴，对于事务处理不大过问，委之于手下各科科长。每天他到时来了，往办公室一坐，便看小说、读报纸、听广播、写私人信件。有了例行公事，大致看看便打上名章，拿去照办。到了下班时，挟起皮包一走了事。所以，在他任职期间，掌握实权的还是处内的各个日本人科长。1940年，他65岁，到了退职年龄便退职了。由日本陆军退职少将长野义雄接任，这个长野与前任正相反，事无巨细必须过问，大小事都得由他解决。一天总开会，召集科长以下的负责人研究讨论，问了这个，听了那个，不够他一个人忙的。1942年初，他转任伪黑河省当省长去了。后任的大泽寅一，也是日本陆军退职少将。这个人的作风与长野又不同，好独出心裁，标新立异，自以为是。每天忙于“作案”（即拟草稿，日本人称“作案”），他忙于改革这项、变更那样，可是常常行不通，碰钉子。记得有一次，他出主意在警卫处院内后面修建了一座高达十丈的了望楼，说是为防空了望之用。伪宫内府的防空，事务是由保安科所管，内设防空股，股长为伊藤三郎，日本警察出身，由伪首都警察厅转来的。我当时兼任保安科长，大泽寅一拟好方案，交给我施行。我看过后，当时就向他建议：“宫内府的防空做好灯火管制就可以了。而且在防空时，与外面防卫司令部联系即可，我们用不着去了望敌机，这个楼没有什么作用。再说，此楼的地点正在内廷的南墙外面，高有十余丈，上面站了望人员，对内廷方面有些不便，恐怕内廷不同意。还是先联系近侍处转奏内廷，同意后才可施行，不然怕有问题……”

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你太小心了，太过虑了，防空事关重要，我们有专责，建了望楼是有必要的，内廷也无权过问，你安心好了，一切由我负责，你照案施行好了。”

我见他决意要办，只好交与防空股长伊藤三郎，照案建立

这座了望楼。几天内便建好了，他很高兴，带领防空人员上了这座楼了望一下，很满意。谁知到了第二天早晨，近侍处来电话问我："为什么建立那座楼，可以窥望内廷行动，诸多不便．上边（指溥仪）问下来了，是不是你的责任？"

我只好据实报告，并告诉近侍处，假如上边不同意，我可以转告处长，但他未必听从，还是请近侍处长直接向大泽处长转达上边的意思，这样，事情好办些。

到了下午，大泽又找我去，我一进门，他便对我说："赶快找人把了望楼拆除。"我明白是近侍处长告诉他了，他也无法抗拒了。但我故意问道："刚刚建成就拆除，那防空怎么办呢？"他面上露出尴尬的样子，说："事情真难办，内廷不明白此中情形，非叫拆除不可，只好照办，你去施行吧。"我也不再多讲，告诉防空股长：怎样建立的，怎样去拆除吧，而且今天就得办，不能等明天。这座了望楼的寿命仅仅一日，就寿终正寝了。大泽寅一碰了这个硬钉子以后，有好些日子没乱出主意，倒也省了不少事！

内务处长原先也是中国人，商衍瀛走后，换刘杰三，刘原任宫内府秘书官转任内务处长。后来调换为冈本武德，他原为总务处综理科科长，综理科由会计审查局的审查官泽山继任，刘杰三便转任到审查局去了。

警卫科长原为中国人，也换上日本人菅谷，后换川口次郎。保安科长原为日本人，曾换上中国人李金声，李走后一时无相当人选，照例由总务科长兼任。但只是兼职不兼薪，但另有职务津贴，每月50元。因我当时是总务科长，故一度兼任保安科长。1945年，才任命吉田正为保安科长，但仅两三个月，便因日本投降而完事大吉了。

伪宫内府的人事、财政、警卫等重要部门，都由日本人控

制了，其他各科科长倒是中国人，可下面的事务官又是握有实权的日本人。车辆、马匹等管理和使用也有日本人的管理员，甚至连伪宫内的扫院子、扫厕所的杂役，也由日本人管理、支配，真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了。而公文中也常用什么“出张”、“登厅”等日文词，因公事多由日本人拟稿，然后再译成中文，结果成了不伦不类的“协和式”公文，叫人看了头痛。好在反正只需中国人的伪官吏在上面盖戳，表示“知道”、“同意”、“通过”就行了。长此以往，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三

伪宫内还驻有日本宪兵班，有一班长率五六名宪兵。与溥仪来往的人也会受到日本宪兵的监视、干涉。伪参议府有位胡嗣瑗参议，原先任过宫内府秘书长，也是清末一位老人物了，随同溥仪到东北，后转到参议府的。有一个时期，他经常到伪宫来，陪溥仪闲谈，有时看看古玩，讲点历史典故。次数多了，日本宪兵生疑心了，认为有什么活动。有一次这位胡参议又来了，出来时，日本宪兵等在门外，把他老人家请到办公室，由班长对他大加盘问和侦讯，问他为什么常来？都说了些什么？是你自动来的，还是陛下（溥仪）的召唤，你愿意来吗？有什么用意？……问得胡老头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好歹算完事了，跑回去了，从此再也不敢来了。溥仪也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也不找他了。常在宫中陪他的也只有一些皇族青年，日本宪兵也还照顾面子，不再干涉过问，也知道这些人年纪小，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因太平洋战争日本失利，1943年春季的一天，伪皇宫警卫处长大泽寅一召集科长会议，有警卫科长川口次郎，我因兼任保安科长，也出席了。大泽对我们说：“目下要加强治安，保持

秩序，要在宫内府建立一个监察机构，以防不测。外面虽然有警察来负责控制，但是宫内府比较特殊，外面的警察执行任务感到困难和不便。而宫内府的职员都是供奉皇帝陛下的，时常与皇帝陛下接触，假如里面有了坏分子，对皇帝陛下有不利行为，那个关系该是如何重大，更是我们警卫人员难卸的责任。所以现在计划在宫内府里组建一个保安的组织机构，好专门担当此种特别重大的工作和任务……”然后他又说，要在处里成立一个“特务股”，任用一个专门负责的股长，另外再选用几个中国人以供驱使。他问我和川口，以何人任股长为宜，这个股设在哪个科内？

我听完感到不安和进退两难，这时川口首先发言表示赞成，并说：“这个机构应当设在警卫科内，符合警卫的性质，股长可由警卫科里的警卫官鹤弥市充当，此人原先当过警察官，办理特务事项有经验，一定可以收到相当的功效。至于选用中国人，可从三个科内挑选，由各科长推荐挑出采用”。大泽听了点点头，然后问我的意见，我立刻表示同意。

可会后，鹤弥市希望把特务股设在总务科，以便可以大权独揽，不受川口的干预。大泽又来征求我的意见，尽管我极力反对，也未奏效。于是我表示：特务股的事我不过问，由鹤弥市股长直接与大泽处长联系，他们点头同意。特务股成立后，又调去佟诸功、刘玉田、裴鑫炎、于永生、杜长忠等。他们这些人每天穿上便衣，各处瞎闯，到处探听伪宫内中国人的言行，有无“反满抗日”的思想，以及赌博、冶游、盗窃、贪污。从1943年到1945年，他们的特务工作并没什么“功绩”可言，因为伪宫内的中国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所以一个“反满抗日”分子也没抓到。至于贪污等事也常是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从此伪宫内常有人给大泽、鹤弥市等人送点大米、猪

肉、鱼、鸡蛋，这些东西在伪满末期，都不易买到，算是昂贵的好东西了。于是有的人讲："作点违法的事，不要紧，一百个鸡子，就可以消灾免祸，还打发他乐乐呵呵的。"由此可见大泽等人的丑态了。

撤换伪总理郑孝胥

日本广播协会《昭和记录采访组》
天津编译中心　译

郑国务总理的更迭

溥仪访日取得的成果，增加了皇帝与关东军统治"满洲国"的信心。据《严密会见录》记载，1935年5月3日南次郎大使与郑孝胥国务总理举行例行会见时，提到了有关改组"满洲国"内阁之事。在此以前更换了掌握"满洲国"实权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南次郎大使推荐的长冈关东局总长被内定为总务厅长之职。关东军司令官将此事征得皇帝溥仪的认可后，南次郎大使与郑孝胥国务总理的会谈，便直接进入了有关改组内阁的事宜上来。在此之前，关东军已事先透露出希望郑孝胥国务总理引退的意向。

5月3日下午4时，郑总理与南大使在大使馆邸举行了会谈。

大使：(上略) 方才谈论了内阁改组问题，由于长冈的人事已定，想以他为中心，把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总理：现内阁已过3年，内阁成员都是建国的有功之臣，让

他们引退应给予优厚的待遇，以保全他们的荣誉为上策。即便在他们退职后，也应适当照顾他们担任相应的职位为妥，或是让他们暂时休养一个时期。关于此意，我已同臧式毅民政部总长进行两三次恳谈。他颇赞成，并相信新内阁一定会取得功绩。关于总理大臣的人选，我认为让现任间岛省长蔡运升担任颇为合适。他有学问、有阅历，德才兼备。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能胜任国务总理之职。

太使：具体的事情待以后再慢慢谈吧。

郑孝胥荐举下任总理的提案被南次郎大使婉言回绝了。两个星期之后的5月18日，溥仪与南次郎大使、新任总务长官长冈三人在帝宫就组阁的人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商议。

皇帝：今天召见二位是关于组阁之事。昨日，郑总理向我提交了新内阁成员的名单。我想大使早已见到这个名单了。名单上的人安排到各部，却再未提出其他候选人，是颇有不便的。在此说句内部的话，让我们抛开一国元首、一国大使的立场，站在同一立场上谈论国事，开诚布公地各抒己见吧！

郑总理是我十几年的亲信，对他的人品性格我是了如指掌的。可是近三年来，他以超然的态度在国务会议上一言不发，沉默寡言，自以为清高。去年在发表登极感想时对日本说，不能把“满洲国”永远当小孩子对待，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这是很不适当的。假若对关东军或日本的对满洲政策有不满之处，应堂堂正正地向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提出来商量，或提出自己的主张，以尽其意才是应该的。然而他有话不摆在桌面上讲，却在报纸上流露内心的不满。这对身为一国的总理大臣来讲是颇不谨慎的行为。他对我虽忠心耿耿，但担任总理之职，他的才能和度量都是欠佳的。我打算此次内阁改组时，让他暂时退职去休养为好。

溥仪早已觉察到关东军对郑孝胥的不满，故借重新组阁之机，由自己提出了更换总理的建议。

溥仪出席每周召开一次的国务院会议，有各部大臣、总务厅长、各部次长（日系官吏）参加。会议的决议案再交付参议府商议决定后，由国务总理每周一次送呈皇帝，仰承皇帝批准。

此外，规定国务总理每周一次定期到关东军司令部官邸举行会谈。议案几乎都是由日系官吏起草的，据说这些议案在会议上，全无更改。这是从前任“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的证词中知道的。

郑孝胥国务总理在签署日满协定书时，就曾显露出抗拒姿态，其后对关东军仍怨气未消。在国务院会议上的沉默作战，是他对日系官吏在国务实权上执牛耳的一种反抗。

5 月 18 日三人会谈时，溥仪披露了和平时不同的真情。

皇帝：建国初期，事先我对组建的现内阁一无所知。恰如这次郑总理向我呈交的内阁成员名单一样，只不过就这样决定了罢了。这样各部总长之间就欠融洽。由于驹井总务长官的专横跋扈。郑总理与驹井关系不和，导致不愉快的结果。解除驹井职务后，阪谷与郑总理之间关系也欠融洽。这些令人感到不愉快……

这一天溥仪以十分强硬的语气向日系官吏陈述了不满。说日系官吏不了解日满官吏的不和，完全不知满洲的情况，只是全部照搬了日本的制度，照葫芦画瓢地实施而招致了混乱。

溥仪的幻想

大使：今日陛下讲出了我心中所想，就象我自己说的一样。

陛下：今日所言，虽说有些象是身居超然地位的元首对国政有所干涉，这是离开自己的立场，为求万全，而在内部与你

们商量，并陈述我的意见。对宫内府的人事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我从6岁到30岁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受过东洋道德教育，深知东洋之精神为何物，也看到西洋物质文明恶习带来的丑陋现象。这些对自己多少形成领悟世间的阴暗面和人生的正反两面的心得体会。不论宫内府的人对我说什么，还是听到小人背后传言，只要自己无私无欲，胸怀坦荡，就感到任何事情都心如明镜。就有关内阁成员之事谈论了许多，对现在内阁成员我的看法是，他们是一些平庸之辈，稍有头脑、可靠的人只有臧式毅一个人。

大使：如陛下所言，臧是深谋远虑的可靠人物。

溥仪推荐“满洲国”建国的功臣，原奉天省主席，现“满洲国”民政部总长臧式毅为郑孝胥总理的后任。自“满洲国”建国以来，溥仪对郑孝胥日益不满，他心中暗暗决定：总理要按自己的意志行动，这方面臧式毅最合适。溥仪期待着让臧式毅当总理，行使自己的职权，把自己的国家充分治理好。

1935年5月20日上午10分，在宫内府皇帝的会客厅，溥仪皇帝与南次郎大使举行了会谈。

大使：今日拜谒陛下，想就前几日的组阁之事谈谈本人的拙见。郑总理建国3年来付出巨大辛劳，现年迈力衰，已露倦勤思退之意。故此，借组阁之机，应恩准郑辞职。而下任总理似应具备下列条件，当然要对陛下无限忠诚，我想下列三条也很重要。

(1) 有统治能力的人；

(2) 人格正直高尚者；

(3) 对国家有功勋之臣。

按以上三条进行人选是必要的。我认为有熙洽、臧式毅、张景惠3人。而熙、臧两人各有长短，大致属于同等人物。况且，在社会上他们两人看做是各把持一派势力的头脑人物。若将其

中一人任为总理是不妥的。前几日，陛下所言让熙洽任宫内府大臣，让臧式毅任参议府议长，使他们两人不分伯仲。这样3人中就剩下张景惠，让他当总理大臣组阁如何呀！

溥仪：大使的意见很对，我也有同感。

这样，由郑孝胥推荐的蔡运升，皇帝溥仪推荐的臧式毅，全未被采纳，下一届总理大臣决定由关东军推荐的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出任。张景惠在满洲建国前，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议长兼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是一个颇具实力的人物。满洲事变时，投降日本，后被推荐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成了满洲建国的功臣之一。

在改组内阁上，溥仪这次也未能反映出自己的意志，只得听从关东军的安排。溥仪按他自己的意愿组建内阁的幻想被彻底地粉碎了。

应溥仪皇帝的要求，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就内阁成员的安排做了如下说明：

大使：谨向陛下禀告内阁各部长的人事安排。于芷山任军政部总长，张燕卿任外交部总长，冯涵清留任司法部总长，这是因为涉及治外法权的问题正在研究中，不便易人。李某任交通部总长、吕荣寰任民政部总长、孙其昌任实业部总长、文教部、财政部总长忘了是谁了。

以上是《严密会见录》记载的满洲建国3年后的关东军司令官与皇帝溥仪关于决定新内阁人事的部分对话，从中反映出皇帝溥仪非常简单地接受了关东军司令官提出的内阁人选名单。然而，溥仪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在《我的前半生》里，溥仪记述了他朝思暮想、再兴清朝的幻想，如同一座座玻璃城被一个又一个地击碎了的情景：

按情理说，日本关东军在决定帝制时正式告诉我不是恢复

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我穿龙袍，在决定“总理大臣”人选时，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见，我就该明白了我的“尊严”的虚假性……

尽管处于这种困境，溥仪仍竭力维持延续皇帝的地位。然而使溥仪感到震憾的事件接踵而来。这就是从1936年到193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摘自《皇帝的密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勋臣”与走狗

孙喆甡

郑孝胥，字苏戡，福建闽侯人。青年应试科举曾名列第一，称为“解元”。早有盛名，诗文和书法均名噪一时。书法为磔笔字，据说民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典面书箴就是他的手笔。至于诗更是“脍炙人口”，连溥仪也为之倾倒。他有几首打动溥仪的心事诗，使溥仪这位圣明乃“知言”了，遂而为后来成为傀儡种下灾难。其诗云：“君臣各避世，世难谁能平。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自意转沟壑，岂复知寇缨。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太王事獯鬻（匈奴别名），勾践亦事吴。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狸首虽写形，聊以避群鼠。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駏。”溥仪逊位之后，这位清末才子久居上海“卖字”，不做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以后却做了伪满的总理，拿了60万元的建国功

劳金），清末遗老重臣们说他有“骨气”，称之为“名节之士”。其实，他以前虽历任过按察史、边防督办、驻日本神户领事等要职，当时并未见重于溥仪。嗣后在溥仪大婚不久，由溥仪最尊崇的太傅陈宝琛（字韬庵，别号听水老人，也是福建闽侯人，20岁点翰林，历官礼部侍郎、内阁学士、懋勤殿行走，简放过山西巡抚）和英人老师庄士敦的推荐，郑孝胥遂任懋勤殿行走（懋勤殿是溥仪读书的地方），深得溥仪的赏识，郑由此才飞黄腾达，当了首班内务府大臣。

后来就是这位自许为“文种”、“诸葛亮”，乃至象“钟馗”的秃翁，却急功好利起来，和日本人打成一片，伙同罗振玉，用耸言动听的辞辩（刘秀复国机不可失……），主张溥仪学“太王事獯鬻”的故事，战胜了稳健派的陈宝琛、陈曾寿等人，打动了溥仪恢复主业的素志。岂料这位清末“名节之士”，一入龙门，便身价十倍，上得知言圣主，下有左膀右臂的两个儿子（长子郑垂，字让予；次子郑禹，字炎佐，均系日本留学生，且长于英文，擅交际，和日本人打得火热）相得益彰。对外，和日本军部勾结紧密；对内，首先战胜了稳健的保守派陈宝琛，又挤掉了和他旗鼓相当的大投机家、大连“墨缘堂”古董商罗振玉。

罗振玉，字叔言，又字贞松、雪堂，别号仇亭老人，浙江人。他凭着江湖市侩的本领，白手起家，又经商又作官，在清末小朝廷当上了“学部参事”。民国成立后，他客居日本达10年之久，考古著书闯出文名，深得日本军政各界的重视。由于他善长交际，手腕灵活，经常穿梭于日本政客和清末宗室遗老之间，成了半官半商的政客。由太傅陈宝琛推荐，竟跨入小朝廷做了“南书房行走”。他也有个儿子，名罗福葆，字君羽，也是日本留学生，亦是罗的膀臂，出谋划策于左右。当溥仪在天津作寓公的时候，日本人早就认定他是“可居的奇货”。而这两位

溥仪的“行走”一个做过日本神户的领事，一个客居10年在东瀛。由于这两位“行走”的行走，促使溥仪甩掉保守派，“行走”到了满洲。之后两个“行走”又经过各自的行走较量，终于是郑占了上风，最后荣膺了国务总理，而“仇亭老人”也做了几天监察院长。都得到了大数的“建国功劳金”，可以说是“名利双收”。罗振玉得了名，拿到钱，便泛舟回到老家卖他的古董字画，自作“陶朱公”去了。而有点迂阔的“腐儒”郑孝胥却很不识时务，耿耿于他那个“执政宣言”，“人类必重道德”，“人类必重仁爱”，“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等等。不久日本人把他的总理撤掉，他在家里作诗写字，又讲王道又发牢骚，说什么：“满洲国已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自己走路了，不该总是把着不放手。”话不多，却触怒了主子。至此不久，郑氏父子便双双不明不白地死了，走狗当烹吧！

溥仪发现受骗上当之后，曾悔愤地说：“郑孝胥心粗胆大，有进无退”。但溥仪对他仍有旧情，死后特予谥“襄勤”。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六辑）

花谷正的一段讲话

万嘉熙

花谷正是日本军中很著名的法西斯人物。长脸大嘴，满脸横肉，煞象凶神一般。他在伪满军事部任高级顾问时期，曾于1939年到沈阳伪训练学校来视察。到了伪训练学校之后就召集全部伪军官讲话，他站在伪训练学校本部的高台阶上，声色俱

厉地说：

"'满洲人'把自己当成主人，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满洲的日本人绝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满洲的主人。谁不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请他自便，另投地方，不能容许这种人存在满洲的土地上。我在济南时曾从广播里听到郑孝胥国务总理的讲话，郑说'满洲国'是个小孩，需要日本抱着走，但是，这个小孩逐渐长大了，就可以逐渐脱离怀抱了。他说的这是什么话？这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满洲国'可以脱离日本的怀抱么？我听了很气愤，当即打电话给关东军司令部，把郑撤职了，这就是个前车之鉴。'满洲国'皇帝的'后见人'（即监督人）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任何一个'满洲人'，要想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再重复一句，有这种想法的人，就请他自便吧！"

"要啥给啥"的伪总理大臣张景惠

张辅麟

1935年5月19日，在伪满国务院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当晚8时，伪大臣们被召集来到总务厅长官邸开会，却不告知会议内容。只见会场内外日本宪兵出出入入，门口还有武装宪兵把守，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可是，届时并不召开大会，大臣们一个个被"单兵教练"似地召到密室去，告知国务院改组及本人被调动的事项。就在这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张景惠取代了"建国老臣"郑孝胥，当上了"国务总理大臣"。

从1935年5月到1945年8月的整整10年期间，日本关东

军为便于操纵，对身居伪满军政要职的汉奸，频频进行调动，有人竟被调动达四五次之多，唯独张景惠稳居“总理大臣”宝座安然不动。据与张景惠关系密切的于镜涛说，关东军曾向张景惠保证：让他终身坐稳“满洲国”的第二把交椅（第一把交椅自然是伪皇帝溥仪，他不能“僭越”）。伪大臣们背地里说：张景惠是“铁杆总理大臣”。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发动事变的罪魁祸首本庄繁和土肥原在11月7日致天皇裕仁的电报中，就曾这样评价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可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后来回忆说，选中张景惠出任总理大臣，是因为“张景惠是伪满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头之一，擅于得人和，是个‘好好先生’。”

所以，关东军决定把越来越不大听话的、还十分热衷于“国际共管”的郑孝胥，换上了张景惠。由此可见，张景惠所以地位稳固，一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需要这样的傀儡，二是他本人媚敌卖国有术，二者结合铸成了他这“第二把交椅”的坚实基础。这种卖国求荣的诀窍，可用他自己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来概括：“要啥给啥”，张景惠说到做到，“要啥给啥”成了这位“总理大臣”奉行的主义了。

首先，他推行“粮谷出荷”，大肆征收粮食，数目逐年增加。1940年征粮720万吨；到1945年增为950万吨；直接运往日本的粮食，1940年为200万吨，到1945年增为500万吨。他为了向日本主子显示忠心，不仅到处倡导“要啥给啥”，还主张多给、给足、给够。就拿1943年来说，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原定“粮谷出荷”的计划量是720万吨，张景惠却说：“今年年景不错，可

望丰收，出荷的数量一定要增加一些。”总理大臣一句话，“出荷”量这年就又增加30万吨，造成很多农民不仅口粮毫无保证，连种子都被征去。黑龙江省林甸县农民因拒交“出荷”粮，而被日本人副县长殴打致伤，并被烧了住房和柴草。这一严重事件在伪省长会议上也是议论纷纷，张景惠见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第四课长黑川大佐在座，唯恐他们听了不高兴，正当大家谈论时，他突然站起来，拍着桌子吼叫训斥说：“不用往下说了，他妈的，不管是谁，不出荷的，就拉出来给我毙了！”

他这种反常之举闹得众大臣一时不知所措，都怔住不敢吱声了。

日伪在拼命加大“出荷”量的同时，势必要控制人们的口粮，张景惠通过他管辖的伪国务院这架机器，先后炮制了“主要粮谷统制法”、“农产物交易市场法”、“粮谷管理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对人民群众的口粮实行严格的统制配给，配给量之低，是举世罕见的。1943年7月，在当时的奉天（今沈阳市），大人供给量为7公斤，少年为4公斤，幼儿2公斤；鞍山市成人供给量6公斤半，抚顺6公斤；哈尔滨4月份成人配给仅5公斤，5月份5公斤半，6月份因另给点白面，只供给2公斤半粮，真是让人难以糊口了。虽然也有黑市粮食可买，但那是要冒着打成“经济犯”的危险的，而且黑市交易的粮价奇高，1斤苞米价是配给价的5倍，高粱米配给1斤1角钱，黑市价1斤1元3角钱。老百姓只好吃用橡子面蒸的所谓“满洲馒头”，喝豆饼渣掺糠秕、杂谷的“协和粥”。可就是这样，关东军第四课长小尾还说：“日本每家都有出征的，牺牲的也不少，和日本一德一心的‘满洲国’人吃得少一点，多出二成粮谷不算什么。”张景惠马上接着说：“我是庄稼人出身，明白庄稼地里的事情，这样大的满洲国，哪有因粮食不足而饿死人的道理”、“勒紧裤带

也就过去了。”总理大臣在上面号召“勒紧裤带”，下面的小汉奸狗腿子们真就勒上了，有的地方干脆一粒粮食也不配给。在伪北安省，1943年7月份完全停止了粮食配给；在伪牡丹江省有6 620名老弱妇幼被长期停粮。老百姓说这不光是勒裤带，是让我们扎脖子，人不吃粮，哪还有活路！仅1942年1至5月，在双城、佳木斯等5市县就有346人因无粮可吃被迫自杀。而张景惠在1945年4月作为慰问特使亲赴日本东京，送去大米30万吨、盐70万担，并表示：“满洲物资丰富，有力量援助亲邦进行圣战。”

除了“出荷”粮食外，张景惠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钢铁的需求，又通过“国务院”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将人民手中的各种金属制品悉数搜去，如门拉手、汤匙、点心模子、乐谱架子、炉篦子等，不论大小，凡沾上金属边的，统统都列在“金属类回收法”的清单中，连老太太平时嘴叼的铜烟袋锅也是回收对象。又如德都县为响应张“国务总理大臣”献纳金属的号召，专门举行仪式，将187尊明朝以来铸就的大铜佛全部献了出来，“协力圣战”。

张景惠还下令伪国务院将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点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交纳出去了。1944年古海忠之去上海采办日本军需品时，一次就从东北运去20吨铜。

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物，而且还要钱。1932年伪满刚成立，全东北税收1.7亿元（伪币）。张景惠上台执政后，巧立各种名目，拼命征税。据清原县太平川村一位伪甲长回忆，他经手所收的税，就有土地税、人头税、畜牲税、车辆税，还有保甲费、协和会费、门户费、天照大神供奉费、狗牌子费以及鸡、鸭、猪等都要上税。这位伪甲长初步折算一下，当时一般

老百姓平均一年得拿150多公斤粮食的杂税。因此，仅1937年伪满的一年税收增至3亿元（其中包括专卖收入），到1944年竟增为11亿元（也包括专卖收入）。

掠夺成性的日本殖民侵略者要物、要钱之外，还要地、要人。张景惠上台执政两年，关东军自认为已经全面确立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后，于1937年夏，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和张景惠共同签订了“满洲拓植会社协定”，依此协定，日本国要以20年为期，向“满洲国”移民20万户、100万人。移民自然要先占地，自1937年以来，先后有2 650万公顷土地被占用（包括山林荒地），其中有1 200万垧良田，逼得40 700余户农民背井离乡。

要人，是征用东北人民无偿地为日伪当局服劳役，即“出劳工”。开始是煤矿、水电站征用劳工，以后关东军搞什么“北边振兴计划”，大修军事工程，更是大量征用劳工。经张景惠的手，又制定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18岁到45岁男子都有当劳工的义务，日伪当局每年所需劳工起码50万，有时竟达近百万。1942年为落实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计划，又临时紧急征用劳工40万。一时征不到，就在城市大抓所谓“浮浪”，一些无业的城市游民或上街碰上抓人，就都当作扰乱社会秩序的“浮浪”，被押运到东部或西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每天平均强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加上生活条件恶劣、疾病流行。劳工死亡率平均达15%。由于人民叫苦连天、怨气沸腾，关东军闻知找张景惠，他却说：“满洲人苦力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们不要顾虑……”

张景惠奉行的“要啥给啥”主义，自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疯狂掠夺。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33年到1944年，掠去煤炭21 661万吨、铁1 183万吨；从1935年到1944年掠去

钢、钢片988.6万吨，钢材319.6万吨。这些数字对当时中国东北的生产能力来说，几乎近于天文数字那么可观了。

1942年，当“满洲国”庆祝建国十周年时，关东军又抛出了什么“十年的历史发展已使日满结成不可分的父子关系，满洲应该称日本为‘亲邦’。”作为去日本面谢十年“援助”的特使张景惠，在东京致辞时便口口声声称日本为“亲邦”，不惜连祖宗都出卖了。

1944年日本已经面临全面失败的颓势，曾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对张景惠的秘书松本益雄说：“在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张景惠仍然倾向日本，为日本尽力。”确实，就在1945年4月，张景惠最后一次去日本送米送盐时，还向铃木贯太郎首相拍胸膛保证：“请放心吧，只要有我，满洲国的一切都好办。”

总之，张景惠的“要啥给啥”是汉奸的卖国逻辑，也是个人荣身富贵的可靠保证，循此也就找到他这位铁杆“总理大臣”稳坐其位的奥秘。

“凌升通苏事件”真相

正珠尔扎布

所谓“凌升通苏事件”发生于1936年3月（伪满洲国康德3年），日本宪兵队在海拉尔等地逮捕了凌升等许多人。一个月后移送伪新京（长春）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经伪军法会审判处死刑者4名，13年以上徒刑者2名。

这件事是在汉奸、蒙奸之中轰动一时的大案。当时驻海拉尔的日军骑兵军集团长笠井中将、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中佐、伪

满兴安军顾问寺田利光中佐和日本海拉尔宪兵队长北川宪兵中佐等4人，是制造这件事的主角。

究竟所谓“凌升等通苏事件”有无事实呢？至今是一个哑谜，综合我对这件事的见闻，我认为只是“莫须有”而已，凌升封建余孽叛国求荣，决不会采取通苏以实行反满抗日的爱国行动。只不过自以为拥戴有功，分省长的地位没有满足其愿望，流露出怨愤之情，加以刚愎自用，某些地方刺痛了日寇的隐衷，触犯了主子的尊严，所以被杀。

“九·一八”事变以前，凌升是呼伦贝尔副都统。他封建思想很浓厚，对满清皇朝的复辟抱着幻想。“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把废帝溥仪拉出来作傀儡引起了蒙古封建阶级攀龙附凤的兴趣。溥仪到了旅顺，凌升积极活动起来。跑到旅顺见了溥仪和关东军，参加策划伪满建国的阴谋活动。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凌升被任命为伪兴安北分省省长。他的父亲贵福被任命为伪参议府参议。凌升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同时又对日寇的专横、满系官吏有职无权的状况很怀不平。对日系同僚态度傲慢，对日寇统治满洲国的政策措施，多有抵触，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走狗群中称硬汉，取死之机已伏。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省长会议。当时，我在会上当翻译，凌升公开发言，反对日寇对满蒙的一些政策如土地国有；日寇参加满洲国政府当官吏（所谓日系官吏）；用日语作为满洲国国语并用日文行文；把蒙古地方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四个兴安分省等等。他说在满洲国的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能作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什么叫分省？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能实施呢？弄得主持会议的日系蒙政部次长瞠目不知

所对。他提出的意见也很多，都为日寇难以接受的。这样凌升与日寇鸿沟很深，参加会议的满系人（汉奸）都噤若寒蝉，莫敢是非。

1932年10月，伪满兴安总署长官齐默特色木丕勒（郭尔罗斯前旗亲王）、伪兴安东分省长额勒春、伪兴安北分省长凌升等赴日本参观。随员有辅导员、伪兴安总署总务处长白浜晴澄、翻译正珠尔扎布等。在日本各地参观了一个多月，参观当中也对白浜提出很多难题。最严重的是他反对到日本各地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他说我们参观的目的，是为了逛逛名胜古迹，观赏风景而来的。不是为参拜天照大神而来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

1934年末，凌升作为伪满首席代表，参加在满洲里举行的满、蒙（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会议，当时出席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后回国的日本代表、海军少将山本五十六路过满洲里，驻满洲里的日本领事和凌升联名在满洲里车站食堂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升看见日本领事的座位是主人的位置，而自己则列了次席，不肯参加宴会。日本领事解释说：因为请的是日本代表，日本领事应该坐在主席。凌升说虽然请的是日本代表，但是这个地面（指满洲里）是属于兴安北省管辖的范围，我是这省的省长，客人到了我的管辖地方，应该省长我坐在主人的席位。两人争执了一番，领事无奈把主席让给凌升。

凌升和抗日将领苏炳文有来往。他的妹夫春德也同情苏炳文。而且为苏炳文的事，他还给蒋介石打过秘电。这些都在日本人的手里掌握着，成为日寇将他列入“视察人”的把柄。

根据上述情况，凌升在日寇的心目中已成为统治呼伦贝尔的一大障碍。

伪满成立以来在满、蒙（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上，由于日寇野心挑衅而不断发生国境上的纠纷。特别是在1935年以来，在满蒙国境沿哈拉尔哈河一带发生的彼此间的冲突中，每次战役日军出动军队若干人，蒙古人民共和国总是用加倍的兵力来对付，日寇老是打败仗，伤亡很重。

驻地海拉尔的笠井骑兵团长认为皇军惨败的事实，对所谓“皇军之面目”来说是难堪的。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责任，因此扬言有人通苏，窃取了日军的行动情报，于是首先在国境附近逮捕了所谓嫌疑分子、伪满上尉团附沙德勒图和伪警察沃兴泰等。逮捕以后，日寇宪兵严刑拷打硬逼他们说出背后关系。终于捏造出凌升等有间谍活动和反满抗日通苏的口供。

1936年3月27日日寇突然宣布海拉尔市戒严，出动了许多宪兵和军队戒备、巡逻，旅客乘坐的火车、电信电话的使用、文件来往均行禁止，形势非常严重，人心惶惶不安。当天逮捕了伪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并搜查他们的私宅，结果一无所得。过了一个星期，凌升自伪新京回到海拉尔。下车后就在车站被日本宪兵队长逮捕。凌升的胞弟、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偕同顾问田中佐等，到笠井骑兵团长那里抗议，要求释放凌升。笠井支吾应付，不一会，日本宪兵就在笠井司令部逮捕了福龄。

在新京（长春）伪蒙政部召开的伪兴安省长会议，随行秘书官华霖泰也在新京被诱捕。

凌升被捕后，数十名日本宪兵包围了凌的住宅进行大搜查，但私人住宅里，除了金银货币以外，没有什么通苏的证据，只是在旧副都统衙门的仓库里发现了两挺机关枪，以及四五十支步枪和子弹数万发。这些枪械子弹是马占山、苏炳文出走时无法带去，给凌升留下的，凌升尚未正式移交警务厅。日寇得了

唯一可以作为凌升“通苏”证据的东西。

此外日本兵还捕了保定（伪省公署科长）等许多人，又到伪兴安北省总务厅长荣安和海拉尔伪市长春德家里去劝诱，软硬兼施叫他们说出有关凌升等反满通苏的事实。但是仍然什么证据材料也没有得着。

凌升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里，经过严刑拷问后转解新京的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以后把这个案件移交给伪满军法会审，在日本所宣布的所谓“凌升等通苏事件”公报上，一点也指不出事实，只不过是空空洞洞二三百个字的罪状。

“凌升等通苏事件”宣布后，日寇对蒙古民族加强了统治。在一次集会上，伪满军事部高级顾问花谷正少将宣称，今后无论任何人，若是说蒙古独立的话，就拿反满抗日的罪名来惩罪。

所谓“凌升等通苏事件”发生后的一天，堀内一雄（中国名叫满良，伪满第一军管区少校参谋长，我早在日本时与他相识）由新国都旅馆来电话找我。会见后他问凌升事件是怎么回事？我答以不知，他说这次为了裁判凌升，要组织军法会审，特地调他来充当裁判长的。他也不知道这事的底细，问我有什么意见，给说一说。我说我想他（凌升）不可能有这个事，他还要跟皇帝结亲呢，在新京也盖了大楼。他父亲是参议，自己是省长，还能有别的想法吗？堀内默然。

裁判结果。把沙德勒图判了15年徒刑，沃兴泰判了13年徒刑（他们都在狱中死去，怎样死的不详细）。凌升、福龄、春德、华霖泰都处死刑。

1936年4月，在新京南岭刑场凌升等人被执行枪决，当天在太子堂（日本庙）尸体由各家属领回。这个案件的处理是按着关东军的意旨行事的，既没有辩护律师，而裁判长及裁判官又是日人，只是扮演了一出傀儡戏罢了。

凌升事件结束，关东军宣布这件事不再扩大；不再检举逮捕。拿这话来安定人心，又假惺惺地表示恻隐说这样大事件本来应该诛灭九族，但是大日本帝国不忍那么作，他们的亲属都免罪。于是把凌升的儿子色布精太送到日本留学去了。

（海拉尔市政协供稿）

凌升之死

恩克巴图

凌升是伪兴安北省省长，达斡尔族，1936 年被日本统治者杀害。那是在 3 月末 4 月初，海拉尔的日本宪兵队，发布了戒严令。出动了几千人马，包围了海拉尔及南屯、西屯、莫和尔吐屯，禁止行人来往，出入者必带日宪证明。在街道口村落中贴满了布告，其内容是：要在几天内一网打尽不良分子，搜查了不少住户。经过七昼夜才解除了戒严令，各行业恢复正常，报上登载了凌升通苏事件。与凌升事件有牵连的春德（伪警务厅长、凌升妹夫）、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凌升的弟弟）、沙德勒图大尉和警佐沃兴泰也都先后被逮捕。

凌升等四人被捕后，在日宪惨无人道的审问中，没有承认任何罪状，也没交待过其他人，由于案情重大，很快就把他们送往长春军事法庭。他们在长春也没承认任何罪状。同年 4 月末凌升等四人，在长春的南岭被日宪枪决。

据正珠尔扎布（伪军官）的回忆文章说：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到伪康德皇帝（溥仪）面前说，前几天破获了一个案件，罪犯是陛下认识的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

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当时目睹行刑情况的伪治安部官房长官入江上校，后来对我谈过凌升被枪决的情况。他说，这人真倔强，临刑时面不改色，含着冷笑，叫他带上覆面带时，坚决不带，挺着腰板不在意。问他还有什么说的，他说："没有，快打吧！"事后听说，凌升被拷问中，始终没供出任何通苏事实，只说："别人无罪，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担当，不要牵扯别人。"

凌升事件当时轰动一时，在报纸上发表，但没具体事实，谁也不敢议论。现在在文件报刊上难于找出线索，他们四人被捕至枪决只一个月，其后报刊上也不刊登，日本人也不谈，象毫无其事一样。

凌升被捕当时，日军到他家搜查了好几次，没找到任何秘密文件，登记了所有的财产，到野外敖特尔查点了他家的牲口，没有没收。

其后不久，把凌升的儿子色布精太送往日本学习。

伪满洲国刚成立时，凌升是拥护并亲自前往旅顺，参加了各地的"请愿代表团"，拜见过爱新觉罗·溥仪，请他出马上任伪政权元首。但是凌升当上了伪兴安北分省省长以后，在工作中他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对日本侵略者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有一次和伪满各省省长去日本参观，参拜日本天照大神庙以后，他说这是日本皇帝的祖先，不是我们的祖宗，为何让我们去参拜。

伪满政府给凌升发了勋章，他拒不接受。

有一年关东军为了向苏蒙挑衅，调来一批精锐部队陈兵到满蒙国境线上，当时凌升到车站去迎接，日本的队长同他谈过军事情况。当该部队开到西部国境交战时，苏蒙方面早已布置

了大军，超过了日军好几倍。在交战中，日军大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因失职被调回国。当时有一位从长春来海拉尔的蒙族官吏说过："因对方的消息很灵通，所以在几次的国境冲突上日军大败，一定是在兴安北省的大官内有地下活动组织。"

于1936年3月末，在长春召开了伪兴安四省伪省长会议，会上谁也不敢提土地问题。可是，凌升挺身而出，强烈反对日本内地开拓团移入内蒙地区，反对日本官吏的独揽大权，反对日本关东军干涉地方政权等等，惹起了日本军部的恼怒。散会后，凌升和华霖泰二人回到海拉尔就被捕入狱了，以后又逮捕了春德和福龄。这是我所知道的凌升被害的片断。

附　记

花赛·都嘎尔扎布

关于凌升被杀害的问题，当时的伪兴安北分省公署警务科长板水梧郎（日本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6年4月12日的夜间在自己的家里用小型电影机放电影的时候，日本军司令部来电话命令说：火速来到司令部。我马上跑到司令部时，那里的接待室里坐着特务机关长寺田大佐（上校），我小声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用汉语说："没法子"，过了一会，司令部的参谋长出来正式命令说：

"一、同蒙古人关系密切的三位可能有意见，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严禁向上级提意见和联系。

二、凌升为首的蒙古人搞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已经揭露，因为今夜早晨4点钟宣布戒严令，要逮捕凌升以下几名蒙古要人，

对于有关这个事情的一切事儿都由日本军队来施行”等等。他还写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一些以前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有怀疑的行动，军参谋长说他们搞了蒙古独立活动，但是凌升没有军队的指挥权，或者向外蒙古请求援助么？过去没有这样的行为，头脑聪明的这个人（指凌升）不会做这样的蠢事，但是成立满洲国以前，在呼伦贝尔，他们掌握绝对的大权，成立满洲国的时候，他也有功劳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过分干涉省的内部事务，他有些不满意，这是事实。关东军方面，找理由换省长的意图过去是有过。从多方面考虑对凌升事件，不能不说关东军有些阴谋诡计的事情。”等等。

以上是摘自日本人冈本俊雄写的《一名布里雅特蒙古青年和一名日本青年的会见》一书，第111页到113页。（昭和54年7月，日本奈良市实业印刷株式会社发行，非卖品。）此人当时是伪第十军管区司令官乌尔金的翻译官。

（摘自《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

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被枪决的内幕

藤山一雄

贾玉芹　译

一

“满洲国”宣布帝制后不久，在一个秋季的日子里，我去中央银行总裁荣厚的公馆拜访。当谈话提到王维时，荣厚突然说：“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说完，他把我带到新京城内东三道街

益通银行院内的一栋房子里，那里有袁金铠、李槃、宝熙、三多、王季烈、沈瑞麟，还有年轻的于莲客，此外，佐藤肥斋也在座。事后得知，这个集会叫做“乐诗会”，在这一俱乐部内有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荣厚从中央银行的仓库里拿来芳醇的绍兴酒，每月举行一次集会。达斡尔族出身的贵福和溥仪夫人秋鸿（即婉容）的父亲荣源也参加这一集会。贵福最为平易近人，以后同我成为至交。他是我将在本文中记述的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的父亲。建国前他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自清朝以来，一直是驻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将军麾下主持蒙古行政，在草原绿洲的海拉尔威震一方。

中华民国时期，政府为了博得蒙古人的欢心，编制满洲八旗，使其负责镇守边境，尽力使彼此间不致产生裂痕。而当吴俊升任督军时，呼伦贝尔被纳入黑龙江省长管辖之下。民国7年，爆发了巴布扎布事件。巴布扎布与张勋一派相呼应，企图复辟清朝，很快夺取了伏西、嫩江，进军至林西，最后以巴布扎布战死而告失败。其幕后就有这位貌似温厚的贵福在暗中活动，他曾为巴布扎布提供过大量金元和子弹。

民国11年（1922年）又发生了“梅尔赛叛乱”。他与贵福同样，也是达斡尔族人。他企图搞呼伦贝尔独立，私赴苏联，获得大批武器，同吴俊升交战。但是，他也是武道不佳而一败涂地，逃入苏联驻齐齐哈尔领事馆，又去外蒙，以后杳无音讯，下落不明。梅尔赛的父亲荣禄长期任索伦旗旗长，建国后任蒙旗联合办事处处长，在凌升身边充当卫士的角色。梅尔赛叛乱的直接原因是反对吴俊升向呼伦贝尔输送山东流民开垦土地所导致的。

二

贵福已近入暮年，表面上似乎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但我却有一种直感，他暗中在祈祷着凌升大业有成，并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当时，我正任恩赏局局长，总想去呼伦贝尔拜访凌升。截止1936年，草原大约有2.7万名游牧民散居各处，而贵福一行的达斡尔族却只有386人，其中壮年男子据说只有165人。自清朝300年以来，被称作"达斡尔政权"，掌握草原主权，广施仁政，颇得好评。达斡尔族共分三家，其姓为郭尔钦（郭）、孟尔钦（孟）、和敖罗钦（敖），其意为"川上"、"川中"和"川下"。据说，这一名称来自他们是在蜿蜒的额尔古纳河边形成的部落。孟尔钦一门居其首，据说连张作霖主持的东北政权，对于其实力也难以敌对。

我同凌升的相识是通过兴安总署次长菊竹实藏介绍的，后来交往甚密。经常在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相会，每当这时都是边进餐，边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乍一看来，他似乎是一个住日本农村的私塾先生，身材短小，面容温和。但他却具有天生的骑兵士官性格和祖传的不屈不挠的骠悍精神。谈话一旦涉及蒙古行政问题，他便十分激动，语言中多有过激之辞。例如，他曾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现在我们已走投无路，连北满的日本开拓民，关东军也把他们当做看门狗，我们的要求或许是过分的，不过满洲还有辽阔的土地，即便是日本人，如果将农耕民族引进草原，也是无视天理的愚蠢之举。政府既然提倡五族协和，蒙古人也理所当然地拥有生存的权利。蒙古人拼上性命也要死守西边。"这是他坦率的肺腑之言。

如上所述，凌升不欢迎汉民族进入草原，同样也不欢迎日

本移民。关东军决意要消灭凌升一族，而重用布里亚特族的乌尔金。乌尔金毕业于帝俄时代的俄国军官学校，1917年10月间被驱逐，带领布里亚特和蒙古族两千人，从伊敏河支流越境。建国后，被编入索伦族，任族长，后来又被任命为满洲国陆军上校；在关东军策划的消灭达斡尔政权的阴谋中又晋升为少将，任蒙古军司令官。1934年，在海拉尔公署就任时，曾在省长凌升面前行“跪重”之礼，而很快便同省长平起平坐，甚至在关东军的某些集会上，有时竟居省长的上席。此人活泼开朗，身材高大，潇洒英俊，颇有将军风度。

凌升有一弟弟名福龄，是陆军上校，但生来缺乏阳刚之气，颇有文人气质。作为军人终究不及乌尔金。而在凌升的内心中，由于他失去了担任司令官的机会而不胜惋惜。因此，在兴安北省的官场中投下一缕阴影，从而导致政治动摇，这也是意料中的事。

警察厅长敖春德，他的汉语是在南京大学学习的，音调优美，思想激进，被视为危险人物。每次到新京来都来我这里，毫无保留地畅谈他对引进新文化和开发草原的设想。其妻子是凌升的胞妹。关东军早已在侍机消灭他。

三

对于建国有功人员的首次奖赏大约用了两年时间。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关东军强行要求其全部官兵都要获得奖赏，这样一来，人数将成倍增加。另一方面，在公布前夕，又发生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那就是关于省长凌升的问题。恩赏局早已进行过充分调查，认为凌升至少应授予勋二位。建国当时，他是东北行政委员会拥有实力的人物之一。他曾置生命于不顾将皇帝带来满洲。对

于苏联，他也属于第一线人物。然而，横山中佐却一再来恩赏局，强烈要求授予凌升以勋四位，相反却要求授予乌尔金以勋三位。我作为恩赏局的负责人，当然不会屈从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恩赏局同关东军经过激烈的争论，我曾一度遭到软禁。最后，我的顽强抵抗也是徒劳无益的。对于在建国时毫无功劳可言的乌尔金授予勋三位，而省长凌升却只被授予勋四位。事出无奈，只好公布了这一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恩赏名单。当时任兴安总署次长的伊田四郎和前任次长菊竹实藏，在公布之前由于问题严重，认为它不仅将对蒙古行政的前途投下阴影，而且对满洲国的政治也将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要求关东军三思而后行，但却遭到了关东军的严厉驳斥，凌升的勃然大怒自不待言，贵福一门的绝望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

贵福一门始终绝对效忠于溥仪皇帝，私下称清朝时代为“前清”，称满洲国为“后清”。在举行正式典礼或敖包祭典时，必须着用清朝时代的官服，以显示其热忱与忠诚。据说当凌升拿到勋四位景云章时，立即将它摔在地上。他一是为我这个朋友和恩赏局长的无能而感到气愤，但在关东军的强权面前，我也确实无能为力。

凌升在授勋典礼上的急躁行动已在关东军的意料之中，于是便嫁以“反满通苏”的罪名企图将其消灭。同时，还以同样的罪名将除乌尔金之外的兴安北省的全部首脑，包括凌升、孟福龄、敖春德，以及郭华霖泰（省长秘书官，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生，梅尔赛的堂兄）等人，于1936年3月23日上午10时，在新京郊外的南岭刑场，依据关东宪兵司令官的命令全部予以枪决。

按照郭华霖泰、敖春德、孟福龄和凌升的顺序执行死刑，临刑前他们的态度都极从容。其中，凌升特别被问到有无遗言，他

对在场的下永宪次说："希望你能转告我的长子，以背叛皇帝的罪名处我死刑，我感到十分遗憾。请将这件上衣转交给他！"说着，脱下上衣，拒绝覆面，站在了受刑的位置上。

然而，他那大义凛然的态度震慑了行刑者，子弹射偏了，他虽一度倒下，又自己站了起来，并指着自己的心脏部位，从容地说："向这里开枪！"枪声起处，按照关东军的意图完成了对他们的杀害。

伪兴安南省省长 叶喜海顺被革职一事

查干　萨哈雅

叶喜海顺是图什业图旗（今科右中旗）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袭札萨克和硕亲王。1914年叶喜海顺亲王与清室皇族肃亲王的女儿金孟显珍结婚，成为肃亲王的贵婿。辛亥革命后，得到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赏识，1920年又认了东北军阀张作霖为义父。

叶喜海顺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复辟大清"的肃亲王善耆及其子女宪真、金璧玉、金璧辉（川岛芳子）等关系密切，他们勾结日特山良为首的日本人，经常出入业喜海顺王府，秘密搜集情报。

"九·一八"事变后，叶喜海顺亲王积极支持日本侵略者把东蒙古并入伪满洲国，他参加了日本关东军策划的"郑家屯会议"，会上他积极赞同会议主持人菊竹稻藏提出的满蒙政策，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赏识。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1932

年9月，叶喜海顺被任命为伪兴安南省第一任省长。日本天皇为了表彰他对建立伪满洲国的“功绩”，授予他一枚三级旭日勋章，叶喜海顺成了当时东蒙古地区显赫一时的人物。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开始调整对蒙政策，废除了蒙旗制度，实行“蒙地奉上”。大大削弱了王公利益。这些政策逐渐引起了叶喜海顺的不满，加之当了一年多省长的叶喜海顺，深感日本人专横跋扈，身在上层的王公毫无实权，因而不满的言论行动时有流露。一次宴会上，叶喜海顺亲王有了几分醉意，当时他无顾忌地说出：“如果我早知你们日本人是这样，当初就不该为你们卖命！”一语出口，招来了祸事。从此，日本人对叶喜海顺产生了疑心，认为他不忠于日本帝国，准备寻机撤换他。

当时兴安南省公署设在郑家屯吴俊升的宅院内，省长叶喜海顺的公馆安排在县长高某的一处宅院。1933年正月初一，房主高县长回叶喜海顺居住的宅院内设的家堂庙祭祖，省长公馆门前的警卫，将高县长一行阻拦在大门外，不准入院。高县长及其随从欲强行入内，与门卫争吵起来。门卫朝天鸣枪警告，高县长的马弁亦鸣枪示威，后院的省长叶喜海顺听到枪声，问及缘故，卫兵排长如实报告了门前情况，叶喜海顺大怒，拔枪朝大门方向开了两枪，当时并无伤亡，高县长等无奈，只好在大门外放鞭炮祭祀祖宗，开始的枪声和后来的鞭炮声混在一起。高某心怀不满乘机驱车到日本宪兵队和“满铁”公所告状，谎报省长叶喜海顺无故开枪，欺压汉族等。日本宪兵队不经调查，就到叶喜海顺公馆问罪，并抓走了1名仆人、1名家乡来拜年的亲戚。后经叶喜海顺和省公署的官员到宪兵队陈述情况，才不了了之。叶喜海顺一气之下，长时间没有上班，日本人以此为由，革了叶喜海顺兴安南省省长的职务。

当年春天，叶喜海顺带家眷先后转至沈阳、旅顺闲居，1939

年妻子因煤气中毒病故，叶喜海顺则于1944年秋在家乡科右中旗病殁。

本文据查干、萨哈雅等回忆文章及有关资料整理。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伪警察总监修长余之死

王稔五

1930年秋，我充任大连泰东日报社记者兼长春分社社长，驻在长春。由于经常到长春市公安局采访，有机会和该局的局长修长余接近，渐渐地处熟了。

熙洽叛国投敌，成立吉林伪政府后，为了奖励修长余丧权辱国的“功绩”①，特提升修为吉林全省警务处长兼全省保卫团总办和清乡局副局长。做为熙洽的亲信，修长余到任后，叫他的督察长梁尊一两次来长春找我到吉林去，要我做他的日文秘书。此后，由于和修共处在一起，因而对他的情况我是知道一些的。

修任伪吉林全省警务处长时，他的家眷住在吉林德胜门外警务处的后院。每天晚饭后，他总要到熙洽的南公馆去。这里汇集着大小汉奸，赌博聊天，乐以忘返，修是不过午夜不回家的。他对熙洽、孙其昌这类人，自然是很恭维的。就是谢介石、张燕卿、郭恩霖、李铭书、荣孟枚一类所谓的新贵人物，也极力周旋于其间。吉兴从延边来省城时，他设宴表示欢迎，并有

① 参阅《九·一八事变》卷中《日军侵占长春见闻》一文。

日本宪兵队植田中佐作陪。张书翰接任吉林省印花税处处长时，受到日本宪兵队的反对，他叫我给张书翰当翻译，请植田的客，进行联络。伪省政府各厅安插日人做顾问后，他向伪财政厅长孙其昌推荐我兼做该厅的日文秘书。有时候，他又好象很叹惜似地说，东北的情形愈弄愈复杂，凭中国自身是不可能有什么好办法的。看样子他认为中国人的前途只有寄托在外国人的身上。

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随后伪政府的各院、部相继成立。一批批日本浪人和一伙伙汉奸纷纷来到了所谓的国都新京，当时客栈旅馆家家客满。3月12日夜间，修在吉林接到熙洽从长春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为了重视新京的治安，臧式毅民政总长和他商量决定调修为首都警察总监，要他到新京接事。13日修布置马季援督察长和张主任秘书共同负责暂时看守吉林警务处，14日早车他便带秘书王肇澄、王稔五、科长王致中和郎某等一齐奔向长春。下车后因旅馆到处满员，就暂时住在头道沟志远永鲜货代理店。当晚，修在省城公安局借用的200名警察也赶到，住在城内的一个大车店里。修连夜先后到熙洽、臧式毅的住所报到，他们两人对修从吉林借来200名警察充实长春的公安力量一事都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天（15日），修带着我到伪民政部去见警务司长甘粕正彦。甘粕却对修说，首都警察厅的编制还没有决定，请总监在家暂候几天，等到厅舍的地点和编制决定之后，再与你联系，新京的公安业务暂时仍由原来的市、县公安局照常负责。甘粕的这一番话，弄得修摸不着头脑，一切都同他原先所想的不一样。他原来以为首都警察总监是全国警察之冠，有职有权。然而没想到上头出来这么一个警务司，又是日本人在管事，警察总监也不过是个虚名而已。为这事他曾亲自问过臧式毅，也未得到

什么肯定的答复。用他话说："我总是糊涂。"

总监没有事，我们也得闲，整天里打牌喝酒。大约过了四五天，修叫我和他同去见甘粕，到了警务司，说是司长忙，由警务科长星子敏雄代为接见。一见面，星子敏雄劈头就问：是谁要你把吉林的警察带到长春来的？如果吉林市发生什么问题的话，谁来负这个责任？星子敏雄说话非常不客气，一听就知道他是不满意的。修被星子敏雄所激怒，也怒目相视，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是吉林省长同意，民政部总长要我这样做的，如果吉林市治安发生什么问题，我这个还没有辞职的吉林全省警务处长，一切责任还能负得起！你有什么意见，直接问总长去。说完他回身就向外走。这时，星子敏雄连忙起身追在身后对修说，总监不要误会，今晚我约你详细地谈谈。修未说什么，出门登车而去。到家之后，他对我说，这里一定有谁说坏话，今晚上如果星子敏雄真的来了，我们倒可以探询一下。下午6点来钟，星子敏雄果然坐着小汽车来了，请修到"八千代"喝酒。星子敏雄原来是个嗜酒如命的狂徒，三盅入肚就丑态百出。从他口中，我们知道了这件事与孙仁轩有关。原来自修调转吉林全省警务处长之后，熙洽就把这个长春市公安局长的位置派给了孙仁轩，修这次又回来担任警察总监。孙很是不安。于是就造谣说什么修要强制接收长春市公安局，还从吉林带来200名警察做打手，等等。警务司的日本人信以为真。修对星子敏雄说，孙仁轩不过是长春市公安局的一个光杆局长，他的督察长、科长、分局长、分所长以及800名警长警士，哪一个不是我修长余的旧部下，他从哪一点能说我要强制接收？真是无稽的谰言。几句话说得星子连连点头，不断地举起酒杯，不住地说："是啊，是啊！请喝酒，请喝酒！"

3月末，甘粕和修商谈，决定把第二模范监狱的一栋办公楼

暂做首都警察厅的临时厅舍。4月初，修把我们这些从吉林带来的人带到临时厅舍开始办公，进行筹备工作。这时，已有数十名日本人比我们先来了。这里也和各院、部的情况一样，只见日本人进进出出地很忙，而中国人只是东张西望地无处着手。修也只是上午来照照面，坐上一两个钟头，下午就不来了，晚间到熙洽、孙其昌、臧式毅的住所走走。

6月间，民政部正式公布了首都警察厅的官制，10月间正式开厅办公。按照伪政府的规定，接管了长春市和长春县两个公安局的警察消防业务，直接受民政部总长的指挥和监督（实际上是受警务司的指挥和监督）。原长春市公安局长孙仁轩调警务司督察室任督察官。首都警察厅的6个科长，日本人占了4个，修从吉林带来的人中，只有王肇澄弄了个保安科长，王致中、姚时中、郎某等人派为股长或科员，而我早在4月份就离开了警察厅。修长余也只好让日本人说了算。

10月间，在警察厅开厅后的不几天，我到修那里去，闲扯时提到国联调查团一事。记得，修很得意地说道：国联调查团来长春的时候，中国代表顾维钧的一个随从人员（名字记不清了）是我在营口时的一个同事。一天晚上，他偷着坐人力车从下处大和旅馆直接来到我家，向我打听满洲国的真实情形，我就当做说故事的一样讲给他听，他一直呆有两个多钟头才走。我看修说的很高兴，当时，我心里有些话想说，但未能说出口。我想：日本人为了监视国联调查团的活动，不能不做防范，这个人力车夫会不会是日本人伪装的特务？即或不是特务，也会有人跟踪的。修长余虽然是警察总监，但是日本人也不会完全信任他的。这个事日本人能不知道吗？我虽然想到了这些，可是由于修正在兴头上，尤其是他这个人平素好胜，总以为自己聪明，对别人的话总不愿采纳。所以，我只好抱着姑妄言之姑妄

听之的态度。后来在修的身上发生了两件事，使我不能不联想起他和顾维钧的随员秘密会晤的事，是否与这个事有关系？现在也是个谜。

1934年冬，伪满洲国实行地方区划改革，将原有的奉、吉、黑、热四省划为10个小省。当时，想当省长奔走活动的大有其人。修长余由于臧式毅、熙洽的推荐，已经内定为间岛省的省长。最初，修对此职本来不大满意。因为间岛省地处偏僻，省份小。后来由于大家的劝说，宁为鸡头不为牛后，他才同意了。可是等到正式发表时，间岛省长却是蔡运升。这个突然的变故，使他不能不为之一惊，究竟是什么原因？他自己纳闷，外界人也是弄不清。翌年（1935年）春，孙其昌从龙江省来新京出席新省成立后的第一次省长会议时，特地到修长余家去看望他。孙说，这件事一定是日本军部的意见。修说，关东军对我不满，也是在所难免，这几年我很少和这群军人有来往。孙和修本人都认为是日本人搞的，而日本人为什么反对修长余呢？这倒是一般人猜想不透的。

1935年的深秋，伪首都警察厅连续发生了两件不体面的事：一件事是长通路警察署长范某，发放鸦片零卖所许可证有受贿嫌疑被逮捕；另一件事是厅里的保安科长王肇澄因为三马路燕春戏院的建筑问题，受到长春地方检察厅的拘押审讯。一时间满城风雨，传说与修长余有牵连。范、王二人，在检察厅里几次受到严刑审讯，检察官直接向修长余的身上逼问，叫他二人咬定修长余受贿。据说这两个人始终没有承认，拖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结论。在范、王二人被捕之前，长春地方法院检察厅修葺了一间优待号监房。当时，法院、检察厅内部人员都私相议论说，这是给高级人物准备的，要有重要案件发生。过不了几天，抓进来的是当科长、署长的小汉奸，也没有把他们押

进这个优待号监房。最初人们并未在意，可是经过几次刑讯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是要在修长余的身上找问题。从检察厅透出来的消息，传到了警务司和警察厅。果然，在范、王二人被捕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清晨，检察厅的小车开到修长余的住宅，说是检察官请总监有事。修去了之后当即被扣留，在那个“优待号”里拘禁40来天。据说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和翻译全是日本人，中国人谁也摸不着准信。修的妻子探过几次监，时间限得短，监视也严，不准随意谈话，一般朋友则不准许接见。当时的伪民政部大臣臧式毅、次长赵鹏第都是修的直接上司，但是谁也不敢过问。熙洽、孙其昌、谢介石、张燕卿等往日旧友也不敢露面出头。当我向孙其昌提出设法营救时，他只是闭目摇头。我曾想过：就算是修真的受了贿，就至于这样的严重吗？这里面日本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那么是什么问题呢？使我想到会不会与顾维钧的随员到他家访问的事有关？可能是日本宪兵借题发挥。

有一天，孙其昌一到班上就对我说，修云汀（修的号）回来了。又说，昨天晚上在大和旅馆看见他和总理（张景惠）在唠嗑，谈其被审的经过。并说，我看他有些精神失常，你替我去看看他。于是，我坐着孙的汽车到修公馆，我把孙其昌劝他“安心静养，暂时不必急于上班”的话告诉了他。回来后又听孙说：“云汀这个人刚愎自用，缺乏涵养，这事搁在他身上，他哪能受得住，气也得把他气死。”果然，修长余回家不过一星期就死了。据修的家人讲，他从检察厅回来后，始终不愿吃东西，医生也看不出是什么病。然而，在当时有谁敢说是日本人害死的呢？

修长余死后留下妻子和三男三女，大孩子刚满7岁，小的不过周岁。幸好修长余生前加入日本生命保险1万元。修死后，日

本帝国生命保险会社新京支店说修长余死因不明，不能履行契约之规定。我找伪首都警察厅去交涉，日本警务科长告诉我，决不许保险会社乱说胡说。从此，保险会社再也不敢说死因不明了。伪国务院还拨给一笔死亡退职金，修的灵柩运往营口原籍安葬。这些都说明，日本人是抱着一了百了的态度，不愿无谓地给其他汉奸们一种不安的刺激。

伪满修聘特使熙洽访日的罪恶活动

罗靖寰

从1934年伪满政府改称帝制后，溥仪总算称了“满洲国”皇帝，觉得兴高采烈。其他遗老，如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胡嗣瑗等，也都觉得夙愿克偿，非常满意，并都对日寇极为感激。于是遂有向日本皇室派遣修聘特使，表示感谢的决定。特使的人选，正使为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郑孝胥，副使为伪满洲国的财政部大臣熙洽。熙洽是满清的宗室，在“九·一八”事变后，首先推举溥仪为满洲的皇帝，对满清的复辟极为热心，所以决定派他为特使。以后，他就计划利用这次到日本去的机会，向日本当局首要提出他的满清复辟计划（就是卖国计划），要求日本政府许可，并给他以军事装备的援助，以便向中国大陆燃起战火把4亿5千万中国人民，都投入水深火热的战争灾祸之中。

1934年3月中旬，熙洽即命令我和秘书长李铭书准备到日本送人的礼物，因为日本对于中国的古董书画，都特别喜爱，所以就决定以中国书画古董为礼物。但是吉林是个小地方，长春也是商业都市，古董商特别少。特别是高价真品的古董，可以

说绝无仅有。如果到北京去购买，又因为去日本的期限太近，时间太短，并且没有真正的认识古董专家，难免受人的欺骗。尤其是日本人对于中国古董，有很多专家、鉴定家，如果以特使的身份，送给日本政府要人的礼品是假的，让人家发现出来，岂不是笑话。所以对这个准备礼品的事，大家非常伤脑筋。幸而吉林永衡官银号（吉林国库银行）的经理李荆山，这个人一生酷好古董。他在官银号20年作经理，所赚的钱，全都买了古董，都是真物，决无赝品。他和李铭书及实业厅长赵任夔都是好朋友，所以赵任夔说，可以和他商量商量。让他把他所存的古董，让出一部分，不过20件，如书画、铜器、玉件头等，即可以够用的了。虽然李荆山这个人有古董迷，但是为了给熙大臣救急，他也不好意思不给。赵任夔去和他商量，果然一商量他就满口答应，允许自己所存东西，熙大臣可以随便取用，并将他买古董时的存帐拿出来，熙大臣用什么东西，就按他当时买的原价照付。就这样，把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熙洽就叫赵厅长、李秘书长和我就他所收藏的古董之中，选定了20件，都系最好的，如王石谷的山水，他有三幅，我们就选了最精的两幅。其它如戴克昌的作品、仇英的作品等书画共十幅，又选了周铜器鼎、觯、盘四五件，白玉和碧玉的件头四五件，共值一万三千几百元钱。选好后遂令吉林的秀古斋古董铺给打箱装好，负责在运输中不能损坏。这一切准备，一直到3月25日，才算忙完。

熙洽的随员，由吉林派定的为罗振邦、赵任夔；由财政部派定的为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庶务科长古海忠之，还有事务官二人。国务总理郑孝胥的随员有国务院秘书官郑禹（他的儿子）、国务院翻译官日本人（姓名我忘了），还有事务官2人，共12人。财政部星野直树，担负一行的一切事务的责任。至于

由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送给日本天皇裕仁的礼品，有东北出产的虎皮、豹皮、貂皮、最好的老山参、鹿茸等等的土产品。最可笑的是当我们到日本东京把这些礼品送到日本宫内，摆在日本天皇的招待外宾的宫殿内，请日本天皇看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不知道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送给他的，还说什么南洋的菲律宾送给他的。

在1934年3月28日早8点，伪满洲国访日修聘特使一行共12人，由新京（长春）乘专车出发去日本。3月30日晚8时，抵朝鲜釜山。31日6时抵下关，有日本宫内省派人来迎接，上陆后乘日本国天皇派来迎接专使的国宾专车，于31日晚5时抵东京。

熙洽拟定在日本住三星期。熙洽在4月2日晚对我说，他打算在日本皇室正式招待完了以后，用两星期的时间，分别拜访日本政府的各大臣和在野的要人，叫我给他做一计划和接洽联络，并且把带来的礼品，分别各人的身份，及和"满洲国"的关系，每人给一份，也拟出一个清单来。我当时主张对于日本政府的各大臣及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必都一一访问，只选重要的与满洲国特别有关系的大约在20人以内即可。熙洽同意。我当时即着手调查，我那时对日本国内各要人的履历以及他们在社会的地位、政治背景等，虽然知道一些，但是并不十分完全。我当时想起来，伪满洲国的立法院长赵欣伯正住在东京，他和我是最好的朋友，他对日本的情形非常熟悉，在日本政界的友人也很多、可以说是日本通。我遂去找他，和他商量，拟定一个名单，计有斋藤实内阁总理大臣、陆军部大臣（名字我记不清了）、内政部大臣与部麒三郎、贵族院议长近卫文磨公爵、众议院议长犬养毅，文教大臣（我记不清姓名了），系以前内阁的陆军大臣，在军人中亦颇有势力，系少壮派军人的领袖。

军事参议官槙崎大将，他为当时军人中资格最高，年岁最老的典型。本庄繁大将、高桥是清大藏大臣（财政部大臣）、芳泽公使、小矶广岛师团长、宇垣一成朝鲜总督、外交部大臣内田康哉、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共13人。除了小矶师团长及宇垣总督、芳泽公使外，均由赵欣伯给接洽拜访的日期、时间及地点。4月8日，熙洽首先访问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斋藤实子爵。当日早8点，我同熙洽由帝国旅馆乘汽车到总理官邸，当时有秘书在门前迎候，将熙洽让到客厅，由秘书献烟、茶后，约5分钟，斋藤总理大臣到客厅与熙洽握手寒暄后，分宾主坐定。首先斋藤实子爵向熙洽说，阁下在许多天的应酬中，一定很累，今天还特地分出工夫到我这里访问，太不敢当了。熙洽说，这次来贵国访问，蒙各方面热烈欢迎、招待，实在感激得很，尤其是此次满洲国改称帝制，阁下一定尽力很多。我们皇帝陛下，也对阁下非常感谢。熙洽又接着说，我这次来访阁下，除了表示敬意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阁下谈一谈。因为满洲国已蒙贵国的援助，改称了帝国，从此我们两国的关系，象兄弟左右手一样密切，利害是完全一致的。满洲国的发展，即是日本国的发展，所以我打算从现在开始，完全脱离行政的职务，训练30万人的军队。所有的装备及重、轻武器，完全希望日本供给。待军队训练好以后，即行开进关内，占领北京、华北及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看蒋军的强弱多少以及当时军事的情形如何，决定占领地区。总之，以黄河以北为限。待人心安定、治安确保以后，那时即请满洲国皇帝陛下回到北京。以北京为满洲国的首都。对这30万的军队，进行休养整编，然后看情形再行训练新兵50万人（50个师团），一切装备，轻、重武器，也请日本供给，待训练好后与前有的30个师再一齐向长江以南进展，向蒋介石的老巢南京进攻。同时，进兵武汉、四川、江西、

湖南、两广、西南各省，以及云、贵等地，以恢复旧日满清的全部版图。到那时，日满的关系，更加密切。名虽两国，实为一体。日本可以尽力在满洲国内发展经济，开发矿产，建设工厂企业。不到20年，则满、日两国，均能富强起来，可以雄飞世界。日本可以为东亚盟主。欧洲英美的势力，可以完全由中国大陆驱逐出去，满洲国人也能和日本人一样，过富强康乐的好日子。这是我的计划，但是实现这个计划，日本必须从现在起援助满洲国30个师团全部军事的装备，待进入北京后，日本需要再援助满洲国50个师团的全部装备。所有的代价，由满洲国作为借款的形式，分期偿还日本。不知阁下以为我这个计划怎样？如果阁下认为可行，我回满洲后，即行奏请皇帝陛下，派遣专员来和贵国有关方面，正式来商洽制定条约。斋藤总理大臣听完熙洽谈话以后，说阁下这个计划是很好，非常远大的。但是满洲国成立刚刚3年，国内治安，尚未确保，人心还没安定，所以象阁下这种计划，为期尚早。说话的时候，态度非常冷淡，面上也没有表现丝毫的感情。熙洽遂叫我把带来的礼品，周铜鼎一个，送呈斋藤，说略表敬意，作为纪念。斋藤说阁下到我国来，我们应该送给阁下纪念品，反倒受阁下的，实在不敢当。熙洽说不要客气，请收下吧。斋藤就叫秘书拿去收下，熙洽遂即起身告辞。斋藤送到门外阶下，我们遂即回归帝国旅馆。熙洽到旅馆后，心中似乎非常不快，午饭后，向我说，斋藤这个家伙真正太岂有此理，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并没思索考虑，就拿为期尚早四个字来作判语加以否定，令人太不痛快了。我说我看他在听大臣说话时，象毫不在意的样子，也可以说他根本对于这个问题，不感什么兴趣，所以态度非常冷淡。

4月9日午前10点，往访槙崎军事参议官。槙崎大将是日本旧军人的典型人物，只知道为天皇尽忠，自己的生命都是属

于天皇的，为了表示自己忠诚，随时可以拿生命报效天皇。根本不结婚，没有家族，只自己一个人住在东京郊区一所小民房内，没有任何使用人。只有他一个侄孙女来照顾，给他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我们到他门前时，只一个很小的庭院，种点草花。院内进不去汽车，车就停在门外的街道上。我们进入他的住宅时，他已经站在门内相迎。由他本人引导熙洽到楼上日本式客厅，分宾主坐定。看槙崎大将约有70岁以上，须发皆白，面色红润，身材非常魁梧健壮。他先开口向熙洽说，阁下这次来我国，每天都有公事的应酬，当然很累，今天还特别来拜访我，太客气了。熙洽说，听说您是国家的元老重臣、日本军人的模范，又是我的老前辈，所以特地托赵欣伯先生介绍，前来拜访表示敬意。并且有一件事情，想向阁下请教，并请援助。槙崎说，我们是先后同学，又都是军人，无论有什么事，尽管说，绝对不要客气。这时由他侄孙女献上日本式茶点，槙崎让茶，并请吃点心。他说，我一生无所好，只好吃酒和饭茶，我这茶是今年的新茶，京都宇治山的玉露，请阁下尝尝新茶的风味。熙洽遂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又说，这个点心是风月堂制的最细的纯日本式的茶点，都是日本特别风味的。熙洽又拿起点心尝了一块。为了表示答谢主人的盛情，熙洽称赞茶点甚好。这时遂说，我今天来是向老前辈请教及请求援助。我有一个计划，遂将向斋藤所说的事情，叙述一遍。槙崎大将听熙洽这套议论的时候，频频点头，表示赞成。待熙洽说完了以后，他说，你这个计划太好了。蒋介石是同英美合作的，绝对不能同日本合作。如果满洲国能够消灭蒋介石的势力，实行日、满经济合作，这是与日、满都有利益，日本当然赞成的。如果有必要，你还可以向关东军商量，把关东军动员一部分加入满洲国的军队内共同去作战。再训练军队时，也可以大部分利用关东军的将校作

教官，那就快得多了。熙洽说这是当然的，我也这样打算。熙洽又接着说，如果将来我的计划，日本当局能采纳时，希望阁下在军事会议上予以支持和援助。槙崎说，那是自然的，我祝你的计划成功。然后又问熙洽在东京住多少日子，几时离东京，还到何处旅行的杂谈。熙洽遂即叫我把带来的礼物，王石谷山水画一张送给槙崎，槙崎推辞不受。熙洽说这是作为会见的纪念，无论如何，也得收下。槙崎遂即接下，并令他的侄孙女当时挂在墙上。熙洽遂告辞，仍由槙崎送到屋外，等我们上车，方始回去。我们于11时回到旅馆。午餐时，熙洽的表情，不象昨天那样不高兴了。

4月10日去拜访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10时半到他的公馆。当由秘书官让到宅后一间布置极为精致的日本式书斋中，这间书斋面对庭后的花园，三面为整个玻璃窗，时值早春，花园中盛开各种花卉。有白色的玉兰及粉红的杜鹃，还有各种兰草。所谓日本有名的樱花，还含苞未放。中间有一活水池，周围陈列很多的奇石。室内陈设亦极为雅致。陈列的古董书画，大部分为中国的物品。在一个古董架上，陈列一个均窑宋瓷古瓶，一个青花大瓷盘极为美观，这两件物品，在中国亦属罕见之物。秘书献茶后，约三四分钟，近卫着纯日本式服装，方始由室外的走廊进入书斋，向熙洽寒暄后，分宾主坐定。先由近卫说阁下连日作各种公事访问，一定很累了吧，还在百忙中到我这里访问，实在太客气了。熙洽说对于满洲国这次改称帝国，公爵一定有很多的支持援助的地方，我代表我们皇帝陛下向公爵表示谢意。从此我们两国的关系特别是两皇族的关系，当然日益密切；如同兄弟手足一样。我久仰公爵阁下是日本国家的重臣、政治的中心人物，所以特地来拜访，表示敬意。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公爵请教，不知道公爵有没有时间。近卫说，今

天院里休会，我正在休息，有事尽管慢慢地谈，我有充分的时间奉陪，请不要客气。近卫说，听说阁下是满洲国皇帝陛下的直系家族吗。熙洽说是直系家族，不过年代已经很远了。熙洽接着向公爵说，因为我有一个计划是今后满洲国的发展问题。遂将以前向斋藤、槙崎二人所谈的事情，又重述一遍，说这是我个人的计划，不知公爵以为如何，倘蒙赞同，就希望将来在贵院会议中，予以援助支持。近卫听完熙洽这个谈话以后，态度很从容不迫地说，对于满洲国的将来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在今天日本的立场来说，是有种种问题的，关于满洲国的成立，由于国际联盟李顿的调查报告，欧洲各国多认为日本是侵略中国的东三省，不承认日本是援助东三省民众脱离张作霖父子的暴政而独立自治。现在各国的印象还大部分没有转变，假设日本再援助满洲国训练军队，供给武器，那就有可能引起新的风波，于日本更不利。日本已经脱离国联，并不是怕英美的干涉，但是如能避免，又何必惹他们狂吠呢。所以象阁下这种计划，还是缓一缓再行提出，较为适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只能作为参考。熙洽说，我是军人出身，对于外交及国际局势，知道的很少，公爵对于国际情势，了如指掌，所见当然是对的，只得候候国际局势转变再说了。二人又谈了一些闲话。熙洽遂叫我把送给近卫的礼品拿出来，系羊脂玉巧做香炉一个，高约九寸，刻的是仿周铜饕餮信。炉盖与炉身由一尺多长的玉石练相联，都是由一块玉石雕刻的，非常精致美观。呈给近卫公爵作为纪念，近卫当时极为推让，说我不敢受这种重礼，再三谦让之后，方才收下。熙洽说，以后俟机会成熟时，我再给公爵来信，请公爵不客气地指教为盼。近卫说一定不客气地陈述我个人的见解，然而是否正确可不一定，只作阁下的参考好了。熙洽遂起身告辞，近卫只送到玄关，遂即止步。便由

秘书送我们到门前上车。

4月11日午后4时，拜访“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这时本庄繁大将担任日本国际红十字会总裁，已经离了军职。他住在东京郊区，自己新建的住宅，系一日本式的房屋，内部客厅、饭厅系西洋式，规模很小，家内并无佣人，由他的太太和女儿出来招待客人，看样子生活非常朴素。因为他和熙洽在满洲国时非常的熟，可以说是老朋友，所以见面后并没有什么客气，即叙些别后的情形。由本庄繁问熙洽说，连日忙于拜访应酬，累不累，打算什么时候离东京，还到什么地方去参观。熙洽说最近接到满洲国财政部的来信，说有许多紧要的事情，待我回去处理，打算再住上三二日即行回满洲国。当时由本庄的女儿送上茶点，本庄大将让茶后，熙洽遂说，我这次来日本，原打算借机会向日本政府当局商量一件事情，所以才多住几天，向各方面接洽接洽。遂将他的大清国复辟计划又重叙一遍。又说这是我个人计划，不知阁下以为我这计划怎样。本庄说，我现在已经脱离军职，对于军事，已不过问。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所以只好谈一谈我个人的见解和我所知道的事情，以供阁下参考。日本因为“九·一八”事变问题，与英美及欧洲各国的关系，近来均不十分融洽，所以日本对于满洲国的问题，暂时尽力避免深入，以免刺激他们的神经。阁下也知道日本现在与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进行三国联盟的交涉，如果成功，那么日本对欧洲外交问题，即占主要地位，对于阁下所提出的计划，自然一时无暇顾及了。所以这时对于阁下这种计划，暂时不能不缓一缓再研究。还有一个最重要问题，就是日本援助满洲民族不堪张作霖父子的虐政，谋求独立自治，并不是援助满清复辟，这一点尤应注意。我在满洲的时候，对于这一层也曾和阁下谈过数次，满洲国就是满洲国。人民的内政采取什么样

的政体，也是随满洲人民的大多数自愿。若说是大清复辟的问题，那又错了。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所以不客气地说出来，作为阁下的参考。熙洽说，阁下这番话太使我感激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以为日本既然援助满洲国改称帝制，那就是默认大清国复辟。所以才这样来和日本当局商谈，现在我知道了，日本回避的是大清复辟这个名词。本庄说，以后阁下认清满洲国是满洲国，不是大清复辟这一根本问题，则一切问题都好办了。溥仪既然作了满洲国的皇帝，是不是清朝复辟，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熙洽叫我将带来的礼物拿出来，系明朝戴克昌的山水，还有一个周铜觯。熙洽说，这是我送给阁下的一点薄礼，不成恭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我来的仓促，只将我旧有的东西带来两样，送给阁下作纪念，请不要客气，收下好了。本庄并没推辞，当即收下。当时并留熙洽在他家吃晚饭。熙洽说，谢谢阁下的盛情。我晚上已经有了约会，下次再领吧。本庄说，如果有约会，那是不能勉强的，下次来日本，一定要预先留出时间，我请阁下尝一尝日本的家庭料理的风味。熙洽当即起身告辞，本庄说，因为阁下太忙，我也不回拜了，请您恕罪。我们遂即起身，他太太、小姐都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相送。我们于6时回到旅馆。

这天晚饭后，熙洽对我说，我在这几天的访问中，已经看出日本方面的态度。对于我的计划是不能立刻就答应的。再见谁也是一样，我打算对于其他的人不见了。我们过一两天，就起身回满洲国。我说，大臣对于其他的约会、见面的人，不见也行，就得推说满洲国有事，部里来电报催促大臣立刻回国，我得替大臣到处辞退以前的约会。就那么不辞而别，未免太失礼了。尤其是中间有赵欣伯的介绍接洽，如果就那么走了，对赵欣伯的面子也不好看。熙洽说也好，那么你就从明天起，到各

处去辞退约会，我们带来的礼品，可以拿着预定的物品，送给他们。我们不必带回去了。再到广岛给小矶师团长的礼物和到朝鲜宇垣总督的东西，要留好一些的。我说，那么我就从明天午后去办，大约有三个半天就可以走完了。但是后天预定拜访的高桥是清大藏大臣以及芳泽公使招待宴，还是按预定前往，后天休息一天，整整行装，15日即起身离东京到京都。熙洽说好，就这样办。

4月20日早晨9时，小矶师团长派副官到旅馆，陪同我们到市外广岛湾。湾口内即岩岛神社。熙洽及小矶师团长单预备一个小浴池。熙洽入浴后，即同小矶在临窗处找一比较清静的地方，开始和小矶谈话。除了谈一些别后的事情，熙洽又将他的复辟计划详细说了一遍。小矶说，将来一定有机会可以实现阁下的计划。这种百年大计，岂在一朝一夕就能实现，就看将来国内国际的局势转变如何而定。将来我到东京时，我再询问有关方面。日本政府将来的方针，是否有可能转换，那时我再给阁下去信，告知一切。

4月21日午前11时乘大阪来的快车赴下关。晚9时开船，翌晨5时许即到朝鲜釜山港。到旅馆后约一小时半，即带着送给宇垣总督的礼物到朝鲜总督府去拜访。带来的礼物拿出来送给宇垣，是碧玉雕的炉瓶三设，为一个香炉两个花瓶，雕工极细，玉质颜色均好。宇垣说，阁下送给我这样好的贵重物品，实在不敢受。推辞再三，方才收下。熙洽说，我这次访日，除了访问日本皇室，还利用时间，作了许多私人的访问。因为我有一个计划，遂又将以上复辟的计划说了一遍。待熙洽说完，宇垣说，阁下这个计划太伟大了。熙洽说，可是所得的结果恰恰同我的预期相反，斋藤实总理大臣和近卫贵族院长都认为这种计划为期尚早，现在还谈不到，必须候一候。满洲国治安恢复，国

际局势好转，才能考虑这些问题。宇垣说，斋藤这些人，都对外国人怕得很。现在日本因为满洲问题，脱离了国际联盟，英、美、法这些国家，对日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在下月初到东京去办事，那时候我和他们这些人谈谈，对于阁下的计划，究竟有什么不同意的理由，待回朝鲜后，将我所得的结果，写信告知阁下。熙洽说，那太好了，我候着阁下的信。熙洽起身告辞。

熙洽由日本回来后，对于一切日本人的态度都非常冷淡，不象以前对于日本人要人那样尽力拉拢。对于伪满的一切事情，亦表示消极，特别与吉林省的特务机关长中野英光中佐的感情非常不好。中野英光对我说过两次熙洽瞧不起他。待到1934年12月，满洲国政府改组，熙洽被调任为宫内府大臣。兼任的吉林省长亦被免职，由李铭书任吉林省长。从此以后，熙洽所谓实权一点皆无。到1937年后，溥仪竟在伪皇宫内建筑神庙，迎接日本天照大神为他祖先，对日本昭和称儿皇帝。这时伪满洲国上自溥仪起下至宫内大臣熙洽以及陈宝琛、胡嗣瑷等元老重臣，对大清国的复辟梦，才都被这些事实惊醒，而死心塌地地作日本的傀儡。

“满洲国”和关东军的关系

古海忠之

编者按：作者在文中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也涉及到关东军操纵伪满政权、殖民统治东北的一些事实，故摘选以供参考。

本庄·溥仪秘密协定

满洲国成立后，曾任关东州厅高级官吏的阪谷希一就任财政部总务司长，处理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重大问题。同时，满洲国根据阪谷的建议招聘了我等一行大藏省官吏。当我们到任后，星野直树接替了财政部总务司长职务，阪谷希一调任总务厅次长。我个人由于上述原因，从财政部文书科长改任总务厅主计处总务科长，作为阪谷希一次长的部下，曾受到他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身为满洲国官吏的我，迫切需要了解的就是关于满洲国的国情，尤其是满洲国同关东军的关系问题。我在大藏省时，便听到传闻说，满洲国完全被关东军所控制，是根据关东军的命令而运行的。所以，当我们决定来满洲时，连大藏省也曾向陆军省次官提出要求："希望将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事情完全交给我们，请关东军不要横加干涉。"

阪谷次长毕竟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关东军同满洲国的关系，那就是关于本庄·溥仪秘密协定，以及关东军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权问题。

关东军常驻满洲国，而且拥有根据上述协定确定的权限和内部指导权。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失败后，战胜国和部分日本人认为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产物。而上述关东军的存在便成为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和条件。以下仅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

满洲事变后，关东军基本上控制了南满，同时，又以武力或怀柔政策使各地方军阀臣服关东军，最后终于攻克张学良占据的锦州，从而称霸全满。

今后将采取何种形态统治满洲，从国内外和当地的关系而

言，确是一个严重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关东军在征求并分析当地文武要人、日本方面各机关团体等各部门的意见的同时，找出各方面意见的共同点，最后决定成立以五族协和（后改为民族协和）和王道主义（民本主义）为宗旨的道义国家满洲国，并付诸行动。通过关东军巨大的努力和支援，满洲国终于于昭和7年3月1日诞生了。

关东军在建设满洲国时，需要突出考虑的重大问题就是国防。位于中苏边境的满洲国，为了确保其独立，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只能由日本军（关东军）担任国防。以于冲汉为首的当地领导者也都一致提出这一要求。所以，关东军还必须同时完成日本国军的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新国家不应该是象张学良政权那样的践踏日本权益采取反日行动的政权，尊重日本权益，永远同日本友好相处，采取同一方针，乃是绝对必要的。作为关东军（日本），认为不能不在这方面获得某种保障，其具体体现就是本庄·溥仪协定的缔结和对满洲国内部指导权的规定。

满洲建国后不久的3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同满洲国执政溥仪和国务总理郑孝胥之间缔结了下述协定，被称之为本庄·溥仪秘密协定。其内容有：

（一）　满洲国将国防及治安维持任务委托给日本，其所需经费由满洲国负担。

（二）　日本军将国防所需已有铁路、港口、航线、空运的管理和铁路的铺设，委托给日本或日本指定之机关。

（三）　满洲国对日本军所需之各种设施，积极提供援助。

（四）　在满洲国参议府参议（3名）和各地方机关中任用日本人，其选任委托关东军司令官推荐。

根据上述协定，决定日本国军（关东军）驻屯满洲国。关

于这一问题，于同年9月15日，通过随着日本决定承认满洲国而缔结的日满议定书，再次予以确认。日满议定书在其序言中指出其目的在于“永远加强日满两国间的睦邻关系，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确保东洋之和平”。其内容有简单的两条：

（一） 满洲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国或日本臣民历来根据日中间签署的条约、协定和其他缔约以及公私合同等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

（二） 日满两国约定，当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和治安受到威胁时，共同担任国家的防卫任务。为此，在满洲国驻屯必要的日本军。

在本庄·溥仪协定的第一项中规定的“满洲国将国防及治安维持任务委托给日本”，在议定书中改为“共同防卫”。

满洲国既然是独立国家，并拥有国军，则进行共同防卫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关东军却认为不能因此而受到束缚。于是，在签定日满议定书的同时，又由日满两国的军事协定委员缔结并签署了日满守势军事协定。

其内容有：

（一） 日满两国……当受到第三国侵略时，两国国军在日本国军司令官的统一指挥下行动。

（二） 日本国军在满洲国领域内，享有军事行动上的必要自由和保障，以及与之相关的便利。

此后，在满洲国军政部内设顾问部，派来直属关东军司令部的将官及大批军官，用以统制满洲国军。

关东军对于本庄·溥仪协定也作了周密的考虑。在日满议定书签署当天，郑国务总理会见了武藤全权大使，并提出照会。照会指出：满洲国对于关东军司令官同满洲国执政及国务总理间已经交换并缔结的文件及协定，均予以承认，并使之继续生

效。同一天武藤全权大使送来回信。结果，本庄·溥仪协定作为日满议定书的附件，获得与正式条约同等的效力。

由此可见，在缔结日满议定书的同时，采取上述措施，完全确保本庄·溥仪秘密协定的效力。这样，关东军不仅负责满洲国的国防与治安，而且，作为日本国军，还获得了可以自由地任意行动的权力。

根据该协定第一项规定，日本军为满洲国国防及治安维持所需经费由满洲国负担。关于这一问题，在我制定满洲国预算时，就满洲国应负担的关东军经费的核算方法及支付等，有必要签署协定，曾同关东军第三课多次交涉，作出如下决定：即以从各年度一般会计总预算额中扣除国债等债务总额后所余金额的1%，作为上述关东军“所需经费”，并将其全部缴纳给日本政府，支付日期定为该年度决算终了时。

然而，于昭和8年（1933年）在日本国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日本政府决定不接受此项经费，所谓的所需经费完全没有支付的必要，关东军经费全部由日本政府支付。这项关东军经费，对于痛感日元资金不足的满洲国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

其次，根据第二项规定，铁路、港口及航路的经营及铁路的铺设，全部委托给南满洲铁道会社；航空事业由满洲航空会社；电信及电话事业交日满条约法人的满洲电信电话会社管理和经营。同时，对于上述会社的监督权，同军事上必要的命令一样，均属于关东军司令官。因此，满洲国对上述会社没有监督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只能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请求和委托。

第三项规定的宗旨，通过与日满议定书同时缔结的日满守势军事协定进一步明确，规定“日本国军享受军事行动上必要的自由和保障，以及与之相关的便利”。

这一规定，对于日本国军的行动而言是绝对必要的。日本

陆军的假想敌国是苏联，因此关东军的行动就是针对苏联，关东军的部队基本上是沿着满苏国境驻扎的。要求满洲国协助为这些关东军解决设施问题，其对象主要是建筑工程用地和其他土地。而提供人口密度小的国境一带的土地，对于满洲国来说，并算不了是什么负担。

第四项是关于关东军司令官获得对日本人官吏的任免权问题，通过这一规定关东军策划并实施了对日本人官吏的统制。

关东军司令官的内部指导权

关东军司令官拥有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权，控制这一内部指导权，是关东军设计的一种保障制度，目的在于使在关东军巨大支援下诞生的新生满洲国，尊重有关满蒙问题的已有条约和日本的各种权益，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其将来采取排日甚至反日的态度和行动。

内部指导在实质上同根据本庄·溥仪协定第四项规定的由关东军掌握日籍官吏任免权，以及主持满洲国国家机构中的政治和行政的国务院组织具有重大的关系。关东军在听取当地及日本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决定成立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独立国家作为统治满洲的形态，并立即在关东军司令部内新设统治部，任命驹井德三顾问为部长，部员全部是文官，负责关东军临时的行动善后处理。同时，研究制定有关行政、财政、产业、交通等各个领域的新国家的组织及重要法令，以促进建国准备工作的开展。因而，满洲国的国家机构，甚至连具有独特性的国务院组织也都是秉承关东军的意旨，由统治部研究确定的。

国务院的首席人物是国务总理，各部（日本的各省）设总长（后改为大臣）。对满洲国的元首，即执政负有辅佐责任的所

谓国务大臣只限于国务总理一人，各部总长是主持各分管事务的行政长官(事务大臣)。国务总理辅佐执政指挥监督各部总长，负责掌管国家行政机要事务，可以根据其职权发布院令。同时，国务总理是各部总长的上级长官，拥有在必要时可以停止或撤消各部总长的命令或处分的权限。此外，国务院还设总务厅，用以裁决并处理国务院内有关机密、人事、财务及庶务等事项。总务厅具有国务院总理幕僚的性质，国务总理在总务长官的辅佐下，通过总务厅处理各部由总理统辖的事务，这是一个用心良苦而成立的机构，采用了所谓的总务厅中心主义。

后来，总务厅的行政统辖事务逐渐增加，除机密、人事、财务、庶务之外，还遍及法制、宣传、计划、地方和统计等。各部在实施其主管行政时，如果不到总务厅就必要事项进行交涉，获得批准，则将一事无成。因此，国务总理——实际上是总务长官，其权限庞大无边，俨然是满洲国的最高领导人。

不仅作为总务厅最高负责人的总务长官，规定必须由日籍官吏担任，包括总务厅次长以及各处处长（局长）的位置也全部被日籍官吏所占据，日满人官吏的比例为7：3，总务厅实质上是一个以日籍官吏为核心组成的机构。

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为了行使对满洲国的幕后指导权，在司令部内新设第三课（后为第四课）作为主管课，满洲国方面与之相对口的机构只有总务厅。

根据满洲国组织法，有关法律、法令、命令、条约、预决算、高级官吏的任免以及其他重大国务，必须全部经国务院会议（相当于日本的阁议）审议批准。国务院会议由国务总理主持，以各部总长、总务长官等组成，除总务长官外，全部都是满籍领导人。

在国务院会议上通过的议案，经执政的咨询机关参议府讨

论后，由执政裁可公布。

最初，关东军准备在参议中安插日本人，通过日籍参议行使日本对满洲国国政的指导。本庄·溥仪协定的第四条规定，关东军司令官以其所拥有的推荐权任用3名日本人官吏为参议。

然而，仅以数名参议的力量是无法左右国政的，何况日本要对国务院行使其指导权，就会议的组成和满洲国的性质而言，更是不可能的。关东军经过深思熟虑，作为内部指导满洲国的手段，决定成立一个可望获得充分效果的行政组织。其根据就是国务总理的特殊地位及其绝大的权限，这一主持国务总理亲自处理的重要行政事务的机关，就是由日籍官吏完全控制实权的总务厅。

如上所述，政府各部为了执行其主管的行政业务，必须经总务厅就必要事项进行审议和决定。因此，只要同总务厅保持内部联系，关东军就可以控制满洲国的国策和行政的全貌，充分发挥内部指导的效果。

关于上述关东军司令官的满洲国内部指导权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满洲国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协定。有人认为可以从本庄·溥仪协定中寻求根据，但是在该协定中也没有此类规定。关东军可能认为自己始终处于内部指导的地位，对方是以日籍官吏为中心的总务厅，因此，没有必要再特别求得满洲国的承认，而自行作出这一决定的。

驹井德三曾就任满洲国第一任总务长官，他作为关东军的统治部长建立了满洲国的政府组织，特别是国务总理和总务长官的特殊形态，而且清楚地了解关东军内部指导的作法。关于关东军和总务厅的关系，无疑达成了充分的谅解乃至承诺，内部指导得以顺利实施。

上述关东军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权，是为了制止在关东军

的巨大援助下成立，并同日本拥有不可分关系的满洲国，向不利于日本、或排日反日的方向发展而采取的措施。从其后实践的过程而言，也不能认为这一制度是关东军为了谋求日本的利益，企图积极干预满洲国的政治和行政而制定的。

建国初期，每当有需要关东军同满洲国之间进行联系的事情时，总务长官或次长去司令部，或者关东军的板垣参谋等来总务厅，同长官或次长进行磋商。然而，昭和7年、昭和8年，随着陆军的大调动，以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领导人全部调离，武藤信义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任参谋长，在司令部内又恢复了第三课，由原田熊吉大佐任课长，在其领导下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陆军参谋，如沼田多稼藏、盐泽清宣、岩畔豪雄等。此后，凡属满洲国的政治、行政方面的重大事项，以及日籍官吏的采用等，均由总务厅同第三课联系，求得关东军的同意。

然而，最初的作法很简单，关东军听取总务厅的说明后，表示同意就可以了。但是，随着满洲国各项制度的日趋健全，它逐渐变成十分繁琐的事务性的手续。后来，逐件事项都需由总务厅向第三课提出报告，经第三课审查后再以关东军参谋长的名义发来表示同意的文件，指出："对某某事项表示同意，特此奉命通知"否则，总务厅就不能将重要事项提交国务院会议进行处理。

通过上述作法，关东军可以掌握满洲国的重要国务及行政。而当关东军方面对满洲国有要求事项时，也要采取首先向总务厅提出，经总务厅研究后实施，但仍需向第三课提出报告，请求同意。总之，可以说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指导始终是在内部进行。

如上所述，根据满洲国组织法在决定有关国务、行政的重

大事项时，须按下列程序进行。首先将议案提交国务院会议，经审议通过后，再由执政（皇帝）的咨询机关参议府批准，最后经执政裁可决定，予以公布。因此，经总务厅整理、关东军同意的议案，并不一定按原案决定，实际上，也有由国务院会议作出部分修订或保留的议案；也有参议府提出某些条件或作出附带决议的议案。我认为，这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对满洲国内部指导权的实质，也是其微妙之所在。

直接参与关东军对满洲国内部指导的有关人员，只限于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三（后改为第四）课课长及第三课所属参谋，与其他部、课员全然无关。同时，关东军首脑绝对不同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大臣）、参议等满洲人首脑面谈交涉，而是交由总务长官、次长、各处处长进行。此外，驻满洲国的关东军部队虽然大批增加，但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严格的禁令，严禁各部队对地方机关采取内部指导行动。因此，基本上未曾发生过任何纠纷，收到了军民融合的效果，是值得赞赏的。

关东军与日籍官吏

关东军司令官根据本庄·溥仪协定获得了在满洲国任用日本人官吏时的推荐权，关东军将这一推荐权解释为任免权。关东军司令部第三课（后为第四课）具体负责任用日本人官吏，直至满洲国中期，包括委任官（判任官）的采用都需经关东军同意，总务厅人事处在同关东军交涉过程中曾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满洲建国当时，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官深入地考虑了满洲国的国情，确定了除任用少数日本人为高级官吏外，日常政务以满籍官吏为主体执行的根本方针。石原莞尔参谋也积极支持这一方针，他曾指示，在建国当时满洲国中央政府600 名官吏编制

中，日籍官吏不超过20%，即120人。同时，作为防止日籍官吏编制扩大和作风专横的措施，还确定了满洲国政府各机关、部局的日满官吏比例，并规定每个职位的日满定位，作为满洲国人事的重要原则，关东军拥有这一制度的决定权。

在执行上述有关人事的重大方针和两项制度方面，总务厅理所当然地是一个例外。总务厅是作为关东军实行内部指导的对口部局，根据由日籍官吏运营的宗旨而设立的满洲国的一个独特机关，就其性质而言，总务厅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此，在定位方面，以最高的总务长官为首，次长、各处处长（相当于日本的局长）以及科长等，全部由日籍官吏来担任，日满比例为日籍70%，满籍占30%。

各部（即相当日本政府的省）的日满官吏比例也是十分严格的，很难找到适当的满洲官吏的各部，如财政部和实业部，日满官吏各占50%。其次是司法部，日籍官吏占40%，满籍官吏为60%（满洲国进入建设时期后，上述各部的日满官吏比例均调整为6：4)。其他民政部、外交部、文教部、军政部的日籍官吏占30%，满籍官吏占70%。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也均以此为准进行配备。

地方机关、省公署、税务监督署等日籍官吏占20%，满籍官吏占80%。至于县公署、税捐局等基层地方机关，绝大部分是满籍官吏，日籍官吏只有极少的几个人。

就日满定位而言，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大臣）自不待言，包括监察院长、立法院长、最高法院院长、参议、省长等特任官（日本的亲任官）基本上都由满洲人担任，日籍的特任官只有总务长官和3名参议。简任官（日本的敕任官），也同样如此，最初，除总务厅外，只有少数日籍官吏。各部的各司司长（日本的局长）中，除总务司长规定由日籍官吏担任外，其他司长

初期也基本上是满籍官吏。

关东军对于行政各部也企图如同对总务厅一样贯彻关东军的意图，为此，各部的总务司主管并具体负责机要、人事、会计、文书等工作，相当于各部内的总务厅。各部在执行其主管行政工作时，必须同总务司磋商，征得其同意，方能制定方案。这样，只要总务司控制在日籍官吏手中，就可以对该部行政工作的动向和实际情况了如指掌，进而予以指导。为此，总务司的司长和科长应由日籍官吏担任，其他各司司长及科长尽可能任用满籍官吏，日籍官吏仅限于极少数人。这就是关东军的设想。

基于上述设想，荐任官（日本的奏任官）同样除各部总务司的科长外，大部分科长也由满籍官吏担任。

此外，地方各省的省长规定由满籍官吏担任，其下属的总务厅厅长必须任用日籍官吏，这也同样是基于上述理由。

地方行政机关也同中央一样，税务监督署署长、地方专卖署署长、县长等，其正职为满籍官吏，副职则任用日籍官吏。

上述人事方面的双重体制，正是满洲国统治的根本方针。

关东军之所以确定上述人事原则，存在于总务厅等部门的潜在目的又当别论，可以看出，它是关东军为了尊重民族协和的国情，贯彻尽可能安排少量日籍官吏这一根本方针而作出的一种尝试。

然而，为了将满洲国建成现代化的理想国家，虽然政府的最高职位以双重组织为宜,但却无法坚持这一人事方面的原则。满洲国的治安基本平定，国家基础也逐步稳固，即将进入建设时期。自昭和11年（1936年）开始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为中心，各部门为实现现代化而采取各种措施。遗憾的是，中国，尤其是满洲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体制下，拥有现代行政知识和经

验的人才奇缺，不得不采用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日籍官吏。结果，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最初制定的日满比例和日满定位也不能不加以修改。

关于满洲国的人事和行政，日籍官吏自不待言，包括满籍的主要人事安排也必须一一征得关东军的同意，当时在日满比例和日满定位方面不断地出现问题，总务厅人事处为了说服关东军第三课的人事部门曾经大伤脑筋。

以下拟就关东军对满洲国进行内部指导的实际情况略加探讨。

关于其实际情况和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满洲国的政治和行政，关东军司令部首脑同其对方，即满洲国日籍官吏首脑（主要是总务厅）之间取得的一致意见，或双方同意的事项。

关东军首脑自本庄司令官、板垣、石原参谋时期以来，尽管根据所处时代而程度不同，但都是一贯尊重满洲国的独立，对建国原则、理想，有明确的认识，除纯国防性的问题外，经常在充分理解满洲国当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态度。

另一方面，满洲国的日籍官吏不论其出身与经历如何，都能专心致志地为实现建国理想而奋斗。如上所述，他们不计名利，坦率而热情，彼此之间拥有同志意识，形成了高尚的为官之道，并在这一气氛中努力工作。他们对上司也能毫无畏惧地阐述自己的意见，甚至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过后又毫无介蒂。如果有人谄媚骄傲专横的上司，他必将立即遭到鄙视乃至排挤，甚至由此产生风波。这样，为实现满洲建国精神而作出的努力成为一种媒介，使同志意识在官吏中日益发扬光大，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事隔30年，这一意识仍然记忆犹新。

日籍官吏对于掌握日籍官吏任免权，行使内部指导权的关

东军，其态度也莫不如此。没有人低声下气向关东军当面奉承讨好，经常敢于仗义直言，以期满洲国的政治、行政工作能准确无误地实施。在有些问题上，同第四课的参谋们展开激烈争论，经过反复争辩，最后满洲国的意见得以通过，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从上述过程看来，关东军行使内部指导权也可以说是就满洲国的重要政务和行政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们同满洲同日籍官吏首脑提供了审议和讨论的场所，以及判断议案正确与否的良好机会。

因此，关东军对满洲国进行内部指导的实质，就是关东军同满洲国日籍官吏首脑双方经过磋商，并取得一致意见，从而对满洲国进行扶持的一种措施。另一方面，也应该看作是满洲国不断地同日本之间协调融合，借以防止出现反日、排日行动的一种手段。应该指出，认为关东军利用这一权限为谋求日本国家的利益而向满洲国政府施加压力；是日本侵略满洲国的工具，这一认识是违背客观事实，是根本错误的。

以上仅就关东军对满洲国内部指导的实质略抒已见。与之相关联，也曾发生过由于没有关东军的内部指导，对满洲国的行政工作独断专行，从而引起严重问题，最后陷入困境的事件，那就是日本向满洲移民问题，略述如下，仅供参考。

日本人武装移民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的移民论者立即掀起了向满洲输送移民的运动，其中加藤完治、那须皓、桥本传右卫门等主张立即向满洲移民的人们，开始直接同关东军进行交涉，得到东宫铁男等关东军内赞成移民者的支持，终于获得关东军的同意。

昭和8年（1933年）日本人武装移民团迁入北满的佳木斯

近郊，第一、第二以至第三批武装移民团所使用的土地，都是关东军通过劝业公司亲手收买的。包括大面积的已开垦土地是按低于当时价格十分之一的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的。结果，导致 3000 农民拥戴土龙山村长、在当地有威望的谢文东为首领掀起暴动，这就是土龙山事件，佳木斯的第六十三联队长一行在镇压暴动中全部战死。

关于此次日本人武装移民团迁入满洲一事，未同满洲国政府进行任何联系和交涉。而且，当关东军开始征购大面积移民用地，当地农民出现动摇时，有关各县的参事官（日本人官吏，县长的助手）一致反对，认为是背离民族协和精神的行为，请求关东军审慎处理，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未被关东军所采纳，结果明石胜利等七名参事官感到对其后果无法负责，遂提出辞呈，离职而去。明石等参事官几乎都是大同学院的毕业生，由此也可见满洲国官吏风格之一斑。

关于导致土龙山事件爆发的农地收购问题，最后关东军总算认识到解决事态的必要性。关东军从土地收买工作中退出，交满洲国处理善后。满洲国确定适当的人选，动员主管此项工作的吉林省官吏，满怀诚意地同当地农民协商，同意提高土地价格，最后博得当地农民的谅解和感谢，一切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由于此次事件的发生，开拓（移民）政策原则上由满洲国执行，日本人和当地居民的开拓事业基本上得以顺利开展。

其后，根据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强烈主张，开拓用地原则上以未利用的土地为主，确定除非万不得已，不收购熟地的方针。

关东军在日本人武装移民团迁入满洲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正是超出其使命的越权行为；是不认识、不尊重满洲国独立和建国理想而导致的结果。

曾经参与策划成立满洲国，并竭尽全力给予极大支援的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三宅参谋长、板垣、石原、竹下、片仓参谋等，他们尊重满洲国的立场和国情，避免关东军和日本的权力行使表面化，对于满洲国从未超出内部指导的范围。问题发生时上述人员已经换代，那已是武藤司令官、小矶参谋长和新参谋的时代了。或许在两代之间对于满洲国的认识存在差距也未可知。

然而，除国防及治安问题外，在满洲国的内政问题上，关东军直接插手的事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换言之，满洲国的政治和行政虽然一切都受关东军的内部指导，但都是由满洲国政府制定方案，作出决定的。

对满洲国拥有内部指导权的关东军司令官，逐渐发展为兼有管理驻满日本各机关的权限，不久，就占有了日本在满洲的唯一代表的地位。

建国当时，日本的驻满机关代表是关东军司令官、满铁总裁、总领事和关东长官，即所谓的四头政治。顾名思义，它在对满政策上必然缺乏统一性。根据昭和7年7月的阁议决定，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和关东长官，采取所谓三位一体制。然而，由于日本中央机关的指挥系统和基层机构的不一致，仍然不断发生纠纷。为此，于昭和9年，在驻满全权大使之下，作为接受外务大臣指挥命令的事务机构，设大使馆参事官，同时废除了关东长官。为了赋与关东军司令官以行政监督权，又在其领导下，设接受内阁总理大臣命令与监督的办事机构，即行政事务总长（关东局总长）。这样，关东军司令官便成为名副其实的驻满日本机构的一元化实权者。

藉此机会，日本在内阁中新设对满事务局、陆军大臣兼任总裁，主持有关保持日本对满洲行政事务统一的业务。

如上所述，关东军不仅对满洲国拥有内部指导权，而且还控制了日本在满洲的行政权，从而获得了日本在满洲唯一代表的地位和权限。

满洲国政府同尊重建国理想和独立性，而又精通满洲情况的关东军，就日满两国间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在达成一致意见后，再与关东军共同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这样，在争取日本的援助方面，满洲国可以得到许多方便。

实际上，关东军乃至日本政府，一向尊重满洲国的独立，为了满洲国，不惜提供力所能及的积极援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收买构成满洲国独立最大障碍的北满铁路和撤消日本的治外法权，以及返还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

伪总务厅——伪满政权的中枢

谷香圃

长春市解放（伪兴仁）大路矗立着煊赫巍峨，堂构辉宏，具有现代装设的巨厦，这座日本殖民者妄图百世，侵略东北14年的中心建筑物，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所在。归复人民手里以后，用作民之福星，保健育材，医科最高学府，白求恩医科大学（原军医大学）校部教研楼。

伪总务厅乃伪国务院军事、经济、兴农、交通、民生、司法、外务等各伪部局的总枢；为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前星野直树）、次长岸信介、谷次亨等日寇巨奸所在。伪满初期，驹井德三、远藤柳作先后派来任职厅长，1939年（应为1937年），星野直树由伪经济部总务司长升转总务厅称

“长官”，直到武部任内崩溃。改称总务长官的用意在于名位，可以并肩同伪国务总理大臣出席“国务院会议”。这个厅的机构组织，形式庞大，表面上“法定”该厅承总理大臣之命，办理政府内机密、法制、人事、主计、需用、情报等事务，实际完全由伪总务长官掌握，事无巨细都须与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联系，所谓“军部、政府”二位一体。伪总务厅置总理大臣官房和人事、企划、弘报、法制、地方、统计、主计等处，各处设处长，除统计处处长为“满系”人员外，其余各处长都由“日系”人员担当。

官房（办公厅）：伪总理大臣直属秘书官室，有秘书官两名，日满各1名，“满系”王子衡，精通日语，光复后迁居北京；日系松木侠精通华语，以后松本益雄与王子衡共始终，一直是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入值时间的监视人。官房设文书、庶务两科，文书科在官房是首席科科长荒川秀次，直接为总务长官办事，有“官房长”意味；文书科掌握总务全厅机密文件和各伪部局来往文件总收发，工作非常繁杂；主编“满洲国政府公报”，日出一册，主编者乃伪事务官经家宝，由于是“日满文”合编，尚有徐姓嘱托（北京人）和日人小谷文吉协助，这是文书科经常主要事务。所有机密文件完全用日文，由日系事务官三谷文雄、清水××掌握办理，任何人不能近前。伪参议府议决“上奏文件”，由科内派人专职楷书缮清后，装入锦匣，由伪事务官范钦议（精于楷书现在宽城区某卫生所服务）送往宫内府，非常郑重其事。全厅各处日文文件全需要打字和原纸油印，日满系打字员40余人，地下室一角落为打字室，如同工厂，由日人领导，内外人不能随意出入。另外设资料室一所，内储多为汉文线装、辞类字典以及日文大玄海等，异常丰富，有许多工具书。笔者于1939年秋临时由伪产业部调到该科整编资料，1942年秋由

伪开拓总局调入该科任伪事务官，办理一般汉文文书兼管资料室。

人事处：处长源田松三，参事官王贤沣（金州人，原奉天省长王永江子）。该处在总务厅有权威与神秘之称，设有人事、福祉、考查三科，科长全为日人，凡荐任（即理事官）以上至简任伪官吏，统由人事科掌握它的迁转任免，福祉专司荐任职科长级以上，每年年中6月，年终12月“赏与”（奖金）并筹谋伪官们的衣、食、住、用。日方专设有官吏住宅，依级分配，国人方面则设备简陋；对日方设有生活必需品会社，国人方面则为官吏消费组合。总之，一切待遇，都有差别。

弘报处：对内对外广泛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情报，也宣传其中可以宣传的情报；每月编刊“宣抚月报”一厚册，直接发行。日伪新京放送局（地址在今吉林省广播电台）、伪满洲国通信社（很大的新闻采编发行机构，简称“国通”）、满洲映画协会（地址在今吉林省电影发行公司）、满洲新闻报社（日文）、大同报社（后改康德新闻），此外尚有丰乐剧场（今春城电影院）、帝都电影院（今人民电影院）、金城电影院（今儿童电影院）、银座映画馆（今长江路电影院），尚有其他剧场、影院等等，皆归其控制。处长武藤富男，设参事官一员，由伪民生部理事官王秉铎兼充，便于由文化教育方面佐助。另外设置了情报、宣传两科科长，皆由日系担任，未记其名。

地方处：掌握全满各省、市、县行政情况，县长、县事务官的升迁调转；地方财务收支预决算；负责日、满、鲜等青壮年的教育培养，如办各种训练所；每月编发汉文《地方行政月刊》一期，由各市、县供稿。处长菅太郎，设满系专任参事官一名李宝华，李留日出身，以后转升热河省伪民生厅长。又满

系理事官1名王富海，担当地方行政科长，以后升转长春县伪县长，直到光复国民党接收。地方人事、地方财务、地方教养各科长统由日员担任，另外尚有日系参事官10余名，皆各伪部有关理事官兼充。

主计处：分设3个科，一般会计科，特别会计科，司计科，处长饭泽重一，以后为古海忠之，置满系理事官1名，徐渐九担任一般会计科长（徐留日出身，原名徐鸿渐改名渐九，后转任铁岭市长），余两科长由日员理事官专任。该处不设参事官。

统计处：伪总务厅所设各处，只有此处处长为满系人员，由徐家桓充任（徐吉林人，留日出身，曾充吉林市筹务处处长），不设参事官，设理事官两名，分掌统计、统制两科，科长皆由日员担任，忘记其名，其统计事项，据不完全记忆，大致为下列各项：全满总务、行政、财政、军事、地理、外交、司法、警察、卫生、教育及宗教、社会事业、土木、农林牧畜、水产、工矿、商业、物价、通货（纸币）金融、交通通信（邮电）、贸易、度量衡等。统计处专设资料室，藏有充实丰富的古今中外图书。

企划处：处长神田某，不分科，设日系参事官10余名。

法制处：处长青木佐治彦，日本法学专家，该处亦不分科，设日系参事官10名，多为法界中的日本职员，伪满垮台前，设满系参事官1名，林喜泰充担。

关于伪满洲国初期的人事行政

王贤沣

我当伪国务院总务厅参事官时期，主要是参与人事处的事

务。后任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时期，人事处又在我的职务分担中，所以，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的人事行政上，和在人事的安排处理上，略知一二。

一、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初期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后，为了避免国际舆论，想把东北装饰成为东北人民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模样。因此，向外发表声明：伪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对于这样一个所谓独立国家的伪满洲国，要谁来执掌呢？这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军，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时，日本政府中有人提出这样一个意见，既然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成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就要由满洲人来掌握。至于伪政府的组织机关里，可以利用在满洲的旧官吏和亲日的满洲人当官吏。至于日本人，可以顾问的身份，参加到伪政府的组织机关里当参谋，人数也不要太多。这样，在国际上，可以说明日本是站在帮助指导的立场上。不过，在伪国家的财政经济方面，可以多用日本人，也可以用一种会社的形式，全部由日本人经营。

当时，日本关东军提出了另一种意见，要是根据满洲当地的情况，最好是日本人参加到政府的组织机关里，同满人一样的当官吏，日本人变成伪满洲国籍的日本人。仍就是独立国家的形式。并且认为，如果日本人以顾问的身份参加，那是一个闲职，没有实权，这个国家的施政，就将不可能在日本掌握下，实行日本所要实行的政策，日本的大陆政策，也难于顺利地实现，日本关东军的流血牺牲，就将毫无代价地付出。所以说日本人当这个新国家的官吏，是十分需要的和必须的。

同时，日本关东军还说明了它极力主张日本人当这新国家

的官吏的理由，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它用中国海关的事实情况，向日本政府作证明。它说：中国海关在世界上很有信用，但中国政府内部，贪污腐化，十分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在中国海关里，有英国人官吏参加，把握实权，打破了中国社会官场中种种恶习的原因。如果想要搞好这个新国家，必须象中国海关那样，日本人参加当官吏，也要象中国海关那样，由日本人官吏把握人事、会计、财政经济等实权，作为领导的榜样，新国家才能兴隆起来，才能达到日本所期望的目的。

最后，日本政府采纳了日本关东军的意见，决定在所成立的伪满洲国内，在人事安排上，采用日满两系官吏并用的方针。日本政府还重复地说，日本人官吏不要太多。

日本关东军根据决定，计划出伪满洲国的组织机构，决定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方针。在伪政府的中央机关里，多采用日系官吏，在伪政府的地方机关里，少采用日系官吏。同时，把斟选伪政府的人事问题，交给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少佐、日本关东军经济顾问驹井德三等，负专责办理。

这不用说，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就屈膝投降的于冲汉、袁金铠、臧式毅、丁鉴修、赵欣伯、冯涵清、熙洽、张燕卿、谢介石、金璧东、张景惠、马占山、张海鹏、溥仪、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宝熙等人，都在日本帝国主义预定利用之中。其余的民族败类，有的通过以上各汉奸之手，有的通过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等的推荐、保举，积极而努力地争夺一个汉奸地位。

如阮振铎通过伪奉天省公署顾问金井章次；王庆璋、鲍观澄通过奉天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金荣桂、李绍庚、

吕荣寰通过哈尔滨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小松原××；张海鹏通过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洮南满铁公所长河野××；阎传绂通过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河本××等等。

还有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为日军作走狗，诱降马占山的韩云阶、赵仲仁，拉拢蒙古王公投降日寇的邹麟，率日本军队进哈尔滨市的于琛澂……等等，都登上了傀儡舞台。

有些直接高攀不上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败类，则投奔巴结这些大汉奸的门路，借梯爬上去。当时出现了各个派别的活动，大汉奸们都想抓一部分人，作为自己的实力。

驹井德三，他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后，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工作多年。“九·一八”事变当时，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经济顾问。所以，在他组织下的伪政府日系官吏，除了从日本国内派出一部分日本政府现任官吏，当了伪政府官吏外，其余的日系伪官吏，多数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员，就近当了伪政府官吏。因此，以满铁老社员资格的驹井德三为首，结成了满铁派。这一派，直到伪满垮台前，在伪政府里，还有相当的势力，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部门，更为显著。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利用旧东北时代的官吏，当伪政府的官吏。其目的有二，因为伪政权初成立，除了伪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是新组织成的，其余的各伪机关，日本殖民者仍然暂时利用旧时的组织机构，凡是旧东北时代的官吏职员，只要不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继续留用，先把伪政府产生出来，解决当时的混乱时局。所以，各伪政府机关的首脑人事，一定要用满人充当，在外表上看，这个伪国家是东北人自己组织的国家，日本人作幕后操纵者，这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和驹井德三等人，所采取的人事方策。

二、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

日本殖民者在伪满洲国的组织机关里，采用了以汉奸作招牌的人事安排。在伪政权的中央机关里，多采用日本人官吏，在伪政权的地方机关里，少采用日本人官吏。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控制伪政权。伪中央政府，以伪国务院为最高决策统辖机关，其下有各伪部、局的设置，再其下有各伪省、市、县、旗的地方统辖机关。一切施政，由伪中央发号施令，各伪部、局和各伪省、市、县、旗，执行贯彻。这样，日寇还不放心，恐怕控制不了，又用集权制，以控制各伪机关的事务处理，以限制满系官吏的滥用职权，或是不服从伪中央的命令指挥。

从事实上看，在伪满最高决策统辖机关，伪国务院里，设有总务厅，为最高决策统辖机关的事务机构。伪国务总理是满人（中国人），伪总务厅长是日人，他有权代理伪国务总理，处理一切事务。其下有七个伪部，各伪部总长是满人，在各伪部内设有几个司，无论在哪一个伪部内，都有总务司，并规定总务司为首席司，司长是日人，他有权代理各伪部总长，处理一切事务。再其下有四个伪省，伪省长是满人，在各个伪省公署内，都有总务厅，并规定总务厅为首席厅，厅长是日人，他有权代理各伪省长，处理一切事务。各伪市市长是满人，在各伪市公署内设有几个处，无论在哪一个伪市里，都有总务处的设置，处长是日人，规定为首席处，总务处长有权代理伪市长，处理一切事务。各伪县县长是满人，在各个伪县公署里，有参事官的设置，参事官是日人，他有权代理伪县长，处理一切事务。

伪满洲国在初期的人事行政上，明显的一点，就是在各个伪机关里，都布署了日系官吏，并规定了总务首席，作为控制满系和事务执行的代理者。但在各个伪地方机关里，日系官吏

参加的少。如在伪县公署里，只安排了三四名日本参事官。大批的日系官吏，都集中在伪中央机关里，如伪国务院总务厅七个处，处长全是日系。这些人事上的安排，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政治和日本殖民统治集权的安排。

当时日本侵略者们自豪地说：新国家，由日、满两系人来当官吏，这是世界上的榜样，我们是在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基础上，进行新国家的建设，我们要终生献身在这个新国家里。如第三代伪国务院总务厅长长冈隆一郎，曾在伪首都新京，买一块墓地，他决心要埋骨在满洲，并预定以“日满亲善的东洋和平之基础”，作为他墓前的碑文。

关于伪满各机关的首脑人事，在伪满初期决定时，在汉奸们中间，互相有所争夺。这个人想干这个，那个人想干那个，都认为自己帮凶有功，都想一把抓个大的。但日寇的政策，是以安定地方秩序为首要任务，无论你们如何争夺吵嚷，我有一定之规。日本关东军不点头认可，那是白闹一回。如郑孝胥随溥仪到东北来，所谓的保驾功臣，又代替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出卖民族利益的秘约，换来了溥仪当执政，郑孝胥自然要当伪国务总理。可是自不量力的熙洽、罗振玉等人，都想当伪国务总理。如张燕卿，以一个吉林省公署的秘书，给了一个实业部总长，还不甘心，想要当民政部总长、财政部总长等，……诸如此类的汉奸在日本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可怜相，令人痛恨。但日本关东军决定从自己利益出发，尽可能地利用旧东北统治者，以缓和惊慌不安的东北人心。所以凡是在“九·一八”事变当时的东北统治者，尽量安置他们官任原职，并兼任伪国家的各部总长。如熙洽，授予伪财政部总长兼任伪吉林省长；臧式毅，伪民政部总长兼任伪奉天省长；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兼任哈尔滨特区长官；马占山，伪军政部总长兼任

黑龙江省长等等。余下的挑选早就和日本侵略者有亲善行动的，如丁鉴修、于冲汉、赵欣伯、冯涵清、谢介石等等，暂先利用。

这就是凡是东北政权时代的官吏，只要不反抗日本的侵略，全部留用的原因。因此，在各伪机关里，还是同旧东北时那样，拉拢亲戚朋友关系，仍然存在着小集团和派别的活动。如臧式毅当了伪民政部总长兼伪奉天省长，就拉拢旧部下和亲朋关系，如有葆康、赵鹏第、黄富俊……。熙洽当了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便笼络、重用金名世、洪维国、荣孟枚、齐知政……。张景惠当了伪参议府议长兼哈尔滨特别区长官，重用的是金荣桂、宋文郁、于镜涛……。马占山当了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也是这样，手下有王静修等……郑孝胥当了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也是这样，被封官的有许汝棻、胡嗣瑗、宝熙、沈瑞麟、郑禹、郑垂……。

在日本主子面前，他们互相间展开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如郑孝胥、熙洽，诚心诚意地想搞清朝复辟活动，尽可能地想把爱新觉罗氏的后裔、清朝老朽人物，纳入伪满洲国政府组织中。但日本主子没有听他们这一套，所以，在伪满洲国首次举行的伪国务会议时，日本人的伪总务厅长，当着各伪总长的面，郑重地强调了“满洲国”就是“满洲国”，这是一个独立国家，要大家忠诚于“满洲国”，本着“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为建设新的王道乐土而尽力……。说者有意，听者无心，马马虎虎就算过去了。

日本殖民统治者当时很注意这些汉奸的行动，把他们分成郑孝胥派、臧式毅派、熙洽派、张景惠派、亲日派等等派别。并决心要逐渐消灭这些派别。但在伪满洲国初成立时期，虽然日本侵略者尽力掌握着伪满洲国的人事行政大权，因为旧的习惯势力，相沿下来，还不能马上清除掉。同时日寇也考虑到，它

所谓的亲日派（无派别），还没有力量完全掌握伪满洲国政府的重要职位。在这个过渡时期，只好监视利用，慢慢地考察甄别。

如臧式毅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当了伪奉天省长，他用曹承宗当他的秘书长，通过曹承宗的手，出卖伪县长缺，好县份的县长缺，卖几百元至千元，不好县份的县长缺，卖几百元。至少也得化二三百元，买一个县长干干，这是当时的一个不公开的公开。卖县长缺所赚的钱，归臧、曹二人分肥，日本主子虽然也知道，但在伪国家成立时，还是利用他，作为安定东北人心的招牌。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伪满洲国政府的人事行政上，进行了如上的安排，如上所述，是为了利用汉奸，以缓和东北人的抗日心情。也想通过集权的安排，来控制一切。但实行的结果，还不理想，还没有达到所预想的那样完整无缺，日本殖民统治者还不能完全控制着伪满洲国的施政。

例如，伪政府规定伪国务院日本总务厅长，有权代理伪国务总理，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利。但在职位上，特别是对外关系上，无论如何，低于伪国务总理，限于官阶，不能同伪国务总理相平衡。各伪部的日本人的总务司长，各伪省的日本人的总务厅长，各伪市的日本人总务处长，各伪县的日本参事官，都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实行这样的安排以前，没有预想到，今天感到必须及早解决，以便完全控制这个伪满洲国政权。

在伪满洲国成立当时，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对于这个伪国的人事问题，曾作了充分的考虑和研究。应该利用什么样的"人才"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议论。驹井德三的意见是："在这样一个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新国家里，应该利用什么样的人才？一句话，就是利用亲日派和一些受过日本教育的满洲人，最

为合适。但是这样的人才，眼下说，很感不足，那就只好放松一点要求，用利禄来拢络他们，这是暂时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今后的长久之计，我们必须尽快地训练出我们所需要的人才。那就必须有一个新国家的人才养成机关。”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意见一致了，都认为及早成立一个人才养成机关，是必要的。结论是，以伪满洲国的年号“大同”为名，成立一个“大同学院”。因为这是一个养成机关，不属于文教部门，直接归伪国务院总务厅领导，第一任大同学院院长就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兼任。大同学院成立以后，招收的学生，凡是受过日本教育、会日语的青年，不分日满系，在职不在职的伪官吏和知识青年，都可报名报考。录取后，在入院的一年“教育”期间，主要是进行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所谓建国精神的教育。一年毕业后，在职的回原职，不在职的，由人事处分派到各伪机关去，这就是日本殖民者所谓的“中坚分子”。从此，在伪满洲国的人事上，又出现了一个“大同学院派”。这个派，其中有日满两系伪官吏，他们有大同学院同学的关系，互相联串起来，站在日本主子信赖的立场上，分布在伪满洲国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在人事处来说，这样受过新国家基础教养的人才，只要不犯大错误，尽量地从快提升。

三、1934年行政组织机构改革的原因

虽然日寇参加伪满洲国政权，当了伪官吏，并预想以日寇集权的安排，控制一切。但由于满系官吏既有的旧势力存在，又由于满系官吏，很多人抱着独立国家的热火盆，因此在事务执行上，又由于日本官吏的揽权，而感到不满意。日本主子们深深感到满系有不满的心情，就是处处都避免发生磨擦，终非长久之计。同时，在日系伪官吏中，很多是满铁出身的人，他们

对于中国的风俗人情，有些一知半解的认识，对于日本政府所要实行的殖民统治，有些不以为然，所以在执行政策上不够狠，有的根本不予执行。这样，伪满中央的号令，不能顺利地推行下去。日本殖民统治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考虑到伪满洲国的组织机构和伪满洲国的人事安排上，还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因此，决定要实行一次行政组织机构改革。在组织机构改革的同时，对于伪满的人事，也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更换。

在日本殖民统治当局预定的伪满洲国行政组织机构改革前，日本政府曾有过这样一个官面文章的表示，通过日本关东军说出这样一段话："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人参加满洲国当官吏，是为了帮助满洲人，把新国家建设好。结果是，当满洲国官吏的日本人，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压迫满人，这是很不对的，这种现象，不应该继续下去……"

接着日本政府，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在日本当过多年县知事的远藤柳作，接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这就是说，第一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是日本关东军委派的，第二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是日本政府委派的。

其实，日本政府所表示的那段谈话，完全是假话，是欺骗中国人的话。实际是，因为从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在汉奸们中间，有浓厚的清朝复辟思想，有些人不认为满洲国是殖民地，相信日本侵略者所说"满洲独立国家"的假话，对于驹井德三，在首次伪国务会议上所表示"满洲国就是满洲国"的话，没有理解。特别是郑孝胥，他曾代表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过密约，深信满洲是独立国家，是属于满洲人的国家，满洲人有自主权，日本人当官吏，是出于援助的好意……。所以，他们认为日系官吏的揽权，是他们的错误。

另一方面，在日本伪官吏中间，派阀之争也很剧烈，如大藏省派、内务省派、商工省派、递信省派、满铁派、帝大出身、一高出身、高师出身……等等。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伪自治指导部，派到各伪县公署的政治指导官，后改名参事官，很多是日本青年联盟、雄峰会的会员，他们对伪满洲国的看法，和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看法，有不一致地方。最终，导致了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于1934年对伪满的行政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所谓的“改革”。

一九三七年伪满机构改革的特点

邢士廉

伪满洲国由1933年到1937年是它极力欺瞒世界的一个时期。为避免刺激世界人士的注意，始终持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针与态度。但到了1937年以后，它就明目张胆地、大张旗鼓地实行了更加露骨的侵略政策。为实现侵略计划和政策，先把伪满国政府的中央与地方的机构加以如下的改革：

将原有的军事部改为治安部，外交部改为外务局，民政部改为民生部，司法部照旧，交通部照旧，文教部取消，归属于民生部，编为教育司，财政部改为经济部，实业部改为产业部，蒙政部改为兴安局。同时设了一局“内务局”，专办原有的民政部所管的一切行政事务。

这个改革的主要点，是把担当国内治安的警察与担当国防的军队编为一个命令系统“治安部”，一旦国内起了暴动时，军队马上即可出动援助警察，国防有事时警察即可出动援助军队，

这是强化国内治安与更加巩固国防的一个方针。

外交部改为外务局，是因为国防及其它的建设业已完成，对外顾虑的时代是不存在了。所以将外交部缩改为处理事务性的一局的体制。

取消文教部，只编为一司归属于民生部，这证明了侵略者不希望中国人民受更高的教育。

取消民政部，只设一内务局办理民政事务，这是不重视中国人的民政政策，而只采取处理事务的态度。

取消蒙政部，只设一兴安局办理蒙政事务，也是不重视蒙古族人民的民政政策的表现。

新设民生部，是因为各种企业需用劳工甚急，故为整备劳务行政，"新民生部的中心以劳务司为主体"而添设的。

交通部和司法部照旧，未加变更的用意，一为开发产业更需交通的发达；一为取缔思想问题的关系，两部的内容却都加强了。

财政部改为经济部，是机构改革主要中心问题之一，把以往的财政部更加以扩大，明显的包括了商工业在内。

实业部改为产业部，是机构改革的最中心问题，以便与日本政府采取一致的计划，管理日满间的各种企业（重、轻工业）与实行统制，就是为实现日本的军备而制定大开发各种企业的计划与进行监督及指挥的机关。

同时将以往各部的独裁独行的权利取消，把这些独裁独行的权利，归集于总务厅，使总务厅为伪满国家实际的最高参谋本部，与此同时把星野由财政部总务司长一跃而拔擢为总务厅的总务长官，当了实际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地方机构改革的主要点，除了原有的10省：奉天、吉林、龙江、热河、安东、锦州、间岛、滨江、三江、黑河等省，内蒙

古地区不在内，这些是1937年5月前设立的，后新设了通化与牡丹江两省，缘因通化附近的大栗子沟一带埋藏无限的优质的铁、煤矿藏的关系，所以以通化为中心，定为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地区，因此也定为行政的中心地域。牡丹江是临国境地带的中心地，故划定了为军事重要基地，而行政方面也随之划定为行政中心地域。

同时对中央与地方各机关内更增加了日系官吏，例如中央各部的中国人首长下边添设了次长，省长下边添设了日系的省次长，市长下边添设了日系的副市长，县长下边添设了日系的副县长，中国人司长下边设了日系的首席科长或总务科长，掌握了实际的司长权利。这种制度表明它是丝毫不顾虑世界舆论，明目张胆地掌握了各个部门的主权了。

伪满洲国日系官吏的构成

王允卿

伪满建国以后，日本人统治阶层亦不断发生变化。起初，日本人官吏中多为满铁系出身，喜财好利。继而由国内人士跑来参加，或由国内名人推荐者，当时因满洲的前途如何尚难确定，所来者，多系昭和12年犯共产嫌疑者。及松岗宣布脱退国联后，日本政府即以全力经营满洲，此际所来者，即由帝国大学毕业之帝国主义派逐渐来满，代满铁系而执政。而满铁系大为不满，然亦无可如何而已。共产嫌疑系，对于帝国主义系，亦抱不满，主张满洲应建一世界最新式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派侵略的政策，对于中国人多表示好感。康德6年，在总务厅官吏中，企划

处长神田、法制处长青木佐治彦、主计处长古海忠之、弘报处长堀内一郎，均系帝国主义派。代主计处长饭泽义重为满铁系。而地方处长菅太郎、人事处长星子幸雄，为共产嫌疑者。自康德7年总务长官武部六藏，随植田关东军司令官来，日系次长为松木侠，后以统制经济关系又添日系次长一人，为古海忠之。

武部六藏总务长官，帝国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系日本国内务省出身，官至敕任局长、关东局长官。后回国随植田关东军司令官来特任伪满总务长官，代表植田大将控制伪满政府的政治大权，人奸滑多虚伪。

松木侠出身为满铁系，无多才。为缓和满铁不满之风，故任以总务厅次长。

古海忠之帝国主义派，人精明，多辩才，长于计算。对于财政经济方面，在当时日本人中，无有出其右者。原为总务厅主计处长，去欧留学一年，归为经济部次长。后以开发产业关系，又调为总务厅次长，专司产业开发计划，一般日本人均宣传有继代武部长官之可能性。

我所知道的武部六藏的出身及简历

古海忠之

武部六藏1932年任日本内务省会计课长，同年任秋田县知事。1934年来满洲任关东局司政部长，1935年任关东局总长。1936年至1937年回国任日本企划院次长，1938年参与创立北支那开发会社，并任设立委员。1940年7月，就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

武部六藏离任关东局总长以后，入日本内阁企划院，在企划院总裁青木一男之下就任次长，负责日本重要计划的起草及日本国力判断调查。在制定日本帝国主义未来侵略计划的过程中，即与日本各财阀有了关系，尤其是1938年，受内阁的委托，主管北支那开发会社创立之事务。在日本大财阀和政府互相勾结（日本政府与财阀各出资半额）策划设立本社时，他得以认识了日本财阀的巨头池田成彬（是三井财阀的最高理事，当时的大藏大臣），并与日本金融界的巨魁结城丰太郎相识。通过联系确定出资分担额的事务，又得以与各财阀发生深厚的关系。从而他也逐渐成为日本各财阀信赖的人物，然而从他的交友及其它方面来看，其中关系最深厚者是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住友财阀。该财阀当时在伪满洲国已经经营了金属工业及钢管等事业。而且于大东亚战争后期，伪满洲国拟定轻金属紧急增产计划时，他作为总务长官，亲自访问住友财阀，把安东（今丹东）轻金属会社委托给住友财阀。这样，他维护以住友、三井为首的日本各财阀的利益，作为帝国主义代表，一直是为财阀所信任的人物。

武部六藏在当时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中，尤其在军阀及官僚中，又多有知己前辈，例如：安部信行、东条英机、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木户幸一、河原田稼吉、后藤文夫、大达茂雄、汤泽三千雄、贺屋兴宣、石渡庄太郎、青木一男、岸信介等。他与这些天皇制军阀、官僚巨头集团，交际关系非常广泛，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中有相当的影响，而他本身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有力成员之一，是日本帝国主义阵营的一流人物。因此，武部六藏被军阀、财阀、官僚选定为在伪满洲国实施侵略政策的最高负责人，经内务官僚汤泽三千雄等推荐，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立即同意，而被任命为伪满洲

国总务长官。

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充当强行侵略满洲的关东军司令官的最高政治参谋，向关东军提供侵略满洲的重要计划与方策，并与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等共同决定最高侵略政策。另一方面，作为侵略满洲的工具，总务长官又是伪满洲国实际的国务总理大臣，即最高实权者。他指挥和动员伪满洲国官吏，尤其日本人官吏，在伪满洲国内制定审核日本的侵略计划、政策，并通过伪满洲国的行政机构及特殊会社等，进行指挥、监督，推行彻底侵略满洲的种种重大事务。而且，关东军期待总务长官，以其在满洲日本人中所具有的最高领导者与统率者的地位，把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官吏结集于自己周围，竭力掌握实权。对日本以及其它国家和地区来说，总务长官作为伪满洲国的实权者，是被公认为处于代表者的地位的。特别在日本，其地位一贯特别受到重视，武部的前任，后来都被敕选为日本帝国议会的贵族院成员，这已成为惯例。

总之，伪满洲国总务长官，在伪满洲国内，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和财阀利益，加强控制伪满洲国，以扩大侵略满洲为使命，拥有日本帝国主义天皇制官僚最高地位的重要责任者。而且，武部六藏在伪满洲国期间，更是处于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掠夺最关键的时期，他彻底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从武部六藏的关系网，看他所起的作用

谷次亨

一、武部六藏与东条英机之关系

1935年，东条英机在其少将时期，任日本驻满洲宪兵司令官兼任日本关东局警察部长时代，武部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关东局总长，成为东条英机的直管上司，由此与东条英机结成莫逆的关系。

二、武部六藏与梅津美治郎大将之关系

梅津美治郎曾任日本驻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第六师团长、陆军省次官、日本驻“满”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参谋总长等职务。当梅津任日本陆军省次官时代，武部由上述的关东局总长转升为日本政府企划院次长（同次官一样），在日本内阁每周召集各省、院次官会议时，武部亦参加，在该会议上凡对陆军省所要求的战争军需物资的提案，武部以执掌日本全国“物资动员计划”的企划院次长的身份，表示异常赞同。因此，在这个时期不但与梅津次官结成志同道合的关系，而日本陆军好战的将官乃至中坚分子的佐官亦皆对武部发生好感。于是，直接、间接地形成了无不拥护武部的主张与意见，这就是武部六藏获得日本军阀拥护与支持的根源。

三、武部六藏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来历

日本军国主义者选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在政治上必须具备的条件：（1）现任关东军司令官信任的人物。（2）在日本陆军好战分子的将、佐官们之间对其有好感的人物，并本人具有积极侵略思想者方为合格。1940年初夏，在梅津美治郎大将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时代，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星野直树被调走后，日本政府根据现任司令官梅津的要求，经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同意，还有好战的将、佐官等的支持，武部六藏被充任伪满洲国的总务长官。

四、武部六藏与东条英机新的关系

东条英机由1940年任日本陆军大臣，1942年升任日本总理大臣仍兼陆军大臣并兼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又兼日本军需省大臣，名副其实地执掌了独裁式的战时体制的内阁。为强化侵略战争，主要的军需物资必须仰赖“满洲国”的供给，故东条对武部在“满洲国”的施政和地位，更加一层地支持和拥护，如是，武部在其本国有东条政府及好战者一派的支持，在现地有梅津司令官的信任和拥护，所以，武部直到伪满垮台实行了其为所欲为的恶毒政策。

五、武部六藏与日本财阀的关系

武部六藏，因其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成绩优秀，被日本第一流财阀三菱老板岩崎男爵聘为女婿，由该财阀的援助，遂从其38岁的年龄，充任了秋田县长（相当于省长），更经任关东局总长后而又被重用为企划院次长。这个时期的企划院总裁为青木一男，他也是与武部同样的情形，即青木一男被三菱某一老

板，聘为女婿，后由对“满”事务局次长，而被拔擢为日本企划院总裁，他们两个人既同受三菱的援助，更具有亲属的关系。

六、日本企划院的任务

根据侵略战争的进行，负责计划所需要的一切军需和民需物资，除日本本国内所有的微少资源外，主要是依赖中国东北的粮谷、铁、铁矿石、炼钢用煤、盐，中国华北的粮谷、炼钢用煤，以及中国华中的棉花、铁矿石等。一方面，按其计划数量输送日本以便供给和生产；另方面，依各地生产的原料，按其计划数量，现地生产。这种物资的生产和配给的指定权，是由企划院和日本军需省（系商工省的改称）指定之。实际的内情，在其本国内的指定权，是由二者合议，在各现地，则几乎属于企划院与各现地主管机关之所定。被指定者，必须具有生产资料或新建生产资料的庞大资金和游动资金。这就说明了日本的军需物资的生产是操纵在财阀的手里——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等独占财阀们。

日本由其大正年代，即走向“金融寡头”政治。独占资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五大财阀，暗暗地左右了日本的国策，侵略中国东北，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都是垄断资本家们直接间接决定的侵略政策。为的是，掠夺原料的生产地，再做军火以便发横财。例如：三井财阀出身的藤原银次郎曾任过日本的商工省大臣，住友财阀出身的池田成彬曾任过日本大藏省（财政部）大臣，都是代表日本独占资本家的意志．使日本政府扩大进攻中国与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政策决定者。

武部六藏和青木一男如上所述是三菱财阀老板们的爱婿，更在其援助下，得以执掌日本企划院总裁与次长的大权，当然

为三菱及其他有关财阀来谋利益的。

七、武部六藏任企划院次长时代安排资本主义在占领区的发展顺序

日本独占资本家为避免在中国本部和在中国东北的互相竞争，由1933年组成联合会，其内容：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的顺序，成立了协定，即利用其既有的设备与关系，经过日本政府的非正式指定各自进行发展。

例如：在武部任企划院次长时代，1938年日本占领中国华中的南京、上海后，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华北、华中区域，指定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之顺序；对于华南区域，指定按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大仓等之顺序行之；至于东北区域则因三井多年的垄断关系及其既有的组织，以三井为主体，三菱为次，更次则为住友、安田、大仓及其他资本家的顺序，从事发展。

对其国内关于增加新的军需物资生产，大多数系指定了三井、三菱、住友为主体和其他的资本家担任之。以上是根据1941年日本关东军第四课“物资动员计划”制定者小岛少佐参谋对我所说的。

八、武部六藏任总务长官后与日本财阀的关系

1940年武部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后，规定每年向日本国内输送100万吨铁矿石、60万吨炼铁用煤、约30万吨铁，1940年度输送220万吨粮谷和若干吨盐。

前述的100万吨铁矿石，主要是供给三菱系统的神户“日立”制钢所、岩手县的“釜山”制铁所、北海道的“室兰”制钢所之外，其余则寥寥地分配给其他的制铁所。前述的炼铁用

煤也是几乎全部供给前述三菱系统的三个制钢所使用。前述30万吨铁，大部分供给了三菱系统的神户、长崎两处的“川崎造船所”及其他制造军火的使用。

由1941年起中国以东北产的鸦片拿到华北卖钱，以此购买开滦煤（炼铁用煤）每年90万吨，主要是除三井、三菱、住友投资的福冈“八幡”制铁所使用外，还供给了其他制铁所。由东北及华北购买（以鸦片的卖价在华北收购的盐）的大批盐运到日本后，主要是供给了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投资组织的“大日本化药工业株式会社”及其它的工业使用。前述的粮谷由1940年的220万吨逐年增加，到1945年为700万吨，这是经过三井机构（主要是经由海路）向日本输送。在运送过程中，三菱、三井的船舶垄断去巨额的运费，更因粮谷大部分是由日本政府指定经三井、三菱的机构，配给人民的关系，又取得了大部的经手费。这也是根据上述小岛参谋对我私谈的。

九、在东北日本各财阀的势力与武部六藏的关系

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在中国东北的投资和企业，占日本主要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例如：由1937年开始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为此而组织的执行机构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构成该社的子会社35个中，有25个以上，系属上述财阀的投资和企业，如：“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主要为三井、三菱投资。“鞍山制钢所”大部分系经由“满铁株式会社”，而是三井、三菱、住友的投资。“本溪湖煤铁公司”完全是大仓的企业。“奉天”铁西的铜电线制造业（忘其名）是住友的企业。鸡西煤矿系三井的企业。阜新煤矿是三菱系统的企业等，这不过由伪经济部日本人次长青木实对我所说的几个代表的例子而已。

由武部六藏任“满洲国”总务长官后，对这些会社的扩大和增设其子会社，更加以特别援助。特别是，于1941 年以后，经武部许可，三菱在东北创设了各种保险事业，吸收了东北中国人民的膏血，获得了特别的利润。又许可三井在东北各地普遍设立收买特产（包括土产）的机构，通过其在哈尔滨、长春、奉天、营口、安东、大连等地的许多个支店向其本国及欧洲出售，获得超额的利润；更于1941 年将东北生产的鸦片和粮谷，向华北暗暗输出，以换取供给在东北的日本军需物资——白面、皮革、棉花等。在这种运送、贩卖、换取、价格等等方面，都指定由三井一手包办，说明了武部六藏以伪总务长官的职权，援助了日本独占财阀，使他们获取到特别的超额利润；相反地摧毁了东北的民族企业和使人民陷入种种困窘的情况，战犯武部六藏实应负其罪责。

二

伪满地方殖民政权

日伪统治奉天十四年

齐守成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策划，在沈阳（奉天）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我国东北大好河山，完全践踏于关东军的铁蹄之下，而且于1932年3月，炮制出一个所谓的“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下，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和军事镇压，进行疯狂掠夺。同时，大搞以摧残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殖民地文化，时间长达14年之久。

炮制傀儡政权　实行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奉天）后，积极筹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奉天省公署”、“奉天市公署”，在城乡遍设区、乡、村公所。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侵华战犯元凶土肥原贤二还亲自首任伪奉天市长。据1940年伪《奉天要览》统计，在伪奉天市政府任职的825名官吏中，日本官吏就有509名，占62％。日本官吏不仅人数上占多数，而且把持了各部门的实际大权，少数汉奸也只不过是装饰点缀的牌位而已。伪行政机构设立后，为实行殖民统治，公布取消使用“中华”和“辽宁”字样，禁悬中国地图，公布指纹法特令等。

为了巩固伪政权，镇压反抗，扩张侵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大迁到沈阳，并在沈阳驻扎大量军队。据伪《盛京时报》1932年9月刊载，当时驻伪奉天省日军“警备总兵力，步

兵20余营，骑炮多连”，后在沈阳又增设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为王之佑，实际大权是日人顾问原和三郎，在重要军工厂均驻防日军，如“九一八部队”“五八一部队”等二十多个。至日军战败时，驻沈阳日军就有后宫淳大将的第三方面军、本乡义夫中将的第四十四军、岸川健一中将的第六十三师团、中山惇中将的一三六师团、桑田贞二少将的独立混成一三〇旅团、阿野安理少将的独立战车第一旅团。这些日军以“讨伐”、“剿匪”为名，大肆逮捕和屠杀我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监视和镇压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仅据伪《盛京时报》1934年1月23日载：1933年，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出动485次，其中8月份就出动84次，打死我抗日志士及人民群众1 749名，打伤2 200多名。

同时，在沈阳大量设置警、宪、特务机关和监狱，实行法西斯专制。诸如设立了奉天陆军特务机关、关东军情报部奉天支部等大量的特务组织，其中设在沈阳的伪奉天地方保安局，以“姜满洋行”为掩护，有9个特课班，40余人。城内育美屋书店、劝业商场内之秋江书店、协和街前美国领事馆址均为特务据点。北陵国际观光旅馆、千代田大街瓦尔瓦露西亚饭店、住吉街奉天大楼“此之花”豆腐馆、私烟馆等则为秘密联络点。另外在加茂街的“敷岛寮”和北陵警察学校内均设有秘密监狱。在这些特务组织中任职的间谍特务分子数以万计，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专事捕杀我爱国志士，实行法西斯残酷统治。

就警察来讲，在沈阳先后设有伪“奉天领事馆警察署”、“奉天市警察署”、“奉天市警察厅”。在“奉天市警察厅”下又设24个区警察署和138个街、村警察分驻所，在市内各主要工厂都设有警防课（系）。这里特别要提到宪兵。伪满期间，日伪军警联合进行的屠杀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暴行，无不有关东军宪兵队参加，而且都处于核心和指挥地位。众所周知的日本甲级

战犯东条英机，就曾担任过关东军宪兵队的司令官。

这些日伪军、警、宪、特的五花八门反动组织还给沈阳人民制造了种种罪名，什么“思想犯”、“经济犯”、“国事犯”、“嫌疑犯”、“反满抗日罪”、“内乱罪”……五十多种，以此来任意残杀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的14年中，制造大规模血腥镇压我党地工、爱国志士及人民群众的大事件达40余起。据伪“奉天省警务厅”1936年的报告中记载，这一年内即捕杀我爱国志士和居民19 623名，仅一个“桃园工作”事件就捕杀318名。

血腥屠杀　残酷镇压

伪“奉天市警察厅”特务科长筑古章造，在他任职期间就抓捕中国人530名，杀死百余人。伪“奉天铁西警察署”署长中园秀雄，在他任职3年中，就捕杀我中国居民2 930人。他们为了大量拘禁中国人民，在沈阳设立了伪奉天第一监狱、陆军监狱、兴农合作社等公开、秘密监狱和拘留所、看守所近五十多个。其中，仅伪“奉天第一监狱”就经常拘押中国人民二千多名，绝大部分人有去无回。沈阳东陵区有个贫农老汉无端被抓至该监狱，在狱中他的右腿骨被打断，日伪看守竟然割开他的皮肉，用铁丝将断骨缠绕，把他活活折磨死去。

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抓捕中国人民之后，施用各种非人刑法，除毒打、灌凉水外，还有灌煤油、灌辣椒水、烙铁烙、蜡烧、开水浇、滚钉笼等。杀人也是多种多样，有枪杀、刺杀、刀砍、铡刀铡、活埋、绞死、喂狼狗、开膛破肚、活体解剖、细菌试验等等。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沈阳抓捕中国人13名，刑讯后，均送到石井部队进行细菌试验而屠杀。1941年，日本特务机关先后将18名中国爱国志士押到南满医科大学，交给该校的

日本教授做活体解剖，并且还写出《中国人脑的组织学研究》等论文，发表在日本仙台大学学报上。

沈阳的大东区老瓜堡子，日伪时曾在该地设立“奉天矫正辅导院”。这个矫正院，实际是个杀人魔窟，关押的都是些被敌伪任意抓来的无辜百姓，天天遭到毒刑拷打，每日都成车往外拉死尸。日寇对想逃跑的人更是惨无人道，抓回后有的被绑在杆子上，先从头上浇开水，然后用布缠起来浇上汽油点“天灯”。有的被绑在一棵枯树上活扒了皮。

垄断工商企业　掠夺经济资源

1906 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对沈阳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沈阳成为日本在东北投资的五大中心之一。据统计，1926 年沈阳的 24 家近代工厂中就有 11 家是日本投资。到 1927 年，日本在沈阳的投资达 4 570 万日元，开办公司 150 个，其中拥有 100 万元资本以上的大公司 17 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等大财阀，进一步垄断了沈阳的经济命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奉天工业总资金中所占的比重达 97%，商业达 73%。

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开办的企业，利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如当时在沈阳的“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奉天造兵所”、“满洲火药工业株式会社”、“满洲铸物株式会社”……都是直接为关东军服务的。一些机械制造工业，也完全是日本机械工业的附庸，不能生产成套设备，只能修修配配。一些轻工业，如“满麻奉天工厂”生产的麻袋，是专门用来掠夺中国农产品用的，“亚细亚麦酒株式会社”生产的啤酒，是专门供应关东军及运往日本国内的。工人如喝几口啤酒，有的被毒打致死。日本帝国主义各大财阀在

沈阳经营的工厂企业，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我国经济资源，攫取高额利润的基地。他们把在沈阳掠夺的财富，大量运往本国，如煤、铁、大豆等物资，1943年为350万吨，1944年为450万吨。

同时，为了缓和他们国内的经济危机，大肆倾销日货，当时在沈阳市内的商品70%均是日本产品。沈阳的四大百货公司，其中有三家是日本人开办的。零售商店有一千五百多家。为了独霸沈阳市场，对待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竭力进行迫害和摧残。"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城内中国工商业者休业逃亡的达1 500余家。城内中街（四平街）中央百货公司的三层大楼竟变成了一个煎饼铺。即使这样，还由于粮食配给的不足，甚而"统制"以致连煎饼铺也开不成了。沈阳的"同昌行"，当时生产一种"老火车头"牌牙粉，物美价廉，深受沈阳人民所喜爱，这也恼怒了日寇，1932年3月将老板刘凯平抓到日本宪兵队严刑毒打，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处死。

敲骨吸髓　生灵涂炭

在日伪统治下的沈阳各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技术大权，全由日本侵略者所掌握。如"满铁奉天车辆株式会社"、"亚细亚麦酒株式会社"，从经理、技师，到每个科、股、班长、事务员都由日本人担任。中国人除少数汉奸工头外，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以上，可所得工资连家人都养活不了。日伪统治者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在各工厂中大量雇用童工，被贫困逼迫自幼就出卖劳动力的中国童工，都要同大人一样的干活，但所得工资都不及日本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少的可怜。据1935年《满洲国现势》记载，1934年沈阳市的中国工人同日本工人日工资比较：力工日本人为2.5元，中国人为0.7元；铁工种日

本人为3.6元，而中国人却是1.4元，相差极为悬殊。就是这样微薄的工资，还要遭到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受到工头、军警的敲诈勒索。据1943年出版的《奉天市要览》统计，在1935年沈阳市征收的税款总数是459 000元，平均沈阳市民每人为0.88元，至1942年，税款总数上升为2 120万余元，平均每人为13元之多。1942年与1935年相比增加46倍，平均沈阳每人缴纳的捐税，增加15.7倍，日伪当时收缴的捐税即有二十多种。除一般的营业税、所得税、人头税、家屋税之外，还有什么“畜犬捐”，不论饲养鸡鸭猪狗都要交税，养狗一头1932年纳税1.2元，到1942年增为6元。当时就是给别人当个佣人也要缴纳“佣人捐”。在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的同时，日伪统治者还大肆发行“公债”，按人分派，逼迫沈阳劳动人民去认购。

中国劳动人民除在经济上遭受穷凶极恶的压榨盘剥，尤其是处处受到歧视迫害，任意鞭打残杀当牛做马，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如当时的中国工人上下班都要给日本侵略者行礼，有的工厂上下班时中国工人不能和日本人走一个门，也不能上一个厕所。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沈阳工厂企业，是日本侵略者作威作福的乐园，是中国工人的暗无天日的活地狱。在日伪统治下的“奉天纺织株式会社”，对工人有“三十八打”比如谈论国事打、交头接耳打、听不懂日本话的打、挨打不耐烦打……有个童工，由于年岁小，劳累过度，有一天该童工上夜班打了一会瞌睡，被日本工头森奇发现后，即指使狗腿子用棍棒将其活活打死。此外，还规定出什么“旷工一日罚工三日”、“旷工三日立即除名”，“女工有了小孩就开除”等“三十二罚”以奴役中国工人。

1941年冬，在伪“奉天住友金属株式会社”炼钢厂内有个天车工，因连续干了三天三夜，刚在平炉后面坐下来休息一会

儿，被日本工头山本发现，这个恶魔竟舀起一勺钢水泼到中国工人身上，活活地烫烧致死。

在奉天第一机械工厂的日本守卫警长合本井藏，肆意残杀中国工人，他将工人浑身扒光，吊在厂内的老杨树上，用电线拧成的鞭子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用五个大气压的风管，插入工人的耳朵里，直吹得七窍出血当场死去。有的工人被他吊打后往身上浇凉水，寒冬里埋在雪堆里活活冻死。而这个杀人魔鬼还说什么："满洲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

1941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设立"济生院"，后改名"勤劳辅导训练所"，专门作为抓捕输送劳工的转运站。日伪的宪兵、警察经常出动，以抓捕什么"浮浪者"为名，到处抓捕沈阳行人及老百姓居民，然后押到训练所登记编班送往矿山和军事工程当劳工。这些被抓去的数以万计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绝大多数是有去无回，每一个劳工营都是一座人间活地狱。在所谓的"共荣庄"之类的劳工营里，劳工们遭受着劳累、毒打、饥饿和传染病的袭击，随时都和死神作伴，而日本帝国主义准备的是万人坑。

日本帝国主义在抓劳工的同时，还大抓所谓的"经济犯"。中国人种大米可不准吃大米，否则就是"经济犯"。据1942 年1月《盛京时报》刊，1941 年奉天市警察局经济保安科办理的经济犯案件，即有4 778 件，抓捕沈阳无辜人民一千五百多人。如在大东区老瓜堡居住的一位孙大娘，有一天他丈夫和三位老客因吃一顿大米饭，后被日伪军警发现了大米粒，当即将其都抓至"奉天矫正辅导院"均被活活处死，孙大娘的两个孩子也被惊吓而死，一顿大米饭弄的家破人亡。

另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期间，修公路、开工厂、建兵营，任意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于洪区丁香屯原有土地七千

多亩，在1937年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逼卖五千多亩，修建了关东军“蹄铁厂”、“航校”。1943年，关东军修建飞机场，强占奉集堡、下庙子、皮家湾等村的土地三千多亩，当时正值秋天，庄稼快要成熟之际，就全部被毁坏掉，使沈阳大批农民衣食无着、流离失所。有的被逼身亡。更甚者，日寇不但霸占土地，还向广大贫苦农民征收高额出荷粮。农民一年用血汗换来的一点粮食还要拿出一半或四分之三去交出荷粮可日伪把大量的粮食搜刮去，却在沈阳城乡实行粮食配给，一个成年人每月只能分到不足10公斤的粮吃，其中大都又是豆饼、橡子面之类，至使沈阳人民终年遭受饥饿折磨，挣扎在死亡线上。

推行奴化教育　灌输“日满一体”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后，竭力推行奴化教育。首先，封闭一切原有的学校，在日本人主持下，先后成立了“伪教育筹备委员会”、“奉天省教育厅”。重新组建日满学校，派日本人当校长、训导主任、教员等对中国师生进行监督。废除原有教材，采用日本人及汉奸文人编纂的，灌输“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等一系列的亡国奴货色。这些教材是只讲满洲国史、东洋史，不讲中国史，只讲满洲国地理，不讲中国地理，从教材中取消了中国这个观念，妄图使中国的下一代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忘掉是个中国人，永远做日本统治者的“顺民”、“良民”。

为了彻底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中国学生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日伪教育机关，强行规定日语和满语同为国语，而在实际教学中则以日语为主。中国学生从小学就要上日语课，当时的“国高”不仅每周要用许多课时学日语，而且一些课程的教材皆用日文印成，在讲课时以日语讲解。当时凡

中等学校，每年都举行两次日语鉴定，鉴定合格者分等给予津贴，毕业时并给以升学和就业的“优待”。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永远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不仅进行奴化教育，并且执行愚民政策。沈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14年期间，大中小学校只增设19所（原为51所后为70所），这增加的19所，除了一所高等学校外，其余均为小学校，这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阴险用心，这就是从小给中国青少年心灵中播上奴化种子，限制发展中高等教育，妄图使中国人永远做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奴仆。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奴化教育的手段是花招多样，他们在学校里大讲什么“修身”课、“国民道德”课，宣扬“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并按照他们进行侵略奴役的需要，还提倡什么“尊君”、“善邻”、“博爱”、“孝行”、“礼义”之类，以此来束缚和麻痹中国学生的思想。同时，强迫中国学生天天念诏书，遥拜日本天皇，大力培植奴隶意识。

与此同时，对中国师生的思想活动严加监视，各学校里的日本校长或教职员，都和日本宪兵特务机关有联系，发现中国师生对其统治稍有不满，或稍有爱国思想流露，就立即捕杀，实行血腥镇压。日本宪兵特务机关制造的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的镇压事件中，就捕杀我爱国师生35人。当时甚至因中国学生成绩好也是犯罪，如1936年，沈阳“共荣”中学，由于学生成绩优良的多，日伪特务机关就怀疑这个学校里有反满抗日思想，至使7名师生遭到杀害。

除了在学校推行奴化政策外，对新闻出版事业完全加以垄断控制。日本侵占沈阳14年期间，沈阳有4种报纸，即：《满洲日日新闻》、《奉天每日新闻》、《盛京时报》、《醒时报》。这些日伪报纸，均是宣扬日本侵略政策和日满亲善等内容的，有的社

长就是日本人。除报纸外，对于社会上出版的一般书刊杂志都要严格检查，仅据1940年的《满洲年鉴》记载，从1934年至1937年，禁止的杂志有2 300多件，扣压4 000部，普通书刊3 500余件，扣压35 000部。

日本统治者不但禁止扣压甚至还任意焚毁书籍，日伪文教部曾于1932年明令通告各地文化机关，凡涉及与日伪组织“国情”不合之书刊，一律急速焚毁。沈阳小北门里的学生书局，因藏有关内出版的书刊，即遭封闭，经理等人被捕入狱，2万余部书全部被焚毁。其后对沈阳各书局均严行检查，据日伪文教部的统计资料，只在1932年3月至7月间，就焚烧书籍达650万册。

在社会上设立了许多诸如所谓“民众教育馆”之类东西，还成立“道德会”、“协和会”等不少宣传奴化思想的机构，严厉控制和利用宗教团体以麻痹和奴役中国人民，修建了许多“神社”、“忠灵塔”，强迫沈阳人民祭祀。当时沈阳各影剧院上演的都是宣扬“日满亲善”以及淫秽、诱人醉生梦死、忘掉亡国之痛的影剧节目。日本帝国主义还用鼓励种植鸦片、允许开设烟馆的办法，诱使许多中国人吸食毒品，进行慢性自杀。据1943年伪《奉天要览》载，伪奉天市政府批准开设的鸦片专卖所全市就有八十多处。

有压迫就有反抗。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下，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中，谱写出一曲“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以其巨大的辉煌胜利，揭示出一条真理：一切侵略者都没有好下场，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何等地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曾几何时，就被人民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伪满兴安东省的成立经过

巴达荣嘎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东北军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忍辱退出了沈阳。正当此时，以滕续文（哈丰阿）等人为首的东北蒙旗师范的蒙族学生聚议，要趁此混乱之际组织内蒙自治军，要武装摆脱国民党的统治争取内蒙自治，同时号召各地蒙族组织地方武装起义。当时布特哈达斡尔族出身的日本留学生绰罗巴图尔（郭兴元）、绰克巴图尔（德树元）、吉尔嘎朗（德古来），还有上海美术学校的学生耐勒图（鄂恭元）等人参与组织了内蒙自治军。他们当中的绰罗巴图尔回到布特哈（现在的莫力达瓦旗库如尔齐）一带，和东北蒙旗师范的一些达斡尔学生组织起武装队伍配合内蒙古自治军活动，齐齐哈尔一带也有敖瑞平等人组织了一些人。

内蒙自治军一度占领通辽以后，未守住，又被国民党军队夺回。正待组织再夺回时，却被日本军占领，并扬言要帮助蒙古自治。日本关东军方面与蒙古王公联系，叫他们出头拥护伪满皇帝，交换条件是：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并答应在蒙古地

区建立兴安4个省，在伪首都长春成立一个兴安局，管理4个省的事务。后又改为蒙政部。

蒙古王公和上层都表示拥护溥仪当皇帝，而且还都参加了溥仪的登基大典。这样一来，哈丰阿等人所组织的内蒙自治军也没有必要存在了。所谓的自治也由兴安四省所代替了。自治军的历史任务已经完结，也无人提倡什么自治了。内蒙自治闹了短暂的时间，却换来了兴安四省。后来兴安局改为蒙政部以及兴安四省的头头都任命了蒙古王公或者民族上层，对此蒙古王公表示欢迎。因为王公们的利益不但未被侵犯，反而受到保护，并且还当了官，于是哈丰阿等人的主张也就不了了之。

兴安南省的范围是现在的哲盟，兴安西省是现在的昭盟，兴安北省是呼伦贝尔盟。这三个省的土地原封不动，其中兴安东省却占了很大一块土地。原来东布特哈归讷河县，西布特哈归布西县以后，东西布特哈没有什么土地，只剩下历史的名称布特哈，但由于达斡尔族的青年们配合内蒙自治军活动的结果，分设兴安四个省的时候，也有他们的一份，这就在比原来的东西布特哈还要大得多的地方上建立了兴安东省，省会定在布特哈旗的扎兰屯。兴安东省下设五个旗，即布特哈旗、阿荣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其中巴彦旗包括现在的鄂伦春旗。另外还有一个喜扎嘎尔旗，旗政府设在索伦。兴安四省刚开始成立时，叫兴安四个分省后来升为兴安省。伪满末年的时候，把兴安四省又合并为兴安总省，原来的省成为兴安总省的派出机构，设一个行政公署。这个时候，兴安局也名存实亡，蒙政部早已撤销，兴安总省直接归伪满国务院管辖。

兴安四个省的省长都是蒙古的王公或民族上层人物。兴安局长是扎嘎尔，原是兴安西省的省长。蒙政部大臣是齐默特色木丕勒，这两个人都是王爷。兴安南省省长开始是叶喜海顺，也

是王爷。兴安北省省长由达斡尔族凌升来担任。省长下面的厅长、秘书官、局长也都由当地的民族上层人物担任。以兴安东省为例，省长是原讷河县东布特哈八旗筹办处总办额勒春，总务厅长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还有点亲戚的关系的一个人担任，尽管已快入土也不能上班，但仍拿俸禄。这个人死后由巴金保来担任，巴金保原来是布特哈青年教育促进会的会长，对教育达斡尔、鄂温克族青年出过力，他曾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一半，让那些穷苦的从乡下来讷河县城上学的达斡尔族青年们居住，自己全家挤在一间大房子里。兴安东省的民政厅长是志达图，他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过。其他各旗的旗长、警察局长等都由那些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小官吏、民族上层们担任。唯有一个特点是：省公署的各科长均由年青的达斡尔、鄂温克族青年们担任。如总务科长吉尔嘎朗（德古来）、会计科长阿恒泰（敖恒泰）、劝业科长绰克巴图尔（德树元）等人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九·一八"时组织武装配合内蒙自治军在莫力达瓦旗库如齐一带活动过的绰罗巴图尔（郭兴元）当上了兴安东省警备军司令官。其它参加过武装活动的一些同伙不少人都参加了伪军队，当上了大小不等的伪军官或伪官吏。

兴安东省刚成立的时候，除了有一名日本中村参事官以外，日本人没有几个。实权都掌握在达斡尔族青年知识分子手里，他们为了教育下一代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在各旗所在地、努图克所在地都设立了小学校、卫生院、卫生所等。当时扎兰屯有一所师道学校（初级师范）和一所国民高等学校（等于中学），还有一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只收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学生，莫力达瓦旗还设立一所农业学校。从这些学校出去的学生中有不少升入国内各大学，如沈阳南满医科大学、建国大学、吉林师道大学、长春政法大学、哈尔滨医

科大学等，还有用蒙旗协助会的钱，去日本留学的。值得提出的是，达斡尔族的女学生也增加了不少。20年代初期，东布特哈八旗筹办处向南京保送几名达斡尔、鄂温克学生时，其中就有两名鄂温克族女学生，名叫涂景芳、涂景文，当时这种打破封建礼教的阻挠，挺身而去求学的勇敢行为在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族人中引起了轰动。在此以前，也有几名达斡尔族女生到苏联学习。

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各地统治的深入，日本帝国主义对兴安东省的殖民统治也加强了。刚开始时，好象是你们的事，你们自已办。但不久就开始大量地派来日本人，从省到旗县的大小参事官都是日本人，而且说了算，一切大权都由日本人掌握。正职从省长、厅长、旗长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后来，连兴安东省的各科科长也都换成日本人。于是有些达斡尔青年对此不满，言论上如有外露，重则以思想不良，反满抗日来整，轻则把你调走，而且暗中盯住。到了日本垮台以前，日本人对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达斡尔族青年更加怀疑，特务们施展了用明暗两种手段对伪满的大小官吏进行监视。

（摘自《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

我所知道的兴安西省

暴有山

日伪统治时期，我曾在兴安西分省、兴安西省当过职员。现将我所知道的兴安西省前后的一些情况，穿缀成篇，忆述如下。

一、兴安西省的前奏

日本侵略者在入侵南满之前，就曾派遣特工人员在内蒙古搜集情报，拉拢巴林右翼旗王爷扎噶尔和巴林左翼旗豪绅清卓理克图（汉名贺子章）。执行此项任务的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郑家屯出张所所长菊竹和浅野良三，还有薄益三。他们在巴林右翼旗设立劝业公司（收购畜产品及牲畜），在林西县黑山头设立种畜场，借经商为名，将有军事价值的资料及蒙古族风俗习惯等拍摄成影片，交给日本特务机关，得到10万日元的报酬。

日军入侵南满后，又企图侵占整个内蒙古，还试图向外蒙扩张。为推行侵略政策，日军大搞民族分裂、挑拨蒙汉民族间的关系，满洲国国务院设立了兴安总署，下辖东、西、南、北四个分省，兴安西分省省会设在开鲁镇，所辖旗县为扎鲁特左旗、扎鲁特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翼旗、巴林右翼旗、克什克腾旗、奈曼旗、开鲁县、林西县、翁牛特旗（不久，两个扎鲁特旗合并为一个旗，并将翁牛特旗划出）。

兴安西分省，原隶属于兴安总署。当时，其机构设有总务科、地方科、文教科、劝业科、检查室，另外，还有一个警察大队。后来，这个警察大队改组为警察局，在省公署内只保留一个为数不多的卫队，并取消了检查室。总务科设有庶务股、文书股、人事股、会计股、需用股；地方科设有行政股、财会股、警务股；文教科设有教育股、宗教股；劝业科设有农矿股、畜产股、工商股。职员人数除卫队外，总计五六十名，多数为蒙古族，少数为汉族，还有三四名日本人。

二、兴安西省的建立及组织机构

1934年，日本按照其“南上”、“北下”的侵略部署，对蒙

古族实行了"怀柔"政策，竭力进行挑拨离间、破坏民族间的团结，撤销了原隶属伪国务院的兴安总署，改组为蒙政部，并取消了四个兴安分省的"分"字。兴安西分省改称为兴安西省，省公署所在地正式定在开鲁（省公署原定在巴林右翼旗王府所在地大板）。警察局改为警务科，取消原属于地方科的警务股，增设了会计科。其后，机构逐渐扩大，科、股名称亦多次变动，约略如下：

省长、次长（一度改称参与官，后又改名次长）。

总务厅：下设总务科、会计科（一度改称财务科、财政科）、经理科、人事科。总务厅最后改称为省长官房，设秘书室，安置了秘书官。

民政厅：下设行政科、文教科、劝业科（一度改称殖产科）、烟政科、建设科。

警务厅：下设警务科、特务科、保安科、指纹管理室及特务分室（特务分室虽属警务厅管辖，但实际上与日本特务机关有更多的联系）。

三、兴安西省的建制及人事变更

简任官：由"皇帝"任命，在"满洲国"兴安西省属最高官阶，省长、次长属此官阶。

荐任官：由"满洲国"国务院任命。厅长、科长、事务官、技佐均为荐任官。荐任官又分理事官及事务官，此则由其职位而定，在警察中科长为警正衔。

委任官：由"满洲国"国务院任命，亦称属官，委任官实行试补制，即经考试合格后成为正式委任官。股长、技士、科员均为委任官。在警察中，警佐、警尉（后又分为监督警尉及执行警尉）、警长多为委任官试补。一般技术员均为委任官试补。

雇员：一般为最低级的职员。非官吏者可由省公署人事科按各科需要雇用，但实际上均系长期雇用，无临时工。

兴安西省成立后，萨嘎拉扎布和哈丰阿二人在较长一段时间掌握实权。后来，日本人将哈丰阿一度调去“满洲国”驻日本使馆任参事官，萨嘎拉扎布调任巴林右翼旗旗长。名为升迁，实则削弱了此二人在蒙古族职员中的领导地位。至于各任省长及蒙古族各任厅长，皆属虚名，即无实权也无威望。

兴安西省首任省长为扎噶尔，此人系清朝亲王，在爵位上为最高的王位，他与日本人发生联系较早，故日本人委其为首任省长，并曾派其赴日本参观访问。

省次长一度曾改称参与官，均为日本人，职称虽为副职，但却实权在握。首任省次长名叫中村，其后有除野、海村等人。

各厅厅长均系蒙古族。警务厅第一任厅长为靳文泰，不久即更换为日本人当麻。首任民政厅厅长为诺拉嘎尔扎布，后由旺沁帕尔赉担任，首任总务厅厅长为靳文泰，继由萨嘎拉扎布改任。首任实业厅厅长为原文教科长升任。总务科长为萨嘎拉扎布；地方科长哈丰阿；文教科长卜和克什克；劝业科长米济道尔吉。当时，日本人为数不多，均为副职或股长，蒙古族任科长者继后还有勒旺端鲁布、锡理德格都、郭漠北、那孙孟和等。

随着日本人职员逐渐增多，除警务科及特务科始终为日本人外，其他各科科长也多改为日本人，如浅野良三、绪方义道、上屋款次、佐佐木、寺田茂七等。股长级日本人则更多。后来，日本男女职员剧增，竟占省公署全部职员的半数左右。往来公文几乎全部为日文，汉文多属副件，蒙文则更寥寥无几。

四、兴安西省重要的施政及事件

1. 将两个扎鲁特旗合并为一个旗。

2. 在劝业科主管下，在开鲁县小街基一带及扎鲁特旗作过移民适地调查，计划先迁来少数朝鲜人，再迁来日本人，但实际上只迁来了少数朝鲜人。

3. 在警务厅主持下，协同日本军，"满洲国"蒙古军五团及警察剿灭奈曼旗"卜家皇帝"（"卜家皇帝"率众攻破奈曼旗公署所在地八仙筒，除一名日本人渡边外，其他日本人全部被杀）。

4. 在警务厅主管下，处理过"归还兵"事件（日本与苏联军队在诺门罕作战时，蒙古军逃回者多。当时，日本人未敢采取严惩态度，反而采取了安抚政策）。

5. 在文教科主管下，日本为了利用宗教达到侵略的目的，曾选派青年喇嘛赴日本留学。

6. 在兴安西省初期，成立了蒙文学会，不分蒙汉民族均可参加学习，为期不久即宣告解散，会址设在卜和克什克家西厢房。教师由阿木古郎、福龄阿等省公署职员义务担任，并无补贴。

7. 在劝业科主管下，各旗县建立了兴农合作社，强征农民粮食，名曰"出荷粮"。在用品方面，日本的供应机构采取消费组合，一般商店成立了"小卖联盟"。物价实行限制，规定商品必须贴上标签。标签分为"公"，即公定价格；"停"，即由发布布告后，不得再行提价了；"自"，可自行定价。

8. 在文化教育方面，建立了两所国民高等学校，一高专收蒙古族学生，二高专收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在总务科主管下，设置了弘报股，从事宣扬王道乐土及大东亚共荣圈。同

时，收集民间思想情报，将日本国从前所称的“友邦”（即朋友关系），改称“亲邦”（即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9. 在开鲁县设立了兴安西省地方职员训练所，对各旗县的低级职员施以亲日思想及施政、业务诸方面的教育，以加强其统治。

10. 强征不合格的国兵（即所谓的“国兵漏子”）服劳役，主要是从事军事设施方面的劳动。

11. 强迫贫困农民赴黑龙江省垦荒（即所谓迁民）。

五、兴安西省的撤销

1943年10月，四个兴安省取消，改组为兴安总省，省公署设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在原兴安西省辖境设两个行署，一个在林西县，一个在通辽县。

（摘自《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伪对辽中人民的政治统治

编委

日本侵略者随其侵略势力的伸张和伪满洲国政府的建立，迅速地推行了殖民地的奴役政策，先后制定了“劳工法”、“国兵法”、“勤劳奉公制度”、“粮谷出荷政策”（强制征收粮谷棉麻的反动措施）等等。为配合奴役政策的执行，又开动了所有宣传工具，到处宣扬所谓“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用以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同时极力强化军、政、警、宪等反动机器，从多方面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的反动统治势力，开始由城市蔓延

到集镇、农村，并建立了严密的统治机构。辽中县也不例外。

县公署是日伪时期县一级的政权组织，是县里最高统治机器。伪满前期辽中县公署建立之后，署内设县长1人，日本参事官1人，下分总务科和内务、警务、财务、教育四局，至伪满中、后期，日本侵略者为便于对伪政权的直接控制，而将日人参事官正式改称为副县长，同时为适应统治人民的实际需要，对县公署内的原有科局，也进行了全面调整。调整后的伪辽中县公署行政组织如下表：

- 县长
  副县长
  （日本人）
  - 1 庶务科
    - 经理股
    - 文书股
    - 庶务股
  - 2 行政科
    - 街村股——街村共三十三股
    - 教育股
      - 民众教育馆
      - 在满日本小学一座
      - 国民优级学校三十三座
      - 国民学校一百六十三座
    - 烟政股
    - 国兵民籍股
    - 土木股
    - 劳务股
  - 3 财务科
    - 理财股
    - 征收股
  - 4 实业科
    - 经济股
    - 植产股——屠宰场一所
    - 农林股——采种园一座、苗圃一座
  - 5 地政科
    - 地政股
    - 登录股
  - 6 警务科
    - 特务股——特务系、特高系
    - 保安股——保安系、经济系
    - 司法股——司法系、搜查系
    - 警务股——警务系、庶务系
    - 警备队
    - 警察电话局
    - 警察官教习所
    - 警察署五处

县公署里的一些重要职位，均由日本人充任。日本人虽然

担当副县长、副科长等副职，但是他们确是全县的主宰。所谓“满系”（中国人）县长、科长与伪皇帝溥仪一样，都不过是傀儡而已。

警察是日伪政权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日伪极力强化警务系统。县警务科内共分4股、8系。其中特务股（两个系）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当地人民和伪官吏、公职人员的思想动向；侦缉中国地下工作人员；监察“特别要注意人”。监察宗教团体、集会结社；检查信件、出版物等等；至于劳工逃跑公报，流言通报，也统归特务股管理。保安股（两个系）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营业许可；管理鸦片麻药；统制粮谷；统制专卖品和商品；检举经济犯罪等。司法股（两个系）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刑事犯罪；审讯刑事案件；监察“刑事要视察人”等。警务股（两个系）的主要任务是：编制调动各警察署、警察所的人员；管理、发放枪支、弹药等。另外警务科还在县城建立了一些附属机构。

伪满初期，日伪为加强警察统治，曾把全县农村划分为10个警区，每个警区内，除设有1个警察署外，还设有若干个警察分驻所。1937年（伪康德4年）警区废除，警察署由17个减为7个，警察分驻所则由38个增加到44个。到了伪满后期，全县分别在辽中街、满都户、小北河、朱家房、小新民屯等大集镇地区设立了5个警察署；在街、村所在地设立了33个警察分驻所（每街村1个）和4个警察派出所。警察署内设有警务、司法、保安、特务、经济五系；警察所内则设有经济、特务、保安三类警察。

日伪时期的警察队伍极其庞大，全县从警士、警长、警尉补、警尉、警佐到警正，共有300余人。单是县警务科就配备三十多人。其中除警务科长1人（警正）外，每股有股长1人（警佐），股副1人（警尉），每系有系主任1人（警尉），系员二三

人（警尉补或警长）。警察署的人员配置，除署长1人（警佐）外，每系有系主任1人（警尉），系员2人（警尉补或警长）。警察分驻所、派出所置有所长1人（警尉补或警长），内、外勤警士若干人。

在县警务科内集结着精干的日本特务，铃木、龙波、林武雄等日本侵略分子，长期担任着警务股副和特务股长等要职，直接操持警政大权。而大部分“满系”警察官员，则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依附在日本侵略者的脚下，残害中国人民。如满都户地主，辽中县内的头号汉奸刘海澄（外号刘大瘸子），由于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率领县公安队镇压县南一带的抗日义勇军，而深受日本侵略者的赏识，被任命为县警察大队长。从此，他更加效忠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屠杀爱国志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23名靖安队青年战士（又称红袖头子队）哗变，携械出来寻找抗日队伍，参加抗日。当他们行至我县境内的辽河西岸（五里槽子村）时，刘海澄这个汉奸，用花言巧语骗取了他们的信任，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又骗到辽中县城向日本人请功，被日军用轻机枪扫射枪杀了，刘海澄唯恐不死，亲自挨个补枪。23名爱国者牺牲了，刘海澄却因此得到了日本侵略者奖赏，当上了警察局长。

日伪警察机构的性质和任务，虽然名义上是维护地方治安，实则是保障推行“日伪国策”，镇压人民反抗，维护日本侵略者残暴统治的机器。

日伪警察对人民群众的政治迫害是骇人听闻的，迫害的方式方法也是极其残暴的，如对“特别要注意人”，凡日本侵略者认为不够驯顺的而免职的伪官吏，或有一定学问、在地方上负有声望的人，以及所谓“思想不纯正”的人，均被列为“特别要注意人”的名单进行严密的监视，防其反满抗日。每个“特

别要注意人”要缴2寸免冠照片3张，填写“特别要注意人”登记表3份，由县警务科特务股掌握，报省警务厅备案，以便在外逃时，进行通缉。县特务股特高系外勤警察具体执行监视“特别要注意人”的任务。每月特高系外勤人员会同警察署特务系外勤人员到“特别要注意人”家里，视察两次。通过与“特别要注意人”直接谈话或其他方法了解“特别要注意人”的思想、行动。每次视察后，都要用口头或书面材料向特务股长（日本人）做直接报告。有时也给“特别要注意人”加上“尾刑”，即雇用地方上的流氓、烟鬼，对“特别要注意人”进行盯梢。“特别要注意人”如果外出时，必须向警察署报告，以防“不轨”。如果发生政治案件，当地的“特别要注意人”则首先要按“嫌疑犯”的罪名而被拘押、审讯。当时我县县城的张某、洪某，满都户的刘某，冷子堡的张某，卡力马的马某和朱家房的李某等人，都先后被列入所谓“特别要注意人”名单，长期遭受精神上的迫害。

“刑事要视察人”，凡因“刑事犯罪”刑满出狱的人，或被认为有刑事犯罪可能的人，均被列为“刑事要视察人”进行长期监视，以防危害所谓地方治安。每个“刑事要视察人”要缴2寸免冠照片3张，填“刑事要视察人”登记表3份，由警察署司法系和警察派出所掌握，报县警务科司法股备案。警察署司法系外勤人员具体负责监视“刑事要视察人”的任务，监视的方法与特高系外勤人员监视“特务要注意人”的方法相同。当时全县的“刑事要视察人”很多，每个警察署管内都不下七八名。

政治犯、思想犯和嫌疑犯。凡是进行反满抗日活动的人，或触犯伪政法令的人，一律加以政治犯的罪名而判刑或处死。对于虽未在行动上反满抗日或触犯伪政治法令，但如果口头上流

露出对日伪及其政策不满，也要加上思想犯的罪名，轻者受刑，重者被送进思想矫正院进行“思想矫正”。其实思想矫正院就是变了名的监狱。入院的要想出院是极不容易的。即或侥幸出院也因为遭受各种刑法，特别是电刑的矫正，变成了失去理智的废人。

嫌疑犯分成政治嫌疑犯和刑事嫌疑犯两类，又包罗多种多样的人，如刑事嫌疑犯中就有纵火嫌疑犯、盗窃嫌疑犯、抢劫嫌疑犯等。在一个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发生后，凡被认为与案情有关或有嫌疑的人，都要以嫌疑犯的罪名被逮捕刑讯。

日伪警察对所谓罪犯动用的刑法是极其狠毒残忍的。除用板子、竹剑毒打外，还有从口腔或鼻孔灌凉水、灌煤油、灌辣椒水，用子弹头挖肋条，用笔杆夹指头以及“挎筐”（详见后述）等等。

我县有许多无辜群众，甚至未成年的小学生，因为所谓嫌疑犯罪而遭到上述各种刑罚。其中有的成了残废，有的含冤自尽，也有的死于非刑。

1941年（伪康德8年）旧历八月上旬，伪辽中县协和会本部被烧，纵火者在房墙上贴了反满抗日标语，内容是：“焚禽兽之巢穴，勿忘祖国”，“打倒小日本”。这一政治案件发生后，县警务科特务股和辽中街警察署特务系的所有特务、警察，由特务股长（日本人）龙波亲自率领全员出动进行侦察。奉天宪兵队也派人前来协助破案。协和会失火当晚在会内值宿的职员柳春阁知道自己脱离不了关系而畏罪逃跑。于是县警务科特务股一面派人缉拿失踪者，一面将县城的“特别要注意人”张某和协和会会计宋某一起以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刑讯。在刑讯过程中，虽然使用了灌凉水、灌煤油、灌辣椒水等所有刑罚，也未得出口供。然而，一案未破，一案又起，事隔数日，在卡力马小学

附近黄姓的大门墙上，出现了同样内容的反满抗日标语："闹倒协和会，飞人走来"、"打倒小日本、勿忘祖国"。县警务科特务股和辽中街警察署以及卡力马警察所的所有警察又全员出动，到卡力马小学侦察。首先将卡力马全体学生都按倒在地，每人打了几屁股板子，企图让学生说出犯罪者，但打了一气毫无效果，就又对全体教师和较大的学生进行逐个审查，并把校长马龙媒和学生满庆龙等四五人带到县警务科特务股刑讯。几个十几岁的小学生被凉水、辣椒水灌得昏头胀脑，嚎啕大哭。他们自己的确没写反满抗日标语，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日伪警察看到无法从他们嘴里获得罪犯的姓名，只好把他们释放回家。校长马龙媒虽未受刑，但是，他却是主要的嫌疑罪犯。因此，日伪警察在把他放出后，立即给他加了一个"尾刑"。

1942年（伪康德9年）春，蒲河解冰以后，一具死尸浮了上来，经检查正是"协和会"成员柳春阁的尸体。于是柳被认定为纵火和写反满抗日标语的政治犯，由于"畏罪"，投河自杀。案件已破，留置场（监狱）里关押的嫌疑犯宋某才被无罪释放。卡力马小学校长马龙媒这时已因"教学失职"被降职为教员。虽然这样，日伪警察特务仍不放过对他的监视。后来，马龙媒借特高系主任乔长有娶弟妇的机会，卖掉三垧三亩地，以伪币600元的全部地价，到乔长有家上了礼，才算甩掉"尾刑"。

1939年6月，朱家房子警察署管内戴家房子地主陈荫萱家被抢。朱家房警察署得讯后，出动了大批警察，对戴家房子村民进行了野蛮的搜查。结果毫无所得。嗣后，于家房警察分所把一个在集市上卖饭勺的小商贩郝某，当做嫌疑犯送到朱家房警察署。于是朱家房警察署长王奠恩亲自指挥司法系警尉补李成仁等进行严刑拷问，除用竹剑、木板毒打外，还施以灌煤油、灌辣椒水，用钢笔杆夹手指，用子弹头挖肋条等种种酷刑，致

使郝某多次死去活来，头发根渗血。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审讯中警察竟惨无人道地使用了所谓“挎筐”刑，将郝的手脚象绑猪一样绑到一起，用木棒穿过郝的胳肢窝，再将木棒两头担在办公桌上，然后李成仁等3人从早晨8点钟开始轮番悠郝达4个小时之久。结果郝被悠得胳肢窝皮破肉飞，骨头都露出来。待李等罢手不悠的时候，他已是牙关紧闭，双眼不睁，奄奄一息了，入夜就被埋进了乱坟岗子。当他咽气前的一刹那，他的右食指被牢牢地按在一张早已写好的假供词上。次日这张假供词连同医生的一张“患脑脊髓膜炎而死”的假验尸证明，一起被报到县警务科司法股，完结了陈荫萱被抢一案。郝某含冤死去了，他远在沈阳家里的父母、妻子却不知道他的下落。

日伪警察特务除对我无辜群众多方迫害外，还积极为日寇抓劳工、抓国兵，搜捕我地工人员。汉奸分子李成仁在县警务科警务股任职期间，曾多次押送劳工到指定地点，其中在1941年6月间，往黑河押送劳工途中，与日本鬼子一起开枪打死了跳火车逃跑的青年劳工谢玉福（茨榆坨人）。李在特务股特高系任职期间，曾在县城东门外抓捕了4名从本溪煤矿逃出的所谓“特殊矿工”，经李亲自审讯后，又送回本溪煤矿。实际这4名“特殊矿工”本是我关内的抗日游击队员，在战斗中被日寇俘虏后，编为“特殊矿工”强迫在本溪煤矿从事非人劳动的。

这个丧心病狂的汉奸分子李成仁，由于积极地效忠日本侵略者，所以在一年之中就受到三枚“精勤章”的奖赏。

日寇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除通过警察特务、汉奸走狗对我县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外，还于1935年（伪康德2年）下令开展了一个“铳器回收运动”（即收缴民间武器）。目的在收缴民间武器，解除反抗之患。当年秋，辽中县警务科奉令后，立即组织一个20余人的刑事搜查队，到朱家房、老达房、满都户

等重点地区，大搞“铳器回收”。枪支弹药无不收尽，甚至连一些铁筒、铁管也在收缴之列。在“铳器回收”中，警察特务借机敲诈勒索，翻箱倒柜，大发横财，使许多群众遭受一场空前的灾难，有的被打，有的被罚，有的甚至由于被认为私藏军火而不得不破产行贿，求情保命。

农村的街村公所是日伪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日伪政权在辽中建立之初，基层政权仍沿用旧的区村制度。1936年（伪康德3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为加紧对农村的统治，而制定了“街村制”。经调整以后，全县共划定一街32村。街、村公所内各设街、村长1人，主管村政，又各设副街长、村助理1人，辅佐街、村长掌管村政。下分庶务股置股长1人，吏员1人，掌握文书、备品、会议等事务。财会股置股长1人，司计1人，掌管全村预、决算及国、县、村税的征收事务。动员股置股长1人，吏员1人，负责国兵征募、劳工调派及督催粮谷出荷和物资献纳（强行征集物资）等事务。实业股置股长1人，技术员1人，专管棉麻栽种及督催棉、麻缴送事宜。

街村以下分屯，设屯长1人，屯下分牌，每牌十家，“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就是日寇精心策划的严密的农村统治网。

街村公所的任务主要是要钱、要粮、要人（国兵、劳工）和推行经济物资统制政策。在各个街村中，还有一个与街村公所平行的组织，“物资配给委员会”负责掌握专卖品、商品的配给事宜（商品的限量供给）。

关于街、村长的人选，首先由各地的警察署长物色。被物色的人物多系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铁杆汉奸。如腰屯村长赵经武即系此流。赵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善于逢迎交际。他当上村长以后，立即翻修房舍，装饰门面，勒令村民修路，植树于路旁，以壮观瞻。开始就给日伪官员一个

“能干”的印象。他在招待日伪官员上，做的更为出色。备有整洁的房舍、专用的行李，还选用上好厨师，做出丰盛的饮食，以供俸其主子。赵又经常到县长、科长家里送礼，大米、白面、鱼、肉、蛋、瓜、菜等无不送到。他对日伪翻译和靠近日本人的一些人也竭力奉承，拉拢关系。不仅如此，他还破例地请了一个日本人“村政指导官”，常驻腰屯村（其他村都没有日本人“村政指导官”），以表示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忠诚和有利于对人民的统治。由于赵甘心认贼作父，很快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有力爪牙。并由于他能够完全听命日本侵略者的旨意，积极进行抓丁拉夫，强迫群众出粮等罪恶活动，因而第一个被命名为“模范村长”，腰屯村也成了所谓“自兴村”（即模范村）。

日本侵略者为加紧对东北地区的掠夺，根据所谓“国家总动员法”不断地强征劳工，把大批青壮年劳动力送往矿山，为其开采煤铁等各种矿藏，从事非人的劳动。在日本侵略者统治的14年里，从我县要去的劳工，已无从计算。但据伪《奉天省政史》所载，仅1940年（伪康德7年）和1942年（伪康德9年）两年三次，就要去3 629名。其中单是1942年一次就达2 545名。其实每年并不止要一两次。

当时“模范村长”赵经武所管辖的腰屯“自兴村”，是全县出劳工较多的村子。仅在1941年（伪康德8年）至1945年（伪康德12年）的5年间，就出劳工八百三十多人次，占青壮年总数的60%以上。

赵经武这个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卒，不仅遵照主子的旨意，按时如数的完成劳工“割当量”（日语，即担当数），还于1945年在“割当量”之外奉送了200名，并亲自押解到本溪煤铁公司。赵在要劳工方面所表现的“卓越”才能，深受日本侵略者的赏识。日本侵略者为表彰他的“特殊贡献”，一次就奖给他伪币二

百多元，还有大米、白面、奖状等。然而被赵送去当劳工的苦难同胞，却日以继夜地做苦役，干重活、吃橡子面，终日不得温饱。前后因饥饿劳累和得传染病而死亡，有据可查的就有15名之多。其中在最后奉送的200人中就死了7名。腰屯村如此，其他32街村也不例外。

伪满末期，大帮牛村的刘凤柱，曾一连出了四次劳工。1944年（伪康德11年）夏季某夜，刘凤柱刚躺在炕上，就被伪保长王锡山等日伪爪牙五花大绑地拖出了家门，用大车拉到腰屯，推入“防空洞”里，里边是腰屯村等12个村屯抓来的劳工。在“防空洞”黑暗的一角，几个狗腿子正在拷打审问一群妇女。因为她们放走了自己的亲人，有碍赵经武的“劳工完遂”（完成抓劳工任务）。

第二天用卡车一直把他们送到铧子煤矿。在铧子煤矿的劳工们，住在黑暗的工棚里，吃的是苦涩的橡子面。山上山下总是不断地往外抬死人。其中有许多还没咽气的劳工也被扔入山沟或扔到狼狗圈里。

刘凤柱心想再不能呆下去了，死亡的命运不定哪天会临到自己的头上，于是他决定逃跑。一天夜里他乘岗哨打盹的机会，逃出了矿山，不分昼夜直奔家乡，饿了就在大地里采些野菜充饥，走了两天两夜，跑回了自己的家。

过了几天，这件事被地主金德才知道了，于是金德才就和伪村公所串通，花了几个钱，把自己摊上的劳工又给刘凤柱安上了。在那不分曲直的社会，他只好又去南芬铁矿当劳工。就这样他一共当了四次劳工。由于过分劳累，他骨瘦如柴，老婆孩子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腰荒地的武春付（贫农）哥三个，一起被抓到铁山当劳工，而回来时只有他自己，两个哥哥则装成两箱骨灰运回家中。

大帮牛村的赵维才（贫农），在伪满末期当劳工中，因不堪日伪的折磨逃跑了。然而他的父亲却因此被活活折磨死了，妻子被日伪狗腿子强奸后，也得病而死，他的孩子，因没人照料，也没有剩下。

二道岗子王凤阁在本溪当劳工时，一时不慎，身子被绞进机器之中，当即首身异处，家里闻讯后，母亲、儿子因过分忧伤病死，妻子成了疯癫的废人。

伪满时期有很多无辜百姓、大批农民，由于残酷的劳工法压在他们的头上，造成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这种悲惨遭遇是一言难尽，不胜枚举的。

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向中国南方进军和扩大太平洋战争，而在东北地区无止境地抓兵拉夫，充当炮灰。1940年4月1日又颁布了所谓“国兵法”，规定年满18周岁到23周岁的青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这是伪满头等重要的国策。因为它是完遂大东亚圣战（完成东南亚侵略计划）的物资基础，没有炮灰就没法占领殖民地。因此所有的日伪官吏、警察，个个都必须忠实执行抓兵这一政策。

1942年3月开始从我县征集第一期“国兵”，以后的4年里从我县征去的“国兵”数，已无法考察，其实凡在国兵年龄的青年男子，除少数官僚地富子弟外，很少能够逃脱。

在那黑暗的年月里，母亲担心儿子，妻子担心丈夫，不知什么时候被抓走。为躲避国兵，许多青年不能和家人团聚，根本谈不到和乐的家庭生活。

日伪大量抓兵拉夫和无止境的掠夺和搜刮，使广大贫苦农民家破人亡，饥寒交迫，有的逃荒外地，远离家乡。如当时仅五十几户的郑家屯就有6户逃荒到江北，有的被迫自缢或被关在监狱。所以当时流传一句歌谣：“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上

吊、坐监牢”。逼人走上这几条道路的凶犯，就是遍布全县各地的街村公所的伪官吏和警察特务，他们常年压在人民头上，除了征兵要粮就是抓劳工，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百姓对他们深恶痛绝，但迫于敌伪势力，敢怒不敢言。1945 年东北光复后第一个春节，在一家普通农民的大门上贴了一幅对联："村分所协日殃民十家九害莫此为甚，特务警栽赃敲诈一案百冤谁敢奈何”。彻底揭露了日伪村政官吏、警察特务的滔天罪行，抒发了全县人民反满抗日的愤怒情绪。

随着“七·七”抗战的爆发，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尤其感到劳动力不足，如国防建设、农业生产、重工业建设、资源开发等都缺少劳动力。所以日伪又于1942 年11 月18 日颁布了所谓“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年满22 岁的青年有“国民勤劳奉公义务”。其实凡是未检查上“国兵”的人，不管多大年龄都要被编为“勤劳奉仕队”(群众称之为“国兵漏”)到工厂、矿山尽义务劳动。人们一到勤劳奉仕队除练习下操打仗外，主要是从事修筑工程、开采矿山、修哈大道，实质上他们就是服劳役的劳工。

日伪时期设有“日满协和会”，这个组织是日本侵略者的反动宣传机构，直接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领导。它是鉴于日本侵略者力图“长治久安”，除军事屠杀、警宪镇压、政治胁迫之外，以思想麻痹手段缓和民族矛盾而建立的。因此，它是日伪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说客”。当时我县也有这一组织，县一级叫日满协和会辽中县本部，直接受省协和会领导。正副县长兼本部长。事务长一人，由日本人专任。初期只有本部员一两人，嘱托一两人，雇员若干人，后来增设了指导、庶务、青少年等科。

在33 个街村中均设有日满协和会街村分会。由街村长任会

长，置雇员若干人。

协和会会员资格。凡年满20岁以上的男子均可加入，但必须是“思想纯正”者。所谓“思想纯正”就是没有反满抗日思想。

按照协和会组织纲要的说法，“协和会是唯一永久、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和政府（伪政权）是表里一体的”。其任务有五，即：“宣扬建国精神；实现民族协和；向上反映国民生活；彻底宣德达情；完成国民动员”。究其实质，就是日伪政府的传声筒。所以当时就有民谣说：“政府放个屁，协和会唱台戏”；“前边走着讨伐队，后边跟着协和会”。然而日伪当局对它却赞扬备至，说它是“宣德达情”的好机构。所说的宣德是什么呢？无非是日本侵略者所谓的“国策”、“圣战”（日本侵略者把野心吞并亚洲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叫“圣战”）、“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亲邻友好”等一些谎言谬论，用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消磨人民的抗战意志。在日伪政府要劳工时，它就宣传当劳工如何好，说什么有“劳工改善提案”，又挣钱，生活又高。腰屯村协和会分会向群众宣传这一套的时候，一个当过劳工的老农说：“改善，改善，都是欺骗，谁若相信，谁是混蛋”，可见人民群众已看透敌人的阴谋了。在要国兵时，它又宣传当国兵是每个国民的“义务”，是“完遂圣战”（完成侵略战争）应尽的责任。在征收出荷粮（强制征集粮谷、棉麻等）时，则宣传为保证“完遂大东亚圣战”，百姓尽量多缴纳粮食，为国尽责。这就是协和会自命的“宣德”。所以总起来说，日本侵略者是利用这个所谓表里一体的协和制度内外夹攻，推行“国策”，使人民在他们所提倡的“一德一心”等口号下，无条件的顺应着“国策”而已。“国策”者何？简言之就是要人、要粮、要税，要东北人民服服贴贴地当亡国奴。因此当时人民群众一

致称“协和会”为“协和坏”。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我县的14年中，就是通过上述一系列反动组织和途径，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进行政治上的统治和镇压。

（摘自《辽中县文史资料》）

伪满郭尔罗斯后旗公署的组织机构及行政管理

赵 衷

1941年春，我被伪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公署录用为职员（我是从农民训练所毕业），分配到内务科征收股当雇员的。

当时，伪旗公署内设有3个科，即是总务科、内务科和警务科。因为原来的办公大楼，在东北抗日联军攻克肇源城时上层被焚毁，底层经维修便成3个科的办公室。

总务科：内设3个股。庶务股主管人事、宣传、机关工作等；文书股主管文件收发、打印，档案保管及印鉴等；经理股主管全旗预决算、备品购置、发放，工资、奖金等业务。科长桑春因涉嫌于抗联，当年被调往热河省青龙县。

内务科：内设实业、教育、行政、土木、地政、征收6个股。科长格增久是超等村的蒙古地主，年过半百，高身材，为人和善、没脾气，是个“牌位”，实权都在各股长手中。

警务科：内设警务、保安、特务3个股。科长张鹏第无论从白胖的高身材或气质上看，都是个典型的旧官僚形象。

各科在当时只有1名科长，尚未安插日本科附。

从1943年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侵略者为适应“非常时期”需要，将伪旗公署的机构进行了充实和改组，把原来的3个科改组为1室7科，根据个人记忆，分述如下：

一、改组后的机构设置及主要人员

伪旗长达瓦年近花甲，傻大黑粗，不识汉字，说汉话困难，鸦片烟瘾很大，在日本人面前纯系傀儡，对蒙汉同胞却十分蛮横。日本参事官儿西崇，是个面色青白、从无笑容的高身材中年男子。在伪旗长和参事官为首的旗公署内下设机构为：

（一）审议室：是全旗行政的决策机关，乃日本人进行统治的核心。各种上报下达文件只要有审议室主査盖章，参事官即可放心盖章批准，旗长自然不在话下。审议室主査是日本人，名森乡里，也是个“万年不乐”脸孔，为人阴险、狠毒，很难办事，室内还有两三名蒙汉族职员。审议室附设一个无线电室，专供日本人收听情报用，中国人不许沾边。

（二）总务科：属各科之首，下设庶务、文书、经理3股，全科共二十五六人。科长讷木克琪（包浚明）蒙古人，曾留学于日本，是个近视眼，经常戴眼镜，在日本人面前常为蒙汉族受凌辱职员解围。科附佐藤是日本人，因身材高被称为“大佐藤”，性格粗野暴躁，外号“傻柱子”。兼职科附渡边，日本人，身材黑壮，少言寡语。

（三）行政科：下设5个股。即街村股、动员股（曾名劳工役股）、土木股、国兵民籍股、烟务股（曾名保健股），全科约20余人。科长杨维新，铁青脸中等身材，是日本人忠实走狗，因他为人吝啬、语言刻薄又甚狡猾，群众送号“损贼司令”，曾为虎作伥、打骂科内职员。科附佐藤（为区别于大佐藤，都叫他

“小佐藤”)，性格阴险凶残，对职员苛刻。

（四）开拓科：下设6个股，有开拓股、农业股、林业股、水产股、畜产股、工商股，全科约40余人，为推行日本人的殖民政策，在西部各村大力掠夺民田，建设所谓，“农造地”，因此，开拓股的编制为最大，人员多达十几名。科长前任是渡岛喜佐时为日本人，长条个儿、性格内向。后任为孟和巴雅尔（韩维民）蒙古族，伪大学毕业，通晓日语，不苟言笑。科附由开拓股长白尾兼任，这个状似黑熊的中年日本人，性格十分暴戾，经常打骂蒙汉职员，一次酒醉后，曾要全科职员在室内排成一行，从头至尾挨个儿打耳光子，称为“配给嘴巴”。

（五）地政科：内设地政股和登录股。全科共有职员十五六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呼兰、巴彦、双城、宾县等地。科长鬼仓泽彦，黑瘦大胡茬戴眼镜，他与其他科很少接触。

（六）财务科：内设征收、理财两个股。征收股内包括全旗16个街村的一二名财务驻在员，共有职员30名。但在春秋两季收渔税和整理土地台帐时，还要招考临时雇员十几名。科长刘鹏举是四方山下大地主刘子阳的侄子，曾任肇源街长，是个有名的“老太太官”。科附渡边兼任总务科附。

（七）文教科：科内两个股，即学务股、礼教股，全科10人左右。另有蒙民厚生会蒙古职员2名，在科内与礼教股合属办公。前任科长为孟和巴雅尔（后任开拓科长），后任科长博彦朝克（何辑五）为人宽厚，不多言语，任职期间很短。科附由实验校主事吉田麻治（日本人）兼任。

（八）警务科：设股仍与1943年前相同，只是人员编制较前大为增多，由原来十几人，增至20余人。警务科长为警正，各股长为警佐，其他成员均为警长以上的警尉补和警尉。1943年后的前任警务科长陈鼎彝只有三十来岁，是个白面书生形象，日

语水平很高，他的姐姐是财务科长刘鹏举续弦妻子。后任警务科长关奇绶，形若胖猪，凌辱群众为其能事，在催缴“出荷粮”时，他对贫苦农民随意打骂。1943年因应征国兵与修堤民工去东门外天亨久烧锅抢购白酒，他亲自制造了一场冤案，上报谎称知识分子乘新兵入伍之机发起了反满抗日暴动，并将即要入伍的两名小学教师杨崇秀（头台人）、高鸣楼（茂兴人）做为罪魁祸首逮捕入狱，判刑后，高死于狱中，杨坐 牢至光复。1944年肇源发生全城大火以后，关对受灾居民大讲因果报应，引起灾户公愤。

二、伪旗公署的官吏等级及其职称

伪旗公署的旗长、总务科长、警务科长、开拓科长为荐任三等官，参事官为事务官，其他科长均为委任官（属官），股长有属官也有委任官试补。没有任官的职员1943年前有吏员、雇员之分，后则改称：事务员（吏员）、事务员补、雇员、临时雇员四等。事务员除极优秀者外，不能任股长，全旗公署事务员任股长的只有国兵民籍股的王松林和理财股的李树藩2人。此外，开拓科各股有技术职称，即技士、技术员（相当于事务员）、技术员补（相当于事务员补）。文教科学务股有教育职称，即甲种教谕（相当于委任官）、乙种教谕（相当于委任官试补）、教导（相当于事务员），科内也有事务员、事务员补，但没教辅（一般小学教师）。

伪旗公署除职员外，还有一名博役（勤杂工）各种待遇与职员相同。

三、伪旗公署职员的录用与薪俸（工资）制度

日伪录用职员有三种渠道：一是职业学校毕业分配，如农

民训练所的学生自1937年至1940年的四期毕业生共120余人大都分配到旗公署各科、兴农合作社和各村公所去当职员；二是考试，择优录用（多为录做临时雇员，工作称职再转正），条件注重文化水平、健康状况两项。1938年招考职员竟采取要考生从旗公署门前同时跑向码头，在码头设专人发准考证，领证后再跑回来，超出规定时间的不准入考场。三是学校（如国民高等毕业的）或个人推荐。录为财会人员的，要有一家商号出具保条，以防携款潜逃。新录用的职员起薪最初是20元，1943年后增到34元。正常提薪是每一季度增加2元，但病事假或迟到超过三次的，或工作上有明显误差、漏洞或有贪占被查出者不予增薪。在每月的基本工资以外，另有家属津贴，按义务抚养的人数，每口人每月在薪俸内多加1元。出生、娶入的当月就加发，死亡嫁出的当月就扣出。此外，还有"语学津贴"，凡是在职考上一、二、三等日语翻译的，按等所规定标准，纳入工资，逐月发给。一般雇员、事务员补、事务员参加任官考试。考上"属官"或"试补"的，将原工资改按任官待遇标准发给。薪俸领取除警务科有人专管自发外；其他各科一律于每月8日到总务科经理股领取当月的"俸给"。年末奖金是固定额，人人有份。

四、对伪职员的考勤

总务科庶务股专设一人负责考勤，每天上班前摆出签到簿，以加盖本人名章为有效。上班铃响便锁起来，然后由主管人查明未签到的原因，在签到簿的当日格内加盖"迟到"、"事假"、"病假"、"缺席"的蓝色长方印章。对公出人员要由本科股长事先报给庶务股主管考勤者，按日盖上"公出"红色印章。除签到簿外，庶务股还挂着一块钉有各科职员名牌的大黑板，每天

午后下班前，主管考勤的把名牌全翻过背面，早上签完到的人，要把自己的名牌翻过来。为了查勤方便，每个职员的办公桌抽屉旁也钉着一个名牌，日本人在抽查时，随时按名牌打听此人下落。凡全年签到簿上满堂红，没有一个蓝色印章的，年末发给薪俸5%的“精勤奖”金。

五、伪旗职员的工作制度

每日早8点上班铃响以后，各科职员立即到正厅前装有伪满皇帝“御影”诏书的水泥建筑物前列队（每科一行），升伪国旗，唱伪国歌，向阵亡的侵略者默祷，然后作早操。操后，参事官、审议室主查或总务科长、科附有要讲的话或通知、要求等就在队前讲出，没有讲的就解散。回到各科以后，职员轮流用日语领读一遍《国民训》，读后，坐下来按统一发下的64开小黄本《日用日语官署会话》默读一小时，才开始处理业务。

伪旗公署值宿每夜3个人，1名代班股长、1名职员、1名夫役，住在电话室的小炕上，有值宿记事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规定职员有“非常召集”制度。即是夜间听到警报机一响，立即打上腿绷，戴上脑后钉有3片宽布条的战斗帽，跑步到总务科集合。其实，多是训练演习，只有一次因康生院囚禁的上百名鸦片瘾者逃跑，召集职员分头在城内搜查到过半夜，一个也没抓到。

伪旗公署各科职员分工明确，各负专责。一般是按上级指示办事，旗内不独立制订规章制度或开创什么事业，也没有会议。要办的事形成文件，格式千篇一律，即“首提之件关于……等因奉此”，拟稿后，用写有“仰裁决”三字的厚纸夹逐级送阅，加盖名章。即：经手人、系主任、股长、科附、科长、总务科附、科长、审议室主查、参事官、旗长，这些格内名章盖齐了

才能办理。所以当时有个老职员春节写副对联是："首提之件辞旧岁，等因奉此过新年"。

对伪职员要求最严的是对日本语的学习。自1943年开始，在职员中推行"义务语学"考试制度，平日自学，每年举行一次统一考试，由日本参事官亲自主考和口试，成绩报伪国务院。考试合格的由伪满洲国出版的月刊《政府公报》公布，连续考3年仍不合格的，即予"免职"（日本人称开除公职为免职）。

日本人对伪职员的礼貌要求也很严格。送文件到科长以上的写字台前批阅时，要先将文件夹放在待批的文件木格上，然后退回一步行鞠躬礼。曾有的职员自以为是日本科附的"大红人"，送文件不行礼，贴到近前，嬉皮笑脸催着快批，竟被当众左右开弓扇了几个耳光。每天早晨见到参事官、主查、科附，在外行举手礼，屋内脱帽鞠躬，并用日语说："哎哈哟勾匝依吗嘶"（早安），一般同事见面打招呼则只说：呕哟嘶"（"早安"的简称）。

伪旗公署各科股均无权使用一角一分钱的经费，备品及办公用品均由总务科经理股统一购置、保管，需用时报表经本科及总务科长审批后才能发给。

六、伪旗职员的生活状况

伪职员的服装冬夏一律穿草绿或"国黄"色协和服（样式为翻领暗扣，四个明兜，背后一道横梁，后背及大小衣兜均有个折褶），富裕者用毛料制成，贫困的用黄棉布做。不属于"官公吏"的人，即使是富商、绅士、区划长也不许穿协和服。1943年后，无论大小官吏、日本人或中国人一律剃光头。伪旗公署的职员除旗长与日本人住公建的"官舍"外，其他人都是自建或租房住。单身职员几人同租一间民房作宿舍，自雇人做饭吃。

旗长和日本人住的官舍租金很高，由经理股按月从薪俸里扣，财务科征收股逐月到总务科和警务科提取官舍房租（绝无拖欠者，因欠房租罚款额很高）。对上级来人，省公署除厅级以上官员由总务科安排到街内大商号食宿外，其他人的食宿均自行安排。旗公署预算必须严格执行，预算外开支均为非法，无处核销。各科职员待遇标准均一致，毫无特殊。

职员去省或下乡“出张”一律坐“东亚公司”的公共汽车或大车，旗长有一辆四轮单马车。参事官去省里有专车接，旗长坐班车或轮船。下乡人员按“出张费”标准到总务科经理股报销，但必须有本科的股长、科长盖章。“出张”虽有补助，但职员到各村去，均由村公所给安排到当地商号或烧锅食宿，不必花钱。到各屯去，吃住在区划长、大财主家，也不用给钱。

1943年后，由于“圣战”告急，各种物资奇缺，伪政府给职员特殊照顾，不定期以配给形式卖给棉布或更生布、毛巾、袜子、手套、麻丝衫裤等。有时，一个科只配给铁锅、粗毛呢等四五只（块），职员们只得以抓阄形式决定给谁。每月定期供应的是香烟，诸如“大前门”、“华道”、“金砖”、“哈德门”等皆为市场抢购的高级烟。街上烟贩子与伪职员各有挂钩对象，配给烟下来，立即按议价标准转手给商贩，获利额超过一般职员的月薪，成为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

从总的情况看，靠薪俸过活的伪旗公署职员，经济状况拮据，因此，当时贪污、受贿成风，日本人根本无法发现。警察下乡抓“经济犯”、“思想犯”，“勒大脖子”自不必说。一般职员下乡催出荷粮、划开拓地、发放“鸦片吸食证”、“国民手帐”、财务滞纳班回收陈欠、缴收渔捐、马税、换车船牌照、征集劳工、勤劳奉仕队以及教育寒暑假办讲习班、统做操衣（校服）等，都给一些人造成了贪污受贿的可乘之机。

七、伪职员的概况及思想面貌

从年龄上看，40 岁以上的占 25%，而其中财务科则占 85%，被称为“老头科”。30 岁以上的占 45%，18 岁以上的占 30%。从文化程度上看，大学程度占 2%强，中学占 35%，小学占 63%。从官级看，高等官占 2%，委任官（包括试补、教谕、警长以上的）占 23%，事务员（包括技术员）占 6%，事务员补（包括技术员补）占 24%，雇员占 30%，临时雇员占 10%。从国籍、民族上看，日本人占 11%，蒙古族占 13%，满族占 2%，朝鲜族占 1%，汉人占 73%。从性别看，旗公署共有女职员 11 人，即：审议室 1 人，总务科 5 人，开拓科 3 人，行政科、地政科各 1 人，占总人数的 5%。

就伪旗公署职员思想情况看，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甘做亡国奴，死心塌地为虎作伥，对日本人奴颜婢膝，年龄一般在 30 岁以下，委任官试补以上居多；警察、特务和金、阜州人占的比例最大，此类人占职员 30%。

（二）无是无非、醉生梦死，有奶便是娘，吊儿郎当混，有暇时，热衷于谈麻将或发家致富生意经乃至色情下流事，绝不谈论国事政局，这类约占 25%。

（三）身在曹营心在汉，当职员只为谋生，心中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对时局最关心。1945 年伊始，《滨江日报》每日登载的“轴心国”与“反轴心国”的战况，已成为这些人每天最关切的事。他们约占总人数 45%左右。

因时过 40 余年，追忆难免误漏，望当事、知情者予以补正。

（摘自《肇源文史资料》第一辑）

伪舒兰县公署的机构组织情况

黄景林口述

黎士杰整理

伪满舒兰县公署的组织机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统治需要，历经了几次变化。我是1937年（伪满康德4年）到伪舒兰县公署做事的。当时，县公署是在老县城（现在的朝阳镇）。伪舒兰县公署的机构设置是1个科3个局，科、局以下设股。

庶务科：下设庶务股、经理股、文书股。

内务局：下设行政股、街村股、教育股、土地股、土木股、实业股、义仓。

财务局：下设理财股、征收股。

警务局：下设警务股、特务股、司法股、兵事员室。

1937年（伪满康德4年）以后，伪县公署内机构，把局改称科，又增设两个科，共6个科，科下仍设股。庶务科和财务科设的股同前；警务局改称科，除把司法股改为保安股外，又增设警防股；原内务局改名为行政科，除原设的股外，又增设动员股、烟务股，还把原街村股改名为地方股；把原内务局的实业股撤销，增设开拓科，下设开拓股、农产股、畜牧股、林业股；还增设经济科，下设经济股、工商股。

1940年（伪满康德7年）7月初，县公署由老县城迁至四家房（现在的舒兰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处于垂死挣扎阶段，伪县公署机构变化较大。警务科增设了无线电室，原行政科的动员股分出扩大为动员科，土地股也分出扩大为地政科，开拓科的林业股也分出扩大为林政科。县公署内设科已

达9个，一直到日寇投降。

另外，县内还设有协和会的组织系统，县有协和会本部（原址在现舒兰镇人民大路北，二商店东侧），在各村设有分会。它不仅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思想统治，而且还广泛参与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掠夺活动。县内还设有兴农合作社（原址在现舒兰镇建设路北，县医院东侧，即文化宫位置）。它是从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对农村和农民实行掠夺政策的机构。自从1937年12月把县日本参事官改名为副县长之后，逐步兼任了这两个日伪机构的头目。从1941年（伪满康德8年）起，推行地方行政总合化对策，采取了“三位一体制”，即县公署、协和会和兴农合作社等3个日伪机构，由日本副县长统一掌管。

伪舒兰县公署的人员编制是正、副县长2人，各科设科长1人，科下各股设股长1人，有的科、股设有日系科附、股附，余为科员。全县公署总计人员，初期约有八九十人，到后期多达200人左右。日寇为把我国东北变成永久的殖民地，在伪县公署的机构组织中采取了一些统治措施和毒害中国人民之策。仅举几例说明：

日人统治政权

在人员的安排上，正、副县长中安排日人为副县长（原名参事官），一切大政由日人副县长决策，实际权力居于正县长之上。在各个要害的科、股中都安排日本人掌握大权。庶务科和开拓科的科长都安排了日本人，以掌握全县公署和全县日本开拓团的大权。动员科是向全县要劳工、征国兵，直接为日本侵略战争供给劳役和兵役的部门，设日人科附，各股都设日人股附。这个股附的实权，在重大问题上要大于中国人的股长甚至科长（伪满时，把中国人都称作满洲国人，谁要说是中国人，谁

就是反满抗日，是政治犯)。庶务科的经理股是负责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的财权部门，除中国人任股长外，还设有日本经理官，名叫宫川峰绿，一切开支，必须经他一人签字盖章核准，其他任何人即或是经理股股长也无权。警务科是分管全县治安、镇压反满抗日活动的地方警务部门，这个科也设有日人科附（又名首席指导官)，各股也安排了日人股附（又名指导官)。这个指导官权力很大，中国人股长也要听他的摆布，他有权管教中国人的上级警官。警务科的兵事员室和无线电室都是军事的重要机关，故由科附直接管辖。警务科的人员都有警衔，按1943年7月的规定，最低的警衔是警士，往上是警长、警尉、监督警尉、警佐（股长级、署长级)、警正（科长级）等，阶级服从，一级压一级。经济科的经济股是负责全县物资管制与配给的部门。控制这个部门，对日寇掠夺中国物资有着重要作用。日寇调用了台湾籍的卢有用任经济股的股长。当时卢很有权势，他妻子叫×慈爱，在舒兰二道街北头（即现在舒兰镇民政街舒郊乡招待所的地址）开办慈爱医院。总之，扶植伪满政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做贼心虚，唯恐有失，所以对一些要害部门都安插上日本人和亲日的中国人把持，伪政府实为日本的傀儡政府。

政府是傀儡，人民则成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奴隶，任其蹂躏。据伪舒兰县警务科的王建勋介绍其亲身经历时说：1943年（伪满康德10年）8月，警务科科附鲇川茂（日人），为解决其私人朋友（日人）在黑河某地包工需要的劳力，随意下令，在一天夜里在舒兰街大肆搜捕所谓“浮浪者”，由夜间2时开始至早7时，共抓了三百多人。后来经我（王建勋）和邢警尉负责甄别，有一百三十多穷苦百姓找不到保人，得不到释放，而交给了他朋友派来的一个朝鲜人，被全部押送到黑河工地，送给鲇

川茂的朋友当劳工了。

实行文官令

为诱使在伪满政权机关做事的人积极效忠于日伪统治，与日本“一德一心”，于1939年（伪满康德6年）6月1日开始，实行文官令，在职员中定官衔。最低是佣员，往上依次是雇员、吏员、委任官试补、委任官（又名属官，系股长级）、荐任官（分三等：三等和二等荐任官是科长级、一等荐任官系县长级）、简任官（分三等、二等、一等，多是在省和中央机关）等。定期组织考核，合格者可上升官衔，发给委任状，提一级工薪，就有高于下一级的地位。开拓科张亨元是三等荐任官，伪满建国大学毕业，精通日语。有一次，庶务科日人中岛找张给当一次翻译，张不答应，两人用日语吵起嘴仗来。在县公署的走廊里，张被骂激怒，举手就打了中岛一个耳光子，中岛反击，两人撕倒在地，滚打起来，惊动各办公室的人，出来给拉开了。此事轰动整个县公署，后经县长解决，因张是荐 任官，大于委任官中岛而了事。

散布鸦片之毒

早在18世纪初，英帝国主义者为毒害中国人民，大量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被我民族英雄林则徐烧毁，为扫除中华民族之毒害，立了大功。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之后，也继用了英帝之策，于1932年11月30日公布了《鸦片法》，1933年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下设专卖署和分署，还设立了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机构进行鸦片交易，低价收购，高价售于瘾者，用以搜刮和毒害中国人民。1940年，在各省、市设烟政科，并将原各地管烟所改为官营。伪

舒兰县行政科内设有烟务股，下面各村都有管烟所（俗称大烟馆），使一些中国人中了烟瘾，走上了害身之路。苗有方曾在舒兰警察署当过卫生警察，管过鸦片瘾者的登记和发证工作。瘾者有了证就可以凭证到管烟所买取和吸食大烟（鸦片）。据他介绍："县行政科烟务股的股长是日本人，由他掌管鸦片的进入、包装小包（每一小包为一份，每份1.25瓦）和向各管烟所的发售等工作。"1939年（伪满康德6年），仅舒兰警察署管辖的4个管烟所（朝阳街一、二管烟所，四家房和天德管烟所）就有鸦片瘾者五百多人，以后还逐年增加。这4个管烟所，每天售出鸦片一千五百多份。另外，在二道河（现吉舒镇）、棒棰沟（现东富）和四家房（现舒兰镇）等地，还有日本权威者默许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开办的小当铺，秘密卖鸦片和吗啡。对无钱的瘾者，可用物低价抵押，三天还不上钱，抵押物就归当铺高价出售，从中渔利，毒害人民。每年严冬季节，都有些鸦片瘾者，身披破烂衣、破麻袋死于街头或破庙中。每年都发生十起八起。社会上为吸食鸦片的人送了这样一句话："吸食大烟好不了，穷的快、死的早，临死抬着最轻巧"。真是一箭双雕，既榨取人民的财富，又毒害人民的健康。中上了大烟瘾的人，多是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伪满小城街朴永祥，因吸大烟而把家的一切物品，出卖净光，又把妻子儿女卖了出去，只剩下枯瘦如柴光棍一人，行窃作案，走上了犯罪道路。

1943年，日本侵略者面临侵略战争危机之际，为加紧掠夺中国物资，积极筹集劳动力。县行政科烟务股在小城街开办了所谓"康生院"，把吸大烟的人集中去戒烟，每期500人，两期就达一千多人。每期两周结束后，以劳动锻炼为名，全部押送到日本人开办的二道河煤矿，做无偿的无止期的煤矿劳工。

“火曜日”活动

日本把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排成为月、火、水、木、金、土、日，火曜日就是星期二。日寇为控制伪政权中的中国人为日伪统治卖力，除采取正面以金钱、升官诱惑腐蚀和神皇奉戴的奴化教育之外，还采取了侧面监视的秘密办法，即“火曜日”活动。这个活动是日寇内部的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在每周二都要召开一次日人的秘密会议，决策大事并提出可疑人物。伪舒兰县“火曜日”活动时，参加的人员是县级各部门的主要日人和各开拓团的团长、警察署的署附（日人）、日人村长等。周二这天停止办公，集中到临时指定的地址，参加秘密会议。会议由副县长（日人）主持，首先是军事训练，表演武士道，然后集中开会。会议内容，一般是传达上司的旨意，决策大事，接着再由各部门汇报工作和中国人（包括县长、科长、股长、署长、村长）的公务情况、思想动向等。伪小城村村长王立斋是伪满前师范毕业的，当上伪村长之后，对当时某些事件有些抵触情绪，被日人小城署附汇报，扣上反满抗日的“危险分子”，登注在小城警察署特务系的“要注意人”的秘密名册上。特务侧面监视，每月要向县警务科特务股上报一次该人的思想、言论、表现和接触的人物等，结果于1944年5月被勒令带勤劳奉仕队去前郭旗服役。这就是日寇“火曜日”活动的宗旨，用以“密谋大事”和“肃反立正”，以加固日伪的统治和所谓“日满一德一心”。

（摘自《舒兰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伪时期桓仁统治机构简介

白尔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侵占了辽吉黑三省。为了长期霸占东北，奴化中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设立了日伪组织机构。现将日伪统治时期桓仁机构设置情况简介如下：

一、日本驻在机关和单位

日本守备队，1933年进入桓仁县，约有200余人，队长叫野田，直属于关东军，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讨伐。初来时住在东关（现在的医药公司院内），后迁到西关飞机场。

日本宪兵队，宪兵队是随守备队一起来的，约有20余人，队长野田勇夫。其任务除监督日本守备队军人行动外，更主要的是干特务工作。其中有少数朝鲜人，除做翻译外兼有侦探任务，侦缉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地址在现百货公司所在地。

东边道特别工作部，1936年成立，专搞特务活动。工作部负责人是朝鲜人韩某。

日本领事馆，1934年来桓仁设馆，人员不多，都是日本警察。总领事矢野俊，副领事中村义夫。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侨民（包括朝鲜人在内），但也参加过屠杀和迫害中国人的罪恶活动。

桓仁县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高下定二，军衔少佐。这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负责退伍军人的生活、集训、调遣、分配等特殊任务，设在伪县政府警务科内。

日本航空株式会社桓仁县出张所，负责人是日本人白起。于1936年4月开始客运，每周定期通航三次，航线是从沈阳起飞，经由桓仁，再到通化，然后由通化返航，回到沈阳。这是桓仁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空航。可惜的是，中国人买不到飞机票，只好望航兴叹而已。

满铁桓仁县出张所，所长日本人梅村逸雄，直属于满铁株式会社。负责铁路交通客运工作，在桓仁通化之间每天对开一次客车。后改为安东交通株式会社。

日本开拓团，是1940年移民来的，迁来农民六十户，二百六十多人，团长夏井永吉。开拓团直属于伪长春日本开拓株式会社。名目上是开拓种地，其实质是通过移民，侵占中国国土，同化中国人，达到"同文同种"的目的。

在满学校，是在1936年成立的，校长是朝鲜人金某。这所学校原是朝鲜学校，为了教育桓仁县朝鲜子弟而设立的。因日韩一体化，强迫朝鲜人更名改姓，遂把这所朝鲜学校，改为日本在满学校。

二、伪桓仁县公署

伪桓仁县公署，1932年成立，地址在现政府广场前。是县里最高行政机关，日本人担任副县长，拥有最高的权力。县长是傀儡，从行政系统来说他只能对县公署各科发号施令，不能对其它机关插手干预。县公署下设两个办公室、6个科，科下设股，分别主管各自分担的任务。

县长办公室，曾任过伪县长的有周鼎、常荷禄、王育文、刘清一。

副县长办公室，初成立伪县公署时叫参事官，后改称副县长。参事官三轮健儿，副县长是三盐末雄、石垣贞一、樋口一郎。

总务科科长堤信义，行政科科长张国权，财政科科长钟振北，实业科科长徐志新，地政科科长日本人蝈永吉，警务科科长王本富。

三、桓仁伪协和会

桓仁县伪协和会，1934年正式成立，全称是“满洲帝国协和会桓仁县本部”。地址在桓仁街西门里，原是日本领事馆馆址，后为协和会办公地点。协和会桓仁县本部长是由伪县长刘清一兼任，副本部长由副县长日本人石垣兼任。实行所谓“二位一体制”，即伪县公署和伪协和会同属一个系统、两个机构。本部内设有司务长1人，由日本人担任，专职负责伪协和会事务。下设总务班、指导班、青少年班。另有“妇人会”、“军人后援会”两个外围组织。在基层按行政区划设18个分会，会长分别由18个街村长兼任。

伪协和会有很大的欺骗性。利用这个标榜民意的组织，把所有机关和单位的头头都网罗在一起，听从日本人副本部长随意摆布。既可以独揽大权，又可以显示民意，这是日寇对伪满统治的手段。

四、县公署所辖18个街村和7个警察署

18个街村：

桓仁县街公所街长杨春华，二道岭子村公所村长董福先，横道川村公所村长王绍通，四平街村公所村长莱尚义，沙尖子村公所村长王芝田，五里甸子村公所村长陈晓江，六道河子村公所村长孙廷双，二户来村公所村长王禹川，华尖子村公所村长黄义忠，木盂子村公所村长袁裕民，八里甸子村公所村长吕之业，雅河口村公所村长姜春湖，普乐堡村公所村长魏永秀，泡

子沿村公所村长潘玉璞，拐磨子村公所村长马忠礼，北甸子村公所村长陆守田，业主沟村公所村长佟汇川，响水河子村公所村长曲元伯。

7个警察署：

城关警察署署长徐万程，横道川警察署署长黄贵福，沙尖子警察署署长范斌，二户来警察署署长孙学章，华尖子警察署署长黄金兰，八里甸子警察署署长教维国，拐磨子警察署署长朱文元。

五、县内其他机关和单位

桓仁县法院院长郜焕文，桓仁县检察院检察官梁澍霖，桓仁县税务局局长刘某，桓仁县邮政局局长赵纯，桓仁县电报局局长王华春，桓仁县电话局局长丁跃南，桓仁县专卖局局长王化清，桓仁县水电局负责人日本人。伪满中央银行桓仁支行经理卢鸿顺，及桓仁县兴农合作社、桓仁金融合作社、桓仁县柞蚕株式会社、桓仁县商工公会、桓仁县农务会、桓仁县图书馆、桓仁县南关师中学校(后改为南关小学)、桓仁县国民高等学校、桓仁县女子小学、桓仁县北关小学、桓仁县西关小学、桓仁县教养工厂、桓仁县大兴当、桓仁县协荣公司（经营桓仁丹东之间客运)、桓仁县林兴站、桓仁县管烟所、桓仁县监狱、桓仁县保安队、桓仁县二棚甸子铅矿。

六、宗教、民众团体方面

桓仁县基督教会、桓仁县天主教会、桓仁县佛教会、桓仁县道德会、桓仁县道院。

（摘自《桓仁文史资料》）

伪本溪县公署见闻录

谭会忠

一、辽中大院

伪本溪县公署设立于1932年。县长陈荫翘，别名陈楚材；参事官高木一也；翻译野村一郎。陈荫翘辽中县人，是沈阳肇新窑业的财东，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当上了伪本溪县公署第一任县长。所有僚属，都安排上他的亲信、至友、乡亲，本溪县署遂有“辽中大院”之称。日本人占领东北后，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这样为在县衙的人事安排上任用私人提供了机会。

二、吸毒、贩毒

伪县衙内吸食鸦片成风。县长、科长、股长、科员、雇员、伙夫、工友中，吸食大烟、打吗啡的占大多数。因抽大烟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不乏其人。伪县衙经费来源主要是靠地捐。但当时治安不稳，没有人敢去四乡收税，为了增加财政来源就设赌场、办妓馆、烟馆，贩卖鸦片、吗啡，从中渔利。还允许种大烟，此举一箭双雕：一方面可增加税收，一方面毒害百姓。中国人都抽上大烟，就无力起来抗日，这是日本人又一侵略政策。

三、两个青年的堕落

伪县长的保姆姓罗，是个寡女人，只有一个儿子叫罗四维。

从小在陈家长大，念完中学，正好陈荫翘到本溪当县长，罗四维跟着来到县衙，当上文书股科员，专管“县印”。这个职务只有县长亲信才能充任。罗四维年方20岁，西服革履，出入县长公馆随便，不知底细的人，认为是县长少爷。罗四维和文书股打字员王××相爱，不久结婚，建立起小家庭，夫妻也还和睦。可好景不长，罗四维早晚伺候县长抽大烟，不久由“搬尖”、“抽头”，到吸烟而成为一个瘾君子。后来家产变卖罄尽，终于妻离子散，最后死在烟馆门前，由道德会买口薄棺，埋在乱坟岗。

文书股雇员方乐天，写一手好字，真、草、隶、篆，样样皆行，还会刻印章。也是陈县长带来的亲信。到本溪后结婚安家，生有两个孩子。方乐天因吸鸦片，烟瘾上来，什么也顾不上，被县衙解雇，到景记印刷局刻字。入不抵出，偷卖家中衣物，逼得老婆离婚另嫁。最后沦为乞丐，死于街头。

这两个青年因吸鸦片而堕落，当时社会上层人物对仇家采取的手段多是：拿钱供仇家孩子抽大烟、逛“窑子”。不出3年，保证叫他家败人亡。这是软刀子杀人，真是凶狠到了极点。

四、仗势砸戏院

伪县衙有一名老听差的，叫杨德春，伺候过多位县长，人很老诚可靠，他的儿子杨××，陈县长看在大老杨的面上，任命为雇员，在财务科当税收员，这是一个美差，有发财机会。杨××管征收戏捐。有一次酒醉到戏院包厢看戏，戏院掌柜没有奉献烟茶水果，引起杨××大怒，抡起板凳朝戏院掌柜砸去。响声惊动了正在演出的戏班和看戏的观众，不知出什么事，纷纷外跑。戏没演成，掌柜却遭毒打。第二天戏主到县衙告状。陈县长也觉得太不象话，把杨××臭骂了一顿。大老杨跪着求情，

县长息怒将杨××免职，到屠宰场去当工人。

五、庶务股长留笑柄

1934年3月1日伪满溥仪皇帝登极，全县召开庆祝活动。正赶上是元宵节，举行提灯游行。河沿师范学校学生二百多人在体育老师谢永华带领下，拿着灯笼，走到县衙门前。谢老师在前头呼口号，同学们跟着喊："啊——"这时站在县衙门前的庶务股长刘海川勃然大怒，大声吼叫："你们师范学校学生都是哑叭，为什么不喊口号？现在我命令你们各校唱各校的国歌！"此言一出，同学们有的捧腹，有的捶胸，笑声一片，队伍顿时乱成一团。刘股长被激怒了，又连喊两遍："各校唱各校的国歌"！这次因为声音更高，传的更远，引起看热闹的人大笑。有人将刘拉走。从此，"各校唱各校的国歌"传为笑柄。

六、榜首并非第一

1934年暑假，伪县长陈荫翘在伪总务科长王悦安、伪警务科长常庚尧策划下，举办一次全县秀才考试。由老学究王悦安命题："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全县中、小学校老师和社会文人都来报名应考。考试结果，张榜公布，王悦安在榜前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两句话："……白描取胜，自月旦之评，鹤俸客分略作花红点缀……"名列榜首的是县一小学语文老师商××（名忘记），第二名是碱厂小学著名老师沈曙东。商××是陈县长的老师，是随陈县长来本溪任教的。被陈县长亲批榜首，这不是白描取胜而是朱批列首。沈曙东应列前茅只好屈居第二，没有受到花红点缀，人言纷纷，引为怪论。

七、羊能不能上树

1934年春，伪县警务科长常庚尧、伪警管训练所长常伯英（是常庚尧的家侄）出示布告招考伪警，报考者须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受伪警务科科员王奎多邀请，替别人应考（我在河沿师范念书），我顶替谢××去考试，坐在我左右两个人照我答卷抄录，王奎多监堂，看着不管。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常识三科，语文题是常庚尧出题："有志者事竟成"和"人贵有恒"两题，可以任选其一。很多人有"小抄"，照着抄。在口试时，要对相片，我不能代替，必须应考本人应试。口试主考人员有日本指导官和伪警务股长范希文，日本指导官问应考者："羊能不能上树"有的答："不能"，遂被淘汰。有人答："羊能上树。"日本人问："为什么？"其人答："我可以抱着羊送上树"，竟被录取。

八、冀东文盲

1935年伪本溪县长陈荫翘调走，继任伪县长王荫椿到任。王荫椿，冀东滦县人，自称是冀东伪政权大汉奸殷汝耕的亲属，汉奸王克敏的家侄；曾任冀东参伪组织"冀东四民治安维持委员会常务委员"。"四民"是指"仕、农、工、商"。王荫椿借助日本侵华军司令官梅津的势力，当上了伪本溪县长。到任后住在伪县公署后院伪县长公馆内。本人和妻妾三人，都吸鸦片；还有家属和佣人20余人。王荫椿大高个，常穿蓝缎子团花皮袍，外套青绒大花马褂，头戴一顶帽头，红帽疙疸，佩上一块玉石眼，戴一付墨镜。从外表上看很神气，象一个当官的样子。实际脑子里一点墨水没有，是一个斗大字认识不到两石的白字先生。

1937年5月2日，伪满皇帝溥仪东渡日本认亲回来，发布了

《回銮训民诏书》。训令各省、市、县长接诏捧读。诏书用黄缎子包着，王荫椿双手接诏，举过头顶，轻轻展开，全县伪官吏俯首听读。王荫椿读诏书时，一句一个错字，把“回銮训民诏书”念成“训民回舍语书”不知什么意思，把“联”字念成“月”字，“亟”字念成“承”字，一篇诏书，念的驴唇不对马嘴，谁也听不懂。以后组织学习，由总务科长老学究王悦安领念，才发现王荫椿念的错别字太多，怪不得谁也听不懂。从此群众给他送个外号叫：“冀东文盲”。

九、“喝你妈的尿”

王荫椿春节时，请一些商号老板来赴宴，从午后1点开喝到上最后一道菜“八珍海味汤”时已经晚8点多了。听差的任庆春有点疲劳，端着这碗汤刚一过门坎，看见县长不高兴，瞪眼珠子，吓得任庆春两手一颤，一不小心将碗掉在地上，双耳细瓷碗打碎了，汤也洒了。王荫椿一看勃然大发，大骂任庆春说：“你是废物，一碗汤都端不动，把我这宫廷宝贝的双耳碗打碎了，汤也洒了，拿什么给客人喝，喝你妈的尿?!”任庆春赶紧回答说：“是，县长，喝你妈的尿。”王荫椿一听更来火了，大骂：“你妈妈的是混蛋，喝谁妈的尿？喝你妈的尿！”任庆春这时才有点明白，急忙回答：“是，县长，我是大混蛋，喝我妈的尿。”弄得满桌客人，啼笑皆非，赶紧掏腰包给赏钱来解围，任庆春接过赏钱，连说：“谢谢！”王荫椿端起茶杯说：“送客”。等到客人走后，任庆春将赏钱五百多元，交给姨太太，姨太太拿出10元钱对任庆春说：“给你5元，给厨师5元”。这场“喝你妈的尿”宴会，令人哭笑不得。

十、"友邦"变"亲邦"

伪满初期，一些伪官吏，管日本帝国主义者叫"友邦"。后来伪满皇帝访日认亲，承认日本是"亲邦"。王荫椿接到旨意后，在早操训话时说："从现在起，对日本国民的称呼不准再叫友邦，要叫亲邦。王荫椿认贼作父，厚颜无耻，从此说话时张口"亲邦"，闭口"亲邦"，二字成为他的口头语，叫的肉麻。

十一、疗伤不付钱

王荫椿对日本侵略军，经常去慰问，翻译程远鹏和各科长轮流随行。有一次王荫椿带着教育科长高凤翰，翻译程远鹏等人乘坐一台大板车和一台小轿车去碱厂慰问守备队。高凤翰坐在大板车上，走到八盘岭下坡路拐弯时翻了车。将高凤翰右臂砸坏，司机没有受伤。王荫椿将司机臭骂一顿，带着高凤翰坐他的小轿车返回本溪湖街。急忙找金玉山的父亲金恩祥老大夫给治疗，经过金家膏药铺祖传名医的精心治疗，总算保住右臂，没有残废。高凤翰用治好的右臂握笔亲书："痊我右臂"4个大家，做了一面锦旗，亲自送到金府致谢，从此再也不敢下乡了。伤臂治好了，医疗费却分文未付。

十二、解剖活人

1937年6月，王荫椿领着翻译程远鹏去连山关守备队去慰问。连山关守备队长接过送去的礼物，亲自领着王荫椿、程远鹏到守备队院内去参观。当时驻在连山关的守备队兵舍，占地很大，四周筑有土堤，四角设有暗堡，警戒森严。日本警备队经常四出骚扰，乱捕无辜，枪杀或喂狼狗。老百姓不敢从门前走过，要绕道走，守备队兵营成了杀害本县人民的魔窟。守备

队长领着王荫椿到各兵舍看了一遍，又领到一处监房，将门打开，让王、程两人进去看看。两人进屋一看，吓得直哆嗦，原来这是一所刑房，摄着各种刑具。在梁上还吊着一个人，赤身露体，满身伤痕，口流鲜血。守备队长哇哇大叫问王荫椿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王荫椿吓得魂不附体连说："不知道"!守备队长指着梁上悬吊的人说："你是什么人?"那个满身伤痕的人睁开眼睛说："我是朝鲜人"。守备队长说："你是反满抗日的罪犯，还不老实交待，我要将你打死!"那个朝鲜人说："要杀要砍随你的便。"守备队长野性大发，用大刀将那个人两个耳朵割下来，又去割舌头……这时王荫椿、程远鹏两人吓得倒在地上昏过去。等他们两人醒过后一看，不是监所是守备队长办公室。守备队长笑呵呵地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是满洲国的功臣，为大日本帝国效劳，我不会加害你们。那个朝鲜人不听我们的话，让他在朝鲜当县长，他不当，跑到东北来抗日，已被我解剖杀死。"王荫椿临走前，守备队长又一再训示："今天看到的情况，不准对外透露，如敢说出去，叫我知道，也休想活成。"王荫椿连连表示："遵命，绝不透露。"就这样王荫椿和程远鹏两人灰溜溜地回到本溪。吓得一场大病，差点死去。

十三、追悼死婴

伪参事官浅子英的老婆生下一女孩，未满月就死去了。按日本人的规矩，不论老人、大人、小孩死后都要火葬，有条件的还要开追悼会。王荫椿抓住这个机会，对浅子英表示深情厚谊，亲自到浅子英家去吊孝。臂戴黑纱，胸戴白花，还送了一个花圈，向生未满月而夭折的死婴遗体告别。行了三个大鞠躬礼，烧了三柱高香，眼流长泪，泣不成声，如丧考妣。岂知王的举动还真得到了浅子英的青睐，浅子英在职工大会上说："王

县长不愧为一县之长，很懂礼貌，对我刚生未满一月的女孩死亡，亲自参加追悼会，悲恸万分，值得表扬和赞许！”

十四、庆混烧香

1937年9月王荫椿被免职，由辽中县长关庆琨继任本溪县长。关庆琨，义县人，中等个头，微胖。穿一身协和服，头戴协和帽，帽徽是一个“王”字（代表王道乐土的意思）。顺他头部往下看，一双眼，高鼻梁，大嘴，留着一撮八字胡。仔细一端详原来是“王——八”县长。关庆琨早在辽中时候，竟做一些混蛋事，老百姓故意将“琨”字读白“关庆混”就成了关庆琨的雅号。

关庆琨到县任职后，自标高雅，好养花，好供佛。从辽中县拉来一汽车菊花，撮在县长公馆院内花墙上。花姿百态，五彩缤纷，确也有一番风味。关庆琨到任一个来月的一个礼拜天，在他的寓所院内举办一次“赏菊披露”。关庆琨在宴会开始时致词说：“今天到会的各位，都是我的部下和地方绅士，希望大家知道我的脾气。我这个县长，是有警察权的县长。别看在日本人面前，我什么大事也不敢管，是一座佛像。但既然是佛，就得有人给我烧香还愿。谁要瞧不起我，不给我面子，别怪我不客气，我就抓他头痛、骨头痛……”从此“庆琨烧香”的外号就传开了！

十五、赵长庆遭殃

总务科会计股科员赵长庆，是主管前渡资金的会计。是日本的高等小学校毕业，精通日语，沈阳人。身高1.80米，外号叫赵大个。赵长庆担任前渡资金会计，是县委任官以上开支的会计，凡是国库开支经费，都由他办理。有一次关庆琨下乡回

来，要报公出旅费，赵长庆拿过单据一看，公出天数不符，多报3天，就没有给报销。还在日本经理官斋藤面前告了关庆琨一状。日本经理官斋藤对关庆琨的报销事提出疑问，并狠狠批评了他一顿。因此关庆琨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赵长庆也不争气，自恃会日语，哥哥赵长生是伪牡丹江市长，也养成一身坏习惯。学会抽大烟，还嫖野妓暗娼。事被关庆琨知道，就找警务科司法股长张连惠商量对策。张连惠外号"张黑子"，是关庆琨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爪牙。正好张连惠也对赵长庆不满，是为一个暗娼，两人争风吃醋吵过架。张连惠找到机会，得到关庆琨批准，就下毒手，将赵长庆抓起来，送到监狱拘押了6个多月。直到赵长庆的哥哥赵长生（伪牡丹江市长）来本溪找到关庆琨说情，关庆琨才让张连惠将赵长庆释放出来。赵长庆赌气不干，回沈阳另谋出路。

十六、泉水村长被捕

关庆琨到任1年多，各伪警察署长、伪街村长，怕不烧香还愿，遭到迫害，逢年过节，都来送礼。关庆琨感到我这座佛像到底是眼通六路，耳听八方。权招天下士，都是烧香人。后来关庆琨发现泉水河村伪村长谭广吉没有见过一次面，也不到家烧香上供，这还了得。关庆琨通过财务科长乔恩润，才知道这名村长的底细，原来他的儿子谭会忠是会计科员，从来不到上级家送礼。何况谭会忠在审查经费报销时，也对关庆琨报销单据提出过问号。又经过多次了解，知道谭会忠不过是一个小小科员，没有什么保护神。于是找张连惠研究对策。张连惠说："这事容易，交给我办，我就说谭广吉参加过赌博，可以抓来拘留。"不多日，张连惠在街上遇到谭广吉，就说："找你有事，你跟我到警务科来。"谭广吉到了警务科，张连惠硬说谭广吉在广

泰盛打过麻将，参加赌博，下令拘留。谭会忠得到父亲谭广吉被拘留消息，马上找财务科长乔恩润请求办法。乔科长说："这事我知道，关县长对你父亲不满，对你也有意见，才让张连惠拘捕。你赶快找泰盛经理李梓薪去关县长家说情。"谭会忠连忙照办并送了100元现大洋。关庆琨说："谭广吉爷俩瞧不起我这县长，我就得给他们点惩罚，现在你来说情，看在你的面上，可以放人。"谭会忠给张连惠家送去一台松下牌收音机。当天就将谭广吉释放出来，气得谭广吉辞去伪村长职务，去经营煤矿了。

十七、岗元大打出手

关庆琨进财之道除"吃供"外，还常在家设赌抽头，私开大烟馆。赌徒烟客大都是各伪警察署长、伪县署各科长及股长、县衙大商号经理和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绅士等。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闹得乌烟瘴气，满城风雨。1938年春节后，一个星期六，关庆琨又下请贴，请县公署内各科长、股长以上伪官吏，还请日本人指导官、科长等多人。在伪县长公馆东屋设两盏大烟灯，西屋设两张麻将桌，宾客抽大烟的喷云吐雾；打麻将的红中发财。宴会还没开始，警务科警务股日本人指导官岗元手拿请贴进院。关庆琨在门口接待，让到西屋，岗元进到屋里一看，麻将桌上坐着两男两女，正在洗牌码牌，谁也没起来让坐。岗元怒从心来，大骂"叭嘎"，抡起双手，对准两对男女各打两个大嘴巴。并让男的跪下，又用皮靴踢了一顿，踢后愤愤而去。东屋烟客一听西屋岗元大打出手，赶紧将烟灯吹灭，收拾起来，没敢出屋。由于岗元闹宴，不欢而散。这两个男人是伪县公署土地股长李如芸和绅士阮通谱；两个女人是本溪有名恶棍黑帽子衙门日本人走狗姜兰一的小老婆，和日本宪兵队翻译依立峰的老婆。星期一刚一上班，岗元就去找参事官三松

泰助报告了这事，还要找关庆琨、李如芸算帐，吓得关庆琨坐在县长室内不敢吱声，参事官考虑到和中国官吏的关系，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劝岗元息事宁人。劝说岗元要照顾县长面子，岗元才怒冲冲地回到警务科。此后，关庆琨再也不敢去请日本人到家赴宴了！

十八、监狱变赌窟

关庆琨在岗元闹宴后，不敢再大张旗鼓地来设赌场。就和警务科长于文治商量，暂时搬到他家去赌钱。于文治家住在县长公馆下院，一墙之隔。互通声息，避开日本人耳目之后，赌风更盛，赌法更多，更为活跃，由打麻将、耍牌九，上升到打桌面——玩扑克。扑克赌博是日本人传过来的。人数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赌徒群集到于文治家，这种赌法是每人先分两张牌，一明一暗。在分第三张牌前必须再放下赌注或筹码。有的人看自己牌没有奔头，就放弃不跟了。这样到第五张牌时，剩下的人就不多了。最后五张牌决定胜负，关键是扣着那张牌，如果是"娇客"（大王）就有绝对胜利的把握。这种赌法，在当时所谓上层人物中颇为流行，一般人赌不起。

岗元对关庆琨行为不满，组织伪警去抓赌，没有抓到，就认为赌风刹住，再不过问了。这些赌徒在于文治家赌了一段时间以后，认为于文治家是临街房不保险，想另找地方。监狱秦典狱长趁此机会，极力怂恿到监狱办公室去赌。至此，这帮赌徒每晚7点多钟进去，第二早7点前出来，夜间还有酒席款待，就再没有人再去抓赌了！伪官吏为赌博，可谓绞尽脑汁。

十九、两股长出走

日本人对县衙内部职工控制审查甚严。会日语的吃香，有

靠山的得混。会计股长黄崇原、征收股长王学志两人，既不吸毒，又不赌钱，为人正直，但不会日语，又不到关庆琨家上供烧香，关庆琨就有意陷害。1939年3月诬黄、王二人有反满抗日言行，进行政治迫害，打算逮捕。事被财务科长乔恩润知道，通知黄、王两人急速躲避。黄、王两人趁赴沈阳开会之机，逃之夭夭。过了几天，黄、王两人没有回来，关庆琨知道消息透露，可能出走，就向日本人报告："黄、王两人潜逃。"日本人到家搜查，室内空无一人，连家属也不知去向。事隔6年以后"九·三"胜利，黄、王两人才从内蒙农村回来，未遭毒害。

二十、株连无辜

1939年7月，警务科会计日本人佐田和伪警何庆忠3人，由银行取回全县伪警开支款2万多元伪币。因礼拜六下雨没有发出去，锁在办公室金库内。原警务科被解雇电工王连恩知道取、存款日期。这天晚间警务科没有值班人员，王连恩潜入会计室内，用电工工具将金库破坏，盗取全部现款潜逃。第三天上班，发现金库被盗，司法股长张连惠向关庆琨报告。关庆琨大发雷霆说："这个贼胆子不小，敢到警察局作案，可能是内部职工作案，要立即动手清查。"张连惠领着一帮刑警和狗腿子将全县公署人员名册拿去，逐个进行审查。凡是过去有劣迹的，如耍钱、嫖娼、酗酒、钱财来路不明的人都列为怀疑对象。会计股科员冯光宇主管工资发放，好赌博，娶妓女为妾列为第一名，由张连惠亲自抓去审问。冯光宇那天晚上在家打麻将没有出去，找来那天晚上一起打麻将的人作证。张连惠就追问那几个打麻将的人，没有得到什么证据，就将这几个人暴打一顿释放。工友徐殿阁平日赌钱出名，是个穷光蛋，疑其有作案的可能，也找去审问。因作案那天这些人都在某处赌博，就抓了一大片，因

没有足够证据，打了几下，都被赶回去。警务科日本指导官感到警务科被盗是个耻辱，必须急速破案。无辜群众被抓、被押不知多少，遭受毒打、受刑的更有其人。大海捞针，上哪找去。过了3年多，王连恩在安东市被捕，才供认这次偷盗经过，但是时过境迁，窃款已大部挥霍，不能追回，这场被盗大案，才算结束。

（摘自《本溪文史资料》第四辑）

统治阿城六年的岸岳五郎

秦绍儒

四十多年前的伪满时期，我曾在伪阿城县公署行政科保健股当过雇员（当年20岁）。还有王全忠、刘万良、唐荣跃、邵仪唐、张德奎等人，也都在县公署、村公所等处做过事。为了使后人不忘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去，我们几个人，对岸岳五郎在阿城的所作所为，就身验目睹的一些事件进行了回忆：

一、岸岳五郎在阿城施展的“怀柔政策”和“绞榨政策”

1939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日本遣送来一些日民，在平山、玉泉、双河等地建立了开拓团。当时就遭到中国人的反对。在双河村所建开拓团占地时，以王文阁为首的二十多人进“京”（当时的新京，现在的长春）告状，反对日本人没收农民的土地。伪满国务院的日本人松木秘书官接待告状人时，他说：“五十蓄真一（伪满时阿城第一任伪副县长）领导不了阿城县，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他就要调北安去了。岸岳五郎就要到你们县去

当副县长，他是我的老朋友，他会有办法解决你们的问题的……”

1940年，岸岳五郎是带着一个中国人老婆来到阿城的。来后，他兼任了双河村副。一次，他来双河村，副村长陈××陪他喝酒喝醉了。陈副村长让邵仪唐照顾岸岳五郎睡觉。岸岳五郎对邵仪唐说：“我来阿城当副县长，是因为阿城县刁民大大的，不好治，所以让我来治。”又说：“我是皇族、浪人，我还是新京妓女院的后台老板……”。

那时的岸岳五郎已五十多岁。他来阿城推行的是一套“怀柔”政策。对县长温继桥（中国人）毕恭毕敬，让温县长在正面的大屋办公，他在旁边的小屋办公。每次在公开场所，他不但同温县长一起走，还把温县长让在头前，如遇到路不好走或上楼梯，他搀扶着温县长走。在大会场上讲话前，要先让让温县长。

岸岳五郎在对伪县公署机关实行了一套“怀柔”政策的同时，安排了大量日本人在一些单位任职。如总务、警务、行政、财政、地政等五个科的科长是中国人，但科副都是日本人，决定问题的大权却掌握在科副（日本副科长）手里，又如行政科的勤俸股（即当初的劳工股）股长为汤浅、工务股长为丸岗、国兵民籍股长为矢口、保健股和街村股长森正二，这些日本人都直接执政。日本人为了便于监视中国官吏的言行，一科几十人，从科股长到大小办事员，全都在一个大屋办公。不但科股长由日本人统治着，到县长那级也是日本副县长岸岳五郎说了算。在一切公文上加盖公章时，只要说副县长已经批过了，县长就叫盖章了。

岸岳五郎来阿城不久，就决定给县公署的伪职员，每人发一套青布衣服（那时候棉布已实行控制，也没有卖的）。据王全

忠同志说："1942年（伪康德8年）夏天，岸岳五郎带领全体伪职人员去大河洗澡，他和中国人学游泳、练球，还曾组织一次到北门外打猎。特别是在一次大会上宣布：日系人不准打满系人。"

岸岳五郎在阿城县稳住脚后又实行了一套"绞椎政策"，也就是一步比一步紧。他对伪县乡署机关人员宣布：谁也不准迟到和早退。每天早晨必须开"朝会"，在会上升国旗，唱国歌，向西南遥拜"皇帝"；向东南遥拜"日本天皇"，宣读诏书，长官训话。有来晚的人，必然打一顿，骂一顿。为惩罚伪职员又命令总务科给他做了一个"神棒"，即一根四至五公分粗的，两米来长的木棒，一头挂有红绿纸条子，并宣布："上楼梯不准出响动"。有一天，玉泉警察署张署长穿着一身警服，挎着洋刀，穿着一双带有刺马针的皮马靴，神气十足地走上楼，因马靴踏地板和楼梯发出响声。岸岳五郎走出他的办公室，不但大加训斥，又回到办公室拿出"神棒"，劈头盖脑地把张署长打了一顿。打后走下楼梯，找到看门的靳鸿儒，也给他两"神棒"。

1945年（伪康德12年）夏天，岸岳五郎在县公署大院给劳工开大会，机关人员在楼内办公，我在练钢笔字。会刚开完，岸岳五郎就气势汹汹地来到楼上我的办公室问："刚才谁说笑啦？"这时候，人们都起立，默不作声。他问过一通又一通，因为我们这个办公室根本没人说笑，所以也没人承认。于是他责成国兵民籍股长矢口（日本人）追查到下班，也没追查出来。这时教育科的马永吉用日语对矢口说："是我说笑来的。"（实际他没说笑），矢口听了，马上去后院副县长家里汇报。待矢口返回来，代表岸岳五郎打了马永吉一顿嘴巴了事。

1942年（伪康德9年）秋，岸岳五郎到蜚克图村去催出荷粮，他在村、区、屯的三级伪官吏大会上讲了春订的征收出荷

粮标准，不但要交足纳够，还要交出好粮。曹家窝棚区的区长曹长霖，站起身走上前去，给岸岳五郎来了个90度的鞠躬礼之后说："县长，今年早霜，庄稼没上来，实在是打不出那么多的粮食，请副 县长开开恩，让我们少交些粮吧！"岸岳五郎听了，勃然大怒，命令派出所齐所长把曹长霖带走。吓得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提少交出荷粮了。当岸岳五郎回县时，把曹长霖带走了。

二、岸岳五郎所宣传的"协和"、"亲善"

岸岳五郎来阿城不久，就自己撰写了一本名叫《教示县民》的小册子，其内容：一是说明日本人来东北不是侵略，是为了拯救"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日满亲善"；二是说明台湾原名叫蓬莱岛，这个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等等。后来，岸岳五郎的这个小册子大量地出版，不但每个伪职员人手一册，还发到各个部门和村、区。

岸岳五郎每年至少两次到全县的各街、村去开大会。凡他要去的街、村，必须提前排队迎接，小学的师生也要列队迎接。有一次，他去开大会，有些人去晚了，他命令村长李芳对姚百福等迟到的人逐个打嘴巴，列队迎接的人行90度鞠躬礼之后，就开始听他的训话。除宣传他的小册子精神外，还讲："我是你们的父母官，见到我鞠躬行礼，我也给你们还礼，你们不赔帐。"

1943年（伪康德10年）夏天，在东门外的运动场上，召开锄草班动员大会。岸岳五郎看锄草班队伍里有些人超过五十多岁（规定50岁的人不参加锄草班），他立刻宣布："超过50岁的人站出来！"并追问："是谁让你们来的？"当场又向街区长宣布："该来的人不来，要押起来！"

三、岸岳五郎所建的傀儡机构

为了维护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岸岳五郎还在阿城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就是“日满协和会”。中国人都叫它“蝎虎会”。协和会的表面任务是搞什么“日满协和”、“日满亲善”、“宣德达情”。实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搞特务活动，监视中国人的言行。所以那时从县、村、区都建有协和会组织，并发展协和会的会员，会员都穿着“协和服”。协和会直接掌握社会名流和政治嫌疑分子的动态，并把这些人列入“要人”名单，名为“视察人”。

岸岳五郎还独出心裁地建立了“增产班”、“锄草班”、“互相帮”以及城镇各行各业的“组合”等，把中国人统治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形成了一整套的监视网。

所谓“增产班”，是由伪县公署官吏组织起来的，由科长或科副任班长，每村去一个班。从春耕、夏锄到秋收送完出荷粮，一包到底。增产班一下乡，人们怕而敬之，怕他们往死里要出荷粮，因而不得不恭恭敬敬，到处都得用好吃好喝招待，得意啥给啥。招待不好时，就大发雷霆。如：伪县教育科长王宝合，他担任永源村增产班长，他到了一个屯子，正碰上一家办喜事。由于招待不周，他大发雷霆，把酒席桌给掀翻在地，当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愤恨。

“锄草班”，是把城镇居民50岁以下的男人强行组织起来，在夏锄季节，下乡帮助地多的地方家锄草。名义上是帮助铲地，实际上，都是白给地主铲地。

“互相帮”，是从1945年（伪康德12年）开始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每十多户为一帮，每帮有一名帮长，名义上是互相帮助种地，实际上是为了多要劳工。岸岳五郎又发给每个帮长

一套黄色肥大的衣服。

“组合”，是在城镇按行业组成的，什么饮食业组合、商业组合、手工业组合、柴炭组合等，各组合都有“官吏”参加。如伪满“官吏”徐锋，看到成立组合有油水，便买通了农业科日本人中山猛彦、警务科特务股长管井等人，在城镇里成立了柴炭组合。从此，阿城镇再不准有人随便买卖烧柴，实行了城镇居民烧柴配给制。烧柴由柴炭组合统一经营。同时，也出现了柴炭组合人员的贪赃受贿。

四、反岸岳五郎的斗争

自从岸岳五郎来阿城任副县长以后，阿城出的劳工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城乡人民反对出劳工的办法也越来越多了。城乡人民都不愿意出劳工，他就成立了“互相帮”，来解决出劳工人家无人干活的困难，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去。他就亲自出来动员，并派伪职员带队。

岸岳五郎向农民要的出荷粮年年增加，农民反对要出荷粮的做法也越来越巧妙。岸岳五郎为了达到多收粮，采取了对送出荷粮的农民给布的手段。另外，给送粮的大车老板子每人两张大饼和二两白酒。送出荷粮时，岸岳五郎还到饭店去看看饼的份量够不够，白酒烫得热不热。为了多方严格控制粮谷，岸岳五郎还出马大抓“经济犯”。唐荣跃的家住在石槽村，在1943年时，为了还债，卖了几麻袋大豆，岸岳五郎便派警察把他抓了起来，不仅蹲了监狱，还罚了1千元钱（相当于一个伪职员二年的工资）。徐成业是伪县法院职员，据他回忆：1941年春季，由警察署一次送交检察院四十多名“经济犯”。当时的检察官赵俊臣决定：一律免予起诉，无罪释放。警务科一个日本人指问“检察院为什么把‘经济犯’全部释放？”赵俊臣当场反问：“在

日本国的老百姓买烧柴，你们都给制了什么罪?”这个日本人无言答对。

岸岳五郎在阿城时，步步加紧了对粮食的控制。城里人的吃粮有限，只逢年节配给点白面，大米一点也不给。谁若是私买粗粮就是“经济犯”，私买了大米就是“国事犯”(因为大米都是军用的)。那时，在大年三十，做一顿大米饭吃也是心惊胆颤的。总怕被警察发现，还要另做一盆高粱米饭，摆在桌子上。边吃大米饭，边不时地向外看。如果发现警察来，就立即换上高粱米饭。

岸岳五郎在统治阿城县的6年当中，施展了种种统治手段，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建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出了大力，受到了日本统治头目的赏识，并请他到“新京”介绍统治中国人的“经验”。伪滨江省要调岸岳五郎去省里当警察厅长。尽管岸岳五郎的统治手段很高，但却掩饰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全县人民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严惩岸岳五郎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1946年1月，阿城民主政府召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岸岳五郎。

(摘自《阿城文史资料》第二辑)

榆树县伪副县长
日和崎栋男其人

宋晓峰

日和崎栋男，在伪满曾任榆树县副县长，是日本侵略势力在榆树的总头目，是双手沾满榆树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日和崎栋男于明治42年（1909年）8月，出生在日本国高知县香美郡山村的房吉二男家族。时值明治维新鼎盛时期，军国主义教育遍及全日本，所以日和崎栋男从懂事时起，就受到“武运长久”和“大陆政策”等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昭和8年（1933年）初，他取得东京大学法科毕业文凭后，即被派住中国，加入了侵华战争的行列。

据《满洲绅士名录》载：“日和崎栋男，大同2年（1933年）至康德5年（1938年）3月任兴安总署属官，科尔沁左翼中旗属官，科尔沁左翼前旗参事官。康德5年3月，任省事务官，兴安南省警务厅特务科长”。从上述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日和崎栋男的特务身份。不仅如此，日和崎栋男在来榆树任伪榆树县副县长时，始终也没停止其特务活动。1941年3月，他被派到榆树，在同年11月，就在原榆树县警务科特搜股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高级的情报组织——特搜班。特搜班的班长由特务股长九岛××和秋业义雄（均系日本人）先后担任，下有15名班员，由日和崎栋男拨以专款作为特务班活动经费。此外，还由这些班员在流氓地痞中发展特务密探，在全县范围内设十个特务活动据点，用来监视人们的社会活动。

在情报上，日和崎栋男还有他的另一手，就是发展弘报员和弘报要员，建立弘报小组。在日和崎栋男到榆树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建立了两个弘报组织，专门用来搜集信息，监视反满抗日的言论和行动。据有关资料载，194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二支队长杨文清来榆树活动而被追捕，就是由弘报小组摘到的情报提供给特搜班的。

日和崎栋男还是一个掠夺人民财富的强盗，屠杀广大人民的刽子手。据当年的伪职人员在1961年的回忆，日和崎栋男一到榆树，就大量接收出荷粮任务，强迫农民低价卖粮。每到冬季，抽出县公署各科、股长和经济部门人员，组织出荷督查班本部，分组到各村逼着农民要出荷粮。给警察起个名称，叫兴农警察。各个农村派出警察督促农民春种、秋收、征集出荷粮和各种物资，其中包括军用马匹、车辆、劳工、勤奉队，都要超额完成任务。如有一户不完成“任务”，轻者抓起来充为思想犯，关押6个月；重者定“通匪罪”，有钱买命，没钱的枪杀、砍头或活埋。更有甚者，他有时下令将砍下的中国人的头衔在马嘴里或挂在树上，以示不完成任务或抗出荷的下场。

由于日和崎栋男在榆树完成日本侵略战争所需的各项物资任务积极，“成绩良好”，屠杀中国人民有功，在1943年其官衔升为简任二等，勋六位，超越一般县长，相当省厅长级。

1945年“八·一五”光复，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日和崎栋男逃回日本。

（摘自《榆树文史资料》第二辑）

敦化县日本参事官惨杀抗日军民

查讯检举人张振华笔供录

（1954年11月17日）

为了查清伪满吉林省敦化县参事官荒川秀次命令指挥部警察、自卫团等配合前日本宪兵队，在敦化县城、郑家屯等地惨杀我抗日武装人员及和平居民的罪行，敦化县人民政府梁玉福于1954年11月15日讯问了检举人张振华。张振华自称44岁，职业伪警察，家住吉林省敦化县第四区红石砬子村，现在吉林省第一劳动改造大队劳动改造。

问：你认识荒川秀次吗？

答：认识。他是1935年初调来敦化县充任伪参事官，于1936年调离敦化县。他在敦化县曾命令指挥其部下警察、自卫团等惨杀了中国抗日武装人员及和平居民。

问：请你把荒川秀次指挥命令部下警察、自卫团等在敦化县惨杀中国抗日武装人员及和平居民的情况谈一谈。

答：1935年春天，抗日联军陈翰章部队的战士来敦化县城筹集粮食。荒川秀次得到这一情报后，即命令部下警察、自卫团和日本宪兵队进行了3次大搜查。搜查结果，在敦化县城东关的旅馆内搜出抗联战士4名、和平居民9名。这13名被交给日本宪兵队之后，宪兵队把其中的抗日联军战士4名、和平居民2名，在敦化县的北山上用日本刀砍杀，其余7名不知下落。

又在1935年的冬天，荒川秀次命令指挥部下警察、自卫团等150名和伪军一个连，包围了驻在敦化县郑家屯的黑龙抗日部队战士20名，其中11名被逮捕，最后被枪杀于郑家屯西北的炮台附近。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大讨伐”》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

日本参事官妄杀伪汤原县县长

沈玉和

日本人制造的伪满洲国凡是机关团体的主脑人，由溥仪当皇帝起，全由汉奸充当，做为傀儡、牌位，只受香火不可喘气。次一位都以日本人充之，掌握实权，管理一切。如各县县长必定是中国人，但只可坐官不可做事。副职（副县长），伪满初期叫参事官，固定是日本人，所有一切事务全由参事官决定。这是伪满官场中的规律，任何人不能变更。

农安县人刘会同，是吉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当过大学教员多年，民国初年曾当选为吉林省议会的副议长。伪满洲国成立时，刘会同在吉林走投无路，难以谋生，乃前往黑龙江省谋得汤原县县长职位，苟全性命，本可以借地吃饭。但刘会同不知深浅，硬说他当伪县长，有权处理一切事务，可采用参事官的意见，但不受参事官的支配。他到任日子不久，就知道参事官有侵吞公款、横征肥己等不法行为。在查得确证后，将要办理的时候，参事官知道了，立时将刘会同逮捕，当即召集全署日满职员讲话，他说：满洲国人要想管日本人，就是大逆不

道，今县长查我的毛病，就是想要造反；应当处以死刑。说完，便将刘会同枪毙。刘会同身充伪县长就这样死于非命。

汉奸县长习齐辉

展庆喜

习齐辉，字达初，加入日本国籍后，改名羽白太郎。1897年生，原籍江苏省南通人。1948年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省。

该人于1921年从江苏省南通来海伦县经商。其人狡猾、奸诈，善于欺骗和社会交际，于1925年就当上了海伦县"烟酒公卖局"的主任。在任职期间，大肆贪污、勒索，发了横财。1928年当上了海伦县"义合永烧锅"的股东。1929年至1932年先后开设过"义合号当铺"、"大通粮栈"、"籴粜粮店"、"大租车柜"等买卖。他不仅是个地地道道 的奸商、资本家，而且还是一个风流浪荡公子，乱搞女人，逛妓院，经常出入大烟馆、赌场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把本国内的女青年进行特务训练后，通过各种途径派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为其侵略中国打下基础。日本女特务贺川良子，经过日本的特务训练后，于1929年从哈尔滨派到海伦县妓女院，公开的身份是妓女，秘密进行特务活动。1930年习齐辉在逛妓女院时，结识了贺川良子，并经常在一起鬼混。由于贺川良子是海伦县的名妓，又是外国人，当时海伦县城的上层人物，都要争占她。自从习齐辉与贺川良子接触后，便利用手中的财势，贿赂"官相"；排挤他人，最后将贺川良子占为己有。贺川良子

也看中了这个有财势，奸诈、狡猾，社会交际广，活动能力强的人物，并将习齐辉发展为日本特务，不久二人结了婚。从此，习齐辉这个中华民族的败类，干着背叛祖国、出卖人民的勾当，充当着日本侵略者的忠实汉奸走狗。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日本侵略者的小头目平贺司令侵入海伦县城以后，首先找到了女特务贺川良子，并利用贺川良子充当翻译。这样，习齐辉有了谄媚日寇的阶梯。由于习齐辉使尽了各种招数向日寇平贺司令溜须拍马，得到了平贺司令的重用。不久平贺司令就将习齐辉派到青冈县，登上了县长的宝座。来青冈上任之后，把从海伦带来的三十多名亲信分别安插在重要的单位，如警务科、警察署、财务科、地政科、总务科、协和会、兴农合作社等。把原来掌权者，大部分免职或调到其它部门，换上他的人。伪警务科是日本帝国主义镇压、统治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习齐辉到任后，将原警务科长米春轩调走，换上他带来的邢继先担任。王之荣本来是个无能小辈，由于是习齐辉拜把子弟兄，也当上了警务科的警佐，后任警务科特务搜查班的主任、警务科的股长、警察训练所的主任、骑兵队队长、青冈警察署的署长等重要职务。并参与逮捕、审讯我抗日烈士赵祥案件。青冈县的兴华地区是与明水、海伦、望奎三县的结合部。日伪政府认为兴华地区是个重要地方，习齐辉便将他从海伦县带来的于玺璋派到兴华当警察署长。日伪县公署的总务科长张洪儒、财政科长赵忠、行政科的隋子明等人都是习齐辉从海伦带来的亲信。

伪大同元年（1932年）习齐辉来青冈县任汉奸县长。初任不久就被奸商王晓峰用金钱拉拢住。王晓峰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拉拢习齐辉呢？原因是这样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王晓峰就开“当铺”。“九·一八”事变的当年，李海青抗日队伍

进驻过青冈县，不久离去。王晓峰见有机可乘，把群众当给“当铺”的贵重物品运到哈尔滨市出卖，将钱私吞，回来后宣扬当铺的东西都被李海青部队的人抢去了。当时住在青冈县城内的刘占一是个主持正义的老知识分子，知道王晓峰玩弄这个鬼把戏的底细，便找王晓峰进行质问，当众揭露了王的这一丑事。王晓峰理亏，只好赔偿了出当人的一部分钱。但王对刘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从王晓峰将习齐辉拉拢之后，王多次向习齐辉诬告刘占一有反满抗日行为，又说他是黄枪会头子，并在刘占一家的柴禾垛里安赃，偷着放进三支扎枪头子。习齐辉令警务科派人去刘家搜查，将所谓“凶器”搜查出来，当即将刘占一逮捕。第二天将刘占一等人交给了驻安达的日本军官西可大尉（来青冈视察后回安达），带到青冈、安达两县的交界处林家烧锅屯（现在互助乡的新望村）活埋了。同时被活埋的还有刘占一的父亲刘广文，刘家请来说情的翻译林泽英弟兄（朝鲜族人），去安达买粮的刘老五、车掌包于占元和一个过路人等共7人一起活埋惨死。

伪大同2年（1933年）至康德5年（1938年），习齐辉在任伪县长期间积极效忠日寇，采取各种残忍手段屠杀青冈县的爱国人士，作为他向上爬的资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入青冈后，凡知国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感到当亡国奴耻辱，对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利用各种办法抵制日伪政府的统治、压迫以及剥削中国人民各种措施的推行。如抓劳工，交出荷粮，农副土特产品的统购，老百姓吃细粮犯法，实行食盐、火柴、布匹、豆油配给制等等，使中国人几乎失去了生存条件。因此，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抵制、反抗。伪县长习齐辉便下毒手进行屠杀。伪大同2年至康德5年，在习齐辉的主持下，先后5次活埋和枪杀我中国人民。1933年夏季，夜间用汽车将二十多

名中国人拉到通肯河边用刺刀捅死，将尸体扔进河内。1933年秋季的夜晚，乘夜深人静，在县城东北角外边的周家坟茔地处，活埋中国人三十多名。1934年夏季在青冈县城西门外活埋11人。1937年因兴华一带，有些爱国知识分子对日伪政府极为不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较为活跃，习齐辉为了镇压这个地区的反满抗日的气势，将10名被扣上“反满抗日”罪名的人员，拉到兴华镇东北马家园子后边枪杀了。此事件发生后，前民国的老校长贾润圃向省写信告发习齐辉在青冈县随便杀害中国人的罪行。省里用电话追问此事，习齐辉谎称是监狱炸狱，处理几个犯人而了事。

习齐辉在青冈县任县长期间，作恶多端，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然而，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却深得日寇的宠爱。日本人在青冈县的参事官松村三次向上司打报告说，现在青冈县的习县长，从事着日本皇军的特殊使命，是一位难得的好县长。这就是对日本走狗习齐辉罪恶的真实记录。

由于习齐辉在青冈任县长期间，出卖祖国、杀害中国人有功，于康德5年(1938年)，将其调往我抗日根据地巴彦县当县长。习齐辉在巴彦县任县长期间，参与了杀害我三百多名抗日将领、战士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全东北闻名的“巴木东”事件。之后，又被重用，调去牡丹江市任市长。“八·一五”光复后，习齐辉逃到了辽宁省沈阳市。1948年，沈阳解放，又逃到天津市任国民党政府要员，曾被选为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天津解放逃去上海，由上海逃往台湾。

(摘自《青冈文史资料》)

忆日本侵略者对古镇碱厂的血腥统治

李洪达

日本国内的一股右翼势力，常常借各种机会否认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行径。前一时期国土厅长奥野诚亮等连续谈话，声言日本当时“没有侵略意图”，否认日本侵略中国。他在国内外正义舆论谴责声中被迫下台后，又纠集右翼势力，继续坚持侵略者立场，颠倒是非，否认史实，为日本侵略狡辩。这引起了对当年日本侵略我家乡碱厂的回忆和无比愤慨。

我生于本溪县碱厂满族镇碱厂村。这是个大行政村，属镇的所在地，在明清时期就是我省东部山区一个兵家必争的古镇。碱厂地处本溪东部太子河畔，是个盆地形的小平原，早年是东部山区土特产的集散地和小水旱码头，在未修溪田铁路前，太子河是该村直通本溪、辽阳等地的水路运输通道，旱路四通八达，东至桓仁、通化，西至小市、本溪，南通宽甸、凤城，北接新宾、抚顺。向有“先有碱厂后有本溪”之称。民国时期是本溪县的第二商业重镇。当时全镇达八百多户，九千多人口，其中工商户占二百多户，本溪市的大商号“火悦成”还是碱厂“公悦成”的分号。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由于日伪的野蛮统治，碱厂的工商业日趋萧条，逐渐失去本溪东部山区经济中心的地位。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古镇碱厂的法西斯统治，是日本侵略中国、野蛮统治和屠杀沦陷区人民的一个缩影。1931 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踏向碱厂。1932年，在碱厂驻防并进行游击活动的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李春润部，由于日本关东军不断向东部山区增派侵略军的军事压力，而撤出碱厂后，古镇碱厂便成了日伪重要战略据点。此后碱厂人民长期在日伪的血腥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

1933年以来，日本侵略者先后在碱厂驻扎的有米冈中佐、片野中佐为首的"守备队"。1934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又改派"守备队"大队长喜多中佐进驻碱厂。当时日本侵略军在碱厂少时有二三百人，多时达四五百人。"守备队"的队部设在碱厂的烧锅"福兴魁"大院内，门前设有刺网栅栏和双岗的岗楼，福兴魁大墙的四周拉双线铁刺网，四角修四个炮楼。看上去戒备森严，实际上反映了侵略者做贼心虚。当时驻扎的"守备队"除队部设"福兴魁"大院外，"杜秀才大院"等地主大院也为日本"守备队"所盘踞。

日本侵略者除在碱厂驻扎"守备队"，还常派宪兵队和日特"搜查班"配合"守备队"镇压中国人。同时日寇还在碱厂设立了伪警察署、伪村公所，并组织了森林警察队，还把民国时期的商团改编为保甲自卫团。后来由于抗日联军和抗日自卫军等在1934年以后两次攻打碱厂的日伪机关，保甲自卫团的安团长被日伪机关怀疑，视为"剿匪"不力，在1937年左右被日伪缴械解散。此后，设在碱厂"福兴魁"大院的日本"守备队"、宪兵队、"搜查班"和设在"公昌泰"西侧"崔油坊大院"的伪警察署，则成为日伪镇压和屠杀碱厂一带民众的两大魔窟。

当年盘踞在碱厂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在古镇碱厂一带频繁去外乡"讨伐"，实行烧光、抢光、杀光政策，大搞"归屯"、修"围子"活动。

日本侵略者每次从碱厂出发去外屯"讨伐"时，见到离

“围子”较远的耕地的农民便用枪射杀，然后割下人头或耳朵带回碱厂交警察署悬挂示众，作为“讨伐的战利品”。碱厂的日本“守备队”回村，总是带回一大筐人头或一两串人耳朵。在秋冬季节，伪警察署的门前影壁下，时常堆着一堆中国同胞的人头，也有时挂着两串人耳朵。我当时在小学读书一次和几名同学路经伪警察署门前，见到影壁下堆着7颗人头，其中两颗头上被枪弹贯穿，一名相貌仅是一个十二三岁儿童的人头。鬼子在碱厂四周修“围子”后，在5个“围子”门旁的树上，时常挂着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用来恫吓当地居民，宣扬日本侵略者的兽威。然而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中国同胞是吓不倒的，鬼子每次去碱厂东部八里甸子、红土甸子、大四平、苇子峪等地“讨伐”时，也常常拉回几具日本侵略者的尸体或骨灰匣。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在碱厂的后山脚下，也埋下了数十具日本侵略者的骨灰。这是中国抗日军民对侵略者的惩罚，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拿日本青年做炮灰，侵略中国神圣领土的铁证。

日本侵略者在碱厂一带“归屯”、修“围子”时，把许多自然屯或沟岔住的居民赶到碱厂等一些大村镇里。一些为了种地活命舍不得离开山村家园的农民，不是房屋被扒、被烧，就是本人或全家被杀。日寇对“归屯”后沟沟岔岔来不及进村的居民，一律烧光、杀光和抢光。仅在伪满康德4年（1937年）10月27日的一天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就把碱厂东部一带的东营坊、洋湖沟、小东沟、红土甸子、小四平、老营沟等小屯子的三百多间民房全部烧掉，大阳屯的农民侯庆东全家12口人，当时被日本人杀死6口。据本溪县有关部门统计，碱厂以东的东营坊等8个小村落，被日本侵略者烧毁民房1 238间，有数十居民被杀。日本侵略者在强令中国人“归屯”并户时，还强迫中国的男女老幼居民在大村周围修路、挖“围子”，发现有抗拒不满

的，便拉去砍头示众。我8岁那年便被赶去修路、修“围子”，同去的还有街坊里年近70岁的老奶奶。碱厂村民在日本刺刀逼迫下挖的“围子”全部用铁刺网圈栏。围墙外挖有一丈宽、八尺多深灌水的围沟，每年水淤后便强迫居民清沟、加固“围子”。周围小屯子的居民搬进碱厂“围子”里以后，日本人命令种地时不准离“围子”太远。同时还强迫居民修飞机场、建日本“开拓团”的苗圃，致使碱厂周围大片土地撂荒，使得无数农民年年过“歉年”，靠吃糠咽菜和吃草根、树皮度日。还有很多沿街行乞的乞丐，当时本县流传的歌谣有“挖围子刺线拉，鬼子修路回不了家，山沟房子从头扒，百姓无法收庄稼……”自1932年抗日自卫军李春润部撤离碱厂起到1940年前后，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碱厂村三天两头屠杀中国人，碱厂的“西北天”（西北山脚）后沟和南城垣子边是日本侵略者砍杀中国人的刑场。当时驻在碱厂的历任守备队长米冈中佐、片野中佐、喜多中佐等和伪警察署日本指导官小田等人，每次去“西北天”杀人时，往往是前面推绑着几个要被砍头的中国人，后面跟着担凉水的伪警察，有时还带去一个长条凳子，备作摆人头拍照用。日本侵略者砍人时，先由宪兵古赖和伪警察刘运卿等人把待杀的人按到坑边上，然后由守备队长喜多、指导官小田或宪兵队长等掌刀，拔出战刀，往水筒里沾一下凉水，再逐个把绑去的中国同胞砍杀，鲜血喷溅，令人发指。在日寇统治下的碱厂居民如坐牢笼，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意宰割。碱厂村的一位妇女（农民吴大刚的老伴）因出“围子”去外屯给人看病，被日本指导官小田等抓去，以“通匪”罪名用酷刑折磨后也被拉到“西北天”砍了头。当时日本侵略者拿杀人取乐，在砍杀前，有时先放狼狗啃掉待杀人的脚跟和脚趾，然后才砍头，有时先用小手枪往待杀人的非要害处射几枪再砍下人头。我的同学关喜朋的舅父张

大伯，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因进村晚了些，便被鬼子拉去砍头。他就是先被日本狼狗啃掉脚跟在惨呼叫骂中被砍头的。日本侵略者在砍杀人之后，有时令伪警察拣起人头摆在带去的条凳上，日本守备队长喜多、指导官小田等拄着战刀站在人头后面，令本村唯一的一位照相技师王显忠给拍照。有时日本人在砍杀中国人之后，命令伪警察从尸体上扒出人心带走，听说日寇拿中国人的心下酒。当时被关押在宪兵队、守备队和伪警察署的中国同胞，有时单个地被拉到南城子边扔进日本的狼狗圈，被狼狗活活咬死吃掉，听日本侵略者说这是为了训练狼狗。也有时把在押的中国人不经审问便装进麻袋用棍棒活活打死。这些，就是日本右翼分子奥野之流宣扬的当年日寇在中国领土上所干的“没有侵略意图”的勾当。当年侵占我家乡的日本侵略者不仅以砍杀中国人取乐，也时常对无辜关押的中国人施用各种酷刑，进行惨无人道的污辱取乐。伪警察署的历任日本指导官，都残害过中国同胞。特别是鬼子小田，既是一个砍杀中国人的魔鬼，也是一个用酷刑折磨、凌辱中国人的野兽。当时我家左邻住着一名伪警赵喜三，他有次对小田在警察署用酷刑折磨中国人取乐看不下去，回家对院里邻居崔大伯等人说，小田这些日本人不拿满洲人(当时日本不准东北人称自己的祖国，只准叫满洲国人)当人了，动不动就拉出几个男女“犯人”取乐。先是把他们的衣裤扒掉，逼令在他面前“扭秧歌”，学狗爬，不从就是一顿毒打，然后用烟头烧乳房和小便。今天又拉出两名从屯下抓来的老头和妇女，一是公爹，一是儿媳，小田令人把他们的衣服扒光后，强令父女搂抱，因这父女俩反抗，被用烟头烧过后，又毒打昏死过去，简直是个野兽！当时在日本宪兵队、守备队和警察署两个魔窟的日本人及其爪牙，每天对抓去的中国人施用压杠子、上大挂、灌辣椒水、灌火油、猪尿，用

火钩火铲灼等种种酷刑进行折磨取乐。魔窟附近的居民不时听到中国同胞的惨叫声。在这两个魔窟的门前，中国妇女不敢通过，遇有妇女从门前经过，小田等日本人便喝令狼狗扑上去撕咬，然后他们在中国妇女跌爬奔跑和惨叫声中鼓掌狂笑。这些也是奥野之流宣扬的“不是侵略”的“日满亲善”的活动吗？

当年，日本侵略者为推行其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利用其爪牙汉奸残害中国同胞也是令人发指的。1937年左右日伪给碱厂伪警察署派来一名署长名叫阮子忱，他原是一个伪自卫团长，因协助日寇屠杀抗日军民“有功”当了署长。有次日本侵略者推出19名中国同胞去“西北天”后沟砍头，他为了凑够20人，又从看守所提出一人凑数。1939年左右，日特“搜查班”的贾翻译，外号叫“贾大鼻子”，三天两头在碱厂“围子”里抓人打人，被他抓去送到日本人手里，多数被杀头或喂狼狗。有一次他借口家父李文奇在村里办过女校，“有反满抗日嫌疑”，诬指家里藏有手枪，在当院毒打后进行敲诈，声言“限三天交出手枪”，否则送交日本宪兵队。后经本村商人杨茂亭等从中说情周旋，勒索去六两大烟土和一些伪币才算买了活命。此后家父吓得患了半年多病。有一次贾翻译看一名老农背的烧柴质量好，扯过来打得鼻口喷血，然后把烧柴没收。还骂不绝口地说，你这个老家伙象个土匪“拉线的”。今天大爷开恩，饶你不死！当年碱厂日伪其他一些爪牙，在逼村民修路、修“围子”、修飞机场，给日本开拓团苗圃干活时的打骂虐待，也是“家常便饭”。总之，当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古镇碱厂的血腥统治，使家乡人民和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中国同胞一样，过了14年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

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过去，丧失警惕的。决不让那些为日寇罪行狡辩，为侵

略者招魂的日本右翼分子奥野诚亮之流，再做“大东亚共荣圈”美梦！

（摘自《本溪文史资料》第四辑）

伪满北镇街村制沿革

何宋林

伪满洲国时，笔者在曹屯乡大祖村公所做事多年，对北镇县街村建制有关情况的回忆，写在下面：

北镇县街村制沿革

“九·一八”以前旧中国时期，没有街村建制，只是各屯有一名屯长和两名管理地方摊派款项的人员，也不是专职人员。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不久，开始建立街村机构。全县共有108个街村。村公所有村长1人，助理员1人办理公文，差役2人（土名“跑会的”）。这时的村务不多，在人们眼中还没被重视，只是摊派点花销而已。

1934年底，开始并村，村公所机构扩大了，合并为78村。除村长助理员外，增添事务员、雇员五六名，村丁三四人。村税增加了，开始编十家连坐制，有十家头百家长（村董）。掌管整理户口、编壮丁、修道路等，村公所象个地方行政机关了。村设警察分所，置分所长1人、警士2人，负责治安，禁止赌博，夜间巡逻查哨等。接着村公所增派棉麻指导员，开始派种棉麻、黄烟，配给肥料、药品等。

1938年为了强化街村的统治机构，又合并街村，变成32个

街村。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把东北看成是援战物资基地。街村就是征集人力、物力的执行机关。开始实行国势调查，即查清人口及资源状况。接着实行征兵制，村公所设国兵民籍系，负责调查壮丁，为征兵做好准备工作。设产业系，负责军用物资的摊派，各种农作物面积的分配，保证种植棉、麻、烟草、大豆的面积，以后还种过除虫菊，总之种植要满足军事的需要。又设劳务系，专门要劳工，提供阜新煤矿和兴安北省、三江省（两省即现在的内蒙古呼盟和黑龙江省东部）修筑战备工事的劳力。

1940年后，为扩大街村统治机构的权力和精简机构集中统治的力量，又将街村合并为20个。村公所共设4个系，即总务系、财务系、产业系、国兵民籍系，大的街村还设劳务系（一般的附属在国兵民籍系）。财务系主管征收国县税及村屯事务附加税；产业系负责完成农牧产品物资的摊派征集，监督追种任务；国兵民籍系负责人口调查出生死亡登记、国兵及壮丁的调查、劳力资源的统计；总务系管村屯人事训练，公文收发等不属于别的系管辖的杂务。当时的20街村为：北镇街、沟帮子街，闾阳村、肖家村、鲍家村、闵家村、烧锅村、大市村、正安村、中安村、窟窿台村、青堆子村、五粮村、赵屯村、车堡子村、广宁站村、张代村、汪家村、边家村、大祖村。

1945年，战争进入更加紧张阶段，为强化街村集中统治权力，又将20街村合并成12个街村，即北镇街、沟帮子街、闾阳村、大祖村、鲍家村、闵家村、石佛村、四方台村、正安村、中安村、五粮村、赵屯村。村公所内部各系照旧。

大祖村农民负担概况

大祖村是伪满街村建制开始执行时的老村。108街村时，只

辖大祖屯及南北河西两小屯。78街村时，将曹屯村的3个自然屯并入。32街村时，又将徐屯村6个自然屯并入。20街村时，又并进罗屯、廖屯等村屯。到1945年最后一次并村时，共辖12个区划，计有40个自然屯。土地有7 000天地（“天地”为当时北镇民间使用的土地计算单位，每“天地”约产粮食400斤），人口约15 000口人。成劳动力约3 500人。

“出荷”粮谷按土地面积平均每天地约400斤，全村约出荷200万斤（5 000天地）。10天地以上农户迫种半楼黄烟；20天地以上户迫种一个楼子的黄烟。中小户迫种棉麻，秋后全部送缴棉花株式会社。达不到任务的，迫交被套。农民秋天交出荷粮、棉时，是一年一度的难关。有很多农民去了交出荷的，就没有吃的，为了保住点吃的，就得豁出去受些折磨。因完不成出荷任务，被警察、村公所职员、县里派出人员，找到区划所罚跪、举秫秆、跪砖头等，受尽软硬刑罚。有的农民为私留下点棉花，以备纺线织布，就得将被套褥套交出，一看是真没有棉花了，才算罢休。实在没招了，也有全家逃走的。

农民另一个沉重负担就是摊劳工。大户有钱雇人顶替，有势力的，可以找个自由差使当当，或者在某机关哪怕是在事务所当个挂名雇员，也可以不摊劳工。小户人家虽有劳力，但全家指望这个劳力养家口，摊上劳工是最难的了，雇还雇不起，去还去不起，没法子只好自己去，全家生活就更难了。逃跑也消停不了，因为劳工是一批接一批，这次躲了，下次还得摊上。一个劳力平均两年就得摊上一次。与县里劳务股、村上管劳务的职员、区划长或警察有关系的户，虽点上劳工，但是花几个钱、送点礼请请客也可以躲过去。有的人自己去，到场一检查说有病，骂一顿，或责备村屯人员一顿，说把有病的整来干啥？滚回去！也算完事。每次要劳工都是层层加码，县下到村加一成，

村下到区划也加一成，区划长点劳工也得多加几个，这样因层层加码，他们各级管劳务的就有了受贿的机会了。全村一年约出劳工1千名。

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紧张，征集的物资越来越多，席茓、麻袋、猪皮、狗皮、羊毛、废铁、鸡蛋。他们凡是征集的东西，也都事先摸了底。1940年后的副县长是日本人，叫新川吹雄。他有几个亲信村长，就是大祖村长胡显达、鲍家村长陈秩新、赵屯村长吴正言、广宁站村长李连亭。凡有机要大事，新川吹雄就到大祖村胡村长的家里来，夜间招来几名村长，研究情况。定盘后回县，开各村长会，布署任务。警察、“协和会”、村屯总动员，有时完成八九成，实际就已超额了。任务下来后协和会先出面说为了“共存共荣”，人民得出力。实在完不成（实际超额任务了），协和会装好人向上说话，请免了其余的数。让群众还得说协和会好。总之，北镇县的日本统治者善于耍手腕，使你出足了血，还不致于要了你的命。如出荷粮要的是不少，但也不至于使你饿死；劳工是要不少，但剩余的还能种上地，这就是要长期奴役你。如同人使役牲口似的，为使你继续出力，就得留你的命。

农村无人敢惹的区划长

区划所是街村制下边的基层单位。所有街村行政事务，都由区划所来实行。区划长是最有实权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区划的“太上皇”。

日本侵略中国是分步实现的，先东北，后华北，然后深入西南向全国。东北成为它的侵略基地。东北人民已成了亡国奴，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供应地。人口都受奴役，谁当区划长都不能避开派出荷粮、派劳工、派征集物资等任务。因

此要劳工要出荷，不能怨区划长。那么为什么都恨区划长呢？他招人恨，是有另一面的情由。区划长没有违抗出荷、劳工的权力，但他有叫谁多出少出的权力。上边派10万斤出荷粮任务，他具体一分加二成，他的亲友、亲信、“靠山”、地方有势者，在他掩护下可以不出荷或少出荷；上边要10名劳工，他点了12名，上述人可以虚晃一招，过后没事。这样在一个屯子里，有哭的、有笑的，苦乐不均。他们这帮子人不负担，就加重了别人的负担，正因为有这样权力，区划长就成了区划中的铁腕人物，谁也不敢得罪他。得罪了区划长，迟早叫你吃亏受气，使你知道他的厉害。一般是暗使警察整治你，说你违抗服役或家有私货，在日本统治时期，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成是违法的。

大祖村小祖区划长×××是落魄的地主家庭出身，当过几天买卖人，给粮栈当过粮把子，能说会道，私官两厢善于圆滑，在屯中大家公认在这个世道，非他谁也应付不了这个局面。因此，公选他担任区划长。家家把区划长看成是屯中的唯一靠山。谁家私自弹点棉花被警察查出来了，就得苦苦哀求区划长。果然他一出面说说了事，对他千恩万谢，年节请吃顿饭，或赶上办喜事时，重重送点礼。谁摊上劳工跑了或者去劳工未满期跑回来了，警察保甲时常来抓找，也必须托区划长给疏通才能了事。1943年交出荷粮时受他庇护的大户未交，任务差的太多。他与村上谋划出“报恩”一词，使土头土脑的中下等农户在完成任务外，再加二成报恩粮。有一家姓毕的知道底细，揭了他的底，他哑口无言，取消了他的报恩粮。但时过不久，分所长“于小胡子”来屯督催出车修县道，他眼珠一转就说：“毕家的车要不动，影响修道。”于小胡子立即找毕某打了一顿，还得他出面给讲情了事，好坏人都是他。所以人们对这位区划长敢怒而不敢言。谁要触犯了他，谁去劳工管保快，这种小鞋准穿上

了。这位区划长对上级善于逢迎，成为大祖村长胡显达的四大得力区划长之一（其余三个是金屯的、廖屯的、罗屯的）。这位区划长在本区划也笼络了一批有势的地主作为他的靠山，如潘××，连户牌长毕××等支持他，使他得以连选连任到底。

这位区划长变相贪污很巧妙。一年四季县村级人员、警察分所人员来区划时，都是在他家设宴招待，不但家人及帮忙的跟着吃喝，连他家的伙计也都沾了光，吃得嘴巴溜油。招待费是“白条”帐，说多少是多少，按地均摊。屯中人背地叫他：“白尾巴狐狸”。每年配给迫种烟棉土地肥料，谁也不知多少，分下去一点儿，走走过场，大批肥料被他私吞。

（摘自《北镇县文史资料》第八辑）

伪满时的保甲制、街村制

黄显升口述

文建章　潘殿刚整理

1937年4月我到洮安县（1938年5月1日改称白城县）苇子房保公所任事务员，第二年又考入白城子街公所任司计，1941年到平台村公所任助理员，后又到大兴村公所和格索营子村公所任村长，直到1945年8月祖国东北光复。

推行保甲法，强化殖民统治

伪满时的大同年间（1932年和1933年），洮安县的基层政权仍沿袭旧制，县内设警察局，下有8个警察区，每个区都设警察署，县里还有警察大队，负责“清乡”、“剿匪”，维护地方治安。各警察区虽有自卫团，但受彭金山的自卫团统带部管辖、指

挥，警察局管辖不着。一个警察区内有两三个村，全县不是29个村就是30个村，都是小村，村有村长，一村管辖3至5个屯。

1932年8月29日洮辽警备军第九团（白团）与八区部分自卫团举行武装起义后，日伪当局趁彭金山调到郑家屯任职，首先废除了自卫团统带部，将各区自卫团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县长（实际上交给了县公署的日本参事官），并对各区的自卫团进行了清洗和整顿。

1933年12月22日伪满政府公布了暂行保甲法，1933年1月17日公布了"暂行保甲法施行规则"，同年12月22日又公布了保甲法。洮安县于1934年（康德元年）实行保甲制，将全县城乡划为21保，保下划甲，甲下划牌，城内一牌有50户，农村大屯划两三个牌，小屯一个牌，还有两个小屯划为一个牌的，户数在四五十户之间。保设保公所，有保长、会计、事务员等，甲有甲长，牌设牌长。每个保内都设自卫团，自卫团有团长，也叫保董，下有三十到四十多名自卫团员，武器都是县里发下来的，是一些过去从乡间收缴上来的私人杂牌枪。有的一个保（单保）建一自卫团。有的两三个保（联合保）建一自卫团。当时社会秩序很乱，为防范"土匪"，维护日伪统治，自卫团员都吃住在团部，昼夜值班，并有电话和县里相通，随时汇报"匪情"，听从县里（主要是警务局）的调遣。实行保甲，是"十家连坐"下来的，一人通匪，全家受罚，一户通"匪"，邻居受株连，一保内出了"匪"，将要制裁保长。建立保甲就是互保不通"匪"，不资"匪"，防范"坏人"进保甲防区。

在第1警察署（白城子区）设了5个保，在城外设了3个保，即三合屯保，保盛屯保（保长陈德生，土改时被镇压），太平庄保；城内设两个保，以现明仁街为界，划分东保和西保。东保长韩成林，保公所设在现五金一商店大楼处，西保长王晓峰，保

公所设在现水果店大楼处，两个保一个在道南，一个在路北。乡间19个保都有自卫团武装，城内东西保与外乡的保建制一样，就是没有武装。在第2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大兴屯保，保长刘万仁；苇子房保，保长高永吉。第3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哈尔呼吉保，保长徐士武（后任花拉道村村长，土改被镇压了）；花拉道保，保长的名字忘了。第4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程四家子保，保长姓聂；十家子保，保长姓季。第5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30户保和满洲岱保。第6警察署区内设3个保，有西五家户保，保长是小龙湾屯的孙绍华，孙后来到大兴村任过村长；有胡宝山保，保长黄云卿；还有高世功保，保长郑相庭。第6警察署区内的3个保是联合办公，联合保公所办事处就设在胡宝山屯，3个保长轮流到保公所办公。第7警察署区内设3个保，有五棵树保，白庙子保，索格营子保。第8警察署区内设2个保，有苗家窝堡保，红八塔保。

我在1937年4月在苇子房保公所任事务员，保长是保公所西高大骡子屯的高永吉（高兴阶），他经常在保里吃住，那时保上的事情多，胡子也多，县经常来电话，他不在保里不行。保公所驻有自卫团，团长也叫保董，姓马，他归警务局管，但也听保长的指挥。我和保公所的会计薪水都是三十元左右，保长和保董挣的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职务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当。枪是民国时散在人民手中的枪，啥枪都有，很不统一。自卫团员都是当地人，每人每月20元左右，还有“马乾”（读gān，马的草料费用），每天5角钱，一个月可有三十多元的收入。

苇子房在大沁塔拉草原的边上，过去那地方常闹胡子（土匪），于八店那地方就是胡子窝，像兰家围子屯和勿兰巴打南屯，都有“活人”，谁家被胡子绑了票非找他们去通融不可。但胡子对大户人家也不敢怎样，因为大户有枪有炮台，一时打不下这

个“窑”（指院落），还容易遭到警察大队和自卫团的增援和袭击。一般他们抢的都是些中等农户人家，抢完就走，不在一地停留更多时间。我在苇子房保公所只呆4个月，有胡子路过，但还没有发生大帮胡子攻窑抢劫的事。

1937年8月，我到胡宝山保办事处，是总务兼会计。这个办事处是3个保（胡宝山保、高世功保和西五家户保）的联合办事处，地点就在胡宝山屯。后来我才知道黄云卿在白城子也是很有名望的人。他和李方（其父李云起是放荒“揽头”，30户大地主）是亲戚，和杨春甲也是亲戚，杨父杨润波是民国时的省议员，是黄云卿的表兄弟。民国时奉天省有省议会，一个县一个省议员，可见杨润波在洮安县里的名望地位是不一般的，杨春甲也是大地主。黄云卿有这样两家靠山，所以才能当起保长来。我到白城子来，就是高永吉和黄云卿举荐我，我才来的。这个联合保的办事处3个保长轮流住在保里。这3个保就一个自卫团，保董姓郑，下面有二三十人。这3个保内很太平，那里一马平川，又是洮安县（白城子）的中心，没有闹过几回胡匪。

伪满康德4年收缴枪支，自卫团随着也撤掉了，加强了警察力量，以后警察也多了。日伪政府为了巩固保甲制的实施，各警察区也设立了相应的警察分所；白城子警察署设立了三合屯、保盛屯和太平庄警察分所；苇子房警察署设立了大兴屯分所；哈尔呼吉警察署设立了花拉道分所；十家子警察署设立了满洲岱分所；胡宝山警察署设立了西五家户和高世功分所；白庙子警察署设立了五棵树和索格营子警察分所；苗家窝堡警察署设立了红八塔警察分所。

全县一共有多少甲我不清楚，象我呆过的苇子房保就有5个甲，即苇子房（修好屯）、王豆腐房、金钱达、平顶庙和勿兰巴打。胡宝山有陈树政、方家、龙湾、胡宝山、陶家屯5个甲。

西五家户保有4个甲，即西五家户、东五家户、凤凰城和聚宝山4个甲。高世功保有4个甲，即日升屯、田喜屯、刚喇嘛屯、高世功屯。至于每个保都各划多少牌，我更不清楚了，因为保就管到甲，一切都与甲联系。

保直接归县里管，保公所的呈文直接送到县长，上写“××保××号保长×××”中间写“洮安县长殿”，不与区（指警察区）发生关系，县里文件也一直到保。保里关于其他事项报告则报告有关科局，如关于人口的事报行政科，关于耕作方面的报实业科，关于征兵的事报动员股（国兵民籍股），如此等等。

全面推行法西斯政治，实行街村制

在白城子实施街村制是从伪康德5年（1938年）5月1日开始的。根据街村制“规则”，废除了保甲制，把原来的保并为街和村。同时洮安县也改为白城县。白城子街内原来的东西两保撤销，建立白城子街公所，街长韩成林。将白城子街外原来的太平庄、三合屯、保盛屯3个保合并为太平庄村，村公所的地点就在保盛屯，村长先是高村长，后来是门玉璞。将苇子房保和大兴屯保合并为大兴村，村长徐世武。将哈尔呼吉、花拉道保两个保合并为哈尔呼吉村，村长范仲庚（先是徐世武，范原是助理员）。将程四家子、十家子两个保合并为十家子村，村长郑长仁。将三十户保、满洲岱保合并为三十户村，村长黄云卿。将西五家户、胡宝山、高世功3个保合并为胡宝山村，村长杜永书。将五棵树、白庙子、索格营子3个保合并为白庙子村，村长高永吉。将苗家窝堡、红八塔两个保合并为红八塔村，村长孙连才。全县共划1个街和8个村，随着保公所撤销之后，原来的甲也就改为屯了。康德6年又增设三合屯和索格营子村公所。索格营子村长李瑞（号雪峰，原满洲岱教员），三合屯村公所村长冯绍箴

（后门玉璞）。

伪康德8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为适应其日趋紧张的局势，便于支持平台军工基地的建设，便于督促出荷和经济统制，又将胡宝山村的东五家户、西五家户、凤凰城、聚宝山及红八塔村的四马架、张俭屯、三畲堂等十来个屯设立了平台村，村公所设在平台，村长门玉璞，后来是刘景兴。由于哈尔呼吉村公所管辖地面太大，如六家子都近镇东了，就在楚伦坡东，即洮儿河堤东头增设了花拉道保村公所，伪满白城县农村的12个村公所建制直到1945年8月东北光复。

我是在胡宝山保通过考试进入街公所的。1938年5月1日成立白城子街公所，我是5月2日到街公所的。街公所有几个系，行政系有王书润、董士膚，财务系贺移坤，国兵民籍系的孙家象等人。当时街长是韩成林，是当地士坤。他的老叔早年曾任税捐局长，他的姑母是万福麟的大太太，万国宾则是他的表兄弟了。韩成林当街长可能也借万福麟的光，当时万福麟正在关内与日本军队作战，安排他当街长可能也是作为对万福麟等人的一种引诱吧。韩成林当街长时间不长，到伪康德7年就把他给免职了。因伪康德6年3月24日公布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法律开始实行，日本在白城子领事馆（现五金楼地址）撤销，日本居民完全由街公所管理。当时县城人口25 000多人（25 107人）中，日本人就有2 000多人（2 057人）。伪康德7年以后“出荷粮”日紧，配给物品增多，人心不稳，街公所也派进了日本人任职，韩总和日本人顶牛，就遭免职了。韩离职后，没有街长，则由日本人岛村副县长兼街长一职，副街长由楢本、遇那岭两个日本人担任。伪康德7年又派来安永宽任街长一职，安只呆了3个多月，也因没处理好同日本人的关系被调离。之后就派来日本人安武晨喜任街长一职，副街长先后由张玉麟、王

盛贵（王尊庭，原县公署行政科长）担任，直到1945年8月光复。

我乍到街公所的时候，白城子街内仍是两个保，保下面是甲，大体上是一条街的方块为两个甲，甲下为牌，每牌50户左右，光复后才将牌变成闾。1938年年底，白城子街内才撤销了保，划了10个区，区有事务所，虽然不是一级政府，但有区长、副区长和事务员等，百姓有事就到区里去办。特别是康德7年实行配给制后，区里的事就更麻烦了。配给的东西太多，是凡日常的东西，如棉布、胶鞋、白糖（粮食用户口簿）等都配给。先是发票，后来发现票易作弊，有票买不到，就用配给簿了。簿里面有项目，棉布一年一次，胶鞋一年几回，糖也每季给一定的数量。各商店也有簿，也限制。各部门买统制的东西要请求，要批条子，如大米、白面都得批条子，布也统制。各家都有配给簿，都得到区上办理。街里服役、出劳工，日本人要修什么，从街上要勤劳奉仕，街上组织义勇奉公队等，都通过区，所以区里事情繁杂，工作很忙乱，几个人也干不过来，往往要找帮手。白城子街10个区的区划是：车站以东沙坑从南到北那一长条地带是10区；铁路居宅是9区；西门外是5区；1区是现市公安局北到铁路；2区在现联营商场大楼以北；3区在现百货大楼以北；4区在百货八女商店北；6区在浴池大楼以南；7区在地区医院大楼以南；8区在福仙居大楼（原明仁文化馆）以南。城乡有街、村公所，县、省有公署，伪中央有国务院、人称“四大政府”，伪满统治机构这才定型。

村公所有村长、助理员（相当副村长）、司计（会计）。村长负责全村工作，助理员辅助村长，司计主管全村的财务和村公所机关的一切收支。下设5个系，有庶务系，负责人事、掌印、文件印发、总务以及礼仪（祭孔孟、祭关岳）等项工作。行政

系，负责修缮道路、河川、桥梁，人口、卫生等项工作。财务系，具体负责理财、征收，征房地产税、勤劳所得税、附加费、卫生费及税金，收滞纳金，或豁免税金等；那时户口是双重管理的，街公所管户口，警察分所也管户口，也都查户口，但目的不一样。街公所管是掌握人口数，控制统制物品发放，青壮年服劳役，出国兵；而警察分所是控制外来人，和各种罪犯流入。至于卫生完全由分所管，街公所只是配合。征收附加费是街里花销，摊在各种税项上面的钱，加的虽少，街公所每年也能收上3万5万的，收上之后，归街公所自用；各村在收税时也加附加费，归村公所用。实业系，管工商业情况统计、土地播种面积统计。伪康德7年后还负责粮谷出荷、统制物品配给等，对土地耕作面积及时填写上报“割当”（日语，既有情况数）表，后连种大麻子、养牛、羊、马、鸡等都得报数，都得分配任务。国兵民籍系，负责征兵、服役、劳工等。各系都有系长1人，事务员、雇员四五人，夫役（勤杂工）1人。一个村公所都有20余人。属实业系、国兵民籍系最忙，所以人也多。村公所是合署办公，助理员、司计和各系长都是官，但助理员和司计是县里任命的，并对各系实行监督。各屯有屯长1人，每月5元“手当”（跑腿）钱，还有事务员1人，每月30至40元，相当村职员，是村长任用的；下面牌有牌长，没有钱。

街公所的机构除街长外，其它与村公所机构相同。在伪康德8年白城子升为指定街，提格了，各系都成股了。到了伪康德9年街公所的各股就变为课了。课长下有事务员，还有若干雇员。课下不分什么，但有某项工作的担当者，各村也就变系为股了。以前的普通街和各村一样归县管，划为指定街后，就直归省管了，并成立筹备处，做进一步变市的准备。当时的街长就是日人安武晨喜，他来我就调到平台村公所去了。

白城变市在民国时就筹备过。兴安屯垦军民国17年来白城子，要把白城子变为兴安市，所以邹作华督办出了很大力，修建了八大处，划定了街基．动员修门市盖房屋，现在的主要街道就是那时候规划的。当时买街基都得自出现金，但为了壮市面，修街基、盖房子，可以向银行借钱。当时白城子买卖少，富户不多，是个后开辟的地方，人们没有钱，修房子都是向银行借款的。如彭金山、韩成林等各家修不少房子，都是从兴大银号借的钱，是现大洋，各家都借出多少我不知道。我来白城子几次，看白城子修建的确快，只两三年的时间，房子全起来了。那时的白城子街内啥买卖家都有，如精忠书馆、大烟馆、饭馆等也纷纷建立起来了，市面很是热闹。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而没有变成市。兴大银号是国家的钱，后来政局变了，彭金山他们借光了，都白捞一笔大钱。日本来后，也就没人提这些事了。

伪满康德5年或康德6年，日伪当局曾计划向白城县迁移日本居民100万，把白城子街向西扩展到三十户，向西北至平台、平安镇直到镇西（当时叫索格营子），要建成为一个大市，拟建纺织以轻工业为主，并有水产加工、罐头食品、淀粉加工等，同时也计划修建一些钢铁厂等重工工业。各工厂、商业区、居民区的布置，都制成图，存于县都邑建设局内。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忙于战争，无暇顾及，这项计划也就随着破产了。关于城市建设原来县公署行政科内有一管绘图姓邢的雇员，谁家盖房子都得找他批，并经他绘图。后来由行政科分出一个都邑计划局，局里有一日本人姓岛内，专管绘图。康德5年我调到街公所，大兴城市建设，岛内经常找我，说“黄商（“商”日语“先生”的意思）你的帮我改图，改一个图3角钱。”当时我负担不重，就帮助他修改，对图上的街道、胡同地名不

符或位置不对的地方进行校正。我工作细心，很得他的赏识，于是他就拿出一个大的规划建设图来，让我校正。这就是白城子移民百万的规划图。由于白城子变市、移民百万牵涉许多村屯地名，所以，我才知道这项计划大致的内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都邑建设局就撤了，成了县公署建设科一个股，也就没有财力去搞建设了。就剩下日本这移民计划图了。

白城子街公所下属有一个窑厂，还有一个卫生场。窑厂在伪满初年就有，地点在城北三四里地万家屯后边的德善屯，有好几垧地，主要是烧砖。卫生场在城西乱葬岗子西，有一百多人，负责清除城内厕所粪便和清扫大街。选卫生场地点，日本人曾跑了大连、海城、辽阳、长春、四平等地方学经验，最后选在了那里。那时没有汽车，往城外拉粪有40至50辆马车。城内修不少公共厕所，修的不怎么好，但很干净。雇有监督员，一天清扫几次，兼收卫生费，每户一月三四角钱。就这样北门外日本住户还常常给街公所打电话，说厕所埋汰了，粪便沾脚了，就得叫人去清理，弄得天天不得消停。五金商店大楼地址原是日本领事馆，领事馆撤销后，改兵士乃家，后又改军人会馆。现市工会地址伪满时是日本武术馆（柔道），康德4年街公所搬迁到那里，武术馆和军人会馆都迁到现劳动公园处，其路东又修了神社（后立石牌坊），北门外路东路西盖了许多房屋，全是日本居民的住宅（光复后全扒光了），成了日本人的居住区。因卫生场赔钱，后来就包给白雨希了。白雨希民国时曾在黑龙江省某师当过副官长，伪满住在白城子。他和郑潆桥关系好，由郑提议并用郑的恒丰厚粮栈担保，把卫生场包了去，由此发了财，白郑两家还成了儿女亲家。在城西乱坟岗子那还修一个火葬场，火化用的是汽油和柴油，人们都称为“炼人炉”。日本人大人小孩死了都火葬，交火葬使用费，之后将骨灰装在木盒里保存。中

国人也有火葬的，但为数甚少。

伪满康德2年白城子就有大烟馆，康德3年最兴旺，有5个大烟馆，有俊兴隆、赛桃园、宝丰久、兴隆号、新兴号等。这些烟馆都归县里管，街公所不管。我在街公所一共4年，后期升为司计，兼总务系长，又兼庶务系长。那时是人财主义，我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什么靠山，完全是自已干出来的。我刚到街公所工薪是35元，一年内连提3级，长到50元钱，那一年我还买1张1元的彩票，中了5彩，得了50元钱，确实很顺当。但街公所内工作也不是好做的。除两个日本人副街长外，街公所内还有几个日本人和朝鲜人任职。如实业系（管配给）的清水、三浦、大久保，还有一个朝鲜人李某，财务的佐佐木（女），他们与副街长一起掌握着实权，特别是楢本副街长他精通会计，直接管理财务，对窑场、卫生场和火葬场的“三场”财经收支，都直接过问、查看，稍有疏漏，便遭训斥。

伪满时各街村的会计独立，司计负责财务工作，上级审计局经常来检查下面支出情况。来时事先不通知，一来就是一大帮，有二三十人。到街、村公所后，屋内的人不许再干什么，都得站起来接受检查。他们对各股挨个检查，特别是对会计帐目和金库检查的更严。每笔大的支出和收入都检查单据，每份支出单据上都印有现成的报销表格，附在单据的前面，村长、助理员、司计、系长和担当者（经手人）都得盖章。每日金库内存款都有记录，10元的多少，1元的几张，甚至几角、几分都得填好数目。在审计检查时，差几分几角还可以，如差多了就不行，就算失职，犯错误，就要受处分。所以做现金的，每日午后下班前必须下好白天经手的各笔帐，并清点库存现金，作好记录，以备检查。街公所管财务支出有三四个人，而村公所只司计一人，各屯有记帐员（事务员）一人。司计每年末除了

作当年决算之外，还要做好下年的预算支出。会计科目大的方面有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预算超越支出（追加）。

街公所每年开支预算要十几万元，共中卫生场就要花掉四五万元（去掉收入）。当时俸佣工资有分别，街长、副街长、司计以上是官叫俸给，事务员叫工薪或薪水，雇员是薪金，佣人是工资。办公费的项目还有祭祀费，每年要祭关（羽）岳（飞）、祭孔（丘）孟（轲），还有其他费用。街公所的日本人经常过问帐目，我当会计，特别是接近年终，他们就问我还剩多少钱。当时每年年终结余，不论多少，都得作表上缴。他们听说还有多少结余，就填条子，如下乡旅费等项目报销，使一年预算没有结余，之后几个人平分（也塞给我一份）。

伪满康德8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街公所动员股的事务就多起来了。以前街公所主要应付日本军队经常调动，来一拨军队，就要一次劳工，主要是修整大青山的飞机场和从铁路上运输东西。当时汽车没几台，全是大车，当时叫服（劳）役。要人要车全向买卖家要，买卖家出不了人，就雇街内的闲散劳力。服役的人，日本军队虽然给点钱，但很少，除去吃饭，所剩无几。至于出“勤劳俸仕”、义勇奉公，这事归行政股管，则不给什么钱了。去劳工多数是修大青山的飞机场，这个飞机场不如平台北大岗上的飞机场大。平台是伪满一个大型的飞机场。大青山飞机场修时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基础不好、简单、不规格，为适应飞机起落需要，每年都要整修几次。此外，每年到外地出劳工还要两三次，地点不固定。

白城子街那时只有4 600多户，人口25 000多人（1939年统计4 610户，25 107人），日本人就占600多户（675户），2 000多人（2 057人），占城内户数的15%，人口的8%。他们不出劳工，也不出钱，所以当时城内买卖家负担是很重的。伪满康德

6年三合屯建村时即成“自然村”(即“模范村”，每县一个)，外来人参观都去那里。三合村虽然地势高，在三合屯中有个大架子，是地高的标志，据测量比洮南高出几十丈，但土壤肥沃，农作物连年丰收。建为“自然村”，县里专门为他们培养作物种子，进行种子改良，县里对他们优待，农民道场还派一名技术员进行指导。当时每县都有一个“自然村”。那年日本还在三合村排过电影，片名叫《满洲大地》，当然拍的是电影的一部分。在那里主要记录了农舍、牛羊群、高粱、苞米、谷子等农作物，还录了农民劳动场面，手摇“乌橹把”(提井水的工具)的情景，在放映时，还组织伪职员和居民们去看，以显示日本侵略者所鼓吹的“王道乐土”。

伪康德8年4月魏绍书任街公所司计，我就到平台村任助理员(副村长)了。平台原来没有村的建制，是因为大岗军队逐渐增多，胡宝山村公所应付不过来而建立的。在平台村公所我只呆了8个月，于同年底(11月)我就调到大兴村公所任村长。

原大兴村村长是孙绍华(五家户保保长)。大兴村地主多，读大书的多，“邪神”也多。敌伪时期当村长一要体察民情，二是为当地农民(中小耕地户)解决些问题。孙绍华在那以“官相”压人，所以当地“邪神”就找机会告他，直到把他告走。大兴村管辖地面很大，下辖13个屯，83个小屯。白城子南部的土地好，民富粮丰。虽然哈尔呼吉、十家子靠河一带涝，但年年都有好收成。伪满以后靠河这一带因连年水涝都已荒芜，日寇借口“开发”把这些土地连同镇东县的一些靠河土地，全都变成了日本殖民的开拓地。镇东县给占去多少我不详细，白城县就给占去17 000垧，大兴村南部和东部土地全给占了去，整个草原为开拓团所有。那时白城县是12个村，136个屯。伪满各

村长都兼协和分会长，白城县南边4个村即大兴、十家子、哈尔呼吉、花拉道保算一个片，这4个村每年开一次协和分会会长联席会议，并选我当会议主席，连续3年，所以那边我去过不少地方。镇东县风水山那有日本开拓团，白城县所占去的大片土地都没有日本人，土地任凭荒芜，人们也不敢去种。就是有个别农户偷着种点小地块，夏秋日本人到各村调查，被查出来也得交“小作料”。

伪满康德8年正是“出荷粮”紧张的时候。过去农民虽负担“军粮”，但摊派的很少，还按市场牌价给点钱。那时的粮食也贱，一斤也就是几分钱。自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之后，“出荷粮”的数额也增大了。起初，县里给一个“割当数”（据播种面积），秋后按“割当数”“出荷”，交完“出荷粮”后都给一些钱和布。伪康德8年的“出荷粮”数是根据各村年初报的数要粮。康德8年正是涝年，而要的“出荷粮”却比往年高出很多。如大兴村2垧地，要“出荷粮”50 000吨，各村完不成，县里就派督励员去督促。督促不上来，就派县公署、协和会等组成“督励班”下去催逼，对人们施加毒打，翻找粮食，搞得很凶。我刚到大兴村，去的是县公署财务科长张太行、股长田光玺（外号田老美）、薛奎武（国兵民籍股长）、杨瑞峰（日本翻译）等一帮人。他们没来前，我就和农民讲，“你们一定要留足口粮、种子，之后再交‘出荷粮’。有就交，没有不可强交。留下的粮食，不能藏在明面或容易翻出的地方，要藏就把它藏好，不能叫人给找出来，找出来就得挨打。就是挨了打，也不能乱说。”张科长他们来后我亲自领着到各屯农户去查看“出荷粮”情况。多数人家没有完成“出荷粮”。他们想要打人，我说：“打能完成‘出荷粮’还行，如果打也完不成怎么办？”他们没啥说了。我又说不是按年初的“割当数”吗？看那家欠交多少，就追要

多少，交不足再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各想办法。到县里，在村里我都说："没有粮就是没有粮，地都涝了，还产什么粮?"开伪职员大会时，县长把我好说，说我挡道。会后有人和我说："没有粮也不能那么说。那样说话危险!"我说："那不行，说有粮，粮食在哪里，完了老百姓受苦啊!我这村长怎么当啊?"我知道农民没有粮，说想办法，就是把事情拖一拖。出钱买粮，老百姓哪有钱啊!我找县长不行，于是我找县公署实业科日本人小川科长。我说："大兴村遭受水灾确实不轻，农户的口粮明年有问题，种地都有困难，今年的'出荷粮'难以完成。"请他和日本人副县长说说。日本人副县长问我："你说的属实吗?"我说："属实。"他又问我"你敢保证?"我说"敢保证。"他又问我"拿什么保证?"我说"剖腹。"日本人不讲起誓讲剖腹，以表忠诚，结果给减免了近1 000吨。第二年夏天，我又找小川科长，说农民现在没粮吃，有的已揭不开锅了，现在莳弄地有困难。我是从城里去的，又在官厅呆过多年，小川相信了我的话，说："你写条子来领米吧。"于是我就先在村公所给缺粮户打条子，小川批后，就直接到粮栈领米，完了我同小川算总数。那时大兴村缺粮户，用小车、驴驮、担挑，整回不少，群众很满意，直到青苞米下来。那时官员间不准送礼，有特务、宪兵，一旦查出来，算行贿受贿，是犯罪，特别一些特务腿子总是闻风探讯，得点情报就往上报，所以他们也不敢收礼。于是我就借去城里办事的机会，请他下小馆，共同吃饭，他到大兴去，我也请他到家中吃饭，两人关系处得很好。以后我到索格营子任村长，又给那里减免过出荷粮500吨。

"出荷粮"事过后，我就和村公所实业系的人说，今年自报的"割当数"有去年的教训，地数和产量估计都不能报高了。对农民也讲，今年领配给粮就这么一次，明年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康德9年以后年成都很好，康德10年崔宝山转来当县长，这个人不象刘鸿谟，能替百姓说话，敢“抗上”，不怕得罪日本人，但他只在白城县呆了1年多。我从配给农民的白面中，给崔宝山送去两口袋，他很乐，我又给日本人副县长送一只老鹰，所以他们对我印象都很好。以后“出荷粮”虽然仍很紧，但“出荷”数都完成了，吃的也就不那么紧了。

伪满时在各村都建立协和分会，分会与村公所一起办公。协和分会除了宣传“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内容外，还经常往上级协和分会反映人们的思想动向，对大事反映，有关作物生长及收成情况等。村长兼分会长，另有专职副分会长和书记（都是上面派来的），村长只是挂名，他们有什么事要向村长汇报，村长一点头，他们就往上报了。兴农合作社在村公所派有驻在员，主要是反映农情，进行生产指导等。

刘鸿谟当白城县长时，去大兴村，到过四十户，到过交通窝堡。据说四十户在民国时还是一个大村呢，后来划入了苇子房。他在交通窝堡住过一宿，偏遇上有人报告一伙要钱的，叫他听到了。我对村公所的人说：“你赶快告诉他们，县长在这呢，要要就到别的地方去要！”刘洪谟听后说：“哪要钱，把他们都抓来！”并指责我说的不对，“上别的村去要钱，也没有出白城县哪！”我说：“我是村长，不是警察分所长，不管要钱。”刘县长听后更不愿意了。

为什么有人骂刘鸿谟呢？他在哪些地方不好呢？伪满康德7年刘鸿谟任白城县县长，刚刚上任就指出实业科所报的地亩数和农业收成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来白城县当时由于水涝实际耕地只有14万垧，他却报了20万垧，把开拓团占去的土地都给报上了。第二年的“割当数”就做多了，象春旱秋涝，粮食减产，刘鸿谟不下乡察看，却在省里大吹白城县丰收，结果

“出荷粮”比上一年多了不少，多出的只好向各村硬摊派，向种地户硬挤，挤不出来，刘鸿谟就派人下乡紧追、硬逼。人们完不成，就进行打骂。我去大兴村任职时，就听到农民的谩骂声，刘鸿谟只顾日本人那边的一头热，而不顾中国人民，所以人人都骂他是汉奸。伪满时的县长、村长以及一些科长没有在一个地方呆长的，最多3年，就得调动一个地方。刘鸿谟没呆3年就走了。

伪康德11年3月1日，我转到索格营子村，那地方日本军队多，总向地方要车要马，地方百姓拉碱土，事先必须和他们联系好，不联系好，就不让你上大岗。日本人忙于备战，每隔十天八天就来一批军用物资，从火车上往下卸东西，往大岗上运，都要地方出车、出人，最多时一天要过51辆，一个屯一辆车，并要很多人前去卸车，往北大岗上军事基地装运。村长经常的工作就是与日本军队打交道，来来往往，你找我要人要车，我找你网开一面，给予方便，每天都是这些乱事。在白城子日本军队很多，据我知道有培芝部队、国本部队、国芝部队、大岛部队、游佐部队……，有一二十个。就大岛部队是战斗部队，共它部队性质不详，平台、平安镇都有飞机场，大岗上好几百里方圆内没有人家，又是最好的靶场和伞兵练习降落的好地方。后来大部队调到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去了。游佐部队，又叫336部队，是训练军马的，这个部队我去过，其他部队很保密，有些事，不让你去，更不让知道。

伪满的各村都有一个警察分所，分所一方面维护地方上的治安，另一方面也监督行政。如果村公所与警察分所处好了，麻烦事就少，如果不对头，出事就多。有次索格营子村公所司计和助理员杀羊，一个村公所二十多人，打算大家分点，这事却让警察分所给检举到平安镇警察署，后又送到警务科。原来索

格营子有一个张某还是我的一个亲戚。这小子很坏，专搞小报告一类的事。他和助理员、司计有别扭，一见司计和助理员杀羊，违犯了统制法，就向警察分所告了密。我知道后，就向他讲："你怎么能随便报告呢？你事前没告诉我就告密，这不是从中整我吗？"我把他说一顿，随后我坐上火车直赶县里找了崔县长，正好崔县长收到了密告信，我把情况一说，才把事情压下来。

伪满时的警察厉害，他们可使用刑罚，并好动刑，打嘴巴、踢人是经常事。如灌凉水、灌辣椒水、打鞭子，什么都干，我见过灌凉水的。胡宝山有一个姓孙的是个地主，不知道得罪哪个警察了，给整到警察署，把人放在一个长形木槽里，胸腹、膝盖都用绳子牢牢地捆在木槽上。在脚部垫上一个板凳，使头部朝下，再用一月牙形的东西卡住脖子，然后用水壶往鼻子里倒凉水，使人喘不过气来，边逼问边灌，一会儿就从鼻孔流出血来。还有打鞭子、打棍子、打皮带，是叫人在地上撅着，露出后背和屁股，往后背上打，往屁股上打，往大小腿上打。日本警察用鞭子打人最厉害，他们是用鞭子抽打人的肋条，这和灌凉水一样，人都受不了。哈尔呼吉警察署长刘孟逵，原先当过特务股长。有一次抓赌，抓着几个人，把1个人绑在车轮上，然后用脚踢，踢到小便上，把人活活给踢死了。所以在伪满时人人都怕警察，恨警察。

我在索格营子只呆1年多时间，家在白城子街里，每日早上坐轻油车去，晚上坐轻油车回来，很方便，司计和助理员也来回跑。1945年8月11日我回的家，8月12日苏军就进了白城子，以后我再没有去索格营子（镇西）。

现在提出要抢救伪满史料，对我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年纪太大了，蜡头不高了，只有密切配合，讲出自己

所历、所见、所闻的一切人和事，做为自己的奉献吧。

（摘自《白城市文史资料》第七辑）

日伪时期长春郊区的大南村政

李子新

马殿俊　丁淑芹整理

保甲的职能

保甲制度是在敌伪建政初期，沿袭旧社会十家连坐制度而来的，十家连坐的意义是一家有事十家不安，一家违法十家受罚。保甲是警察局的下属，行政事务不多，主要任务是治安。旧社会是滥用职权的时代，保甲就是警察的帮凶，可以随意逮人。

自从1935年后，伊通县重新调整一次保甲区域，并加强保甲职员之人选，那是为了施行街村制打下基础。但在1939年伊通县施行街村制时，街村的职员是换汤没换药，仍是原保甲的那些人，所以警察官们把街村职员仍看成是他们的走卒，村警双方经常发生矛盾。

缴枪和集家

缴枪和集家是日寇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人民之铁证。日本侵略东北以后，恐怕人民起来反抗，他们首先把民间之武器（包括洋炮、大枪、土枪在内所有冒烟武器）全部收缴，集藏在县城。以后他们仍不放心，又把偏僻村落拆除，把抗日救国的组织与群众隔绝，强迫实行集家。当时执行集家命令的是伪警

察署长，他的辅佐助手是派出所长和保甲长，凡是被拆除房屋无家可归的人们，都遭受着极大的蹂躏和痛苦。

街村的成立

伊通县是在1939年2月1日，将全县保甲全改为街村的，当时大南屯是大南村公所所在地，第一任村长林子然原是林家屯甲甲长，第一任助理薛占鳌是原大南屯甲甲长，以下设庶务、财务、行政3系共有20余人。下属有大南、加官、热闹、林家、庄油坊、二道沟和房身沟7个行政区，每区置区长1人、助手2人。

大南村管辖区域，东起逯家窝堡东张申沟，西至石灰窑，东西将近30公里，南北约有15公里之多，成为一字形地域。

在未施行街村以前，保甲职员很盼望早日施行街村，他们的认为是：街村是国家的法定地方政府，是纯行政单位，能摆脱警察的统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敌伪政权中的矛盾。

加强监督管理

伪满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起所谓大东亚战争，一切物资均以军用优先，所剩无几，给老百姓平常吃的白面、豆油都列入配给之内，白面只到三节供应，在旧历年时（春节）每人只发给半公斤，豆油更少。虽然少得可怜，而商人是以挣钱为目的，对村民的饥苦很少考虑。大南当时比较大的商号，只3个，有永和公、天增福、景华新。这3家商号是经伊通县工商会批准的配给品商店。

统制物资刚施行配给时，县实业科印刷大批配给品通账发给各村，各村按户口上的姓名、人口、住址等填在通帐内，每户一本发到村民手里。到发放物品时，村民持通帐到商店直接

领取，由商店把发放的物品名称、数量记在通账上，而商店没留什么凭证，这样一来就给奸商开了绿灯。有的奸商把配给物品藏起来一部分，硬说放完了，村公所因没有核对的依据，就无法监督检查。记得1939年的旧历年(春节)，每人放白面半公斤。在农历腊月卅这天晚上，有一群农民，手拎着空口袋，找到我的家门。当时我是助理，赵村长已回营城子老家过年去了，当然啦，老百姓有事就得找助理。我领着这伙农民，到配给商店了解一下情况，最后在天增福商号发现尚有存面，给这伙拎空面袋的农民照数发给。

粮谷出荷

粮谷出荷，是一个奴化名词，就是敌伪向农民强制征购粮食。1943年刚过春节尚未开始春耕前，通阳县[①]就为本年的粮谷出荷召开村长会议，根据各村耕地面积及土质好坏，县实业早有调查，大南村应负担责任量是7 800吨。并指示各村往各区下达数字时要加10%的机动量。意思是，战时体制的粮谷出荷是属于军事物资，是一粒不能少的，如无机动量之准备，倘若某户遭受突然灾害而供不出去，村长只是目瞪口呆，县长也是束手无策。怎能完成任务呢？因此各级必须都加一点，留有余量，以免到时完不成“出荷”任务。

当时我坚决反对这种作法，认为这等于向老百姓说谎话，是一种欺骗性的办法。在县署为粮谷出荷召集街村长会议席上，我对加机动量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而未被采纳。为了避免大南地区大爷、二爷[②]拣便宜和造成“出荷”苦乐不均的后果，大南村决不能按县里指示加机动量。

① 通阳县即今吉林省伊通县与双阳县一带地域。
② 旧社会对农村当地有钱有势的人习惯称呼为“大爷、二爷”。

就在检查秋后青苗时要公平认真，只要在秋收未割之前，大家互相公平无私的验地，使各户心口皆服，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

门　户　费

敌伪最后摇摇欲坠时期，加紧苛捐杂税。约在1942年又增加一项门户费，根据纯收入计算收费，类似人头所得税。

县财务科召集街村财务系人员到县集中学习计算方法。因由各户自己申报收入额，并各种收入有各种不同的纳税换算率，结出纳税额就有出入。例如甲、乙二家，甲家不如乙家生活好，但甲家门户费的纳税额例比乙家高，不用说老百姓有意见，就掌管收门户费的财政人员也不敢承认公平合理。

三位一体

敌伪时期的伪中央政府和协和会中央本部以及兴农合作社是三个性质不同的机构，但人员经常互相调动，所谓人事交流。在伪满最后几年，基层单位根据地方情况，施行“三位一体”，就是在同一地区的村长、协和分会长、兴农合作社办事处长都由一个人担任，但不是上级一声令下，而全县同时照办。通阳县已有三分之一的村已施行三位一体制以后，于1943年大南村才施行三位一体。

劳工的供出

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人力、物力全从中国人身上出。1941年第一批劳工，大南屯摊了20人，是通阳县警务科直接给各警察署下命令强制征集的。抓走所谓无有正业的“浮浪”分子，县里来的大汽车，大南警察署派人押送到县。这批劳工走

后不多日子，就有悄悄地跑回来了。

到了1942年通阳县署就成立了动员科，科内有劳务股，各村就设置了国兵民籍，后改为奉公系，该系内部有管劳务专人。并令各街村按户口凡18岁至45岁的男子全部注册，建立劳工台帐。以家庭经济情况而定供出之先后，供出期限大致是6个月，上面指示不许雇人代替，实际雇的劳工约占1/3以上。

劳工去处大部分是矿山、部队仓库，有的去国境虎林、虎头，也去过驻在伪都——新京的日本军100部队和60部队的仓库、蛟河煤矿等地。

据反映全是拿中国人当牛马之不如，劳工死亡不断出现，在1942和1943两年中，大南村劳工死亡有十余人，通过了解，死因大部分是活太累，吃的不好，住的地窨子，得病不给治疗。

我曾去过蛟河煤矿慰问劳工，直接目睹了虐待劳工的种种罪行。1943年我出席吉林省协议会时，我以通阳县协议员代表的身份，控诉矿山虐待工人不如牛马，长达三千多字控诉词，在叙述劳工回来的悲惨情景时，各县代表以阵阵掌声表示支持和同情。最后得到伪当局很简单的解答，只用6个字，“今后妥为善处”而草草了之。

参加伪国务院一次会议

1944年春，通阳县公署通知我到县接受县长面谕，是让我去伪国务院，代表通阳县参加春耕动员大会，并给我一张国务院礼堂的入场券。我到伪国务院礼堂稍迟一点，由工作人员把我领到通阳县的代表席位上，我落座后才看到桌上三角标牌有通阳县字样。参会的全员也不过200人，讲台上平列两张桌，左

边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右边桌是一个关东军上校参谋长[1]，身边站着一名翻译，张景惠先发言，他手举一张讲话稿是他秘书写的，据传说写完稿给他念几遍，他虽不识字但他能记住，表面看他端着稿纸往下讲，实际他是手捧稿纸往下背诵。张景惠讲话还很流利，就是口头语太多，说一句话得带两个"奏么"，我好奇地给他数着，他讲完这段话，说了一百二十多个"奏么"。

伪总理讲完，接着就是右边那位参谋长讲，因为他是军人，讲话的风度比张景惠精神得多。听完讲话就散会，由几辆大客车把参会的人们接到伪国务总理官邸。这是一所新的建筑物，室内设备很款式，全是单人沙发。我们到以后，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日本人）也来了，武部的中国话说的很流利。等张景惠来到官邸时，有人喊"全体起立"，大家（包括武部六藏在内）都很礼貌地站起来，从表面看，武部还很恭维张景惠的。接着就聚餐，饭后通知明天各县代表全体去鞍山参观钢铁厂，到火车站集合，然后各回到各自的住处。

第二天乘上火车的人没有开会的人多，只有百余人，只坐一节车厢。火车过铁岭时，张景惠对大家讲："我青年过绿林生活的时候（他手指南面的群山）经常出没那些个大山里"，他又说："我们投降到奉军以后，又和那大山里的匪徒打仗，大家都听说过吧？兵打乱石山嘛。"

到鞍山钢铁厂也没看到什么表演，先由一个日本人在礼堂里按图纸讲讲生产各部位，以后又换个人讲讲生产原钢的过程，下午乘上火车直接返回伪都新京，两天会议结束，第三天各回各县。

（摘自《长春郊区文史资料》第三辑）

---

① 1944年春，关东军参谋长为笠原幸雄中将。而且日军军衔为将佐尉，无上校衔，故作者回忆有误。

三

伪满警察

日帝在抚顺建立的警察机构及其罪行

迟荣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抚顺煤矿，为扩张其侵略势力，于1906年9月1日，以“维护权益”为名，根据关东都督府官制，在抚顺设立了奉天警务署抚顺出张所。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抚顺最早设立的警察机构。

1909年7月，清政府就抚顺、烟台的矿权、矿税等事宜，开始与日本进行“商议”。日本侵略者急不可耐地把抚顺出张所升格为奉天警务署抚顺支署（藤田任署长，署员有几十名），妄图以刺刀为其殖民阴谋张目。1910年8月25日，清政府奉天交涉使韩国钧致函小池张造，抗议日方这种践踏中国主权的行为。日方代表蛮不讲理，声称警察权与矿权并无关系，不在“商议”范围之内，设警察机构是“鉴于保护与管理我国人的需要”。事实上，日本的警察机构在抚顺一设立，就极力为其侵略政策服务。日俄战争刚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就想挤进千金寨，但当时那里除中国居民外，还有俄国侨民，而且他们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为了扩大地盘，日本警察借所谓给日本商人以居住千金寨的优先权，一边用武力强迫中国居民搬家，一边排斥和打击俄国侨民，让更多的日本人搬进千金寨。

随着抚顺炭矿采掘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多，日本的警察机构也不断扩大，警察支署很快又升格为警务署。1919年9月13日，关东都督府被关东厅取代。在此以后，抚顺的日本警察机构施行“关东厅官制”。1926年，警务署又改称为抚顺警察

署。署长为警视阶级．高等警察系主任为警部补阶级。高等警察系计有内外勤5名。1928年，日本警察署迁入市内。1929年，大林任日本警察署长，1930年，又由寺田良之助任署长。

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日本警察机构和抚顺县政府矛盾重重。日本警察千方百计地刺探中国官方内部的情况，为其侵略政策服务。日本警察利用手中的警察权，残酷地迫害抚顺人民，殴打、逮捕以至杀害中国民众的事件时有发生。日本警察还以保护市郊朝鲜族农民为借口而进行特务活动，扩张其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在抚顺的组织与活动，日本警察更是丧心病狂地进行侦察和破坏。1929年8月，日本警察在叛徒范青的帮助下，逮捕了杨靖宇等同志，破坏了中共抚顺特支，对被捕人员严刑拷打，残酷迫害，最后交中国官方处理。1930年，日本警察又先后破坏了中共抚顺特支和中共抚顺县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1932年3月1日，在伪民政部内设立了警务司，这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各省设警务厅，各县设警务局。抚顺当时是县，设的是警务局。抚顺警务局内设警务、司法、保安三个股和一个警察队。警务局下设千金寨（后改新抚顺）、抚顺城、下章党、营盘、东社、塔峪、阎老沟、马郡丹、高官寨9个警察分局，各分局均有十五六名警察。县警务局的警察计有200余名。这些警察都是全副武装。为加强法西斯统治，抚顺日伪警察的队伍不断扩大，据《奉天省各县县况要览》的统计，1933年夏，抚顺计有行政警察360名，警察队250名，自卫团515名。警察计有短枪370支，机关枪1支、迫击炮1门。

在抚顺的日伪警察，除少数司法警察外，大多数是保安警察。保安警察又分为普通警察和高等警察。高等警察主要是对

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进行侦察、迫害和镇压。1932年9月11日，伪满洲国公布了《治安警察法》。这项法西斯法禁止秘密结社，不准随意集会，在公共场所，不许张贴图画，散发传单，进行讲演，违者严加惩处。日伪警察凭借这项法令，到处横行，公开勒索和欺压平民百姓，逮捕抗日爱国人士。1932年9月，日伪警察协助抚顺宪兵分遣队，对平顶山居民进行了大屠杀。日伪警察还和煤矿的把头、劳务部门勾结在一起，对工人进行侦察与监视，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在奉天特委领导下的中共抚顺特支的活动，引起了敌人极大恐惧，日伪警察协助抚顺宪兵分遣队，进行侦察，千方百计地寻找共产党人的行踪，最后于1933年4月逮捕了抚顺的几名党员，又一次破坏了中共抚顺特支。

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抚顺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党的领导下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这些抗日武装在抚顺周围地区经常袭击敌人的据点，拦截敌人的车队，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设施，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为了维持其法西斯统治，日伪警察队经常下乡，围剿抗日武装。据《奉天省各县县况要览》统计，自1932年4月至1933年6月，抚顺警察队共出动16次，749人。在围剿中死伤各1人，而取得的战果甚小，只打死1人，打伤1人，俘虏1人、缴获1支枪、10发子弹和1匹战马。

为了割断抗日武装和广大农民的血肉关系，置抗日武装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日伪警察还大肆推行杀光、烧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大搞归屯并户。1935年，抚顺警务局长下令，在抚顺周围的边塞地区，实行归屯并户。在他的指挥下，大批警察窜入农村，用武力强迫大小沟岔，特别是抗日武装活跃地区的分散居民，一律限期迁到指定的居民点，在居民点周围修围墙，设

据点，由警察把守，不准居民随意出入。对居民原居住的地方，一律杀光、烧光和抢光，制造无人区，农民群众受到巨大的灾难。

尽管敌人大搞归屯并户和围剿，但在农村广大的天地里，抗日武装仍然十分活跃，日本守备队和日伪警察队经常遭到抗日武装的袭击，日伪警察机构警报频传，惶惶不可终日。为加强法西斯警察统治，抚顺警务处于1936年初又增加了一大批警察，并把新抚顺、抚顺城、下章党等9个警察分局改为警察署，各警察署下设两三个警察分驻所。警务局内增设了特务股，配置了七八名警察特务。警务局的警察队缩编为警备班，大部分武装警察被编入各警察署及警察分驻所。

1936年是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抗联三师的游击活动已扩展到了抚顺地区，日伪军警经常遭到抗联三师小股部队的袭击。这一年的8月，杨靖宇同志和中共南满省委在抚顺建立了党的支部组织。抚顺地下党组织建立后，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把抚顺的抗日救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了镇压抚顺人民的革命斗争，日伪警察，在市内主要是“加强防谍”，调查与镇压厂矿中的“谍谋分子”和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在县里，则主要是对付抗联。日伪警察拿出很大一部分力量围剿抗联，经常派大批武装警察到农村，迫害抗日群众，围攻抗联部队。1936年8月，伪奉天省警务厅特务科组织了一个名为“搜查班”的组织，到抚顺、铁岭、清原和新宾等县，指挥这些县的警察围剿抗联。在省警务厅特务科一名日本科长率领下，首先到营盘警察署，以后又到章党等警察署，会同那里的警察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至10月份，共逮捕群众200余名，其中有50名惨遭杀害，其余都判了刑，被投入监狱。

从1937年7月1日起，伪满州国实施《国务院官制》和《国务院各部官制》。为迅速完成对抗日力量的镇压和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伪满洲国的各部有所变动，其中包括民政部警务局的业务转移到治安部，各地警察由治安部统辖。同年11月5日，日伪之间签订了《日本国满洲国关于撤销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和转让南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条约》。提出日本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全部废除，并全面转让满铁附属地行政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与伪满之间的政治统治权统一起来，也使日本侵略者攫取的特权合法化和扩大化。在此以后，抚顺的市和县分开，成立了伪抚顺市政府和伪抚顺县政府。抚顺的警察机构也设市县两套，原抚顺警察署改为奉天省抚顺警务厅，新抚顺警察署及警务班划归抚顺市警察厅。抚顺县警务局改为警务科，由抚顺县政府管辖，在业务领导上直属奉天省警务厅。抚顺市警察厅以原关东局所派的人员为骨干，计有警察270名。厅长由原关东局警视、抚顺警察署长柴田三滕二（警正）担任，特务科长警佐竹松良一担任。特务科设特务、特高二股，有科员8名左右。

"七·七"事变后，中共抚顺县委的工作进展很快，30余名党员已深入到了敌伪行政机关、工厂、矿山、学校、街道以及农村等地开展活动，给日伪的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为消除心腹之患，抚顺的警察特务到处侦察，妄图把共产党员一网打尽。1937年10月初，在日伪警察的配合下，抚顺宪兵分遣队逮捕了29名中共党员，破坏了中共抚顺县委，后有13名同志惨遭杀害，4名同志被判刑，投入监狱。

抚顺的日伪警察还不遗余力地侦察和围剿抗联。1937年10月5日，抗联三师师长王仁斋同志带领小股队伍，进入抚顺城北关开展游击活动，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接到急报之抚顺警察队当即跟踪追缉。同时，抚顺宪兵分遣队及抚顺警察署对此

事件视为重大。决协力施救……”王仁斋同志率部转移到清原后，抚顺县日伪警察的头目亲自指挥警察队，以抚顺县警务科特务股为主，同清原、新宾的警察组织一个联合工作组，到南口前对抗联三师进行大讨伐。一时间，南口前一带枪声昼夜不断，到处都是日伪警察。可是折腾了一阵子以后，他们一无所得，撤出南口前。同年秋，抚顺县日伪当局集中了四五百名警察，在抚顺县的东社、营盘、马郡丹、高官寨一带，对抗联进行讨伐。他们在那一带设了一个很大的包围圈，下章党的警察由台山起与抚顺城警察相接，抚顺城的警察经靠山屯、官岭、章党北部的寺沟、黄金堡一带，至浑河北岸和营盘警察相接。日伪警察还强迫群众在包围圈上放哨，监视抗联的行动。由于敌众我寡，抗联不得不迅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向新宾转移。

在抚顺市内，日伪警察经常出面逼迫中国居民搬家，帮助抚顺炭矿扩大掠夺范围。“七·七”事变后，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侵略者急需抚顺提供大量石油。抚顺的石油主要是从油母页岩中提炼出来的。但油母页岩埋藏丰富的东乡坑、大山坑、大和公园、弥生町和松田町等一带，有三千多户中国居民，影响开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伪警察在上述地区首先收集情报，然后挨门挨户地强迫居民搬家，最后把三千多户居民全部赶走了。在此以后，抚顺油母页岩的产量增加了，西制油扩大了，东制油也于1939年开始修建了。

“七·七”事变后，进入东北的劳动者大大减少，抚顺炭矿的劳动力严重缺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伪当局在1938年12月1日，伪满洲国《劳动统制法》公布不久，就在抚顺设立了劳动警察，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动者，主要是煤矿工人的监督与管理。从1939年起，在抚顺又实行指纹登记，劳工协会在进行劳动登记时，取登记者的全部指纹，交警察机构的指纹管理部门

掌握。这样就把劳动者控制起来了，警察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群众的统治。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侵略者从1938年起，把我抗日武装被俘人员、国民党投降兵和在清乡扫荡中抓捕的和平居民押送到抚顺炭矿服苦役。这些人被称作“特殊工人”。据统计，1938年冬，在抚顺的特殊工人有100名，以后急剧增加，截至1941年底，到达抚顺炭矿的特殊工人总数达6 312名。由于特殊工人的采用，侦察、监视和镇压特殊工人就成了警察的任务。为了防止特殊工人逃走和反抗，特务科特务股派遣一百多名密探，潜入各矿从事特务活动。这些警察特务和各煤矿设立的所谓“防止事故班”（后改劳务课）以及劳工协会的人员密切配合，严密地监视“特殊工人”的行动，并进行欺骗宣传，逃跑和反抗者，一律逮捕，严加惩处。

1939年以后，伪警察机构里的特务科兼管伪奉天省地方保安局的业务，由科长和一部分特高股员进行“防谍”，对有关人士和方面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在抚顺城乡进行，涉及面很广。1939年至1940年，抚顺县的警察对县内的宗教团体、人力、物力、耕地面积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与此同时，还对旧官绅、名人、吏士、有反满抗日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伪满洲国的政策不满者，平素言论过激者，群众中有威信者和外国留学生等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束后，有一大批人被填入“要视察人”、“要注意人”和知名者的名簿，成了日伪警察监督的重要对象。后来，名簿中的一些人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1940年夏，日伪在抚顺进行了体制改革，警察权由市长直接掌管。市警察厅改称为警务处。在警务处内新设了经济保安科，在特高股内新设了劳务系，并增加了特务科的人数。1941年，伪治安部警务司在抚顺地区设置了装备优良和机动性较强

的警察警备队，在铁路沿线设置铁路护总队，后改铁路警护队。为加强对特殊工人的法西斯统治，同年6月9日，伪抚顺市警务处长同抚顺炭矿总务局长、抚顺宪兵分遣队长签订了《特殊工人对策备忘录》，三方根据合议制设置机关，“通过抚顺炭矿（防卫系主任）在特殊工人的配属单位，设置侦谍工作网”，对特殊工人进行“秘密战（谍报、阴谋、宣传）”，“对工人中有影响人物的言行”进行秘密调查和监视。同年8月15日，抚顺炭矿成立了抚顺炭矿特务委员会，以加强战时的防卫工作。伪抚顺市警务处长特别重视并参与以特殊工人为对象的“宣传”，监视及“同各单位保持密切联系”的活动，强化对特殊工人的法西斯统治。

随着日本伪警察机构的加强，警察特务更加残酷地迫害抚顺人民。1941年7月，特高股的日本警察，以不给日本人居住区供水为由，逮捕了贮水池变电所的1名中国工人。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把那个工人绑在凳子上，用胶皮管往嘴和鼻子里灌凉水，同时断断续续地过电近半个小时，把那个工人折磨得死去活来，肚子几乎胀开，精神严重错乱。在监禁了7天后，又把他交检察厅判了5年徒刑。同年，为扩大抚顺炭矿的采掘范围，日伪警察用武力强迫老虎台、万达屋、新屯、龙凤一些地方，2 000余户居民搬家，使这些居民遭受很大损失。日伪警察对工人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1942年6月，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宿舍的30名特殊工人，为反抗日伪非人道的残酷迫害，集体砸了一个仓库。伪市警务处特务科、司法科、警备队和老虎台派出所的警察得到报告后，一齐出动，到现场把30名工人全都抓了起来，最后将斗争的领导者（5名军官、3名士兵）拉到浑河枪杀了。其余工人被送交炭矿劳务科惩处。同年8月，有1 000余名特殊工人和一般工人罢工后集体逃走。为镇压这些工人，伪警务处

出动大批警察和宪兵一起进行追击，伪抚顺县的特务股、各警察分驻所警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最后，仅抚顺县的警察就逮捕了200余名工人，后交给了抚顺炭矿劳务课。被捕工人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警察特务还到处寻风探信，侦察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组织的活动，侦察国民党和外国宗教团体，尤其是美国天主教的活动，发现可疑的人，立即逮捕。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战时的法西斯统治，伪满洲国于1941年12月27日，公布了《治安维持法》，规定所谓以变革国体为目的的团体的组织者、参与者、指导者；以否定国体或从事可能有损建国神庙及帝室尊严事情为目的团体的组织者、谋划者、指导者；掌握其他团体的“要务”者等等，都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抚顺的日伪警察凭借这个法令，大肆捕捉和迫害抗日爱国群众和各方面人士。日伪警察在抚顺县逮捕了10余名“要视察人”名簿中的所谓危险人员，交警务科关押，对其他“要视察人”以及“要注意人”等严加监督和控制。日伪警察在抚顺市，除逮捕了一批中国的“危险人员”外，便以“战时危险分子”为名，逮捕了2名无国籍的白俄，押送到奉天。还有11名美国传教士也被日伪警察逮捕，同4名修女一起被送还本国。为防止中国人了解时局的情况，日伪警察在居民中，没收了230台5个灯以上的短波收音机。日伪警察还同宪兵队、防谍协会等密切配合，大搞“谍报”和“防谍”、监视和镇压抚顺人民的活动。据统计自1939年1月至1942年末，伪抚顺市警务处特务科共搞情报4 900件，杀人70名，逮捕1 196名。

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为挽回败局，日伪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法西斯统治。4月1日，伪满洲国对警察机构进行了一次改革，专门设立了警察总局，伪抚顺市警务处改名为警察局。警察局的人数也有较大的增加，特务科的人员

增到25名。当时，日伪当局为解决抚顺炭矿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正极力实行劳务新体制，大搞“国民皆劳”，强制征集劳力。为此采取了不少办法，如推行国民勤劳奉公制度，搞所谓“紧急就劳”与“行政供出”，即抓劳工等等。在这些罪恶活动中，日伪警察极力驱使抚顺人民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强迫青年男子参加勤劳奉仕队，到处“派劳工”、“抓劳工”。日伪警察还以“紧急劳动力供出”的名义到处抓人；有时一抓就是几十人、几百人，抓得人心惶惶，不敢轻易出门。据统计，至1944年，在抚顺“供出工人”计有5万名，“勤劳奉仕队员”约1万名。“供出工人”全部在抚顺炭矿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1943年9月8日，伪满洲国公布了两项所谓《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按《保安矫正法》规定，要把“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送进矫正辅导院，进行“精神训练”强迫劳动。《思想矫正法》则规定，对可能犯有政治罪者，实行“预防拘禁”，同时施以劳役。1944年春，日伪在抚顺设立了矫正辅导院，总院在新屯，分院在东洲和大瓢屯，可收容1 000余人。日伪警察疯狂地迫害抚顺人民，把所谓的犯罪危险的人和可能犯有政治罪者，一律抓起来，送进矫正辅导院，进行“精神训练”，强迫他们从事沉重的劳役。日伪警察有时用“个别索出”，即个别逮捕的办法，想捕谁就捕谁；有时把一个地区包围起来，或者把一条街道两头堵上，一抓一大批人，然后再送进矫正辅导院，叫做“一齐索出”，即所谓“抓浮浪”。1944年春，日伪警察按着抚顺地方检察厅次长野田实次的命令，在市中心露天市场“抓浮浪”，一次就抓了300余名小贩、失业者等无辜群众，经刑讯后，把250名送进矫正辅导院。据统计，从1943年1月至1944年6月，伪抚顺警察局特务科，搞情报370件，杀人10名，逮捕2 950名。其中主要是抚顺炭矿工人，特殊工人占多数。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侵略者不仅加紧掠夺抚顺的矿产资源，而且疯狂地掠夺粮食，卡抚顺人民的脖子。在掠夺粮食的罪恶活动中，日伪警察对人民的迫害是极其残暴的。伪满从1941年起，对居民的用粮实行配售。配售的量很低，而且逐年下降。据1943年《经济情报》记载，在抚顺，每月每个大人是8公斤，小孩只是1公斤。为了加强对粮食的“统制”，经济警察到处进行侦察和监视，发现私人买卖、收藏粮食者，一律逮捕，并加以“经济犯”的罪名。中国平民百姓（包括稻谷生产者），吃大米饭被警察抓到了，也按“经济犯”论处。在那个年月里，为糊口谋生而遭警察残酷迫害的人不计其数。在抚顺县，日伪警察用武力推行所谓“粮谷出荷”，强迫农民售粮。1943年秋，抚顺县日伪当局组织了不少警察“出荷督励班”，分赴各村进行“督励”，大肆搜刮农民的粮食。“督励班”的警察在各地挨门挨户翻箱倒柜地搜查粮食，日以继夜地威逼迫害，有的被逼自杀，有的躲避在外，住房竟被烧毁。“粮谷出荷”给抚顺县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据1943年伪奉天省警务厅的《经济情势报告》记载：“当年奉天省内民食困难，特别在4月以后，已进入恐慌阶段。抚顺县境内的贫苦农民，已有一部分饿死”。

1944年9月，小林畩太郎晋升为警正阶级，任伪抚顺市警察署特务科长，原来监督警尉阶级的特务股长被改为警佐阶级，科员增加到30名。同年7月29日，美国70架B29型飞机轰炸了大连、鞍山。9月8日，美国约100架B29型飞机又轰炸了鞍山、本溪。在这种形势下，人心浮动，时局动荡不定，人们的反日情绪很高，都在暗中议论：日本必败。为稳定维护法西斯统治，日伪警察在抚顺市内逮捕了90余名爱国群众，并将特殊工人中的首脑人员列入“战时有害分子”等名簿，和“要视察人”一样地控制起来，发现问题立即逮捕。与此同时，日伪警察还通

过“防谍协会”督促各公司、厂矿和团体等“自体防谍”了解情况，监督人们的言行。为防备空袭，抚顺市县都设立了警防组织和警察监视哨，同时还强迫群众参加突击队、救火队等组织。

1944年10月，为维持紧急状态下的治安，加强对共产党、国民党及战时危险分子的侦察和镇压。根据伪奉天省警务厅特务科长警正今岛寿吉的命令，伪抚顺市警察局特高股长松本平吉和特务科长小林畎太郎建立了“自兴会”的特务组织，据点设在市中央大街大和洋行的楼上。1945年1月，“自兴会”改称“特别搜查班”，由特高股长兼任班长，计有9名班员，据点设在矿务局后边美国天主教堂一角，并以抚顺炭矿劳务课作为主要联络点。特别搜查班内设中共系、中央系、文化系、朝鲜系和一个拘留所。特别搜查班的联系很广，其情报网包括抚顺的厂矿、抚顺县“固定检查班”和奉吉线、奉抚线设立的流动检查班等，计有30余名特务在凌产正义的领导下从事情报侦察活动。特别搜查班的特务一律化装潜入各地，对特殊工人中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和把头以及官吏、教员、职员、地方有势力者、宗教界人士和团体，特别是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活动进行侦察和监视，发现可疑分子，立即逮捕，并进行审讯。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局已定，为挽救失败的命运，日伪警察在抚顺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1月，新屯矫正辅导院的100余名被关押者集体逃跑。伪市警察局特务科长警正小林畎太郎接到报告后，立即派特务科特务股劳务系执行警尉矢内正美带领特高股员，会同龙凤的警察前去追捕，在新屯南山1名逃跑者被打死，40名被捉回。同年3月，老虎台采炭所的60名特殊工人，为反对日伪的统治，集体暴动逃跑。伪市警察局特务科长警正小林畎太郎、特务科特务股长警佐森川孝平和炭矿劳

务课特务主任竣户正义得到老虎台采炭所劳务班的急报后，分别率领伪市警察局警察警备队、炭矿警备队跟踪追击，最后抓到16名。经特高股松本审讯后，10名被送进矫正辅导院，还有3名不久被杀害。

1945年5月，伪抚顺市警察局，为加强对西露天矿、轻金属工厂、液化工厂和制铁工厂等所地的西部地区的统治，新设了望花警察署。署长系警佐阶级，下辖40名警察官和3名特务警察。这时，伪抚顺市警察局局长是深田袈裟吉。警察局的组织机构十分庞大，局内设6个科，每个科下还辖股、中队、分署等一大堆组织。

在大势已去，濒于崩溃的前夕，日伪警察对抚顺人民进行了疯狂的迫害。真锅信义在任站前派出所所长一段时间里，共逮捕"经济犯"120名。伪市警察局特务科特务股长森川孝平，在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的一年时间里，在欢乐园、南站一带，以取缔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流言蜚语为名，指挥特务股外勤逮捕了87名"造谣者"。与此同时，他还指挥部下，在工人中逮捕了125名"思想嫌疑犯"。被捕者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据统计，在日帝投降前的一年里，日伪警察搞情报约1 000件，杀人9名(其中4名与宪兵队共同杀害)，逮捕2 265名。被捕人员中多数是特殊工人和"供出工人"，在这些工人中，约90名是"造谣犯"和"写标语犯"(其中28名被关进监狱)，约九百多名被关押在矫正辅导院，约360名在抚顺炭矿服苦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伪警察同伪满洲国一起土崩瓦解，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日伪时期“安东警察厅”

修玉麟

伪满安东警察厅的前身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安东商埠警察厅，其地址坐落于公安街八号（现丹东市丝绸公司物资供应站）。这处建筑是于民国9年（1920年）动工，建成于民国10年，它在当时来说是较为先进和庞大的，青砖石结构的二层楼房，一层楼底下设有地下室；为了居高临下，二层楼上面还设有单元的办公室东西各一处，和一套了望全市区的了望所。原公安街道路扩宽前，该楼正门设有台阶6层，直伸人行便道路边，台阶顶盘计有3平方米半圆形平台，为站岗哨警所用。整个警察厅占地面积为3 870平方米。在伪满时期来说，除了另一个衙门，直接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宪兵队外，那就是杀气腾腾的警察厅了。这个衙门的伪警察官头戴五色星金箍黄呢大盖帽、肩扛大肩牌、身着黄呢装、腰挎盒子炮、腰缠武装带、佩带大洋刀、脚蹬大马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另外还有一些身着便衣的特务，他们的武器刑具是短枪、手铐、捕绳等。便衣特务也叫“刑事”，他们比露面的警察还要凶狠，比虎狼还残忍毒辣。这个伪警察厅里，有日本人30余名，中国人250余名，除此还有编外的“大腿子”和“小腿子”，以及腿子的腿子，但数目已无据可查了。

“九·一八”事变当时安东警察厅称安东县公安局，局长是张汉威。现在的公安街街名之所以叫公安街就是因为公安局设于此地。第三任安东县公安局局长由凤城县陆军第七团团长姜全我担任。日寇为了适应其统治政策需要，于1934年把安东县

有关乡与镇的警务分开，在安东县分署内设警务科。日伪当局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加强对安东商埠地区的控制，于当年成立了安东警察厅，厅长叫白铭镇（官衔称理事官）。警察厅下设警务、司法、特务、保安4个科，科下设股，警察厅还管辖4个警察分署，各分署下面又设若干派出所。那时，公安系列的要害部位都是日本人把持。现将警察厅各科和警察分署以及派出所的情况分述如下：

安东警察厅的4个科及其反动职能：

警务科。科长日本人秋山太助，他实际上是安东警察厅的最高权威者，凌驾于中国人厅长之上。警务科下设警务股，股长是日本人茅根龙夫，他虽然名义上是股长，但在当时的警察厅来说，他的权势也很大，因为他是从朝鲜殖民地调转来的，对统治殖民地人民是最有经验、最有办法的日本人。所以他在安东犯下的罪恶也很大。另外是日本人吉田一盛，职称为巡官，再就是中国人孙景惠（巡官）。其余还有中国人警长和警士共6人。另一个是教养股，股长是黄明春（职称警佐）。该股的职责是专门教育和监督警察的，并保管、发放枪支弹药。下有巡官张庆春，日本人警长仓田谋、警士田鸿玉等人。再一个股是经理股，股长是日本人木村武，下有日本人巡官叫植田正膺，以下是中国人警士于国阳、杨金钊等人。这个股的职责是发放薪金、服装及办公用品等工作。

司法科。它是镇压中国人民的一个魔爪口，由警务科长秋山太助（警正）兼管。下设司法股，股长是日本人（警佐）大山太十郎，下面还有日本人巡官行村政、警长沟上满雄、儿玉一男及中国人巡官徐仁堂等。该股主要办理文书业务。张文选是管审讯的系主任，其余的人是司刑事职。穿便衣办案的有石志通、张文俊、张远昕、曲远璋（以上是巡官），警长有姜升田、

肖金堂，警士有石维山等。司法股还另设刑事室，完全穿便衣，做侦缉工作，专门抓人和用刑拷打人的一个机构。主管这个刑事室的是日本人警长铃木要作。以下还有日本人警士池田五十生、中国人警长铁子正、警士梁子和、徐明奎、刘春德、栾维林、徐文才。这些人还各自私用了一些当时称为"腿子"的人，这伙"腿子"以职业性图财害人为生，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有的还身带手铐和捕绳。为了镇压人民，还设有扣押人的拘留所，所长是日本人警长伍币××，下有中国人警长郎廷相，警士周国安、卢树吉、王日三、曲朝宗等。还设有治安股，股长是日本人竹尾××，还有巡官日本人小野寺伊佐雄，警长冈崎觉明，警长蒋介臣。这个股主要是处理有关当时治安情报的通报工作。

特务科。这个科是专门刺探我人民抗日的组织，盯梢有反满抗日嫌疑者，拿该科的话来说叫作"不审讯问要视察人"，并设档记名，对被嫌疑的人逐个记入黑名单，不时呈报到日本宪兵队，向其主子请功领赏。由于这个科事关重要，科长由伪警察厅的"太上皇"警务科长秋山太助兼任。股长日本人远藤××。实际上这个股的权限都操纵在警务科名叫茅根龙夫的日本人手里，日本人称他为殖民地通，意思是他压迫异国人有"本领"。以下有警佐田寿山，这个人在中国籍警察里级别较高，因为他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忠，罪行严重，解放后被处决。另外有巡官日本人千叶运三郎和鞭木吉郎右卫门，他俩分担特高股和外事股工作。外事股还有邱玉琛（巡官）、日本人警长根岸辰三和大日方甲子三郎。其余是中国人：警长宋发春、警士窦荣生、卢树藩、刘岱森、王英成和刘××。这个股的中国人平时都穿便衣。另一个是特高股。这个股的人事组织极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表面上是发放旅行证，处理劳资纠纷，监视集会，审查书籍、刊物等。特高股和外事股的活动都极端诡密，经常在

外面活动。如经常在镇安桥附近的英国楼，暗中活动，不让外人知道。表面能看到的是把从本厅管辖的县方——凤城、宽甸、东沟等地抓来的所谓“政治匪”，经严刑拷打审讯后，送司法股押入拘留所。这个股一向由警务股的茅根龙夫主持，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曾有多少中国人被他杀害。天成祥药房的股东孔子范，硬被逼说成是“安东教育事件”参与者而惨遭杀害。

保安科。由于这个科处在次要地位，因而设中国人刘佐辰（警正）为科长。下设保安股，股长是日本人警佐关东××，下有技师何德润和日本人巡官守屋仙吉、中国人警长孙玉霖、警士刘霭云等。这个股是管理和发放各种营业执照的，如蒸气机、交通车辆执照等。还设有卫生股，股长是警佐刘信言，管理有关卫生事宜。下有少数几名警长、警士级人员，主要做些对中国人的防疫、日常卫生监督检查等工作。

警察厅的下属机构还有：消防队，队长曲鸿琪，官衔是巡官；武装警察队，队长邱士汉，官衔是警佐，还有日本人警长泉清××、中国人警长陈子周。队下设几个分队，分别驻在安东县边境的东坎子、蔡家沟、八道沟、九道沟等山顶高处。设置哨卡，日夜站岗巡逻，居高临下，见火报警。

安东警察厅所属的4个警察分署及分署下设的派出所：

永安警察署，也称一署。地址在永安街，署长警佐王云青，另有日本人巡官为警务主任。下设与警察厅各科对口的各个系（以下各警察分署都同样）。该署在粮市街、永安街、新安街、兴东街、菜市街、兴隆街都设有派出所。

新安警察署，也称二署。地址在于家沟的自新街，署长警佐王辅予。在县前街、新民街、天后宫街、八道沟、青龙街、九道沟、蔡家沟、聚宝街、春源胡同、广济街等处设有派出所。

镇安警察署，也称三署。地址在珍珠街，署长警佐刘耀宗，

下设镇安路、临江路、燕窝、珍珠泡、太平等派出所。

水上警察署。署长由日本人担任，它的管辖区是整个鸭绿江岸，上至马市台，下至浪头。浪 头和马市台均设有派出所。

日寇为了进一步实现其殖民地政策，便于长期统治我东北人民，于康德4年12月1日（公元1937年）施行其"治外法权撤废"和"附属地移让"，在安东设立了一个统一的警察系统，把安东警察厅（不能管理日本人和朝鲜人）和他所谓新市街（指满铁势力圈内和附属地）的日本警察署合并为一个警察势力圈——安东警务处。同时日寇还把原来在租界地警察署充当巡捕的警衔破格升级，个个超过以往伪安东警察厅警察的警衔，以此，既拢络住这伙伪警察为其效忠之心，又使这伙伪警察为其殖民统治卖力。与此同时，便将原在公安街的伪安东警察厅缩编而改为公安警察署。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永安警察分署改称金汤警察署，新安警察分署合并于公安警察署（地址是原安东警察厅所在地），镇安警察分署改称镇安警察署。日寇为了强化其统治，把以上警察署称为旧市街的警察署。把原租界地内的日本警察署称为新市街警察署 。新、旧市区的警察署都隶属于伪安东警务处。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手段，从表面来看这些警察署的规格和权力已缩小了，但其镇压劳动人民的手段比过去更为残忍毒辣。过去，只有安东警察厅设有拘留所可以关押犯人，而经过缩小编制的各警察署都设有拘留所，都可以随时随地把"犯人"关押起来。特别是原安东警察厅旧址的公安警察署，虽然编制缩小，但其权势之大和镇压劳动人民的反动气焰则有增无减。

缩编后的公安警察署历任署长是：第一任署长叫赵宝林（警正）；第二任署长叫彭椿（警正）；第三任署长叫王泮英（警正）。这些人都精通日本话，是效忠日寇与人民为敌的分子。公

安警察署内部机构设置及主要人员有：警务系主任叫伊藤××；特务系主任叫阪口××；保安系主任叫马绍荣；司法系主任叫于绍文；经济保安系主任叫王德武。这时的公安警察署和东坎子英国楼，仍是日本宪兵队十分重视和利用的地方，是当时旧市街警察机构的最高权力机关，又是镇压我国人民的重点魔窟。

在警察系统来往的公文当中，时有"极密"和"绝密"记号的公文，凡此类公文，伪警察（指中国人警察）一律不得开封阅看，伪警察需要阅看时必须得到日本警察批准。至于有"绝密"字样的公文，只有日本人自己看，并由日本警察亲自密封起来，另行重点保管，伪警察是绝对不得看阅的。

如关于金日成、崔贤智、杨靖宇、王凤阁、李红光等情报，记载的是抗日地区的活动，这些情报，多来自奉天（现沈阳）、新京（现长春）等上一级机关。这些公文都是下达到省级的警务厅及所属各县的警务局、日本奉天特务机关、安东日本警察署以及用日本部队长姓名称呼的友枝、福本等机关，还下达到凤城县的大营子、桓仁的八里甸子、宽甸的双台子等地以"治安肃正委员会"的名称露面，实质是由日本特务机关、军队、宪兵和伪警察机关共同组成的特务组织的据点，类似这些公文都属"绝密"，伪官吏的中国人是绝对不准看的。

在敌伪时期，安东警察厅是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和日本宪兵队的旨意行事的。日伪统治当局为了残酷镇压劳动人民，泡制了"暂行惩治盗匪法"，为日寇效忠的警察就依此法捕抓中国人，在经过特务科和司法科严刑审讯后，若标以"应严重处理"，这人就算没命了。尤其残忍的是被抓的中国人常被密押到日本安东宪兵队，喂狼狗取乐。日本警察们还认为被害人的残骨遗物清扫过于麻烦，臭气难闻，于是对这些无辜受害者，就密杀于蘩家沟和盘道岭交界处。但他们又察觉到暴尸露

骨有碍于“王道乐土”的声誉，这伙禽兽又采取以死不见尸的卑鄙方法杀人，即在隆冬季节，于鸭绿江下游，将人枪杀后将尸体滑进冰窟窿里，让外界人感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每当行刑时，都是由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厅的特务科、司法科的日本人在场指挥。唯有一个伪警察张文选可以在场，因为他身份独特，是审讯的司法官。那时有关政治性大案的审讯，并不在伪警察厅内进行，而在他们密设地点——镇安桥下英国楼里。这里是便衣特务、刑事以及腿子活动和密聚的场所。腿子是不在册的日寇亲信，这伙坏家伙是没有工资或警察待遇的特殊怪物，其奢侈的生活，就是靠敲诈勒索。当其勒索人民财物时，若不满其愿或稍不称其意，就栽赃诬陷，把莫须有的反满抗日的罪名加诸于被诬陷人的头上，有时他们甚至比伪警察还凶残几倍。人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了免遭横祸，也就抱以宁可损财而不被毒害的态度，任凭这伙便衣探子们的层层勒索，中国人受其害者，真是不计其数。

在日伪统治时期，不仅平民百姓受其摧残刁难，就是一般店铺老板也难以幸免。例如，伪警察便衣腿子到饭馆白吃白喝，谁也不敢稍为怠慢。就连到了药铺，也得照样不花钱白白将药拿走。少有名气的刑事特务，甚至还逼迫坐堂先生登门为其家眷免费看病，尔后还得把药送到家门，即便是较大一点的商号也不敢怠慢，否则“经济犯”和反满抗日的“政治犯”的罪名，便不知不觉地落在头上，这就需要花大量的“老绵羊”（百元一张的伪满洲国币）去买命，不然就会遭到杀害。例如，天成祥药房股东孔子范，舍命不舍财，被捕后，既不承认自己反满抗日，又不肯多出贿赂，终于被日本宪兵队枪杀了。老天祥药房经理梁甘庭就是以“经济犯”罪名被伪警察厅捕去的，关押了8个多月，耗费很多“老绵羊”才被放出来，梁甘庭出狱后为了

应付日伪官吏，再不受牢狱之灾，用高薪雇了一个叫川林的日本人当“大杆”，这种办法不但没有免灾，反而引狼入室，祸患不断，最终连在原籍山东老家都不敢呆下去，只得逃亡山西省朋友家“猫”了起来，才免掉杀身之祸，直至祖国解放后才敢露面。

便衣暗探，俗称密探或探子，是日寇的耳目。劳动人民吃顿大米饭，若被他们发现，就立刻告其主子，吃大米饭属于“经济犯”，是要押起来问罪的，所以，被害人就不得不以财物去买住他们的嘴巴。于是这伙密探敲诈的机会就多起来了。“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日伪物资日渐缺乏，为了补充他们的粮食不足，便把中国人吃大米饭的“经济犯”升级为“国事犯”和“政治犯”，随着犯罪性质的升级，被害人被敲诈的价码也随着提高了。彼时中国人要想吃顿大米饭，都得把时间选在星期天的夜晚，这种秘密行动，久之也被密探发觉了，不灵了。从伪满在农村实施“出荷粮”政策以后，在城市里的中国劳苦大众再也见不到大米了，人们说“能吃顿大米饭真算过年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连到饭馆吃大米饭还要由买主缴纳筵席捐，那时，中国人的食粮是以高粱米和苞米为主食的，至于猪肉、牛羊肉都是统制品，老百姓很难吃到，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之苦是难以言状的。这伙伪警察和便衣特务，自己效忠日寇，压迫中国人还嫌不够，他们又私自豢养了一群狗腿子来弥补他们更加效忠日寇的方方面面。大腿子手下还有小腿子，这些大腿子在探出情况后，便循级不乱地向其主子告密，制造事端残害中国老百姓。在抓捕人时，他们当“捕快”，审讯时他们又是逼供的打手，且每个人都有其绝招，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灌火油和灌凉水，都是这伙人的拿手戏，他们以狠毒的面孔出现，借以取 得日寇的信任。这伙特务还暗藏在邮局，私拆信件，稍

有可疑，即行其敲诈之能事。如不从其愿者，就无端扩大事态，报告其主子。腿子又是特务和刑事的引线人，如特务和刑事要敲诈某某人，腿子就在其中充当说情的和事佬和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说客，从中穿针引线，跑腿周旋，讨价还价，鱼肉人民。如果你所犯的事已被他的上级发现，罪情还没向日本人报告，他便花言巧语地说，咱们都是一国人，尽可能不出乱子，我去给你串通串通，避免这场“官司”。被害人明知这是个圈套，可是也只得以伤财救人保命要紧，就这样被这伙坏蛋骗取了大量财物。真是有口难言，有冤难述。日本帝国主义者采取象吞并朝鲜时走的老路那样。倡导什么“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对满施行“治外法权撤废”、“附属地移让”等花招，欺骗我国人民，妄图亡我炎黄子孙。在伪警察内部还兴起了一股仿照日本人复姓的更姓改名风，如姓林的名玉森者，则改为姓林玉，名森，企图以此让中国人亡其本，以实现其彻底的殖民化。

（摘自《元宝文史资料》1989年第一辑）

伪安东县警察统治的几件事

牟建屏

伪满警察统治的方面很多，思想、政治、军事、经济、刑事、治安等，几乎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所记述的只是伪安东县警察统治中的几件事。

日伪警察统治的强化

1935年以前，安东县的伪警察机构和人员都是承袭事变前的，警察中的80%是文盲，并多为年老体弱有毒瘾。那时我在安东县九连城分局任内勤警长，这个局上下有三十多人，其中小学以上文化的只有四人，其余全是文盲。分局长也是文盲，只能盖章，不能批阅文件。那时，县警察局里有两三个日本人当指导官，常带着警察大队扫荡抗日军。

1936年，日本为了强化其警察统治，着手整顿警察机构。他们在长春，在各省、市、县建立警察学校，除招收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入校受训外，还对在职警察进行考试，合格者分批到警察学校受训，不合格者即行淘汰。这样一来，老朽的警官，以及"皇亲国戚"，全部由后起的新人所代替。一年以后，伪满的警察统治明显的强化了。

1937年，各县城乡的警察，大部份都是在警校受过训的，人员也增多了。各警察署都设有警务、司法、保安和特务系。到1938年，日本声明撤销领事裁判权，把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撤销，形式上是把领事裁判权交给伪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人交给日本人，大批的日本警官进入伪满警察机构，县城里的日本警官多了，乡村的警察署也有日本人。警察署的主要职务都由日本人把持，如警务、司法、特务等系的主任多为日本人担任。

好过的鬼门关　难过的石佛山

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后，财力物力上都很困难，即实行了全面经济统治，很多物资都是日本人统一征购，统一配给，把经济管得很死。为了贯彻这一统治政策，他们在各重要路口设了很多关卡，由警察负责堵截禁运物资。安东县石佛

山就是多处关卡中的一个。

1944年，石佛山警察派出所长叫大久保，是个日本人，此人心狠手辣。当时，凡是贩运物资被他抓到的，轻者拳打脚踢，重者灌凉水，所运东西全部没收。他在石佛山派出所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被他没收的东西，多者送大东警察署，少者自行消费。若是贩运大米被他抓到，连自行车一起没收。老百姓说："好过的鬼门关，难过的石佛山"。

那时，安东市兴隆街有个商人叫王同宣，开了个小商店，在日本实行经济统治时，他把一些棉织品、胶鞋等物资藏起来。1944年8月的一天夜里，他把约值四百多元的物资用手推车推着，要运到大东沟西面乡下他的一个亲属家变卖。经过石佛山时，被大久保堵住。王见势不好，便弃车逃走。大久保得到这些东西后，交到大东沟警察署。王同宣逃出后，费了许多周折找到我，苦苦哀求我帮他想办法。我琢磨多时，想了一个办法，要他写一个失盗报告，把车上运的东西都写上，把在什么时间地点丢的，怎么丢的都写上，及早送给我，这样就可以把贩运变成失盗，把经济犯变成被盗窃的受害人。王同宣听后，高兴地照我的话办理去了。

而后，我到经济保安系找到系主任安田（朝鲜人），我问他："是石佛山派出所送来一些经济犯扔掉的东西吗？"他说："是的。"我又问："处理了吗？"他说："没处理。"我说："这些东西不是经济犯搞弄的，是被小偷偷的，小偷在石佛山把东西扔下跑了。"安田问我："我怎么知道的？"我说："那个被偷的人，是安东市的，打听到消息，从安东找来了，我告诉他写盗难届（失盗报告），明天就来报案。"

第二天，王同宣拿着报告来了。我把报告交给安田，同王同宣当面查点了东西，少了一些。我同安田研究，这事要转到

司法系办理。我说："东西要发还本人，少了不行啊，问问石佛山派出所吧，还请安田把这事和署长讲讲。"安田答应了。当天下午，王同宣从司法系把东西领了去。在大久保得知东西返还本主时，大为不满，大发牢骚，说："经济犯的东西不没收，还给了本人，真岂有此理，我当时要知道，宁肯这所长不干，也要留下那些东西。"

1944年底，长山乡七顶股子有个姓李的，同我有点远亲，他把家中余粮偷着拉出去卖，在石佛山被大久保截住，粮食和车马都被没收了，跟车的吓跑了，赶车的被大久保打了一顿。大久保对大东沟警察署长说："这家存粮不少，不卖给合作社，偷着外运，粮要没收，车也要没收，不然他还要偷运。"皆川署长听后就说："都没收。"那个姓李的找到我，说粮不要了，车马可别没收。我得知经济保安系主任安田，为没收粮车的事去找署长，我也一同去了。安田问署长："粮没收，车怎么办？"署长说："都没收。"我接着说："粮食没收了，可以交到合作社，大车没收了，往哪儿送呢？在这儿又不能变卖，送到安东法院，人家能收吗？再者，明年还要种地，向国家交粮，牲畜没有了，地怎么种呢？"我这么一说，皆川笑了，问我："你说怎么办好呢？"我说："粮食要没收，大车不能没收，本人跑了，如果抓到了可以拘留几天！"署长又问安田："怎么样？"安田说："这办法行。"这时大久保又进来，要参与其事，署长对他说："你回去吧，交到这儿就行了。"大久保很尴尬地走了。而后把大车返给了那个姓李的了。

一场搜查大豆的灾难

1941年，我在安东县铁甲房身警察署担任保安系主任。这年春的4月间的一天，突然接到县方电话，要我们警察督促各

村，赶紧收交大豆。接完电话，我觉得这事很稀奇：大豆已在年前如数交完了，怎么又要收大豆呢？收要粮是村公所的事，怎么又要警察督促呢？我把想法对关春常署长说了。他说："县方有指示，就得去办，你们就到各村去看看吧。"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两个人，先从铁甲村开始，后又到石门村、汤池子村，村长都说，县方已在上星期开了村长会，要收交大豆，村长都向村民传达了，要求把大豆赶紧一粒不留地交到合作社。前两天都交完了，再没有了。

第3天，县方又来电话，催要大豆，要我们到个别户检查，看大豆是不是都交干净了，并且说县方也要去人配合督催。就这样由督催到个别户检查，由个别户到逐户检查，由白天检查到夜晚检查，由屋内检查到室外检查，闹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警察署、派出所、村公所，全部出动搜查大豆，对农户由斥责到辱骂、殴打、逮捕、灌凉水，农民一转眼都成了罪犯。有一天，在石门村后山窝中发现半草袋大豆，约二十多公斤，不知谁藏的。这一发现，农民更遭了难，逼农民"拉大网"搜查大豆，结果是一无所获。仅5天时间，农民一个个都是提心吊胆，无所适从。村方向县方提出疑问，不知搜查大豆何时完结，要春耕了，大豆种子都交出去了。还要多少大豆？县方给每村下达了一个要收交的数字。石门村要交大豆400斤。就在这天的深夜里，石门村助理员崔长文找到我。对我说："一个村要交400斤大豆真不好办？"我说："你找我干什么？"他对我说："开始时个别农户家是有点大豆，是留作种子用的，在动员期间，都交出去了，剩下一点，到后期都不敢拿出来了，怕犯罪，隐藏吧，又怕搜出来，无奈都销毁了，埋到野外的，撒到河里的，现在一粒都没有了。现在想出一个办法，同你研究一下。"我说，"你讲吧"。他说："石门村南部同新沟区相联，新沟区是安东市

管，不要大豆，这个区的农户有大豆，有人私开油房，我们这几天搜查大豆，他们也怕搜，就把剩下的大豆卖给油房，现在油房存了不少大豆。我们打算私自到那边去高价买来顶上数目，你看怎么样?”我说：“你买来顶上，不怕县方再向他们多要吗?”他说：“先顶上，再要再说吧。”我说：“你看行就办吧，咱俩是私人谈话，出了事我不负责。”他说：“好，就这样办啦。”他走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天亮后，我又遇到崔长文，我问他：“怎么样?”他说：“行了，能交上。”我问他：“多少钱1斤?”他打了一个手势，是4角钱1斤。当时收价是1角多钱1斤。就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搜查大豆灾难才算平息下来。

（摘自《东沟文史资料》第二辑）

伪满的阿城警察署

鄢继安　孙梦飞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一口吞并中国，不仅依靠它的日本关东军，而且还豢养了大批警察来镇压和残害中国人民。

1934年，伪阿城警察署分局正式成立，一开始坐落在大什字街西路南（现在的阿城艺术剧院）。1936年2月1日改称阿城警察署，随之迁到西岗子（现在的阿城食品公司）。后来，又迁到菜市门里路西（现在的人民医院住院处）。1944年，同伪满县公署的警务科合并，归县公署警务科直接领导。随着“大东亚战争”形势日趋紧张，为了便于统治，又在阿城县境内的玉泉、平山、永源、巨源等村镇设立了警察署。当时，我们两人分别在警察署和派出所任职。

那时，伪警察署长多数由中国人担任。副署长多数由日本人任职。其任职和调换相当频繁。中国人张世武、肖世光、孙炳功、谷铁铮、赵凤久都先后任过阿城署长。日本人的柿内、片柳、渡边、千田、小野等指导官都在阿城当过副署长。日本人也任过署长，那是非常少见的。他们的任职或调换，全凭上司的心意，主要是看其对“大东亚战争”和“王道乐土”是否得力而定。

伪警察内分6种职衔：两肩横带肩章，章板上圈着黄色金线，中间靠脖领的顶端钉一小圆扣，带上一个黄色梅花的叫警士，在警界里算是最低等级了。肩章上带两个黄色梅花的叫警长。肩章正中带上一条稍粗的黄色金线，在其中间放上一个梅花的叫警尉补，后来又称之事务警尉。在粗黄线上，镶上两个梅花的叫警尉，一度称之行政警尉。凑上三个梅花的叫警佐。肩章上满金光板，落上一个较大的梅花叫警正。警察署长和副署长由警佐担任，警尉补就可以任派出所长了，但多数派出所长均由警尉充当。警尉还可以任署里各系的主任，警尉以上职衔的人都有捕人的权力。署里都设有便衣特务人员，经常活动在公共场所和人群中间，动不动就捕人。

警士、警长、警尉补，全配带电镀白刃宽刀和短八分手枪。警尉以上的配带电镀白色窄刀，刀带是蓝色呢子衬里。警正以上的人配带同伪满国兵军官式样的皮壳战斗指挥刀，刀带衬里是红色呢子，他们可穿马靴，加带刺马针。唯有警务厅理事官、警正以上的刀带衬里是黄色呢子，他们一般不挎明枪。

警察署内分系，各系分工也较具体。每个系里都有一至两名警尉任系主任，具体办事人员最低职务也是警长（两个花）。一个系里最多不过3至5人，全署只有30人左右。日伪统治和压迫东北人民14年，警察署里的具体办事人员从不固定，都多

次任免和调换。

警务系：管理警界内的人事任免和调动，保管备品，发放服装和工资。

特务系：这个系是警察署的行政主体，是重点系。所以，系主任大多数由日本人担任。它的职能是专门搜查与处置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及被他们认定为反满抗日的要人，或被怀疑的重点人员。当然对抗日联军和游击队更不放过了。

保安系：管理工商物价、火药、自行车、交通、消防、发放许可牌照、票证；处理一些建筑行业所报请的事宜。

司法系：处理偷盗、抢劫、杀人、放火、打架斗殴，调解有关房、地产所发生的纠纷。

卫生系：管理街道卫生、妓院和窑娼，大烟馆、饮食业，禁止无证吸食鸦片。

警察署为了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迫使中国人甘当其“良民”，建造了三处监狱。其中一处是伪满县公署小楼西头的地下室（原政府楼现已折除），门向西开；第二处是伪警察署办公室的西头，门也是向西开的；第三处是原天锡国民优级小学校的西院（现在胜利小学西半个院庭），院里的牢房较多。在押的人犯中多数是反满抗日的“政治犯”、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还有被定为“政治嫌疑犯”、“经济犯”的人也常常被关在这些牢房里。

为了屠杀我们中国人，还特设了法场。为此，伪政府特意关闭了县城的正西门，撤销了西门派出所。在西门外（现在回族坟地下边，阿什河砖厂址）设立法场，在那里枪杀和刀砍了无数爱国志士和无辜的百姓。

1937 年（伪满康德4年），由驻阿城日本宪兵队在当地捕到十多名朝鲜族人，转给阿城警察署关押了一些天后，又押送到

伪满的国都——新京（现在的长春市），事后，不知道怎样处理了。

1943年（伪满康德10年），满族地主绅士关恩兆元院内，住着一个姓赵的房户，无职业，人口多，生活困难，因为倒卖百八十斤大米，被警察发觉，用绳子绑进警察署。他受尽了严刑拷打，被定为"经济犯"（日本人不准中国人买卖和吃大米），关押在警察署办公室西头的牢房里四十多天，后来，因他患了重病才不得不放回去。还有杨树乡徐家窝棚屯的王凤阁，因为给本屯的老乔家赶车卖粮也被抓去坐牢，后来死在狱中。那个时候，在天锡国民优级小学校西院的监狱里，经常拖出一些尸体来。

大约在1942年、1943年，原大什字街西路南（现在艺术剧院）警察署办公室的西头就有牢房。有一天，天刚亮，一部分犯人带着镣铐跑出来，直奔正西门，从土城墙上跳出去，藏进黄土坑里。随后，十多个手提长枪的伪警察，将这批越狱犯人全部抓回去，不久，都被枪毙了。

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干尽了坏事的伪警察，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他们的日本主子一道被押上了人民的审判台。

（马运程整理，摘自《阿城文史资料》第一辑）

我所知道的伪警、宪、特

赵健平

伪满时的"三害"，即警察、宪兵、特务。伪满初期，首先

在伪民政部里设置警务司，警务和警察人事等均听命于该司。首任司长为长尾吉五郎，1937年他调任伪宫内府警务处长。各省均设有警务处管辖全省警务，视市、县大小不同，各市、县则设警察厅或警察局，又在县内设警务科，在厅、局之下设有警察署、派出所等。大约在1937年，取消警务司，改设警务总局。

在1938年以前，长春头道沟一带属日本满铁附属地，警察管辖权归日本领事馆，以后有所谓"撤回治外法权"之举，才把头道沟及东北各地满铁附属地的警务都交付伪满统一管辖。

伪满警察官阶设有警正，一般为荐任官，如厅、局长，也有为简任官的，如伪都的警察总监或大城市的厅长。署长一般是警正级，少数为警佐，视警署大小而定。伪科长、股长、所长一般为警佐，以下设有警尉、警尉补、警长、警士。警服为"国防绿"，即草黄色，与伪陆军相同。袖子上附几道墨条以示阶级，帽上有金条，穿马靴、佩短刀，横式肩章上有金花，以多少表示阶级大小。简任警官有带金穗的大肩章的礼服，在有典礼时穿用，不过在荐任级以下就没有了。伪满警察按其职务，大致分为行政、交通、刑事、特务警察四类。"七·七"事变后又设了经济警察。

伪满成立后，在伪新京成立"京师宪兵司令部"，司令为德楞额，原为黑河旗长。当时宪兵人数不多，仅1个营的兵力左右。德楞额一天忙于奔走交际，对于宪兵职责也没有进行什么，日本人对他也不满意，1935年前后便无形取消了。在这以后，伪军事部成立了"国都宪兵团"，在各省市地都设立了第×宪兵团。

伪警察系统设有特务组织，各警察厅、局里都有特务科，署里有特务股，在县公署里也设有特务科。伪新京有名的特务是所谓的"三张、二栗"，"三张"即张福盛、张福成和张学九，"二栗"即栗宗元、栗宗周。大约是张学九吧，这小子忽然看中

某处科长的一个女儿，要同她交朋友并经常无理的纠缠她。这位小姐不愿意，躲避他。使他又恨又恼，便单刀直入地去登门求亲。这位科长胆小怕事，不敢去惹这位红极一时的大特务老爷，只好忍气吞声答应下来。他女儿也害怕了，不敢不从，无形中成了张学九的外室。一个伪政府的荐任官吏都要受其欺辱，一般平民百姓受到特务的欺压、迫害，就更不在话下了。

伪满通河县警察的罪恶

盛连江

编者按：《伪满通河县警察的罪恶》的作者在县公安局史志办工作。因工作关系，查阅了县公安局、县法院凡能涉及到伪满通河县警务科及其伪满警察的全部档案和卷宗，摘录了有关部分，并调查了有关人员，写了《伪满通河县警察机构简况及警察的罪恶》近万字史料。《通河文史资料》只用了伪警察的罪恶部分和仅摘用了伪警察机构的少部分材料，以《伪满通河县警察的罪恶》予以发表。

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略了我东北辽、吉、黑三省。1932年（大同元年）5月1日占领了通河县。

日本侵略军占领通河后，为了镇压通河人民的反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警务机构，延用了民国时期的名称，仍叫公安局。并委派原县农会会长田绍武担任公安局长，按旧公安局规章行事。田绍武当伪公安局长后，极力效忠日寇。1932年7月他率伪警察到浓河进行所谓“宣抚”，破坏抗日活动，被抗日义勇军处死。以后又由田受昌、马成令当伪公安局局长。当

年，日寇又将县公安局改为警务局，局长是宋日新。

1933年后，日寇在通河县相继成立了伪警察游击队和森林警察队，镇压活动在县境内平原和山区的抗日军民。

1936年（伪康德3年）日寇为实现所谓“治安肃正”计划，建立集团部落，把从拜泉县调来的伪警佐李珍堂带领的100余人警察中队编入通河游击队，后改为治安队，直属伪滨江地区第四军管区领导，称之“滨江地区第四军管区通河治安队”。

1937年，日寇将县警务局改为警务科。

1945年（伪康德12年）“四·六”事件后，日寇为进一步镇压反满抗日的中国人民，重新调配了伪通河警务科和各警察署（所）的头目，原伪警务科长张文选、科副佛园（日本人）被免职。调伪新律警务科长张登仁任伪通河警务科长，派伪三江省警务厅保安科经济保安股长吴乃权（吴劭农）任伪通河警务科警务股长。

1933年（伪大同2年）日寇将凤山设治局改为凤山县，伪县公署设有警务局。日寇把仅有7个村屯，2 500余人，抗日队伍经常活动的凤山县，列为重要“匪区”。建立庞大的警务组织，武装警察多于行政警察。每个村屯都有警察，多则45人，少则11人。1935年（伪康德2年）警务局内设警务股、司法股。并所辖凤山、宝兴屯、浓源镇3个警察署和凤阳、清茶馆、孙船口3个警察队及凤山游动警察队。同时该县还驻有治安队三江地区独立连和通河县森林警察队。1936年又设凤山县城、凤阳村、清茶馆和孙船口4个伪警察署。以后警务局改为警务科。1938年（伪康德5年）凤山改为凤山区，撤消警务科，保留了凤山警察署（归属通河警务科）。其孙船口、清茶馆等警察署改为分驻所。通河森林警察队（即岔林河森林警察队）驻在凤山，由凤山警察署长高铭三兼任队长，至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

伪满通河县警务科、警察署及其伪警察是日寇统治、压迫、剥削、勒索通河人民的工具。在伪警察中，有的人是一心效忠日寇的汉奸走狗，也有的人是为了求生存、找生活出路当了警察的。但伪警察绝大多数都是欺压人民，杀害抗日志士的。

围剿抗联

伪满的警察队隶属于警务科（局），是日寇统治与镇压中国人民的帮凶，直接参与对抗联的围剿和屠杀。

1936年（伪康德3年）冬，通河的日伪军警部队向凤山杨木顶子墨林队伍（抗联收编的义勇军）的营地进犯时，通河警察游击队长高铭三带领中队长毛凤林、邢万山等80人先到蚂螂河北岗住下。第二天，在住地北五里多地的地方，抓住了骑着黄白马挎着匣枪的墨林队张仁义（称二掌柜的，别号“北山”）。由高铭三和日本指导官类家长三郎、武方寅之助亲自审讯，严刑拷打，逼张仁义供出墨林队阵地的布署（哨卡的方位、火力的配备等）。于是敌人集结了依兰日军一百多人（配有小炮），通河伪军三十七团60人，凤山警察队30人，在伪通河县日本参事官宇都宫仁、指导官类家长三郎、武方寅之助的指挥下，强迫张仁义领路，向杨木顶子墨林营地进攻。敌人凭借火力，突破墨林队三道防线，进入营地。墨林指挥战士奋勇抗击，激战一天，但因突遭袭击，墨林和30名战士壮烈牺牲。高铭三命令邢万山留下指挥火烧墨林营房、粮食和物资，烧了3天。

1937年（伪康德4年）4月，张义鹏带三百多名抗联战士在祥顺东六方吃午饭时，被特务发现，并到祥顺警察署报告。日军饭岛部队驻祥顺小队、祥顺警察署警察和祥顺自卫团先赶到洪水泡子附近刘老十房框子堵击。张义鹏队伍路过此地，突遭袭击，有四十多名战士光荣牺牲（张义鹏的哥哥也遇难），抗联

战士的鲜血和战马的血水染红了场院。抗联战士奋勇抵抗，打死十多名日本兵。高铭三从通河带治安队七十多人赶来，抢渡洪水泡，围攻抗联队伍，迫使张义鹏率队撤走。高铭三命令警察将战死的抗联战士冯玉秀（冯原是高铭三部下班长，后参加抗联）的头割下，拿回县城向日本主子献功。

1937年（伪康德4年）4月初，祥顺警察署便衣警察勾朋武（特务）和祥顺警察署长孙凤周、自卫团长李文耀带领五十多名警察和自卫团员，路经漂河直奔二站，配合依兰的日伪军，疯狂地围剿堵截哈东司令李福林率领的抗日部队。李福林在指挥突围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镇压饥民

日伪统治下的通河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三宝村新发屯（又名“穷棒子屯”）因年景歉收，去了出荷粮，百姓只能吃糠咽菜。在衣食无着，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新发屯农民自发地进行了反饥饿的抢粮斗争。

黄占春、尹作祥是新发屯的有粮大户，他们不劳而获，把剥削来的粮食囤积起来，埋藏在尹船口屯（现保安屯）。1943年（伪康德10年）12月23日深夜，12家农户20余人，由孙玉山、刘景方领头坐4辆马车，在鸡叫前赶到尹船口，将黄、尹埋藏的粮食全拉回屯子分掉。事后，黄占春、孔宪文（伪村长）先后到伪县城区警察署报告，署长潘嘉春得到署副丹治政三（日本人）的允许，命警察署司法主任范景隆带领司法系警长邵万里和7名警察，在桦树分驻所警察的配合下，前往三宝村新发屯，以查户口为名，先后逮捕11名村民，押回警察署连夜进行审讯，用皮带抽、棒子打、灌凉水渗洋油，将唐国政、王喜义活活地打死。郭子英、刘景方、苏景昌、孙玉山（外号“孙秃耳朵”）

被判刑，死在佳木斯监狱中。

随意打人

伪警察在检查卫生时，非打即骂。清河警察署警长范垂宪，百姓都骂他“范大巴掌”，他在检查卫生时戴白手套，到老百姓家摸门坎，稍有灰尘，就动手打人。有一次在祥顺检查卫生，他打了两名妇女耳光之后，又罚在大道上跪着。

1941年（伪康德8年）3月，凤山孙船口警察分驻所警长梁占山到贾万友家检查卫生，说卫生不好，将贾的妻子毒打了一顿，贾妻正在经期，被连打带吓，患流血不止病，3天后死亡。

残害无辜

1936年（伪康德3年）夏历八月二十三日夜间，通河城东门分驻所被张义鹏的队伍缴械。城区警察署接到报告后，听说张义鹏队伍是从城东南方向来的，次日早晨，署长耿震带领警务系巡官马景书、特务系巡官杨国英、司法系巡官于广润，以及李景山、徐青和、张令君、尹德昌等30余名伪警察，分两路把火炬屯包围起来。进屯后，挨家逐户的搜查。在上午10点多钟，把张义鹏的地户季奎武、张富、张万财、常维生、焦士荣、韩永发6人以嫌疑犯抓起来，押到警察署。由署长耿震、特务系主任杨国英、司法系主任侯天一进行审讯。在审讯中，警察李景山用皮鞭抽打，警察孔芳用凉水掺小米往嘴里灌，张万财被灌昏。残酷的审讯毫无结果，耿震怕日本鬼子怪罪下来，吃不消，就将这6名无辜百姓送交警务局。在警务局季奎武等继续被审讯惨遭毒打，伪警察用铁丝拧住张富两个大拇指悠荡，拇指被悠断。季奎武的肋条被打断三根，胸部被用洋蜡烧得露出肋骨，他实因受刑不过，招出给张义鹏队伍送过粮食，而被交给

日本人。第7天。季奎武被日本宪兵枪杀扔进松花江。张富等5人押了五十多天才被释放。张富、张万财爷俩的家产被没收。这些人因受重刑，加之惊吓，释放回家都患了重病，弄得家破人亡。

1942年（伪康德9年）初，伪通河城区警察署司法刑事警长邵万里以贩卖大烟嫌疑犯为名，把居民宋××抓到警察署，进行严刑拷打致成疯癫才放回，不久宋××自缢。

同年3月，通河城西门外有一具被割掉四肢的小孩尸体，邵万里与伪警察王珠等进行调查。正巧居民宋长林的小孩与邻居小孩打架将鼻子打破，出血不止，跑回家中。邵万里按地上的滴血点跟踪宋家，不问青红皂白，将宋长林双手扣上手铐就带走，才生孩子3天的妻子被吓病，十多天后，不幸在忧愤中死亡。

1945年旧历正月初八，居民徐奎武在赵某家推牌九，被邵万里看见，当场用铁棍子把徐打得不能动弹，回家不到1个月就死了。

敲诈勒索

伪县警务科特务股主任李介生的特务腿子梅国一和富乡伪屯长杨忠有仇火。1940年（伪康德7年）秋天，梅国一告杨忠家藏有枪支。李介生带领特务股邱山、孟庆芳、郑克勤、许耀忠等6名警特去杨忠家搜查，没搜出枪支，把杨忠带到特务股审讯拷打，关押了半个月，才暂时释放回家听候处理。杨忠只好给特务股的人挨家送礼，才算饶了杨忠。

1942年（伪康德9年），城区警察署司法警察王珍，同特务警察邵万里到李兆庆家，李正患病，诬说李偷卖了国营大木。李病好后，给王珍送去100元伪币，才算了事。

1944年（伪康德11年）10月间，伪警务科保安股长王文彬

（外号“王大脑袋”、“王大马棒”），派警察和他家长工李聋子（瓦匠）两次到单鸿宾家（单家店，在现小电影院后院）借大烟票和200元伪币。过了五六天，单鸿宾去保安股找王文彬，王非但不给钱，反而大发雷霆，打了单鸿宾三棒，踢了三脚。

霸占民女

1938年（伪康德5年）日寇强行并屯。马万发家从东南屯并到祥顺街里，伪警察勾朋武乘马万发种地之机常去马家，以给钱花，与马万发23岁的媳妇邵××[①]厮混。并让其与丈夫离婚，说“你要离开马家，我接你”。勾对马万发处处找岔毒打。伪满国军三十七团到祥顺“讨伐”抗联，马万发被找去铡草。铡完草回家，见警察在街上抓人背小背，马万发、朱殿福吓得跑到西南炮台，被勾朋武追上，堵在里面，把马万发按倒，用洋刀背砍了马万发20余下。还有一次马万发家来人串门挂条晚了，勾朋武把马万发抓到警察署押了3天，勾朋武就在马家睡了3夜。经别人保释，马万发才被释放。勾朋武为了把马妻弄到手，给她出鬼点子。当马万发不愿意离婚时，邵××竟威胁说：“你们（指马万发和马的父亲）勾搭抗联！”，马怕招来杀身之祸，只得顺从了她，当天勾朋武就把邵××接到家。

1941年（伪康德8年）凤山警察署特务系警长赵宗尧经常到各村屯搜查抗联。凤阳屯农民陈自发招老实巴脚的梁顺为养老女婿。赵宗尧常买酒菜在陈自发家吃喝，一起抽大烟，并给起大烟票，乘机将梁顺妻子陈××奸污，使陈与丈夫疏远。赵并向陈自发讲：“肩膀有劲能养一口，庄稼人有多大能水……”，表白自己有权有势，挑拨陈自发叫女儿与梁顺离婚。赵宗尧给

---

① 作者为保护被害者名誉，将受害妇女姓名改为邵××、陈××。

梁顺一点钱，并威胁梁顺赶快滚开，赵宗尧就这样霸占了陈××。3年以后，赵宗尧被免职，由于赵宗尧好逸恶劳，赌博成性，吸烟成瘾，在双城县又把陈××卖给了妓女院。

开枪杀人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在苏军进通河第二天，伪警察王珍见大势已去，携带妻小同高凤岐、王明志等带着财物（有三小车）乘船欲逃，被群众发现，有30余人围上不让逃走。有的人喊“抓特务”，有的要解船上的绳子，工人杨永坤说：“不用绳子绑，把他拉到苏联红军司令部去！”。王珍掏出手枪将跟前的王长善打倒（在民光医院抢救7天无效死亡），工人赵言龙上前抓住枪管，和王珍支巴起来，又被王开枪打伤左臂。一时群众都散开了，被吓傻发楞的孟庆复要跑时，王珍又开两枪，将孟的腿打穿。当苏军驻通司令部派苏军战士到江沿时，伪警察王珍的船已经离岸很远了。

（摘自《通河文史资料》）

伪满北镇县警察的组织机构和职权

吕向志

一、我所知道的伪满警察机构

1. 伪满康德4年以前的情况

伪公安局下设公安局及分驻所、派出所。那里伪警察并没有什么权力，老百姓把伪警察叫巡警狗子，但是日本人，即使

是一个警士也称为指导官，可以指导公安局长及公安分局长。总之，日本人操纵一切。伪警察分驻所设于村公所附近。北镇县城有直辖、鼓楼、大南门、小南门、东门、西门、北门等警察派出所。

2. 伪满康德4年以后的情况

公安局改为警务科，分局改为警察署，警察派出所仍然存在。警务科内，日本指导官这个职衔没有了，把首席指导官改为科附，科内设股。警察署内分系，如警务、教养、保安、卫生、经济保安、司法特务等系，各系有系主任。警察署长有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无论是警察署，还是以下的分驻所、派出所，名义上是维持地方治安，实际上是直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从此伪警察的权力越来越大。可是，随着权力的增大，伪警察也就干了许多欺压人民的坏事，成了日寇的帮凶，为人民所深恶痛绝。

二、警察是日寇的统治工具，忠实执行日寇的侵略政策

1. 进行特务活动

县警务科设特务股，警察署设特务系，特务警察外围有特务腿子，名字叫“重要谍者”，发谍者证。特务的职权范围，包括控制全民的思想、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以及流言倾向动态等，同日满宪兵队特高课一样，只是在一县之内活动。特务股把旧东北的军阀官僚县团级以上的都列入被监视人之内；另外高级知识分子和宗教信徒（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道教）中负有名望的，都属于要监视人。每月对这些人由特务股去视察两次，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言论，以及是否有反满抗日

的嫌疑。对一般老百姓，特务是到处寻风、盯梢、跟踪和尾随。他们可以任意盘查以及对人身及住宅进行搜查。他们便衣携枪经常出入茶馆酒肆、妓院、剧场，如认为有反满抗日的嫌疑，立即逮捕，并开留置票拘押。审讯时轻则拳打脚踢，板拶鞭笞，重则坐老虎凳、上大挂、"坐火车"、翻肋条、灌洋油及辣椒水等。不知有多少爱国人士及无辜百姓，死于严刑之下；更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被送到检察厅或日本宪兵队定为"国事犯"，处以绞刑或喂狼狗。敌伪末期更是大抓思想犯，送矫正院，特务气焰更为嚣张。因此，东北人民一提起"特务"二字，莫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

2. 督催粮谷出荷

粮谷出荷政策，是日寇征收东北人民所有农产品的变相抢光政策。每年由县公署给街村下达任务。几乎把一年所收的粮食、油料、棉花等全部要光。老百姓交纳不出，就派所谓"皇帝陛下警察官"去督催。警察们动用举秫秸、灌凉水、上大挂等各种严刑，到处哭声一片，真是目不忍睹。警察和街村官吏借机敲诈勒索，大发其财。这种例证很多，不胜枚举。

3. 要劳工

要劳工是一批接着一批，把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送到矿山、边防地区，做繁重的劳动，吃的是橡子面，睡的是草席棚，每天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惨遭毒打，死在外边的不计其数。当劳工的名额下达后，警察及村保长就可以乘机勒索，有钱的花钱买通，没钱的前去送命。警察与村保长狼狈为奸，从中渔利，不知有多少老百姓，惨遭其祸。

4. 实行经济统制政策

经济统制就是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统一管理，禁止私人买卖，实行配给。例：对棉布、丝绸及毛织品等，成立"纤维组

合”，统销统配；对米、面主食，发通帐按户按人配给；对鞋袜、烟酒糖茶以及肥皂牙膏等，成立“小卖联盟”，统一经营；对木材及饮食行业等，也设专门机构管理。所有物资都严格控制。为此，在警务科设经济保安股，警察署设经济保安系，派出所及所有警察都执行监督检举任务。这样老百姓和商人铺店都成了监督对象，警察可以任意检查，从中大肆勒索，造成商业萧条，民生凋蔽。警察在一个月内举行一次经济大搜索，各个城门都关闭起来，县警务科、警察署、派出所，除值勤人员外，都带领自卫团全员出动，编成经济搜查组，进行恐怖的大搜查。老百姓惊恐万状，鸡犬不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老百姓穿衣吃饭，都在受限制之中，警察可以信口雌黄，轻则罚款、拘留，重则扣押、判刑，名之为“经济犯”。如行贿送礼，那就可以教育释放。我记得北镇警察署经济保安主任西山侃（日本人）和翻释高贵德互相勾结，任意到街头搜查，把卖豆腐、卖煎饼的都带到警察署，利用当地警察腿子（私设的密探）从中讨价，大肆勒索敲诈，层层私分，这些警察和“腿子”，搜刮财物礼品，不计其数。

老百姓为了维持生活，私自拴车，私设花厂（弹棉花）、私开烧锅，农村妇女纺线织布等都给警察勒索造成可乘之机。民间流行这样一句话：“家有警尉补，强如作知府。”伪满的经济统制就这样瘦了人民，肥了警察。日本人把大量的东北物资，源源运回本国，挽救由于战争而造成的经济危机。

三、我所认识的检察官、司法科长、日本宪补

伪检察厅是阎罗殿，伪检察官是吸血鬼。伪检察官王文荣把所有被送来的思想犯、经济犯及其它刑事犯，都押在监狱久不审理。那时的监狱是惨无人道的，因饥饿和患流行病而死亡

的不在少数。如：我在中安堡警察署时曾送一案件，当事人叫刘海青。经拘押一年之久，患精神病出监一年后死亡，就是例证。检察官经常不上班，如某一案件的当事人把钱送足，便可开庭释放，没送钱的就关押着一律不问。每天由小老婆陪着抽大烟，打麻将，设赌抽头，灯红酒绿，过着“一灯消日夜，四路进财源”的生活。

锦州市伪警察厅司法科长警佐郭凤阳更是凶狠残暴。老百姓管他叫郭阎王。他在审讯时把长板凳、皮鞭、火油等刑具，分程序来用。我眼看他把人弄得死去活来，经他一审，什么人也得屈打成招，真是名副其实的活阎王，他的法庭也就是阎王殿了。

日本宪兵队的宪补就是杀人魔鬼。我认识一个姓杨的是日本宪兵队宪补，中国人民在日本宪兵队没资格当宪兵，只能叫宪补，日本宪兵队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他能随便给人加上反满抗日思想犯的罪名，轻的扒层皮，重的喂狼狗。他到谁家都得用金钱美女来取得他的欢心，不然就有性命之虞。我记得杨宪补有一天“光临”伪满退职团长秦化一家，秦某破格招待，用金钱美女来满足他的欲望，这才免于一场灾难，真是“魔鬼降临，举家遭殃”。

（摘自《北镇县文史资料》）

伪舒兰县警务组织及其活动

谭 珊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建

立了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帝国。从伪满中央治安部到省、县，一直到基层各村、屯建立了各级警务机关。伪中央治安部设警务司，省公署设警务厅，县公署设警务科，县下设警察署，署下设分驻所分管各屯，统管“地方治安”。

伪舒兰县警务科，原在全县设6个警察署，从1943年（伪满康德10年）以后，合并为4个警察署，又在二道河子（现在的吉舒镇）增设一个警察署。到伪满后期共有以下5个警察署，署下设分驻所21处，分别设在当时全县14个村、街，分管各屯。

舒兰警察署（当时叫：舒兰县直辖分驻所）：设在舒兰街，分管舒兰街和大日向、天德、朝阳、大北等5个街、村。下设舒兰街、大日向村的二道滴达、天德、朝阳、大北等5处分驻所。

白旗警察署：设在白旗屯，分管白旗、法特、溪河等3个村。下设溪河、法特等两处分驻所。

小城警察署：设在小城街，分管小城、新安等两个村。下设马鞍山（现马鞍岭）、上营、牛心顶子、新安、桂家街、榆树沟、北太平屯等7处分驻所。

平安警察署：设在平安街，分管平安、开原、水曲柳、金马等4个村。下设四道滴达、珠琦口子、开原、石头河、金马、两方三、水曲柳等7处分驻所。

二道河警察署：设在二道河（现在的吉舒镇），专管二道河矿区。

各警察署内分4个系，各系设主任1人，主务（即副主任）1人，行政警察若干人。署内各系与县警务科的股对口，即：

警务系——分管署内的财经、人事、服装、办公品等公务；

保安系——分管署辖村内的治安、司法（逮捕、审讯）、经济（工商业方面的事）和卫生（包括医药业方面的事）等公务；

警防系——分管署内武器、弹药和署辖村内的自卫团、防

空、修公路等公务；

特务系——分管反满抗日的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政治犯、思想犯以及侦查活动等公务。

除上述各系外，还有外勤人员，负责警戒、巡逻、查询……无所不管。

署长的配置

各警察署设署长1人（警佐），还配1名日本署附（警尉）。各署的日本署附，虽然是副职，而且警衔还低于署长，但实际职权却要高于署长。例如：署内收发文件时，必须经署长和署附亲阅，并签字盖章。如果署附不在时，署长无权代替，必须等署附阅后，才能签署意见；反之，如果署长不在时，而日人署附则可代替署长签署意见，视为确凿生效，处理其他事务也是如此。署内特务系主任由日本署附兼任，署长无权参与特务系的活动。

六种警备组织

日寇为了镇守地方治安，设置了六种常设地方的武装警备组织：

行政警察——从警务科到警察署、分驻所的警察，除少数司法警察外，大多数是保安警察。各警察署的警察人数不等，按其分管面与地区情况配备人员。最少的是白旗署二十多人，最多的是舒兰、小城各署达四十多人。分驻所人数最少的是上营、马鞍山等各所有五六人，多的是开原、新安等各所有十几人。总计全县行政警察共有四百多人，人人身佩武装，其中警尉以上的警察都有手枪，分管各村屯的地方治安。

森林警察——在县内马鞍山（现名马鞍岭）、上营和榆树沟

等森林地带，常设两个森林警察队共有二百多人，队附都是日本人。人人身佩武器，各队还配有轻机枪，专责驻守林区治安。1944年（伪满康德11年）陆续被外调，最后剩几十人合并到分驻所，撤消了这两个队。

警备队——本队建于驻县治安队调走，即1939年前后。全队驻守在县城，队长是张云峰，共50人左右，人人身佩武装弹药，主要是保卫县内，维护县城治安。

上述三种武装组织，都是在县警务科直接指挥下进行活动的。有时还要按上级指令，组成临时讨伐队伍。1939年（伪满康德6年）秋，日寇为讨伐安图县我抗日队伍，下令舒兰县警务科在警察中抽调120人，组成一个中队，队长是警佐姜雅超，下分3个小队。一小队长是警尉郭新民，二小队长是警尉马慧龙，三小队长是警尉刘新民。各小队下分4个班。全队被调去安图十骑街搜山"讨伐"，结果遇战就败，遭"敌"就逃，被勒令退回舒兰。

1939年冬，日寇又下令舒兰县警务科，抽调警察100人组成一个中队，去蛟河县大青背围剿我抗联队伍。中队长是警佐姜雅超，小队长有宫云谱、王英华……等人。这次围剿大青背抗联时，有日军守备队200余人在前，满军一个步兵连在中间，警察队在后。进发到山中夹路，被我抗联堵击，使围剿惨败，日军死伤最重，近百人之多。舒兰县警察讨伐队宫云谱、王成春等7人受伤，奚洪祥和段××两人阵亡，共死伤9人，大败而归。其中宫云谱是参战的小队长，腿被击中不能走动，溃逃不及而被俘，经抗联教育，为其治伤，劝其参加抗联。宫为了家中老人妻子而要求回家，抗联出于怜悯之心，组织了8人担架队，连夜把宫抬送到三十多公里远的伪军驻地附近。宫忍痛自回驻地，带伤回家，对抗联感恩不尽。1944年初，日寇又下令舒兰县警

务科抽调警察30人去热河“讨伐”我八路军，但都屡受挫折。

治安队——系军队组织，属军政司管辖，是派驻舒兰县的军队，驻舒兰县一个营三个连，约三百多人。驻在县城（现朝阳镇）东大营，用以平定地方“叛乱”和抗日活动。1938年末撤走，调到伪三江省萝北县。

铁路警护队——拉滨线铁路各站通车后，于三棵树建立了铁路警护总队，各站设立了铁路警护队，一般是4至10人，身佩武器。主要是警护列车上和车站的治安以及对旅客的检查等事宜。1943年夏，改名为铁路警护军，由中央治安部警务司改为军事司管辖，列入军队编制。

铁路分遣队——是日军守备队分设在各车站的警备队伍。舒兰境内的马鞍山（现名马鞍岭）、上营、群岭、四家房（现名舒兰）、水曲柳……各站都设有日军铁路分遣队。守备队部设在新站，统管各站分遣队。主要任务是分管铁路沿线的安全，对铁路两侧山区、居民等任意搜索、查询。水曲柳路家街屯位于水曲柳车站南5公里处的山区。1935年，该屯的居民路德才，被水曲柳站日军分遣队的密探报告为通匪（指抗日队伍），绑架到新站日军守备队，施加了多次严刑拷打，最后竟惨无人道地投入恶狗圈被活活地吞食。

三级警察学校

日伪统治者，为加强地方警务实力，培训日伪的忠实骨干和后备力量，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警察学校。

警察训练所——1935年（伪满康德2年）春，伪舒兰县警务局于县城（现在的朝阳镇）的西大楼开办了舒兰县警察训练所，招考有文化的男性青年。到1938年共举办了9期，培训新学警400余名。我是训练所第9期培训的新学警。这期共48人，

教官是警尉解占一、卢崇琛。主要学习警察业务，即六法全书(基本法、卫生法、刑事法、警察法、保安法、警察职务规范)，还有术科操练。每期6个月，结业后为警士，分配到县内警察署。

地方警察学校——1939年以后，停止县办警察训练所，改由吉林省警务厅在省城（现在的吉林市）东大滩原第二师范学校旧址办的“地方警察学校”培训。校内分4个科：一是普通科，从有文化的男性青年中招考新学警，培训6个月，结业后为警士，输送到各县；二是补习科，对在职的警尉补以下的警察(即警尉补、警长、警士)，从各县招来，分批轮训，3个月期满回原警务机关；三是高等科，对在职的警尉补，经考试合格者，到校培训6个月，结业后为警尉（1943年7月1日以后，结业后改为监督警尉)，回原警务机关；四是警尉后补科，本科是1945年上半年新增设的学科，从国高、师道等中等学校以上的毕业生中招收，学期6个月，结业后任警尉，本科第一期未到结业，东北即光复了。

我是1943年被招到本校高等科学习的。当时校长是省警务厅长村井矢之助（日系警正）兼任，主事也是日系警正，教官有警佐贵文、董香圃、崔树礼、警尉陈希岩、王玉槐、日系警佐大石、警尉日下宪一……等二十多人，其中日系占三分之一。每天午前学习六法全书和一点点文化课，午后是军训课。军训都是日系教员任教，有时还组织夜训。军训是法西斯式，极为残酷，除打骂外，时常训以长跑。每人肩扛长枪，全副武装，绕校舍周围（4公里）跑四圈，教官在一旁看手表，慢了就挨打。有一次，学员安守平长跑中晕倒在地，他置之不理，继续长跑，当安醒过来时，还强令其追赶队伍。有一次日系教官日下宪一值宿，在夜深人静时，突然打钟、鸣笛，搞“非常招集”，全校各科学员闻声而起，赶忙整装，跑到操场列队集合待命。这时

普通科一个新学警，着装慢，出屋晚一点，正忙着低头扣衣钮向队列跑时，教官日下宪一迎面跑去，抡起皮剑，猛力地向这个新学警的后脑打去。一下子就把他打倒，晕在地上，日下宪一却置之不理，学员们也不敢动一动。

中央警察学校——这所警校是中央治安部警务司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办的，是专门培训在职的警尉、警佐、警正等人中的日语好、积极效忠日伪、有深造前途警官。受训6个月回原地，定为将来提升的后备力量。一般警察是进不了这所警校的。

诱鱼上钩，效忠日伪

日伪为引诱一些中国人积极向往警务工作，坚定效忠日伪的信念，而对投入警务的人员规定了极为优厚的待遇。凡是当上警察的，除月俸（工资）之外，都由官方发给警察服，有棉、有单，还发给衬衣、衬裤、鞋、帽和手套等，都是免费供给。还有六种津贴：一是家族津贴，警察家中每口人每月1元；二是冬季津贴，每年30元；三是职务津贴，警尉以上的每月5元；四是精勤津贴，凡警尉补以下的警察，每年评一次精勤（即公务好的），评上一次的，每月发给精勤津贴1元，被评上两次者，每月发给2元，评上三次者，每月发给3元；五是语学津贴，日语达三等者每月5元、二等者每月10元、一等者每月30元；六是勤务地津贴，离家在外地当警察，每月5元。此外，还有“赏与”（奖金），每年两次：6月末1次，按本人月俸额，少则赏与1个月的，多则赏与3个月；12月末评1次，按本人月俸额，少则赏与3个月，多则6个月。评定是由警务科长评科内人员，署长评署内人员，一般是按该人的公务、出勤、功过等的综合情况评定。对警察的待遇超过其他公务人员，因而当时有的女人说：“认可嫁警士，不嫁高等官（指其他行政官吏）”。因为警察

有钱、有权、有势，家属也随之光宗耀祖，贪享他人苦中之乐。所以，当时吉林地方警察学校招收新学警时，诱使一些国高、师道，甚至还有医大的毕业生去投考警校，他们成了日伪统治、残害中国人民的忠实走卒。

监　督

为了使警察积极为日伪卖力，各级行政机构专门设立了对警察的监督机关。省设督察股，县设督察室，各级监督本级管辖的警务人员。对不为日伪卖力的或思想有问题的警察，进行处分。伪舒兰县警务科警务股设督察室，室内只一名督察员是警佐张久财，负责全县警察的监督检查工作。于每年3月1日、6月1日、9月1日、12月1日等日，要对有问题的警察，发令惩办或免官，用以监督每个警察，为日伪效力。两方三分驻所的马麟、水曲柳分驻所的所长任××等，都是因为玩弄女性、纳妾享乐，整天东走西窜，游游逛逛，不为日伪的警务尽心卖力，而被免职罢官。

特务组织与活动

日伪特务组织是很严密的，县警务科其他各股的股长都是中国人，惟有特务股的股长安排了日本人。各警察署的特务系也同样由日人署附统管，署长都不准过问。特务人员都是经过特殊选择，忠于日伪，手毒心狠的人。特务系的活动是秘密的，上至省特务科、县特务股，下至各署特务系的一切活动，都是单线联系，其他任何人，就是中国人的科、署长都不得过问。凡是特务系的来往信件，封面上都加盖“特务亲展”四个字的立式长条印章，只准特务系主任（日系署附兼）拆阅，其他任何人不准拆封。上至县特务股、省特务科，皆是如此。

特务人员出外活动，都是身着便衣，内藏手枪，到处探听反满抗日的言论和可疑迹象。常常组织一些武装，任意搜查、逮捕，甚至杀害无辜平民。水曲柳路家街屯位于山林地带，抗日队伍曾来过此地，故特务组织对此地严加窥探。1935年夏，特务探知此屯有“土匪”（抗日队伍），县警务科特务股便立即组织一个临时侦察队，队长是安××，会同水曲柳日军分遣队和水曲柳警察分驻所所长何正长、警察马骥等共二十多人，各持武器，悄悄地进了路家街屯，进行突然搜查。一进屯就挨门挨户地搜查和逼供，非打即骂，凶狠残暴，但一无所得。急想报效日伪的马骥，再次威逼一个农民老吴。吴回答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是老农民，能知道谁！”态度有些生硬，马大怒，随即开枪击中吴的胸膛。吴当即身亡，马等人扬长而去。老吴一家以种地为生，老小两口人，相依为命。可怜的老吴，无辜地被杀害，剩下一个14岁的男孩，趴在爹爹的身上，嚎啕大哭。当时的惨状牵动着每个乡亲的心弦，无不落泪痛心，更加激起对日伪的统治和汉奸走狗的复仇怒火。

日伪统治地方的几个警务措施

日寇为预防地方人民的反抗，抵制抗日活动，便在地方推行了以下一些政策：

收缴民间武器。日寇侵占东北后，肆意烧杀掠夺，很怕地方人民拿起武器起来反抗，1932年9月11日到1933年2月26日，公布了《治安警察法》和《暂行“枪炮取缔规则”》。伪舒兰县警务局首先以发“枪照”为名，下令有钢枪的人家持枪主的半寸免冠照片和枪支到县警务局验枪编号登记发照。不到半年，即1934年春，就全部如数上缴没收，违者严惩。继而于1939年秋，对民间的土枪（洋炮、洋台子、母猪炮）也下令上缴。仅

平安一个村就缴送到县警务科（这时县警务局已改名为警务科）两大车。从此，民间武器收缴尽光，他们妄图迫使人民听候摆布，俯首做日伪的奴仆。

十家连坐，归屯并户。日寇侵占东北后，妄图切断广大人民群众与抗日队伍的联系，在各地居民中推行《连坐法》。这个《连坐法》是于1933年12月22日公布的《暂行保安法》实行地方管理保甲制时推行的。《连坐法》就是每十家左右连为一体，称一个牌，设牌长一人。如果牌内某一家有抗日言行或与抗日队伍有联系，其他几家也同受惩治。十个牌左右划为一个甲，设一名甲长（俗称百家长）。几个甲划为一个保，设一名保长。这就是当时县以下行政区划管理的保甲制。1935年（伪满康德2年）又强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各地零散的住户集中到指定的部落（屯），名曰牌，有牌长1人；几个牌划为一个屯，设有屯公所，有屯长1人，文书1人；几个屯划为一个村，设有村公所，有村长、副村长、司计，下分庶务系、财务系、劳务系、民生系、自卫团总等，这就是县以下政区的村屯制。归屯并户时，多是以当地的地主、豪绅、官吏的住址为部落集中地，其他佃户、穷人家都要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到指定的屯落居住。对原住房则实行烧光，不搬走的人则杀光，不拿走的家物和畜禽则抢光，制造无人区，断绝抗日武装与广大人民的联系。逼得千家万户贫民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是几家挤在一个屋内存身，有的露天支“马架”过宿，有的流落他乡。

发放“居住证明书”。日寇为便于侦查和围剿我抗日活动，于1938年（伪满康德5年）春到1940年，向各街、村居民发放“居住证明书”（俗称良民证）。18岁以上的人都发证，证上有半寸免冠半身照片，还加摁本人右食指的指纹。山区居民还要在

台帐上摁双手的全指纹。有证者视为良民，无证者则逮捕拷打受审。

搜查抗日潜伏人员

1940年9月至1941年3月，由省警务厅指纹管理室下派两名日系警尉补和两名满系（中国人）警尉补（翻译）到舒兰县警务科。按其旨意组成了两个“指纹游动班”。第一班班长是警务厅指纺管理室派来的警尉补阿久津文四郎，警尉补于××任翻译，以下班员都是从舒兰县各警察署抽调的，有警尉补孙世静、警长王梦筠和我等10余人，驻扎在两方三，活动在平安、金马、水曲、开原等村、屯；第二班的组织、任务与第一班同。主要任务是搜查抗日的潜伏人员，还要对各署掌握的“归顺匪”（投降的土匪）逐个进行审讯，是否有枪支、活动等。我在第一班，这次没有搜查到潜伏人员，只是先后审讯了姜秀生（“跨海”队长的警卫员）和阎有（“跨海”队员），查知无枪又无活动，之后取保人而释放。查知一名“跨海”队的炮头外逃，将其子逮捕，经审讯后，因其不详其父下落也释放了，诸如此类的搜查活动的目的是防止“归顺匪”东山再起。

（摘自《舒兰文史资料》第二辑）

巴彦县伪警务科内幕

岳如衡口述　魏长海整理

1940年7月1日，我考入了滨江省地方警察学校，校址在哈尔滨霁虹桥西侧。校长是日本人，名叫土权。学校有教官四十

多名，其中日本教官15人，中国教官二十多人，露西亚（白俄）教官4人。这一期共招收学员5个班，其中高等科两个班，培养高等警察，毕业后任警长；普通科两个班，培养普通警察，毕业后任警士；露西亚学员1个班。我考取了高等科，级任教官由警佐（股长级别）吴立夫担任。学期半年，学习了《警察通则》、《刑法》、《日语》，以及点检即检查手牒（身份证）、警刀、捕绳和武装训练等课程，于12月20日毕业。

我毕业后回到巴彦县，被分配到县警察署北门派出所当见习勤务。当时，县城有中心、北门、南门、东门、西门等5个派出所。我在北门派出所干了三个月，1941年（康德8年）4月1日，被调到县警务科特务股，职衔是内勤警长，1944年（康德11年）又晋升为警尉，一直担任特务股收发工作。

巴彦县警务科设置五个股、一个室和一支六十多人的警备大队，下辖巴彦、西集、洼兴、兴隆4个警察署。各警署下设派出所及分驻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警察机构。

警务股6人，主管人事调动，警察的任免、赏罚、教养。我们每天早晨上班后，先在警务股主持下做操点，学习两个钟头，而后才开始正常工作。

保安股13人，主管各种类型现行犯，如思想犯、政治犯、经济犯等等。1941年（康德8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政府为了加紧实行掠夺东北经济的计划和政策，又增设了经济警察，制订了《经济犯手续法》。凡是满洲人吃大米、白面或花高价买“私货”，一旦被警察发现，就被定为“经济犯”受到“法律制裁”。1944年（康德11年），县城光隆炉掌柜的盖云山，因为托人在津野田洋行买点煤，被经济警察发现后，被把他抓到保安股进行严刑拷打，回家不几天就含怨死去。保安股残酷折磨“犯人”的刑法多种多样，如灌辣椒水、抽牛鞭、过电等。

这种牛鞭是用一条牛皮做的，宽约二寸，长一米左右，象根棍子那么硬，往人身上一抽一道棱子，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过电更为残忍，将电话机的正负线分别缠在“犯人”两个大手指头上，然后将干电池拿掉，摇动电话，感应电迅速传遍人体，刺激“犯人”的心脏和大脑神经，使之浑身麻木，失去知觉。保安股残害“犯人”的场面，令人目不忍睹。

卫生股5人，主管卫生院、康生院（所谓戒鸦片烟的地方）和卫生事务。

警防股6人，主管防空和武器库。

督察室3人，它是1944年（康德11年）增设的，负责监督、检举警察“违法乱纪”的。

特务股17人，任务是配合日伪军警法西斯统治，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残酷镇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民族抗日力量。

特务股在警务科拥有特殊的权力，它虽隶属于警务科，但在业务上直接受省警务厅特务科指挥，可以不通过警务科长自行采取行动。省特务科来的双层封筒，第一层带“密”字，第二层写“别密”的密件，只有担任副县长、警务科首席科副及特务股长的日本人才能看到，而担当县长和警务科长的中国人是看不到的。从1940年到1945年，巴彦县警务科特务股长分别由日本人山崎、三富三郎、久保谷正男担任，副股长一直由陆维先担任。陆维先毕业于卜奎（今齐齐哈尔市）讲武堂，由于他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侵略者，曾得过一枚“建国”功劳章，被提拔为警佐。

特务股下设3个系1个特别搜查班（以下简称特搜班）。特高系主任高声远，警长衔，他手下有3个人，都是警尉衔。这个系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搜集苏联情报，对内迫害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

邪教系主任李方恒，他手下有4个人。这个系的任务是监督宗教团体、学校、党派、集会结社和出版等。在伪满时期，中国人民被剥夺任何政治权利和自由，不管社会团体或宗教团体有什么大型举动，都得事先请示特务股，待允许后方能开会。开会或布道时，邪教系派人监视，没发现问题算走运，若发现一点过火言论，当即就把开会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逮捕。按照1941年（康德8年）公布的《治安维持法》，这些人都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1944年（康德11年）又公布《时局特别刑法》，规定了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五十多种罪名。那时候，人们在大街上碰上熟人，也不敢站那闲扯一气，怕被警察看见当成"嫌疑犯"塞进监狱。

特务系6人，负责内勤，如文件收发、庶务等。

特搜班也叫特谍班，是特务股防谍地下组织。特搜班长由陆维先兼任，有19名成员。这19人中有6名是特高系、邪教系的成员，其他13人是从各个警察署特务系抽来的特务。此外，还有10名特务利用人（特务腿子）：黄福田、石雨田是陆维先的利用人，活动据点在兴隆和山后一带；金田昌浩（朝鲜族）是北原一武的利用人，活动据点在驿马山前东城子曹里屯，是朝鲜人居住点；冯老五也是北原一武的利用人，他家住县城，以赶胶皮马车拉脚为掩护，活动于兴隆镇、老巴彦港（今废弃）、木兰县石头河子、扬石河子等集镇，沿途搜集情报；利用小张是高声远的人，他是仁和商场（今巴彦县第一百货商店）年青店员，他就活动在这个商场；崔明德是久保谷正男从哈尔滨带来的，以做日本豆腐为业从事特务活动；李福才原是抗联第六军的收报员，被分配到巴彦县搜集情报，住在县城里崔家店。那时候，每隔一两天警察就到各个客店伙房检查一遍，发现李福才住了好多日子，也没有什么营生干，值勤警察就把李福才的

情况向陆维先做了汇报，陆就派人把李福才抓来，经过严刑拷打，李福才供认出自己是抗联第六军的收报员，当了可耻的叛徒，仍以抗联的身份活动在崔家店；还有李全（后改名李洪全）和一个叫大杨的，他俩都是抗联的叛徒，直接归省特务科领导，和陆维先取得联系。

特搜班除特高系、邪教系6人没有具体任务外，其他13名特务和10名腿子都有活动据点。这26人分别伪装成农民、工人、赶车夫或其他阶层人士，秘密破坏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特搜班为了防止抗联打入内部，绘制许多张《巴彦县行政区域》图，将他们的相片分别贴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用于互相辨认，交换情报或下达任务。

1942年（康德9年），东北抗日联军十二支队在支队长朴吉松的带领下，经常活动于巴彦北部山区，即巴彦、木兰、东兴三个县接壤地的白明贵、杨力平、韦家沟、前后硷草沟、蛤蟆塘和仁和村一带。接壤地带属于“三不管”，巴彦县警备大队围剿抗联队伍，抗联队伍可以撤退到东兴、木兰县，巴彦县警察就不追了；反过来，东兴、木兰县的警备大队也不开进巴彦县地面，这叫“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抗联十二支队抓住敌人这一薄弱环节，与敌人进行周旋，找机会重创敌人。

一天，朴队长率领战士冲进巴彦县仁和村，消灭了村内日伪武装，召集全村老百姓开会。会上，朴队长讲了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号召群众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会。很多群众参加了救国会，推选原仁和村村长吴福东为会长。这一情况被洼兴警察署知道了，并向警务科作了报告，警务科立即派武装警备队和搜查班前往仁和村围剿。十二支队得知警察出动的消息，提前安全转移了。十二支队离开仁和村后，先后袭击了木兰县石头河、巴彦县万发警察分所，狠

狠地打击了敌人。

1943年（康德10年）4月，在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小园井的带领下，组成了以日本警察为主的日、满、鲜警察共同参加的三十多人的“肃正工作队”，同时调动哈尔滨市、呼兰县、双城县、宾县等地的警备队二三百人，巴彦县警务科特务股除我一人留守外，其余的人都参加了震惊全省的“巴木东大检举”围剿、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巴木东大检举”在巴彦县、木兰县、东兴县，进行了一个多月，先后检举三四百人。这些人都被戴上黑帽子，扔进汽车里拉到巴彦县日本东大营，而后拉到警察署（巴彦县医院现址）逐个严刑拷打，过堂审问。审问后，有的人被送回东大营，“重犯”直接送到哈尔滨监狱，被释的是极少数。据我所知，巴彦县被检举的有：

仁和村村长杲福东（被杀害）；

教育科学务股蒋荃金（被装在皮口袋里摔死）；

小学校长武彬（被杀害）；

中学教师李廷槐（被杀害）；

中学校长孔庆尧（在哈尔滨监狱坚持绝食斗争中被饿死）；

教员孙述孟（被释放）；

1944年春，继第一次“巴木东大检举”之后，警务厅特务科属官平井和安田（朝鲜族）来到巴彦县，在县警务科特搜班和警察的配合下，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检举，搜捕第一次检举时逃跑和漏掉的人员，是第一次大检举的收尾工作。

越到满洲国末期，日本侵略者越感到处于四面楚歌、草木皆兵的困境，它象一只垂死挣扎的“困兽”，疯狂地镇压抗日武装力量，杀戮无辜的百姓，甚至连本地的大资本家也不放过。1943年（康德10年），巴彦县警务科特务股长久保谷正男秘密

逮捕了巴彦县出名的资本家兼地主秦广仁，将他押赴哈尔滨监狱，进行百般折磨。后来，他儿子秦瑞祥（县商工会会长）花了6万元伪国币，才将秦广仁赎了回来。特务股逮捕秦广仁，是因为老秦家财粗势大，联系人广，在巴彦地面影响大，有相当的号召力，怕他们干扰和妨碍日本统治，想让他"大户搬迁"（特务股内部术语），用老百姓话说就是逼他挪挪窝。由于秦家的产业都在巴彦县，迁出带不走，秦广仁不干，所以把他逮捕了。

日本侵略者不但对大资本家不放过，而且对效忠他们的警察也不放心，为此，1944年在县警务科又设置了督察室，专门监视警察的言行。当时，我们当警察、特务的，也是一日数惊，提心吊胆，人人自危，稍有不慎就可能掉脑袋。单文忠、张继学等人被杀害，就是"杀鸡"给我们看。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了，祖国光复了，中国人民得救了。不然的话，日伪反动派还不知搞多少次大检举，不知有多少爱国志士、平民百姓被检举杀害。光复第二天，群众打死了罪大恶极的陆维先和李方恒，从陆维先的口袋里搜出一张黑名单，上面有五百多人的名字。

祖国光复后，在中国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感召下，我于1948年从家里的夹壁墙钻出来，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向政府交待了自己的全部历史，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仅判管制3年。在管制期间，我在家种菜园子，管制解除后，于1956年参加吉庆菜队劳动，至今还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我的子女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一家过得很好。

追古抚今，思绪万千，伪满洲国我在县警务科特务股干了近5年，给巴彦县人民造成了很多灾难，至今想来还痛心疾首。

（摘自《巴彦文史资料》）

海伦县伪满警察署机构和欺压群众的情况

韩庆德

海伦县伪满时期警察署机构庞大，是日本人镇压、统治中国人民的最直接的工具。海伦县公署下设警务科，它领导全县各街、村警察署、派出所及各森林警察队。

警务科下设警务股、保安股、特务股、卫生股、司法股。各股有股长一人，均由警佐担任。设有拘留所和刑讯室。警务科工作人员约五十多人。

警务科下设海伦镇、海北镇、伦河镇、海南4个警察署。

海伦警察署下设十字街、南门、北门、东门、西门5个派出所。

农村的有海北、伦河、海南3个警察署所属的城西、海南、海东、海兴、兴农、友爱、双录、信义、业家、福海、祥雀（祥富）、墨字十井、后三井、爱乡派出所（也叫分驻所）。各所的所长由警尉、警尉补担任。

警察署本身设警务系、保安系、特务系、卫生系。各系的主任由警佐担任。

海伦县公署警务科，历次换了几任局（科）长，他们是警正赵祥云、警正沈玉昌、警正王秉钧。王秉钧也是光复后的一任科长。

海伦县警察署光复时，署长是警正周振国，副署长永井（日本人）。

当时海伦出名的四大特务，是在警务科特务股，即监督警

尉刘品三、监督警尉李洪藻、警尉补石崇岳、监督警尉李醒误。他们专门给日本人搜集情报，调查人民反满抗日的活动和言论，迫害和镇压抗日军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警务科各股的股长是：警务股长警佐吕明溪、保安股长警佐杨泽民（光复时，国民党维持会派他任伦河警察署署长，后来调到海北公安分局任局长叛变投敌），卫生股股长警佐宋右溪、司法股长警佐董世昌、特务股长警佐丸山（日本人）、副股长监督警尉福本（日本人）。

海伦警察署各系主任是：警务系主任警佐潘义尚、保安系主任警佐杨仲山、卫生系主任监督警尉永野（日本人）、特务系主任由副署长永井兼任、司法系主任是警佐佟焕生。

伦河警察署署长，光复前是杨泽民，海北警察署署长警佐毕圣序、海南警察署署长警佐吕殿奎（原是警察四中队的队长）。

全县警务系统共有警察七百多人。警务科下设警察大队，5个中队，每个中队百余人。是地方武装组织，专门从事镇压屠杀革命人民的武装组织。总队队长由警务科长兼任，一中队队长警佐申永和、二中队队长警佐王玉玺，三中队队长警佐杨青山、四中队队长警佐吕殿奎、五中队队长警佐林宝树。

一、二中队驻军海伦县城，三中队驻军伦河镇一带，四中队驻军叶家窝棚，五中队驻军海北镇和后三井子。

海伦县伪警察分为警正、警佐、监督警尉、警尉、警尉补、警长、警士。

警正有：孙克礼、赵祥云、沈玉昌、王秉钧、封永恩、张士勋、周正国（以上人员分别任过警务科长和警察署长）。

警佐有：宣明哲、潘义尚、佟换生、杨仲山、吕明溪、董世昌、佟吉海、杨青泉、韩岗来、杨泽民、张福田、魏振寰、张

世民、林宝树、王英俊、王玉玺、申永和、杨青山、夏尊珠、杨化三、解春普、韩锡环、张家骥、毕圣序、吕殿奎、邓林阁、曹兴北、王守信、方新伐、永井（日本人）、丸出（日本人）、剑持（日本人）、宋起超。

监督警尉和警尉有：徐鹏志、郎书林、王明惠、赵洁臣、李德全、张德吉、杨乃荣、张亚东、崔广文、丛显岗、李维刚、孙世芳、李醒误、陈宗荣、宋玉文、杨作文、吴德明、耿恕中、佟嘉谟、陆志基、席星垣、李志新、金明赫（朝鲜人，后改名金海明）、勾云朋、永野（日本人）、福本（日本人）、郭景汾、鞠兴臣、伊占鳌、陈景玉、尹天钧、窦桂新、郭　廊、李祖方、胡庆元、王国栋、王春芳（现名王安政）、王　惠、戴季良、邵洪财、李洪藻、刘品三、赵玉树、邢殿宝、吴玉庭。

警尉补、警长、警士有：石崇岳、王辅臣、毛兴武、黄仲三、赵庭奎、赵占春、李玉荣、于梦鲲、于万益、叶文山、初宝华、郝广普、吴秀岩、王浩然、王振祥、齐　贤、姜柏录、王奎山、赵广仁、王耀武、王　汉、安茂发、何守全、梁永新、梁风山、付占东、王洁身、蒋润贵、李子平、林奎伍、李效白、吴方林、霍恩惠、尹天宝、苍松林、綦海芳、李风文、赵邦禹、杨连春、寇明山、于海龙、辛旭晨、陈景山、杨文俭、辛海丰、王奎海、刘德胜、杨明千、徐振清、张希文、崔玉科、刘井贤、杨贵新、牛青山、牛文山、周锡武、方庆祯、曹辅臣、赵永福、许贵方、李振海、于殿生、董庆民、王振恩、吕行方、平希贤、沙立兴、蔡广文、王荣周、王树林、胡家业、卢万林、乔耀武、焦德本、黄　钧、杨文显、蒋迎春、杨永利、史洪超、苗庆丰、郑玉书、王国华、安洪超。

警察的服装是警官服。根据官级的不同，警服的质量也不一样，警察带着肩章，警士一个金梅花，警长二个金梅花；警

尉补一条金杠一个金梅花；警尉一条金杠二个金梅花；警佐一条金杠三个金梅花；警正二条金杠加上金梅花。1945年警察官衔有所变动，取消了警尉的职称，警尉补改称警尉，而原警尉改称监督警尉。警察带警刀，按级别，装佩不同的警刀。警士、警长、警尉补佩给皮刀带、铁鞘刀；警尉、警佐佩给蓝里皮刀带、皮鞘刀；警正佩给红里皮刀带、皮鞘刀。警察戴警官帽、佩国徽。警尉以上的警官穿长筒的皮靴，其他警察穿皮鞋或布鞋等，都有短枪。

伪满时期，警察欺压打骂群众，当时流行着这样的口头语：时运不济碰上华利，时气点低遇见吕明溪，时气操蛋碰上王汉。

华利，日本人。吕明溪、王汉都是当时的警察。他们仗势欺人，效忠日寇，群众恨之入骨。

吕明溪，33岁当上了伪警察，当过警长、警尉、巡官、警佐、警务股长。主要活动于我县的业家、伦河、海兴、三圣宫、海南乡一带。他平时遇见群众，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拿起洋刀就砍，因此，群众称他为“吕大绝后”。

他在三圣宫（现共合乡）当伪警察署长时，去仁和村包文斌家，因包家没看住狗，吕明溪一洋刀将老包头砍伤，不到十天死去。去丰厚村催“出荷粮”时，把老邓家9口人打得跪在当院求饶命，结果打死2口。在田家岗屯场院，把没粮的群众吊起来，往身上浇凉水，灌辣椒水，薅老头胡子，边打边说：“穷小子们，你们全死了，还不当死几只鸡。”他还用角锥打死了田振德。苏生的父亲，冬天没衣服穿，不能送出荷粮，吕明溪就把他打到外边往身上浇凉水，活活冻死了。1944年，吕明溪去水师营（现永和乡）催出荷粮，因王广兴出粮慢了，就将王家6口人绑在马厩桩子上，活活打死了4口。1941年，吕明溪去海南永强村催出荷粮，在任向臣的家中翻出几斤小米，将任的老婆

踢倒在地，当场小产死去了。吕明溪在出荷粮中，打死群众10余人。吕明溪在训练勤俸队时，用洋刀砍死了两人。所以群众说："时气点低，遇见吕明溪，不是打掉魂，就是扒层皮。"

王汉，群众称他为"王大巴掌"、"北霸天"。他在日伪时期曾当过百祥村公所雇员、情报员、动员系系长。当时全村16个屯，30岁到50岁的男人没被他打过的极少。在训练"棒子队"时，一位名叫王瑞宽的群众，被他打了一百多木棒子，打断了14根锄杠，打得当时就不会动了。把朱峰打二十多木棒子，打倒在地上，他还说这是装的，又上去把肋条踢断一根。他向刘正龙要豆秸，刘没有，他就进行报复，强行抓刘正龙当劳工。他说："抓劳工你能跑，把腿给他打折了。"上去两棒子就把刘正龙腿打脱臼了。王汉在冬天催出荷粮时，因王德田缺点谷子，就扒光了王德田的上衣绑在外边往身上浇凉水，冻得死去活来好几次。李殿奎、黄玉山两家已如数交了出荷粮，王汉又强加数量，因没粮，就叫黄玉山的老祖母跪在砖头上，用棒子将李殿奎打成重伤，第二天就死了。李殿奎两个10岁左右的孩子，因没有粮吃的，在当年就饿死了。

在抓劳工时，王汉更为凶恶。如姜喜明、郭宝寻四五户群众家破人亡。百民屯郭景祥哥俩都被抓去当劳工，一个去鹤岗，一个去孙吴。逼得郭景祥老父跳河死了。一次他"检查卫生"到一个姓刘的群众家，正赶刘妻上地割猪食菜回来，因为脸晒的又红又黑，一进院子就叫这个妇女跪下，用砖头子给蹭脖子，把脖子都磨出了血，还用皮带打得可地滚。因此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说："不怕天旱水涝就怕王汉来到，时气操蛋碰上王汉"。

石崇岳，是海伦有名的四大特务之一。从"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开始后，就当上了汉奸。他认贼作父，积极为日寇效劳。1933年5月份，石在海伦镇十字街发现了东北抗联三支

队参谋长陈树波、抗联战士陈树本，立即向日寇报告，率领特务和警察进行围捕，陈树波为掩护陈树本脱险，开枪与敌人战斗，后来被捕。石崇岳亲自逼供审问，严刑毒打30余次，将其肋骨打断了三根，后来在当年的6月份将其杀害了。

1941年4月，石崇岳和伪警佐佟焕生二人带领40余名敌特人员，将农民李奎元、李奎生及其儿子李金山抓到警察署，严刑拷打，硬逼他们承认是抗联战士、"反满抗日"等。之后李奎生死在狱中，李金山被送到孙吴当劳工。石崇岳对抗联家属也极力迫害。抗联战士李雷炎的父亲李守财，两次被他逮捕入狱，进行严刑拷打逼供，过电、灌辣椒水、上大挂，逼迫老人说出他儿子的活动据点。

1941年8月，他在街内发现"荣盛炉"管帐先生刘子仁买大米，就以"经济犯"为名把刘打得死去活来，后来托人讲情，罚款200元，又送去大量礼品才完事。1943年5月，石崇岳看到肖聋子的妹妹有些姿色，就强行霸占为妾。

此材料是根据多方查证，走访了海伦伪满警察署警察王安政等人和查档整理而成。

（摘自《海伦文史资料》第四辑）

东辽县伪满二道河子警察署组织及其罪恶活动

李国太　周文华整理

二道河子（现为东辽县建安镇）是原西安县（今辽源市）北部的小集镇。伪满时期统治者在这个号称北半天的地方设立一

个管辖11个村、方圆百余里的二道河子警察署。

二道河子警察署所辖各村都有警察分驻所，建安村叫直辖分驻所。

二道河子警察署设署长1人，警务主任1人，特务主任1人（日本人），治安主任1人。警务主任管警务系、保安系、卫生系、教养系；治安主任管司法、特务系。

伪康德3至6年又在警察署里设有日本指导官，专办特务系工作。伪康德7年日军进关，此员被抽调，把此系纳入治安系，这些便是日伪统治基层的警务机构。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了确保其政权的巩固，采取"治安肃正"政策，重点在东边道一带组织了东边道大讨伐队。从各地抽调日本警备队、警察队，对东北抗联进行大扫荡，实行经济封锁，集屯、集家，以此割断抗联与群众联系，形成统治者的所谓无干扰地带。这个隶属于县公署的警务组织，在"三权分立"后，权势日益强化，对于大批警员竟称之谓"皇帝陛下警察官"，其威严不容侵犯。除凶狠的日系警官外，更有一批背宗忘祖的中国人，甘心为日寇效劳，充当侵略者的帮凶。回忆当年甲山村分驻所有一个警士，名叫付龙涛，绰号"野龙"，当上警察后，耀武扬威，无恶不作，群众编了几句民谣传诵："野龙下了屯，百姓吓掉魂。野龙要来到，小孩不敢闹。不怕地陷天蹋，就怕野龙到家"。由此可见在东北沦陷14年里，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血腥镇压

日伪统治者为了征服、镇压爱国志士和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建安警察署的特务由县警务科特务股特派了指挥官佐藤。他是二道河子警察署的太上皇，又是特务系负责人。他

用一顶顶"思想犯"、"国事犯"大帽子给人们扣上，什么"反满抗日"，什么"思想不良"，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下，也不知死掉了多少无辜人，又有多少警官因此升了官、发了财。

对地方仕绅、知名人士、不甘心出任敌伪职务的知识分子都登记上册，列为"要视察人"。过去当过土匪、刑事犯罪、刑满释放分子、认为有不良倾向的人，列入"要注意的人"。迁入、外出都须报告。

学校教职员工，每年须呈交相片、履历表，以备归档审查，并定期到学校监督听课。

宗教团体，集会结社，都须报请特务系监督。

此外，到国外、国境、特别地区旅行，也都须到特务系申请许可证，方可行动。

伪康德7年，"七·二五"公布了"统制配给令"，为支援所谓大东亚圣战，对棉布、豆油、酒、烟、煤油、火柴、米、面、肉……都列为配给品。因之，警察署又特置"经济视警"一人。谁个私贩私卖，查着就是"经济犯"，轻者罚款、没收，重者关押。

建安小街西门外有个吕矮子家里来了客人，酒醉后吐出大米饭，被直辖分驻所长赵明志看见，追要大米，吕矮子吓得跪倒求饶说："所长，我老是信奉佛教的（赵信佛教，外号叫赵小佛），我这是过年时留下几把米，今天拿出待客，高高手吧。"赵不允，便翻箱倒柜，翻到了一瓢米，敲诈了一笔钱才罢休。

小商号"多家床子"贩进了一些棉布，警察腿子报告了警长李志国（外号李大巴掌）。李带人翻出了百十尺青、蓝花旗布，掌柜多守信挨了一顿打，没收了布又封了店门。多托人求情，拿出两张"大绵羊"（200元）才算了事。

老百姓最感到头痛的是：春秋季卫生大检查，年始年末大

搜查，五更半夜查户口……这也查，那也查，目的都是敲诈勒索。

二、经济掠夺

1933年这里建起了“金融合作社”，还有“兴农合作社”，“粮谷组合”等单位。粮谷出荷、配给品发放都由这些部门办理，警察署起监督作用。对那些不甘心受剥削的老百姓，加以武力镇压。

此外设有“大兴当”，属于新京大兴株式会社的分“当”，实质就是公开的高利贷剥削组织。由一个叫西尾的朝鲜族日籍人与安润冒合办了一个烟馆，叫“大荣号”，又雇用女招待，用色相引诱顾客，有些富家子弟溺于此，大多染上了大烟瘾。

1939年这所大烟馆由县鸦片专卖署接办，改名为“鸦片小卖所”，由警察署卫生系发放鸦片证，每日按数发放，每份重量一分。包装纸上有付对联，上句写的是：“及口为吸，若不撇开终是苦”；下句是：“因火成烟，如能回头便成人”。这只不过是为“王道乐土”、“日满协和”的招牌贴金罢了。

二道河子区是个富庶的边陲镇，但多年来却也多灾多难。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土匪蜂拥而至，妄图阻挠、破坏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事业。1946年国民党五十二军由马鞍山发炮攻打二道河子小街，在一片慌乱中，这所日伪警察盘踞近11年的“狗窝”，一炮升天，硝烟弥漫，大火飞腾。

（摘自《东辽文史资料》第一辑）

伪警察编成“讨伐”部队

潮海辰亥

关东局警务部依照警务部长东条少将的命令，为配合军方对东边道中国抗日联军的进攻作战，编成了关东局警察侵攻作战部队，实施了在安奉线地区的进攻作战。进攻作战部队的编制如下：警察进攻作战部队司令官东条警务部长，参谋长盐泽警备课长，司令部员，警备课员，宪兵少佐两名，坂本警部等约8名，司令部附青木警务课长，潮海事务官（我）。队本部设于凤凰城，警察中队驻于安东、凤凰城、本溪湖、奉天、抚顺、鞍山。队员约1 000名，武装配备有手枪、步枪、机关枪（各中队配有1至2挺）、步兵炮（1门），骑兵各中队有10匹至20匹马。进攻作战期约50天。出动在900次以上。对抗日联军及乡土游击队约6个集团的中国人民约2 000人进行了攻击作战。

我以警务课事务官及司令部附的身份，担任了攻击作战预算费用400万元的拨款事宜。由关东局派遣警察官200名增援。9月初，随同东条司令官检阅进攻作战部队。10月，关东局武部总长视察前线时，我按照青木警务课长的命令，担任了向导。在凤凰城，和盐泽警备课长搭乘警察机视察前线，鼓励部队。另外还担任了论功行赏的事务。结果射杀或屠杀了中国抗日联军游击队员306人；掠夺武器弹药甚多。其间凤凰城警察中队大西翻译员，在凤凰城地区对王大姑娘游击队长收降工作中，杀害了中国人民队员3名，并射杀了王队长。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大讨

伐"》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

略谈伪满的"思想犯"

鞠晶

日伪当局继1941年12月27日公布的《治安维持法》之后，从1943年起，又公布了一系列的法西斯法令。其中包括1943年9月18日公布的两项可以任意迫害中国人民的《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

所谓《保安矫正法》，就是把"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送进特设的矫正辅导院，在进行"精神训练"的同时，强迫从事沉重的劳役。而《思想矫正法》则是对可能犯有政治罪者，实行"预防拘禁"，同时也施以劳役。据此既对中国人民进行法西斯高压，又将被迫害的群众作为急需的劳动力来奴役。根据《思想矫正法》而被"预防拘禁"或"保护监禁"者，则规定为犯有下列"罪"的可能者，即"对帝室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家罪"、"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军机保护法之罪"、"治安维持法之罪"、"国防保安法之罪"、"国防资源秘密保护法之罪"，等等。由此可见，日伪军警根据这样的反动法令，只需加上了"有犯罪可能"的帽子，就可以随意地把任何一个人抓走，并投入狱中。

捕人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所谓"个别索出"，即个别逮捕。日伪警宪依据自己的意愿和判断，对于处于任何行为中的人都可以逮捕，包括外出上街或旅行中的人；二是所谓"一齐索出"，也是最残暴的方法，即所谓"抓浮浪"，一次集中和大批

地抓捕中国平民百姓。例如：1943年7月1日至7日，伪鞍山日伪机关还别出心裁地实行“防犯周”，几乎天天地成批抓人。再如奉天（沈阳），虽然不是天天成批抓人，也是每隔一个时期就大肆进行一次“抓浮浪”。

1943年4月——6月奉天“抓浮浪”情况

时　间	抓捕人数	资　料　来　源	备注
4月27日	3 576	《盛京时报》1943.5.8	
5月4日	326	《盛京时报》1943.5.6	
6月22日	3 500	《满州新闻》1943.6.25	

日寇入侵以来，在我盘山也有很多无辜群众，被扣上“思想犯”的罪名遭受残酷的迫害。1935年，沙岭九台子小学教师周凤举，突然被营口日本宪兵队捕去，送至沈阳监狱，囚禁一年，在狱中备受各种酷刑，遍体鳞伤，出狱后一年死去。1937年7月，伪警察无故将一过路青年（姓名不详），囚禁狱中，下落不明。

1939年，日寇警务股长佐藤，巡视街内，无故将孙明远、马常有两人逮捕，加以“反满抗日”的莫须有罪名，枪杀于盘山西门外。

1938年，伪警察首席指导官酒寄平三郎协同伪警察署林署长等数十名警察，在高升一带进行3天的大搜查，寅夜入户，鸡犬不宁。广大群众倾家荡产，伪警人员满载而归。

日寇的思想统治，无孔不入。稍有文化水平，并有爱国思想的人，时刻担惊受怕，随时都有被矫正的危险。1943年以后，伪警察署已列具了黑名单，准备分批送去矫正。但好梦不长，没等他们动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摘自《盘山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收缴民枪

曾宪绂*

旧中国时期盘山就素称多匪之区，"九·一八"事变前后盗匪更蜂拥而起，抢绑事件天天发生。人民为了自卫不惜高价购买枪支，户与户，屯与屯联起来共同防御。因此不仅有钱的人家多买几支枪，就是中等人家也得买上一两支枪。当时只要屯子枪多，修好炮台，建好卡门，昼夜加强防御，就不受匪害或者少受匪害。

日寇侵占盘山后，就下令民枪登记，当时有的人把自己家所有枪支全部登记，也有的留下几支不登记，防备以后都收去没法防御。由大同2年（1933年）就开始收缴民枪。收枪按登记册子根据有枪人家的家庭情况留一支或几支（这次收每支枪发给伪币10元，后来收的就不给钱了），从此以后每年冬季就有一次收缴枪支活动（每次都经过两三个月）。经过一两年收缴工作把登记的枪支都全部收缴后，以后每年还是照旧收缴一次，每次都是由县里日本人参事官、指导官指定哪个警察署必须完成多少支（当时盘山八个警察署，每个警察署一次都得完成几百支）。在1937年以前，有些没登记的枪经过几年的陆续收缴都已缴净了，以后哪还有枪？但一次比一次要的紧，当地警察署完不成，县里派去由日本人率领的收枪班，到警察署后先召集村

* 曾宪绂，现年70岁（系撰文发表在《双台区文史资料》时年龄）。原伪满洲国盘山县警务科警察。历任警务股长、警察署长、警务科长。《收缴民枪》一文中记载的事实，是他个人亲历的事。传给后人以窥伪满时代统治者对东北人民残酷迫害之一斑。

民开大小会，用威胁恫吓等手段强逼硬要。有时指定某人必须交几支。我们当警察的这些人都明知民间没有枪了，但是为了保住自己饭碗子，或者讨日本人的欢心，也不得不昧着心眼为虎作伥，甚至认为谁有枪就找来动刑逼问，因此一年一度的收枪，人民要遭受一次最严重的涂炭。一听说开始收枪了，人们就不寒而栗，寝食不安，都说："这个鬼门关实在不好过啊！"在欲交没有、欲抗不敢的情况下，无奈何就得积极想办法，托亲友到外县多花钱买"铁公鸡"、洋炮等来交差。

1940年是最后一次收枪。当时我在沙岭警察署当署长。在县警务科开会时，指定沙岭警察署要完成500支枪，当时我提出沙岭境内我敢保证实在没枪了，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当场遭到榆井指导官的大骂。会后，另外几个署长劝我说，你心太实了。他（指日本人指导官）说怎么的就怎么的呗，提那个有啥用呢？这年的缴枪是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全县一支完整的枪也没有了，县里派去的收枪班尽管经过两个多月的督催，但毫无效果，后来又把认为哪些人还有枪的都传来，施用毒打及灌凉水等酷刑，逼得人民实在没路，再想到外县买"铁公鸡"、洋炮也买不到了。在这个紧要关头，也不知道是谁大胆想出办法来，找旧自行车把、铁管子，说是埋在地下多年的枪筒、拿来交任务，以后连锄钩子都当枪交，日本人却满意的说"顶好"。就这样全县一个传一个地这样干，各警察署都收一堆废铁完成了任务，人民才过了关，从此盘山县收枪工作才算结束了。

不仅在历年收枪工作时期，人民遭受痛苦，就是平时有人密告谁有枪没交，警务科就捕来拘押刑讯，甚而有被处死的。我记得在1937年春季，盘山河南某屯居民吴某，因为有仇人插在他家秫秸里两支步枪，被警务科密探孙洪生报告日本人，把吴家兄弟两人捕来，在毒打、灌凉水的严刑逼供下，承认了他私

藏枪支，结果把他们哥俩都枪毙了。

（摘自《双台区文史资料》）

伪满收缴民枪　汉奸横行霸道

彭希九口述

姜富斌整理

从1937年前后到1941年期间，伪满各村公所会同各保甲，并由警察署所属各分所督导，在绥中普遍大搞“武器回收”，紧一阵慢一阵，断断续续搞了5年之久。特别是铁道南各屯被作为重点，挨户强迫收枪，群众为这事没少挨打受气。“武器回收”已搞多次，有的人家把老套筒或不知什么年月捡来的生了锈的大刀片和扎枪头都交上去了。谁想到屡次三番还要枪，日伪当局得寸进尺，硬说有的是枪，死逼着要。谁要领头说句没有就专找谁要，我就是爱说话出了毛病，以抗拒武器回收的罪名被灌了凉水。

多言种祸根

杨致山是新庙子人，是协和会会长。那年他派我们小郑福屯6个牌的人到蔡家窝棚河沟子修桥。这6个牌的牌长里就有我。杨会长单叫我们小郑屯的人修桥，不派附近几个屯子，就不合理。我和杨会长顶了几句：修也可，但必须把周围屯子的人都调来修。另一牌长张玉藩也跟着顶了他几句。当时杨会长气得一甩袖子走了，从此对我和张玉藩怀恨在心。

借机行报复

得罪杨会长是在那年夏天，他以后总想找我的岔子，没遇到机会。一说要搞“武器回收”，他就借机会报复，限期完成。当时我们屯确实一条枪也没有。9月、10月间有一天，我刚吃完早饭，老贲头来招呼我到杨保屯甲长李少白家开会。我刚到李家时，院子里已经有姜茏春、彭老润、张玉藩、赵老升、毕德怀，加我正好是原来修桥的6个牌长。院子里站着些拿枪的警察。屋里有杨会长，警尉吴连第和牛心屯村村长刘丰年等。我一看不妙，哪里是开会？明明是整我们出他的气。果然，不大一会儿把我和张玉藩叫到屋里去了，杨会长叉着腰站在屋当中，张口就向我俩要枪，我们好话说了不少，但他没等说完，就把张玉藩捆了起来。只见屋里水壶水桶板凳早已预备停当。他们把张牢牢地捆在只一头有腿的板凳上，一连灌了两大壶水。我想，这是杀鸡给猴看呢！果然，灌完他就冲我逼来，吴警尉一边捆一边问：“有枪没有？”我说没有。杨会长就说，“问他干什么，让他躺在那儿，灌！”他们往板凳上绑我时，我还说：“长这么大也没有过枪呀！”刘丰年慢条斯理地说：“你这老爷子脑瓜太死。”接着吴警尉提壶就往我鼻子里灌。他边灌边咬牙切齿地说，“我灌死你，看你还倔！”两壶水我只喝了一壶半。接着外面的警察把彭老润推进屋里了。吴警尉见他进屋，横眉立目地嚷道：“你他妈干什么来了，出去！出去！”几下就把他推出去了。后来我才想起来，原来彭老润跟警尉有亲戚关系，吴的堂兄吴俊亭就娶彭老润的妹子为妻，怪不得把他推出去了。

另几个牌长也被推进来，个个吓得魂不附体，谁也不敢吭声。刚进屋，杨会长就说：“算了算了！”都放了回去。

无辜受迫害

不光是象我这样爱多嘴的人受苦，就是老实到连打个响雷也害怕的人也难躲灾殃。前山洼有个大老实人叫张德柱，年轻时屯里人叫他“大姑娘”，现在都管他叫“老太太”。此人平素寡言少语，是地道庄稼人。也是在那年冬天，伪保甲通知一户出一个男人到后火石村开会。后火石村是当时警察分所驻地。这个分所辖区有三十多里，各屯去参加会的有几千人，完全集合在分所门前的空场上，挤得满满的。分所有个任警尉，外号人称瞎老任。等各屯都站好队时，瞎老任和绥中警察署的戴警长以及一些警察都喝得醉醺醺地出来了。他向大家讲话，张口就让有枪的都拿出来，然后指了指空场边上的长条凳和十来付水桶，把眼一斜，接着说：“看见没有？没枪就灌死你们，多咱灌死多咱拉倒！”这时只见姓戴的小子拎着文明棍，在各屯队伍前面溜达，看谁不顺眼，就用文明棍的弯把子勾住脖子往外拽，勾出来的人单另排一行，挨个受灌。当时站在队伍前排的人见事不妙，都想往后排蹭，张德柱老实，别人往后挪，他不动，最后只剩他突出在前面。姓戴的刚好过来，用勾子把他勾出来道：“你愿意出来就来吧！”把他拉出来后，扒掉了棉衣，大冬天光着膀子就捆在条凳上，用刚从井里拔出来的水灌，张德柱是有生以来没有接触过枪的人。他们一边灌一边问：你知道哪里有枪？谁有枪？张德柱生来不会胡说八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能挺着，直灌得他死去活来。

就这样连着好几天，每天灌十多个。瞎老任说：“看见没有？这井水多咱干了多咱算完。”群众都吓坏了，东李金屯有个单连会，被勾出来还没灌就吓成精神病，过了两三个月死在家里了。

后来前桑园有个姓陈的被勾出来了。他弟弟是个国兵，当

时正在家，听说要灌他哥，赶到会场就跟任警尉吵了起来，陈的弟弟说："国兵家属没有枪。"瞒老任说一定有，拿出来就灌。把姓陈的灌了一顿，当国兵的弟弟不让，就打起来了。结果警察人多，把国兵的一条胳膊打断，才把这开起来没有头的"武器回收"大会搅散。此后再也没人来要枪。

（摘自《绥中文史资料》）

记海边警察队及其营口分队

王富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建立了傀儡政府伪满州国。设置一些恐怖伪机关组织的同时，在营口成立了"营口辽河水上警察局"。局长是中国人傅占文，由日本内地派来的原海军大佐宫部光利为顾问，他带来了很多日本人安插到警察局的主要科室，指导一切工作。施行法西斯专制手段。同时，利用原"中国营口渔业局"部分残留人员充当部下，迫害人民群众。

1934年，"营口辽河水上警察局"被撤消，正式成立了"海边警察队"，本部设在营口市西安桥街西边，下设旅顺办事处和6个分队两个分局：即营口分队、田庄台分队、庄河分队、大东沟分队、葫芦岛分队、复州分队和巨流河分局、二界沟分局。所属舰艇有：驱逐舰海威号、运输舰海王号、海上巡逻海龟、海凤、海光、海瑞、海华和海祥号（以上均由日本海军省配备）；炮舰荣安号、快马号、骏通号和第一辽河号（以上是原营口渔业局遗留下的）以及逃船（帆船）第一、二、三、四、五、六

号；汽艇第一、二、三、四、五、六海边号，第一、二、三、四辽河号。此外，还配有飞机六架，其中水上飞机两架。海边警察队总部人员总计1 000人左右，日本人占其50%。组织机构和职权范围在辽河水上警察局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和扩大。主要人员如下：队长宫部光利（日本人），原日本海军大佐。副队长村上功（日本人），原日本海军大尉。秘书周万选（中日混血儿）。翻译高崎美男（日本人）。警务科长亀田野平三（日本人），原日本关东军宪兵大尉。保安科长西冈源（日本人），原日本内务省警视厅警视。特务科长谷次郎（日本人），原日本内务省警视厅警视。外事科长涩谷三郎（日本人），原日本新闻界特派员。机政科长樱田博（日本人），原日本海军机关大佐。舰政科长川田实（日本人），原日本海军大尉。航空科长铃木四郎（日本人），原日本海军大尉。队长宫部光利兼任警察训练所所长和旅顺办事处处长。

海边警察队本部管辖各分队、分局的一切事务。其执行职权范围不受任何地方机关管理，是一种特殊警察组织，由伪满国务院治安部警务司直接管辖，并接受日本关东军旅顺海军要塞司令部直接指挥。除执行一般警察职权以外，还负责渤海、黄海以及沿海的警戒警备任务。有权检查海面上一切航行来往船只，取缔海上密输品出入，逮捕“潜入国境”的“不良分子”（被认为是反满抗日的爱国人士）。另外，还搜集海外一切有关军事、国际形势等情报，管理海面和沿海海岸的一切“刑事犯”、“国事犯”。有随时逮捕和自行处决权，一切事务勿需请示上级机关，可以先斩后奏，任何地方行政机关无权干涉。一是因为它是双层领导，另一方面是因为队内是日本军、警、宪高级人员，其他单位也不敢管。

海边警察队营口分队共有70余人（日本人占40%），下设警

务系、特务系、司法系、执行系和庶务系。管辖营口辽河两岸及水上治安，检查出入营口港的一切船只，发放船舶牌照和海员手册，检查出入营口港旅客的行李与所携带物品，发现和逮捕思想犯和"不良分子"。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他们的严查对象，还搜集海外有关军事、经济、中日战争、国际形势、民心动向、流言蜚语等情报。营口至龟口，营口至天津定期往返的客船上都有营口分队的专人押船。对于每位旅客，他们在检查中非打即骂，无一放过。"九·一八"事变时，有很多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了爱国不当亡国奴，由东北逃至关内，认为国民党政府必能派兵收复东北。未想国民党政府抱着不抵抗主义的政策，放弃了东北三省，致使这些人在关内无亲可投，无业可就，只得重返家园，以待时机到来。可是，在回来的途中路经营口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一旦被发现，即不准继续前行，有的被押送回关内。有的被当做嫌疑犯扣押起来，不知去向。还有的被"抛锚"，即把一块石头绑在其胸前，用汽艇送到营口港外推至水中淹死，象这样死去的无辜者不知有多少。

海边警察队营口分队司法系除进行正式刑事侦察以外，还利用"密侦"（便衣），这部分人大多数是土匪出身。他们常常到营口市周围各县（盘山县、营口县、辽中县、新民县、庄河县和盖县）农村去，侦察找村长或当地土豪劣绅，询问该村中是否有人长期不在村内干庄稼活而到外地去的，这种人就会被他们认为不是"好人"，待这些人回乡时，便以"盗匪、嫌疑犯"的罪名被逮捕到营口分队，严刑拷打，逼迫承认是土匪。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受刑不过，只好承认，而后，按"盗匪"处死，如此被营口分队杀死的人在当时还有很多。

海边警察队本部于1938年6月奉其上级命令，实行机构改革，将原来的海边警察队改为"海上警察队"，并将以前所属的

各分队、分局移交给所在市、县接管，而不再属于海上警察队管辖。原海边警察队营口分队就由营口市警察厅接管，改名为“营口警察厅水上分室”。

（摘自《盖县文史资料》第五辑）

抚远“国境警察队”见闻

杨峰

我在1943年的10月，由通河县森林警察大队长调任为抚远县“国境警察”本队附，在抚远任职了一年半。

抚远县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处，距苏联的伯力市仅60公里。这里的地势低洼，交通很不方便，每年夏季只有5个月的通船期。此外，每周有1次旅客班机直通当时的伪三江省会佳木斯。

这里驻有日本军约50名，并设有日本关东军直属的特务机关，专门从事特务活动，可见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视的。

“国境警察”的沿革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抚远之后，就在这里设置了“国境监视队”，分别在抚远、秦得利、海青、东安镇设置了4个中队。

“国境监视队”直接受省警务厅的指挥，专门执行国境监视的任务。1936年为了精简机构，撤销了国境监视队的组织，把国境监视的任务交由当地的警务局负责。同时把警务局改称为

“国境警察本队”，各警察所改称中队，各分驻所改称小队，并强化了内部组织，设置了无线电室，加强了通信网的设施。

本队长由日本副县长兼任，各中队长及队部的股长完全改用日人，中国人全改为副职。中队仍然是驻扎在抚远、秦得利、海青、东安镇，共4个中队，其中东安镇中队改用日人的警正。本队部设警务股、特务股两股，不设保安和司法股，保安警察的事务由警务股处理，司法警察的事务由特务股处理。特务股长是省事务官兼警正，他受省警务厅和本队长的双重领导，并同当地的特务机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队内的日人数量也增多了，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所谓大东亚战争之前，日本人约占警察队总人数17%。我到抚远时，因为他们已成了强弩之末，日本人已不够用了，但仍占总人数8%左右。

1944年3月又改称为国境警察区队，但其它都没有变动。

装备和训练

抚远国境警察队，总人数约400人。每人都配有一支步枪，警尉以上的人员都配有一支手枪，县里的文职人员也都配有一支步枪。本队部有重机枪一挺，所属的4个中队各配有轻机枪一挺。据说以前还有几门迫击炮，在日苏中立协定（1941年4月13日）订立后被调走了。

警察队经常作军事训练，每两周要作一次战斗演习，县里的文职人员和县长也照样参加，就是在零下40℃的严冬也不例外。还经常作夜行军和急行军的练习，而且多数是在冬夜进行的，借此也作了江岸巡逻。

一般业务和国境的一些情况

警察队除了作一般行政警察业务之外，重要的是国境监视的任务。在县内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沿岸，每隔10里、20里不等都设有高达10余米的木架子，作为监视了望台。这种了望台完全是隔江对峙的形式，这边有一个，那边也有一个。如果发现这边或那边增设一个，对方也一定要增设一个。从前在这些了望台上日日夜夜都设有岗哨，从1937年日苏订立了不侵犯条约之后便撤消了。我到抚远的时候只剩下这些木架子隔江相望地在耸立着。但国境巡逻仍在日夜地进行着。

在抚远县城西山日军的驻扎地设有一个最高的了望台，安置着直径4寸的望远镜，从这个望远镜里可以把伯力市的一切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关于国境的一切情况都由特务股作成日报，每天向省报告一次。

在每隔一两周的时间里，苏联方面要有一批机群（三至五架）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上空作一侦察飞行；在夏季里也常有炮艇沿江巡航。伪满的江上军每到夏令也要有一两艘炮艇开到抚远停泊两三周，用来示威。

国境事件和特务的往来

所谓“满”苏国境，在初期里是呈现着剑拔弩张的局面，隔岸炮击的事常常发生，在日苏不侵犯条约订立后便逐渐地改善了这个状态。但我在抚远的期间也曾有过几次小事件。

一次是在一个冬夜里，在海青镇的江面上（乌苏里江），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了一只野狗，于是双方都开了机关枪，互相射击了1小时之久，结果那条狗被打得稀烂。

一次是抚远中队所属下八岔小队的两名赫哲族的警察被两

名赫哲人杀死，夺去了枪支逃往了苏联。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联人在黑夜里跑到了江南来，据他自己说：是一个小学教员，因不满苏联的生活而逃跑的。后来经特务股把他送到了省警务厅，结果不明。

在我到抚远的前一年，也就是1942年端午节这天有苏联的一架飞机越过了黑龙江，在抚远的上空作低空飞行。当时抚远并没有防空武器，警察队和日本军一齐用步枪射击。由于这架飞机飞的过低，遂被击伤，不得已降落在抚远的简易机场上。机上的驾驶员跳下飞机奔向了正停在机场上的伪满班机，意欲驾着这架飞机逃回江北。可是这架班机尚未发动，不可能立即起飞，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取出了手枪自击头部当场殒命。这个事件，自然马上报告了省方，后来得到省的通知说：苏方已约定了日期前来接取尸体。到了约定的日子，省方也来了人并作了相当的戒备等候苏方的到来，可是苏方并没有来。后来只好把尸体埋葬在抚远的江滨。我曾看到过这个坟墓和竖在墓前的十字架。

在所谓“满”苏国境线上，特务的往来活动是经常的，特别是在冬季里，大江冰封，更是特务往来最活跃的时期。抚远特务机关里有一个姓刘的，他既通日语，又通俄语。他经常地拿着一些这边的报纸和情报之类过江，回来时也带回一些那边的报纸和情报之类的东西。而苏方也常有这种类型的人到这边来作同样的活动。

还有一个叫王寿山的人，他也是以开饭馆作掩护的一个特务，不过他是专门对在国境供职的中国人作监视工作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掠夺

抚远县地势低洼，大部份是涝湿地带，全县人口只有6 000

左右，耕地不到2万亩。对这样一个贫瘠的地方，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每年要从这里以所谓“粮谷出荷”夺走农产物1 200多吨。农民们的粮食不足，就只好吃鱼，特别是赫哲族几乎是把鱼作主食了。

这里的水产是极其丰富的。每年可出各种淡水鱼五六百万斤，海青鱼场每年要产大马哈鱼150万斤。这些鱼产全都由兴农合作社统一收购，运到内地作成罐头供军用。特别是大马哈鱼和名贵的鳇鱼，当地的人民是很难吃到的。

饶河县国境警察机构及其罪行

安林海

一、机　构

1932年，日寇成立了伪满洲国“警务局”，把它作为镇压中国人民、维护和巩固其在东北统治的反动工具。后来，警务局改属治安部警务局；其下分设省警务厅、县警务局。

1934年2月1日，日寇武装侵占饶河后，以维护县城治安为名，成立了公安队，不久又成立了警务局。在山区，日寇建立了9处自卫团。1939年6月，警务科改为饶河县国境警察本队。

饶河县国境警察队是以巩固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镇压中国人民为宗旨的。为了加强情报搜集，警察队特务系在机关、团体、学校和社会各行各业中物色和安插特务。他们对大烟犯、经济犯和生活困难的人进行威胁恫吓，或诱以金钱、鸦片等等，运用各种手段网罗大量特务，并且还以机关企业负责

人为主组成一个“防谍协会”。

饶河县日伪政权初建时，警务局只有两个警察署和一个警察大队，有警察二百多人。1935年，警务局下设5个警察署，人员增到600余人。1939年，饶河国境警察队下属5个中队（20个小队），警察人数增到近千人。1934年，饶河县人口为3.9万人，1939年下降到1.4万余人。两者对比，伪警察人员与老百姓的比例为1：14。这个庞大的国境警察机构，在维护日寇对中国人民的反动统治中，残酷镇压饶河人民的反抗，血腥屠杀抗日军民和无辜的平民百姓。

二、沿 革

1934年2月1日，日寇武装侵占饶河后，立即着手建立伪警察机构，成立了以原城区警察署长李相宸为首的，有二十多名队员的公安队，负责所谓的“维护县城治安”。这年2月中旬，成立了警务局，隶属于三江省警务厅，下设城区和东安镇两个警察署，由城区警察署长李相宸代警务局长，日本人畏元早苗和星九雄为正副指导官。警务局内设警务、庶务、司法、队务、特务等股。不久，任命龚金城为警务局长。

1934年3月，四合川警察署成立，警察署由被日寇收编的以邹其昌为主的八十多名山林队员组成。不久，因邹其昌率队抗日，这个警察署即被撤消。

1934年9月，日寇撤消了龚金城的警务局长职务，由三江省警务厅委派的马继奎（马星武）继任饶河县警务局长。同年，日寇在山区建立了9处自卫团，人数约230人。自卫团由苑增（苑福堂）统管。过了不久，日寇认为这些武装驻扎过于分散，调动不便，于是，在10月份解除了自卫团的武装。经过整顿，日寇将自卫团改编为饶河县警察大队，由苑增任大队长，张青山

任大队副，日本人町田为指导官，犬童为教官。饶河警察大队下设两个步兵中队，一个骑兵中队。第一中队长李树山，第二中队长赵家培，第三中队当时驻扎小佳河，中队长是龚金城。

1935年3月1日，伪县公署根据伪治安部的统一要求，改编了警察大队，设立了行政警察。当时设置的行政警察机构及其警察署长是：城区警察署，署长李相宸；小南河警察署，署长张青山；小佳河警察署，署长赵家培；小别拉炕警察署，署长龚金城；东安镇警察署，署长李××。警察大队改编后，苑增任警务局局副。另外，还专设了一个游动巡察班，苑增任班长，常设人员46名。在执行讨伐任务时，这个班还可随时增调人员。

1936年，小南河警察署被撤消，又先后成立了西林子警察署和三义警察署（1939年三义警察署改为饶河中队所属的三义小队）。西林子警察署长先后由张青山、田毅、高××担任，三义警察署长先后由辛华山、李风山担任。

1937年，警务局长马继奎被调走。孟庆善任局长，中野为指导官。

1938年，警务局改为警务科，由日本人粟田任科长，孟庆善改任科副。同年，撤消了小别拉炕警察署，建立了大别拉炕警察署。小别拉炕警察署改为警察小队，归大别拉炕警察署管辖。这一年，日寇为了增强武装警察力量，对付抗日武装，从海龙县和本溪治安队调来三百多人，成立了近四百人的警察大队，直属警务科领导。大队长姜佐洲，大队副王贵印。大队下设3个中队，第一中队长关品一，第二中队长刘贵武，第三中队长高鹏翥。同时，撤消了游击巡察班。1939年初，随着归并村屯计划的实施，这个警察大队人员被分派到各村屯建立了警察中队或小队。剩下的二十多名年龄大、体质弱的成立了一个预备队，也称游击班，由警务科副孟庆善直接领导，任务是巡查

江岸，发现情报直接报警务科特务股。

1939年6月，饶河县由三江省划归东安省管辖，警务科也随之改归东安省警务厅领导。同时，警务科改为饶河县国境警察本队，由日本人福岛保家任本队队长，孟庆善任队副，下属5个中队（20个小队），总人数近千人。同年秋，由高新华任本队队副。1941年，由周××任本队队副。

1940年以后，国境警察本队队长一职先后由日本人县长稻津一穗、新井清兼任，各中队长均由日本人担任。当时警察本队内设警务、警备、特务等股（历任特务股长均为日本人）。城区、西林子、大别拉炕3个警察署改为中队。小佳河警察署改为小队，归属西林子中队。1942年，小佳河小队改为小佳河中队。

1942年，成立了大穗（石场）中队。1944年10月，由宝清县调来五十多名森林警察，编为饶河县国境警备队，孟广林任队长，直属本队领导，同时撤消游击班。警备队任务：一是上山“讨伐”，二是负责上至大楞下至四排的沿江巡逻，防范抗联和苏联内派外遣。这时，全县伪警人员达到600余人。

1945年8月10日，苏联红军攻进饶河，日本侵略者纷纷逃窜，饶河县国境警察队随同日伪设置的各种机构一起土崩瓦解。

三、罪　行

（一）清剿抗日队伍，破坏反日组织，屠杀爱国群众

饶河县的伪警察机构，是日伪对饶河人民进行法西斯统治的罪恶工具。警察队与日伪军密切配合进山“讨伐”，有时还单独进山“讨伐”。仅据《满洲帝国地方事情》记载，在1934年至1936年不足3年的时间里，它配合日伪军进行的所谓“日满联合讨伐”就达49次。在每次“讨伐”中，警察队都起了重要作用，使我抗日队伍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如以苑增为首的警

察大队以及后来的机动巡察班，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专门与我抗联队伍为敌。1935年9月，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在新兴洞痛击日军守备队，击毙高木司令等四十多名日伪军。在我军即将全歼敌寇之际，苑增率一百五十多名伪警察，从后方抄袭四团，使四团遭受很大损失，副团长朴振宇和政治部主任李斗文等二十多名同志壮烈牺牲。1937年3月6日，我抗联七军一百五十多人，由军长陈荣久指挥，在小南河天津班阻击三百多人的日伪军警讨伐队，击毙日本参事官大穗久雄等三十多名日伪军。就在即将全歼敌人结束战斗的时候，又是大汉奸苑增率领一百多名警察抄袭七军的后路，使七军腹背受敌，撤退时军长陈荣久等7位同志壮烈牺牲。苑增的游击班，每年冬季都配合日伪军进山追剿我抗日武装。1937年冬，他配合日军守备队，去暴马顶子、关门嘴子一带"讨伐"，带回十几颗人头，有男有女，摆在小佳河警察队院内"示众"，并照了相，称这些人头是"匪首"的脑袋。1936年至1938年期间，苑增还和县警务科指导官小野带队5次去小佳河、关门嘴子一带"讨伐"，每次都抓回不少无辜的老百姓。

1938年，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饶河地区抗日斗争如火如荼。为了扑灭饶河地区的抗日烈火，日寇从佳木斯调来大量兵力进行联合"大讨伐"。日寇还从海龙县和本溪治安队调来三百多人，成立了近四百人的警察大队，直属警务科领导。这个警察大队主要是对付抗联，实行归并村屯，即所谓的"治标、治本"。1939年，随着归并村屯计划的实施，这个警察大队的人员全部分散到各村屯建立了警察中队或小队。

1940年冬，伪东安省警务厅组织5个县警察队四百多人联合"大讨伐"，在饶河山里追击围攻我抗联队伍3个月。1942年冬，伪东安省警务厅组织饶河、虎林、宝清3县警察三百多人去

大酱缸、大旗杆、马鞍山等地追剿我抗联三十多天。

1936年，饶河城乡人民群众，在饶河中心县委的领下，纷纷建立起“反日救国会”，积极配合抗联打击敌人。日伪统治者对此深为惊恐，组织了大批伪警对爱国群众进行搜捕。1936年5月，特务警察吴金华和日本指导官率领三十多名特务警察破坏了小北沟反日救国会，逮捕了反日会干部于时贵、吕世湖、倪福田和农民群众王旭臣、王开同等8人。当年9月，将于时贵、吕世湖和关门嘴子四道沟的冷志明一起秘密杀害。1938年，警察队特务韩××告密，逮捕了去饶河购买布匹等物资的抗联人员鲁昌富和农民高宝、周学先等4人。据周学先说，他在狱中3个月时间亲眼目睹有六十多名难友被敌人杀害。

伪饶河县国境警察还大肆捕杀爱国群众。1934年4月，日寇侵占饶河县还不足两个月，特务警察就以“反满抗日”的罪名秘密捕杀了二十多名群众。据不完全统计，自1934年至1938年的4年时间里，特务警察把200余名“可疑”或所谓“思想不良”的群众填入冰窟窿。1935年，特务警察王金城1年内就在饶河街里逮捕了反日会员夏裕敬、安庆溥等二十多人。

1939年9月，三十多名特务警察伪装成抗联催送粮食的人员，侦察出送粮的群众，逮捕了董义操、曲景发、李东聚、孙明阁等十多人。

1943年，东安省警务厅组织饶河、宝清、密山、鸡西、虎林等县的特务主任齐集饶河进行大搜捕，抓了近百名所谓“通苏”、“通匪”的老百姓，把他们转送到牡丹江监狱。这些人解放后只有少数回到饶河。

1944年秋，特务彭××告密，警察本队逮捕了大代河村救国会长张华学和农民张宝贵、姜忠山、刘安春等10人。经多次严刑逼讯后，送牡丹江监狱，9人死亡，只有张宝贵在东北光复

后回到本村。

（二）归屯并户，割断群众与游击队联系

1937年，根据伪民政部1934年发布的《集团部落建设》文告，伪饶河县公署下达了归并集团部落的命令，加紧实行“匪民分离”政策，限令在1年内，将山里散居的农民归到指定的集团部落里，企图割断人民群众同抗联的联系。这年冬季，日伪调集全县所有武装警察，协同日伪军开始清乡，归并集团部落。凶狠残忍的警察和日伪军见到房子就烧，将西风沟、十八垧地、大叶子沟、暖泉子、七里沁、暴马顶子、关门嘴子、大代河等沟约三千多户1万余人的居民赶出家门。老百姓携老带幼，四处奔逃。有的人死在警察和日伪军的枪口和刺刀下，有的被烧死在大火中，有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身亡。据关门嘴子老户翟明恭、赵殿文等人回忆，关门嘴子及岭西一带清沟时，日伪军一次就杀害了200余人。大代村老户薛连山、王福进说，日本鬼子清沟归屯子时，农民卢洪祥的妻子生孩子刚满月，没有搬迁，全家4口人，妻子被鬼子刺死，两个孩子冻死在雪地里。大叶子沟五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人，逃出活命的没有几个人。有一次，日本守备队和三义警察署长辛华山带着警察队，在关门嘴子后堵抓了十多个农民，说他们是抗日军的探子，命令警察把他们绑起来，赶进一栋房子里，然后点燃了房子。当时，有两个人从窗户跳出来，被鬼子开枪打死，其余的几名农民被活活烧死在房子里。1937年冬至1938年春，仅5个月的时间，全县约有三分之二的山区变成了无人区。

1937年至1938年，饶河县各地的老百姓在警察和日伪军的枪刺威逼下，归并到集团部落。当时，建立的集团部落有：三义、关门嘴子、小北沟、大代河、西南岔、石头窝子、小别拉炕、大别拉炕、西林子、小南河、四排、西通、三人班、小佳

河、蛤蚂河子等处。为了控制和镇压集团部落的老百姓，每一集团部落都设了警察机构。大村设中队，有警察三四十人；小村设小队，有警察二十人左右；最小的村也有七八个警察。老百姓在伪警察的残酷统治下，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同时，归屯并户，使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由于这种原因，到1939年，抗日游击队的生活给养已经难以得到保证。游击队自己种的玉米和蔬菜也几乎全被敌人破坏，战士们一两个月吃不到粮食，只有以野菜、野果充饥。归到集团部落的抗日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游击队传送情报和偷运粮食等物资。游击队为解决粮食，也付出了很大牺牲。如1939年冬，抗联七军军部警卫连连长吴应龙率领4名战士，在去挠力河北为部队解决粮食的归途中，遇到数百名搜索的敌人，吴应龙在掩护战士突围中壮烈牺牲。1940年冬，李亿松（李学福的侄儿）等3名队员，去小北沟联络点取粮，被小南河警察队发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这3名同志英勇牺牲。

（三）敲诈勒索，残酷奴役老百姓

警察队在为日伪催交"出荷粮"时，借机敲诈勒索百姓。警察是村中的"土皇上"，村民哪敢得罪，伪警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得送礼。否则，就要给你"穿小鞋"，找你的麻烦，有的还以抗缴"出荷"罪名加以逮捕。警察队还经常给"讨伐"队抓民伕，为修道抓劳工等。在县城的老百姓生活处境也不比农村强多少，特务、警察、日本宪兵到处横行，老百姓提心吊胆过着亡国奴生活。饶河三处城门都设有警察分队。出城的人与农村一样，必须携带证明书和出门证，否则不仅不准出城，而且还会被当作"坏人"抓起来坐牢。江边码头设有水上警察派出所，旅客乘船来往必须持有证件，接受警察和宪兵的盘查。渔民下江捕鱼，除有下江捕鱼证明外，还要到埠头警察派出所领取船旗插在船尾

上，归来时再将船旗交回派出所。冬天，江边设有流动哨，一般不准下江捕鱼，居民到江边挑水要有警察队发的上有火印专供挑水用的木牌。规定一户出了问题全组负责，也就是所谓的“十家连坐”。商业店铺是警察们敲诈勒索的主要对象，赊东西、借钱是经常的事。名为借或赊，实际是敲诈明要，店主只能忍气吞声让他们拿走。警察栾士信为了敲诈兰香春糕点铺，有一次买白糖故意找茬，硬说称的不够秤，不仅折断秤杆，而且将这个糕点铺的掌柜秦子良打得鼻青脸肿，并要抓起来治罪。秦子良无奈，只好求人送礼赔情，才算了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更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与掠夺。当时物资极度缺乏，市面冷落，商店倒闭，农民破产，饶河街里失业流浪者剧增。就在这一时期，饶河警察队趁机大抓“浮浪”（无业游民）100人，送往鸡西煤矿下井挖煤。这些被抓去的老百姓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总之，伪饶河县国境警察队在饶河这块土地上犯下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饶河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摘自《饶河文史资料》）

伪满“鸡宁国境警察队”简介

何崇阁

鸡西位于祖国东北边陲，南端约50公里即与苏联接壤。早在1931年9月18日前，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是密山县管辖内的一个农业地区和煤田。日寇侵占后就设立密山县警务局，后改警务科、哈达河警察署、滴道分驻所等。于1938年将分驻

所改为滴道警察署，内分警务、保安、司法、特务等4个系，同时成立鸡宁派出所，城子河分驻所、恒山分驻所，均属滴道警察署领导。

为了适应与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加强国境监视的需要，于1938年把警察机构改为国境警察队制度。滴道警察署改为滴道国境警察中队，鸡宁、城子河、黄泥河（现恒山区）分驻所改为警察小队。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大量掠夺鸡西地下的煤炭（伪满称之为"密山煤田"）和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满抗日爱国活动，以及为侵略苏联作好准备，在所谓"北边振兴"工作计划的名目欺骗下，于1941年9月1日从密山县境内分割而成立了鸡宁县。随着鸡宁县制的建立，设置了伪鸡宁国境警察队本队，是伪鸡宁县公署的组成部分。本队下设：特务、队务、警务、警防等4个股和警察警备队特别搜查班。它管辖鸡宁、滴道、平阳镇等3个国境警察中队，若干个警察小队和分队，共有警察750余名。1945年3月伪鸡宁国境警察本队，迁出伪鸡宁县公署，与鸡宁警察中队合并（地址在现红旗铁工厂处）改名为鸡宁国境警察队。撤销了原鸡宁中队，设立了直辖哈达岗、城子河、恒山等三个小队、滴道中队、平阳镇中队，还有4个直辖分队，即：梁家分队、新市街分队、东砂场分队、鸡冠山分队。鸡宁县国境警察队本身除设4个股外，还设有两个室：督察室、兵事室。

伪国境警察队是为对付苏联和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各种需要，要求警察机构能够起到军事行动的补助作用，实行军事性质的制度。其任务：在所谓"依法受执行警察业务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名目下（1）封锁国境，加强警戒，侦察、逮捕自苏联潜入的谍报人员，镇压鸡西煤田工人的反满抗日破坏及我抗日爱国的地下工作人员等。（2）各种情报的搜集，外国人

动向查察、劳动者动向查察，“要视查人”查察，国境地带居住、迁移、旅行管理、思想对策，侦察逮捕、特别搜查、特种营业管理等。(3) 对所谓刑事犯罪搜查、逮捕、审讯向法院起诉移交、保安、卫生监督、经济犯罪搜查检举等事项，此外还有防空监视、防空训练和奉公训练等项。

其罪恶活动是：

第一，把国境完全封锁起来。1937 年伪满洲国牡丹江省制定了“国境地带法”，规定在甲号地居住的年满 14 岁以上的男女国民都必须有“良民证明书”。因此，鸡宁国境警察本队，根据鸡西地理环境位于中苏国境接壤，把鸡西划为第一号国境地区，限制中国人民（当时叫满洲人）的自由行动。在警察本队特务股设有管理国境地带“居住证明书”。以便发现通苏及反满抗日的地工人员。伪满鸡宁县曾两次发放居住证明书，约为162 000余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60%至70%。中国人就是有了“良民证”如遇有外出探亲访友时，也必须经警察中队特务系批准，发给旅行证明，同时还必须按着旅行的目的地址、规定时间、经由路线旅行，否则除禁止旅行外并要拘留审查。

第二，大量发展使用密探，设立情报点。鸡宁国境警察队本队特务股下设特务系、居住证明书室、内、外分室，3 个中队还有 3 个特务系。各小队也均有专门做特务工作的职业特务，并且还大量的发展使用密探分子也叫特务腿子。本队特务股在鸡西街北河沿处对外称“兴亚寮”，有 8 名职业特务专门从事镇压反满抗日爱国活动，设有秘密监狱一处，专门拘禁所谓政治犯。在 1945 年 8 月东北解放，日寇溃退前夕，将监狱被拘押的爱国志士全部秘密杀害了。鸡宁国境警察中队从 1942 年 9 月至 1944 年 4 月，就在鸡西街内各种社会团体、组合、会社等各行业中设立情报网点 58 处。另外还有许多密探分子。1943 年为强化防谍

团体而成立了在警察队长领导下的由各社会团体、组合、会社以及各种行业负责人参加的所谓“土曜会”组织，并规定星期六集合在一起，汇报与研究各机关的防谍工作。还把鸡西等饭店、妓院、旅店及各种会社职工集合起来，在电影院收听无线电广播。施以对苏联的诽谤宣传，号召汉奸特务爪牙等检举通苏及反满抗日爱国的地下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密探，加强了特务活动，残害中国人民。

第三，镇压鸡西煤田（伪满称密山煤田）工人的反满抗日破坏活动及抗日爱国地下工作人员。警察中队在滴道煤矿、城子河煤矿、黄泥河子煤矿等处设立警察小队，每小队10人左右，重点调查工人反满抗日的思想动态及防止工人暴动逃跑等。在1943年9月鸡宁国境警察队特务系主任逮捕了由华北派来滴道煤矿进行活动的我地下工作者谢××，企图逆用，但谢某不甘为日寇效力，被特务股长将谢某诱至伪鸡宁县公署东边约3公里的地方秘密杀害。1943年5月在城子河“矫正院”拘押我被俘武装人员60名，因集体逃跑未果，被枪杀6名，被捕4名，其余下落不明。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对物质的掠夺极为重视，特别是掠夺鸡西的地下资源——煤炭，因而深感劳力不足，仅在1942年9月至1943年秋就在鸡宁街捕抓了575名中国人，所谓“浮浪”劳工，送往煤矿挖煤。在同一时期伪奉天省（现辽宁省）警务厅抓了150名中国人送往城子河煤矿强制劳动，为日寇掠夺生产煤炭。至祖国光复时，其中有部分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下丧生于九泉之下。

1945年8月，这个日伪爪牙组织机构才彻底瓦解。

（摘自《鸡西文史资料》第四辑）

日伪豢养的鹰犬——新选队

王志扬

1937年全国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根除进攻关内的“后顾之忧”（指东北抗日联军），根据《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对东北抗联和游击区进行了大“讨伐”。新选队（也称神仙队）是日本侵略者在施展“治安肃正”计划时，以“讨伐”长白山地区的抗日联军为目的，在今延边安图等四县成立的。

安图县（指老安图县）新选队是于1938年7月初，由伪安图县警务科派遣警防股长朴好吉（警佐）负责筹建。招募对象是那些枪法准的打围“炮手”和身强力壮、山路熟的旧军人。筹备结束后，1938年7月中旬，在安图县安图村兴隆河正式成立了新选队。成立初，全队仅17名队员，蔡凤林（曾在兴隆河任武装自卫团团长、保长等职务）为第一任队长，辛德胜为副队长，金斗益为参谋长。1938年11月以后，李昌朝接第二任队长。

1938年8月和9月，抗联在大沙河和寒葱沟打响的战斗，给长白山地区日伪“讨伐队”以致命打击。日伪军为加强对东北抗联的“讨伐”，1939年11月，伪安图县警务科又派朴好吉，在万宝村十骑街扩编了四十多名新选队队员，李道日（曾在十骑街任武装自卫团团长）为队长，张洪星为参谋长。并把原在兴隆河组建的新选队编为安图县新选队第一队；在十骑街新编的新选队为第二队。新选队组建时，其成员都是朝鲜族，后在扩编时吸收了一些汉族。安图县新选队队员最多时，达九十多人。

该队始终受伪安图县警务科的领导，组织名称从1938年7月至1939年称为新选队，1940年以后改称片田部队。

1939年秋至1940年冬，日伪动员间岛省各县和桦甸、通化等地三千多名日伪军警以及新选队，对抗日联军活动的游击区实行经济封锁，进行“篦梳搜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东北抗联决定停止大部队活动，退到苏联境内进行整训。根据决定，从1940年冬开始抗联部队陆续向苏联境内转移。在安图县境内，与总部失去联系，孤军作战的马德全指挥的二军六师九团三连的部分指战员相继向敌人投降了。敌人认为已经达到“治安肃正”目的，于1941年5月，解散了新选队。新选队存在历史自1938年7月至1941年5月，共有2年10个月。

新选队存在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它的历史是充满罪恶的，是一部在日本侵略者的指挥下，打着“治安肃正”的旗号，“讨伐”长白山地区抗日武装，屠杀抗日战士和无辜老百姓的罪恶史。新选队进行“讨伐”活动的主要地点是，在安图县境内的兴隆、二道白河、头道沟、汉阳沟、小荒沟、大荒沟、寒葱沟、西北岔等地。据档案资料统计，新选队“讨伐”活动，共15起，被杀害的抗联战士和老百姓，共36人，被捕的抗联战士和老百姓，共17人。他们的“讨伐”活动，大体上可划为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1938年7月至1939年11月，从新选队成立到扩编队伍（建新选队第二队）之前为“讨伐”活动的初期阶段。在初期阶段主要是在安图村和两江口村一带进行“讨伐”活动。先后出动共7起，被杀害的联抗战士14人，被捕的10人。

1938年7月15日，伪安图县警务科听到密侦王福有在兴隆河南山发现抗联小部队活动的情报后，派警务科警防股长朴好吉，由蔡凤林率领17名新选队员，在两名宪兵的配合下，由王

福有带路，进密林搜剿抗联部队。在交战中新选队枪杀了抗联战士1名，夺走长、短枪各1支。参谋长金斗益将抗联战士尸体头颅割下来，让王福有背回警务科，交其主子邀功请赏。

1938年10月初，根据密侦王福有的情报，警务科派警尉王汉民，由蔡凤林率领的17名新选队队员，到兴隆河东南大合顶子进行"讨伐"，杀害抗联战士1名。

1938年12月20日，新选队第二任队长李昌朝带领全体队员，在去长白山西河子一带，偷袭了抗联宿营地。抗联小分队因没有准备，在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突围，使抗联部队遭到较大损失。被杀害的抗联战士4人，受伤被俘的10人。

1939年2月，新选队员在警务科警尉王汉民等4人的指挥下，在长白山西河子一带进行搜山，途中与抗联小分队交战，在抗联部队突围时，新选队枪杀了4人，夺走了2支大枪。极其凶恶的参谋长金斗益，把死难者的耳朵一个个割下来串到刺刀上，带回去向主子显示"讨伐"抗联有功。

1939年5月初，由伪警务科警尉王汉民直接指挥，李昌朝和辛德胜率领的20名新选队员，窜到二道白河地区搜山，在三合水发现抗联宿营地，在双方交战时，王汉民用机枪扫射打死抗联战士2人，夺走大枪2支。

1939年7月20日，李昌朝和金斗益率领的20名新选队员，在伪警务科警察刘洪有的配合下，在头道沟搜山中，枪杀抗联战士1名，夺走长枪1支。

1939年9月13日，队长李昌朝和参谋长金斗益率领的新选队员26人，在伪警务科卢胜日等16名警察的配合下，在两江口一带搜山时，在汉阳沟龙山杀害抗联战士1人，夺走手枪1支。

1939年11月末至1939年12月末，从新选队扩编两个队分兵"讨伐"，到两个队联合"讨伐"之前，为"讨伐"活动中期

阶段。此间新选队“讨伐”活动，主要是在两江口一带进行。这一阶段“讨伐”活动共两起，被杀害的抗联战士10人，被捕的5人。

1939年11月末，新选队第二队40余名，在队长李道日、参谋长张洪星的带领下，去两江口、露水河一带搜山，发现抗联窝棚，用枪乱扫射、杀害抗联战士1人。

1939年12月24日，李昌朝带领的新选队第一队40余名，在伪警察蔡永春的配合下，在两江口西岔河一带搜山时，发现雪地上足迹，一直跟踪至抗联窝棚，进行包围偷袭，杀害抗联战士9人，受伤被捕5人。

1939年12月末至1941年5月，从新选队一、二队联合“讨伐”到新选队解散止，为“讨伐”活动晚期阶段。在这一段“讨伐”活动，主要是在小荒沟、大荒沟、寒葱沟、西北岔和长白山一带进行。“讨伐”活动共6起，杀害抗联战士和老百姓12人，被捕老百姓2人。

1940年5月初，新选队一、二队在小荒沟联合“讨伐”时，发现抗联窝棚，用枪猛射，杀害抗联战士2名，并逮捕给抗联部队送粮的两名老百姓。

1940年5月10日，新选队一、二队在李昌朝和李道日的带领下，在去大荒沟“讨伐”途中，杀害抗联战士1名，夺走手枪1支。新选队在清理战场时，参谋长金斗益惨无人道，竟把死难者的耳朵割下来挂到电线杆上。

1940年5月中旬，1名警佐（名字不详）指挥新选队一、二队，在寒葱沟搜山时，发现种鸦片的老百姓3名，将他们枪杀。下山以后假报消灭抗联战士3名。

1940年11月初，新选队一、二队在去长白山一带搜山，发现抗联窝棚，四面包围，俘虏抗联战士3名（其中2名是苏联

人），在解往县城途中被惨杀。

1940年12月5日，新选队一、二队在队长李昌朝和李道日率领下，在去长白山一带搜山当中，杀害抗联战士2名，夺走大枪2支。

1941年2月初，新选队一、二队在安图县西北岔“讨伐”时，发现抗联部队行踪，李道日指挥部分队员跟踪追击，追上抗联战士1名，乱枪杀害，夺走大枪1支。

上述的血淋淋15起“讨伐”罪恶，仅仅是有据可查，铁证如山的部分事实，还有很多罪恶事实暂时无法考证。由于新选队“讨伐有功”，被日伪当局授予集体“勋八位”勋章。

解放后，原参与新选队进行“讨伐”活动的反革命分子，除个别病死和逃亡国外者外，其他人都陆续被人民政府捉拿归案。沾满革命先烈鲜血的刽子手，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严厉惩处。

（摘自《安图文史资料》第四辑）

石城岛事件
——肖忠田枪毙日本警长和伪警察署长

庄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伪康德3年（1936年）农历六月初五（公历7月22日），在石城岛与庄河之间的海面上，发生了一起声震东北的事件，这就是肖忠田枪毙日寇福田、滨田和伪庄河警察署长王子康等人的事件。

肖忠田，字顺武，庄河县三区（即现在的明阳镇）康宁村（现刘店村）前姚屯人。1905年生。因家境较贫，只读了4年书，18岁时，随其在马庙学校当校长的舅父在该校当了校役。25岁时，当上了民国时期的警兵，伪满时期，被继续留任。1934年，当上了警尉补，任庄河县石城岛分驻所副所长。

肖任副所长时，该所的所长为隋连元，庄河警察署署长为王子康。隋、王二人，民国初年曾一起在城子疃当过巡捕，当时他俩为争夺小老婆产生矛盾，结下了私仇，王子康由于未争到小老婆，对隋怀恨在心。1934年7月，庄河警察署得到了石城岛分所私藏一支二八匣枪的情报，王子康如获至宝，认为报复的时机已到，立即报告了县参事官，并将隋连元调到县里拘留起来，进行审讯。可是，这支二八匣枪，是伪石城岛村长杨忠堂直接给肖忠田的，隋对此事不知详情，所以在审讯时拒不承认。后来，隋的小老婆，从分驻所内了解事实真相并捎信告知了隋，因此，再审时，隋连元便供出了肖忠田私自收藏二八匣枪的真实情况。这样，伪庄河县参事官吉川正登，便率领伪庄河警察署长王子康、日系司法警长福田、司法警士滨田、特务警士四川和王子康的上差李亭春一伙，于农历六月初（公历7月下旬）前往石城岛查讯此事。王子康原是庄河县日本领事馆刑事，无恶不作，是日寇的一条忠实走狗，他想借此事捞取晋升的资本，便大肆威胁肖忠田："你私藏枪枝，隋所长已经讲了，民众也有检举，如不据实交待，就交给日本人审讯你！"肖忠田对此虽未表示什么，但心里却思考着对策。

日本人吉川正登参事官和特务警士四川，先离开了石城岛，回到了庄河。7月22日（农历六月初五），王子康、福田、滨田一伙，还有赴石城岛种牛痘的伊藤药店的主人，也要离岛返庄。临行前，王子康强令肖忠田随他们一起到庄河与隋连元对质。肖无

奈只好回家安排了一下，并将“二八”净面匣子枪藏在小包里，便同王子康等一起在断头船坞上了船，隋连元的小老婆也随船同行。

这天，云雾弥漫，下着毛毛细雨，王子康、福田、滨田躲进了船仓的后大铺里，王子康的上差李亭春在外面了望，肖忠田、隋连元的小老婆和几个水手及散客也在舱外。船主王在豪、船夫王清连，驾驶着船只向庄河方向不停地划驶。肖忠田坐在船上，内心却象海水一样的不平静。当船只划到半路时，肖忠田见舱内的王子康、福田、滨田等都昏头僵脑地躺在铺上，便灵机一动，迅速地将船舱的锁口板用串条锁上，接着，一枪结束了在舱外了望的王子康的上差李亭春的性命，然后，连续用匣枪向舱内大铺猛烈射击。隋连元的小老婆要想拦阻，被肖忠田回手一枪打死。王子康等开始从舱里向外打了几枪，不会儿，就无声无息了。船主王在豪和几个水手、散客在肖忠田向舱内射击时，吓得都跳了海，被海水淹死，船夫王清连(绰号王小辫)跳下水藏在舵旁。肖忠田见王子康、福田、滨田等已死，认为大患已除，松了一口气，但，环顾四周，船上只剩他只身一人了，正在心神不安，考虑着自己处境时，突然发现船尾附近水面漂着一支辫子，他仔细察看，知道是船夫王清连，就扯着辫子把他拽上了船，并安慰他：“不要害怕，我绝不能打你，如果把你打死，谁为我开船！”这样，王清连在肖忠田的指使下，将船又开回了石城岛船坞。时已更深夜静。他让王清连在船上等他，自己先到分驻所，叫开门进去后，将墙上挂的步枪枪栓都卸下，收缴了警察的手枪，然后对7名警察说：“王子康和日本人都叫我杀了，你们也好不了，愿意跟我走的一起走……”警察没有武器，慑于肖忠田的威胁，连忙言不由衷地说：“我们跟你走！”肖忠田说：“好，我回家一趟，回来再找你们一起离岛。”肖忠田急忙回到潘屯，迈进自己家门后，即催令妻子收

拾东西，把刚生下不几天的婴儿送给了邻居，自己领着老婆孩子离开了家。当他来到分驻所时，7 个警察早已逃匿，他领老婆孩子便急忙赶到船坞，到船坞后，船夫王清连也无踪影了，无奈，只好另寻他船。结果，在三家子找到韩家的一只小船坐着离开石城岛，第二天，在高阳张虾网一带下了船，藏在山上树林里。

肖忠田枪毙日本人和伪警察署长这一事件，很快传到了庄河，庄河警署在关东州沿岸开始大检举。7 月 24 日，"满洲国海边警察队警备船海龙以下一只，在向大连航行中，于午前10 时顷，依无线电知事件之发生，当即上陆石城岛，编成陆战队"，对石城岛进行搜查。后依石城岛分驻所警士董连镳、佣人吕有长两人之供述，曾在派出所前海岸发现肖，并向庄河方向引渡，于是警备船又向大连航行。

当时，全县青壮年都被赶到山上，拉大网缉捕肖忠田，昼夜不准回家，肖忠田的亲属，被明阳警察署抓去进行了酷刑折磨。7 月 25 日，肖忠田带领老婆孩子潜伏于庄河县第八区郑下后岗张茔大树林里，忽被满洲国警备队的讨伐队侦明，并于午后 3 时将肖忠田包围于潜伏地。在这危急时刻，他已料到自己无法脱身，但他决心已定，誓死不作日本人的俘虏，坚持与讨伐队进行周旋，开枪射击。终因单人独马，力不抵众，肖忠田毅然决然地开枪先打死了老婆和孩子，撕毁了身上带的伪币和衣物，然后将枪口对准自己自杀了。

肖忠田在石城岛与庄河之间的海面上，枪毙了日本人和伪警察署长后，当时的《盛京时报》在康德 3 年（1936 年）7 月 26 日，以"庄河警察署长等12 人被一警士谋杀"为题，刊登了这一事件；《泰东日报》也相继发表了消息。这一"石城岛事件"，在伪满时期震惊了东北，影响很大。

（摘自《庄河文史资料》第二辑）

四

伪满宪兵、特务

鞍山日本宪兵队

鞍山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日本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设置在东北各政治、军事、经济要地的特务组织；是对中国人民施行法西斯统治，进行血腥镇压的机构；是对其管辖境内的保安局、警察局、铁路警护队、警务统治委员会等及其所属特务组织的"太上皇"。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宪兵司令部即配属宪兵于"满洲派遣军"中。1906年成立了"关东宪兵队"，隶属日本宪兵司令部领导。1931年9月21日，关东宪兵队升格为"关东宪兵司令部"。下辖旅顺、奉天（沈阳）、长春、安东（丹东）4个宪兵队。不久在大连、辽阳、公主岭等地成立了宪兵分队。鞍山、抚顺、本溪、铁岭等地成立了宪兵分遣队。

鞍山宪兵分遣队，是鞍山地区的日本特务组织中历史最长，组织最大，活动最为猖獗的主要特务机关。为了适应形势，加强对我国人民统治的需要，而先后进行了3次改组和扩大。1936年4月设立奉天宪兵队鞍山分遣队。同年升格为鞍山宪兵分队。1939年4月又降格为鞍山宪兵分遣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美机B29轰炸鞍山。社会秩序动荡，敌伪统治不稳，根据当时形势，又升格为"鞍山宪兵队"，下辖鞍山、营口、本溪、安东等宪兵分队及辽阳、海城宪兵分遣队。鞍山宪兵队本部设有：战务课、警务课、经济课、自行车队、鞍山昭和制钢所宪兵诘所、鞍山车站宪兵诘所。

战务课，是宪兵队组织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课。课内分

“国民党系统”（重庆系统）、八路军系统（延安系统）、社会一般阶层系统、机关、团体、宗教系统、厂矿系统等。特高科也划在战务课内。其中有一部分人负责特事工作。除这几个系统外，下设内勤、外勤两个系。内勤系下设取调（预审、传讯）和邮检（检查信件、邮包）两个班。外勤系根据地区划分，下设市、郊区，立山和千山，刘二堡和腾鳌堡，昭和制钢所四个班。战务课的任务，对外搜集防范敌对国家的谍报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的有关工作，对内搜集社会思想动态和在伪军中的所谓“反满抗日分子”、“战时危险分子”的情报和有关方面的工作。警务课的任务，督查军风纪、总理军事、刑事案件工作。经理课的任务是管理庶务、财务、人事、医务等有关工作。

鞍山日本宪兵队，豢养了大批特务，大量雇用宪补（中国人）、宪兵补（朝鲜人）、翻译、“嘱托”等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此外，还雇用大批爪牙和狗腿子，其中有的由宪兵队直接采用，这样的人地位高，每月发给活动费，并给证件。联络员（腿子）是宪兵、宪补个人采用的没证件。活动时利用主人名片上写“×××系本人联络员，希军警及机关人员多加关照”字样。他们没有工资，主要靠通融贿赂、敲诈勒索为其生活来源。凡是中国人当宪补的，都编在特高科，其他课都是日本宪兵。翻译都编在庶务系里，如审讯案件需要翻译时，可临时调配。宪补是直线领导联络员，密侦与联络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翻译很少使用联络员。为严密执行“谍报防卫”任务，把这些人分布在各个角落，广泛组成了情报网和活动据点，在昭和制钢所内（即今鞍钢）建立公开盘查工人的宪兵分驻机构的宪兵诘所，采取各种手段，疯狂镇压工人运动。还在弓长岭，大孤山、樱桃园等矿山，以及铁路、车站、码头、机关、学校、后天道、家理教、千山佛道教会和社会各复杂场所，安插密侦和联络员。

并设有“六四部队”（日寇抓劳工的组织代号），及“八六部队”（专事探测可疑电波的特种组织），派邮检班宪兵常驻保安局、邮局、电话局内，从事信件和邮包检查与偷听电话、刺探我东北抗联的军事活动、地工组织、政治经济等各种情报。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鞍山地区（包括辽阳、海城）活动过的特务达291人，其中日本籍117人，朝鲜籍3人，中国籍171人，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每个宪兵，宪兵补及宪补所领导的联络员，少则五名，多则二三十名。

他们使用的特务手段极其阴险毒辣，使用的特务方法极其隐蔽狡猾。首先是凭借宪兵队与犯人之间特有的震慑能量，采用先拉出来，再打进去的方法，抓住其弱点进行收买利诱。如在某些要案中，选择无关紧要人物做假释放（暗地保持监视），用给金钱或物资，找职业，谋生活出路等手段，收买他当腿子。让他仍和原案中的人接触，保持联系，从中做密侦工作，再秘密向其主子汇报。主子根据情况作新的布置，直到一网打尽。再如抓到“贩毒犯”，为了收买，捕后不关押，不判刑，同时还支持他继续贩卖大烟，并为其提供货源，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利用犯者无限感激的心情，使其在收买后，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甘当腿子尽忠效力。再如利用“特业”，包括大烟馆、妓馆、旅馆、饭馆、澡塘子、影剧院等人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特务活动的重要场所。旧社会特业经营者，本人若有权有势，他人不敢刁难。否则必须依靠权势做后台、顶门棍方能维持。宪兵就是当时地方上有权势的了，因此宪兵要求特业者给以职业上的掩护，那是特业者一呼百诺，求之不得的事，利用特业本身容易搜集各种情报及思想言论为宪兵效劳。如此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不知多少中华儿女、爱国志士，在“反满抗日分子”、“战时危险分子”的罪名下被屠杀，多少无辜百姓，在“国事

犯”、“思想犯”、“经济犯”的罪名下，被逮捕送进“思想矫正辅导院”，沉重劳役，不堪其苦，折磨致死后扔进万人坑。

1944年9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所谓“大东亚圣战完遂”，意为“扩大的侵略战争最后胜利”，在鞍山宪兵分队的基础上，改组扩大为“鞍山宪兵分团”隶属奉天第一宪兵团。1945年光复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变本加厉地对中国人民施以高压手段，又在鞍山宪兵分团的基础上，扩大为“鞍山第十四宪兵团”。刚刚成立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无条件投降了。

（摘自《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的罪恶活动

张涉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镇压矿工中的反满抗日活动，1943年11月，由锦州日本宪兵队派遣，建立了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也叫分遣队）。该队由锦州日本宪兵队本部直接领导，到1945年4月撤离北票，并入阜新宪兵分队。

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有队长1人，为上士山本正夫；副队长1人，为中士浦本俊夫；有日籍宪兵准士山口××、太田××、××义藤、××齐藤等，并先后用翻译6名，特务、密探、“狗腿子”三十多名，杂役1人。初期所用翻译为胡庆余、刘仁亮、吕宝兴、吕宝善、张××、曹忠山。翻译有明确分工：曹忠山负责外勤；刘仁亮负责内勤、文件翻译和审讯时口头翻译；胡

庆余、吕宝兴、吕宝善每天分别到北票邮政局、电报局负责检查和翻译信件、电报。派遣队设在冠山采炭所第一公馆。

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主要在北票炭矿活动，与北票邮政局、电报局、炭矿劳务系、警务系、吐默特中旗旗公署警务科、火车站、协和会等均有联系，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情报汇集网。其主要任务是：在炭矿工人中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和破获八路军的活动（宪兵队办公室内挂有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图）；侦察矿工中的反满抗日分子；监视"特殊工人"的异常动向，以及所谓的各种犯罪行为。宪兵队内设有审讯室和各种刑具。

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成立的两年间，广大矿工身受其害，有的被拘捕、审讯、严刑拷打，致伤致残，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投入监狱，被残害者无法统计。

宪兵队搜集情报和镇压矿工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在各部门设立秘密工作人员。这些人员经常出没在工村、独身寮、警察派出所、劳务系分所、包工大柜，了解工人的思想情况。利用各单位的日本籍工作人员，掌握中国工作人员的思想动向，凡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重点对象，用卡片登记立案。

二、每天派固定人员到邮政局、电报局检查来往信件和电报。开始去的是翻译胡庆余，后来是吕宝兴。通常是一名翻译和两名宪兵一同去。检查的重点是唐山和华北地区的来往信件和电报。每天要检查10件到20件，由翻译将信件内容用书面译出或口头翻译，交给日本宪兵，认为可疑的信件、电报即收起登记。当时引起宪兵注意的人有炭矿的雇员陈宽修（燕京大学毕业），小学教员龚瑾（女）、工人于××、李××等，这是一个时期列为重点检查的人物。

三、利用犯人和被捕人员做反间工作。经特务张福民证实：

"我是1944年被释放出狱，由锦州宪兵队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长山本正夫，将我带到北票做反间工作的"。山本正夫托北票协和会事务长山本若太郎，将张福民介绍到北票炭矿株式会社劳务科当雇员，月薪110元。名义上是在劳务课工作，实际上是宪兵队派到劳务课的特务。他积极效忠日本侵略者，曾调查过采用系雇员陈宽修、劳务课雇员王义生、阎桐瑞等3人的情况，认为他们思想可疑，写报告给山本正夫。因此，这3人都被审讯和遭迫害。

四、检查事故。每当炭矿发生事故时，警务系就及时向宪兵队报告。宪兵队就前往出事故地点进行调查，并对有关人员审讯，每次都有很多人遭到毒打，逼他们供认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搞的破坏，有的人因此被投进监狱。

五、宪兵队和炭矿的警务系、劳务系、协和会与当地伪政权、车站、邮电局等有秘密联系。这些部门经常将可疑人员向宪兵队报告。宪兵队长山本正夫经常到旗长沁布多尔济、街长马连登家密商和了解情况，有时他也装成协和会员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思想的动向，以及交出荷粮的情况。

六、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到工村、旅店，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可疑人员。每次都拘捕很多人，一些无辜群众遭受严刑拷打，有的被逼自杀，造成家破人亡。

1943年底，根据情报，宪兵队翻译刘仁亮指使其狗腿子李××、曹××拿着他的名片，到北票十八奤村杜清林家搜出5支大枪，并将杜押送到伪警察署，后送到阜新被处死。杜妻被逼受惊吓得病，不久而亡。

1944年入冬，刘德臣被定为反满抗日分子被抓到宪兵队。宪兵队副队长浦本和翻译吕宝兴对刘审讯，刘不招认又受电刑，最后还把刘的衣服扒光，向他身上泼水，推出门外站着"冻冰

棒”，以致终身残废。

宪兵队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嫌疑分子的迫害更为残酷。台吉采炭所工人刘喜孔，就是以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抓到宪兵队的。特务和狗腿子对刘轮番吊打审问、过电，最后将刘押送到锦州日本宪兵队，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因而受到表彰和奖励。北票街内“双兴铁匠炉”的几个工人，被宪兵队以私通八路军的罪名，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投进监狱。

对暴动逃跑而被宪兵队抓回的一些“特殊工人”，十有九个被打死，有的被判刑入狱，成为死囚。更可恶的是那些宪兵队的翻译、特务、狗腿子，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豢养和怂恿下，狗仗人势，对人民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解放后虽有的被处死、判刑，尚不能解人民心头之恨！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

伪满孙吴宪兵队

王登明

一、历史沿革

日本宪兵队是日本侵略者对被奴役的中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权力机构与指挥机关。自1931年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成立后，统辖伪满各地所有的宪兵队（本部）、分队、分遣队（或派遣队），并从日本、朝鲜增调一批宪兵加强沈阳、长春、哈尔滨宪兵队。1933年成立承德宪兵队，1934年日寇为实行所谓“治安肃正”，继续从日本增设大批宪兵，配置于各地宪兵队和

日军"讨伐队"内，向我抗联活动根据地疯狂进攻。日寇为了镇压抗联和其他爱国活动，加强了各宪兵管辖区域，大量地增设宪兵队本部，自1936年至1938年曾先后设立了大连、牡丹江、安东、佳木斯、海拉尔等宪兵队。孙吴宪兵队就是在这个期间"应运"而生的。

孙吴宪兵队成立于1937年8月，队本部设在孙吴。由日军中佐和昌田雄首任队长，日军少尉内海米十郎任课长，日军中尉田附常邻任副官。日军中佐辛川加寿夫、谷川岩吉、松永亲弘先后接任队长。孙吴宪兵队直接受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统辖。其任务主要是侦察苏联情报人员，镇压抗日联军和其他抗日活动。孙吴宪兵队本部的名称及其管辖范围几经变化，成立当时辖孙吴、北安、黑河3个宪兵分队及绥化、奇克分遣队、瑷珲分驻所。1938年本部迁至北安，改称"北安宪兵队"，孙吴宪兵队本部缩为孙吴宪兵分队，受北安宪兵队管辖。同时，在孙吴县之霍尔漠津设胜武屯分遣队，将瑷珲宪兵分驻所扩大为宪兵分遣队。1939年设龙镇、神武屯、嫩江宪兵分遣队，撤销胜武屯分遣队。1941年4月设泰安宪兵分驻所，是年7月，本部再次迁往孙吴，又改称孙吴宪兵队。1942年4月撤销泰安宪兵分驻所，是年8月，嫩江宪兵分队编入孙吴宪兵队。1943年4月设纳金口子宪兵派遣队。1944年6月，在瑷珲县源利金厂设立源利派遣队，嫩江分队缩编为分遣队，绥化、龙镇、奇克、瑷珲、神武屯分遣队变为派遣队。1945年3月各派遣队撤销，7月15日撤销孙吴宪兵队，将孙吴宪兵队本部及下设的分队、派遣队分别编入哈尔滨、齐齐哈尔宪兵队。

孙吴宪兵队的组织演变按年代排列如下：

1937年8月：孙吴宪兵本部辖克山分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孙吴分队、黑河分队、黑河分队瑷珲分驻

所。

1938 年：北安宪兵队本部直辖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孙吴分队神武屯分遣队、黑河分队、黑河分队瑷珲分遣队。

1939 年 8 月：北安宪兵队本部、直辖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黑河分队、黑河分队瑷珲分遣队、黑河分队神武屯分遣队、本部直辖嫩江分遣队。

1940 年 8 月：北安宪兵队本部直辖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瑷珲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神武屯分遣队、黑河分队。

1941 年：孙吴宪兵队本部辖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北安分队泰安分驻所、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瑷珲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神武屯分遣队、黑河分队。

1942 年：孙吴宪兵队本部辖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黑河分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神武屯分遣队、嫩江分队。

1943 年 8 月：孙吴宪兵队本部辖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分遣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瑷珲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神武屯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纳金口子派遣队、黑河分队、嫩江分队。

1944 年 1 月：孙吴宪兵队本部辖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分遣队、北安分队龙镇分遣队、孙吴分队、孙吴分队奇克派遣队、黑河分队、黑河分队瑷珲分遣队、黑河分队神武屯派遣队、山神府分队、山神府分队嫩江分遣队、山神府分队、纳金口子

派遣队、山神府分队源利派遣队。

1945年3月：撤销源利神武屯、龙镇派遣队，同年6月1日撤销纳金口子派遣队，同年8月撤销孙吴宪兵队本部，同时撤销黑河、山神府分队、奇克派遣队、北安分队、北安分队绥化派遣队、孙吴分队、孙吴分队瑷珲派遣队，划归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嫩江分队划归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

二、机构和职责

孙吴日本宪兵队：内部设有队长室、副官室、庶务室、经理室、特高课、警务室、特高工作班、厩舍、车库等。

队长根据新京关东宪兵司令官的命令，领导本部及所管辖的分队工作，将本部及分队、分遣队情况综合汇报新京司令部。

副官根据本部队长指令，领导庶务室、经理室和医务室的工作。

庶务室根据本部副官的指示直接掌握本部及各分队的人事调动，马匹、车辆分配，内外文件发送，队员考勤，武器保管及各种队务工作。

经理室掌握全队所管辖内的财经工作，并以副官指令发放本部及各分队宪兵的工资、被服、管理备品和队员的福利工作。

医务室分军医与兽医两部分，军医根据孙吴陆军医院的指令，按期在宪兵内作身体检查，预防注射等工作；兽医根据孙吴第四军管区兽医部的指示，保护孙吴宪兵队所管辖的各分队的军马。

特高课长兼任警务课长，他站在特高课长的地位，根据本部队长指令，领导特高课宪兵，进行谍报工作，并经常给各分队的特高室主任指出重点工作方向和工作办法，站在警务课长地位，管辖各分队的警务工作，并负维持各地区驻军的军风纪，

保护军用物资等责。孙吴宪兵队的特高工作班，即是本部里的外勤便衣特务，特高工作班在本部特高课长和特高主任直接领导下，专对各分队发现的外国间谍进行审讯、利诱、逆用等工作。

宪兵分队：各分队设队长一名，一般以尉级军官充当。下设特高班、警务班、庶务班。特高工作班是本分队管辖区域内穿着便衣的外勤特务，是专门寻找、搜捕所谓反满抗日人员的秘密组织。警务班专负军事警察任务，保护军用物资和军事工程，维护各地军警的军风纪等。必要时也武装出动，参加“围剿”抗日联军及搜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由于黑河宪兵分队比较重要，1937 年以陆军少佐泷山三郎充任队长，并设有科学室和邮检班。邮检班即是宪兵分队派下士官数名常驻保安局邮检班和电话局内，专门从事检查信件和偷听电话等等。

分遣队（或派遣队）：均设队长，下设 特高系、警务系、战务系、庶务系，其各系职责大体与分队相同。

宪兵诘所：伪满孙吴宪兵队曾在黑河火车站、孙吴火车站、黑河江边设 3 个宪兵诘所。其任务一是为了维持日军上下车的秩序；二是对上下车的中国旅客进行检查，尤其对旅行证明和居住证明的检查十分严格，从中发现苏联情报员及抗日地下工作者。

宪兵诘所还派“密算查证”宪兵（伍长）跟随火车检查每名旅客证件。当时每天10 点钟，由黑河站发往哈尔滨的304 次列车上，都有 1 名宪兵伍长到列车上领导铁路警察工作，他们专门检查中国乘客证件，核对每个证件的暗号与密码是否相符。到达北安后，向宪兵队汇报途中工作，翌日晨8 时乘303 次返回黑河时，对本次列车乘客再行检查。黑河江边诘所是临时性诘所，其主要任务是对来往的轮船、帆船、木排上的人员进行检查。船

只到达黑河港岸时，宪兵一定到江边查证。船只开发时，宪兵要按时到达江边给乘客证明书签字。它的目的与火车站诘所相同，借此限制国境地带居民活动，防止“坏人”潜入，搜捕抗日人士及镇压抗日爱国活动。

宪兵：即是日本的军事警察，经宪兵教事队训练6个月，出校后任宪兵职责，他们皆有较丰富的军事警察知识，负有维持军队的军风纪、保护军事行动的机密防谍工作。

宪补：是宪兵的补助者，本身没有司法权，一切都是辅助性工作，待遇上比宪兵低得多。但是在宪兵队特高组织里，特务外勤工作方面，仍然站在最重要地位，担负很大责任。

日本宪兵队所以要采用宪补，原因在于他依靠密侦进行工作，而密侦是中国人。日本宪兵直接对中国人密侦，不明白语言，不便其工作，于是他们采取招考宪补的办法，挑选那些通晓日语和日本人风俗习惯的人，入宪兵学校学习特务工作3个月后，辅助宪兵工作。为了特殊需要，日本宪兵队不但采用中国人宪补，还采用白俄宪补与蒙古族宪补。此外，还在朝鲜人中招考宪兵补。因为敌伪时期，朝鲜人地位在中国人之上，所以叫宪兵补，同宪兵一样分为几等宪兵补。

密侦：是宪兵队利用威逼恫吓，金钱利诱等手段收买的外围工作人员，有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也有中国籍的苏联人。他们专为日本宪兵提供情报，是日本宪兵的腿子和耳目。

日本宪兵在伪黑河省发展密侦可以说不遗余力，使密侦充斥伪黑河各地机关、学校、会社、商店、工厂、农村、仓库、码头、车站、旅店、饭馆、茶房、妓院、赌局等各个角落，不但数量惊人，行业也是五花八门，甚至在外商及外国领事馆中也发展密侦。一般分为职业密侦、游动密侦、固定密侦、刑事密侦与特务高等密侦。

伪满孙吴中国人中工人、农民、商人占绝大部分，孙吴宪兵队特高课针对这一特点，一是在工房子里选择许多青年、流氓无赖加以利诱，充当密侦，在工人中搜集情况；二是在小店的管栈人及司帐先生中发展密侦，让他们在住宿人中发现“可疑”的人；三是为搜捕苏联地下情报员及抗日地下工作者在孙吴街外及曾家堡一带散住孤居的农民中发展密侦；四是当时孙吴街妓馆很多，去妓馆的工人很容易在妓女面前吐出真情，暴露身份。所以孙吴宪兵队大量在妓女中发展密侦，让她们听取住宿人的可疑言论。

伪满孙吴宪兵队特高课除在其管辖区域内极力发展密侦，还将密侦派往海伦、绥化、泰安、克山、拜泉等地搜集情报。

三、罪行累累

孙吴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伪黑河省人民实行法西斯反动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与日本关东军情报部黑河支部——黑河特务机关、警察队、满洲宪兵团、协和会等军警特务机构一样，配合日本统治集团每个时期的殖民统治方针，进行着最反动、最阴险、最残酷的反动特务活动。它站在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最前线，施以德国希特勒“盖世太保”特务组织的逮捕、屠杀、绑架、电刑、拷打、逼供、利诱等等野蛮、恐怖、惨无人道的手段，疯狂地“围剿”抗日联军，惨杀苏联地下工作人员，抗日地下工作者，爱国人士及无辜群众，是伪黑河省人民最毒辣、最凶残的敌人。

1. 逮捕惨杀苏联情报员及抗日地下工作者

针对伪黑河省是国境地带、面对苏联的特点，孙吴日本宪兵队及其所属各分队、分遣队在伪黑河省地带活动重点，是以各种办法对付苏联情报员及我抗日地下工作者：他们除大量发

展密侦建立情报网，成立邮检班，检查信件，偷听电话，收听电波，设立诘所，实行密码查证之外，并实行夜间守候及间道对策。所谓间道对策即是宪兵和宪补共同携带武器和食品，专走山间小道，发现路上行人当场讯问，并检查其携带物品和证件，从中发现“可疑的人”。有时，他们到江船上去搜捕检查，被逮捕的苏联情报员及我抗日地下工作者受到严刑拷打后，大部送到731细菌部队当作“木头”惨杀，少数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被送到黑河特务机关训练后，作逆用工作。

1939年10月至1940年11月间，北安宪兵分队长田附常邻中尉及武下虎市大尉命令部下宫崎信伍长在北黑线列车上实行“密算查证”时，将3名苏联情报员（中国人）逮捕，拷打刑讯后送731细菌部队杀害。1941年3月，苏联情报员赵殿卿在北黑线303次列车上，被密算查证宪兵发现证明书不符，孙吴宪兵队和昌田雄中佐命部下渥美清少尉带翻译奥田胜及中国人宪补杨××、赵××由龙镇乘车跟踪赵殿卿，在通北站赵被渥美清一伙逮捕，搜取手枪一支。日本宪兵用竹剑殴打赵的头部及手脚，后送731细菌部队杀害。1940年6月，孙吴宪兵分队密算查证宪兵逮捕苏联情报员刘某（中国人），经刑讯后，送石井（731）细菌部队惨杀。1944年9月，黑河火车站宪兵诘所奉黑河宪兵分队长羽腾宽（中尉）之命，在检查证明书中，逮捕了苏联情报员王福山，经威逼利诱后，转送黑河特务机关。

1939年7月，孙吴宪兵分队长毛利辜三大尉命令部下板口直藏曹长等3名宪兵将在孙吴曾家堡农民住宅中休息的1名苏联情报员（中国人、约30岁左右）逮捕、刑讯后送731细菌部队惨杀。1941年末，瑷珲宪兵分遣队沼口助伍长在“间道对策”中逮捕1人，送731细菌部队杀害。

孙吴宪兵队自1939年10月至1943年11月和1944年5月

末至1944年12月末，在先后四年半的时间里，在队长和田昌雄、谷川岩吉、松永亲弘中佐指挥下，以逮捕、惨杀苏联情报员及我抗日地下工作者为主要任务，共计逮捕40余名。其中，在北黑线列车、车站实行密算查证时，黑河宪兵分队逮捕约13名，孙吴宪兵分队逮捕约5名，北安宪兵分队逮捕约6名。在黑龙江岸夜间守候、巡逻及间道盘查中，黑河宪兵分队在黑河街、五道豁洛附近逮捕3名，在长发屯、牡丹江附近逮捕8名。孙吴宪兵分队逮捕约4名，山神府宪兵分队逮捕2名。大部送731细菌部队杀害。

2. 绑架、杀害中国无辜群众

1944年10月，第四军道路部配属宪兵岛崎威浪军曹以下3人在北黑线列车上，强迫1名中国旅客从途中辰清下车，抢夺其金钱后带到山林中打死。

1945年2月，神武屯日本陆军医院因丢失一支注射器，将情况报告宪兵派遣队长沼口曹长。沼口带军曹西尾昭信及宪补马××来到医院，当时医院只有1名打扫烟筒的中国工人，便把他抓来审问，用竹刀、木刀乱砍他的背部、四脚，在严冬里让他裸体到屋外站立3次，每次10分钟。又用火钩烧他的鼻尖、胸部，刑讯4天致死。

1941年6月，瑷珲县骆驼脖子杜连奎、五里亚屯陈子延、金山排子李富友等均被日本宪兵打死。此外，在源利金厂日宪逮捕工人14名……

1945年5月，奇克宪兵派遣队队长笹岛松夫（准尉），据密侦报告：奇克西南约六七公里山麓中某村庄两名中国居民（40岁左右，名不详）贩卖的鸦片来路不明，有抗日地下情报员之嫌，遂命令部下大江忠逸军曹及金田翻译（朝鲜人）把他俩捕来，用电刑、老虎凳将他们杀害后，为消灭罪证在夜间用马车

把尸体拉到奇克南山中国人坟地掩埋，并让县公署伪造心脏麻痹的死亡证明书，掩盖其杀人罪行。

1945年8月12日，有8名打柈子的中国居民（其中妇女1名）在北孙吴三里丁南侧，顺逊别拉河堤坝向瑷珲方向行走，被在孙吴临时编成的宪兵中队逮捕监禁。8月14日苏军逼近北孙吴，当日午后2时许，宪兵中队长羽腾宽命令部下放火烧房，并投掷手榴弹，同时将这8名中国居民无辜烧死。为掩盖杀人罪行，羽藤宽中尉命西尾昭信以下18名宪兵将尸体埋藏于宪兵分队横壕内。

诸如以上擅杀中国无辜群众的罪行不胜枚举。仅据1939年任孙吴宪兵队庶务军曹，1944年6月任孙吴宪兵队庶务主任，瑷珲分遣队长、奇克派遣队长的笹岛松夫一人供称：在六七年中他指挥部下或亲自杀人3名，参加集体杀人3名，帮助杀人54名。又据曾担任孙吴宪兵队曹长的西尾昭信供称：他亲自杀人4名，帮助杀人10名，参加杀人71名。4年中共殴打中国人621名。

3. 残酷的奴役、屠杀中国劳工

日本侵略者在伪黑河省统治时期，曾在孙吴驻扎一个师团，大约5万名左右关东军，在瑷珲县驻扎1个旅团，大约两万人左右。他们为了长期统治下去及为进攻苏联做准备，曾从关内及东北各地骗招几万名中国劳工，为他们修筑了许多山洞、兵营、桥梁、飞机场、军事公路等等。（胜）武屯分遣队、纳金口子派遣队、源利派遣队都是为了保护这些军事工程而建立的。中国劳工在宪兵、把头的驱赶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着非人的折磨：严冬住的是席棚子，披麻袋片、洋灰袋子，每天吃不饱肚子，干十几个小时重活，日本监工、宪兵拿着镐把，连踢带打。逃跑了抓回来，有的被枪毙，有的被活埋，有的冬天被剥

光衣服绕圈跑。跑不动，日本宪兵用棒子打，浇凉水，吊起来用铁丝鞭子抽，有的被割去耳朵、鼻子。夏天，有的被剥光衣服活活叫蚊子咬死，打死、病死、饿死不计其数，修完山洞的大部分工人均被集体枪杀和毒死。

1935 年（康德 2 年）在大连被日本福昌公司招到孙吴修路和大营的劳工有三千多人，每天劳动19 小时，不到1 年死了六七百人。

1936 年(康德 3 年)2 月天津日本租界大东公司在天津招劳工一千一百多人，在沈阳招六百多人，这些人被骗到瑷珲县西岗子给日本岩崎部队修山洞，张贵芳、宋长科、张希云、韩长林、张德兴、卢青山、袁玉奎等人均被活活打死。修完山洞后，这些人大部被日寇枪杀。从北安抓来一千三百多名劳工，完工时只剩七百余名，也都被日寇集体屠杀。

1937 年(康德 4 年)1 月修孙吴平顶树飞机场的劳工二百多人被日军枪杀4 名，用马拖死2 名，1 名赶大车的因没给日本人行礼，被活活打死。后来劳工增至2 000 人，仅河边死尸就垛着三百多人。

1938 年（康德5 年）在额尼河修路的劳工三百多人，最后只剩三十多人。

1939 年（康德 6 年）在山神府、双峡一带修军事公路的中国劳工冻死、饿死的就有300 余人。修砷子沟山洞的五百多劳工全部被屠杀。被日军104 部队从哈尔滨招到孙吴的一千五百多劳工，饿死冻死七百多人。

1942 年（康德9 年）在纳金口子给日寇修路的中国劳工有二千多人，不到1 年就死了一千多人。这年，修孙吴北大桥有三千多人，死亡一千多人。

1943 年（康德10 年）春修山神府飞机场，由关内招来一千

六七百劳工，七八个月间，被打死、饿死的就有七八百人。同年春从山东曹州府招来二百多劳工修山神府山洞，修完后得以活命的有四十多人，其余全被毒死。

1943 年（康德10年）11 月中旬，霍龙门至黑河铁路线冷川站南山林内，有日军第四军道路部，即第七一八部队看押100余名从华北俘虏的国民党兵士为其修路，道路部长小山中佐命令渡边伍长用日本军刀砍杀3名所谓“思想不良”分子。1943 年6 月至1944 年9 月，该道路部以“勤劳奉公队”、“勤劳报国队”名义在各地拉来3 600余名中国人，日本宪兵对他们严加监视、强制劳役。由于劳累过度，挨打受冻，疾病流行，1 年内死亡400余人。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从我的经历看日本
铁岭宪兵队的罪行

范宪章

我是在1943 年参加日本宪兵队工作的，曾作过密侦翻译等工作，约两年多。

1943 年正值敌人进行所谓大东亚战争正酣时期（实际是面临灭亡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东北三省靠苏联边境修建防卫工事。在中满地带修军事仓库，为的是生产或储存大量军火物资，企图用来支援太平洋战场，以挽救其失利。乱石山军事现场（驻敌七二七部队），就是这种仓库之一。

在距离辽宁省铁岭县南乱石山车站2.5 公里的东部有一处

山地，地形是群山环绕，中间为盆地，纵横方圆10公里，共由8个村庄组成，名叫八大密下甸子。日本勘探队勘察后，日伪当局便下令驱逐所有农民，没收地产，在此地着手修建一个规模庞大的空军秘密军火仓库。当时，把整个山用人工削去一半后，以铁筋钢骨水泥筑成圆形大罐。每罐可储存汽油几万吨。罐筑成后，仍然用土培好，山上栽些花草树木，伪装隐蔽。另外建筑约有10栋地面仓库，间距50米左右，以防止被轰炸后接连燃烧、爆炸，房脊上伪造烟筒，好象农民住宅一样骗人眼目。总计这类设施大小约二百多处，能容存大量军火、炸弹、汽油、军械等。

修建这样庞大的军事设施，除必需的技术工人外，还需要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来做义务工。所以由东北各地强征劳工数千名。为了防止工程遭到破坏，或有煽动罢工影响工程进展的事件发生，特由铁岭宪兵队派驻一个宪兵纠查所，来保卫这个大工地的治安。

铁岭宪兵队特高系，由日本宪兵军曹（中士）担当总的工作，后来由浜田曹长（宪兵上士）负责，组成所谓防谍队。日系宪兵共5名，下有中国宪兵补3名：李庚年、查活国和韩××。还有密侦6名：李向阳、周维政、毛朋学、何文阁、李永士、范宪章（即作者本人）。下设联络员几名，他们以不同的身份混入工人群众中，搜集有关煽动罢工、破坏生产、集会等活动情报。

我初期混入国际运输公司装卸工人队里，以联络员身份进行活动。

（1）搜集工人之间，谁和谁相处密切（防止集体反满活动）。

（2）侧面了解，利用其他人了解工人的文化程度（从中调查知识分子）或多数工人拥护的人。

（3）了解工人中出身知识分子的，曾为工人争利，打抱不平，带头要工资讲待遇的分子。

（4）查询工人登记年龄、语言特征，及通信关系。

（5）了解从关内来东北的工人，或者由热河省地区来做工的。

其他不属上面五项，需要进行的侦查活动还很多。总的是怕工人反抗，怕工人秘密集会，搞集体暴动，怕工人向关内通反，泄漏秘密。怕工人当中混入共产党员做地下工作。

我在该队工作不到半年，身份暴露后，我没法继续进行秘密侦查工作，奉命又转为公开活动。

（1）检查工人来往信件，常到邮局抽查，对象是由关内来的信，去关内的信，定期寄往他地信件。

（2）登记上述收发信人姓名、原籍及通信内容有无其他蓄谋活动，检查信一般是用水调开信封口，必要时将信交给上级用科学方法鉴定。

（3）监视工人金钱使用情况，从中查找工人收入和花销对比，了解其钱的来源。谁和谁在一起吃喝，搞什么勾当，哪个工人在群众中有威信，和工人平时阅读书籍的情况。

（4）通过村中伪保长、组长了解在军事现场附近的居民迁移情况，确定是否抱有什么目的迁来或迁出。工人下班后，到村中与哪家常来常往，发生什么关系。

（5）来军事现场附近各农村的游贩或者不常来的客，都列为可疑分子对象，有时秘密跟踪，有时公开盘查。

再谈谈伪宪兵队人员的罪恶：

伪宪兵队走狗发现上述情况，有一点苗头就利用职权恫吓，敲诈勒索。1943年5月，住在乱石山车站附近的杨洪图，1943年5月，他妻侄在山东无法谋生，来东北找出路。因此地是军营

地区，不允许陌生人久留。所以杨洪图晚间招待他妻侄吃一顿饱饭，次日趁天没明送走，怕在车站被发现，送到距离7.5公里的新台子车站上火车。腰堡村的屯长、联络员赵风顺（也是情报员）知道了这一消息，便借机会敲诈杨洪图说："你的妻姪大概是关里来的探子，为什么来住半晚上就走了呢？"杨洪图百般哀求，发誓说妻侄绝非"探子"。赵风顺始终不听，并且说你把这个人找回来，交给宪兵队审问明白才行，否则你就是隐藏间谍，不但你生命有危险，就连我们知情不报也要受到处分。杨洪图只好以烟酒招待赵风顺，又送给他伪满币100元。赵临走时又说："事情以后不定还闹到什么地步，我尽力帮助你，如果上边知道，你还得认可要人不要钱。"俗语说：钱能买罪。他走了之后，杨洪图想虽然用金钱一时贿赂住了赵，但心中仍然害怕，和老婆核计想全家逃走。但拖家带口也不好逃走，最后只好杨洪图自己先走。杨洪图在铁岭住了4天，后来遇着同屯子的人说，他家平安无事，这才冒着生命危险晚间偷偷回家。杨洪图为什么叫赵风顺弄得全家不宁呢？原来他几次向杨洪图借钱借米，都被杨洪图拒绝了，他怀恨在心，处心积虑想办法找杨的毛病，终于因杨家来客人一事，达到他想敲诈恐吓的目的。

日本宪兵队在敦化的血腥暴行

吴白岩

"九·一八"事变后，驻敦化的旧东北军"老三营"王德林部愤然举义，组织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城西半截河屯的陈翰章，城东沙河镇的戴风龄（当过民团保董），以及许多地方爱国青年

都先后加入了救国军。193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五）王德林率部攻入敦化县城时，人民怀着收复失地的心情，欢迎和爱戴这支抗日的队伍。及至王部退走，日军又卷土重来之后，人民正提心吊胆的时候，祸事就发生了。

日本宪兵队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张敦化士绅供给义勇军物资的单据。敌寇据此便认定是勾结救国军反满抗日，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就按单据一连串逮捕了12个人。其中有：万茂森（字荫卿，敦化商会会长，曾当过省议会议员）、谭宗周（字质轩，敦化农务会会长）、于登瀛（磐石县人，敦化税捐局局长，曾当过省议会议员）、盖文华（敦化、蛟河两县国民党总负责人，时任蛟河小学校校长）、杨振邦（吉敦铁路敦化站电务员）、王洛市（字兆图，办垦务者）、王虎子（在县城十字街开饭店）其余人姓名记不得了。

日本宪兵队在敦化严刑拷打初步审讯之后，又把他们送到吉林省城，不断地进行严刑审讯。因为他们没有株连别人，也没有道出救国军的情况，所以把他们押在宪兵队二层楼上。后来，在一个漆黑的夜间，谭宗周和王洛市，不顾一切，缒楼而下逃出了虎口，他们也投到救国军中去了。

第二日黎明，日本宪兵队发现逃走了两人，马上把其余的人装上盖着篷布的大汽车，把每人眼睛用白布扎紧，开到吉林省城北山下九龙口刑场，用钝刀锯断了他们的咽喉，脖后颈也不拉断，还留一段仍与身体连系着，一时呼叫之声惨不忍闻，附近住户都听到了。事后收尸，雇叫花子在死者喉头部缝了三针，又把每个死者的头和后颈连缀在一起。当时看见万茂森的眼珠子都冒出来了，其余的死者也都体无完肤，令人目不忍睹。

当英国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前来我国东北调查时。刚在上海登陆，即有吉省士绅以吉林同乡会名义据状控诉，把这

一案的全部经过情形，交给了国联调查团。控诉书中仍然是按着最初逮捕12个人的名字提出的。以后有人见到这部分材料底稿，据说是由吉林同乡胡体乾执笔的。

日伪宪特在宁安、吉林市等地的罪行五例

赵卜谦

"九·一八"后，日军肆意横行到处侵占掠夺，惟在旧吉林省中部的宁安县（今属黑龙江省）周边受过重创，尤其是在县属镜泊湖附近。因宁安南邻汪清，北接方正，山环水抱，形势险要。加之，一度曾以方正为据点的李杜、冯占海等和以汪清为据点的王德林等所部的抗日军，同宁安地方武装保卫队长刘万魁等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都须通过宁安进行联系。所以日军侵入宁安，并不是"无血入城"的。

日军记恨于宁安地方武装力量结合正规军队对其的抵抗，回忆起历史的旧忿，入城后除大索与"中村事件"有关的原籍宁安、屯垦军团长关玉衡家属、亲戚们，捉到关团长的弟弟填塞"冰眼"外，还唆使凶残的宪特们捕风捉影地加害人民。现将我所知道的宪特们的罪行事例，概述如下：

（一）孙麟绂，字锦书，吉林农业学校毕业。"九·一八"前曾任宁安县教育会评议员和东京城镇第一小学校长等职多年。他的叔父孙思溥是由延吉道区八县选出的北洋政府时期众议院议员。他家住在东京城镇附近的"穆齐"，他们叔侄在地方上是比较有声望的人。"九·一八"后，日伪利用他的声望，叫他担

当伪东京城镇协和支会的负责人。他把伪协和支会成立起来了，并网罗了一些伪协和会员。有一天突然特务把他逮捕了，并搜去他家的金银财物。事后打听说他征收的伪协和会费没有缴予“上级”，私结集团，有不稳的行动。关押在日本宪兵分队后，非刑严讯，未得供词。特务们威逼欺骗，他家花了多少次的冤枉钱，把家当也花光了。后来说案情重大，一再转移地方，最后把他关押在铁岭河日本国防军司令部所属的宪兵队里，严刑逼供，筋断骨折，死于刑下。

（二）张志铭是宁安县东京城镇人，毕业于北京师大，历任宁安劝学所长、教育局长等职。他的叔父张肇祥是毓顺机制面粉公司经理，该公司设在距宁安30公里的中东铁路海林站，当时驻绥芬河（中东路东部线国境）的张宗昌部下某旅长与张肇祥相处甚密，后来该旅长移驻山东省济南，张志铭经其叔介绍，曾一度为某旅部书记官。曾在北京读书时参加过反对修建海林站到镜泊湖之间轻便铁路，反对过日本公司在东京城镜泊湖之间买地，所以，日寇搜集曾与军界有关系的人，将张志铭抓去了。他被关押在宁安城一个当铺院内，每天受宪特的审讯，逼他坦白反日、排日的经过。他们用燃着的纸烟烧他脖子和喉头，人油滴滴往下淌，痛彻心髓。前痛未止，后痛又来，不许摆动，不能躲闪，今天烧烧，明天烧烧，把脖子烧成了斑斓豹样，但是，还没有烧出特务们想要的东西来。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无罪释放。

（三）刘法海是宁安县人，他父亲以开旅店为生。他少小时很聪明，最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该校是中东铁路公司在帝俄时创办的，采用俄人做教员，以俄语教授。学生们利用具备的条件，阅读进步的俄文书籍比较多一些。“九·一八”后该校的学生因思想、行动进步，被宪特逮捕的比任何学校的学生

都多。他是在毕业后被捕的。捕他的目的是因为他住在哈尔滨的时间较久，认识俄人较多，俄语的能力较强，想通过他检举些反满抗日的俄人、有破坏活动的俄人（如炸桥梁铁路、颠覆列车等等），及有进步思想、行动的中国学生。最初对他使用软的利诱手法，毫未奏效。接着改用硬的折磨手法。特务们竖起高有几丈的长梯，逼他上到顶端时，特务将梯拉倒，人随梯倒跌落地上，昏晕不省人事，特务们就用冷水将他喷醒后，逼他再上再跌，日有数次，跌得他头脑昏昏，虽还活着脑也不中用了。

（四）吉林救国会刘济瀛事件。1933年在吉林教育界曾发生一桩血腥的残暴事件。整个事件是由刘济瀛引起的。

1933年，我在吉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刘济瀛共同负会务责任。二人相处很好。我观察刘之言谈行动，已知其有所活动。后来他调转到永吉私立两级中学任教员。至1933年冬季，刘因在伪中国银行提取汇款，被日本宪兵查觉，幸而刘君机警得以脱险。但由此以后日伪对教育人员即加之以“思想匪”和“注意人”等等名号。1933年12月1日，第一师范学生李玉方被捕。12月3日，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被捕。12月5日，第一师范教务主任娄法墉被捕。女师教员肖伯孚、男师附小主任李禾村、西关第五小学校长魏復周、县两级中学教员张崇法，省一中训育主任丛绍章等，都先后被捕入狱。严刑迫害，后移至普通司法机关，先后释放。但不堪残暴死于严刑之下者有李光汉、娄法墉、李禾村和魏復周等人。

这一残酷事件，据我个人了解，除刘济瀛与在逃的郑璞、郑友三、刘墨卿确曾有组织救国会之活动，张崇法对刘亦有所帮助外，其他如李玉方是由仇人用救国会之黑信所陷害。各校之被害者是由日宪所认为的“注意人”，以严刑逼迫唆使被捕者虚

构诬陷任意株连所造成。而警宪所认为的“注意人”又与日系教员有关。在这里我举一事例以为印证。

1935年暑假开学后前一天，第一师日系教员土井健次，见教务主任住宿的房间很清洁宽敞，就将行李搬进住下。经娄法墉力争，土井理屈被迫搬出。从此以后我常见到土井对娄怒目而视。在娄被捕之同时，于半夜间有日宪士兵3名到一师将土井唤起偕同检查娄之卧室、办公桌。土井并为之燃炉取暖，对娄之书籍信件一直翻检到天明。由此可以推出娄之被捕与土井有关。

（五）日本永田讨伐队对抗联之残暴。我有一宗弟孙法元，家住在吉林的敦化县。据他述说：敦化县的沙河沿，驻有日本警察讨伐队。伪满康德5年11月间，该队出外搜查到沙河沿附近山沟内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某团相遇。当即开火战斗。因日军的武器人数占优势，结果抗联败退，朴团长被俘。抗联战士伤亡6人。凶恶残暴之日兵对此6人不论死活、伤之轻重，一律将头割下，把血淋淋的人头带回悬挂树上。他们以为借此以示威，殊不知这正是暴露他们的惨无人道狰狞之面目也。

伪满黑河省地方保安局

柴树功

伪黑河省地方保安局是伪满警察里的秘密机关，从事防谍、搜集情报等秘密活动。地方保安局除受所谓的中央保安局即满洲保安局领导外，还受当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指导、监督和控制。如捕获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谍报人员，必须送交日

本陆军特务机关，向苏、蒙派遣密探也必须向日本陆军机关呈请。满洲保安局则受日本关东军情报部（设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的掌握控制，只不过掩护在伪满的警察机构内。保安局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各国（主要是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和伪满的谍报活动；向苏、蒙派遣间谍特务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掌管国境的警卫、国境地带的检查、治安管理以及其他警察业务。伪保安系统是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汉奸傀儡政权反共反人民的一支特务组织。为了加强控制，由伪治安部次长兼任保安局长官，伪警务司长兼任保安局次长。日本关东军还派有军官任保安局的参事官，代表关东军情报部长对保安局实行监督指挥，直接掌握对外派遣任务。地方保安局也在当地特务机关的监督指挥下工作。

一

伪中央保安局成立于1937年12月1日。1943年3月因伪国务院机构变革，治安部的警务司改称为警务总局，保安局受警务总局领导，警务总局长兼任保安局长官，警务总局特务处长兼任保安局次长。1945年7月，因伪中央保安局和警务总局业务重叠，中央保安局下设的一、二、四、五科与警务总局特务处的有关科合并，取消了保安局次长，由警务总局长兼任保安局长官，警务总局特务处长兼任保安局参事官。中央保安局下辖有地方保安局，掩护在各省警务厅内。各省警务厅长兼任地方保安局长，警务厅特务科长兼任保安局理事官。

1937年12月1日在伪中央保安局成立的同时，为了“强化国境地带”的防谍、情报活动，在当时的牡丹江、三江、黑河、热河、兴安北省和间岛（今吉林省延吉一带）等省成立了地方保安局。1938年4月成立了滨江省地方保安局，1939年成立了

东安、龙江、北安、锦州等省地方保安局。在所谓国境省地方保安局成立了由特务警察组成的“特谍班”，作为保安局从事秘密侦察活动的核心组织。1940年又成立了奉天、安东、通化、吉林、四平、兴安东省、兴安南省和伪首都地方保安局。这样，直至日伪垮台，伪满保安局下设了18个地方保安局。

伪黑河省地方保安局设于黑河，首任局长是当间音次郎，原为日本宪兵大尉，首任伪奉天市警务厅警务科长。他于1939年调任兴安南省任警务厅长，由竹内节雄继任。1941年竹内节雄调任伪新京（长春）警察副总监兼首都保安局局长，饭塚家太郎为黑河地方保安局长。1942年9月至1944年5月，又由今川嘉尚接任。1944年5月后由正罔辉任伪黑河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黑河地方保安局设庶务、防谍、谍报、资料4个股。每股工作人员平均10人。又设总特谍班，下辖两个特谍班。有班长20人，班员80人左右。1942年在黑河、孙吴两地设防电班，其任务是监测可疑电波和潜伏电台。1940年设立邮检机构。伪黑河保安局在黑河街黑龙江岸设有秘密监狱，黑河街的日新饭店、恩记饭店、东洲饭店、萨哈亮饭店、阿穆尔饭店等都是秘密据点。黑河省保安局主要任务是：从黑龙江上游漠河地区向苏联派遣间谍，搜集军事、铁路、水上运输等情报；加强军事要害部门的防谍；江岸和交通要道的检查工作；镇压和逮捕我抗联和中国人民的反满抗日活动；诱买利用白俄，准备对苏战争时使用等。黑河省地方保安局下辖漠河、呼玛、鸥浦、乌云、逊克、孙吴、瑷珲7个县保安局。瑷珲保安局又称分室，下分一般特务、地下工作两部分。

伪黑河省及各县保安局基干人员状况：

正罔　辉　　黑河警务厅长兼省地方保安局长，一等官。

吉丸鹿之助　理事官，黑河警务厅特务科长，二等官。
星亮三郎　事务官，三等官。
田中明昭　事务官，三等官。
增田俊吉　属官，会汉语。
相泽国雄　属官，会俄语。
罔胜　美　第一（庶务）股长，属官。
渡　　边　第一股长，属官。
小林秀夫　第二（特务）股长。
提德　雄　第三（对苏谍报）股长。
田　　烟　第四（兵要地志）股长。
中村福导　伪瑷珲县分室事务官兼警正。
寺尾格太郎　伪瑷珲县分室特务主任兼监督警尉，负责“地下工作”。
关山顺作　伪瑷珲县特务股特务主任兼警佐，负责一般特务。
中　　岛　西岗子中队特务主任。
森　　×　孙吴特务股长，事务官兼警正。
边　　川　孙吴特务分室主任兼警佐。
多胡幸司　逊克特务股长兼警佐。
美　　山　逊克特务分室主任，监督警尉。
四　　边　奇克特务主任，监督警尉。
忠江　忍　乌云特务股长，警佐。
增　　山　呼玛特务股长，警佐。
须　　田　呼玛特务分室主任，警尉。
田　　中　鸥浦特务股长，警佐。
宫　　岛　漠河特务股长，警佐。

二

伪满洲保安局是在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大举向我国全面进攻时，为了对外进行情报、派遣、侦察、发现并破获各国情报活动，对内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反满爱国运动而成立的。所以，自始至终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当时的苏联、蒙古等为其工作的主要对象。1940年以前，主要是建立健全其特务组织时期，其活动主要还是依靠特务警察进行。1941年以后，由于德寇进攻苏联，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再加上保安局特务系统已完整化，因此，镇压国内爱国组织的活动和对苏情报都日益强化，更加残酷。1944年以后，由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每况愈下，接近灭亡，所以保安局的活动也达到疯狂的阶段。但是，无论在哪一时期，保安局的组织活动始终是绝对保密的。因此，全面揭露保安局的罪行是很困难的。本文就掌握的零碎材料，简谈一下保安局的罪行，难免挂一漏万。

（一）血腥镇压抗日联军等组织的爱国活动

1936年12月初，伪黑河省瑷珲县警务局司法股得到一份关于抗日联军领导者张某带有部下10余名来到黑河境内活动的情报。因此，警务局全力以赴进行大搜查。当时，警务局特务科特务股的中岛宗一带部下一人到瑷珲县兴安金厂搜捕。在搜查中，中岛宗一从该厂副经理（中国人，年约50岁）处了解到抗日武装领导者张某正在离兴安厂东北方约12公里的分厂内作砂金工人。于是，中岛宗一带领5人于拂晓时突然包围该厂工人宿舍，逮捕了张某。经过日特严刑逼拷，供出真实姓名张信。第二天带回黑河，经多田事务官严加拷打，又供出6人，其中1名是黑河某浴池的工人。张信与后被捕的6人于1937年4月间，被越智巡官指挥部下在西四家子附近用刺刀秘密杀害了。

1937年4、5月间，盐田警正所指挥的30名警察队袭击了抗日联军赵尚志所属的部队，杀害抗日军二十多人。逮捕了1名为抗联带路的鄂伦春人（男，约40岁左右）。在逊河城西北方约500米的地方，日军的一个曹长野蛮地用日本刀砍杀了他。而残无人道日特中岛宗一竟然把被害者的脑髓取出来烧黑了，与别人分着吃，企图用此来治自己的淋病。

1939年7月至12月，土屋警佐和斋藤平五郎警佐在瑷珲三站，利用特务收集抗联王明贵部活动的情报三十多件，送交警务厅处理。

1940年2月下旬至1943年2月间，仅瑷珲西岗子特务主任指使刘品一、徐英杰、郭歧山等人大肆收集情报。仅3年就搜得611件情报，其中有关抗日军的情报15件；有关宗教团体及反满抗日组织嫌疑的情报30件；"战时有害分子"动向的25件；居民对时局的思想动向约120件等等。这些情报，直接地镇压了抗日组织，逮捕和杀害抗日工作人员、和平居民，加强其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压迫和奴役。为了搜集情报，西岗子特务主任还奖励部下鸦片600片，以便进行情报活动。

1940年8月，为了进行据点清扫工作，逮捕抗日武装人员，保安局特务组织警察经常对山地的房屋进行调查或侦察，把无人的房屋破坏或者烧毁。仅三站和八车力河小队就烧毁、破坏房屋十多处。

1941年，按着保安局长官"镇压抗日人员计划"的指令，保安局编制了"防谍特殊名簿"，并且进行侦查，以便逮捕抗日人员，镇压抗日活动。当时编制特殊名簿的对象是：与苏联有关系的人；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反满抗日人员。根据情况制定对策：第一种立刻暗杀，第二种监禁，第三种追放。在这种法西斯政策驱使下，保安局经常以"嫌疑"为名任意抓人。如

1941年5、6月，就先后捕捉1名伐木工人和1名农民，经灌水、殴打、拷问，最后因无证据，监禁一段而释放。

（二）残酷压迫中国人民

1934年1月至同年4月间，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砂金工人有五百多人。为了探知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伪黑河国境警察队在芳林佐太郎的命令下把回来的砂金工人全部逮捕，进行审讯和拷打逼供，并且掠夺了他们砂金三十多公斤。

1940年2月至1943年2月间，为了镇压抗日活动，保安局根据伪“军机保护法”、“国境地带取缔法”，以“伪造居住证明书”、“伪造旅行许可书”为由，肆意盘查并逮捕中国和平居民350人，进行殴打。后将其中的七十多人提交哈尔滨、北安警护队，其余监禁一天至半个月后释放。

1940年3月至1943年2月间，仅保安局指挥西岗子、东岗子的警察就逮捕了由藤田组、大昌组、福高组、松本组、福昌公司、公信公司等修筑日军军事工地逃出来的劳工六十多名。日特用竹刀、鞭子殴打他们，将其中的二十多人给予所谓“逐出国境处分”，其余送至原工地服苦役。

每逢“五·一”劳动节、十月革命纪念日、年底年初，保安局特务便在村庄、工人宿舍、酒馆等地进行搜查盘问，以“行动可疑”为名大肆逮捕所谓“来路不明”的中国和平居民。仅1940年4月至1943年2月间，就抓了七十多人。

1940年5月至1942年10月左右，西岗子伪警察队管内有一千八百多名被抓来的劳工，为伪交通部土木工程所松木等单位服苦役。为了防止劳工逃跑，保证军事工程的修筑，保安局的特务配合日本宪兵对他们严加管理。如，限制他们活动地区，看管他们的宿舍等。劳工们卫生条件恶劣，饮食极差，患病不予治疗，病死了六十多人。有一百名逃跑的劳工被抓回，其中

五十多人被严刑拷问，把20人交给铁路警护队，追放到北安。其余押去继续服苦役。

1943年5月至同年9月，保安局主动与日军配合，监视看管在山神府东端修筑兵营、道路的劳工六百多人。因虐待而患病或者过度劳役而死亡的就有七十多人。

1943年2月至1944年5月，伪保安局协助日本宪兵队以“扫除国境地带”为名，逮捕所谓“无证明、无职业、无住址”和违犯伪满中央禁止采金禁令的砂金工人共计45人，结果把这45名工人送到伪鹤岗煤矿当劳工。

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间，在山神府伪警察管内有一万多中国和平居民被抓来为日军修公路、铁路、飞机场等。保安局特务配合日本宪兵队进行侦察，威胁村民不得给逃跑者吃饭住宿，要密告逃跑的人。结果，1943年8月抓住逃跑的和平居民7人，1944年6月抓住2人，7月逮捕逃跑的和平居民40多人。先后共抓52人，这些人都遭到残酷虐待。

此外，还有敲诈民财、逼交粮草、征用人力、车马、强奸民女等，不一一赘述。

（三）大肆收集苏联情报和野蛮捕杀苏方谍报人员

1934年8月，伪警务厅的日军特务为了调查苏联东库伊比雪夫卡到海兰泡之间的军事设施，强迫住在黑河六道街的1名中国人（农民，兼营牛奶，与苏联妇女结婚，年约45岁左右）潜入苏方上述地区。此人始终没有回来。

1935年初至同年6月，他们又强迫住黑河街莺屋旅馆附近的1名中国人（男性，45岁）潜入苏方精奇里江河口的造船厂，收集该厂生产能力及周围的军事设施等情报。此人返回后，他们又强迫他到苏方收集东库伊比雪夫卡至海兰泡之间的军事设施情报。后来，把这些情报报告给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和伪新京

警备司。

1938年2月，伪瑷珲县警务局三卡特务股长得到一份与黄旗营子居民田某入苏事件有关联人的情报，便报给上司。3月，伪警务统制委员会派伪黑河宪兵坂口军曹逮捕苏联“地下工作人员”、瑷珲城国民学校教师孟某（年二十多岁，男性，瑷珲县松树沟人），被宪兵队利用派往苏联，后下落不明。

1942年后，保安局的特谍班加强了情报网。对内：由于情报活动的联络员多数公开，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不能深入到民众之间探索秘密的抗日组织，所以，保安局选择秘密的联络员。他们物色的对象是在群众中有些威望的，过去与警察、军队、官府无关系的，有一定职业和财产的人。采用掌握其弱点胁迫其服从或者利用其怨恨、爱情等关系施以恩义胁迫其服从。对外：积极物色派往苏联的谍报人员。选择那些县内有家者（必备条件），曾在苏联住过，通俄语者，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的。采取的办法，以利益引诱和以武力胁迫。

另一方面，对从苏联来的谍报人员，送交国境特务机关，审讯后送到哈尔滨特务机关。苏联派来的密侦，被捕后经考查，能利用的被派回苏联，不能利用的就地杀死，或者送陆军医院作为军医的试验品，或者利用“龙江之口”在晚间进行秘密杀害。

1942年1月，瑷珲县特务主任多胡逮捕一名苏方谍报人员，并认为没有利用的希望，经黑河省特务科长批准给以严格处分。多胡于夜间把被害者带到结了冰的黑龙江上，打开冰洞用手枪杀死后投入冰下。

1943年4月左右，多胡在黑河街邮政局附近逮捕了1名苏联“地下工作人员”（中国人，男性，40岁左右）。经严刑拷打，往肚子里灌水，6个月后将此人杀害。

1943年夏，瑷珲分室根据没有利用的理由，将两名苏方谍

报人员（中国人）送到日本陆军医院供军医做实验材料用。

1945年2月，原住瑷珲县小黑河的一名被害者，年约30岁。住小黑河时，因与邻居发生纠纷，于1941年冬奔入对岸，越境入苏联。一年以后，约于1943年初以苏联密侦身份潜入黑河。到朋友家后，居民怕被发现乃劝他去自首。他自首后被押在收容所里。寺尾对他进行分化，作为国内间谍来对付苏联间谍的内线。1944年春把他分配到山神府。此人到山神府后不听从保安局的命令，并使警察队与宪兵队发生一些磨擦。中村与寺尾商量，认为已没有利用的价值，便命令部下秘密杀害。

（摘自《黑河文史资料》第四辑）

日寇在东北特务活动的片断

温如春

回忆东北沦陷后，日寇非常猖狂，真是恣睢暴戾、为所欲为。在军事上施行杀光、烧光、抢光；在经济上施行掠光、搜光、刮光的两个“三光”政策；在政治上则是特务密布、间谍横行，玩弄各样心毒手狠的花招，残害群众。当时东北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往事，今日回首，记忆犹新。

我于1938年，在伪满黑河警备队任翻译时，有一同学叫沙成福，他对日寇特务活动，有些了解，尤其对日寇特务机关内部情况，更为知情。据他和我所说的，略述于下：日寇特务机关，设有“特要视察人课”，他们把沦陷区的各界人士分为三类：一类是特殊阶层的，就是荐任官以上的人；二类是委任官级的人；三类是地方士绅。对上述三类人，进行特务跟踪，暗中监

视。凡是日常生活或工作中，触及日满关系的，都列为要视察人范围内。稍有不利于日满的言行，如被警宪特发觉后，便以思想不良，或反满抗日论罪。进行逮捕关押在“辅导院”也叫“思想矫正院”。通过审讯、非刑拷打，百般折磨后，送到矿山煤洞，或军事工地，强迫劳动。其目的是将他们置之死地。他们的口头禅是：“统统的死了顶好”言外之意是：整死几个中国人算什么？死的越多越好统治。此外，他们还感到单靠伪警宪特还不够的，有时达不到目的的。必须利用大批特务人员，进行伪装潜伏，采取形形色色各式各样办法和措施，才能更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的。

特务联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火车站前，或各种宣传商标，如“人丹”或胃药瓶等，外部人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推销商品，其实人丹上老头的胡须和胃药瓶的左右放法，以及瓶口流出药片多少等这都是特务暗号。此外，比较重要情报，是利用日寇神社作基点传递的。日本神社多半建立在大中城市，神社的和尚，全受特务机关领导，并领取经费。一但有要事和特务人员相商，或交待某些任务，则由和尚持鼓走街串巷，边走边敲，口中念念有词，鼓声有快有慢，并有长短几下之分，装成诵经求佛的假相，实际是召集或通报当地驻在的特务人员的暗号。

再如，日寇在各地建立的协和会：省市设协和会本会，县设分会，村设支部。组成人员：省市是官僚财阀，县是地主劣绅，村是土豪恶霸。其中设有会长、支部长、助理、委员等。其任务对外是群众组织，美其名是向日寇“宣德达情”；对内是有实力的日寇帮凶。为了效忠日寇，维护汉奸的统治，他们不择手段地残害中国人民，动辄以思想犯、国事犯……等罪名，秘报日寇。由此可见，协和会的成员，实属罪大恶极的汉奸，人

们称之为“协和坏”。

日寇的特务组织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对内部人员的监察，也是非常秘密的。如关东军内部设有秘密“内谍哨”。这些内谍哨，负责对官、兵的监视，如发现问题，直接向关东军参谋本部秘报。他们的待遇级别，全系二等兵或一等兵，由关东军参谋本部“内谍课”负责领导。即使高级官佐，也不详其任务。他们享受优厚待遇，每月工资约等于少佐薪饷，如能报告特别重要情报时，还给予特别奖金。为了绝对保密，他们的优待薪金或奖金，均不直接发给本人，由关东军参谋本部直接寄给其家属以防泄密。内谍哨人员，绝大部分系皇亲国戚，所谓“皇带子”。认为这部分人忠实可靠，绝对保密，忠于天皇。被征募后在国内先进行训练，然后有重点的，派往关东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等任职。他们到军队里完全担负勤杂兵工作。如汽车兵、传令兵、号兵、军犬军鸽兵、伙夫、马夫等。从表面上看，这些职务都不太重要，但在活动上大有便利条件，能经常接触各级人物，便于达到和完成内谍任务。但关东军对他们的行动，也不时进行秘密调查，如发现有失秘行为者，轻则调离部队，重则秘密处死绝不宽恕。

日寇内谍活动，除利用皇亲国戚外，还利用少数朝鲜族少女，从事内谍情报工作。在日寇联队以上的军队中，都设有随军妓院，(通称酒保慰安所)，征集朝鲜族少女，年龄均在18岁以上至25岁的，身着军服，不带阶级，经过谍报训练后，派往各部队的。其成员分三等：一级妓女接待佐级以上军官、二级接待尉级军官、三级接待士兵，士兵每周准许去妓院一次，不许住宿。尉级以上军官也定为每周一次，可以住宿。佐级以上军官不限，这样少女们在日常接触中，可以了解掌握一些官兵的言行，遇有轨外言行，可以直接秘报指定的内谍参谋，汇总

后再报告关东军参谋本部“内谍课”。妓女的待遇，一二级按尉官级别发给薪饷，三等按士兵薪额发给，每次月薪直接发给本人。但谍报活动费，则直寄妓女家属。由此可见日寇对特务人员的布署，真是煞费苦心，巧布罗网。不仅对反满抗日的中国人，予以严格监视，即对日寇军官士兵也百倍警惕，搜尽枯肠，想尽办法，防止意外发生。其用心之微，真是出人意料呀！

（摘自《锦县文史资料》）

抚松县日伪特务组织及其罪恶

李宗尧

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加快侵略步伐，镇压反满抗日武装力量，扑灭人民的抗日烈火。他们一方面出动重兵，大举武装“讨伐”和“围剿”，一方面在敌占区纷纷建立起密如蛛网的特务组织，并网罗当地一些民族败类，为其充当鹰犬。内外敌人互相勾结，对抚松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自1936年3月1日始，日寇基于其反动的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伪抚松警务局内，成立了一个以日寇为主体的特务组织——特务股。该组织隶属于特务局领导，受省警务厅特务科的指挥。

1937年4月至1938年2月，为了加强特务活动，扩充特务力量，日寇又在县内各警察署专门设立了一批特务组织——特务系，如：伪抚松县警察署特务系、伪万良镇警察署特务系等共有6处，这些特务系都隶属于抚松县警务科特务股直接领导。

为了配合日寇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所谓“讨伐”和“围剿”活

动，日伪抚松县警务科，在日伪通化省警务厅的命令下，又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和1940年10月至1941年3月，先后办了两期“特搜班”。该组织也隶属于警务科特务股直接领导。

日寇为了加强特务力量，进一步实施其法西斯统治，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9月，先后在抚松又组建起“协和会东边道特别工作部抚松临时工作班”、“通化独立宪兵队抚松派遣宪兵驻在所”、“新京治安部警务司金特别工作班”、“通化省警务厅富森工作班”和“长岛工作队”等五六个反动的特务组织。

上述各种特务组织虽然名目繁多，各具特点，但它们的活动任务都是一致的：通过各条渠道、各种手段，搜集我党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掌握抗日联军和抗日团体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镇压、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群众团体；分化、瓦解我抗日联军和群众组织；策反、“讨伐”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屠杀广大中国人民。在特务分子中有一种“密探”（也叫“密侦”），他们分布在各个角落，充当特务头子们的“眼睛”和“耳朵”，起助纣为虐的作用。

一、分化、瓦解、策反抗日联军和反满抗日团体

金昌顺是日伪“新京治安部警务司金特别工作班”的特务头子，在瓦解抗联组织、收降纳叛的反革命活动中，向日寇大献殷勤。1939年7月，金昌顺把“抗日独立团”投降过来的崔洲峰和他的部下，带到了伪新京治安部警务司，编成了两个特务组织叫“金特别工作班”和“卫队”。他们的活动任务是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收降和劝降，同时还要配合日寇的大部队，向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讨伐”。

这年秋天，金昌顺又把前东北抗日联军的“万顺”收降下来（万顺的原名叫丁殿毓，参加抗联以前就是个大土匪）。金昌

顺把叛徒编到“特别班”的“本部”。又把“万顺”的部下编到“特别班”的“卫队”。在特务头子的直接指挥下，以“万顺”为首的“特别班”于1939年春，在濛江县收降了以金贤为首的8名抗联人员。不久，在抚松又收降了一批抗联人员和土匪，共有三百多人。“万顺”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员编入了特务头子崔洲峰带领的“讨伐”大队。

在分化、瓦解我抗日队伍时，敌人惯用的一种手法是“反间计”，他们把收降下来的兵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再把他们派回到原部队，让这些叛徒从内部分化、瓦解我抗日力量。“万顺”就曾经被特务头子金昌顺，派回到“抗日义勇军”中，阴谋劝降李洪斌司令员，当即被李司令处决。

特务们还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招降纳叛，让这些民族败类替他们充当爪牙，破坏抗日力量。如：“长岛工作大队”于1940年1月，指派投降他们的土匪头子“压五营”负责，收降了金日成部下的林参谋长（林宇成）及其部下的一个机枪班。然后把林宇成带领的四十多人编成“第三特设大队”。任命林宇成当大队长。为了报效主子的恩德，林宇成积极从事收降、策反活动，心甘情愿地充当日寇的鹰犬。又如：日伪“通化独立宪兵分队抚松派遣宪兵驻在所”，于1939年夏季，在北岗诱降了抗联李司令部下的副官张玺臣，然后任命这个叛徒当了这个特务组织的副队长。同年秋季，这个叛徒为了表达他对主子的忠心，带领一批特务在北岗收降了以李××为首的3名抗联战士，收缴了大枪两支，子弹40余发。

为了大量分化、瓦解抗日力量，特务们还利用了“以毒攻毒”的办法，让一些叛变分子当密探，在老百姓当中大肆进行特务活动。日伪“抚松警务科特务股”以日本人长岛为首的宪兵队，在特务股的配合下，于1939年收降了抗联人员崔九奎。特

务们为了扩充反动力量，又把以崔九奎为首的一批叛变分子发展成为密探，然后把他们打入老百姓当中，让他们从内部从事收降和策反活动，借叛徒之手为日寇效劳。

破坏抗日组织、抗日团体，也是特务分子们罪恶活动的重要内容。从1936年12月末到1937年3月，日伪在抚松建立的“协和会东边道特别工作部抚松临时工作班”，虽然只活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却破坏了抗日联军领导的党的地下组织“祖国光复会”（又称“反日会”），逮捕并杀害了大部分会员。

二、镇压、逮捕和屠杀我抗联战士，残害无辜百姓

特务们为了全力效忠日寇，对那些坚持抗战、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大肆阴谋杀害。如：驻在抚松县境内的特务，于1936年4月，命令特务分子白日升，伙同日伪汉奸南关区区长刁廷禄，逮捕了抗联战士李大昌（李士武），严刑拷打，然后枪杀。1937年，特务们配合警备队，大肆剿杀抗日武装力量，仅被特务头子宫川正吉（日本人），一次亲手杀害的抗联战士就有3名。在特务股主任门长慰指使下的特务分子赵德茂等人，在抚松城南杀害了1名抗联战士，并将烈士的头颅割下来，送到警务科去邀功请赏。特务分子刘忠海，把爱国人士唐云起逮捕后严刑拷打，然后交给日本人，又被日本人惨无人道地投入狼狗圈里，把唐云起活活地咬撕吃掉。

敌人为了切断抗联的军需供应途径，控制革命群众同抗联之间的联系，对广大人民群众横加摧残。1940年8月，特务们以“通匪”的罪名，把群众徐志藩抓到了警察局，给他上了“吊挂”，悬在梁柁上，由一群特务们用木棒对徐志藩轮番拷打，致使被害人昏死3次，而且终生致残。

1941年3月，特务分子解福堂、刘忠海、黄德才等人，也

以“通匪”的罪名，把农民王有奎抓进警察局，先是一顿毒打，再上大挂，然后灌辣椒水，最后投入大狱。

1938年中秋节，群众张振有给抗联战士们代买了一批过节的物品，被抚松万良镇警察署的特务分子汪树林发现后，马上把张振有逮捕了。除了没收张振有买的全部物资，还把张振有毒打一顿，险些丧命。同年8月8日，抽水洞警察署的特务分子李永亭把三十多名曾经给抗联买过粮、盐、胶鞋等军需物质的老百姓，抓到了警察局，不仅毒打，而且灌凉水、灌辣椒面子、压杠子。把张福山等多人打成重残，不久绝世。甚至有两名妇女，也遭到了特务分子叶荫林和李月祥灌辣椒水、压杠子的酷刑。

1939年，特务股主任石德玉，指使特务逮捕了向抗联提供情报、供应物资的二十多名群众，施以各种酷刑，其中有十多人被判了多年徒刑。在抚松西边荒沟岗上，特务们抓去了给“岳团”筹备给养的群众罗振山，酷刑审讯后，特务们把罗振山交到宪兵队，惨遭杀害。1940年6、7月间，特务头子门长愚，命令特务分子李树广，以“通匪”的罪名，在东岗、北岗等地逮捕了三十多名同抗联有关的群众，遍施各种毒刑。贫农柳中林被打昏过去7次，左肢终生致残。贫农王文进也被活活地打死，许多人被投入监牢。

日寇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巩固其反动统治，补充侵略战争的消耗，需要大批中国人充当苦力，替他们去卖命。而特务分子便尽力效忠主子，以“强化地方治安”为名，在各地大批抓“浮浪”(日本统治者对无职业的中国老百姓的鄙称)，以充当日寇的牺牲品。日伪“抚松东岗警察署特务系”系长解福堂，于1941年农历五月份，曾参加了抚松伪署长召开的“抓浮浪”会议。会上，特务们研究并确定了搜捕“浮浪”的各项措施，并

且提出了搜捕名单和重点抓捕对象。开会的次日，由外勤特务黄德才等人，到各处抓了36名群众，如杨福清、宋日起、于庆之等无辜的老百姓。其中有6人被送到四道沟煤矿干活。在一次煤矿冒顶时，有的被砸成重伤，有的被砸死，有的下落不明。1943年春，特务头子姜永清和他的爪牙李升林等人，受伪“县特务股”的命令，在各地抓了四十多名“浮浪”，审讯、毒打之后，把刘玉山、刘海山等十多人，送到了大栗子铁矿去当劳工。1941年6月和1942年4月，特务系的鹰犬们，配合县警察大队，在全县境内先后进行了两次大搜捕，共抓走“浮浪”一百一十多人，分别送往西安（辽源）煤矿和大栗子铁矿去当苦力。1943年9月，为了抓劳工，特务股配合县警察署的特务们，在全县进行了一次突然性的大搜查，抓走了八十多人，送到大栗子铁矿去当劳工。

特务们对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横加镇压、迫害。经常以“政治犯”、“嫌疑犯”、“通匪”等罪名，大肆逮捕、监禁和屠杀。1942年3月，特务系主任姜永清与特务李永亭等人，协助伪辉南“特搜班”的特务们，在大苇沙河口、东大屯等地，抓走了金光源、崔凤善、车云学等13名朝鲜族居民，并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毒打、审讯了一个多月，车云学被折磨得死在奉天（沈阳）的监狱里。1940年年末，抚松县特务股的全体成员积极活动，配合辉南县“警务科特搜班”，先后3次在抚松县境内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抓捕了一百三十多名朝鲜族人，并押送到了辉南警务科去严刑拷打。又在1945年6月，在警务科副石渡的亲自指挥下，以怀疑是金日成领导的“朝鲜革命（独立）团体”的罪名，在抚松全县境内逮捕了三十多名朝鲜族人，并对他们施以惨绝人寰的酷刑。其中有3人惨遭杀害，大部分人被打成重伤或终生致残。

为了配合日寇的“奴化教育”、“强化教育”，特务分子们在教育界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如：1944年6月，特务股受通化警务厅的命令，由股长、系长博夫，亲自率领特务分子董秀儒、宋增安等人，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逮捕了伪国高的教师别善会，严刑逼供后，又把别善会送到了伪新京高等法院，判处了8年徒刑。1945年6月，特务吉岗刚三（日本人），带领特务分子李成一，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在伪国高抓去了一名教师（姓名不详），还有李时好、赵应国等六七名伪国高的学生，严刑毒打之后，投入监狱。特务分子在教育界制造白色恐怖，弄得广大师生终日惶惶不安。敌特分子利用皮鞭、棍棒和屠刀进行血腥的镇压和屠杀。1940年冬季，特务头子门长愚指使特务赵德茂带领一批特务分子，残酷地镇压了砬子河伐木工人的罢工活动，并抓走1名妇女做人质，用棍棒和屠刀逼迫工人上工。

至于特务们以“经济犯”、“嫌疑犯”等各种罪名加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1940年春季，抚松“特务股”的全体成员，协同其他的特务组织，以“抓抗联”为名，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搜捕，把十多名“可疑分子”抓到了特务股去刑讯拷打。同年9月，特务分子翁振才等人以“种大烟”的罪名，把住在双沟的农民郭修礼及其岳父老孙头抓起来，毒打一顿之后又送到警察局，把他们判了6个月的徒刑。另外，特务们还把一些有抗日嫌疑的人定为“要视察人”，对这些人严加监视，跟踪盯梢，不准他们随便行动。仅特务分子李永亭一人，就监视着三十多名“要视察人”。

三、横行霸道、敲诈勒索、鱼肉百姓

特务分子们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迫害而外，在经济、物质等方面也大肆勒索，无情搜刮，中饱私

囊。如：1937年5月16日，特务分子兰心帮，在抚松城南夹信子，以搜查“大烟犯”为名，抓走了一个姓魏的老百姓，向他勒索大烟。姓魏的交不出大烟，就被特务们暴打一顿，把他打成了重伤，不久就死了。同年10月份，特务分子王德懋又在夹信子李家碾房没收了十多两大烟。特务赵德茂听说老营沟一家老百姓有大烟，于1940年7月，就带了十多名特务到老营沟，杀死了一个老百姓（姓名不详），不仅抢去了六十多两大烟，还抢去了这个死者的一百多元伪币和一百多块现大洋。

以“经济犯”的罪名向老百姓敲诈勒索，也是特务们惯用的伎俩。

1945年2月，抽水洞警察署特务系长姜永清，指派特务分子吴殿军到太平村，以“经济犯”的罪名，没收了农民赵金春的三百多斤大米，并给伪警察和伪职员们私分了。1944年12月，特务分子董秀儒也以“经济犯”的罪名，抓去了抽水乡兴盛店的经理马善一（又名马关龙）把他关押16天，又勒索去伪币五百多元，猪肉六十多斤，木钟一台。

以“通匪”罪名敲诈、勒索老百姓，也是特务们常用的手法。1942年春季，东岗警察署特务分子李文正，以“通匪”的罪名，毒打了一批无辜的百姓，然后罚款。在东岗北门，又以“给抗联送干粮”为借口，把农民冷绍英毒打一顿，并全部扣留了冷绍英给亲属的食物，让特务们私分了。1940年夏季，日伪“通化独立宪兵分队抚松派遣宪兵驻在所”的特务分子李鹏程，以“通匪”的罪名，抓走一个姓王的老百姓，毒打一顿之后，又把这个老百姓自家拣的四百多斤蘑菇全部没收、私分了。

特务们还以“私藏武器”为罪名，在抽水乡小沙河子，由特务分子宋增安、杨锡生等人，收缴了农民护田看家使用的七支土炮。

除此之外，特务们还通过各种巧立的名目，向老百姓敲诈勒索，刁难、毒打，或罚以财物，或跪石头子儿。更有些作风恶劣、道德败坏的特务分子们出入赌场，奸污良家妇女，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怨声载道。

综上可见：日伪在抚松统治时期，特务分子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为整理、撰写这份历史资料，我查阅了抚松县公安局保存的一批日伪统治时期的敌特分子的档案材料。所以本文记载的内容，是根据敌特分子的坦白、交待、人民群众的揭发检举以及专案人员的文字材料整理而成。

因松树镇已不属抚松县管辖，所以，日伪统治时期松树镇警察、特务的档案等材料，没有保存在抚松县公安局，不便于查阅，在这份材料中没有涉及到。

在收集、整理这份材料的过程中，承蒙抚松县公安局李宝仁科长和陈敏同志给予了积极、大力的支持，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摘自《抚松文史资料》第5辑）

伪舒兰县的特务组织和活动

苗有方

日伪统治者为维护其“满洲帝国”在我国东北的统治政权，在东北各地组织了庞大的警察队伍，以实施其法西斯高压统治。其中特务警察，就是与日伪军警的武装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相结合，专门从事所谓“秘密战”，进行秘密活动的组织。据我所知，

伪舒兰县的特务警察组织及其一些活动，记述如下：

伪舒兰县警务科最初设有特务股，上属省警务厅的特务科，下在各警察署设有特务系，全县警察署专职特务十几人。舒兰县警务科特务股里专职特务有六七人（不包括秘密的兼职特务），特务股长是日人，先后是监督警尉田中治作、黑龙靖雄、高昌××、森山美术男等。特务股里分特高和特务两个系。

特高系的任务是直接维护日伪的统治政权，对预谋暴动、颠覆政权等的反满抗日的思想或事件，进行侦察或暴力镇压。特高系的组织，直接由股长（日人）兼管。一是特高侦谍，有监督警尉李洪彩，还有警尉于廷臣。这两个人当时均以免职为名，掩盖其警察身份，进行不公开的秘密活动，和特务股长进行直接联系；二是有密探（俗称特务）数人，也是和特务股长（日人）直接联系。如：在二道河子（现在的吉舒镇）煤矿有个50来岁的日本妇女（早在民国年间嫁到中国人姓刘的，家住二道河子），特务股长给她拿本钱，在二道河子作买卖掩盖身份，做密探活动。在伪舒兰县公署传达室当传达长的房金臣，在伪朝阳村居住的杜弼臣（那时50来岁）等，也是经常和特务股长联系。在舒兰警察署当警长的庞凤歧也说是免职了，但也常和特务股长接触。在警务科当翻译的朱福喜、于贤贵（关东州人）也常和特务股长密谈。当时我们特务股的一些人认为他们也是为特务股长当密探的人。

特务系的任务是从事一般性的特务活动，预防和发现对日伪政权和“友邦”日本进行反抗的思想或活动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特务系设主任一人，先后有监督警尉沈润田、森山刚吉（朝鲜人）、江源××（朝鲜人）、王友帮等，还有警尉光原敬夫（朝鲜人）、林竹隐、苗有方、赵荣阁、张玉峰、警长尚福谊等。

特务系的日常活动，主要是对各种宗教信仰、社会团体和

人民群众中有威望的人物进行监视。再就是搜集人民群众对日伪所施行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反响情报，逐级上报做出决策。如：粮食出荷（强制征粮）、经济统制、征兵、征军马、征劳工、满拓强占农民良田、在学校中推行日语、民间流言蜚语等。甚至上映带有政治性的影片时，各阶层的观众人数和言论、反响等，也要有统计数字和情况，及时上报。为此，任何机关在施行能引起人民反抗的一些条文或活动之前，都必须行文申报到警务科特务股备案，以便特务股深入实际进行特务活动。特务系建有如下的名册和台帐：

一是《要视察人名册》。对于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想的人物或有过激言论、行动的人物以及有预谋煽动暴动或其他危险人物等，都登记在这个名册上。除登记其自然情况外，每月还要定期或临时将其活动情况记入活动栏中。对于“要视察人”要秘密监视，如果其迁居了，或下落不明，就应及时上报和发手配公文（通缉）。

二是《要注意人名册》。对于请愿、直诉上书以及过激言论行动者，都要登记在此名册中，以备监视其动向。还有《知名人士、地方有力者、知识分子名册》，特务警察认为有必要注意的人物和满系（中国人）官员，都要登记在此名册中，也是当作“要注意人”来监视其动向。

三是《宗教团体台帐》。在县内有参加基督教会、佛教会、道德会、家理教会（红帮）、慈善会等结社者，都要登记其团体名称、信仰、宗旨、活动范围和教徒情况以及其首领的姓名和简历等情况。凡是这些集团有集会传教等活动时，都必须在集会活动的前一天，向特务警察机关书面申报，得到批准方可活动，同时还要接受当地特务警察到会临监，并将其活动情况记入台帐活动栏中。

另外，平时如有多数人聚众，特务警察称之为“群集”。对此类现象，警察必须赶赴现场强行驱散。对于报刊、书籍等出版物和影片、唱片等的发行，特务警察都要检查、或者剪裁、或者扣押、或者上报进行制裁。对外国人居留的审批、国外旅行证的签发，也都由特务警察控制和办理。

总之，日本侵略者惟恐中国人民反抗，而设置了以日系为头目的特务警察，有明的有暗的，深入到各个领域中，进行监视和镇压。

特务警察的活动，多是秘密进行。就是特务机关的行文，都是用双层信封，外层封皮写收件机关和收件首长收，内层封皮左侧印有“特务亲展”或“极密”两种戳记字样。收发室拆开外层封皮后，见有此种戳记，就必须直接送交特务股长亲自收拆。对记“极密”字样的文件，由股长亲自拆封处理。对只印“特务亲展”字样的文件，则由特务系主任拆封和处理。

特务股除上述一般日常活动外，遇有重大事件时，则临时组织特别搜查班，进行专项侦破活动。例如：1940年（伪满康德7年）7、8月间，活动在舒兰县东部金马一带山区的我抗日联军汪雅臣部，袭击了伪五常县山河屯的警察署，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弹药，同时带领一些金马的贫民百姓没收了山河屯永恒当铺的一些财物。事后，日伪统治者称此事为“金马事件”。为侦破这一事件，伪舒兰和五常两县特务机关，联合组成了一个特别搜查班。成员有舒兰县特务股的特高侦谍于廷臣、特务警察光原敬夫，还有从舒兰和平安警察署抽调的顾云廷等人。这个特搜班是在伪舒兰区检察厅的检察官（日本人，绰号叫黑小子）的直接指挥下，在舒兰的金马和五常的向阳山等地进行大搜查大逮捕，一直到同年11、12月间，搜查才结束。被捕来的一些人，有些在舒兰警察署看押，有些关在舒兰监狱里，一些

无辜的百姓受到毒打和灌凉水等残酷的刑讯和迫害。最后，有4人被送进伪新京（现在的长春）思想矫正院关押，还有居民程殿奎和张云哲2人于舒兰被枪杀。

日伪统治者大肆宣扬什么“王道政治”、“人类必重道德”、“人类必重仁爱”，甚至在法律上规定“人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等，都是帝国主义者惯用的政治骗局。从上述特务组织、任务、活动中，就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政治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政策。

日伪时期遍布各地的庞大警察队伍，是日伪统治者的御用工具。所谓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就是地方的小皇上，人们都叫他们“警察阎王”。那时，警察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法律上还规定“监督警尉以上者，有司法警察官权力，有发拘引票（捕人票）、关押人的权力”。实际上，一个普通警察只凭《警察手牒》（警察身份证）就可以任意捕人。不但在管辖内、县内捕人办案，就是到外县、外省捕人办案也不需什么公文证件，真是人间的活阎王。

（摘自《舒兰文史资料》第二辑）

伪满黑河特务机关宣传据点——萨哈亮

王登明　郭世宏

萨哈亮是日伪时期一俄国式餐厅，位于江沿街，迎恩路西侧。它是根据黑河的历史名称“萨哈连”而命名的，在黑河特务机关直接筹划下，于1941年末至1942年初成立的。它的建立，是黑河特务机关随着“关特演”的推移，实施谍报欺骗宣

传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成立的目的

（一）黑河特务机关以萨哈亮作为对苏进行宣传活动的据点。每年旧历七月十五盂兰盆会，黑河特务机关在此举办焰火花炮大会，萨哈亮成为焰火大会的楼台。届时，邀请日本北部防卫军高级将领参加，让其一边观赏焰火，一边饮酒赴宴。同时，让宣传班外围工作员弗道谢也夫担任对苏的俄语广播宣传。伪黑河地方当局还诱惑黑河街内百姓都到平时不敢到的江边观赏，借此“真实形象”造型，宣传伪政权下虚假的“歌舞升平”、“物阜民安”的繁荣景象。一方面迷惑当地居民，另一方面欺骗海兰泡市居民，磨灭其反法西斯斗争意志，激起反战情绪和厌战心理。

（二）萨哈亮餐厅以俄人的生活习惯修建的。因此对当地的一些白俄居民和特务机关露班（对俄工作班）的白俄特务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了满足，使他们死心塌地为特务机关服务。

（三）以餐厅作招牌，豢养一些“黑特机”密侦人员，让其侦察所谓可疑的人。“黑特机”露班有时在此集会，有时白俄特务在配属宪兵的监护下，在萨哈亮门前渡江侦察。

（四）以该餐厅所得利润作为“黑特机”国防献金的来源，支援所谓“大东亚圣战”。

二、成立的经过

黑河特务机关宣传班主任佐藤静雄中尉，首先拟制了一份在黑河建立宣传据点的规划和意见。由机关长武部松雄大佐审定后，报请哈尔滨特务机关批准。“黑特机”指派满班主任中森涤七到哈市物色有经营俄国餐厅经验的中国人，结果在“哈特

机”的介绍下，中森涤七与当时道里七道街口的迎春饭店经理孙景山等接洽，进行有关在黑河筹建俄式饭店的商谈，条件是：饭馆资金由孙景山等人筹集，有关俄式饭馆所需的一切物资，如白面、肉类、酒类、砂糖、食用油等，均由特务机关在现地或各地协助筹备。鉴于黑河系国境地带，一切人员往来证件及发送货物的公文、证明手续，均由黑河特务机关负责办理。孙景山等人来往于哈——黑之间的旅行护照，均由“黑特机”以临时嘱托的身份签发，由外地购入的各种特殊物资，如洋酒、罐头等，则以黑特机军用名义装卸。

三、人员接待

总经理：孙景山

副经理：张绪典

副经理：袁×成 兼厨师

赵叔和

会　计：赵　某

服务人员：白俄女招待舒拉、塔玛拉，另外尚有三四名，这些女招待都是经过哈尔滨特务机关审查而选派的。她们的生活待遇由萨哈亮支付照料，她们的身份表面上是萨哈亮餐厅的女招待员，也未列入“黑特机”露班外围工作员的名单内，但他们的宿舍由“黑特机”调拨。她们往返于哈——黑之间的护照，亦由“黑特机”以临时雇用人员身份给予证明。但暗中，她们对各类顾客进行监视，发现“情况”及时报告给“黑特机”。

“黑特机”向萨哈亮直接派驻人员只1名，是“露班”外围工作员廖尼亚，他当时的公开职务是看管本餐厅的顾客衣帽及携带物品，实际是“黑特机”用来监视顾客的特务。

萨哈亮餐厅不但是黑河特务机关宣传据点，而且“黑特

机”也以此接待过日伪时期的一些高级将领。如：1942年5、6月间，关东军情报部长柳田元三中将来“黑特机”视察，为期两天。1943年，柳田元三再次来“黑特机”视察。1944年5月，关东军情报部长大居明夫少将来“黑特机”视察，着重对黑河白俄居民作了动员，他并以情报部长身份，向白俄保证在任何条件下给予生活优厚待遇。1944年后，日本军国主义为巩固北部防卫，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亲临黑河特务机关召集北部防卫高级将领秘密会议。同年夏，满洲宪兵总团司令官关成山来黑河检阅。1945年初，齐齐哈尔13部队长阿南大将（西部防卫司令官）在回日本就任陆相前，也来黑河特务机关视察并作机密指示。

（摘自《黑河文史资料》第4辑）

我所知道的日本大特务寺田利光

宝敦古德·阿必德

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乌尔金的翻译官、现在在日本奈良自由民主会馆工作的日本人冈本俊雄，最近写了一本书，名曰《一名布里雅特蒙古青年和一名日本青年的会见》。1981年，他将该书并信件几次寄给我盟海拉尔、鄂温克旗、陈旗等过去曾认识过的人。在此中日正常关系已经建立，中日友好关系日益发展的时候，这本书却引用了伪满在呼伦贝尔的日本大特务寺田利光的日记。继续沿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仍称寺田利光为“呼伦贝尔的父亲”。严重地歪曲了事实真相，令人愤慨。为此，完全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寺田利光部分史实写出来，这

其历史本来面貌，以正视听。

解放前，在海拉尔市头道街公园里矗立着一个日本军人的大铜像。他就是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呼伦贝尔之父”，而实际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特务寺田利光。

寺田利光生于日本明治22年（1884年）7月5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分配到日本军队里当了尉官。日本的情报机关为了培训到蒙古地方搞特务活动的人材，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外语大学，学习蒙古语和俄语。他精通了蒙古语和俄语，还会说一点汉话。

1918年至1919年，14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消灭刚刚诞生的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蜂拥入侵，日本也派遣了侵略军队，称之为“西伯利亚出兵”。寺田利光也参加了这个侵略军，并来到海拉尔，又去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他正式来到海拉尔是1927年，身份是“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嘱托”，实际是日本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自称是五等高等官，可能是少佐（少校）官衔。关于当时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出国后直接来到了哈尔滨，同哈尔滨的日本人安藤联系后，滞留了一个时期。和过去在哈巴罗夫斯克认识的俄国朋友也见了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于1927年冬天来到海拉尔，在日本人开设的松江旅馆定居下来。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这里雇了一名廿多岁的汉族仆人。这个人过去当过土匪，和一个日本妇女结过婚，是个可靠的人。”

寺田利光在海拉尔定居后，就积极开始了特务活动。他在日记里说：“我每天上街散步，平常穿中国服，对汉人说我是蒙古人；对蒙古人说我是汉人；对俄国说我是汉人。”又写道：“有一天，我在公园里坐的时候，有两个俄国人在那里坐着谈，其中有一个人问我，你懂俄国话吗？我回答不知道。于是他俩

就随便谈起苏联西伯利亚的一些情况。”

1928 年的夏天，他又和当时的海拉尔国民党军队的长官发生来往。他写道：“我认识了海拉尔的镇守使和他的参谋长。这位参谋长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给他的儿子教日本语。”这样，寺田利光逐步地扩大了他的活动范围，而且把手伸进了牧区。并且公开了日本人的身份，又增加了一些日本特务人员，如猪口。以后又来了一名精通蒙古语的日本人。他还利用从苏联逃跑出来的白俄军官阿塔曼、西苗诺夫、巴其西耶夫等人和他们的部下为其服务，唆使他们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搞破坏和侦察活动。在后期他特别注意呼伦贝尔地区的上层人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和呼伦贝尔都统衙门的大官们交上了朋友，我邀请他们到家里作客，也去参加他们较大的盛会。额鲁特旗总管凌升和布里亚特旗总管乌尔金等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了。乌尔金和我是1927 年认识的，他赠送了我一匹带鞍子的好马。”寺田利光在呼伦贝尔地区还收买了一些当地的流氓分子如汉布丁、桑巴拉、沙拉、那木斯来、宝彦等人，为他搞特务活动。寺田利光这个狡猾的大特务，如果感到他的走狗有一点不可靠时，就毫不留情地杀掉。比如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多次去蒙古和苏联搞破坏的沙日、那木斯来，就是在阿尔山附近被日本人所暗杀。

1932 年冬，苏炳文军队逮捕了寺田利光。但是，经呼伦贝尔蒙古官员说情，两个月就把他释放了。此事他在日记里写道：“额鲁特旗总管凌升和布里雅特旗总管乌尔金是救命恩人。”

1933 年初，日本侵略者完全占领了呼伦贝尔以后，寺田利光彻底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是日本陆军的现役军人中佐（中校）。日本政府授予过三等勋章，不久就升到了大佐（上校）。呼伦贝尔的一切大权统由他掌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工作太

忙了，有三个身体也不行。我有专用秘书，还有寺田公馆，我的公馆门前日夜有岗哨，我已经成了呼伦贝尔的王爷，有人称我是‘呼伦贝尔的父亲’，我决心为了满洲国，为了蒙古人而干，要为日本帝国打下不可动摇的牢固基础。”

日本侵略军占领呼伦贝尔地区后撤销了原来的副都统衙门，成立了伪兴安北分省公署，任命原额鲁特旗总管凌升为省长；又成立了伪兴安北分省警备军司令部（后改为第十军管区），任命布里雅特旗总管乌尔金为伪司令官。这些都是寺田利光的安排。他自己当了日本特务机关长兼伪兴安北分省警备军司令部顾问。因此，日本当局称赞他的功绩，称他是“呼伦贝尔的父亲”，而他的野心更大。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当了蒙古的大王爷和‘父亲’了。但是，我等待着指挥军队，进攻外贝加尔地区时期的到来。”又写道：“我到新京（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司令部小矶参谋长，介绍了呼伦贝尔的王爷情况。”

1935年1月，贝尔湖东部哈尔哈庙地方发生了武装冲突。在同年7月，寺田利光就亲自去贝尔湖北部阿斯尔庙附近搭帐篷，住了几天，详细地调查了该地区的地形和其他情况。他去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家属，为一般的旅行者。当时一起去的还有他的女儿寺田英子，这在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的涩谷大佐指挥的机械化部队，就是经由此地突然入侵蒙古边境的。而后被苏军全部歼灭。这件事也是寺田利光特务活动的阴谋产物。

1937年7月，寺田利光因患脑溢血死去。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纪念他的侵华功绩，在海拉尔头道街公园里塑造了他的大铜像，并称他为“呼伦贝尔的父亲”。但是，中国人民都知道这个铜像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者，是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大特务。日本投降后，海拉尔人民早已把

它砸得粉碎。

（摘自《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

“东边道特别搜查班”

杨凤桐

伪满康德2年（1935年）杨靖宇将军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活跃在磐石、桦甸、柳河、抚松等地，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者除派遣关东军、伪军警组成讨伐队外，又处心积虑地拚凑了一个特务组织：“东边道特别搜查班”，设在磐石县黑石镇内十字街南路西保甲所院内。特务头子是野崎指导员，下边还有个汉奸队长。翻译官外号“张大骂”，这小子是掌管“生死簿子”的，让谁死，两句话甭想活。里边的特务有二十多个，如外号“林大巴掌”、“徐大马棒”和降匪“滚地雷”、“黑虎”等。当时群众把这里叫“阎罗殿”。

这个特务机关，将抓来的人随便杀掉，他们叫“拉大脖子”。那个日本人野崎，兽性大发时战刀一挥就人头落地，然后挂在辉发河南沿大树上，有时挂在南卡子门上，故意让走路人看看。隔不上三四天，就又挂出几个人头来。由于这个特务机关随便杀人，那些小特务就大发横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稍不随其兽意，就给扣上“反满抗日”、“通匪”的罪名，横加残害。有钱的可以免死，没钱的就被杀头。即或不死，也落个终身残废。那年月杀个人还不如杀个小鸡，特务们自己也说，杀个人好比捻死个臭虫，那算个啥。据我所知，从成立到撤销仅2年7个月的时间，就杀了一百多人，打伤致残的就不计其数

了。

搜查班的院子很大，四周用青干柳夹的杖子，杖子外再拉上铁丝网，唯恐被抓去的人逃跑。

数九隆冬，天刚亮，就把所有捕去的人赶到院子里集合，一声口令，让自己把衣服脱掉，赤身露体坐在院子里。特务们用雪把每个人培起来，只露个脑袋，特务们管这叫“打坐”。几分钟后，一喊口令就都站起来，在院子里转圈跑。特务在后边用鞭子、木棒赶着。谁若是跑慢了，就挨鞭子抽、棒子打。跑有半小时后，再赶着往江沿跑。到辉发江中心冰上，又命令都跳进冰窟窿里“洗个澡”。出来后北风一吹，成了冰人。特务们管这叫“粘糖葫芦”。出来后，还得跑步。一直跑到冰化成水才算拉倒。回搜查班后，才让穿上衣服。特务们说这是“早操”。

饭后9点多钟开始审讯。刑法很多，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大挂、“抽烟卷”、“坐火车”。叫声不断，惨不忍听。

伪康德3年（1936年）农历七月间，抗联的一个小分队13人，在江南王小沟村南林子里迷路了，好几天没吃饭了，饿得走不动，向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问路，找吃的。不料这个坏家伙假意答应送饭引路，而暗里却告了密，搜查班立即出动大批武装打手，很快将那片林子包围了。经过激战，抗日战士弹尽粮绝，全部被俘。关在当时黑石国民优级学校的教室里。其中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没绑也没关，日本人还带他满街走，还给他买吃的、穿的，大伙以为这个小孩或许不能杀。约摸过了二十多天后，忽然这些人都不见了。有人看见说，都弄到老鸹砬子砍脖子啦。砍完又都扔到江里去了，连那个小孩也没幸免。这时人们想起了，当初鬼子那么哄骗他，还是为了让小孩说出杨靖宇将军的活动情况，可是鬼子是一无所得，所以把他也杀了。据说这十几个人都是野崎亲手用战刀砍的。杀了那么多人

还没过“瘾”，最后又凶狠地用战刀一连砍倒好几棵小树才了事。那个告密的老汉奸，土改时被枪决了。

（磐石县政协供稿）

伪满特搜班在扶余的罪恶活动

常子荣　杨凤楼　陈翼　纪仲三

“特搜班”这个名字是群众给起的。因为他们负有特殊使命，直接由伪满洲国警务厅派来搞专案的，不受地方领导，地方有关部门也无权过问。因此，他们所做所为，地方政府只能听之任之，敢怒而不敢言。故群众称他们为“特搜班”。

记得在1942年5至6月间，江北三肇地区遭到了东北抗联徐泽民部队的袭击，许多日本人被打死，监狱被打开，放走了政治犯，警察的枪支全部被缴械，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他们大肆逮捕和屠杀了无数青年学生和无辜百姓。我县和肇源是临县，仅一江之隔。因此，伪吉林警务厅就把我县沿江一带也列为抗联活动区，派来了以唐警尉、徐警尉补（外号“徐大马棒”）为首的特工队（即特搜班），以“整顿治安、回收武器、肃清匪患”为名，对我县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和镇压。并利用职权之便，敲诈勒索、贪赃受贿、霸占民女无所不为，群众恨之入骨。

这年秋天，特搜班来到扶余，住在“增盛谦”烧锅院内。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也就是10人左右。带队的是个日本人，叫河田警长，三十多岁，一脸胡髭，相貌很凶。执行的头子叫唐武华，是个警尉，榆树县人，也是三十开外的年岁，一脸奸笑阴

险。另一个外号叫“徐大马棒”，是个警尉补，三十多岁，大胖子，凶狠毒辣。他们不穿警服，只穿便衣，经常更换。上街打扮得怪模怪样，手提棒子鞭子，内插短枪，外挂手铐。他们首先找了一些“当地坏”，都是地痞流氓，做他们的爪牙走狗。有一个叫张廷芝的，是东园子张三麻子的儿子，他哥哥叫张廷玺，是扶余日本领事馆的捕快。张廷芝二十多岁，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净干坏事。还有一个姓曹的，是个下事的警察，其他就不认识了。总之，这些家伙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做了特搜班的帮凶，干了不少火上浇油的坏事。

特搜班活动的对象，一是上层人士他不惹，因为上层人士都有些权势，他们不在太岁头上动土；二是下层人们他不理，因为下层人们多是贫苦群众，在他们身上捞不到“油水”；主要找的是中层人物：在城镇商号的股东经理；在乡间是小地主、富裕中农，所说“闷头财主”。至于他们和当地警察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侵犯，避免是非。

特搜班的活动，首先利用他们的“狗腿子”搜集情报，提供线索。这些“当地坏”认为谁家有钱有枪，就带到“增盛谦”进行审讯。开始要枪，如果说没有，就是严刑逼供。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直到招供或者递到“门包”方能罢休。其次他们自己查访，上街挨门进去。如有礼貌不恭，招待不到的，就发泄其淫威。

他们把人带到“增盛谦”除用一般刑法外，还有什么“外五刑”，是把上衣剥光，用烧酒从头浇下，点着火一烧到底。“天庆丰”商号的郝凌阁，因为言语不周，叫郝趴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舔吃地上的粘痰吐沫。“增盛谦”院内有个大贮水池，十冬腊月，让人跪在池内，从头往下浇凉水，叫做“挂蜡”。徐大马棒带人到旅店查夜，对男旅客无端刁难，对女旅客

百般污辱，笔墨难以形容。如徐大马棒看中一个姓李的姑娘叫李桂兰，叫人给他说亲，人们慑于他的淫威，怎敢不从。婚期撒贴子，“拉大网”大操大办，送礼的、随钱的很是不少。徐大马棒既得人又得钱，而群众对他们的兽行“怕之如蛇、恨之入骨。”有的人说：“日本人坏，他们更坏！”“这些东西不死就没天理！”

记得过春节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单位（福兴号），突然电话铃响，原是“益增号”来的电话，说唐警尉、徐警尉补叫我和阎村儒就去。当时我吃了一惊，不知什么事，但又怎敢不去。我和阎村儒硬着头皮来到“益增号”的客室。只见唐、徐倒在炕上正抽大烟呢，中间点着烟灯，一旁摆着鲜货。经理张天秩、程近辰在一旁招待。才知道唐、徐听说我和阎村儒俩会唱京剧，才把我俩找来唱一段，给他开心解闷。结果一直到了半夜，商号给他俩准备夜宵，我俩才告辞退出，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特搜班在扶余城内折腾了3个多月，到了冬季才转到长春岭进行他们的罪恶活动去了。

长春岭是扶余的一个集镇，地处农村，大粮户很多，他们的活动就更加疯狂了。住在“德丰涌”烧锅院内，并设立公堂。仍先找一些当地狗腿子，有李向亭、柳万连等10余人给他们出谋划策，残害群众，达2个多月。

那年冬天雪大，他们坐着雪爬犁深入到各村屯，所到之处就是一场严霜。他们到农村对富裕户进行搜缴枪支。如果没有枪就严刑拷打，灌辣椒水、煤油，烧头发、烧阴毛。把人翻倒在地，仰面朝天，脑袋放在灶坑内，用茶壶往鼻孔灌水，把人呛得鼻眼冒血，昏死过去，用凉水喷醒再灌。有个乔网户搭（鱼房子的东家）由于没交出枪来，打得遍体鳞伤，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被枪毙。他们杀人，是把人用麻袋装上，拉到郊外，先

把人摔个半死，然后往麻袋打枪扔下就走。群众看到特搜班都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长春岭由于特搜班的进入，便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镇商务会为了缓和局面，特传旨意，命各店主事人，自选时间，主动去东烧锅院慰问特搜班人员，以表欢迎。但老板们私下相议论：讲欢迎，实属悖心；谈慰问，空问不如实慰。但实慰当如何进行？尚无定论。有人倡曰：听说班中喜欢玩麻将，吾等何不以此联欢？此议赢得了赞同，于是烧锅院内，顿时几场麻将，轮流不停。

上屋人们打麻将，欢笑取乐，而下屋内外，则愁云惨惨，不时听到：呼爸喊娘、叫苦连天的哀声。特搜班的恶棍们在拷打无辜良民。严冬腊月，有的人被剥去上衣，推至院门的正中井旁，或立或跪，狂徒们往被抓人身上泼凉水，使之“挂蜡”而后快。更有甚者，用热酒泼在人们的肉体上，然后用火点燃，火烧肉痛，满地乱滚，令人惨不忍睹。而那些恶匪，不准你喊叫，否则往口中扬草灰，眯眼、呛鼻、堵塞呼吸，痛苦何如！

屋内老虎凳上，还绑着一个，说他有枪，可他又拿不出来，只得任其折磨。旁边站一恶徒，提一水壶，水内掺合小米，他声嘶力竭地向被绑人要枪，被绑人说声“没有”，只见那人面兽心者，一手拽你头发，一手往你嘴里灌米水。使受害者头发直立，浸出血迹，真是人间地狱，惨无人道！

特搜班害人的消息传出去以后，远近震惊，人心浮动。有权势者，尚能静坐观变；无力抗拒者，或逃之夭夭，或深藏密隐，以避其锋。惟家中乏人，困于事务，则趑趄不前，惟有听天由命。

距岭街40余里，石桥附近，有姓吴者，家有一女，姿容秀丽，被唐警尉迷恋，意欲纳妾。托人通融，女方不允。恶贼乃

昧尽良心，诬陷吴家有枪，而逮捕女儿。将欲行刑，女知贼意，不忍胞兄被贼摧残，乃下定决心，舍身救兄。于是出面，向唐等明讲："枪事我兄不知，问我好了。"匪徒一听，心暗喜，乃释其兄。之后，吴女含悲泪被唐逼走了。

这样一来，特搜班更觉得事事都有利可图，于是便天天在商号"天增太"内设赌，找一些士绅富户打牌，名为娱乐消遣，实际是"勒脖子"。被找的人不敢不来，如果合了牌，徐大马棒就破口大骂："他妈的，让你们赢钱来了？"吓得人们不敢合牌，也就是只准输不准赢。来的人战战兢兢，每次赌博都得输下大量伪币，这个野兽方能称快。另外通过他们的爪牙，向遭事的人"卖关子"，说人情，以大量的伪币进行通融，可以免去皮肉之苦。当时群众说特搜班这伙禽兽："不怕偷，不怕烧，就怕特搜班走一遭。"

每到晚间他们故意敲打商号的门窗，开得慢一点非打即骂。一次白天这伙人到商号"天发隆"，店员傅振刚迎接慢一点，徐大马棒抓住傅的头发，拖到"德丰涌"院内，用火把傅的头发点着，把傅烧得焦头烂额。从那以后，青年们不敢留长发。

住户夜间都是早早关门闭户，怕惹是非。小孩哭闹，大人就说："唐警尉、徐大马棒来了。"吓得小孩都不敢哭。他们在长春岭周围活动那一段时间，受害者不计其数，简直是一场瘟灾。

（扶余市政协供稿）

大石桥的巡捕与狼狗

曾有训

伪满时，我在吉林省城税务监督署经理科担当用度股长。“九·一八”事变第二年的3月间，我的表兄边德昌由辽宁省海城县城西红草泡屯来到我家。说他让“洋拉子”（就是巡捕腿子）“拉”啦。这个巡捕腿子心肠狠毒，一般人谁都不敢着他的边，都称他“洋拉子”。我表兄说：要是被他“拉”着一定要喂狼狗的，所以我偷着跑到你这里来。他说：“大石桥的狼狗可厉害了，尽吃活人，日本宪兵和警察经常用活人做饲料。他们雇了很多巡捕，而巡捕又用许多巡捕腿子给他们探事跑道。这些巡捕腿子为非作歹，经常到村子里去，用栽赃的手段敲诈百姓。因为我们老两口收入多些，这个巡捕腿子就到我家敲诈，硬说有人告我是反满抗日，还说我有枪藏起来了。我说你能翻出证据吗？可是他不在我家翻，却把我带到屯的东南角的一个小庙里，从庙里拿出一支破枪。说告你的人说这枪是你藏的。我乘找个机会跑到你这里来了，请表弟设法托人救我的命吧。”

过了三四天，可巧税务科的李翻译到我家打麻将，我就把我表兄的经过对他说了。当时李翻译认为是欺诈。他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心傲气盛，就说，“不要紧，大石桥翻译我认识一个，明天拿我的信去，保证他没危险。”我又问李翻译大石桥那个狼狗作什么用的，为什么用活人喂呢？他说：“那些狼狗是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养的，是经过训练的，抓着的‘坏人’问成死罪的就喂狼狗。”我们一同打牌的3个人都问他：既然问成死罪

枪毙就完了，为什么要喂狼狗呢？他说："喂狼狗需要用肉，用坏人喂就不用再买肉了，可以省许多钱呢。"我们又问他狼狗怎敢扒活人呢？他说这是训练出来的，日本人用谷草扎成草人，外边穿上衣服，然后把很香的肉，塞在草人的肚子里边，一两天不喂狗，在狼狗饿急的时候就把草人抛到圈里。狼狗闻到香味就扒草人的肚子吃肉，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在它饿的时候，不管真人还是假人，遇到就扒肚子。当时他也说这样太残忍啦，被扒的人不能当时就死，真不如一枪打死呢。

当天晚间，李翻译给我送来一封信，信皮写的是大石桥王巡捕亲拆。由于李翻译的这封信，我表兄才免遭于难。

五

伪满法院、监狱、警校

日伪抚顺地方法院和抚顺监狱

方　觉　姚云鹏

一、抚顺地方法院

抚顺地方法院，是日伪法西斯政权的反动统治工具，也是残酷镇压抚顺人民的执法机关。抚顺地方法院，统治抚顺人民整整14年，它活象一口吞噬生命的恶虎凶狼，在漫长的日伪统治期间，难以数计的中国同胞和爱国志士，葬身于它的虎口之中。

抚顺地方法院是从1929年正式建立起来的。首任院长为陈继祖。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陈继祖工作调动，接任院长为孙振魁。

抚顺地方法院，当时位于千金寨（今西露天矿大坑中心）的新市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伪满州帝国。由于抚顺炭矿采煤计划安排，千金寨一带即改成为西露天掘，即所谓的“大揭盖”。千金寨的新市街一带必须迁移到发电所（现抚顺发电厂）以西地区。在第一批房屋动迁时，抚顺地方法院便迁至抚顺市区中心新站（抚顺南站）地区的西十条通，杨柏河东岸路南。从这时起，直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做为日伪反动统治政权的国家机器之一的抚顺地方法院，就一直设在这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中华民国的抚顺地方法院，不但没有被日伪解散，反而被保留了下来，并且保持了原有的

编制。原抚顺地方法院全体官职人员，均被暂时留用。既不调走，也不免职，原任职务一律不动，只是附加“暂代”二字或“代理”二字。如：

抚顺地方法院院长：由孙振魁代理。

抚顺地方法院推事：由张树犹、黄大熙代理。

抚顺地方法院候补推事：由丁羽丰代理。

抚顺地方法院书记官长：由富世霖代理。

抚顺地方法院书记官：由王振汉、董玉田代理。

从日伪统治时期开始，抚顺地方法院的原有司法人员，虽一律暂时留用了，但事实上，日伪当局却一直在努力培养新的司法奴才。他们成立了法律系的大专学校，造就了一批年青的“满系”司法人员。同时从日本国内，抽调和征集了一批有利于推行和配合实施各种法西斯政策的日本“少壮派”，充实了各级司法部门。同日伪政权的其它部门一样，虽然是二把手，即所谓“次长”一类的职务是副职，但真正掌权说了算的却正是这种人。当时伪满各地司法机关中直接决定生杀大权的，也正是这样一些日本人。

伪满大同3年，改年号为康德元年，即1934年，日伪抚顺地方法院的司法人员，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清理、大整顿、大换班。从前留用的，曾在中华民国时期任职的“旧官员”一律给以免职。正式任命了一批被日伪当局确认为合格的新的司法官员。大改组后的抚顺地方法院的班底是这样：

院长：许育理

庭长：沈德兰

推事：曾传裘、王钟庚

候补推事：李树荣、李恒钦

书记官长：邓伟韬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5年，即1936年（康德3年）1月4日，伪满洲帝国政府正式颁布了《法院组织法》。同年7月1日起实行。按《满洲帝国法院组织法》之规定，全满洲国分设四级法院，即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及区法院。抚顺地方法院直到这时才算正式成立。40年代初，即1940年（康德7年），抚顺地方法院又设立了下属分院和分庭，即兴京（新宾）分庭、抚顺区法院、清原区法院及兴京法院。

从1934年（大同3年改年号为康德元年）到1945年（康德12年），总共11年的时间里，抚顺地方法院已完全成为日伪法西斯政权的反动统治工具。现将历届日伪任命的院长及次长名单列下：

1936年（康德3年）

院长：郭鼎周（满系）

次长：渡边太敏（日系）

1937年（康德4年）

院长，郭鼎周（满系）

次长：渡边太敏（日系）

1938年（康德5年）

院长：郭敏珍（满系）

次长，关隆三（日系）

1939年（康德6年）

院长：郭敏珍（满系）

次长：关隆三（日系）

1940年（康德7年）

院长：宋树元（满系）

次长：空缺

1941年（康德8年）

院长：杨洁民（满系）

次长：栗木义之助（日系）

1942年至1945年

院长：王永兴（满系）

次长：栗木义之助（日系）

1937年（康德4年），伪满洲帝国的法令议会，以中华民国所颁布的《刑法》为蓝本，又根据伪满洲国的所谓“国情”制定并颁布了满洲帝国《刑法》。

伪满洲国刑事审判重点，其矛头所指的主要审判对象：乃为“反国家之思想行动”的人，亦即组织参加反满抗日活动之人。早在《刑法》颁布以前，1932年（大同元年），日伪当局最先颁布的法令是《暂行惩治叛徒法》。按该法规定：“凡意图紊乱国宪及危害和衰弱国家存立之基础，而组织结社者，首犯处死刑；其他指挥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参与谋议或加入结社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用以镇压中国人民，屠杀我爱国同胞和革命志士，以巩固和加强日伪法西斯政权，为妄图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的侵略政策和霸权野心服务。

根据《暂行惩治叛徒法》这一反动法令，伪满奉天省高等法院，仅从1933年（大同2年）到1935年（康德2年），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以“叛徒”（反满抗日）之罪名，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重刑者，有124名之多。与此同时，日伪司法部门，又以所谓“盗匪”之罪名，判刑5 570人。而所谓“盗匪”者，实际上很多是爱国抗日的仁人志士。而其中的绝大多数被判为“盗”或“匪”者，又多半是抚顺、新宾、清原三县的抗日自卫军和杨靖宇将军领导的各部抗日联军将士。

另外，据伪满奉天省警务部门的统计，自1936年（康德3

年）至1942年（康德9年）的6年时间里，全省警务部门共检举（即起诉）各种刑事案件84 509件，其中，“盗匪”罪4 444件。又据《奉天政史》记载：从1932年（大同元年）至1940年（康德7年），在8年的时间里，日伪军讨伐抗日武装游击队共2.86万多次，杀我抗日人员1.1万多人。

1937年（康德4年），伪满洲帝国政府颁布了《刑事讼诉法》。

由于伪满洲国政府刑事、司法的重点是惩治所谓“反国家之思想行动”的人，所以于1938年（康德5年）5月，在全满各省高等法院增设治安庭，将“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交罪”、“军机保护法中之重罪”和“《暂行惩治叛徒法》之罪”等五类案件均划归高等法院为一审。1941年（康德8年）8月25日，伪满洲国政府司法部公布了《治安庭审理治安案件的特别程序》，这一“特别程序”规定，一经所谓《判决》，被告则无任何上诉或申辩的权力。《特别程序》规定，对上述五类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即一经审判，即为终审，不给当事人以上诉权，不给被告人以申辩权。

1941年12月27日，日伪又公布了《治安维持法》。该法规定：“为了加强治安，司法、检察机关与军警系联合行动，审判官、检察官伴随军警讨伐活动，身临现场，就地裁判。”这是日本法西斯杀人手段的新的升级，所谓“就地裁判”，无非是就地杀人“正法”。

日伪抚顺地方法院所受理的一审案件，都是由抚顺地方检察厅所指派检察官，代表伪满州国政府，向所谓的“被告人”提出公诉。而抚顺地方检察厅所提出公诉材料的依据，就是根据特务、司法人员的非刑拷问，抽筋扒皮式酷刑行讯下的所谓“口供”。当时许多被告者，能经受其酷刑而不死、得以进法院

接受"审判"者，也是寥寥无几的。多数人死在黑"官司"的非人刑讯之中。因此，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四句民谣：

警察（厅）宪兵（队）阎王殿，扒皮抽筋家常饭，九死一生难保命，百里挑一进法院。

抚顺地方法院，在日伪统治下的14年里，前7年的案件审判，既无法律凭据，又无法律根据。直到1937年（康德4年），伪满洲帝国政府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维持法》之后，所谓"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交罪"、"军机保护法中的重罪"、"《惩治叛徒法》之罪"等有关五条罪状，能执行这一审判权的，也只有奉天省高等法院，而抚顺地方法院则是无权提出审讯和公诉的。

根据《治安庭审理治安案件的特别程序》，奉天省高等法院所实行的一次终审判决，其用心显然是依法剥夺当事人（被告者）的上诉权利。不问有无冤情，不问青红皂白，更不管是否屈打成招，杀剐存留，全凭高等法院一句话，一审定案。由此可见，在日伪统治时期，所谓执法机关的法院，就是这样的无法无天，公然地执行法西斯式的暴行手段，强行裁决，强行审判。在这种法西斯高压手段下，失去祖国庇护的东北同胞，无异于任人宰割的羔羊。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黑暗的所谓"审判"之中。

二、日伪抚顺监狱

抚顺监狱，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设立，距今已有56年的历史。监狱设置之初，地址设在千金寨新市街。按全省各地监狱的号数排列顺序，抚顺监狱排为第15号，所以抚顺监狱，又称为"15号监狱"。那时，在监狱大门之上，只挂一个小方块牌子，上写"15号"3个字，而并不挂什么"抚顺监

狱”的牌匾。抚顺监狱设在千金寨新市街时，规模并不大，只能收容几百名所谓犯人。不仅监狱的占地面积很小，而且也没有让犯人劳动的工厂辅助设施。收监的犯人们，无非多是赌博犯、斗殴犯、吸毒犯、盗窃犯等。1937年（康德4年）以前，抚顺地方法院根本无权审理政治案件，无论是所谓“盗匪”案，还是“政治犯”、“思想犯”等案件，都必须经奉天省高等法院审判，并且是一审判决。

抚顺15号监狱，在千金寨未搬迁之前，监狱四周的高墙之内，只有9排平房。在关押犯人的牢房之中，担任杂务劳役犯人，每天都要带着脚镣，推或拉着木箱式的人力车，去千金寨市街内、杨柏桥、大官桥等地拉“路倒”（“路倒”就是无依无靠，无法生活而冻死、饿死在街头的一些穷苦人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千金寨新市街因西露天矿加大剥离而逐渐缩小，抚顺监狱地址日益接近西露天掘大坑的北沿。所以抚顺监狱的搬迁问题，已成为燃眉之急。1937年（康德4年）11月，伪满洲帝国政府颁布了《监狱法》，同年以司法部大臣张焕相（抚顺县新立屯人）、次长及川德助（日本人）名义，又颁布了《司法制度》（《满洲国现势》，康德5年版）。在此情况下，早于1935年开始兴建的抚顺监狱，于1937年（康德4年）已竣工交付使用。于是，抚顺监狱遂由千金寨新市街，迁往浑河北岸的高尔山下。

以1939年（康德6年）6月计算，奉天省全省各地监狱，总计收监服刑犯人约3.1万多人。抚顺15号监狱搬迁之初，收监服刑犯人有1 000人左右。监狱警察等管理人员只有100余人。监狱长为金成龙（满系营盘人）；副监狱长为谷川英一（日本人）。抚顺监狱收监服刑犯人最多时，曾高达3 000余人。

抚顺解放当时，新调至抚顺监狱工作的张××（现已提升

为领导干部）曾回忆说："刚转到抚顺监狱工作时，仍觉得有一种阴森恐怖之感。尤其看到刑场上的绞刑架，更令人毛骨怵然，绞刑架的两侧，立有两根绞架木桩，中间有一付绳索。把绳索套在犯人的脖颈之上，两头使劲，紧拉绳索，逐渐绞紧。日伪时期，对犯人用绞刑时，并不是一次拉紧绞死，而是绞到犯人即将窒息昏死时，再用冷水喷醒过来。这样，绞昏了再喷水，醒过来再重绞。如此几个反复之后，把犯人活活折腾死。最后，在日本人的监督下，狱警再向犯人腹部猛踢一脚，犯人才能痛苦地最终死去。"他又回忆说："监狱真是人间的活地狱。在监狱的地下室里，设有电刑，把犯人绑在水浴缸中，往水中通上电流，让你死不得死，活不得活，残酷得让你活遭罪。"

凡关押在抚顺监狱的犯人，只要脑袋还硬，可以起立走者，不问病残如何，是否身患重疾，必须天天到监狱工厂服劳役，稍有不服管教，或有越狱逃跑可能的人，轻者关独居禁闭，重者施以暴力惩罚。据日伪抚顺监狱的工作人员巴恩秀回忆说："伪满时期曾在抚顺监狱关押过的犯人，如石翔振（左鉴）、贾富英等人是知识分子，还有张力久（张贵恒）是领头的，抚顺城南关的佟聋子（佟宝功）等，这些人都已被杀掉了。石翔振、贾富英被判处有期徒刑，关押于抚顺监狱。张力久、佟宝功烈士，曾于1937年11月，被日伪当局枪杀于沈阳小河沿。"

抚顺15号监狱，自1937年（康德4年）以后，收押服刑犯人日益增多。尤其是从1944年（康德11年）到1945年（康德12年），日伪政权即将最终崩溃前夕，收监服刑犯人最多时，曾关押过3 000余人（包括分监在内）。由于监狱工厂的劳动强度太大，劳动时间过长，饮食营养很差，犯人的体力消耗过度，加以缺医少药，根本谈不到保健医疗，因而造成疾病死亡的犯人，日益增多。

附录

日本战犯大村忍的亲口供词：

问："现在把你在抚顺监狱任职中的罪行谈一谈吧？

答："我是1945年6月，转任到抚顺监狱的。这里关押的人都是'窃盗'、'强盗'、'杀人犯'，还有'政治犯'，共有800人左右。在这里有一个人想逃跑，我曾打过他，并加了手铐，关了单房。在我任职的一个半月中，因病死去的有六七个人。死后，有的家属取去尸体，有的掩埋在后山下。不过埋的浅，被狗吃掉了。"大村忍继续在供词中称："那时，西制油厂有一个支署（分监）也是归我管辖。古闲真平（日本人）任支署长。那里关押2 000余人，在煤矿劳役。由于瓦斯多，营养不足，医疗设备很差，无正式大夫和病室，很多人死亡了……"

大村忍任抚顺监狱长仅仅几十天的时间，在日伪当局的残酷迫害下，关押在抚顺监狱里的"犯人"，就死去六七人之多。可以设想，抚顺在日伪法西斯反动政权长达14年之久的铁蹄蹂躏下，将会有多少人被摧残折磨死去！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伪满四平检察厅简介

姚洪山

一、伪满四平街地方检察厅是1937年12月1日在建立四平街市公署的同时，设立的检察机构。1941年7月1日成立四平省，四平街地方检察厅改名为四平地方检察厅。四平地方检察厅是掌管搜查检举起诉和执行的刑事犯罪案件的司法机关，它

包括四平街区检察厅。四平地方检察厅，隶属于“新京”高等检察厅。四平地方检察厅和四平街区检察厅虽为两个机构，却是一套人马，合署办公，公务人员均需兼办两个厅事务，只不过在受理案件时，按情节轻重分别受理。四平街区检察厅的监督检察官、检察官、书记官均由四平地方检察人员兼任。初设在北站铁路局督办公署院内，后移到今四平市中央西路建平街61号道北二层红楼，现改为五交化公司。处理一般刑事案件、经济案件、违犯鸦片麻药法等案件。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重要和其他原因，决定了它的特殊性，其权力之大，管辖区域之广，非其他地检所能比拟。它位于“南满”铁路、“平梅”铁路和“平齐”铁路三条铁路线的交叉要道，又是四平省省会所在地。因此除管辖四平街区检察厅、昌图区检察厅以及郑家屯等区检察厅辖区内所发生的刑事案件和区检的上诉案件之外，凡在这条铁路线上和列车内所发生的一切刑事、经济案件，也都有权管辖。如列车上发生的“犯罪”案件被铁路警护队拿获时就要送到四平检察厅处理，这是与其他地检最大不同之处。从而受理的案件也常常多于其他地检。

二、四平地检的首长为厅长和次长，厅长先后有高儒林、薛树平、祝华封。次长松浦一雄是日本人检察官，兼四平区检监督检察官。论其职位只形式上次于厅长（满系人），但实权却掌握在他一人之手。本着伪满当时确定的“检察一体”的原则，即下级服从上级首长指挥的原则，凡地检和区检不论满、日检察官承办的一切案件都必须向次长请示裁决后方能照办。一般说来原则上次长还能听取和采纳原办检察官（不分满系和日系）的意见，有时则反其意而为之，这时承办检察官就得违心地唯命是从。更为特殊的是松浦次长还兼任通辽地检次长之职，这实际上就等于是两个地检的次长。因此通辽地检及其属下各区检

如兴安区检（设在伪满兴安总省所在地兴安街，即科尔沁右翼前旗旗公署所在地、今乌兰浩特）所受理的要案、重案、疑案也要由远地前来四平请示次长表态，然后才能处理。例如1943年春，白城铁路警护队，在由白城到兴安铁路中段“葛根庙”附近的铁轨旁发现一个“道钉”，硬说是该处的附近村民某某故意放置的，企图制造列车脱轨事件。此人是去北边出劳工回来不久，在家闲居，认为其形迹可疑。同时又在其家中搜出了有类似道钉的铁钉，于是将此人逮捕审讯。在严刑拷问之下，被疑人屈打承招，于是以妨碍列车通行的交通事故刑事犯罪罪名送到兴安区检处理。嗣经该厅检察官讯问调查，被疑人拒不承认，否认了全部供词，并声称原来供词是由于受刑不过被逼说出的假话。这样不得不去四平向松浦请示，最后还得松浦说了算。

又于同年夏天，兴安区检处理一起“西瓜事件”。原来科尔沁右翼前旗盛产西瓜，兴安街的一些投机商和各机关的公务员互相勾结，以谋取暴利的目的，以每市斤两三分钱的价格，购买大量西瓜，用火车运往四平、沈阳、抚顺等大城市，再以每斤一角左右的高价出售，从中获得高额利润。但有向外地输出“许可”的“蔬菜组合”（公司），却未曾作这笔一本万利的生意。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舆论很大，说什么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此熟视无睹，无人过问。当时兴安区检检察官闻此消息，了解情况属实，确有其事。但这个问题牵扯面很广，办起来恐多方掣肘，惹起麻烦，但若不予过问，又未免失职，还要被市民们所非议。因此又向松浦汇报情况，请示如何对待，在他的“依法办事”的授意之下，乃亲自到车站查看，果然发现满载一列车西瓜，约有三四万斤，正准备向上述外城运出。当即责令车站货物处停止发车运出，同时告知货主按当地政府规定的公定价格出售。因营利目的未遂，不予追究违反经济法令责任了

事。对已经获得高额利润的违法分子，要予以追究法办。于是通知旗公署经济警察检举送案。有些人或闻风潜逃，或消声匿迹，结果只拿获3人归案。其中一名是兴安街开豆房的经理杨子丰，其余两名是机关职员，名叫张玉坤、赵广智。讯问结果，3人在警察署所供认的主要问题属实。杨向外地贩卖西瓜若干，获得暴利几千元，张、赵各获得暴利几百元。于是以违反《不当利益取缔规则》经济法令罪名起诉于兴安区法院。法院对3名被告人用“略式”判决各处以罚金300元（最高法定刑）。因杨得利润太多，在区检授意之下，自愿向有关部门献纳（捐献）伪币千元。对案件当事人的处理，或放或罚，都是遵循松浦的意旨行事。由此看来，松浦次长所管辖的范围就纵跨南北两个省份。因此可以说他俨然是四平检察机关的太上皇一样，在他管辖区域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四平地检的权力高于其他地检，而其至高至大的权力，又集中于松浦一人之手，这是“日系”次长中既异乎寻常又普遍的情况。笔者当年曾置身于兴安区检（1943年至1945年），故知真情。

（摘自《四平文史资料》第一辑）

伪满北镇县法衙与矫正法

潘守安

旧社会里广大群众曾流传一种俗话说，“衙门口儿向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有钱没理请进来，有理没钱你别进来。”这几句俗话是劳动人民对旧社会包括伪满时期法衙的一种讽刺。在

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吃官司，无论怎么有理，也是打不赢官司的。伪满时期，笔者曾在县法衙当过多年代书（为原告写呈子），对当时法衙内幕略知一二。故回忆如下：

伪满时期北镇和其他各县一样，仍按照国民党时代兼理司法县公署的旧制度，名义是北镇县兼理司法县公署。内部组织是由当时（1943年）伪县长鄂舒敏任兼理司法行政长官，下设承审员1名、书记员1名，办理民、刑案件，审判记录事宜。另外由县长临时采用雇员若干名，专司缮写判词、批示和其他文件工作，并从中抽出1名雇员，掌管会计和收费工作。司法收费可分三种。一种是，根据诉讼当事人所递呈状篇幅大小、文字多寡作为收费的标准。每百字收费3角，名为抄录费，实际诉讼当事人自己早把呈状写好，还用什么抄录呢？不过巧立名目收钱而已。另一种是，呈状纸费，在诉讼当事人要成涉讼时，首先必须到司法县公署拿钱购买衙门印的各项状纸，没有这样的状纸拒绝受理，也可以说不接受你打官司。当时状纸可分为六种：①民事诉状用纸；②刑事诉状用纸；③保状用纸；④和解状用纸；⑤交状用纸；⑥撤销状用纸。各种用纸收费不一，民刑诉状每张收费8角或1元，保状每张收费1.2元，和解状每张收费6角，交状、撤销状每张收费4角。其中各种状纸收费不同的原因是：民事诉讼大部份为争执财产物品，对原告有财产利害关系，刑事诉状直接触犯伪国刑法，间接亦有生命财产关系，故收费较高。民刑收费区别是：民事状纸每张收费1元，刑事状纸收费少2角。保状为了保人而保钱，保人是保证被押人释放出监不外逃，保钱是提供保证金，要求司法衙门释放被押人，因为两者关系大，所以收费多。和解状纸是诉讼当事人双方，通过中人说和，双方让步和解时使用的，所以也收费多。交状是当事人向官家交付财物故收费较少。撤销状纸是在涉讼中途司

法机关不愿继续受理，勒令当事人撤销诉讼，或由原告自动撤销时使用的，所以收费较低。

除以上六种状纸收费外还收讼费。所谓讼费是根据诉讼当事人所请求，事情大小和诉讼财物多寡而定。例如原告向被告索要债款1 000元，可收讼费4%；1 500元以上者，可收讼费3%；2 000以上者为2%；1 000元以下和不满100元收5%。在收讼费之外还有两种收费，一种是预纳金，另一种是送达费。所谓预纳金是诉讼当事人在呈递诉状同时，首先预交现款3到5元，该款由官家代为保管，预备在诉讼进行中出现小花项以此预纳金支付，不足再交，如有盈余，在诉讼结束时返还交纳人。送达费是司法公署给诉讼当事人送达定期开庭审理传票或批示以及判决书裁决书其它文件等，向当事人要的钱叫作送达费。例如一张八裁的白纸除了印的日期官衔外，所填写的仅不过是年、月、日数单和原被告姓名以及事件事由，刑事案送达费3角，民事索送达费4角。以上这些仅不过是涉讼当事人在司法机关诉讼所应承担的各种花费。另外如主审人贪赃受贿，颠倒黑白，营私舞弊，当事人所花的钱更难以数计。1933年（伪大同2年）北镇兼理司法县公署承审员是吴某，他是台安人，此人生性贪婪，行动卑鄙，善於拍马吹牛，逢迎奔走。当时高等法院院长是于宗海。吴某在于宗海面前阿谀奉承，颇得于宗海的信任，因而荐派吴为北镇兼理司法县公署承审员。到任之后审理案件是一塌糊涂，谁有钱谁就打赢官司。

承审员依靠职权对诉讼当事者勒索是相当严重的。要想打赢官司就得运动承审员，不然，你有天大的理，也难得胜诉。在1934年3月间，北烧锅屯住户李广成控告边家店董瑞祥，请求交付尾欠地价80元。其事实理由是，李广成自幼务农为业，幼年给粮户家（即地富分子）放猪放羊，中年给地富家扛活，因

为节衣缩食积蓄土地12亩，该地坐落在边家店屯北处。李广成因病需款和春耕缺粮遂烦中人李广有、李广富情愿把该地出卖给董瑞祥名下。李广成土地和董的土地毗连，如不卖给董，别人也不能要。因此以廉价123元卖给董瑞祥之妻董刘氏。双方协议之后书写土地买卖契约，当时交付地价43元，尾欠80元缓两期交付。但买卖土地契约上面仍按过去老规矩，写上地价，笔下交清分文不欠等字样，这是过去沿用的词句，也是通俗的惯例。可是到期李广成索款时，董瑞祥硬说地价早已付清，这充分暴露了旧社会里地富分子，对穷苦农民剥削榨取时一种卑鄙手段和无耻行为。李广成无法才到县衙告状，缴纳一切费用后才被批准受理，定期开庭审理，当时李广成自己以为理直气壮的官司一定能打赢，可是承审员说："你的官司我已经调查好了，董瑞祥买地的价款已经给你了，如果没给的话为什么你的卖契上面写其钱，笔下一次交足分文不欠呢？为什么你给划押呢？"李广成听了犹如晴天霹雳，忙着说："欠我80元地价确实没给，这事中人都知道"。承审员说："不用问中人啦，私凭文书官凭印，没给你钱你能干吗？赶快把案子撤销吧！"但李广成并未撤销。承审员见他不撤销没法结束案子，就给裁决停止审判程序。李广成接受了裁决书，官司没赢还得交纳送达费，真是有冤无处诉。李广成连气带上火，卧床好几个月。李广成的官司为啥竟得到这样结局呢？原因是董瑞祥和城内商务会长彭化邦有交情，他见李广成告他，自知理屈，就暗中托彭化邦给他设法向衙门里说话。这位承审员到北镇之初，彭化邦曾以商务会财物用自己的名义给承审员安家办桌椅、锅灶等等。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所以彭化邦一说，承审员就答应了，把这案子就糊里糊涂地判了。

在1943年7月间，有位天津人叫薛久涛，是一个诱骗出卖

妇女的人贩子。他一贯在天津一带诱拐良家妇女，到东北卖入娼窑为妓女，从中满足个人私欲和发财致富。此次薛某在天津诱拐妇女孙氏1名和姓徐的青年姑娘1名，从天津搭火车打算到沈阳南站妓馆去卖，在火车上露了马脚，被铁路警察查获。车到沟帮子站，把薛他们交到沟帮子警察分局，转送到北镇兼理司法县公署。吴某审理时，见薛久涛和两名妇女穿带不俗，举动阔绰，言语伶俐，审讯后没扣押，准许取保缴纳现款保证金50元，保外候审。薛久涛遂找妥北镇县著名官司店李大娘们儿的店保。以后竟给薛久涛下了判决书，主文上曾记载判处奸拐犯薛久涛有期徒刑6个月，如不能服刑役时应以现款1元折合监禁1日，结果薛犯交纳保证金50元，又缴纳折抵徒刑款180元了事。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见到伪满时期县兼理司法县公署在审判案件中对贫者与富者是不公平对待的。

北镇县兼理司法公署在1936年（伪满康德4年）7月1日改组为北镇区法院、区检察厅。在改组之前从新京司法部派来一个日本人名叫赤田游广为北镇区法院、区检察厅主任。他到北镇后即会见伪县长鄂舒敏、副县长椎业鸠民、承审员刘启汉，三方研究有关开办院厅程序。在6月下旬，把兼理司法县公署的一切档案卷宗和备品，迁移到伪县公署东邻外号人称“李大钱搭子”的院内。上屋5间当中1间为甬道，东两间为法院办公室，西两间为检察厅办公室，西下屋3间为法庭，东下屋3间南两间为刑事候审室，北1间为检察厅侦查室后改为搜查室，中庭3间当中1间为过道，东1间为检察厅会计课，西1间为登记课，中庭外院东下屋3间，南2间为民事候审室，北1间为一般候审室，门房3间当中1间大门，东1间为备品仓库，西1间为法警室，临时作主任办公室，后改为传达室。内部组织：法院方面

审判官兼院长（李萨楠）下设监督书记官和书记员各1名，雇员3名，翻译官2名，杨佐清（长春范家店人）、杨月波（锦州市人）。分五课，即民事课、刑事课、行政课、会计课、登记课。检察厅方面，检察官兼厅长下设刑事事件课、执行课、刑务课、会计课（和法院在一起）、外务课。筹备就序后于同年7月1日举行法院检察厅开幕式，届期锦州高等法院次长日本人名叫桑三荣吉亲自到北镇主持一切。由此北镇成立区法院、区检察厅，统归黑山地方法院、地方检察厅所属。至于审级和事件管辖制度，依照伪法院组织法规定，为四级三审制。所谓四级，是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及区法院。三审制是诉讼案件从区法院起诉者到高等法院为三级终审，从地方法院起诉到最高法院为三级终审。伪法院组织法还规定，民事案件诉讼额千元以上者从地方法院为第一审到最高法院为终审，千元以下者从区法院起到高级法院为终审。刑事案件犯一年以下徒刑者由区检察厅起诉到区法院判决。犯一年以上徒刑者由地方检察厅起诉到地方法院判决。公元1942年（伪满康德9年）派来一个伪法学校毕业生王文荣为北镇区检察厅检察官，该人系辽中县小新民屯人，其父在辽中小新民屯开大车店。他日本话说得好，骄奢淫逸，贪婪无厌，来北镇县时先携一妻，后来一妾，3人居住德盛店内。王文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为效忠主子，在北镇干不少坏事。

1944年末，颁布了"思想矫正法"，北镇检察厅内设矫正局。因此王文荣的权势越来越大，积极豢养得心的打手周玉山，别名小周子，委为庭吏。周玉山终日从城内到乡村捉拿反满抗日的思想犯，人民的一呼一吸，都属于王文荣的管辖范围，他的权势所及无孔不入，人民群众畏之如虎，因而无辜农民和一般劳动群众被捕入狱者，不可胜数。由于长时间羁押不闻不问，含

冤死亡者大有人在。如义县烧户营子到北镇赶集的农民朱永年被捕下狱，在下狱之前检察厅书记官张子德曾用电话报告王文荣，并请火速侦查处理。当时正赶上王文荣家里妻妾吃醋争风，大打特打，王文荣如热锅上的蚂蚁，哪里还有工夫侦诉这事，所以当时用电话命令收押起来，等有工夫再说。这一句话就押了几个月，最后该人因病死在监狱中。王文荣听到该人已死，遂给他硬加上一个罪名，说他是被矫正的反满抗日的思想犯，派人到监狱中拉过死尸的手划了押，掩埋了事。伪矫正法一实行，劳动群众昼夜不安，一批一批地被羁押，被解往锦州。1945年的春季，一天中午王文荣下班后，正要吃饭，听人告知家中妻妾又在打死仗，闹的不可开交。王文荣听后不敢回家，遂回到检察厅令周玉山到庆发园饭店叫饭。饭店执事人听说王文荣叫饭，心中忐忑不安，怕侍候不好招灾惹祸，除了告诉厨师仔细操作外，并叫堂倌何老泽亲身担着食盒，把酒菜饭用食盒送到矫正局。王文荣喝酒吃菜无故大发雷霆。当时叫过何老泽大骂特骂，说："你们做的什么菜？这么凉咋吃！"何老泽说："酒菜凉是因为今天冷又挑这么远，所以凉点请原谅，我再拿回去回回勺。"这一句话说恼了王文荣，遂大骂道："你们这些下等社会的混蛋东西，竟敢把菜饭弄凉了送给我吃，你们都是反满抗日的亡命徒，应当受矫正。"立即指令厅吏把何师傅捆绑起来，勒令跪在过厅上，由周玉山动手用胶皮鞭子打嘴巴。霎时把何师傅脸部打得鲜血直流，牙齿脱落，遂躺卧在地上，王文荣骂道："你这个东西装死，押起来。"经法警连踢带拉送进监狱里。饭店执事人烦托北镇大绸缎商兴顺长东家冷雨辰向王文荣说情，才得释放。

伪满时期的"思想矫正法"，表面上是打着矫正反满抗日思想的幌子，内里是开着屠杀中国人民的作坊。再加上亲日走狗

王文荣的胡乱执行，所以人民被害的无法统计。

“九·三”胜利了，解放的炮声响彻云霄，冲散了乌云露出阳光，八路军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国民党，王文荣在群众公审大会上判处死刑，人心大快。

（摘自《北镇县文史资料》第八辑）

特别治安庭的法西斯审判

饭守重任笔供

（1954年6月20日）

关于设置特别治安庭的法律：

1942年3月前后，我出席了伪司法部审议八田参事官起草的关于设置特别治安庭之件的会议。我赞成这个法案，并参与策划了这个法律的拟定。根据这个法律，在某一地方治安状况紧迫，为了迅速恢复治安，认为有绝对必要的时候，由司法部大臣命令，得在特定的高等法院内设置特别治安庭。在这个庭里，对治安庭事件的审理，第一审即作为终审。关于开庭，规定可在法院法庭以外的适当场所进行。此项法律的立法目的，是因为1941年度，八路军为解放热河进行了袭击伪满的进攻，故需迅速处置协助八路军作战的爱国人民，以使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收到效果，恢复伪满的治安。由于实行这个法律，从1942年4月以后，锦州高等法院设置了特别治安庭，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战争结束。3年多的时间，被特别治安庭处死的热河省爱国人民就有1 700名之多，在裁判上实行了空前的大屠杀，并对2 600名的爱国人民处以无期徒刑、有期徒刑20年、15

年、10年、8年等的重刑，投狱监禁，其中数百人因营养不良死亡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

关于热河省特别治安庭的策划和组织：

关于特别治安庭的策划，我想与最高检察厅检察官绪方浩有关。他根本不从事检察厅的事务，只负责与关东军有关的事情，常常到承德从事军方的工作。设置特别治安庭时，我听说，关东军认为，对热河的爱国人民，与其用军法会审，由军方处理，不如让熟悉裁判业务的法院审判，这样既可以减少裁判上的错误，又可以安定民心。因有这种见解，所以法院接受了这种裁判。关东军的这种见解，我想有绪方浩的意见在内，他是否首先提出了设置特别治安庭的意见，虽不太清楚，但我认为他是策划者之一。

热河省特别治安庭，从1942年4月到1945年战争结束，一直存在。对特别治安庭事件的处理，有关审判官和检察官如下：

锦州最高法院次长桑山某(1940年——1942年前后在任)；

锦州最高法院次长横山光彦(1942年前后——1944年前后在任)；

锦州最高法院次长今 井 某 (从1944年前后——1945年的“八·一五”在任)；

锦州地方法院次长内藤庸男(1940年前后——1942年前后在任)；

锦州地方法院次长内藤某(1942年前后——1944年前后在任)；

锦州地方法院审判官长谷川某(1941年前后——1943年前后在任)；

承德地方法院次长坂野某 (1944 年 前 后 ——1945 年 的“八·一五”在任)；

承德地方法院审判官山浦某(1941年前后——1943年前后在任)；

锦州高等检察厅次长杉原一策(1939年前后——1942年前后在任)；

锦州高等检察厅次长西川精开(1942年前后——1943年前后在任)；

锦州高等检察厅次长村口开次郎(1943年前后——1945年在任)；

锦州高等检察厅检察官上山某(1941年前后——1943年前后在任)；

承德地方检察厅次长野田某(1942年前后——1944年前后在任)；

最高检察厅检察官玉泽光三郎（1942年前后，临时应援的)。

特别治安庭的开庭场所，包括以下14个地方，共约25个开庭点：

1. 承德地方法院内；2. 兴隆县兴隆；3. 古北口警察署；4. 青龙县宽城；5. 青龙县区法院；6. 青龙县冷口；7. 喀喇沁中旗平泉区法院；8. 承德县下板城伪满警察署内；9. 滦平县滦平；10. 隆化；11. 兴隆半壁山警察署内；12. 丰宁县丰宁、13. 兴隆县鹰手营子；14. 喀喇沁中旗八里罕。

编者注：饭守重任，日本东京都丰岛区人，1930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1938年后，历任伪满高等法院审判官，伪司法部参事官，总务厅参事官。1944年9月任伪新京高等法院涉外庭庭长，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横山光彦笔供

(1954年6月28日)

1943年5月至1944年5月，我任伪锦州高等法院次长期间，组织治安庭，或在特别治安庭自任审判长，和令其他审判官任审判长所审判之思想案件，如下：

1. 喀喇沁右旗、中旗、兴隆、承德、围场、隆化、丰宁、青龙、翁右、敖汉地区的案件

此系平泉伪满宪兵队和热河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在1943年1月至2月发现，在喀喇沁右旗、中旗、兴隆、承德、围场、隆化、丰宁、青龙、翁右及敖汉地区，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爱国运动而检举的案件。

但我仅供述1943年5月我到锦州就职以后的情况。上述检举机关，同年5月至8月，在喀喇沁右旗、中旗及平泉腹地、青龙县光头山一带，共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及爱国人民约500余名。逮捕后，将其中约200人，送至驻在承德之锦州高等检察厅思想检察官龟冈处，龟冈检察官陆续起诉至承德之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特别治安庭可起诉，在承德地方法院公判庭进行审判（约60件）。

我所组织之特别治安庭之组成如下，承德地方法院次长兼锦州高等法院审判官内藤某、承德地方法院审判官兼锦州高等法院审判官田场川某、锦州地方法院审判官兼锦州高等法院审判官山田某及畠山某。

案件内容：中国共产党员、革命志士，1943年1月至被逮捕期间，在热河省喀喇沁右旗、中旗及平泉腹地、青龙县光头山一带地区，协助八路军、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联络、搜集情报。爱国人民则通过抗日救国会，供给八路军战士食宿、情

报和引路等，进行抗日爱国活动。

判决结果：革命志士、爱国人民7名死刑；爱国人民约120名，无期徒刑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爱国人民约73名，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光头山地区事件

此系1943年1月平泉伪满宪兵队及热河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在平泉南光头山地区，发现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抗日爱国运动而检举的案件。

上述检举机关，1943年1月至同年5月，分数次共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及爱国人民约500名。其中约200名逮捕后随时送交驻承德之锦州高等检察厅思想检察官龟冈处。龟冈检察官将其中20名起诉至锦州高等法院治安庭，而在承德之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接到后即随时起诉。该特别治安庭随时在承德地方法院公审庭进行审判。我到锦州就职后，在承德特别治安庭审判的约有40名，到同年8月分两三次审判的（共约15件，我审判了5件）。总共承德及锦州两地方，我就职后处理了光头山事件60名。我组织了治安庭及特别治安庭。锦州治安庭的组成：审判长是我，审判官为锦州地方法院次长兼锦州高等法院审判官内藤膺夫，和审判官山田某或畠山某；承德的特别治安庭组成：审判长为承德地方法院次长兼锦州高等法院审判官内藤某，审判官为田场川某，山田某或畠山某。

案件内容：中国共产党员、革命志士，1943年1月至逮捕期间，在光头山地区协助八路军，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联络、搜集情报。爱国人民则通过抗日救国会，供给八路军战士食宿和情报，并担任引路等，从事抗日爱国活动。

判决结果：革命志士、爱国人民5名死刑；约35名无期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约20名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 热河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决定进行之大检举事件

(1) 第一次大检举事件

此系1943年8月，根据热河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以热河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委员会名义进行的大检举。

同年9月11日至9月26日，在青龙县西南部地区，由伪满喜峰口宪兵队及青龙驻防军逮捕了324名；在兴隆县东部一带地区，由古北口宪兵队逮捕了98名；在承德南部地区，由承德宪兵队及热河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队逮捕了536名，一共逮捕了958名中国革命志士及爱国人民。其中在青龙县地区，将185名经过在青龙的锦州高等检察厅思想检查官起诉至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此外有49名送至承德。在兴隆县地区，包括承德县南部地区，逮捕约41名，在兴隆经过锦州高等检察厅思想检察官起诉到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结果，这3个地区被起诉的人数，共456名。我派遣到青龙之特别治安庭，在青龙接到起诉后随时开庭审判（约审判了60件）。此后又移动到兴隆，在兴隆接到起诉后，随时开庭进行了审判（约审判了12件）。被起诉到承德的部分，和第二次检举的部分，共有260名。其中，除一名在锦州高等法院治安庭审判外，全部于同年10月末至11月在承德地方法院公审庭由特别治安庭审判。

我派遣到青龙及兴隆的特别治安庭的构成：审判长，承德地方法院次长兼锦州高等法院审判官内藤某；审判官田场川、山田或畠山。

案件内容：八路军干部、革命志士，到1943年9月为止，在热河省西南地区各处指挥部队，同日、满军宪兵队、热河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队作战；八路军同日、满军、宪兵队、热河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队作战；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党员协助八路军，组织抗日救国会，进行宣传、联络、搜集情报；爱

国人民则通过抗日救国会，供给八路军战士食宿、情报，担任领路等，从事抗日爱国活动。

判决结果：在青龙审判之革命志士及爱国人民185名中，死刑4名；无期徒刑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约120名；10年以下有期徒刑约61名。

在兴隆审判之41名革命志士及爱国人民中，死刑1名；无期徒刑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约30名；10年以下有期徒刑约10名。

（2）第二次检举事件

此系第一次检举机关，在1943年10月决定的继第一次大检举之后的又一次检举事件。

同年10月6日至10月19日，在承德县东南部地区，伪满宪兵队及热河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队，分头在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区（即青龙县一部及河北省一部地区）进行了检举，被逮捕的人数共达292名。其中，在承德县地区，经在承德之锦州高等检察厅思想检察官，将30名起诉至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在古北口地区，经在古北口之锦州高等检察厅思想检察官，将约12名起诉至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在喜峰口一带地区，经在平泉之锦州高等检察厅思想检察官，将约26名起诉至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结果，在以上三地区被起诉之中国革命志士及爱国人民共计68名。我派遣到平泉的特别治安庭，在平泉接到起诉后，随时开庭审判。以后移动到古北口，在该处接到起诉后，随时开庭审判，共处理约12件。在承德被起诉之30名，和上面所述第一次大检举中被起诉的181名，及由青龙被送来起诉的49名，一共260名，其中除1人被送往锦州高等法院治安庭进行审判外，均于同年10月末至11月之间，在承德地方法院公审庭，由特别治安庭进行审判。在承德审判的人

数中有60名，由我作审判长分三四次进行审判。其余的199名，由承德地方法院次长兼锦州高等法院审判官内藤某为审判长，分十数次进行了审判（一共约有80件，其中我审判的约20件）。

我所组织的特别治安庭其构成如下：平泉及古北口之特别治安庭，审判长为锦州地方法院次长兼锦州高等法院审判官江上某，审判官为山田某及畠山某。承德之特别治安庭：（1）审判长是我，审判官是内藤某及田场川某。（2）审判长是内藤某，审判官是田场川某，山田某及畠山某。

案件之内容：八路军干部、革命志士，到1943年10月为止，在热河省西南地区各处指挥其部队，同日、满军、宪兵队、热河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队作战，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党员、革命志士协助八路军，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联络，搜集情报；爱国人民则通过抗日救国会，供给八路军革命战士食宿、情报、担任领路等，进行抗日爱国活动。

判决结果：在平泉和古北口，由江上任特别治安庭审判长，审判共38名（平泉有26名、古北口有12名），其中死刑2名；无期徒刑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25名；10年以下有期徒刑11名。

在承德，我亲自任特别治安庭审判长，审判60名，其中死刑15名；无期徒刑15名；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名。

在承德，由内藤任特别治安庭审判长，审判199名，其中死刑15名；无期徒刑15名；10年以上有期徒刑约100名；10年以下有期徒刑约69名。

（3）革命志士白玉林事件

此系承德伪满宪兵队和热河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在1943年9月和10月，在承德县南部地区，逮捕了革命志士白玉林后送至驻在承德之锦州高等检察厅思想检察官，该检察官于同年12月起诉至锦州高等法院，送到锦州。锦州高等法院治安

庭，在同月进行审判。

由我组织治安庭，其组成如下：我任审判长，审判官江上某、山田某。

案件内容：延安中国共产党党校党员革命志士白玉林，到1943年9月为止，在伪满热河省承德地区，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联络，搜集情报。

结果，判革命志士白玉林死刑。

以上第一、二次伪热河省西南地区大检举事件，共审判中国革命志士及爱国人民524名。其中，死刑38名；无期徒刑30名；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5名，10年以下有期徒刑151名。在这些被惨杀及被镇压之革命志士，爱国人民中，除前述之八路军干部、战士、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党员、一般爱国人民外，还有河北省迁遵兴、迁青平、青绥凌、承平宁各县之县、区、村各级政府之负责干部、采粮员、助理员、农会主席、农会会员、游击队干部及队员等爱国人民。并且，上述各县的县政府，也都被检举机关所破坏。宣判的各种刑，均未上诉而确定。其后，在锦州高等检察厅的指挥下，一部分在承德、锦州各监狱，一部分在安东及北满各地监狱执刑。

编者注：横山光彦，日本国东京都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1938年后，历任奉天、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等伪高等法院次长。在锦州高等法院任职期间，兼任西南肃正委员会委员，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大讨伐"》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

八年日伪监狱生活的回忆

李　财　吴淑芬整理

我原是依兰镇五国城大队的农民，1934年与弟弟李银一起参加李延禄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队，在金根团当战士。1935年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第四军，我在四军一团一连当连长，跟随部队转战在勃利、依兰、通河、方正等地。1938年初，抗联大部队化整为零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我带领连队在方正县境内德莫利沟活动，由于没有给养，枪支弹药也得不到补充。我们连续几次派人去游击根据地联系军需，但派出的人都一去不复返。为了扭转危机使连队能坚持战斗下去，我决定亲自下山去找关系。

大约是4月末，我把连队工作安排给副连长韩发，带了一支匣枪，奔抗日游击区，在无字号——伊汉通落脚，住在农民朱财家里。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在出外活动时，把匣枪“插”在朱家。可是我“插”在朱家的枪被他邻居外号叫“蔡柳罐蛋子”的大烟鬼发现了，他向方正县警察署告了密。一天，我从百家长李万银家接关系回来，刚迈进朱家的门，就被警察逮捕，我和朱财一同被押到方正县警察署。

我在方正警察署共押了四十多天。在这四十多天里，敌人三天一审，两天一堂，最后，我满身刑伤，被带上重镣，由两个警察抬着扔上警车押解通河。

到通河不久，我被通河法院判有期徒刑10年，后解到依兰监狱监押，开始了非人的漫长的牢狱生活。

依兰监狱作为日伪高压统治手段的工具，曾有“第五模范监狱”之称，是一座典型的人间地狱。四周是青砖砌成半米厚、4米高的围墙。向西开的铁门旁狱警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往里走一段路程，又是一处高墙，黑森森的大铁门用一个一百多斤重的铁栓穿着，由一个看守看管。此门称作“二门”，通向牢房。

牢房修筑坚固，大青砖砌墙，小青瓦盖顶。牢房中央是直径十五六米的中央楼，大约有两节楼高。中央楼上层有走廊，在中央楼上层的走廊上可一览监狱内外。中央楼下层是个6角形的大厅，6角形的每一边都有一个形状一样、颜色相同的门。其中1个门是进出牢房的便门，从此门去犯人的伙房和操场。其余5个门呈辐射形延伸，各连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两侧是并排的12个小牢房组成一个大牢房。大牢房分：恭、宽、信、敏、惠五个字号。每个通道尽头都是厕所；其中唯惠字号牢房的通道尽头是监狱二门。每条通道都一样，每扇牢门也都一样，使人迷惑，分不清方向，找不着出口——这是修建时目的之一。所以，走进牢房就不易出去，这就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依兰八卦形的监狱。

连接中央楼通道两侧的小牢房又黑又小，一间间并排着。能够透进室内一点空气的是牢门上面碗口大小的窗口，这是供看守监视犯人用的。牢门对面墙壁上有钉着铁条外罩铁丝网的窗子，可以透一丝光线，但打不开。冬天，寒冷无情地袭击着犯人。牢室内虽然有火炕，但很少烧火，室内与室外的区别只是背风而已。夏天，屋小人多，蒸笼似的闷热，由于通风不好，室内便桶的屎尿味和潮湿发霉的气味熏得人难以透气。夜间，蚊子、臭虫，贪婪地吸着犯人们仅有的一点血浆，不让你安生地睡觉。

监狱当局对犯人看管极其严酷。夏天，每天只放一次风，犯人在操场上活动。冬天，也是每天放一次风，但不准犯人走出大牢房，让犯人在大牢房内厕所轮流大小便。在牢室里，犯人不准起立活动，不准互相说话，不准吸烟。看守不时地从牢门上小窗口窥视，犯人如稍一违犯牢规就会遭到看守的谩骂、训斥，甚至殴打。一次，看守王仁民看见我在牢房里补鞋，以我把锥子带进牢房违反狱规为借口而毒打我，竟残忍地用锥子在我头上乱扎，鲜血顺脸往下淌。

监狱犯人也是吃配给粮，而且又受到从配给机构到监狱的层层克扣，到犯人口中已所剩无几。犯人吃焐玉米面窝头、绿色的焐高粱米粥，里面还掺着砂子。平时不准家属探监，家属按规定的时间探监又不许送吃的东西，即或打通狱警送些吃的东西，也要受到监狱多方刁难，犯人本身根本得不到多少。我和弟弟李银参加抗联后，因父亲早已去世，家中只有母亲带着我的一个年幼的弟弟和一个妹妹过着苦日子，哪里有钱打通狱警，母亲只能按着探监的日子来看我，每次都哭着回家。监狱认为危险的犯人都给带上脚镣，由于案情不同脚镣轻重不一。我带着18斤的最重的铁镣，两脚踝骨上卡着两个粗铁环，中间用3个鸡蛋粗的铁环连着，走路抬不动脚迈不开步，只能两脚错着挪动。穿着裤裆开缝、系着布条的裤子。铁镣的铁环卡进踝骨上端的皮肉，汗毛憋在皮肤里成了一个个黑窟窿。脚脖到膝盖之间皮包骨头，不过血，不论冬天夏天都象冰块一样凉。

犯人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身体衰弱极了，因此抵抗疾病的能力很弱，牢中流行着的各种传染病和各种慢性疾病，夺去了无数犯人的生命。判重刑的大多被送到千山、本溪等地去服苦役，也大多死在矿山的万人坑，剩下的也很少活下来。抗联三军某团长王座山被判15年徒刑，不到两年就患浮肿病死在牢

中。我从通河法院被押解来依兰监狱时带着满身刑伤不能行动，由狱警抬着扔进牢房，因而没被送去服苦役。我是服长刑极少的幸存者之一，但是依兰监狱那种地狱般的生活使我这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得了肺结核、气管炎和严重的胃病，苍老瘦弱得让人难以辨认，严重的风湿症至今还折磨着我。

入狱两年后，我的刑伤才基本好转，能较正常的活动。1944年“轴心国”在第二次大战中失利，伪狱警感到形势不妙，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我抓住狱警的这种心理，借金典狱长转勤之际提出了去掉脚镣，到伙房做饭的要求。金典狱长乐得做个人情，就向看守长徐忠海打听我的表现，徐忠海也借机做人情，说我表现老实。虽然小个子看守王仁民说我是“红胡子”不能做饭，可是大个子王看守等却从中说情，这差事总算定夺了。从此，我便在伙房做饭，虽然出不了牢房，但是不带脚镣，在牢内可以自由走动，并且能用做饭的机会尽些保护难友的责任。做饭时，我尽量偷偷地多下米，把饭煮熟煮烂，让难友们少遭点罪。我把从看守口中得到的日本鬼子在战场上失利以及当地群众流传“满洲国”要垮台了等振奋人心的消息，秘密地告诉大家，鼓励大家坚持活下去，度过黑夜等待黎明。

我通过做饭自由活动的机会与高所长打通关系，向他提出叫犯人吃饱饭、不虐待犯人的要求。他痛快地表示，犯人也是人嘛，一定叫他们吃饱。从这以后，做饭时，我多下点米。犯人生活稍有改善，看守打骂虐待犯人的现象也较前相对减少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开始出兵东北。苏军飞机轰炸依兰后，伪政府瓦解，伪军、警、宪、特开始撤退，监狱的多数看守人员各自去乡下投亲躲避，只剩下高所长和两三名看守留在所里。这时狱中犯人情绪激昂，呼吁砸镣出狱，我和伙房人员几次去找高所长，要求出狱，高所长有顾虑，怕犯

人炸狱引起与看守所隔道斜对过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开枪镇压；为使这些赤手空拳的犯人安全出狱，高所长同我商量，先稳住大家，他去伪县公署请示，但县长已不知去向，署内的公务人员也已走光。高所长回所后自行决定释放全体在押犯人。马上召集剩下的看守人员商量释放办法，然后通知牢中全体犯人，叫大家做好准备。要求开门后三三两两地悄悄行动，以免惊动对门的守备队。但是，长期监禁的人们走出牢门如同出笼之鸟，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争先恐后地投奔亲人去了！

我在这人间地狱中被囚禁了8年之久，终于盼来了祖国的解放！我获得了自由！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伪满锦州监狱见闻

张忠诚供稿　尚德贵整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我东北人民的血腥统治，采取了分而治之措施，把东北地区划分为19个省伪满首都设在新京（今长春）。中央的司法机构设最高法院、最高检察厅和司法矫正总局。各省设立高等法院、高等检察厅，下设地方法院、地方检察厅和区法院、区检察厅。省级另设有保护监察所。

锦州省公署所在地的锦州，设立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厅，所管辖的县有锦县、锦西、兴城、绥中、朝阳和义县；黑山设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厅，管辖黑山、北镇、台安、阜新和彰武各县。锦州还设高等法院和高等检察厅，锦州省的11个县都设区

法院和区检察厅。黑山县的区法院和区检察厅在现在的东市场路北粮库商店一带，监狱在粮库后院，门往北开。伪满末年，监狱改为刑务署，黑山监狱改为锦州刑务署黑山分署，其它各县都设看守所，由地方警察署代管。

伪满各省所在地都设一个监狱，唯有奉天省（辽宁）设两个监狱。奉天省第二监狱在沈阳市毛巾屯附近，各省的日本、朝鲜、台湾的犯罪分子，判刑以后，一般送往奉天省第二监狱服劳役。在各工矿区还设司法矫正院，主要是用来改造思想犯。被司法矫正院判刑以后，一般都送往阜新、抚顺、双鸭山等地，他们都是“反满抗日分子”、“嫌疑分子”和无辜的人民群众。

伪满警察是伪满统治者统治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当时的地方警察权限逐渐扩大到检查火车乘客的经济贩运等违法行为，这种警察是地方警察的经警班。原来的铁路警察，后来改为铁路警护军，最小的军衔是少士，专门维持铁路、火车上的治安。

伪满中央设警察总署，省设警察厅，市设警察局，县设警务科、警察署，大村也设警察署，小村设警察分驻所。东北人民的一言一行，都在警察的监督之下。伪满末期，警察的权力更大了。有些亡命徒和甘心为日寇效劳的年青人，想方设法当警察。当了警察，就有权有势有钱，亲朋好友都借光。

一、监狱的位置和设施

伪满锦州监狱在锦州古塔区，占地约600平方米，四周有大约4米高的红砖墙，有两个大门。南大门又叫表门，刑警人员上、下班一律走此门。门西侧有个岗楼，由一个带一支不装子弹的匣枪的看守把守此门，是专给外人看的门卫。门东侧墙上挂着《锦州刑务署》的大牌子。西大门基本是昼夜关着，监狱的工厂

进出货物走此门；犯人死了以后，家属来接尸，都把棺材放在此门外等候。

监狱把病死的犯人用大车从此门送往南山大沟扔掉。监理科每天派一个看守在西大墙里边游动监视，大墙西南角设一个岗楼，可向四处了望，叫“西南见张楼”。

锦州监狱南门外是当时锦州最长最宽的大马路，附近有锦州市警察局大马路派出所。西墙和北墙外都有一条小马路。监狱东侧是锦州高等法院、高等检察厅、地方法院、地方检察厅、区法院、区检察厅（现在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检察院所在地）。

锦州监狱分前后两个院，前院占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余都是后院。前院主要是工作人员办公室，后院设有犯人监房、工厂、仓库、大伙房和保健科（医务所）。

南大门有门洞，西侧是小卖店和收发室。前院西厢房南屋是正副署长（监狱长）办公室，北屋是庶务科。东厢房北屋是小伙房和食堂，南屋是值宿官休息室。东厢房南头有个小院，里面是女犯人的监房和马号。门洞东侧的上屋是监理科科长办公室和戒护股办公室，门洞西侧有监理科教务股、庶务科的庶务股两个股一个屋的办公室。

监理科的东侧是一间简易的接见室，墙上有个窗口，家属通过窗口与墙里面的犯人相见，也能说上几句话。家属带给犯人的所有物品，都要经过监狱主任“付大刀”检查后，才能交给犯人。当时规定，只准许送吃的东西和一些单衣被褥等。

监狱后院东侧靠近前院的地方是保健科。东厢房是犯人的大伙房，伙房里边的南头还有1个小伙房，供日、鲜、台犯人使用。后院正房是第1监房，分4个号筒。第1号筒都是小房间，每个屋里住四五个没判刑的犯人，卫生很差。第2号筒也是小房

间，凡是政治犯和杀人犯都关在这个号筒里，是单人单屋，此筒昼夜严加监视。第3号筒关着新入狱的犯人，不管是新进来10人或20人，一律在这个小房间里关一宿，第二天再分配到其它屋去。北边房间里关的都是尚未判决的犯小案子的犯人，每间房住三四人。第3号筒路南各小监房关着日、鲜、台的犯人，两人一屋，室内卫生条件较好。白天不锁门，犯人除在室内活动外，还允许在监房门口站一站，白天大小便可以去厕所，但必须向值勤的看守请假，中国犯人是没有这种特殊优待的。第4号筒都是大房间，每个监房能容纳二十多个犯人居住，叫杂役房。住的是在各科室办公、在仓库劳动、在院内搞卫生和在大伙房工作的犯人，卫生条件很好，白天屋里没人，中午犯人回屋吃饭或休息。

第2监房在西边，是个有10个房间的大监房，分路东、路西，整个算一个大号筒，每个房间能容纳三四十人。在工厂和铁路机关区（机务段）干活的犯人住在这里。白天屋里没人，卫生很好。

第3监房是病监室，在后院东北角，有4个房间，每个房间能容纳二十多个病犯。冬春两季，室内也比较暖和，但空气不新鲜，卫生不好，病犯总是乱呼乱叫。看守轮到去病监值勤都感到头痛。号筒北侧是病犯尸体寄存室，冬春季节，常有二十多具一丝不挂的尸体四条交叉地堆放在室内。监狱把尸体拉到南山喂狗就算处理了，冬春季节每周处理1次，夏秋季节每两三天处理1次。

病监东侧是绞刑场，立着1根1米左右高的木桩。行刑时，用绳子和小木棒把跪在桩下的犯人绞死。当时，正在建造一种新的杀人工具——电力翻板机器，没等建造成，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

后院西侧南边是个大仓库，仓库的东头是仓库工作人员办公室。

后院有3个工厂车间。靠近前院有1个印刷车间；后院大西北角，有1个制做刺杀训练用的武道具车间，这个车间的对门，有1个印刷品装订车间。

印刷品装订车间前边是给犯人用的大操场。

有时由监理科教务官对犯人进行时事教育，重点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和“日满不可分离”的理论。

二、监狱的组织机构、狱卒的官衔及人员情况

锦州刑务署（监狱）有正、副署长各1名。

署长张树声，中国人，有职无权。监狱里所有重大事情都由副署长（日本人）解决，正署长的工资比副署长少三分之一左右。

副署长上野德（日本人）有职有权。他负责监狱的全面工作，重大问题必须经他批准才能去执行，他是监狱的独裁统治者、太上皇。

署长办公室分监理、庶务、保健3个科。

1. 监理科分两个股：

戒护股，主要负责看管犯人，本股工作人员占全监狱工作人员的近半数。

教务股，主要负责对犯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本股无犯人参加业务工作。

监理科科长（日本人）近藤，他的翻译是中国犯人，在他旁边放一小办公桌，背脸办公。

2. 庶务科分两个股：

庶务股，股长是中国人。本股办公人员6名，其中有两名是

犯人。主要负责管理文书、文件和犯人的档案、办公备品。

用度股，管理财会、基建维修、仓库、工厂、伙食、车马、卖店等。本股工作人员与办公室的犯人总数仅次于戒护股。

庶务科长是日本人松尾，用度股长是日本人鹿屈，仓库主任是日本人前川。工厂的掌权人，有两个车间是日本人，另一个车间是朝鲜人，另外每个车间配两个犯人协助办公。

3. 保健科（医务所）：

科长是一个姓吕的中国人，是保健技士，懂业务。2名大夫（犯人），内、外科各1名。2名男护士（犯人），负责监狱卫生和给犯人治病等。

当时的锦州监狱，有1辆4轮大马车，专供副监狱长上野德、庶务科长松尾、监理科长近藤，用度股长鹿屈等4个日本人上下班乘坐。

当时的监狱实行官衔制。

署长职衔为典狱，佩带两道杠3个梅花的黄肩章、红刀带、大战刀、脚穿黑马靴。

典狱佐3名：监理科长近藤、庶务科长松尾、用度股长鹿屈。佩带两道杠1个梅花的黄肩章、兰刀带、战刀，脚穿黑马靴。

看守长6名，其中日本人1名，佩带1道杠3个梅花的黄肩章、兰刀带、战刀、指挥刀，职务为股长、主任等。监理科的看守长有4名：戒护股股长王振宇、安置夜勤值班的常看守长、负责外勤监督的赵看守长、负责带犯人进行外役劳动的巴看守长。庶务科的看守长有两名：庶务股齐看守长、仓库主任前川看守长（日本人）。

看守主任12名，其中有日本、朝鲜各1名，佩带1道杠1个梅花的黄肩章、皮刀带、指挥刀、佩剑。监理科有1名看守主任，绰号叫“付大刀”，管接见的。他与别的看守主任不同，总佩带

大战刀，脚穿与看守长相同的黑马靴。日本人岛田和朝鲜人金山两名看守主任代理外勤监督看守长。带班看守主任有董××、陈世荣、李××、高××、林××。其中陈世荣是最不得人心的坏家伙。庶务科有4名看守主任：阎××、王××、张××、伊××。看守主任准许打皮裹腿或呢子裹腿，穿黑皮鞋或红皮鞋。

看守共27名，佩带1个梅花的黄肩章、指挥刀、小佩剑，打裹腿，穿鞋随便，有的穿便衣上班也没人管，其中有2名穿便衣的女看守。有4名办业务的归庶务科管，其余归监理科管理。

当时的锦州监狱不顾中国犯人的身体健康，不管中国人的死活。保健科缺医少药，得病进病监的犯人，只能治好一半，另一半都被糟蹋死。大夫对有病的犯人没有同情感，态度不好，只是应付。日本犯人得了重病，送到市立医院治好后回监狱。日本犯人没有病死的。

伪满锦州刑务署（监狱）在日本投降之前，有日、鲜、满刑警人员58名。

三、监狱里犯人的成分及犯人对刑警人员的称呼

锦州监狱的犯人数每天都有变化，因为每天都有犯人入狱和出狱或转狱，还有死亡的，入的多，出的少。转狱的去向主要是瓦房店监狱和奉天第二监狱。一般情况，监狱犯人总数为一千二百多犯人，可分为以下几类：

1. 政治犯，包括国共两党地下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官兵以及抗日的嫌疑分子。占犯人总数的10%左右。

2. 杀人犯，一般情况都判死刑，特殊情况判无期徒刑，那时没有判死缓的，占犯人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几。

3. 贪污受贿犯，绝大多数是来自各地的警察、棉花会社的

或机关职员。占犯人总数的25%。

4. 诈骗犯，占犯人总数的20%左右。

5. 盗窃犯，主要是小偷小摸，占犯人总数的20%左右。

6. 经济犯，伪满末期，大米、白面一律为军用，不准中国老百姓吃。如贩卖大米、白面，被警察抓去送交监狱，一律按经济犯对待。因此，经济犯很多，占犯人总数的30%左右。

7. 盗匪犯，土匪头子判无期或20年徒刑；一般盗匪判15年徒刑，轻者判5年、7年或10年徒刑。

8. 强奸犯，重者判1年徒刑，一般地只判3至6个月。伪满时期，对强奸犯处罚不重。

1944年以前，犯人称呼看守为“老爷”，称呼看守主任为“主任”，称呼看守长为“股长”。1944年以后，监狱改为刑务署，戒护科改为监理科，增设了教务股，派1名穿便衣的教务官对犯人进行奴化教育，通过教育，使犯人认罪服法，争取减刑。监狱内部加强了对看守的管理教育，把犯人对看守的称呼由“老爷”改为“先生”。

犯人与犯人互相称呼不叫名字，要叫号码。每个犯人胸前都佩带1个小签，前面写着号码，背面写着名字。犯人在上班时间，不允许随便谈话、说笑、打闹，如有违犯，被看守发现后，要立刻受到打骂。

四、犯人的伙食

监狱里，犯人的伙食标准很低。参加劳动的犯人，每天3顿饭，主食每顿每人两个小窝头或1小碗饭。副食常年都是每人每顿1小碗菜汤，年节少有一点肉、油。蹲号的犯人，每天两顿饭，每顿每人两个小窝头或1小碗饭。病监的犯人，每天给两顿饭，每顿每人2两稀饭，给少量的蔬菜或一点咸菜。外国人（即当时

所谓的“日、鲜、台”）监的犯人，每天给3顿饭，每顿每人1碗二米饭（大米占1/3，小米占2/3），1小盘用小锅炒的菜，很讲卫生，劳动与不劳动待遇相同。

监狱里中国刑警人员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顿3两主食，用食堂券购买。副食也是菜汤，数量上比犯人的略多一点。要想在食堂用饭，必须提前预约，否则就吃不着饭。绝大多数都不在食堂吃饭，中午也从家里带饭，只是一些昼夜值勤或离家较远的人在食堂用饭。

犯人要想活下去，必须由家属给送点吃的。有些犯人把入狱时穿来的或入狱后家属给送来的衣服，求看守到监狱外边转卖，再买回点吃的东西。卖了三四元钱，只给买回一元多钱的东西，剩下的钱都进了看守的腰包。这些，犯人都明明知道，也不敢说啥。

最苦的还是八路军被俘人员。他们的家属一般都在关内，与家人通不了信，关外又无亲属和朋友。他们每天都带脚镣子干活，忍饥挨饿。又由于菜里缺盐，所以，他们一个个都面黄饥瘦，身上长出了很长的汗毛。因为带脚镣子，他们长期脱不了裤子，身上又长了很多虱子，没办法，就把裤脚剪开，拴上几条带，晚上才能捉虱子。他们患了病被送到病监以后，十个要有九个死在里面。

极少数被判无期或20年徒刑的盗匪头子，在监狱工厂当头头，他们是最吃香的。在监狱干活的犯人收到家属送来吃的东西以后，都主动地给他们送去一些。有的看守长、看守主任、看守，暗地里也偷偷给他们送好吃的东西（烟卷、糖果），他们为什么给工厂的头头溜须拍马呢？因为他们要背着日本人和朝鲜人从工厂拿东西，必须得通过这些头头，先把东西偷放在某处，下班时亲自交给他们。

监狱里的看守对犯人头头比较客气，犯人头头对看守也很尊敬。工厂的犯人头头们每顿饭都能吃饱，还吃小灶，他们不参加劳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检查质量和汇报些情况。这些人中的多数在入狱之前是土匪头子，有的是拉过千八百人的大揽把（司令），他们的刑期都很长，一般都是无期或20年，所以，他们在狱中都学了一手好技术。这些人又都会来事，不但同中国人员的关系搞得好，同日本、朝鲜方面人员的关系搞得也不错。这些人有些违犯狱规的行为，工作人员也不敢轻易去管，实际上这些犯人头头受着工作人员的保护。

五、犯人的劳动

刑期5年以上的犯人，在监狱的工厂劳动；刑期三四年的犯人，在监狱院内清扫院内垃圾、打扫厕所，在食堂做炊事员，在保健科做医生、护士以及在仓库劳动等。这些人统称为杂役；刑期一二年的犯人，到锦州铁路局机关区（机务段）抬煤。在各科室做办公人员的犯人，期刑有多有少；但都是能说善讲，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绝大多数精通日语。保健科除科长是公职人员，余者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都是犯人。

监狱工厂的3个车间各有1个独步（联络员），都是能说善写、精通日语的犯人。他们去各科室办事，能直接与日本、朝鲜人讲话。这几个人在监狱院内很随便，没有看守管他们。在科室、工厂做工的犯人，如果去其它科室、工厂和厕所，后边都得有看守戒护，如果没有看守戒护被科长或戒护股长发现，一要马上停止犯人的行动，二要向犯人所在的科室、工厂进行严厉的批评。

早晨，犯人从监房出来后，马上在门前站好排，由一名责负的犯人喊口令整队，完毕之后，用日语向值勤的看守主任报

告人数。看守主任再清查后，犯人才列队到工厂劳动。午饭和晚饭都在工厂吃。晚上下班，犯人也要列队回监房。由值勤的看守主任，对每个监房进行检查、验收，完毕之后，一律上锁。

做外役的犯人，上下班都在监狱前院列队清点人数，行走和劳动时，由1名看守长、1名看守主任和4名看守进行戒护。行走时，看守长和看守主任在犯人队伍的一前一后，4名看守分别在队伍的两侧。要求步伐整齐大声唱歌。

星期天和节假日，犯人一律在监房免业（休息），白天不锁门，可互相谈话，但不准谈国事，只准做洗、补衣服等活。免业日每天两顿饭都在监房里吃，伙食质量比平日稍好一些。

六、“五·二三”事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末日即将来临。中国抗日军民展开了全面的大反攻。东北地区的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积极活动，配合抗日军民与日寇进行斗争，引起了日伪特务的注意，加紧在各机关搜捕反满抗日分子。1945年5月中旬，日伪特务逮捕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最高指挥部的领导人，并搜出了党员花名册。因此，他们于5月23日，在伪满各省、市进行了大逮捕。在锦州，逮捕了锦州高等法院审判官陈国兴和锦州警察局保安科长张庆凯。当天下午，由宪兵和警察联合把他俩押送到锦州监狱，分别入第2号筒第1监室和第2监室，单独看管起来。

5月24日晚7点半，约有六七个日本便衣特务，乘坐两辆黑轿车来到监狱。看守主任岛田（日本人）接待了他们，并安排在西厢房的署长办公室对陈、张两人进行了审讯。陈的日语说得不太好，由日本特务当翻译。张庆凯的日语说得很好，对答如流，据说他在日本留过学。审讯到10点钟左右结束；他俩被

日本特务带走了，3天以后，又把他俩送回锦州监狱，这时，他俩已是面黄肌瘦、无精打采了。一直关到8月份，也没被判刑，日本投降之后，他俩有幸获释出狱。

国民党统治时期，陈国兴任黑山县法院推事（就是审判官兼院长），张庆凯任国民党锦州市党部书记长。

七、监狱里的敲诈勒索

有些犯人的家属托人联系狱中的看守，把钱交给看守，求他们每隔三四天给他们狱中的亲人买点吃的。如果交给看守50元钱，多说能给买15元钱的东西，少说也就能给买10元钱的，剩下的都装进了看守的腰包。

监狱的看守主任、看守长利用他们给犯人安排工种的职权，向犯人的家属进行勒索。犯人的家属、亲友为了使他们在狱中的亲友能分配到或调换成好的工种，少受些苦，就得去看守主任和看守家送各种礼品，给小孩钱。

监狱的看守主任、看守长还向新来的看守进行勒索。新来的看守刚一上班，他们就问是谁介绍来的，如果介绍人硬，一般地就不敢进行勒索，不敢找小脚给小鞋穿。例如打磕睡、迟到早退，都有可能受到看守长、看守主任的打骂。新来的看守，为了少受些打骂，就得给上司送礼。如果带班的头头“易”人，看守们都得给新来的上司送礼，否则，工作是难干的。有点文化的看守，都想方设法从监理科转到庶务科，转过去之后，工作就好干多了。

在工厂劳动的犯人，如果完不成劳动任务或质量不合格，被带班的犯人头头检查出来汇报给看守或看守主任之后，挨一顿打骂是逃不脱的，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有时还用指挥刀痛打。如果发现犯人互相口角，不问什么原因，动手就打。

庶务科长松尾，每天上下班都带1条大狼狗，白天就呆在他办公的座位附近。每当生人走进庶务科，狗马上到生人面前，松尾发现后马上一出声，狗就回去了，否则就把人给咬了。咬了之后，松尾哈哈大笑，还说："你的，胆小小的，没关系，几天就好了。"日本鬼子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中国人是亡国奴，不如他们的狗。

八、监狱对病死犯人的处理

监狱里的犯人得了病，监狱方面不向家属通知，只有监狱内部有人的家属才能知道情况，前来探监。犯人在狱中病死之后，监狱方面也不向家属通知，只有监狱内部有人的家属才能得知。家属买口棺材放在监狱的西大门外，联系好了之后，由家属把尸体从病监抬到西大门外，装入棺材再抬到家中或直接埋葬。

90%以上病死的犯人死后家属不知道信，由杂役在病监把尸体的衣服脱光，再抬到死尸寄存室。冬季，寄存室里的尸体，多者二十多具，少者十几具。每到星期天，都从街上抓来一辆大车，由两个看守押车，两个犯人跟车，拉到锦州南山，往大沟里一扔。附近村屯的狗集中在一起，吃死尸的肉。这些狗吃得肥大粗胖，眼睛都红了，外地人早晚从那里路过，经常被狗咬死吃掉。

夏季，监狱对死尸处理得较快，前来接尸的家属经常扑了个空。

被判死刑的犯人，都在监狱的绞刑场执行绞刑。行刑时，法院、检察厅、警察局都派代表参加，监狱里的监狱长、监理科长、庶务股长等也参加。在这些人的监督之下，由两个看守把犯人从监号里提出来，带上18斤重的脚镣，五花大绑，押到刑

场绞刑木桩前。法官宣布执行死刑的决定之后，由看守主任执行绞刑。事先得到消息的家属在西大门等候，犯人被处死后，他们把尸体拉回家里埋葬，否则，由监狱用大车把尸体拉到南山喂狗。

九、锦州监狱暴动

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锦州监狱的日本工作人员觉察到他们的一切全完了，个个痛哭流涕、精神紧张、坐卧不安。他们手持刀枪，以防备中国人伤害他们。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军来接收监狱。这时，共产党的锦州地下组织，与监狱里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士兵和其他爱国分子取得了联系，准备进行暴动。8月20日夜间，在监狱党组织领导和监狱里中国工作人员的配合下，犯人们砸开了所有的牢门，冲出了牢房，与日本、朝鲜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场激战，将敌人全部杀死。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了一支队伍，并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起来。有少数其他犯人自愿加入了这支队伍，临时编成一个大队开出锦州城，后来，被编入八路军的冀热辽军区。

（摘自《黑山县文史资料》第六辑）

杀人魔窟——旅顺刑务所

周祥令

杀人魔窟——旅顺刑务所，是日本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

这座法西斯监狱，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元宝房，高大的砖墙围绕着座座牢房和厂房，墙外有看守住宅区和强迫被关押者服苦役的窑场及菜地，整个占地面积约有22.6万多平方米，是当时东北地区较大的一座法西斯监狱。

一、监狱更名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重新霸占旅大，统治长达40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统治者于1907年在沙俄原设监狱的基础上，经过逐步扩建，牢房增加到253间，还设暗牢4间，病牢若干。开始监狱名称叫“关东都督府监狱署”，1920年改成“关东厅监狱”。当时监狱周围大量土地被占为“刑用地”，开窑场、菜地和林场，由日本看守监视被关押者在那里服苦役。1934年又更名为“关东刑务所”，并于监狱东北角修建1座两层楼房式的秘密杀人场——绞刑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又进一步严密劳役、教诲、监管、刑署等司狱法规，象条条绞索套在被关押者身上。监狱几经更名，最后于1939年定名为“旅顺刑务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者不断强化法西斯狱政，随意把“政治犯”、“思想犯”、“反满抗日犯”和“经济犯”等罪名，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日本驻伪满大使，亲自控制这座监狱。在狱中设有戒护系、作业系、用度系、庶务系、会计系、教务系和医务系等机构。除有近百名日本看守，还雇佣几名中国人当押丁。监狱周围是4米高、725米长的红砖围墙，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是一座阴森森的人间地狱。直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旅顺刑务所”才彻底解体。

二、牢房囚禁

这座监狱牢房建筑呈“大”字形放射状，中心地带设置看守台，看守在那里站岗，同时可以监视几排牢房。东侧3层有牢房87间，中间两层有牢房84间，西侧两层有牢房82间，共有253间。

在每间长5.6米，宽2.7米，面积仅15平方米的牢房里，关押七八个人，里面放有食具、水桶和便桶，门旁有一个方形小孔，那就是往里送饭的地方。看守按照被关押者表现和劳动强度，把饭量分成7等，1等的量多，7等的每顿仅1两高粱米饭，菜是萝卜叶加咸盐水，如果被“罚饭”饭量就更少了。

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开始大都是经过关东州地方和高等法院判处3个月以上至无期徒刑者。开始入监时需要全部脱掉衣服，穿上土红色的囚衣。有些人刑期长，经过几年看守认为表现好，便给换上深兰色囚衣，这是敌人搞分化的一种阴险手段。

每间牢房墙壁贴着1张中、朝、日3国文字的狱规，共有11条，规定在牢房里不准说话，不准对面，不准倚墙，不准向外张望等等，稍有违犯，便被加上“违犯狱规”的罪名，遭受毒打。

狱中开始关押几百人到千人左右，后来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906年至1936年的30年间，累计关押36万人。特别是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疯狂逮捕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从东北、华北等地押送到这里囚禁。

许多共产党员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在狱中坚持斗争。1927年大连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由于叛徒的出卖，书记邓鹤皋、党员侯立鉴、魏长奎等人被捕入狱，惨遭敌人的迫害。但他们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当年，狱中囚禁的大都是中国人，也有反对侵略战争的朝鲜人和日本人。杀死伊藤博文的著名的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就是在这座监狱里被囚禁和杀害的。

三、严刑酷法

这座监狱里严刑酷法名目繁多，最常见的是罚饭。当时狱中被关押者吃高粱米饭和咸菜。凡是违犯狱规的人，饭量则被减少1/3，时间是3天或1周，还得照常服苦役。人们不仅遭受刑伤和疾病的折磨，还得忍受饥饿的威胁，许多人被饿得四肢无力，昏倒在地。由于营养缺乏造成大批人得了浮肿病，还有的牙根出血长期得不到医治。被囚禁在狱中的码头工人于其仁因为饥饿难忍，在放风时因掐一棵野菜吃，被看守发现用木棒打得满嘴是血，牙都被打活了，看守还硬逼着他把带血的菜团吐出来。面对着凶残的日本看守，在狱中，许多共产党员组织难友们进行反饥饿、反罚饭的绝食斗争。

狱中的另一种刑罚是“笞刑”，不论在厂房、窑场或菜地，看守经常把人胳膊、腿捆绑在木杠上，俯卧在地，然后用竹条或镐把抽打。有时看守把人带到三角形的刑讯室“调室”里，剥光衣服用皮带把人绑在“火”字形的老虎凳上，看守站在两侧，用灌铅的竹条抽打。为了不让受刑人喊叫，看守事先用湿毛巾把他的嘴堵住，或是强迫咬住特制的小枕头。待看守把人打得皮开肉绽拖回牢房，有的伤口腐烂化脓，甚至有的生蛆也根本得不到医治，过几天刚长出嫩肉还得遭受再次毒打。老工人隋学民1936年平白无故被抓进监狱，在关押1个月期间，竟被毒打半个月，他带着刑伤出狱后，背上留下一道道仇恨的伤疤。

那些反抗斗争强烈的革命者，即所谓“严重违犯狱规”的人，在遭受严刑毒打之后，还被戴上特制刑具“皮铐子”，把两

只手腕固定在腰部，然后被关进地下室漆黑窄小的暗牢里。每间仅2.5平方米，墙上有一个内大外小的观察孔，供看守监视用，平时用铁板挡住，不透一点光亮，还被罚吃7等饭，每顿仅1两。许多人在暗牢里被摧残致死。

这座阎罗殿，不仅刑罚名目繁多，用刑次数更是惊人。仅据日本《关东厅要览》和《关东局要览》中不完全统计：1930年受刑为27.6万人次；1940年竟达44.3万多人次。被酷刑迫害致死者也是逐年增加，据日本《刑务要览》中1936年前的统计，30年间死于重刑之下的有一百五十多人。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捕人剧增，用刑频繁，伤残和致死者多得无法计算。

日本法西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屠杀中国人民，于1934年在监狱东北角修建1座两层楼房式的秘密杀人场——绞刑室。这座占地90平方米的特殊建筑，楼上北部是宣判庭，被判处绞刑的革命志士和爱国同胞，戴着简帽和手铐、脚镣，由看守押送到绞刑室东侧的停囚室等候。当法院院长、宪兵队长、警察署长、刑务所长、法官和书记官到场后，看守把人带到案前进行宣判。宣判结束后看守用布蒙上被判死刑者的眼睛，打开折迭式的门，把人强行按坐在南部地板中间的活板上。梁上3个滑轮挂着3根绞索，看守把其中的1根绞索套在人的脖子上，待刑务所长下令后，看守扳动手阀，活板撤去，身体便悬在空中。绞杀后，由医师验尸，确定已死，便由押丁解下死者的蒙脸布，除去镣铐，然后把尸体卷曲塞进半米粗，1米高的木桶里，抬到监狱墓地埋葬。

在这里究竟被绞杀多少人，已经无法计算。1942年12月9日、10日两天，爱国志士姬守先等9人在这里英勇就义。他们是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俗称抗日放火团）成员，从1935年9月进行第一次放火爆破开始，到1940年6月止，共放火57次，给

日寇造成的损失日币约两千多万元以上。1940年6月国际反帝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被捕成员达一百多人。总负责人姬守先在上海被捕，关押在旅顺刑务所。在狱中他填词作歌鼓舞大家继续与敌人展开斗争。审讯时法官问他："你们为什么放火?"他义正辞严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侵略中国?"经过长达5个半月的审讯之后，敌关东地方法院判处姬守先等12人死刑（其中有3人在狱中摧残致死，其余9人在绞刑场牺牲)。临刑前敌人问姬守先："你们放火团有多少人?"得到的回答是："很多，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到处都是，不知其数。"当敌人问道："你对日本有什么看法?"他回答："日本侵略中国，必然灭亡！"说罢高呼口号，从容就义。条条绞索沾满我抗日英雄的斑斑血迹！累累白骨铭刻着中华民族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帝爱国精神。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旅顺刑务所所长田子仁郎，匆忙指挥看守烧毁档案，掩埋罪证，妄图逃脱罪责。同时在狱中进行秘密大屠杀，由延安抗大派来大连搜集敌人情报的刘逢川等人，就是在敌人投降的第2天，由田子仁郎亲手指挥，杀害于旅顺监狱。

（摘自《大连文史资料》）

旅顺监狱回顾

古賀初一

徐宗志译　王士震校

译者的话：从1894年甲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在历次侵略

战争中，对我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旅顺白玉山北麓的那座“旅顺监狱”，就是历史的见证之一。

这篇回顾文章，是我当年旅顺医专日籍同学古贺初一先生写的。他从1944年5月到1945年7月，在旅顺监狱任医官1年零3个月。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现在在日本松山市牧病院工作，是一位精神病科医师。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我们之间有书信来往。1984年，旧《官立旅顺医专同窗会志》第20号会志里，有古贺先生撰写的这篇文章。他将亲历、亲见之事加以实录，对狱中的恐怖、暴虐和残酷，均有一定程度的暴露。但是，由于作者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对文内某些部分的描述，不能苟同。

旅顺监狱当时囚禁约有1 500余名囚犯。我到职之后，狱方口头上说要任命为技师，可这完全是一种敷衍，过后在委任书上写的，只是个医务官。对此，我虽发过牢骚，但也无济于事。但是住上了唯一的一处部长级的官邸，其环境之幽雅，房间之宽敞，倒使人稍为得到了一点安慰。

这个监狱，长期以来没有专职医师。狱方希望能从我校毕业生中选拔人才，担当此任。有位姓小岛的医师，是熊本医大毕业的。他在大连分狱当医生，又到旅顺监狱出诊，好象是身兼两狱之职。这次我们来了，才填补了空缺，狱方自然感到莫大的满足，不过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象样的优厚待遇。记得当时狱中有总务、保安、供应、财务、教务等课。监狱长是东北（北海道）口音的日高氏，他在执行最重要的保安工作时，经常耸肩瞪眼。我们两人到任后，才正式成立医务课。当时的监狱里还是同旧时代一样，犯人穿的都是上下一抹红的囚衣，只有被认为表现比较好的，才给穿蓝衣青服。在临近战争末期（1945年）的时候，监狱里也更加法西斯化。对上司的命令，必须绝

对服从，什么人权、自由，全被剥夺了，囚犯们只有默默地去干强制性劳动。而吃的，由于粮食不足，只能得到少量麦子饭（大麦做的）或栗子饭（橡子面做的），饭里又只加点少许盐水或蔬菜等。因此被囚者个个营养不良，身体消瘦，染上了肺结核等多种疾病。药品和医疗器械都很简陋、奇缺。重病囚犯抬到医务室后，也只在形式上作了点诊疗，此外别无他法。遇有患龋齿的，因麻药很缺，就不作麻醉，即用钳子或钉起子硬拔。对患痔瘘的，也只稍为作点周围麻醉后，便就强拉缝合。医务课附设六七个病房，只有二十几张床位，经常是超满员的。这些危重病号，就在病房里呻吟着，即使熬过了今天，而明天是死是活又怎么知道呢。对这些病房，虽都做了认真的查房，但个个都是重症，实在无计可施。特别是遇着有些病号缠住我苦诉不休时，也确实使人产生怜悯之情。在临近死期的时候，只有男性下属人员帮助料理一下。由于管理不周，卫生很差，弄得脏乱不堪，再加上尸臭味，成群的苍蝇，顺着铁窗缝隙钻进来。同样敏感的乌鸦，也竟然成群落在病房的屋顶上。

囚犯中，日本人约占1/10，其余多是中国人。他们很多是无辜的，是冤枉地以莫须有罪名被强行抓进监狱的。在我任职的1年零3个月的时间内，曾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件，自杀者有之，杀人者有之。如有1名囚犯，因不堪忍受长年累月的监狱生活，就跳入狱内的1口圆形大井，自杀而亡。还有1个日本犯人，在白天用锐利的剪子，刺杀了在后门值勤的朝鲜人看守，抢得钥匙，夺门而出，逃入山中。后来，警察、消防团等一齐出动，进行搜山围捕，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抓回。被刺杀的那个朝鲜人看守的尸体，即交由母校向笠教授进行解剖，我作为助手，至今记忆犹新，怀念不已。

关于肉刑

这里也与日本国内一样，也许是德川时代的一种残余。诸如拷打50到100板子的体刑，是司空见惯的。满、蒙等地的要犯，都是从大连分狱转送过来的，大概有一两百名。每一个受过这种笞刑者的臀部，都被打得皮开肉绽，一片紫黑色，肿胀得血肉模糊。可以想见，这是看守们象怀有杀亲之仇那样，狠心地用皮鞭毒打成的。这些受刑部位，不久便化脓溃烂，苍蝇争噬，产卵其上，久而生蛆，四处乱钻，最后拱出蜂窝似的许多孔。还有些受过笞刑的囚犯，从分狱押过来时，已经生了蛆。同厕所里的蛆一般大。没有比消灭这种蛆更难办的事了。面积大，有孔穴，成百成千条蛆钻在里边，用镊子钳取，几乎不管用。当时用注射器装上红药水、来苏尔液或双氧水等药物，又灌注，又涂抹，全无效果。最后只好撤手不管了。距离监狱约300米的地方，有一片很大的坟地，这里永眠着成百成千的英灵。许多尸体的手足和头颅都暴露在外。我把那里的颅骨拣回狱中，作灭蛆试验。

旅顺监狱里，女囚犯很少，大概不到1/10。奇怪的是竟有七八名日本尉级军官，她们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生或动员入伍的学生，是被提交军法会议后判了罪而坐牢的。她们在狱中很守规矩，并能完成看守各栋牢房的辅助任务。我记得囚犯中还有一些下士官（军士），可能也是从关东军遣送来的，人数与上述尉官差不多。

执行死刑

同学中有参观过的，或从军队复员到监狱工作过的，他们自然都知道执行死刑的具体情况。现在我仅将任职1年零3个

月期间，狱方执行将近20名囚犯死刑的实际情况，概述如下：

旅顺监狱的重罪犯，大多数是从满、蒙等地送来的。执行死刑，并不象日本国内那样，必须经司法大臣批准，而完全是听从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我当时不知道死刑囚犯究竟有多少，也不敢想去知道，因为这可能是只有监狱长及其亲信才能确知的秘密。每次执行死刑，总是突然宣布的。由于没有医师在场，便不能执行，因此监狱长都在执行的头一天，就下达命令，确定具体的时间。每一次执行死刑，有时是三人，多的时候有五六人。虽然这已经是惯例，执行多次了，但是，在一接到这种命令的时候，我即会浮想起那种令人痛心的凄惨情景，几乎夜不成眠。连我都这样，那么对不知明天将如何的死刑犯人来说，会想些什么呢！他们对死的恐怖，又将是怎样呢！这些要被处死的中国人中，很多都有妻子和儿女，但狱方禁绝一切会晤，他们只能在单人牢房里，孤苦地过着日日夜夜。据说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在执行死刑的前夜，为使囚犯与世惜别，要提供一点特别的饭菜给他们吃。可当时我不清楚，狱方果真能供给向囚犯暗示即将死亡的膳食吗？教务课的人，有称教诲师的，都是住持。他们大概是对死刑囚犯反复进行过超脱生死、无私忘我的教诲了吧。到即要行刑时，死刑犯人的脸上被蒙上象草帽一样的东西，穿着红色囚服，带着手铐，由三四名看守押送，向着坡度很小的土丘上走去。不管哪一个死囚，对这一条微斜的坡道，都是深恶痛绝的，有些人发出悲怆的哭叫声，步行踉跄，以致被强行拉上刑场。我记得刑场就在围墙东角的一隅，是一块稍高一点的土丘上，那里的围墙也高出一截。刑房是两层楼建筑，上下两层各有10张草垫那么大小，呈长方形。临刑时，狱长、医师及各课长都并排站立在二楼阶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便把死囚拖到阶下，由站在中央的监狱长宣读罪状的要点，接

着便严肃地宣布判决：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为了走走形式，按惯例还要问过死囚是否有异议或需要申诉之类的话。这些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大概只有五分钟左右时间。最后就开始行刑，囚犯被拖到1米见方的木板上，戴上手铐，蒙住眼睛，套上吊首刑具，再用纽带把脖颈系紧。这些完了，我便快步下楼，等合页一开，死囚就从活板上落下，立即检查死囚心声停止情况，并向监狱长举手报告。这间刑房的高度大概有4米，死囚吊落时脚不着地，距离约有30公分。由于一经吊落，死囚的舌骨便立即骨折，这时，鲜血和分泌物渗流而出，鼻腔里也喷出带血的鼻涕，蒙面纸已经渗成深深的紫血色。在心音停止期间，人象刚钓上来的鱼一样，左右前后猛摇晃。为防止这种晃动，有3名看守，从三方面拉着从犯人腰间系出来的绳子。我在这个阎罗殿中，随即把粘满血迹和分泌物的胸间部分衣服扒开，在心音部位放上听诊器，以测知心音的变化。常有这样的现象，呼吸即使停止了，但心音由于有自主性，常能继续搏动8分钟左右，等到出现吱、吱这样血液的流动声，搏动也就没有了。这段时间大约有一两分钟。心动完全停止，心脏就失去了机能，证明此人已经死亡；于是我就举手向监狱长递送信号。第1具尸体装棺转移之后，就等待下一个。惨，真惨；1具、2具，以至5具，必须连续地测听下去。面对着如此生身死体，我痛切地感到自己担任此种职务是多么的不幸，真叫人难以忍受。那条作绞刑用的大麻绳，已经相当旧了，证明它已经吸尽了多少人的鲜血啊！听说明治42年(1909年)10月，在中国哈尔滨暗杀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日本在朝鲜设置的最高统治长官）的朝鲜英雄安重根氏，也是在这里作为“刑场之露”而被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并埋葬在前述的那座土坟里。对于死刑的是非，姑且不论，只说绞刑，实在是太残酷、太惨无

人道了。

我是昭和20年（1945年）7月16日到阜新步兵部队任队见习军官时，离开旅顺监狱的。这期间所有死囚的尸体，几乎都被运到母校的死尸房去了。

（摘自《大连文史资料》第五辑）

我从鹤岗刑务署死里逃生

李海廷口述

郭相忠整理

康德11年（1944年），我在佳木斯东蒙古力发电厂当运转工。11月的一天，我正上夜班时，厂里看守警和日本侵略者们突然把我们上夜班的十几名工人看管起来，说丢了3条防空窗户帘，要我们交出来。我们都说没拿，他们哪肯相信，便挨家翻。从我家翻出了1个大灯泡，他们就把我送到伪警察局，监押1个月后，县属法院以“时局盗窃罪”为由判我两年徒刑。从司炉工刘子元家翻出两疙瘩苫布头，还有1条自行车链子，判他3年徒刑。过阳历年时我俩一起被送到鹤岗刑务署刨煤。

鹤岗刑务署是个大监狱，关押一千多名“犯人”。这座人间地狱是日本侵略者镇压、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进了监狱就是进了虎口，幸存者寥寥无几。

“犯人”入监时自带的衣服、行李都叫看守和“犯人”的中队长强行收去了，“犯人”们只好腰里围上草袋子、洋灰袋子。我进监时穿一件蓝棉袄带一条麻花被，都叫一个姓刘的中队长“要”去了。佳木斯西竹帘一个“犯人”，入监时带一床新被，一

个姓宋的中队长向他“要”，这个“犯人”不肯给，在监房，这个中队长当着大伙的面用镐把打得他死去活来，入监仅3天就被扔到东山坡（即大陆“万人坑”）去了。

那时“犯人”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面、冻土豆、米糠掺在一起做成的团子，每个出工的“犯人”每日两顿，每顿一个不过3两的饭团子。我家每月给我送一次吃的，可我根本接不到，都叫看守没收了。“犯人”喝的是又脏又臭的冷水，还不经常有，断水时，大家只好下工后用“囚盆”带点水解渴。

“犯人”在陆镜三坑井下运搬、刨煤，每日12小时以上的劳动，上下工时用大铁链子将“犯人”大队围起来，每3个人用铁链子锁在一起，有的还戴着沉重的脚镣子干活。一个场子有盏嘎斯灯，“犯人”头带一盏灯。日寇不管“犯人”的死活，作业场所根本没有防护投施。采煤是掠夺式的高落采法，拿锹捅几下就往外跑。干不动活的或者刚从场子跑出来喘气的，一旦被日寇和看守们发现就往死揍。他们还狂叫着“三天开放、镐把炖肉”。“放”就是打“犯人”，“镐把炖肉”就是用镐把将“犯人”活活打死。“犯人”们在井下冒顶砸死或叫看守们打死的事经常发生。

1945年4月，我患病住进了“病号房”，“犯人”最怕进“病号房”。“病号房”实际就是等死房。“病号房”有3栋房子（在南山矿3采区煤仓对个儿，现改家属住宅）。“犯人”有病后，轻点的住南面1号，重者住北面的3号，中间的2号为1、3号间的过渡病房。每栋房住一百多“犯人”，南北大炕，大小便在屋里，唯一的小窗户用铁筋严严地堵上，屋里不见阳光，又闷又臭。跳蚤、臭虫一层层的，将人咬得睡不着觉。“犯人”一天只给两小勺苞米粥米汤，根本不给医治，有时还将几个“犯人”绑在一起，进行种种折磨。例如把“犯人”们绑在一起责令绕操

场跑，跑不动的不是打就是吊在木柱上。有个姓窦的看守拎着1根棍子，每天到1号病房挨个敲打"病犯"，催着下井刨煤，经不住打的带病出工，实在动不了的，就往2号病房送。我在2号病房住了5天，就看见"病犯"死了六七个。和我挨铺的一个姓韩的"犯人"，满身长水痘子，得病才几天不等往2号病房去就被折磨死了。凡是到3号病房去的，去多少死多少。不给治病还不给饭吃，怎么能活呢？刑务署里有辆专拉死人的两个马的车，带个篷子，每天最少要拉两次，每次拉五六个人，多时一天拉二十多人，往东山坡"万人坑"一扔就完了。1945年5月，亲友花了好多钱托人将我保外假释，算是拣了条命。出来时我瘦得象个纸人，要是再熬三天两天非死在里面不可，这一历史悲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摘自《鹤岗文史资料》）

富锦炸狱记

牛春圃

伪满康德7年（1940年）农历正月初七，富锦县发生了一起不寻常的事件——炸狱事件。这次炸狱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动，严重地打击了敌人。当时不仅震惊了三江下游，也震动了伪满洲国。但是，由于暴动计划不周密，加上敌人力量强大，结果失败了。日本侵略者对这次炸狱的"犯人"，进行了疯狂地大屠杀，给富锦制造了又一起惨案，欠下了中国人民又一笔血债。

监狱密谋

富锦监狱坐落在现在第三中学南院，周围是两米高的青砖墙，四角有4个炮台。这个院当时分为两部：法院和监狱在西半部；伪县公署在东半部。监狱是10间青砖瓦房，除看守室3间，厨房1间外，其余是男女牢房。

监狱戒备森严。有男女看守11人，管狱官1人。监狱后面设有警备班，有警察11人，各配备长枪1支，子弹100发。东院设有武器库，内藏各种枪支、弹药等。

1940年初，监狱有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刑事犯等等“犯人”210人。其中有要犯40人，一般犯人170人。要犯葛景禄不畏强暴，刚强不阿，警备班和看守们都认为他是难对付的“刺头”。在一般犯人中，孙秉贞微黑的脸庞，魁梧的身体，是一个精明强干、有胆有识的人。他因给抗联购买子弹于伪满康德5年（1938年）被抓入狱，判处6年有期徒刑。在监狱中，葛、孙两人受尽了折磨，经受了严刑拷打。同时每天都看到服刑的中国人，蓬头垢面，衣履单薄，肤黑肌瘦，被摧残得半死半活的惨相，使他们五内如焚。于是他们立志要砸碎这座人间地狱，使“犯人”们都得解放。

葛、孙明白，把这样一座大监狱打开，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俩首先由孙和看守搞好关系，使看守逐步对他放松戒备，给点方便；第二步是了解情况和组织队伍；第三步是炸狱。

孙是富锦人，又不是要犯，再加上孙本人的机智，很快和看守搞熟了，取得了信任，他们给孙换上一个比较轻的脚镣子。看守在监视“犯人”吃饭时，经常找孙帮忙送饭、盛饭。由于看守的信任，孙比其他“犯人”的活动能方便一点。他及时利用这个方便条件，了解了监狱的情况和进行串连活动。

葛、孙在掌握了内外情况和群众要求解放的基础上，开始研究实现第三步计划——炸狱。

1940年初，葛、孙等人确定以葛景禄为总指挥，以男牢房为突破口，炸狱时间定在春节以后。过完春节又明确定在农历正月初七。这次炸狱是欲用看守的11棵短枪，夺取警备班的11棵大枪和警务科的武器库，改穿警察、看守衣服，赚开城门，投奔抗联。

夺取武器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七这天，富锦监狱的“犯人”们，盼望午后下班的时间早一点到来。刚过完“破五”看守还有点松散，午后就有的回家，有的上娱乐场所了，看守头头黄狱官也在家赌钱。到晚上监狱仅剩下隋、黄两个值班看守，后屋警备班的人也不多，正是动手的好机会。

4点钟下班的时间到了，值班看守来查人并准备开饭。孙秉贞对看守说：“我的脚镣太紧了，走道迈不开步，给我钥匙收拾收拾。”姓隋的看守把钥匙交给孙秉贞，孙麻利地打开脚镣，假装修理，趁看守低头看的时机，葛景禄突然掐住他的脖子，孙立即举起脚镣子把他打倒。同时几个“犯人”，闯进看守室操起洋刀，把屋里姓陈的看守砍昏，出来把姓隋的看守砍死。孙立即给大家开脚镣；葛指挥众人，一边操短枪，一边换衣服（看守的旧衣服都集中到看守室保管）。夺下枪支，换上衣服，葛领一部分人去夺警备班的大枪；另一部分人奔向警务科的武器库。

这天，警备班的队长付恩林和5个警察没有回家。付恩林刚吃完晚饭在炕头面向门坐着，忽见屋门一闪，几棵匣枪对准了他的前胸，为首的葛景禄喊：“不要动！”其他几个人到炕上摘下了所有的大枪和子弹袋，并令警察把衣服脱下。炸狱群众正

在穿衣服，忽听到外面枪响了，而且响的很急。炸狱者明白，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出现了——后院日本守备队打来了……

监狱大战

去警务科武器库夺取武器的那部分人，遭到了警察的袭击。如果是正常情况，那部分人用几棵匣枪突然地夺取只有一个日本人守卫的武器库，是不困难的，不幸的是这天却发生了意外；炸狱时伪县公署的人虽然都下班，但伪警务科的警务股却有几个人，因为才从佳木斯开会回来，准备汇报材料没有下班，他们听到外面响动，又看有些人奔跑，料想出了事。警察们匆忙跑出警务股，有的锁住小角门，有的急奔武器库，从看库的日本人手里取出武器，炸狱队伍被阻击。霎时间，日本守备队枪响了。

原来炸狱时忽略一个细节，没有及时割断电话线。使值班警察在混乱之际向镇内伪警察署和日本守备队等机关通了电话。日本守备队闻讯赶来，从北面和西面包围了监狱。

葛景禄等人立即退出警备班，奔赴炮台，夺取武器库的计划也只得放弃。葛景禄等人抢上炮台，打死了两名日本兵（其中有一个上士），顶住了日本守备的进攻。这时南大营的伪满驻军赶来，占据了监狱的南面，使敌我力量发生了悬殊的变化。

敌人的机枪、手榴弹、橹杆炮、大枪的子弹、炮弹象下雨一样，从四面八方向院内倾泻。面临绝境的暴动队伍，只凭11棵大枪、十几支短枪和不足千发子弹，同敌人殊死拼搏，血洒院庭。坚持斗争的炸狱者，从晚5点一直打到晚10点。只有1人因1条腿被打断，留下1颗子弹做为必要时用，暂时隐蔽起来。那些人子弹先后打光，都陆续壮烈牺牲。

热血洒中华

晚10点左右，炸狱者的枪膛已经不再发射子弹了，可是敌人还是密一阵、稀一阵地往院内射击。直到晚11点，他们才敢一步一步地往院内靠，走进院内。伪县公署庶务科长金子龙次，系大尉衔日本在乡军人，从佳木斯开会回来，正赶上双方战斗。枪声一停止，他到马棚去看他那3匹种马，刚走进马棚，一声枪响，从马棚深处飞来1颗子弹，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这就给打断1条腿而隐蔽起来的那个炸狱者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找到了理想的归宿。

炸狱第二天早晨，群众到法院内看到，包括孙秉贞在内战死了37名。有的人手拿战刀，大部分人穿着看守、警察衣服。这衣服是赚开城门用的，可惜没出去，这衣服也就没有发挥作用。这些衣服昨天是敌伪爪牙的保护色，而今天却做为中国人智慧与勇敢的记忆，永远留在炸狱者身上了。

在监狱大战正酣时，以葛景禄为首的炸狱者撤出了18人。富锦城当时四面都有城壕和城墙，炸狱开始后，敌人就对富锦镇进行了严密封锁。第二天，以伪保安股长警佐吴殿全为首组织了富锦城乡的大部分警察进行搜捕。炸狱者没有冲出富锦城，陆续被搜捕回来。以后把葛景禄等18人绑赴嘎尔当，一个个都惨死在日、伪的屠刀下。

这次炸狱55腔热血洒在中华大地上，但热血并没有白流。打死了两名日本士兵和一个日本科长。更重要的是它唤起了成千上万富锦民众的觉悟，同时也正告了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此文根据牛春国、付恩林、孙中发等五位老同志的口述，张国熙整理。　　　　（摘自《富锦文史资料》）

伪满的警察教育

杨　峰

伪满洲国可以说是一个警察国，警员之多、警察权之重，几乎是世界少有的。据称伪满的人口是3 000万，可是警察就有10万人，每300人就有1名警察。当时在警察部门盛传着这样一句话："警察是内政的中枢，国家一切施政，都有赖于警察来推行。"还有这样一句话："警察的天职就是限制人民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2年底制造了伪满的傀儡政权之后，首先就注意到警察。在民政部设置了警务司，日本人担任司长，同时把旅大日本警察署的日人警察和中国人的巡捕大量地安置到伪满警察机关的各个阶层。一个县约三四名，省警务厅十多名。在1933年，他们安置的人员就在一千多名以上。

1936年前后是所谓伪满的全盛时期，他们安置的日本人警察可能达五六千人之多。

日本殖民统治者非常重视警察教育，他们为淘汰旧警察和培养新的爪牙，在1932年下半年设立了各级警察学校，各省和特别市设置了地方警察学校，各县设置了警察训练所。

中央警察学校设于1932年7月，校址在新京（长春）的南岭。置有日本人的专职校长和日人、中国人的专职教授、教官。它的内部分为别科、本科两个科。本科招收各省、市、县的现职的警尉、警佐等人员，采取考试入校的办法，每期招收300人左右，训练期为1年，好的缩短为10个月。

学习科目有：训育、宪法、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

法、国际公法、特务警察、警察勤务、日语等。此外还有军事训练、马术、柔道、劈剑、刺枪等等。

他们最重视的是训育，这门课程概由日本人的校长或日本人的教授来进行。没有什么定型的教材，而是临时选定教材，如：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日满议定书等。或者用训话的方式标榜着"日满协和"、"一德一心"、"日满不可分"等等来奴化学员，从思想上解除他们的武装。

为了施加怀柔，各期学员的在校期间，还必须去日本进行一次视察旅行，所到各地还给予"有礼貌的"、"亲切的"接待。同时还必须参观明治神宫、奈木神社博物馆以及他们的大工厂等，用来启发学员的"忠君"和对日本的文明羡慕的思想感情，这种旅行往往要费时1个月到40天的时间。

总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奴化和引诱，从学员中寻求忠实的爪牙。毕业后，就选拔他们认为满意的、"优秀"的学员送往日本各省警察讲习所学习。学习期为2年。经过两个阶段学习后，他们认为是忠实的、可靠的人，就成了警察的中坚分子。

本科共办了26期，训练了六千多人。其中选拔的留日学员一百二十多人。

别科是专门训练日人警员的。凡是日本人的警员，除了旅大的和其它领事馆旧人员（所谓的中国通），之外都要经过别科的训练。由日本国内招来的青年或退伍军人，训练期间概为一年；其他现职人员的各类讲习班大致为6个月。一共办了28期，训练了近4 000人。

各省和新京、沈阳、哈尔滨特别市的地方警察学校分别成立在1934年的春天。校长概由省警务厅长、市警务厅长兼任，另外置有专职的警正主事（日本人）和警正学监（中国人）。

地方警察学校分为两科，即普通科、讲习科。普通科是招

收一般失业青年，训练期为6个月到10个月不等，毕业后分发各县任警长、警尉补。学习科目有：训育、户口调查、违警罚法、刑法、警察勤务及其它有关警察法令和军事训练等。

讲习班是分别召集各县市的现职人员，依照职务的需要，做各科专门的业务教育。如司法讲习、特务讲习、指纹讲习、外勤讲习等等。讲习期为3个月到6个月不等。

各县的警察训练所成立于1934年的春天，置有专职的警佐主任。招收地方上失业的青年，训练6个月之后就地任以警长、警士。学习科目略同于地方警察学校。

伪满警察在各级警察学校的教育下，很快地扩充起来，到1935年年底把旧的警察人员除了森林警察队还保留一部分之外，完全淘汰净尽，而代之以新的警察，成为日伪政权有力的统治工具。

1944年秋，废除了中央警察学校，同时在长春、沈阳、哈尔滨、热河设立了4个国立警察学校，连同十多个地方警察学校招收了近5 000名学员。当时国民高等毕业生入校，作为警尉候补生。训练期定为1年，毕业后任为执行警尉，这期学生没有毕业，日伪统治就垮台了。

伪奉天省警察学校

马恕知　史乃征

伪满洲国的中央机构设4个院，即立法院、国务院、司法院、监察院。国务院下设8个部，即民政部、军政部（后改治安部）、教育部、卫生部、外交部、交通部、司法部、财政部。各部下

设司。民政部设警务司（原设在治安部，后归属民政部），在各省中设警务厅，省地方警校直属省警务厅管辖。

1931年伪奉天省成立警察官训练所，其前身是辽宁高等警官学校分校。它以招收新警察为主，并对留用的警察也分批训练，3个月1期，属速成性质。

1933年取销了警察训练所，成立“省地方警察学校”（下简称“省警校”）。1944年又改名国立第二警察学校，到日本投降伪满垮台。

一、省警校机构组织情况

省警校直属省警务厅，厅长兼任校长，下设主事1人（日本人，即教育长，参事官或事务官，警正级），设学监2人（日“满”各1人，警正级），下设教官（警正、警佐，监督警尉级）30余人（日“满”人各半数），助教（事务警尉、警尉补）20余人，助手雇员、打字员十余人。

二、教学管理方面，分术科和学科

术科：又分几个区队，设区队长区队副各1（是警佐、监督警尉教官），下分设系班，有正副班主任教官（警佐、监督警尉）。

学科：由监督警尉以上教官分科任教，术学两科均由学监负责管理。

设事务室管理学员食宿、医疗、卫生、财会、后勤等，分别由舍监及事务主任负责管理。

三、学生来源及培养目标

学员有新招收和在职两种，每年要举行两到三届新生考试，

临时成立招生委员会，分若干组到各市县招考新生。入学后服装、食宿一切待遇免费。

资格按招考科别不同，要求文化程度不一，如2部生警长班，必须是初中以上毕业；1部生警士班，必须是高小以上毕业或同等学历；警尉候补生班，必须是高中毕业或国高毕业者。

经过身体检查、学科考试、口试合格者，择优录取。

分科：普通科1、2部，高等科，特种讲习科，警尉候补生班，讲习班。

普通科1部生学习4个月，毕业任警士；2部生学习半年，毕业任警长；警尉候补生班学习1年，毕业任事务警尉，再经考试合格，升监督警尉。

高等科：以培养高级警官为对象，由市县抽考新任监督警尉者，在校学习6个月，毕业时优秀者留校任教，其余回原单位，逐步考升警佐、警正。

讲习班：以现职高级警官为对象，监督警尉、警佐级或高等官试补（是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职称）的大学毕业生，刚分来工作、经考试任警佐至警正。此班原在长春中央警察学校本科，后改在省警校学习。

特种讲习科：

日语讲习科：以现职警察为主，多少有日语基础，入校学习深造6个月，毕业后达到3等翻译程度，分派各市县。

鉴识讲习班：现职做指纹照相的，来校深造3个月，毕业分送原单位。

特务讲习科和司法讲习科，均以现职人员进行专业深造，毕业回原单位，每3个月为1期。

警备队训练班和消防训练班：均由各市县选送现任警士来校专业学习3个月，毕业分配原单位警备队和消防署。

此外，治外法权撤销时，由日本管辖的关东州拨来一大批巡捕（日本警察中的“满”人），为适应满洲警察制度，先后3期来校学习两个月，毕业分送各市县工作。

还有在1944年初，省警校曾去日本内地招募一批新警察，属于特殊教养，共有120人，毕业后升事务警尉，分派各市县。

四、教学内容

（1）学科：分民法、刑法、民刑事诉讼法、法学通论，违警罚法（治安条例）、户口调查、勤务要则，警察法、保安警察、行政警察、卫生警察、司法警察、特务外事警察、犯罪搜查学等。

上述各学科，按学员班科之别，分选或全部教授。

（2）术科：从徒手教练基本动作开始到持枪教练，由班教练逐步到营教练止。

此外有点检、马术、剑道、柔道刺枪术、捕绳术、实弹射击、野外演习、紧急集合、夜行军等。每天有朝会，全校师生集合后举行向宫廷、东京遥拜，念警察纲领。每周星期一第一节课由主事训话。

五、鱼肉人民者与不甘附逆者

由于帝国主义者一贯依靠高压手段控制人民，为达到此目的，就豢养大批爪牙，并给这些爪牙以很高的权力，如伪满警察法规定第一条就声称：“警察者国家最高权力之作用也……”对外美其名曰“亲民警察官吏”，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皇帝陛下警察官，享有最高之权威。特别是在1938年施行文官制，警士都是为丙种委任官，各派出所全挂上：“警察官吏派出所”的字样，这一来有些不识时务、品质恶劣的人，骑在人民头上横行

霸道，无恶不做，造成很坏的后果。

伪警察薪俸较低，虽然也有定期增俸，年终发双薪，但基数低，增长又不多，很难维持数口之家生活。有些人下班休息，竟在外出摊床做小贩，也有人短途贩运土产品。这些人基本上安分守己，不敢做坏事怕留后患。

另有一些人，则利用职权，进行敲诈勒索，如买东西少给钱、不给钱，勾结赌徒、小偷进行非法活动，从中渔利。

更有甚者，在施行经济统治和治安肃正的政策时，老百姓吃大米常被以“经济犯”罪名为警察逮捕。施行国民手帐（良民证）时，无户口的或从关内来无“良民证”者，被认为行迹可疑即送交思想矫正辅导院强迫劳动，或送往北满劳工集训队，很多人受害身死，光复后幸存者极少。摊派劳工时，派出所和街道联保勾结，强行勒索，不出钱就抓人送去当劳工……这种人虽数量不多，但危害甚大，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沈阳市警察厅有个厅长叫白铭镇，曾在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指责这种败类说：“都这样干，算什么亲民官吏，简直是一群警匪。我一定要整顿警风，为民作主。”这几句话引起日伪当权者很大反感。不久白铭镇只得引咎辞职，扔掉了乌纱帽，以后竟遭日本人的毒害死去。还有个日本人叫樱野，是新京警务司属官。他考查奉、吉二省警政归来，提出对伪警察应提高薪俸，保障生活，才能尽职尽责，否则要酿成后患的报告。当权者认为他刚从日本来，不了解满洲一切竟予以驳斥，并将他调任奉天省地方警察学校当教官。他来校不久，又与满系教官讲述他的报告是与国情民意有利，否则后患不堪设想，还讲什么王道乐土呢！此事被主事财部知晓，对其痛加申斥，他不服，两个人口角打架，结果被上级免职处分，送回日本国了。

此外，更有一些人不甘附逆的反满抗日者。

伪满统治14年，虽有许多青年参加伪政权各部门工作，但也发生过有民族气节、不甘附逆当日寇爪牙的事件，仅我了解先后就有七次之多，被日伪警察抓捕，以反满抗日的罪名，蹲监作牢，被处死者大有人在。

特别是发生在1943年12月30日的“一二·三○事件”和发生在1945年5月23日的“五·二三事件”，二次全国动员，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特务进行大逮捕和秘密逮捕（以召集去开会为名进行逮捕，外人不知）。被捕者属伪行政机关、学校、军、警界的人达两千余。其中仅警察界就有省警校教官齐××，锦州省警务厅保安科长张××，双城县长王××，德惠县警务科长（局长?）戚××，警务司属官张××，沈阳市警察局事务警尉王××、打字员郑××等200余人。这些人被捕后，虽受酷刑毒打，灌凉水、过电等审讯，但均不招供，宁死不屈，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

伪安东地方警察学校

修玉麟

伪满警察学校是现在人们对它的俗称。它在伪满时的实际名称是安东地方警察学校。它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镇压我国人民，豢养、培植统治我国人民的奴才与走狗，维护它们的殖民政策，实行法西斯反动统治而设立的。日伪安东地方警察学校的校址在八道沟元宝山下，就是现今丹东市第一医院住院部这个地方。早在警察学校之前，这里的前身是寄骨祠。那时，外

乡人在安东死了，有的不能马上埋掉，把尸体盛殓在棺材里，寄存在“寄骨祠”，以待关内客商船户方便时候将尸骨运回原籍。寄骨祠便成了临时存放尸体的场所。从1926年（民国15年）开始，随着八道沟一带的开辟，以及安东柞蚕工业的兴起，丝绸业开始商品化，一时间几个私营缫丝厂相继建立，人口也随之逐渐增多。每当春季伊始，鸭绿江解冻，诸多死亡者家属来安东起灵。此时，家属往往是捶棺击椁，哭天号地，哀痛之声不绝。尤其在春夏季节，棺内尸体腐臭之气使人难挨，后来由安东商务会出资盖房，将寄骨祠迁至九道沟里乱葬岗一带。于是，这块院落于民国15年（公元1927年）7月被安东县警务局拘留所占用了。警务局并在这里开办了骑兵训练队。彼时交通工具落后，为了强化治安，采取“以马代步”措施，受训者尚不过十二三人。这些受训者，自备马匹，马的饲料由警务科支付，但受训者开双饷。训练科目为马术、徒步制式教练等。受训者也就是拘留所看管犯人的警察。

伪满警校的组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推行“以华制华”的策略，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帝国，伪满洲国在安东地区设立了省的建制。那时的安东省所辖是1市6县：安东市和安东县、凤城县、宽甸县、庄河县、桓仁县、岫岩县。由于安东省、市的设立。安东县公署警务科便将拘留所移到金汤街县公署院内（现在金汤街第二幼儿园）。而八道沟现在住院部这块地方，在日伪反动统治者的策划下，便成为了“满洲国”安东省训练警察的基地——安东地方警察学校。以专门训练伪警察为对象，受训期为6个月，毕业后发给证书，由伪安东省警务厅授予伪警士衔。此后又陆续把市县现职的警察调来轮训，无一遗漏。日寇为了残酷镇压中国人民，遂举行短期训练班，挑选效忠日寇，并有显著

事绩为条件，编有经济班、特务班、司法班等等，训期为1个月，毕业后可提升为警长。伪警校除了对现职警察带职施以特殊反动的专业训练外，又以张贴广告招募的办法，从社会闲散人员中，招收适龄青年为学警，在这里进行训练。招收时对学员们的条件审查也很严格，首先是考察所谓思想纯洁与否，唯恐有反满抗日的人入校，学历规定必须是国高学校毕业，和有同等学历者才能报考，对身体面貌也有要求，经过身体检查，最后才施行政治、语文、数学和常识等文科考试。合格者以普通班的名义在校训练6个月，毕业后均任命为警士。日伪统治者认为，只有从这个学校受训而毕业的人，才够得上“王道乐土”、“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因而凡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警，在年限递增中最高警衔为执行警尉，在当时文官职称中是“委任官试补”。至于再高些的警衔，如从“监督警尉”以上到“警正”，他们还得通过较深的考试科目，更主要的是语学——日本语必须是2等翻译以上，合格之后，再到中央警务学校（设在现长春，即当时的满洲帝国首都新京），受训半年才能晋级或晋升到“委任官和荐任官”。

严酷的法西斯训练。在校受训期间，服装着警服，由伪满洲国内政部统一制定，由安东省公署警务厅发放。为了把他们培育为日本法西斯的忠实走狗与鹰犬，训练的科目主要是：一、伪警察通则，包括警察权限与警察知识、编制、级别的认识、风纪礼节等；二、伪满司法，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执行法；三、保安，包括安全防爆、交通、经济、卫生；四、特务，包括政治与思想方面。训练方法也是法西斯式的。如伙食虽然是免费的，但主食则是高粱米和大楂子（苞米）；副食是白菜、萝卜、豆腐和咸菜。日寇借此锻炼学警的“武士道”精神。日本教官还经常打骂学警，日寇为了使学警做

到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便极力灌输奴化思想，特别是受训期间有一项难熬的训练科目，就是“冷水浴”。学警早晨起床后，即使是严冬数九，也必须执行不误，任何学警不得逃脱，违者严惩不贷，以此观察学警的体质和毅力，并认定今后能否听从日寇的旨意。学警们也言听计从，任其摆布，目的是为了取得头戴日寇加给他们的金箍帽、身着黄呢装、腰挎匣子枪、大洋刀、脚蹬马（马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做福的走狗头衔。从而在政治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做日寇心领神会的忠实爪牙，残害中国人民，维护日伪统治，这就是伪安东警察学校训练这伙警察的目的。这所伪警察学校，从1932年9月成立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为止，共培训了普通班和特殊短期训练的伪警察共计3 000余人次。为日伪统治者立下了汗马功劳。

日本警官是学校的太上皇。伪安东地方警察学校的校长，由安东省公署警务厅长兼任，前后有谷口明三、植木贞夫、森子勇、冈田中一，这些日本警官还在开学和毕业的时候去参加典礼仪式。具体管理警校的叫主事（警衔警正），前后有日高元次、高桥四郎、山内君信。其中高桥四郎在职期限最长，警察学校对学警的冷水浴，就是由他倡导执行的。他对人最冷酷，尤其是对中国人，更为严酷。如冷水浴，虽然学警们也抱以反感，可是他执意施行。每天早操前，他很早就亲自在喷淋处监视，不准任何学警逃脱。冷浴时稍不称其意就骂声不绝，拳打脚踢。因此患感冒者不计其数，即使患病也不准休息，以此磨练学警的意志，好为日寇效劳。中国警官只能充当帮凶。如王忠信和李丰年，他俩的警衔虽也是和主事一样，而他俩的职称叫学监，都是受主事支配，名义上是管理人员，掌管训育，实质和普通中国教官一样，并无管理方面的主事权。

在教官中主要有3名日本人说了算。他们是斋藤太郎、田中

村和赤松正一，这3个人都是抱以严酷对待学警来表现日本大和民族尊严的，个个象瘟神，一向不露笑容，以他们冷酷的形象授意学警们效仿他们来镇压中国人民。这些日本人所担当的科目是特务和司法，更主要的是管思想和政治教育，使学警毕业出校后能更加凶狠地镇压中国人民。

教官中也有认贼作父的中国人十余名。其中有事务人员和翻译人员等，警衔分3个等级：警佐、警尉、警尉补，学警们也必须都称他们为教官。如杜正义的警衔是警尉，日本人教官授课时，由他翻译，他的气势就凌驾在一般中国人之上。方振洲的警衔是警尉补，本是低层警衔，可他比杜正义还凶，因为他是老殖民地大连籍，他不仅担任翻译工作，同时也是掌握学警思想动态的监管人。此外中国人教官还有：吴玉尧，系宽甸县人，在教术科，教捕绳术、操练等；孟庆林系庄河县人，毕业于日本警校，教司法、保安并兼作翻译工作；姜贯和系安东县铁甲乡人，教刑事诉讼法兼操练；陈洪振系安东市人，新京(长春)中央警校毕业，教交通、防爆、安全并兼管伙食与保管；王春堤系海城县人，讲刑法并兼管总务；周元同系山东人，管总务；姚日恒系安东市人，任总务室主任并兼讲保安。以上警察的职务和警衔是警佐。

最后的挣扎与覆灭。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也随之倒台了。但是这批经过伪满警察学校训练过的伪警察，由于其主子灌输的反动思想在作怪，他们还是俯首贴耳地听从其主子的吩咐，私自给日本人短枪做护身之用，来报答过去的"栽培"和"知遇"之恩。更为严重的是，同年10月25日，这伙誓与人民为敌的伪警察和其过去的主子——日本教官及其日本警察纠集一起，煽动部分受其蒙蔽的青年学生，在安东市西郊三股流一带，发动了妄图以武装阻止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自卫军接收和进驻安东的反动流血事件。结果这伙反动的乌合之众，被我人民军队轻而易举地打得人仰马翻，头破血流，被彻底打垮。惨杀中国人30名、罪大恶极的张文选，解放后即被人民制裁。坚持反动立场，誓死与人民为敌，制造"三股流"反革命事件的头子蒋致中也被人民政府所处决。但是，对于在祖国解放以后，能够主动交待自己的反动历史问题的伪警察，则经政府审查，根据党的政策，依法进行了宽大处理，有的还给安排或介绍了适当的工作，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旧日的伪满警察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丹东市八道小学，之后又改建为市第一医院住院部，成为救死扶伤，为人民的健康和幸福而服务的场所。

（摘自《元宝区文史资料》1989年第一辑）

六

伪满协和会

昙花一现的伪“满洲正义团”

乔　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年（1932年），伪满洲国刚刚建立，在沈阳（当时称奉天）就有一个号称“大满洲正义团”的组织出笼。团本部设在小北城门里张作霖时代的热河督统汲金纯的宅院，同时还在其他地方遍设支部，广募团员，颁发证书、团章，并在小河沿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大量分发月饼，集体宣誓，一时锣鼓喧阗，声势浩大。影响所及，争办支部或充当团员者大有人在，简直把它奉为沦陷区里强而有力的一支保护伞。

这个团体的机构很简单，头头叫“盟主”，下设本部长、事务长、顾问、职员以及各地支部长。

盟主是日本人酒井荣藏，主持内外工作的事务长是小林德三，本部的职工大部分是日本的浪人（无业游民）和退役军人，他们一律身穿清一色的黑制服。利用中国人刘冠亚担当本部长，退闲的旧县长雷恒成当顾问，实际都是无所事事的牌位。

这个团体的性质，如同旧时代东北地方繁衍已久的“家理教”。但它的建团纲领则规定：“实现日满亲善，共同建设王道乐土，增进日满民众福祉（福利）”等等，充当侵略帮凶的角色。他们的业务，主要是派人四出讲演，宣扬日本的侵略行动是“仁政”，是“仗义相助，拯救满洲人民”。每遇什么节日，他们就搞些相应的活动；日伪当局有什么号召或措施，他们便积极响应，动员所属支部组织群众摇旗呐喊；为了进一步拢络中国

人，他们还组织过自费的赴日旅游；他们在本部出版月刊一大张的内部报纸《正义时报》，报道本部和支部从事的一切社会活动。另外还开设1所3个月期满的日语速成班，免费授课。由于社会影响愈来愈大，他们就渐渐衙门化了，有时还公然代管民讼，处理民间纠纷。

他们把中国人看做是蒙昧无知极其落后的愚民，企图任意摆布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在召开万人大会让团员集体宣誓的时候，竟然采用一种封建迷信的神道主义手段，杜撰出一个“正义之神”，强令群众拜祷，一齐呼喊：“祈予我以正义之力”的口号，用来麻痹愚弄参加大会的中国人。当然许多人是不信这一套，只不过逢场作戏当个笑话看看而已。

究竟这个组织是什么来源，其真正的企图何在呢？说起来它并不是在东北地方新起炉灶，也不是仅仅甘愿为日本军国主义充当鹰犬的。原来在日本国内，早就有个小小的政治团体，叫做“日本正义团”，盟主也是这个酒井荣藏。这个团体，在日本政界只是一颗暗淡无光的小星，在议会上连一个席位也没有。他们所奉行的，不是什么先进的或开明的政治主张，而是明治维新后早已没落的武士道精神，鼓吹私人义气，闯荡江湖，所以把他们的头头称为“盟主”。酒井荣藏这个人，不过是在社会上胆大敢闯的所谓光棍儿，因此被尊为“侠客”，拜为首领。他们曾买动当时的三流作家村松梢风给酒井树碑立传，写成一部《现代侠客传》，译载在《正义时报》上，内容都是颂扬他怎样敢作敢为行侠尚义。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旧式的正人君子，倒也不无可取，但从他们来到东北的一切表现来看，却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在日本苦无出路，把“九·一八”事变看做是奇货可居，为了趁火打劫，便迫不及待冒着弥漫的硝烟急急窜到东北来，企图先入为主抢占个发展地盘。他们假冒仗义行

仁，为日本军国主义奔走呼号，拉拢中国群众。主要目的，纯粹是为了取宠于权门，捞些政治资本，得以鸡犬升天。早年东北地方的“家理教”，尽管属于封建落后的会道门，其宗旨只在于劝人孝亲敬长、戒烟戒酒、尊奉旧礼教，还没有什么政治色彩。“满洲正义团”与“家理教”，形式相近而实质有别。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时还有许多中国人招之即来肯于入团呢？对这个问题，需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那时候生活在沦陷区里，敌特肆虐，鬼蜮横行，闹得老百姓人人自危，魂梦难安，谁也不知哪一天会有飞灾降到头上。他们多数人是只看到“正义团”声势烜赫，不了解其来龙去脉，以为只要在自家大门上挂上个“大满洲正义团员之章”的长方牌牌，就象贴上一道灵符，可以驱鬼辟邪，最低也能取得个精神安慰，心里踏实一点。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信奉什么“正义之神”，祈求什么“正义之力”，不如说他们是迫不得已祈求一点保护颜色。这种心情不难理解，不应笼统认为他们都是甘心附敌卖身投靠。

承办“正义团”支部的分子可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市井无赖，他们热衷于假借洋气唬人，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因此，发生的问题很多，“正义团”的日本人表面上也略加查问，实际并不深究，反倒有所纵容，认为这些走狗比较驯顺最听使唤，可以替他们四出钻营。

后来，“满洲国协和会”产生了，这是日伪当局官办的政团，表面上它是模仿议会组织伪装代表民意，实际则是日伪机关发号施令的传声筒，替敌伪政权宣布政令，传达号召。同时，他们一面伪造民意，组织老百姓积极响应表示拥护，以便于使其所有的侵略政策都能贯彻无阻。也就是说，它同伪政府的关系是表里一体的，一个高高在上，一个深入民间，一呼一应地演唱双簧。因之他们在组织形式上，也不能不网罗民间会员，也

同样要挂上个“协和会员之章”，这就不可避免地同“满洲正义团”唱起了对台戏。然而，在当时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方，不但不可能象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假民主，容许若干政治团体自由建立，而且也不允许象日本那样有在朝在野的几种政团并存。他们既要利用政团作工具，又必须加以使之单一化，以免产生意外的不同政见。如此性质的“满洲国协和会”，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对于民营的“正义团”就必须排斥。于是，在1936年间，几经折冲，终于使这个“满洲正义团”屈从引退，名义上叫做“发展的撤消”，并入“协和会”，酒井荣藏卷起铺盖退回日本，仅把小林德三留在沈阳转任“协和会”的事务长。至此，喧嚣5年的“满洲正义团”，只是昙花一现便告消失了。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四辑）

谈伪“满洲国协和会”

赵卜谦

一、伪“满洲国协和会”是个什么组织?

谈起伪“满洲国”就会联想起一个畸形的怪物——伪“满洲国协和会”(以下简称为“协和会”)。据称“协和会”与“政府”为“表里一体”、“形影相随”的伪“满洲国”的两根大支柱。在“建国”的时候，作为“国家机构”而结成的组织。具有“伪满洲国”独创的性格——“协和政治”的象征。与日帝的“大政翼赞会”和伪“华北政权”的伪“新民会”，在现实的运动方面虽具有许多的类似点，但是创立的精神却大不相同。伪

“协和会”是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团体永久地护持“建国精神”，不断地训练国民，促成实现“建国理想”，是在思想上、教化上、政治上的唯一实践组织体。因而伪“协和会”既不是“政府”的从属机关，也不是“政府”的对立机关，而是“政府”精神的母体。伪“协和会”的存在又不等于资产阶级所谓“一国一党”的存在。伪“协和会”不是根据政党存在的愿望而产生，相反地却是避忌政党存在而产生的。

二、“协和会”在伪“满洲国”出现前的历史前身

在一般的常识认识上是有了伪“满洲国”才有了伪“协和会”的出现，而实际上却是先有了伪“协和会”的精神，而后才产生了伪“满洲国”。从1927年到1931年之间，在东北发生的中日问题：“溪湖石灰山事件”、“榊原农场事件”、“大石桥滑石山事件”、“万宝山事件”均未获得解决。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作为伪“协和会”的历史前身，日帝的侵略先锋——满铁“青年联盟”和“雄峰会”开始与关东军作密切的联系和积极的活动，阴谋实现“满蒙独立”的企图。

“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的由来：1928年5月，“大连新闻社”认为日侨应有公共舆论机关的必要，采取反排日的对策，曾组织“满洲青年议会”。通过召开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对于“中日问题”、“中日关系”展开了热烈辩论。但是辩论的结果，因模拟议会制度发生了党派对立的问题，所以，同年11月将“满洲青年议会”改为“满洲青年联盟”。总部设在大连，并于金州、熊岳、辽阳、奉天、抚顺、长春、安东、哈尔滨、吉林等处设支部。拥有盟员5 000余名，其中满铁社员占1/2以上，并发宣言：“经营满蒙遂行国策……”这就是“青年联盟”发生和发展的简单过程。

"雄峰会"是满铁社员，在形式上自由集会，表面上不同于青年社会运动有组织的"青年联盟"，而在实际上这50余名会员都是阴鸷之徒，张口"满蒙独立"，闭口"大陆经纶"，简练揣摩，钻研对策，与"青年联盟"殊无二致。这是"雄峰会"的概貌。

"青年联盟"的骨干有金井章次、山口重次、冈田猛马、小川博雄、大羽时男、中西敏宪、小山贞知、是安正立、原口纯光、关利重、藤井丹青、小日山直登、平岛敏夫、岩井勘六某。"雄峰会"的骨干有笠木良明、松木侠、八木沼丈夫、结城清太郎、牧野克己、中村宁、古贺董等。后来他们都是满铁的高级领导和伪"满洲国"、伪"协和会"以及国策会社（公司）的重要脚色。这些人都与日帝法西斯的"右翼团体"和"右翼教化团体"有关。其中还有"大日本国粹会"、"大日本正义团"、"建国会"、"国本社"、"神武会"、"立宪卷正会"、"国粹大政党"、"大亚细亚主义"、"全国立宪青年同志会"、"黑龙会"、"中央B木会"、"中央教化团体联合会"等组织的会员、党员、社员和盟员。因此，"九·一八"事变前，所谓"中村事件"的紧张时候，"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组织"游说队"前往东京及地方各府县，作巡回的"启蒙演说"，受到300万在乡军人和"右翼团体"的欢迎，并得到陆军内部小矶国昭、建川美次等人的支持。我在东京杂在人群中听到他们演讲已超出了保护侨民、维护权益内容，而深入"满蒙独立"、"民族协和"的领域中。在"九·一八"事变后，"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等在军事上与关东军协力组成义勇队。在政治上与土肥原贤二组成奉天临时市政机构。在维持"治安"上组成以汉奸袁金铠为名，以金井章次、中西敏宪等为主的"奉天地方自治委员会"。但是，他们对于"独立"、"大同"、"兴亚"总感觉缺乏一元的指导，又

另组成以汉奸于冲汉为首而实际以“雄峰会”会员结城清太郎为主的“自治指导部”，是指导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核心组织，旨在积极进行制造所谓“民族协和”的伪“满洲国”。

三、伪“满洲国”、“协和会”的筹备经过

由于关东军的威逼和“自治指导部”的宣传，于1932年2月16日到18日在奉天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熙洽)，产生了所谓新“国家”的过渡机关——“东北行政委员会”。并发表了“打破军阀政治，增进人民福利，机会均等，独立自主”的“宣言”。

2月29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所谓奠定“国家”基础的“政府组织法”和“人权保障法”。3月1日遂由该会发表“民族协和”王道国家的“建国宣言”。

伪“满洲国”未出现前的“自治指导部”，如果说它是制造傀儡国家的工厂，那么由该部后改的“资政局”就是涂粉刷浆的装饰店。在东北的日本法西斯团体“青年联盟”的盟员、“雄峰会”的会员的大部分都是“伪满政府”成员，担当“宣抚工作”和“启蒙运动”。以“指导员”、“参事”的名义随日军活跃于第一线。遂在长春创设“大同学院”培植伪满“新官吏”。

后鉴于“政府”方面与群众方面的关系应成为“浑然一体”，又认为“指导”的组织机关，有直接存在的必要，遂于1932年4月2日创设伪“满洲国协和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为日酋板垣征四郎、片仓衷和汉奸张燕卿、谢介石、于静远、阮振铎以及“青年联盟”盟员和田劲、小山贞知、山口重次等，经过3个月沿着所谓“建国精神”而草创“组织”大体就绪。

四、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的宣言、纲领和工作方针

1932年7月25日在伪新京“国务院”举行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式”，并发表宣言。

同日发表伪“满洲国协和会”的“纲领”5条。“本会为唯一的、永久的、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体，与‘政府’表里为一体。（一）发扬建国精神。（二）实现民族协和。（三）使国民生活向上。（四）使宣德达情彻底。（五）完成国民总动员。以此5条，为实现建国的理想，建设道义的世界。”

五、“协和会”创立时的组织情况

创立初，推溥仪为名誉总裁，推本庄繁为名誉顾问，推郑孝胥为会长，张燕卿为理事长，谢介石为中央事务局长。局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审查4个处，均为“青年联盟”、“雄峰会”等分子所占据。

除“中央本部”以外，设“首都本部”和“省本部”以及市、县本部。以下则按职业别、民族别、宗教别，组成的分会网，分布于各地方，形成基层活动组织。

随着伪“协和会”的发展，它的组织和任务也有不断的变更。大概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2年（伪大同元年）到1934年（伪康德元年），“政府”倾注全力于官治机构，所以，伪“协和会”从事治安工作和宣抚工作，即所谓教化的启蒙的运动时期。这个组织于1934年8月作了第一次的改组。

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36年（伪康德3年），“协和会”的机构作了根本的改革，由启蒙的任务转到建设的任务。但在执行任务时，不断发生官民之间的矛盾，不得不又将组织作根

本的改革。

第三阶段：从1936年到1941年4月（伪康德8年），鉴于国际形势紧张，又转向备战时体制的组织，作动员工作、组织工作（积极展开会员的训练）。这时实施了备战时的机构改革。

第四阶段，从1941年到1943年（伪康德10年），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太平洋战争日趋激烈，伪“协和会”的任务从备战时体制进入战时体制，与“政府”确立“二位一体制”，实现一元的强力化，为发挥国民的总力体制，全力以赴。此时实行战时的机构大改革。

第五阶段，从1944年（伪康德11年）到1945年6月（伪康德12年），决定“战时工作要纲”以积极进行思想战为主体，因而在组织工作、运动方向上，都有较大的转变。这个时期“协和会”的机构须为适应于面临的任务，遂出现最后的一次改革。

六、伪“满洲国协和会”的直属团体和外部关系团体

伪“满洲国协和会”的基本所属团体、即“首都本部”和省本部计划1处（内有兴安省的联络部3处）。市、旗、县本部计189处（内有10个筹备处）。分会计5 000余处。会员达400余万。会员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伪官吏、商人、宗教信徒等。此外还有直属团体和外部关系团体等。

直属团体

（一）“协和青少年团”。青年团员由16岁到19岁，少年团员由10岁到15岁的各民族的青少年男女所组成。使他们体会“建国精神”，并在国策线上的生活实践中，积极参与“勤劳奉仕”、“宣传宣化”、“治安肃正”、“情报搜集”等活动，完成所谓赋与的“翼赞”任务。1941年（伪康德8年），响应“勤劳奉仕”的号召，参加者达300万人。1944年（伪康德11年），响应

农、矿、土畜产品出荷的号召，参加者达900万人。1944年，青少年团的团数约达1万个，团员约200万名。从前“协和会”对于该团体进行管辖指导，后来在“首都”和省、市、县、旗各设“统监部”确立一体的系统指导。

（二）“协和义勇奉公队”，是由20岁到40岁身心健全的积极分子所组成。注重于“精神修养”和“行动训练”。具有“挺进队”的性格，从事于防空警护等活动，为国防中坚预备队。从1944年起，在“中央”、省各设总监部，在市、县、旗各设总队部，为系统的统制指导。

（三）“特殊职能组织”，1941年以后设“开拓部会”和“科学技术联合部会”，也是“协和会”的直属团体。前者由指导开拓事业的职员所组成，后者由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所组成。以贯彻开拓政策，振兴农村和依靠科技的发明，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为目的。从此改变了以“地域分会”、“职场分会”为基础的平面组织，而为立体的纵贯的职能组织，以确立动员专门智能的体制。

外部关系团体

（一）“满洲国防妇人会”。（二）“满洲军人后援会”。（三）“满洲国赤十字社”。（四）“满洲国红十字会”。（五）“满洲国道德会”。（六）其它宗教化团体、社会事业团体等。这些团体均与伪“协和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为促进该会的广泛发展效力。

联合协议会

分为三级，即县（市、旗）联合协议会，省（首都）联合协议会和“全国”联合协议会。省联合协议会由县、市、旗联代表所组成。全国联合协议会由省联代表所组成。“全联”开会都在10月1日到9日之间，集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为一堂，准备提案，对于执行决议事项，不受法律的强制，而由协议员绝

对负责为道义的实践。

七、余谈

伪“协和会”这个怪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一言以蔽之，是日帝鲸吞东北四省136.05万平方公里和奴役3 000万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一面以武装暴力来镇压人民，一面以“民族协和”来麻痹人民，玩弄两只侵略的魔手，妄图逞其并吞的野心。这幕丑剧是东方封建道德的“王道”腐朽论，中世纪的落后宗教思想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门罗主义的大杂烩。强调“大同”强调“协和”，是妄想混淆敌我界限，模糊敌我斗争。是妄想融敌于我，役我于敌而不生反抗。

日本帝国主义有一种独特的妄想、欺骗的所谓传统的“理念”，即“八紘一宇”的“理念”。这个“理念”，从伪“满洲国协和会”创设的“理念”中，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夜郎自大”、不自量力的狂妄野心。

在伪“满洲国协和会创设的理念”第一项中，即揭示伪“满洲国”经纶的目标，是准备最后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争霸战，使苏联放弃对于亚洲东部的攻势。其野心不仅是为开发利用大陆的资源，而发展到纠合东亚各民族共同完成的大业。所以，他们特别着眼为东亚各国家“亲善”为基础的民族协调。从这里可以看出日帝以“民族协和”这个得心应手的侵略工具，妄想推行到它所梦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实现所谓“八紘一宇理念”的第一步——东亚门罗主义。

其次，为着“满洲国”的生存，“协和”也是最有必要存在的东西。因为它能打破各民族亲善的障碍，吾人须以豁达的“协和”，来实现人类的理想。欲实现此理想须从“满洲国”来开端。因此东亚各民族的亲善，就是“世界统一”的第一步。这

正是过去传遍世界的“田中奏折”所说的“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即为统一世界的先驱”的同义语，为达成所谓“八紘一宇理念”的第一步。

第三，它是决定国家根本国策的机构，拿“满洲国”说来，君主专制政治和议会专制政治都不适合。只有成立政治团体，获得各民族的支持，决定国家的根本国策，最为切合实际。满洲国协和会适应此目的而产生，并宣扬所谓胸怀大志的日本人都要踊跃参加“协和会”。从而形成的“满洲国”不是由日本政府支配的国家，而是由日本人参加“民族协和”的独立国家。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伪“满洲国协和会”的“理念”，就是“八紘一宇”的“理念”，也就是日帝妄想称霸东亚进而统一世界的“理念”。不仅以“协和”幌子为侵略的工具，更进而重视“协和”为侵略的法宝。

伪满协和会的组织发展过程

谷次亨

协和会组织及其任务，大约经历了4个发展变化时期。几乎在伪满洲国成立同时，协和会也成立了，它的成立宣言是以“宣德达情，代表民意”为自己使命，与政府是表里一体的。在政治上，协和会是政府的母体，换言之，政府所行的政策，就是国内各民族所要求的意向。

满洲国协和会会长，规定是由国务总理兼任，关东军司令官规定任协和会顾问。

协和会组织，从中央到省（包括市）是分3个阶级。中央机

构在会长下设中央本部，本部下有总务部、指导部、训练部、宣传部。这些部的下边，还有许多科的组织。省的机构，有省本部、下边有总务处、组织处、宣传处，这些处下边，还有科的组织。市的机构，有市本部，它的下边有事务局长，该局长下边也有一些科的组织。该组织系省本部直辖的。县有协和会县本部，下设事务长，再下边有股长或班长的组织。

在第一个时期里，中央本部长是由大亲日家谢介石兼任的，当时他为伪政权第一任外交部长。省、市县的本部长都由民间酝酿、官方选定的所谓德高望众的人物。但中央本部长下面的总务、训练、宣传、指导各部长及这些部下的重要科长，均由日本人充任。省本部下面的总务处长、组织处长、宣传处长，以及这些处长下边的重要科长；市本部下边的事务局长及其下边的重要科长；县本部长下边的事务长及其下边的重要股长、班长等，也均由日系执掌。此外，不重要的处长或科长、股长、班长等由中国人担任。

每年春季前后，协和会省、市、县各本部，举行全省、全市或全县的联合协议会，会期三四天，出席会议的人，都由各级协和会所管区域选定的日、“满”、朝鲜人。开过这三种层次的会后，5月中旬，中央本部再召开全伪满联合协议会，一般开4至5天，出席会议的协议员由各省、市、县选定的，有350名至400名。主持这四种会议（中央、省、市、县协议会）的议长或副议长，都是临时聘请具有相当身份的人。在副议长司会之下，各协议员所谓代表人民向政府陈诉民情，并要求政府实现。给人以一种议会民主的假相，纯是虚张声势。而伪满政府对于这些协议员决不发表施政的新计划和新方针，而只是由各部派出几个中级官吏，听取他们的陈述，如有对既往所实行过的政策有不了解的地方，也由负责官吏略加说明。而对协议员所要

求的事项，如不与伪政府的基本方针相抵触，只限于局部范围的问题，有时也能兑现。

协和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到了1933年因关东军参谋长换了小矶国昭，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意见，申明要逐渐削减掉协和会所谓“宣德达情”代表民意的任务，准备采取用日本国内的“正义团”组织来取代协和会。日本国内组织的正义团，其活动中心是凡于日本人有利的事，就要做下去，不考虑其它民族利益，甚至不顾道德，不讲信义，不择手段，这个组织常使用暴力，它又名“国粹派”。小矶拟把正义团组织搬到伪满，是为了表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正义行为，不用顾虑国际影响，也不提倡民族协和，凡在伪满的各民族对日本一手建立的新国家，只有协力援助的义务，如有违反，即可处理。所以小矶到任不久，即在长春、奉天、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大城市设置“大日本帝国正义团”，想逐渐在伪满普遍设置后，再命令协和会取消。为此，协和会的经费和人员逐渐减少，活动也逐渐消极，每年举行的全国协和联议会，也不过一两天，走走形式而已。由此，引起协和会系统的日系官吏的反对，故小矶的打算，在其任内没得实现，小矶走后，在各地设立的“正义团”也全部撤了。

协和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小矶被调走后，板垣接了参谋长，又重把协和会复兴起来。为欺骗世界人民，积极开展活动，并扩充了组织与事业，增加了人员与经费，还发展了一大批官吏出身的协和会会员，全伪满会员达到200余万人。同时，又使这些官吏兼任协和会各级组织的委员与协议员，使政府与协和会的工作又里表一致地协调起来。每年举行的全国联合协议会是相当隆重的，各协议员所提的民意要求，如不违反伪政府政策，也能被采用，当然都是些无关大局的具体小事。这时又把协和会所有的三级制组织，发展扩张到村，成立了村协和会支

部，有了四级组织了。

第四个时期，板垣走后东条英机接了参谋长，更进一步充实了协和会的活动内容。本来在第三个时期，协和会每年活动的经费不过六七百万元，一跃而为一千几百万元。这时又增加了办事的公吏和特殊会社的协和会员，发展会员约有300万人。并且在伪政府中央机构和地方各机关以及所谓特殊会社内，均设置了协和会分会。这些机关的副首长均兼任了协和会分会的分会长，首长兼任顾问，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各分会委员。又使政府机关的重要首脑和官吏，都兼任了协和会的重要职务，同时又制定了协和会工作的五项纲领。

这个时期，日伪更大肆宣传协和会。

每年在5月中旬，在皇帝与关东军司令官亲临之下，隆重举行全国联合协议，会期长达五六天，尽力表现“宣德达情”的样子。

每年秋季，又隆重举行3天全国协和青年动员大会，最后在协和会长临场下，举行协和青年队的阅兵式。

在这两个会场上，都有外国记者和伪国通社报道，及驻在的各国外交官列席旁听或参观。协和会自身更大张旗鼓地拍电影，向各地放映，进行广泛地宣传。

也在这第四个时期伊始，中央本部长在日系人员下，添设了中国人副部长一人，是由伪政府大臣级兼任，同时各省、市、县的本部也增设中国人副部长。这表示协和会是与政府表里一体的形式。日寇这时如此起劲地宣传协和会，一是为了掩盖他们的侵略行为，利用协和会组织活动作为表演剧场，扭转世界人民的恶劣印象。二是欺骗人民，收买各级协议员，做忠实走狗。

总之，协和会这时完全成了伪政权的宣传辅助机关了。它

所制定的方针，完全合乎政府的奴役、压榨人民之口味。例如1942年伪政府要修建长春到哈尔滨的铁路复线，征不足劳工时，协和会动员青年分担了建设任务。再如伪政府强行征粮，要人民"出荷"时，协和会发起民众运动，不顾人民口粮多少，努力完成出荷粮数。

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的活动简况

于静远

1937年4月到1938年2月，我当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兼中央本部委员，本部委员一直兼到1945年8月。

我到差后，立即扩充预算增到600余万元，实行二位一体制，即伪满省长、市长、县长兼伪满协和会的省、市、县本部长。我继续实施青年训练，成为积极培养推行伪满诸政策的骨干。

1937年夏，我参加吉林省联合协议会。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我以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名义出过布告，言词荒谬绝伦，压制了人民的抗日思想。1937年秋，我参加过三江省依兰县湖南营日本开拓团协和会成立仪式。

1938年，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组织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助伪满警察和地方行政维持秩序，如传令、防空、防火、防谍等，还组织妇女参加。1938年夏，我参加过安东省联合协议会。同时，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访问意大利、德国经济使节团所着之协和礼装。

1939年，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助

警察和地方行政实行“粮谷统制”及督促“粮谷出荷”。同年夏，协和会长张景惠招待意大利、德国访问伪满经济使节团，我出席作陪。

1940年夏，我参加协和会北安省县联合协议会。

1941年，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帮助政府推行伪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

1942年，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各地分会协助各级政府大力推行储蓄政策，致使人民受到严重压榨。

我当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有8年之久，参加中央本部委员会议达200余次。

从一九四二年的全国联合协议会，看伪协和会要弄的政治骗局

王子衡

伪满最大的、也是日寇最得意的、认为最有成效的政治骗局，要算是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了。因为它把所谓“建国精神的显扬”、“民族协和的体现”、“宣德达情的实现”、“国民生活的向上”、“国民动员的完成”等协和会运动纲领，也就是伪满政府的各种罪恶，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每年8月上旬在协和会馆的大礼堂举行的协和会全国中央联合协议会时，尽其宣传吹嘘铺张扬厉之能事，试举1942年的全国联合协议会的情况为例，即可知其全貌了。

伪满皇帝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亲临联合协议会

1942年8月3日午前7时，自伪宫内府到协和会馆约有两公里的沿途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喷水车来往洒水，两侧商店、住户闭门不出，军警步哨林立，交通断绝，行人敛迹，会馆内外满院遍铺黄色细砂，礼堂（会场）台上中央设一长方型桌子，铺上蓝花纹（伪满国徽）的红绒桌毯，桌后置一张浮雕蓝花纹的伪皇帝专用坐椅。午前8时，全国联合协议会协议员三百多名和伪政府各机关首脑、伪省、市、县各机关代表、各级协和会本部首脑以及驻伪满的各大公使馆，如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及罗马教皇、日本南京伪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蒙疆政权之各大使或公使和馆员，以及日本“兴亚同盟”代表、南京“东亚联盟”代表、华北“新民会”代表、蒙疆“兴亚会”代表等二百多人依次入场，面向礼台坐着。8时20分扩音器报告“皇帝陛下已经驾离皇宫”，全场空气有些紧张起来，特别是来自地方的协议员们，为得见皇上御颜而“激动不已”。同时伪政府大臣级和协和会部长级以上人员，都离席到大门外分左右两列恭立“候驾”。8时30分伪皇帝的车辆队已到协和会馆大门前，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等向伪皇帝的车行以最敬礼，张景惠急忙到车前请伪皇帝下车。伪皇帝由伪侍从武官长吉兴陪伴下车，张景惠恭谦地在前引导，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尚书府大臣、侍从武官长、伪大臣、部长等紧紧在后面扈从，在乐队响起伪国歌的吹奏声里缓缓进入协和会馆内设置的临时“便殿”（休息室）休息。略进香烟茶点，伪政府大臣级和协和会部长级以上人员一个一个地依次入室，前进一步行以90度的敬礼，再前进三步行以最敬礼，端立后退三步又行以90度敬礼退出室外。同时会场的扩音器又报告：“皇帝陛下现在便殿休息，马上就驾临会场

台上，请大家注意静听扩音器发出最敬礼的口令时，都要向台上皇帝陛下行以最敬礼，不要交头接耳，左右窥视，低声细语，要绝对肃静避免失仪。”稍后，乐队奏起伪满国歌，伪皇帝步出休息室，在伪国务总理前导、伪宫内府大臣的扈从下，由会场左廊缓步前行，从容登台，站在礼台中央的桌后，音乐停止，全场人员向台上行最敬礼。伪皇帝端立不动，仅向外国来宾席微微点头表示回礼的意思。全场寂静几乎听不到呼吸的声音，伪宫内府大臣熙洽向伪皇帝呈以写好了的“敕语”，伪皇帝的目光略向台下一闪就开口念道：“兹当我国国运隆昌百政兴举的时候，尔等聚首一堂协议国家大事，朕甚嘉悦，尔等应善体我国建国精神的实质，民族协和的真义，竭尽忠诚，妥为协议，促进我国各种事业日新月异，贡献亲邦（日本）皇军圣战早日完成，朕意所在有厚望焉……”

扩音机又发出最敬礼的声响，全场又向伪皇帝敬礼如仪。伪皇帝在伪国歌的音乐吹奏声中，缓步下台退出会场，径至门外登车离开协和会馆。伪政府首脑们仍到门外恭送，扩音机又发出“皇帝陛下驾离协和会馆”的声音，全场人才松了一口气，推出笑容，互相攀议起来。

扩音机又说“皇帝陛下平安回宫了，请大家注意，关东军司令官到场致训词时，请大家要按照扩音机的口令敬礼”。接着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带着他的参谋长等，在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的前导下，通过会场的右廊前行登台，立于台上左侧的桌后，台下人们向他敬礼，他也向台下还以半礼。但在1934到1941年期间历年开会时，关东军司令官都是先于伪皇帝两分钟站在台上左侧的桌后，伪皇帝登台时，关东军司令官和其他来宾一样向伪皇帝鞠躬迎送。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这样表示，原为麻痹东北人民的精神，使人们认为伪皇帝实在是个真龙天子有

道明君，连关东军司令官都这样尊敬，一般老百姓焉能不服从。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傀儡，更好地统治东北，使人民服服贴贴地甘作日本侵略者牛马般的奴隶。但是到1942年后，日本殖民统治者认为这样做法，有失日本主子的尊严，因此改变为伪皇帝下台退场后，关东军司令官才登台，避免给伪皇帝敬礼。

1942年的全国联合协议会开始后，关东军司令官即宣读已准备好了的训词，大意是：

“今当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贵会召开盛大隆重的全国联合协议会，本司令官获得与诸位见面的机会，并且略述所怀，殊觉欣快。自大东亚圣战开始以来，日本皇军英勇善战节节胜利获得辉煌的战果实堪庆幸。但是这样旋转乾坤的伟大战争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结束的。因此，距离全面的最后的胜利还有相当的里程，在这期间日本上下一心军民一致，奋勇杀敌自不待言，只是大东亚圣战的胜利与否不仅攸关日本国运的兴废，也决定着整个亚洲各国命运的前途，尤其决定着满洲国存亡的问题，希望诸位本诸‘日满不可分携’的精神，会议讨论开诚相见，会议后回到地方（指地方协议员）更好地传达这种意旨，以竭尽全力援助皇军裨使兴亚大业早日完成，共享幸福，这是我们共同希望、共同欢喜的事情……”

日军司令官读完训词后下台退场，伪政府首脑们的迎送，如同迎送皇帝的情况相同。接着所谓国外来宾如日本大使馆、汪伪政府、德国、意大利、罗马教皇的各大使或公使等致祝词和日本“兴亚同盟”、南京“东亚联盟”、华北“新民会”、蒙疆“兴亚会”代表等读祝词以及各方面的贺信贺电百余件摘要选读。会议第一幕到此完毕，占了整个午前的时间。

当天午后的日文中文各报都在第一版面用大字标题，把会

场内外情况登载出来。说什么会议如何庄严、隆重、盛大，皇帝如何仁慈、诏示殷殷，关心民瘼，日满一体不可分离；关东军司令官如何郑重地希望满洲人协助皇军完成光荣的圣战任务；各国使节们致以恳切的祝词和贺信贺电等数百件，使参加会议者，尤其来自地方的协议员们，光荣地得到亲见皇帝陛下的尊容和关东军司令官的伟大面貌，并亲自听到垂训殷殷的“敕语”，情意谆谆的“训示”，竟有感激涕零者等报道，以及协议员们的感想、伪政府首脑们的谈话和各种祝词照片累篇巨牍占了全版，尽其大吹大擂、惑人听闻的能事。

同时，会场内设有密探、特务，监视人们的行动有无“失仪不敬”的表现。协和会某职员在伪皇帝休息室内多设一张椅子，被认为“冒渎尊严”而遭处罚；伪皇帝宣读“敕语”时，有患感冒忍不住咳嗽出了声者，被认为“存心不敬”而受谴责。日寇妄图假藉对于伪皇帝必须绝对尊敬的虚伪形式，以实现对于日本天皇更须绝对崇敬的阴谋，从而养成人们绝对服从的思想，巩固其血腥的殖民统治。

伪全国联合协议会的组织活动

午后开始全联第二幕。协议员分为两种：一为代表伪政府有关机关的司局长级协议员四十多名；一为代表伪省、市（特别市）、县、市（普通市）各商学法团和社会宗教团体、伪国防妇人会，都市区长、农村村（乡）长等协议员二百多名。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没有一个工人、农民代表。会议设议长1名，副议长2名，书记长1名。产生的办法，由中央本部长提出候选人，经过全体协议员多数举手表决，表决结果是议长为中央本部长，副议长，一为伪政府的大臣级，一为地方协议中的法团代表（商学会长），书记长为中央本部指导部长或总

务部长（1941年到1943年的书记长为王子衡）。议案分为两部分，一为协和会中央本部长的会务报告和伪政府国务总理以及各部伪大臣的政务报告。一为中央本部和伪政府提出的咨问事项及伪省、市、县、市联合协议会未能决议的事项。内容分为四类即：一为“建国精神的显扬”，二为“民族协和的实现”，三为“国民生活的向上”，四为“国民动员的完成”。

会场对面台上为伪国内外来宾和伪政府机关首脑座席，两侧和楼上，为伪政府机关职员、团体和学校师生的旁听席，全会场共有一千多人。

那日午后2时，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就议长席，指导部长王子衡就书记长席。三宅说：

“本会议是‘满洲国’最庄严的会议，本会场是个最庄严的会议，同时本会议也是个最尊重言论自由的会议，本会场也是个最尊重言论自由的会议议场。因此请协议员诸位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更不会受到意外影响，这一点由本议长负责保证，想各位能够相信的。那么，就先由协和会中央本部作会务报告后再请政府方面作报告。”

张景惠的奴才哲学——“要什么给什么，给什么要什么”

中央本部总务部长菅原达郎作协和会会务报告后，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登台作概括的政务报告大意如下：

“这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已如皇帝陛下（全场起立表示绝对尊敬然后坐下）的‘敕语’和梅津司令官所训示的那样，首先要认识到现在是什么时期，我国应负的是什么责任，举国上下应有怎样的高度觉悟，也就是要求大家要进一步体会建国精神的所在，民族协和的真义，尽到我们应尽的义务。会议上要披肝沥胆诚实发言，会后回到原地要充分

把会议的成就传达给人民，援助皇军完成圣战，对于衣食日用节约一点缩减一点。因此，国家要什么给什么，给什么要什么（指日本帝国主义抓劳工、抢粮食、夺财产，要痛痛快快地拿出来，同时，伪政府配给的橡子面、更生布等要痛痛快快地接受）。不要分斤论两计较多少，不要胡思乱想听信谣言，要听亲邦的话，听政府的话安分守职作一个善良的人民。共患难才能共安乐，这种精神意义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其他详细情况，武部长官和各部大臣将另有报告，请大家注意听，妥为讨论……”

武部叫嚷侵略战争高于一切

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报告大意是：

“‘大东亚圣战’开始以来已8个多月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日本皇军所向无敌，获得赫赫的战果，辉煌的胜利。美英侵略者在东亚百余年的邪恶势力即将扫除净尽，整个亚洲将恢复为亚洲人的亚洲，成为共存共荣的天地，但是谁都知道这样辉煌的胜利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我们皇军付出大量的鲜血，日本人民不惜任何牺牲所换取来的。我们日满两国既是一德一心生死与共的关系，正如张总理所说的必须先共患难，然后才能共享安乐。诸位要知道，现在是圣战高于一切的时候，必须厉行人力、物质全部动员，才能很快地完成圣战，同时今日也是满洲国人建功立勋千载难遇的大好机会，圣战以来，满洲国上下人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虽然已有若干的贡献，但与日本人民付出的代价相比较，不免微乎其微，瞠乎其后了。然而日本现在不是要求满洲国要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来，只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要比过去做出进一步的贡献，这是满洲国无可推诿的责任。因此，今年粮食的收购、劳力的供出、

财物的捐献要比往年踊跃一些。请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牺牲较之人力与财物的献出孰轻孰重，不问可知，即使吃的东西有时不大满意，大家紧紧裤带也就过去了，希望各位尤其地方协议员善体此意，回到地方妥为传达，竭尽一切支持圣战，各种具体事情各部大臣必有说明……”

伪大臣们强调粉身碎骨报效“亲邦”

伪军政部大臣邢士廉叫嚷什么要“注意不良分子造谣、生事、扰惑人心，加强伪国兵的质量，维持地方治安支援圣战”。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强调“多多供出劳工，建设国防军事工程，增产军需品，强化康生院，使鸦片瘾者变无用为有用的人，弥补劳力的不足”。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强调“为了支援圣战增设辅导院，使游手好闲、思想不良分子改邪归正报效亲邦”。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强调要“敬神崇祖报恩思源，显扬建国精神养成勤劳习惯”。伪外交部大臣蔡运升强调什么“大东亚圣战皇军着着胜利，美英侵略者一败再败狼狈不堪，日德意三国枢轴坚如铁石，我们要以粉身碎骨的精神，既要打败白色（英美）的侵略，更要打退赤色（苏联）的威胁，这是我们天赋的使命”。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强调要“多多纳税尽量储蓄，踊跃捐献少买东西，节约煤电，以便发展工业产品支援圣战。”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强调“多多献出农产品、畜产品，尤其粮食的供出，要超额完成标准数量，保证军需民用和工业原料的供应，更要好好地与日本开拓民互相善处，亲如家人”。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强调“强化义勇护路团，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多修各种道路，使交通便利畅行无阻，加速军需民用物资的运送”。

至此时已午后7时多，三宅说：“第一日的会议日程到此为止，请协议员诸位把政府方面的指示和各地方提出的议案充分

思考一下，明天午前8时继续开会，请各位踊跃发言就此散会”。

协议员叫苦连天，伪次长诡辩欺人

(1) 关于粮食问题

第二天午前8时继续开会，三宅把“供出粮食”议案提出来要求大家讨论。吉林省榆树县协议员安国治发言大意是：

“昨天听到武部长官和黄大臣的指示，说今年供出粮食数量比去年还多，这可是个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按今年现在情况来说恐怕有困难。今年雨水不调，秋收已无把握，本县土地不过20万垧（每垧10亩），每年产粮不过20万吨，去年供出的粮食是15万吨。但是本县人口有三十多万人，每年需要粮食至少为7.5万吨，仅就粮食一项就缺少2.5万吨，加上种子每年需要二千多吨，牲畜约有1.5万头，每年需要饲料五千多吨，三项共缺少粮食3.2万多吨，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也因饲料缺乏，肉类蛋类及皮毛的供出也将大量减少。正因为粮食、饲料两项的缺乏，人力、畜力也大为减弱，这也是今年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今年粮食供出数量有增无减，对于农民的生活和来年农业生产问题的严重影响，将不堪设想了……”

很多的协议员纷纷举手争取发言，三宅指定伪滨江省（黑龙江省一部分和吉林省一部分改编为伪滨江省，省政府设在哈尔滨）双城县协议员于某（忘其名）发言大意是：

“本县也是本省产粮最多的县，去年供出粮食12万吨，但这是王县长用大马棒打出来的（双城县伪县长王奉璋为效忠日本主子在秋季抢粮时，经常手提马棒下乡催逼农民赶快出粮，挨过马棒的农民不计其数，即使村长等也不例外，因此人们称他为“王大马棒”）。今年如果再增加供出数量，恐怕再多几根马棒也是打不出粮食来的……”

黑龙江省林甸县协议员陈其有发言说，本县是个土质不好、产粮不多的穷县，去年供出的4万吨粮食是山菅（日本人，忘其名）副县长用火烧出来的。农民孙某（忘其名）因为食粮太缺，种籽饲料毫无着落，因此他在小草垛底藏了几斗粮食。在催粮官员们（伪县警察、职员和协和会职员等）沿门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粮食时，来到孙老头家，看他的屋里屋外没有一粒粮食，催粮官员们气狠狠地骂道："他妈的，你这老该死的杂种，把粮食弄到那里去了，快说！"，孙老头说现在连吃的都没有，哪里还会有藏着的粮食呢？催粮官们大怒起来，打了孙老头几个耳光子并踢上几脚，逼他快拿，老孙头还是说没有。有个催粮官突然发现小草垛有些可疑，便说草垛底下一定有粮食，他们一齐把小草垛推倒，果然发现1斗谷子、两斗玉米。这时山菅副县长也赶到，看到这种情况大发雷霆，下令点火给我烧，催粮官们便点起火来，小草垛登时化为灰烬并延烧了小草房。老孙头丧失了仅有的粮食、柴草和破房子，穷病交迫好容易挨过了冬天，到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生活困难达于极点，其他农民如老孙头那样穷困还多的很呢，今年本省再增加供出数目，可真不得了……

三宅在陈其有发言当中，曾再三提醒说："请简单些"；接着伪间岛省延吉县协议员池中龙（朝鲜族）发言大意是："本县主要是水田地区，产的稻子历年全部供出，私留下来便是犯法，换来的是夹杂砂粒、草籽，不堪入口的小米，并且价格比出卖的稻价高出5倍多，农民生活穷困的情况要比榆树、双城、林甸各县还厉害的多。生产情绪无法提高，加上今年水源不足大大减产，今年供出数量不但不宜增加，还希望减轻一些，留点大米配给农民，在保证对国家继续供出上，都是有好处的……"

三宅说，先请政府方面作一解答。

伪兴农部次长的鬼话连篇。伪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发言大意是："根据我们兴农部的生产调查，满洲国的土地每垧年产量1吨是指好坏地平均生产量来说的。象榆树县、双城县那样好的土地每垧年产量当在1吨半以上，也就是说榆树县20万垧地年产量可达30万吨。除去供出量15万吨外，尚余粮食15万吨。即使扣除食粮、种籽、饲料82 000吨外还余6.8万吨，作为30万人口的生活消费可说是富裕得很。双城县的情况大致与榆树县相同。林甸县的产量虽然少些，但供出量也很少，政府只收买它们产量的1/3。并且从总的来说，政府每年收购量仅为全满产量1/3（这年伪满收购量为700万吨，以全东北全年产量2 000万吨计算，当时伪满这个调查估计数字太不符合实际了）。农村还余有2/3的粮食，根本谈不到贫困饥寒的事情，若从每天火车到达新京（长春）奉天（沈阳）车站时，都有很多的大人小孩私带米面、鱼肉、蛋类等物品秘密贩卖的情况来看，更足以证明农村粮食物资并不缺乏，生活并不困难。至于双城县的王县长打人、骂人，一是人民不大听话惹出的结果，一是王的个人作风，政府方针并不是那样的。林甸县山菅副县长的表现，也是一时激于气愤的结果，今后不会再发生那样事情。延吉县出产的稻子并没有完全供出，朝鲜农民经常吃大米，新京（长春）、吉林各城市的大米私买私卖的来源多半是间岛省生产的。并且朝鲜农民往往1天吃4顿饭，竟有夜间偷吃大米饭的，根本谈不到种稻子吃不到大米的话。政府供给朝鲜人民以小米是因为朝鲜农民素有吃小米的习惯，也因他们贪图暴利私卖大米买吃小米的关系，这种情况是谁都知道的。"

地方各协议员听了稻垣的鬼话，都认为强词夺理不符事实，有些激动纷纷举手欲争发言，但三宅说本议案内容很复杂，在本会议上一时不易讨论出结果来，我想把它交给分科委员会

（小委员会）讨论如何？大家无意见，夜间8时开小委员会进行讨论。

实际上在伪满时期，每垧地根本没有过一吨的产量，稻垣的话纯是欺人之谈。至于说来往火车私运粮食，多系地主富农所为，协议员也多为地富分子，他们发言表面似为贫农说话，实际是为他们自己利益说话。

（2）关于统制经济问题

第三日会议，三宅把关于统制经济议案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伪滨江省呼兰县协议员周言录发言是：

“从1937年政府发布开发产业法令以来，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同时并发表了‘七·二五’的物价停止令，尔后各种工业品尤其来自日本的工业品不断涨价，到现在已高出当日的价格数倍。但是满洲国出产的农产物的价格却是依据法令，丝毫没动，致使人民收入尤其农民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日益增多，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生活困穷。试举粮食的价格来说，每吨粮食的生产费用在自然条件顺利的年月需要劳动力30个，每个工资3元即为90元，牲畜饲料至少需要10元，种籽5元，肥料10元，再加上各种税捐5元，共计120元。但是每吨粮食的卖价，政府规定1石细粮平均为100元，就是说每吨粮食亏损了20元；而棉布每尺10元，棉花每斤30元，还是有行无市，买不到手，即使偶有机会可买，又担了经济犯的罪名，受到重罚不算，还得坐监牢吃官司。至于灯烛火炭、油盐酱醋、生活日用品的费用，更无从出，如不及早提高粮价，不但农民无法生活、无法生产，政府又从何处收购粮食呢？”

奉天省（辽宁）协议员发言大意是：

“自从实行经济统制以来，日本人的大工厂、大会社（企业公司）日多一日，满洲人的小工厂、小企业日少一日。例如由

于实行钢铁的严格统制，仅奉天（沈阳）市满洲人的小铁工厂就倒闭了二十几家。农业工具的生产甚至如镰刀、锄板等小农具的生产都减到歇业的地步，买不到手；由于对棉花的严格统制，满洲人小规模的织布工厂、针织厂也都歇业；由于对毛皮革类的严格统制，不仅满洲人的毛织业作坊、皮革业作坊早已不见，农民冬季用的防寒靰鞡也不见了。同时满洲人商家企业旧存的钢铁材料、五金废铁、各种机器和零件也都以贱价被收光了。相反的日本人大钢铁厂、机器制造厂、大纺纱厂、大皮革厂等等倒是日出不穷。因此希望政府把钢铁、棉花、皮毛等等原料稍微分点给满洲人的小工厂或手工业作坊，使它们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再说各种特殊会社，如满铁会社和政府各机关都各有消费组合（供销社），物美价廉，令人垂涎，但又只卖给职员官吏，一般人民得不到手。日本人经营的各种百货店，倒是各色货物俱全，但是有的东西只卖给日本人，不卖给满洲人，甚至门上干脆贴一个纸条，写着：'满洲人不许进来'。还有经济部阮大臣说叫人民多多储蓄，但是现在满洲人实际已无钱可储了。农民在交易场卖粮时，交易场付款处却代替银行强扣一部分作储蓄，这项存款不到一定日期，农民根本取不出来，等于白白丢掉一样。"

哈尔滨市协议员于开诚发言大意是：

"我们哈尔滨市素称北满的咽喉，物资吞吐、经济繁荣的都市。但是现在农产品既少集聚，工厂商业又多纷纷关闭大吉。但是官家又不许关闭，只得勉强支持天天亏本坐食山空，势必落到山穷水尽一无所有的境地。因此，希望放松经济统制，给满洲人工商业一线活路。"

各地协议员纷纷举手欲争发言。三宅说："本议案先请政府方面作一解答，然后再行讨论吧。"

伪经济部次长青木实进行诡辩，他发言大意是：

"'七·二五'物价停止令颁布以后，工业产品的价格虽然有些提高，这是由于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后，军需物资要求增加，劳动力缺乏，生产成本自然随之增涨起来，工业产品价格不得不提高一些。加上奸商不守法纪，投机囤聚，垄断居奇，满洲人商人尤为严重，致使物价飞涨，货币购买力因之减弱，这种紊乱市场、危害金融的行为，令人愤怒，希望诸位协助政府检举经济犯。至于农产物的生产费，决不会象协议员们说的那样高，并且除粮食外，还有其它土产、农产副产物和各种副业的收入为数不少，农民生活不至那样困难。棉布、棉花价格奇贵，那是由于私买私卖的关系。官家在购买粮食时，配给一定比例数量的棉布、棉花、线等日用品，价格很低，对于农民生活的补助当有很大的作用。这些情况想协议员诸位会比我更详细更明了的……"

实际所谓奸商垄断居奇，并不是所谓满洲商人而是日本的垄断资本家，青木本身就是经济犯的主脑者，人们如何检举得了。至于贫农佃户收获的粮食除去交给地主的地租外，余者竟被狼虎般的催粮走狗们抢夺搜刮一空，根本没有余粮可卖。农民运到交易场的粮食多半是地主富农的东西，因此所谓配给的棉布、棉花等物品多被地主富农得去，转以高价卖给农民获得暴利，或者卖给奸商转卖给都市，获得更多的暴利。即使农民幸而有点粮食卖给交易所，得到的所谓配给物品也是寥寥无几，或者干脆被交易所的恶劣职员们借故刁难、欺骗讹诈去了。

协议员们还想说话，但三宅说，这议案复杂交给分科会讨论如何，大家无言，第三日会议到此完毕。

(3) 关于食粮配给和劳工问题

第四日，三宅把粮食配给和劳工问题提出让大家讨论。伪

龙江省（黑龙江省）某协议员（忘其姓名）发言大意是：

“满洲地广人稀，劳动力从来缺乏，过去每年从华北方面进来劳工100万至200万人，补充各地劳力，农业生产还可以勉强支持下去。但从满洲实行经济统制以来，中国各地劳工入满大受限制，即使辗转来满而每年工资的收入又受到汇兑限制的影响，不能寄回家去，维持父母妻子的生活。因此，来满劳工逐年减少，现在大有绝迹的样子。另一方面每年从农村供出‘国兵’、‘勤奉队’、劳工队、协和义勇奉公队和爱路团等等人数不下200万人，致使农业进入日日减产直至无法生产的境地。而官家要粮要人的命令却如雪片般飞来，催粮抓人的官员接踵而至，这不是逼迫农民陷于死地吗？并且供出的劳工到了工厂矿山和其它地方（指日军的军事工程地带，因从来不许泄露，故发言者不敢明说）。口粮既少且恶，衣服不能蔽体，从事苛重的劳动，患病没有医药，因此饥寒交迫劳累而死的逐日增加，或者有些人干脆一去无影无踪（指为日寇修筑军事工事后被集体屠杀，防止泄露秘密），即使幸得归来多成病弱残废，无力劳动。”

听到这里，三宅两只凶恶的眼睛向全场一扫，更瞪视某协议员说，“发言要简单”。某协议员只好草草地结束了发言。

奉天市（沈阳市）协议员陈丰年说：

“我同意龙江省协议员的发言，我们奉天省是工业地区，着重于工业生产，而农产品多为经济作物，食粮殊感缺乏，配给数量极少。例如奉天、抚顺、辽阳、鞍山、本溪、营口等市居民，每月粮食配给大人不过12斤，至多不过14斤，小孩仅为五六斤，区区此数不仅不够大人每月吃粮量的1/4，而10岁以上的小孩每天比大人还吃的多，仅仅五六斤怎样维持生活呢？”

三宅不耐烦地又说“协议员发言要简单”。该协议员接着说：“因此希望对于工业城市人口的食粮配给量应当增加一些，

工人吃不饱没有力量干活，生产不出东西来，军需品供给不上，岂不要影响圣战吗？”

新京市（长春市）协议员程子明说：

“我们吉林省号称谷仓地带出粮很多。但是新京市满洲人食粮的配给量大人不过11斤、小孩只5斤，还赶不上奉天市的配给数量。并且本省又是水稻产区，但是我们根本吃不到大米，而日本居民却天天吃又白又香的大米饭，并常常看到他们把带着白饭的锅巴随便抛弃。”

三宅又以凶恶的双眼瞪着程某说“简单！简单！”。

各地协议员纷纷要补充发言，三宅说，还是先请政府方面作个解答再说吧。

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进行诡辩。这位策划经济统制的谋士反驳说：

“龙江省协议员说满洲农村劳力不足，这话令人难以理解，据政府统计现在满洲的农村人口至少有3 000万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至少有600万人，而满洲已耕的农地不过2 000万垧（每垧10亩），每个劳动力每年可耕种5垧地，那么2 000万垧地至多每年不过需要400万个劳动力；600万劳动力扣去400万个还余200万个劳动力。即使每年供出的国兵、劳工、勤奉队、协和义勇奉公队和爱路团等不过100多万人，还余100万个劳动力，怎样还能说到劳动力缺乏呢？况且满洲妇女从来不下地干活，如果动员起来至少可以增加100万乃至200万个劳动力。这样看来，满洲农村的劳动力还过剩得很多。请协议员诸位回到农村，协助政府动员一下，劳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至于说供出的劳工，有因饥寒交迫劳累而死的话，也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政府对于矿山工厂的劳工的粮食配给都是特别加量的，平均每人每月40斤以上几乎超过我们日本人的口粮一

倍，衣服也是特别发给，怎能说到饥寒呢？每天8小时劳动怎能说到特别劳累呢？对于患病者比一般人都是优先供给医药，怎能说到医药缺乏呢？至于人的死亡那是人生的规律，试问，那些不到矿山工厂劳动的城市和农村居民，不是天天也有死亡的吗？

对于城市满洲人的食粮配给量比较少点，这是事实，但是由于满洲人比其他民族多为土著，人熟地熟绝大多数做着投机倒把秘密买卖的勾当，收入很多。试看每天各车站的满人男女老幼旅客，多从乡下私带一些大米、白面、鱼肉、鸡鸭等物供给城市的满洲居民，其他大宗的私买私卖更是不计其数，致使经济取缔者疲于奔命抓不胜抓。吉林省每年可产大米70多万吨，而政府只收购40万吨，其余30万吨多半由小道进入城市，秘密卖给满洲人，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因此满洲城市居民的食粮无需增量。

我们日本人来到满洲，人生疏地也生疏，说实在的话，日本人又比较诚实，一般的不会作私买私卖的勾当，因此配给粮食比较多些。至于配给粮食的种类是按各民族的习惯来决定的：满洲人从来吃高粱、苞米，所以就配给高粱、苞米；朝鲜人从来吃小米，就配给小米；日本人从来吃大米就配给大米，这是公平合理的办法，有什么奇怪的呢？满洲现有的水田面积很小，但是可变作水田的土地却很广，满洲人想吃大米，这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只有努力多开水田，多种水稻，多产大米，既合乎政府的要求，也满足了满洲人的希望，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吗？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满洲人暂时忍耐一下……”

各地协议员虽然有些气愤欲争发言，三宅却宣布今日会议到此为止。

古海这些鬼话实是漫天大谎诡辩欺人。实际过去东北农业虽有粗放的习惯，但每个劳动力每年至多只能耕种3垧地，以东北2 000万垧土地来说，每年至少需要600万个劳动力，加上所谓供出的劳工、伪国兵、勤奉队等等，至少抽出200万人，合计需要800万个劳动力。即以古海估计的600万劳动力来说也还缺乏200万劳动力，则农村的劳动力不足不辩自明，并且东北农村妇女从来就有下地劳动的习惯，还去动员谁呢？

至于所谓私贩粮食等物，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奸商和日本垄断资本家所为。因为在所谓收购粮食时，地主富农勾结伪警察、特务，先让贫农佃户把交完地租后仅有的余粮全部交出，不足的数量再以他们的粮食补充；余者则私藏居奇高价卖给贫农或者通过奸商卖给日寇垄断的粮栈。至于贫雇农民中间有把自己仅有的粮食送到伪满兴农合作社交易场出卖时，交易场的走狗恶徒勾结日本人百般刁难农民，强索贿赂，若不如愿，即在验粮定级时压秤压等，明明100斤硬说是80斤或90斤，明明是一等好粮硬说是二三等粮或降为等外。农民如果不服与之争辩，不遭殴打便受辱骂甚至逐出场外，过了时间停市不买。农民离家五六十里或百八十里运粮回家，则时间已晚来不及了。万般无奈只得把粮运到栈房存寄，第二天再去出售，而收购粮食的恶徒们依然百般刁难，农民如仍不服，粮食仍然卖不出去，还得住店，住店一宿，人吃马喂耗费很多；即使幸而把粮卖妥，到付款处领款时又被强扣10%的储金，浪费几天工夫到手的粮款已所余无几了。地主富农又复逼还高利贷，结果贫农全家大小勤苦一年，两手空空，衣食全无。只好又复哀求地主、富农再借高利贷，以高于出卖交易场的粮价两三倍的价钱，买回一点食粮，暂时糊口。又往往被伪警察发现，竟以“经济犯”的罪名关押起来，遭受百般折磨，幸得出来后，已经贫病交迫，因

而惨死的时有所闻。地主富农把剥削榨取而来的粮食，以一半运到交易场贿赂走狗恶徒们，他们的粮食很快地就被验妥，验成一等好粮，出卖后并得到棉布、棉花、棉线等物品的特配，拿回农村以十几倍的高价，卖给农民；或者通过奸商卖给城市居民，获得暴利。地主富农又把私藏的一部分粮食屯积居奇，又以十数倍的高价卖给农民，或者通过奸商转到日寇垄断资本家手里，秘运华北华中方面获得暴利。地主富农的私粮还有一小部分落到小商小贩手里，转卖给城市。善良的贫苦农民，为了购买生产资料，或必需的日用品，和必需偿还的高利贷，不得已也间有从地主富农手里以高利买点粮食等物秘密拿到城市，以更高一点的价格卖出去，以济剜肉医创燃眉之急。不幸又被伪警察走狗们发现，把东西没收，还受打骂折磨。古海所说的每天各火车站和交通路口发现一些私带粮食等物品，它的来源就是这样的。

(4) 强收土地和日本侨民的横暴

第五日，三宅把伪政府收买土地问题和所谓日本开拓民的问题提出讨论。

吉林省五常县协议员谢某（忘其名）说："政府收买土地供给日本开拓民耕种使用，我们满洲人当然赞成，无话可说的。但是现在收买的不是荒地、山地、河边地，而是农民耕种多年的肥活熟地，并且给的价钱很少，还不够现在地价的20%。有时收买甲地并把乙地丙地包套在内，只出一份地价却买两三份的土地，农民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一看，他那多年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却不翼而飞了。例如本县太平村葛其发的3垧地，就被包套了去，使得他家5口流离失所，听说他老婆和3个孩子，现在哈尔滨市太平桥下的贫民区里靠缝穷讨饭度日；老葛被抓去当劳工没有下落，死活还不知道。即使能够得到公开的买卖

而所得的地价还不到时价的1/5，又没有指定移居地点，只得流离失所辗转他乡，密山县谢文东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致使农民无心耕种影响生产，也就是影响对于圣战军需的供给。并且现在日本开拓民来的有限，收买的土地无人耕种，多半荒芜，这又影响了粮食的增产。即使有开拓民的地方，由于日本人不会耕种旱田，多半转租给满洲农民。开拓民居然成了地主，什么也不干，并经常驱使满洲农民给他们干零活，任意抓拿农民的鸡鸭家禽杀而吃之，不给分文；虽或有自耕土地者，也任意使用满洲农民的畜力，既不给畜力报酬，也不给饲料，农民稍微同他计较一下，便遭受恶骂毒打，并有开枪威吓农民的。这类情况经常发生，希望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日满两国人才能平安相处……”

当时伪满各地凡有开拓民的，情况都是这样，各协议员纷纷举手争取补充发言。三宅说，还有许多议案需要讨论，为节省时间先请政府方面解答，有不足时再请协议员发言。因此伪满政府开拓总局长五十子岚用他惯用的粗暴语调发言说：

“产业开发、北边振兴、开拓移民，这是满洲国的三大国策，谁都知道的。这三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实行的好坏既关系到满洲国的兴亡问题，也关系到满洲人的死活问题。日本开拓民前来满洲国负有两种使命，就是既负担开发满洲产业的使命，又负担振兴北边的使命。由于满洲地广人稀，并有很多的河川可供发展水利，建设水田的需用，可是满洲农民只会种旱田不会种水田，更不会利用水力经营水产，大好富源弃之可惜。日本开拓民来到满洲后，把开发水田利用河川，经营水产、林业等技术传给满洲人，对于开发满洲产业来说，有很大的贡献。

再说满洲国北边的大门是大敞大开的，满洲人没有力量把

守这个大门，如果强盗（指苏联）一旦闯进来，满洲的国土不但寸土难保，整个的生命财产也是无法保全的；日本开拓民来到满洲，一面为满洲人开发产业繁荣经济提高生活，一面为满洲人准备付出生命把守大门，保护满洲人的土地财产和生命安全，满洲人应当感激，应当欢迎，为什么倒反抱怨愤恨，真令人难以理解。并且满洲土地很广，可作农田的约有4 500万垧，供给两亿人口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政府收买的土地不过满洲可耕地的1/10，对于满洲农民的生活毫无影响，并且所买的多半是半山半坡带有河川的土地，即使其中有点平地为数极少；日本人初来满洲马上开垦有些困难，先买点熟地耕种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收买的地价是遵照政府颁布的物价停止令的标准，因为土地价格当然在经济统制的范围之内。现在开拓用地当然闲着的不少，无地者如果愿租开拓用地耕种，政府倒很欢迎。假如能够这样做，数年之内他们仍然能够成为一个富有者，因此不能说农民无地可耕从而失业的话；并且他们手里还有卖地钱款尽可另谋生活，不致穷困得没有生路。关于指定移居地点，政府自当从长考虑。至于包套土地的事情可能是在登记过册时手续上有些错误，政府将查明纠正……”

五十子岚拿出这一套，进行欺骗蒙蔽、狡猾诡辩的同时，更先提出了所谓三大国策压在人们的头上，使协议员感觉头痛不能动弹，一时默无一言。三宅便说本议案经过五十子局长的解答很明白，想各协议员们没有什么疑义，如有疑问另找机会讨论，现在进行别案。

实际当时伪政府强收的农民土地已达20%，当时全伪满农地1 000万垧，外传2 000万垧，此数不确，至于五十子岚说不过10%，即500万垧乃是欺骗。由于当时确实数字密而不宣，局外人自然无从知晓。日本殖民者当年计划20年移植日本人500

万人，加上原住东北的200万人共为700万人可达到伪满总人口的20%。迫使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流入华北，一部分租种“开拓地”，变成日本侵略者的农奴，则整个伪满不用象朝鲜那样被吞并为日本领土，形式上保存一个傀儡国家的名义，实质上已成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同时700万的日本人可供征兵70万人抵抗苏联，腾出关东军充实侵略中国的兵力。至于当时土地时价：一等地每垧400元，二等地300元，三等地100元，较之所谓“七·二五”物价停止令时涨了十几倍，伪政府每垧仅付以40元、30元、20元的价钞，加上当时伪币膨胀，物价飞腾，三五十元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因此农民收到百八十元的地价，几十天内就花光了，辗转流离，相继死亡无法估计。

第六日，把所谓“国民动员的完成”项下的议案如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和青少年团、勤劳奉公队，义务劳动，省、市、县协和分会的组织，国防妇人会的组织、邻保（保甲）组织等议案提出讨论，内容复杂繁琐在此从略。

第七日开会时，三宅说：“应讨论的议案大致完毕，今天请三个分科委员会的责任者把分科会讨论的结果向大会报告。”这时伪安东省、热河省协议员发言说：“预定的议案虽已讨论完毕，但我们想紧急动议把‘讨伐’、‘清乡’问题、栽种鸦片和收购鸦片问题、辅导院、思想矫正场所问题，提到大会讨论一下如何?”

三宅说：“这些问题内容繁多又复杂，恐怕不是短时间能够讨论明白的，并且这些问题不在本会议讨论的范围内，只好另有机会再行研究……。”

三宅把这些危害中国人民最残酷、最凶恶的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和“思想矫正”政策轻轻推却，避而不谈，真是狡猾到了极点。

所谓“分科会”是指按议案的性质内容，由伪议长分别指定伪政府有关方面和地方协议员十几名，利用夜间在协和会馆的小会议室从晚间8时开会，大致由伪政府次长、司长级和协和会中央本部的部局长级，担任临时议长进行讨论。甲论乙驳，乙论甲驳，煞有介事似地闹得乌烟瘴气，伪政府方面也伪装耐心解答，往往相互争持到第二日凌晨一、两点钟，协和会预备高级茶点款待，伪政府方面始终以歪曲的理论和不正确的事例、数字，诡辩坚持；地方协议员多半是些地主富农、农村区长或流氓地痞分子，连一些诡辩的知识也没有。提到数字更是无法证明其真伪虚实，加上连日白天开会夜已过半，疲劳不堪，其中又多有鸦片瘾者，早已涕泪交流支持不住，只好认输，草草完事。日寇却有意利用这些人的固有缺陷，坚持柔斗的态度达到政治欺骗的目的。

分科会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协和会中央本部驱使平日豢养成熟的地方协议员，分别在大会上作报告。大致与伪政府三个次长所解答的没有什么出入，便算通过。三宅又把准备好了的感谢日本关东军电稿提出研究，大家自然赞成。三宅便站起来说：

“八日来的会议在军政各方面指导援助下，在各协议员的热烈讨论下，使九十多件议案顺利完成，实堪庆幸和欣快。已决议案即将付诸实行；未决的议案将由协和会中央本部和政府协商讲求解决的方法。希望协议员诸位，回到地方把会议热烈讨论的情况传给人民，使全国上下彻底知道我们的重大使命之所在，进一步努力增产节约，援助皇军多打胜仗，兴亚大业的实现指日可待……”乌烟瘴气闹了七八天的骗局到此闭幕。

政治骗局的罪恶作用

这套骗人的把戏，主要的意义是在开会期间，日本和伪满报纸把每天会议的一切情况和各种照片，用大号铅字大吹大擂占了一二版的整版篇幅，说什么协议员踊跃地畅所欲言，政府官长们诚意耐心的解答，时过夜半还在不倦不怠地讨论、在和蔼热烈诚恳的气氛中进行，这样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哪个国家能如此呢？王道乐土、日满一家的精神充分体现出来了……

一般人谁都知道日本统治者的凶恶厉害，平日是小心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的。但在协和会里可以随便说话没有拘束，因而有人误认协和会是为人民说话办事的机关，无形中提高了协和会的地位，以达到更便于进行欺骗工作的目的。

在伪政府方面，下决心无论协议员如何吵吵争论，决不能改变其既定的方针政策，不过是利用协和会联合协议会耍弄这种骗局，以便更好地推行其罪恶政策。

在协议员方面，由于多半是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分子，本来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是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说上几句话，如果有点成效对于他们也是有利无损的。并可在人民群众面前，获得不怕日本人敢说话的虚名，提高身价，增加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进而获得更有利的剥削压迫手段。如果发言无效，对他们本身也无损失，仍然可以勾结贿赂宪兵、警察特务们，在收粮、出工、捐献等等方面，上下其手，获得暴利和便宜。

伪军警宪特机关，可以利用会议的机会，对于地方协议员进行威胁利诱，拉拢他们充当走狗，以加强特务情报网。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的协议员们认为，能给官家办事，是个巴结不上的好机会，自然乐于被驱使。

伪满协和会

古海忠之

贾玉芹　译

一、协和"党"与协和"会"

昭和12年（1937年）满洲国开始进入第二个建设时期。欲全面发展国政，尤其是迎来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度，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日本的大力支援，是难以实现的。

这一年的春天，为了交涉有关预算和日本接受满洲国债等任务去东京。事毕返回新京后，凡是遇到我的人都说："古海！听说这次你要担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了？"我完全被惊呆了，立即赶到星野总务长官那里，劈头便问："你想让我去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吗？"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你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拒绝嘛！"我听后，心想你这是说些什么呀！便回来了，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其后不久，关东军第四课课长片仓衷前来拜访我，张口便说："古海，拜托了！你就担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吧！以前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协和会就是走不上正轨。现在想努力设法将它搞好。目前，能够担任指导部长和甘粕总务部长合作的非你莫属，拜托你了！"我当即回答说："我坚决拒绝。我对协和会不了解，而且，我一听到协和会的职员们只会说大话，头脑发热，我就生气。关东军说什么除古海之外再也找不到人了，这顶高帽我也不戴，请你再去物色优秀的人才吧！我敬谢了。"我

的语气十分尖刻。

接着，甘粕正彦——协和会总务部长来找我。我象对片仓第四课课长一样，将我的想法和要说的话都坦率地说了出来，而反应却全然不同。他一直默默地听着我说，然后，他对我说："实际上，我一直物色象你这样既通情达理又不徇私情的人。尤其是我十分欣赏你的人情味。因为协和会缺少的就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情味。"由于他推心置腹地同我谈话，反而使我感到为难。但是，我也并未表示接受，只说，让我再考虑一下，便告辞了。而对其他人的劝说，我一概回答以"不"。

又过了两三天，我一贯以师长相待，经常前去请教的田边治通参议约我到他家里去，我立即应约前往。他以缓和的语气对我进行如下的一番训示。他说："古海！听说大家都在请求你担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而你却无论如何也不接受。不过，对于一个人来说，自有做人的规矩。当许多人都说'请你无论如何也要接受这项任务，拜托你了'的时候，应该慨然应允，这就是做人的规矩。你去协和会工作，或许是个损失。然而，不计个人得失，接受大家的委托，这才是为人之道啊。古海！我认为你还是遵守这一为人之道才好！"。

我不能再进行任何申辩，只能称"是"。于是，我才准备接受协和会指导部长的职务。但是，由于在田边同我谈话之前，我的态度一直很强硬，所以关东军的片仓参谋等人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提出还可以兼任主计处长，只希望能担任指导部长。不过，我还是将主计处的工作尽可能地委托给一般会计科长饭泽重一，一心投入了协和会的工作。

就是这样，我同协和会发生了关系。然而，关于协和会的性质和任务，在当时，我并不十分了解。而更主要的是，实际上，协和会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有过种种变革；受协和

党创始人关东军石原莞尔思想影响的满洲事变，即满洲建军派的军人和在野人士集团，他们所从事的复古的、道义的活动也在起作用，从而使协和会的性质更加令人费解。就这一意义而言，为了有助于认识协和会，我认为有必要就我参加协和会工作之前的协和会前史作一简单介绍。以下就协和会初期的历史稍加回顾。

协和会是在筹建满洲协和党的基础上成立的。满洲国成立后，满洲青年联盟盟员、曾参与建党工作，建国时解散的自治指导部干部山口重次，和同人小泽开策共同策划成立满洲协和党。并将草案提交石原莞尔参谋征求意见，石原先生全面赞同，并表示给予大力支持。这说明关东军同意成立满洲协和党。

山口重次本人深受感动。昭和7年（1932年）4月2日，经石原参谋批准，在奉天确定了满洲协和党的筹备委员，开始着手筹备工作。委员有于静远、阮振铎、和田劲、山口重次和小泽开策等人（他们均为原自治指导部干部）。

山口重次起草的有关协和党的草案，根据石原参谋的意见做了很大修改，修改后的草案包括：1. 党的性质定为一国一党；2. 协和党根据国法做出规定；3. 协和党党费由满洲国支出。

以有关成立协和党的纲领和党章为基础，于4月15日召开政务会议（由国务总理等满洲国首脑和关东军等参加的政务联系协商会议），石原参谋出席，并提出下述要求：

“……我相信将3 000万民众的思想统一到建国精神上来是十分重要的。关东军司令官赞成协和党的成立宗旨；相信创始人的人格，决定成立满洲协和党。满洲国政府也对满洲协和党争以公议，并给以适当的支援，希望该党能在思想上成为建国的基础。我谨代表关东军司令陈述以上。”

关于石原参谋的上述发言，当场并无人提出意见，政府方

面似乎也已同意。然而，由于以执政溥仪为首多数政府要人持反对态度，因此，政府方面迟迟不制定协和党法。

其后，于6月中旬，资政局撤销不久，在石原先生的斡旋下，经过官吏代表的民政部总务司长中野琥逸和该部警务司长甘粕正彦同协和党代表山口重次进行对话和交涉，达成了妥协。确定将名称改为“满洲国协和会”，以执政为名誉总裁；以国务总理为首的官吏均为协和会会员。其后，以关东军片仓为中心，改写宣言、纲领和章程，重新确定干部人选。昭和7年（1932年）7月18日，政府将成立协和会的议案提交国务院会议，确定了宣言、纲领和章程。

协和会的干部和职员

名誉总裁：　执政溥仪

名誉顾问：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总务长官驹井德三

会长：　郑孝胥

理事长：　实业部总长（大臣）张燕卿

理事：　参议袁金铠、张景惠等，监察院长于冲汉、立法院长赵欣伯、各部总长：臧式毅（民政）、熙洽（财政）、谢介石（外交）等及各省省长、民政部总务司长中野琥逸，还有其他若干民间人士

中央事务局：　事务局长谢介石、次长中野琥逸、总务处长于静远、宣传处长阮振铎等

委员会会员：　山口重次、小泽开策、大羽时量、罗福葆、王大忠等，准委员纪井一（课长）、永井亮二（课长）、小川增雄（课长）、小山员治等

从上述协和会的组织和干部的构成情况来看，第一，明确

提出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高级干部都以名誉顾问或名誉理事的身分，成为协和会的有关人员；第二，提出执政溥仪作为名誉总裁；以国务总理郑孝胥为首的全部满洲国最高官吏都是会长、理事长或理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要说明协和会是国家机关，满洲国的全部最高首脑都要对协和会负责么？

乍看起来，它采取了类似政府机关的形式，然而，主张成立协和党的石原参谋等人，认为建国精神工作方面，协和会（党）应对政府进行指导和监督，而在这一方面，官吏是无能为力的。尤其是山口重次等协和党派对于日籍官吏拥有强烈的对抗意识。由此看来，上述做法或许是为了迫使政府承认协和会（党）是正式机关而采取的一种战术，也未可知。

实际上，从负责会务运营的中央事务局，尤其是委员会的人选来看，都是清一色的协和党派。以于静远和阮振铎为首，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人都是原自治指导部的干部，特别是其中的日本人几乎都是满洲青年联盟的会员，再联系到石原参谋的存在，不能不会联想到协和党的人事关系及其思想脉络。

昭和7年（1932年）7月25日，协和会举行成立大会，正式投入工作。

同年8月上旬，在日本陆军的定期调动中，关东军首脑（满洲事变派）几乎全部发生变化。新任关东军司令官为武藤信义大将，参谋长为小矶国昭中将，副参谋长为冈村宁次少将，参谋们也都进行了调动。

小矶国昭参谋长从他担任陆军次官时就反对成立协和党，认为由协和党发展而来的协和会应该解散，更谈不到由关东军司令官任协和会名誉顾问，参谋长任名誉理事了。小矶参谋长试图将日本的右翼团体正义团召至奉天，成立满洲正义团，借以取代并瓦解协和会。但是，他也考虑到协和会的成立经过和

关东军给予的支持和作出的决策，自知无法解散。最后，不仅不允许协和会成为政党，而且也禁止作为政党雏型而存在，确定了同意只是作为教化团体继续保留的方针，并将这一方针通报给总务长官。

在上述情况下，政府与协和会，官吏和会务职员之间出现了某种游离和对立的倾向。为了推动二者之间的合作，于9月上旬，进行了协会中央本部的改组。让协和会的实际领导人、协和党筹建发起人山口重次和小泽开策二人退职；由政府各部的总务司长（即次长）兼任协和会委员会委员；中央事务局次长由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兼任；结城清太郎（满铁高级官吏）任协和会专职职员，负责领导工作；和田劲担任监事工作。这样一来，协和会带上浓厚的官吏色彩，成为类似政府从属机构的组织。

昭和9年12月。自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起，山口重次、和田劲等人即接近板垣，控诉协和会由于官僚化而陷入低潮，并要求恢复原状，同时开始活动，准备推荐曾经是青年联盟干将、现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平岛敏夫出任协和会的领导人。

昭和10年（1935年）春，关东军首脑再次调动，南次郎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任参谋长（副参谋长为板垣征四郎少将）。同年5月，满洲国政府实行改组，张景惠出任国务总理（郑孝胥退职），总务厅次长为大达茂雄（阪谷希一退职），各部总长（大臣）大部分也进行了调动。

8月，协和会进行了改组。首先关东军的主要首脑恢复了协和会成立当时的名誉职务，其组织机构也全部恢复原状。

名誉顾问：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名誉理事：　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奉

天特务机关长士肥原贤二、满军顾问佐佐木到一、关东长官大野绿郎、日本大使馆参事谷正之

会长：　　国务总理张景惠

理事长：　外交部总长张燕卿

理事：　　同初期一样，包括参议、总长（大臣）、总务司长（次长）、省长等所有高级官吏

中央事务局局长：　吕荣寰（民政部总长），次长平岛敏夫

委员会委员：　结城清太郎（实业部总务司长）、和田劲（专职）、宫胁襄二、星野直树、半田敏治、子山负知、清水良策、高桥康顺、曾维藩、张格罗、罗福东

根据上述情况，南次郎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时代，虽然不同于小矶参谋长时代，他理解满洲国建国当时关东军的方针和设想，并决定继续加以贯彻执行。其后，满洲事变派的花谷正中佐和石原莞尔派干将、辻正信大尉来到关东军，这种倾向愈加明显。在这两名军人的推动下，于昭和11年9月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发表了《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并开展了其它一系列工作。

昭和12年(1937年)，在东条英机中将任关东军参谋长，道义的和唯心的方策很难得到关东军的支持，将采取务实的方针。同样，协和会也不能改变以往的做法，于是，协和会进行了改组和人事调动。本部长由于静远担任，总务部长由甘粕正彦担任，我被拉去任指导部长。

二、我任指导部长期间

最初筹建的协和党，其一国一党的指导思想，虽然不能肯

定它是唯心主义的，但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以维护建国精神（民族协和、民本主义政策）为目的的政治团体。后来，将“党”改称为“会”的协和会，其性质和内容也都是不明确的。结果，为建设民族协和和王道主义的新国家时，在人以权利为主体的政府机构领导下，很难实现民族协和，因此，便成立一个特殊机构以达到这一目的。就这一意义而言，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昭和7年（1932年），当我来到满洲时，对于协和会毫无了解。而当制定满洲国最初的总预算时，阪谷总务厅长将我找去，命令我在预算中编入拨给协和会的80万日元补助费。我虽然不了解情况，但还是编入了预算。当时，关东军司令部还设在奉天，阪谷总务厅长和我（代理主计处长）带着预算书和附属资料去关东军司令部请求批准。当时，小矶参谋长对我们说：“给协和会的80万日元补助费没有必要，削掉算了！”我由于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阪谷厅长却辩驳道：“绝对不可以”，小矶参谋长同意了原订计划。

小矶参谋长根本就无意执行为建立满洲国而煞费苦心，并实施以本庄司令官为首的板垣、石原、竹下，片仓参谋等人的设想，而且，或许又因为是以陆军次官调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大人物，所以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他原本就反对政党政治，认为继承政党政治传统的协和会本身必须解散。并将日本的右翼团体召来满洲，取代协和会，在奉天成立名曰“满洲正义团”的右翼团体。这对于关东军本身和协和会而言，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当小矶参谋长调离数年之后，关东军选择一个时机，解散了满洲正义团，将职员和设施全部合并到协和会之中，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

昭和7年7月18日，在新京，由国务院的委员会通过了协

和会的各项宣言和规章等。其纲领如下：

1. 宗旨：以实践王道为目的，肃清军阀专政的余毒。

2. 经济政策：振兴农政，改革产业，从而保障国民生活，清除共产主义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垄断。

3. 国民思想：重礼教、乐天命。谋求民族协和与国际亲善。

满洲国协和会章程（仅选其中若干条款），如：

第四条：本会以振兴满洲国之建国精神和宣扬王道政治为目的。

第五条：本会会员需是满洲国居民，并符合已定的会员规则（分普通会员、正会员和赞助会员三种）。

第三十三条：本会经费由会费、国库补助费和事业收益及其他杂项收入解决之。

从上述纲领来看，其中罗列了类似政府的方针、政策之类的事项，而第四条却又规定该会员以振兴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和宣扬王道政治为目的，说明它似乎完全是一个从事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的组织。还有，虽说是全国性的组织，但是，作为其基础的会员实体和构成又不明确，而且，又没有维持该组织的资金基础，因此，协和会的具体工作很难开展。结果，必然产生抽象空谈，甚至吹牛的风气。同时，石原参谋关于“协和会在建国精神问题方面，必需经常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监督和指导”的指示，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因而协和会职员对于官吏经常持对立的态度。

协和会成立当时实际领导人山口重次和小泽开策两人，其后来也不得不退职，由阪谷总务厅长和结城清太郎二人负责领导工作，后来又恳请平岛敏夫任协和会总务部长等（这时部分办事机构也有变化）。尽管进行多方的探讨和努力，但都未收到明显效果，究其原因，不外是由于协和会的性质不明确和组织

的涣散所造成的。

昭和11年（1936年）9月，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同时还撰写了与声明有关的小册子，散发给有关方面，其主要内容如下：

协和会的定义是，“协和会是充分领会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实现其理想的唯一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体”。在同政府的关系问题上，规定“协和会既非政府从属机关，又非对立机关，乃是政府的精神母体。政府是在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的基础上组成的机构……当真正的协和会员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以建国精神完成国民总动员时，则王道政治可望实现。”

上述声明和小册子，是由石原莞尔将军的信徒、石原派干将辻正信大尉执笔的，其根本思想就是以石原参谋为中心筹建的协和党的思想。由于找不出直接这样规定的理由和根据，所以才说成“协和会是政府的精神母体”。在为了使关东军司令官的上述声明合法化而写出的小册子中，或许是为了提高关东军司令官的威信，做了极为牵强附会而又不敬不逊的表述：“满洲国的政治乃哲人政治。关东军司令官即哲人，即天皇之代表”。

这份声明的事非姑且不说，小册子的上述内容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日籍官吏的首脑大达茂雄总务厅长向关东军提出了严重抗议，寸步不让。他说：“把关东军司令官说成是哲人，其意义虽然令人费解，然而，更重要的是究竟什么时候被指定为天皇的代表，如果任意自称是天皇的代表，这就是非同小可的严重问题了。”于是，关东军乱了阵脚，关东军首脑多次跑到厅长这里来，力图辩解，而厅长就是充耳不闻，断然拒绝，最后竟宣布辞职。另一方面，关东军在问题发生后，拚命地将发

出的小册子收回销毁。

12 月，由于大达茂雄总务厅长的辞职使风波得到平息。我们对于大达厅长绝对不向关东军妥协、据理力争的精神，深感敬佩。

军官民各界在大和旅馆，为大达茂雄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他在会上所作的告别讲话也令人难以忘怀。至此，关东军的首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而我至今回忆起来，仍不能不为大达茂雄的堂堂男子汉精神所感动。

在植田司令官发表《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同时，以花谷参谋和辻参谋等人为中心，动员全体协和会成员，大规模地扩大协和会组织和发展会员。个别发展的方式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因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某些城市，尤其以新京特别市为中心，遍访市内所有的町会，进行讲解和动员，将町会指定为协和会的分会，町长即为分会长，使分会遍及全市。通过这一工作，协和会会员号称达200万人。

协和会尽管被说成是同志组织，又说只有掌握建国精神者才有成为协和会员的资格，企图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在精神和道义方面具有高水平的组织，然而，欲实现这一目的却十分困难。在协和会难以获得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采取上述措施，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不无意义，那就是它暗示了协和会的性质（国民组织）和协和会运动的发展前景。我就是在上述情况下被拉入协和会工作的。

当我到协和会工作时，其机构已经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名誉总裁为皇帝溥仪，名誉顾问为关东军司令官，会长为国务总理，这一些都依然如旧。关于理事长和理事的情况，如今我毫无记忆，至于理事会更不必说，一次也未召开过。

中央事务局也被撤销，设中央本部作为协和会的执行机关，

在本部长的领导下设总务部长、指导部长和监察部长，采取部、课的组织形式。本部长为于静远（后来桥本虎之助取代），总务部长甘粕正彦，指导部长古海忠之，监察部长和田劲。此外，协和会的决策机关为中央本部委员会，选任年轻的大臣为委员，各部部长均兼任委员，关东军第4课课长片仓也是委员，每周召开1次委员会，审议重要会务。

我每天都到协和会本部去，详细了解其组织情况，职员的工作和思想。在同干部的谈话中，发现原协和党系统的职员和新职员，对于协和会的认识竟然如此不同，不禁大吃一惊。同时，他们对于政府官吏怀有对抗意识。在这一意识中，来自石原思想对协和党的认识仍然存在，同时，关东军司令官关于《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的声明，对此可能有所助长。甘粕和我都认为，以建设民族协和的理想国家为目标的官吏和会务职员，二者间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必须迅速结束其间的对立状态。经过同政府磋商，制定了二者可以对等的立场和相互自由调动的制度。首先，为了加强协和会组织的薄弱环节宣传科，将这一方面的权威，总务厅参事官武藤信男调任协和会宣传科长。同时，协和会的财务机构也不健全，经费用途不清，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又从政府调来会计专家任财务科长，以整顿协和会的会计工作。

当时，协和会的原有的有关人员和职员，绝大部分都认为“协和会是同志组织”。同时，在有关人员和职员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这种同志集团，他们自以为是协和会的指导力量，甚至存在排斥其它成员的倾向。为了解决这些同志意识，虽然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这种势力根深蒂固，工作十分棘手。至于我个人，不仅不是同志，甚至被认为是反对派的同伙。

于是，我曾对他们说：“你们说协和会是同志组织，那么究

竟是以什么为目的的同志呢？如果说凡是领会满洲国建国的根本精神的人就是同志，那么，你们这种歧视他人的同志观岂不可笑？所谓同志，到底由谁来认定？如果以私人关系论定又当别论，如果是合法的协和会的同志，就必须有一个任何人都能接受的客观的决定组织。口里高喊同志、同志，而干的却是破坏协和会组织的统一，导致分裂和对抗的的局面，这种活动必须停止。”我说完之后，一个个表情尴尬，一言不发。据了解，所谓的同志，就是旧时为组建协和党而出力的一伙人的集团，以石原莞尔参谋为中心，以其思想为行动准则的一派。我认为，必须统一各种观点，明确协和会的本质和组织，从而积极开展协和会运动，并且坚定了为此而努力工作的决心。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经过研究，于昭和12年（1937年）8月，修订了有关会员规则和分会组织的旧章程，并予以公布。

过去，协和会员分为普通会员、正会员和赞助会员三种。各种会员的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而经过修订的会员规则则定为“凡志愿实现本会目的、年满20岁以上，身心健康的满洲帝国人民均可以入会”。此外，还制定了有关会员的行动和管理的各项规定，以及关于分会组织的规则；确定了分会组织按地区划分的原则，以居住在一定地区的会员成立组织，不承认以往以集中行业组织和各阶层的政治要求为目的分会组织。同时，在规则的第一条（分会）中规定：凡机关、公司的办事处、工厂、矿山，或与之相类似的工作单位均可视为一个地区，可以成立分会。

总之，通过上述修订，排除特殊性，站在国民平等的立场上，力求使协和会组织发展成为真正的国民组织。

昭和13年（1938年）7月，根据国内外形势要求，在同协和会组织有机联系的基础上，根据民族一体的协和义勇奉公精

神，为了实行警备、动员，以及训练和组织，以各民族年满20至35岁的青壮年男子组成协和义勇奉公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上至大臣下至佣人，不分阶级，全国着用的那著名的协和会服，以及具有礼装性质的绶带，都是根据甘粕总务部长的提议和设计制定的。此外，堂堂的协和会馆落成，机关报《协和会志》也终于出版，这个时期协和会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发展。协和会经费主要由满洲国政府负担，由于我担任指导部长的同时，还兼任主计处长，保证了必要的预算，使协和会得以发展。

协和会的有关人员和职员，通过同分会会员及其它方面的接触，不仅在精神工作方面，在经济、民主、福利等方面，从国家到地方，都站在民众一边，同政府间进行协调和联系，使协和会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大。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协和会的联合协议会。这时，协议会也逐步的健全起来。即联合协议会共分县（旗、市、地区）、省（首都）、全国三级。县、旗市协议员由分会代表和县本部委员等选任。省协议员由县协议员和省本部委员中选任。全国联合协议会则由在全国范围内从首（首都）协议员、中央本部委员、省协议员选出，及全国联合协议会议案处理委员中选出的委员组成。逐步召开各种委员会、座谈会和正式会议。对于提出的议案逐一进行协商和反复讨论，最后由正式会议作出决议。决议不实行多数同意制，而是采用众议统裁（由主席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进行裁决的方法）。

在全国联合协议会的中央委员、参与和全国联合协议会议案处理委员中，包括政府各方面的负责人和特殊会社的负责人。在全国联合协议会审查议案时，作出决议的事项必须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当然，联合协议会同议会制度有根本的区别，它决不是立法机关。但是，它了解国民的愿望，可以在政府和国民之间进行疏通和协调，有时还议论政策的当否，甚至使之改变。由此可见，全国联合协议会制度具有独特的政治优越性。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下，而又不可能不考虑民族问题的满洲国，以联合协议会一类的制度为基调谋求发展，确实是一副对症的良药。

基于上述原因，政府同关东军磋商，满洲国确立了如下方针：过去因违法乱纪立法院院长赵欣伯被弹劾免职的同时，撤销立法院，只保留立法院事务局。现在将该局撤销，由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代替立法院发挥作用。

昭和11年（1936年）12月，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大达茂雄总务厅长辞职，财政部次长（翌年改称总务长官）星野直树被特任为总务厅长。翌年2月，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长调离，由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中将继任参谋长。同年9月，石原莞尔少将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是满洲国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关东军参谋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曾活跃一时。因此，他的到来给某些人带来一种希望，石原派开始蠢蠢欲动。

三、协和会与石原莞尔

在石原到任前夕，东条关东军参谋长将甘粕正彦找去。并说："现在决定由石原莞尔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他是满洲国的创始人，在当地一般来说也有威望，朋友也多。这些情况我也知道，所以我愿意与他友好相处。不过，他也是个怪人。所以，有时难免同我发生冲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你能立即起来为我们调解，使我们更好地合作共事，拜托你了。这件事只有你甘粕能胜任，除你之外再没有别人。"

甘粕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这件事，并说："看来东条也很介意

啊!"

然而，在这两个思想截然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周旋，就是甘粕也无能为力。实际上，陆军就没有合得来的可能。石原是思想家，尽人皆知地尖酸刻薄，公开地将东条参谋长叫做“东条伍长”，令人无法容忍。如果他的身边还有象当年板垣参谋那样拥有超群的实践能力的好搭挡，又当别论，现在这样的好朋友已不复存在。因此，石原往昔的盛名和威信也逐渐走下坡路，在东条的为人和实力的抑制下，差不多是气息奄奄了。

昭和13年（1938年）2月，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取代于静远兼任协和会中央本部长。7月，甘粕总务部长作为满洲使节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出访意大利，是对曾访问满洲国的意大利经济使节团的回访。而且，使节团在访问意大利之后还将为了增进友好和发展经济关系，访问已承认满洲国的德国和西班牙等，此次出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担任留守任务的我，除总务部长之外，还兼任新京特别市支部的事务长和女子国防妇人会的专务理事。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我全心全意地为促进协和会工作的发展而努力工作。

就在这时，不知从何处开始传出一股流言说，将免去古海的指导部长，派山口重次担任。由于关东军、政府和协和会的负责人都没有任何变化，所以我也没有特别介意。但是，又传出了排斥我的言论。

祸根就是石原副参谋长。在新京召开的全国在乡军人的大会上，石原副参谋长做了演讲，当涉及协和会问题时，他竟在公众面前大放厥辞。他说:“现在的协和会实在不象样子，这都是因为让象古海之流去搞的结果。那种人只要不尽快罢免赶走，协和会就绝对不会好。”

不久，出席这次集会的人们接二连三地前来向我报告这件

事。对于这种在公开场合所做的侮辱性发言，我绝对不能容忍，我立即开始行动。

于是，我立即去关东军第四课，我说，既然关东军最高首脑之一在公开场合说出了那番话，我想我不久要辞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而且也不可能作为官吏再继续工作，所以我要辞去总务厅主计处长的职务，回日本去，希望能给我一个明确的处理。

片仓课长等人说，石原这个人就是那么尖酸刻薄，希望你不要生气，等一等再说。桥本本部长说，这不仅仅是你的问题，也涉及到我本人，请将这件事交给我，你再等一下。这样一来，我只能是静观事态的发展了。

涉及到我自身的协和会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这期间发现关东军内部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问题，而协和会问题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就是，石原副参谋长提出了一个包括关东军、政府和协和会在内的满洲政案，关东军不得不加以解决。据说该方案内容有10条以上，内容属机密，我们当然无从得知，后来了解到大致包括下列事项：

1. 在将关东州转让给满洲国，将南满洲铁道会社改为满洲法人的同时，在东京设一协议机关，以公正合理地决定有关日、满间的国防和经济问题。

2. 关东军为了尽快撤回对满洲国政治的干预，缩小第四课，3年之内予以撤销。

3. 管理满洲国军的军政部由皇帝直属。

4. 排除日本垄断资本家在满洲国产业经济界的垄断活动。

5. 为了排除使满洲国变成日本殖民地和少数日籍官吏的专政，设立以协和会为中心的国策决定机构和企划机构。首先，在协和会会长领导下，组织中央委员，作为国策决定机构的母

体。与此相关联，应使古海之类的官僚辞去指导部长的职务，由协和会（党）的创始人山口重次领导协和会（摘自山口重次著《满洲建国的历史》）。

上述石原副参谋长的改革方案，如实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思想。

石原副参谋长的这一改革方案，在企图实现的过程中，遇事便同关东军首脑们意见相左，军内得不到统一。最后，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首脑们不得不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是否采取改革方案。经过认真的讨论，石原改革方案被全面否定。当然，有关我个人的去留以及协和会的问题，也就决定保持现状，没有变更的必要。

其后不久，于昭和13年末，石原竟从容不迫地搬家回东京去了。身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军官，竟如此自由行动，是涉及军纪的严重问题。为了给他的行动找出理由，使之合法化，据说有关人员曾煞费苦心，狼狈万分。

这件事姑且不论。协和会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做为主要问题之一，既然提出了我担任指导部长是否合适，我认为我还是以辞去指导部长为好。同时，我一贯主张协和会虽然从事思想工作、精神工作，但必须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实践。而协和会只是限于道义、精神等抽象的空谈，不进行科学的探讨。一方面倡导民族协和，却又无视构成其基础的各民族的民族性。我认为在协和会内也设立调查企划部是绝对必要的，于是我便向桥本本部长建议，并获得批准，新设企划局。我辞去指导部长，任企划局副局长（局长为本部长）。与此不相前后，甘粕也辞去了总务部长。

而关东军内仍有人认为，满洲国创始人之一，又是协和会创始者的石原莞尔将军，由于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而离开满洲，

而对立面的古海却仍然悠然自得地盘踞在协和会中，未免不妥。可能是由于这一原因，关东军同星野总务长官和协和会桥本本部长商量，动员我辞去协和会的职务出国访问。这也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我做为协和会的代表出席于昭和14年（1939年）9月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然后面对意大利的法西斯和纳粹党进行调查研究。这对于从来未去过外国的我，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同年4月，我乘坐日本邮船会社的欧洲航线轮船“榛名丸”前往伦敦。协和会总务科长阪田修一被选定与我同行，为我提供了一切方便。

伪满洲国协和会

阿拉塔　关朝格珠　舍旺

伪满时，在兴安省各旗县设有旗县协和会本部，在各行政区和努图克设置分会，由区长和努图克达任分会长。每个分会专职书记一二名，分会由村长、艾里达等组成。各本部都给会员发会员证，以证明你是某分会的会员，规定应遵守哪些章程，每月交纳多少会费等。会员主要协助协和会完成各项任务，如向上汇报农村情况、社会动态，尤其注意“流言蜚语”。

日本侵略者说协和会是满洲国政府的“精神母体”，是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国家团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附属机关，更不是与国家政府对立的机关。说协和会以实现“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为理想、是实现天皇圣意、与满洲国政府“表里一体”的组织。

协和会从中央到地方分会每年召开一次联合协议会。其内

容即协和会工作行动纲领中的第四项“宣德达情”。通过这种会议大肆宣扬满洲帝国的德政方针，并通过协商研究，了解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同时，以提案形式层层报请上一级联议会研究接受解决问题，实质上是“宣德达情”的实施形式。1945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故做镇静，以求安抚民心，前后召开了中央和地方两次联合协议会议。

第一次是1945年5月，兴安总省协和会本部，召开了全省联合协议会议。会议由总省本部长博彦满都主持。各旗、县、市长和参事官（日本人）以及各族各界的会员代表近30人参加。

总省协和会本部长博彦满都致开幕词，王爷庙日本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讲了话（阿拉塔任翻译）。这次大会，实质上是日本侵略者为其所谓“支援圣战”所召开的一次动员大会。

大会期间，与会代表提出了保证人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三十多条提案，但日本人仅以“……战争年代，困难是有的，我们日本人也在克服困难，只要更多地支援‘圣战’，打倒美、英，才能很快地提高老百姓的目前生活……”为借口，敷衍塞责地作了答复。

第二次是1945年7月25日，在新京（长春）协和会馆召开了全国各省、市、旗、县协和会官员和代表参加的全国联合协议会议。这次大会共开了4天。会议由满洲国务总理大臣兼满洲国协和会会长张景惠主持，兴安总省本部长博彦满都、本部次官白滨晴澄出席了会议，阿拉塔以联络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协和会名誉会长山田乙三、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以及宫内府大臣等也参加了会议。伪满洲国皇帝兼协和会名誉总裁溥仪到会接见了与会代表。

满洲协和会会长张景惠和日本关东军一名中将在会上讲了

话。内容与兴安总省联合协议会的讲话大致相同。会议期间，合省代表提出一百多条提案。其中部份提案，在会上由伪满兴农合作社总社理事长和全国专卖总署总署长做了解答。对粮食、棉布、食盐、火柴、油类等日用品的要求，全以所谓“战争时期，克服困难……”为由回答了事。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协和会在甘南的组织与活动

姬洪声

1932年7月15日正式宣告成立了“满洲国协和会”，在各省设事务局，各县设办事处。但当时并未全面普及，没做到每县都设办事处。甘南县在1935年（伪康德2年）仅设一个“联络员”。迨至1936年（伪康德3年）3月才正式建立“协和会甘南县办事处”，当初地址设在甘南县城南大街路东（今甘南一中的对过）。

1936年7月25日协和会实行改组，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本部”。甘南从1938年（伪康德5年）11月正式建立为“大满洲帝国协和会甘南县本部”，本部的最高职官称事务长，由日本人儿岛勇任事务长。办公地址迁移至大十字街东街路南，新建日本式水泥瓦房两栋（今为甘南旅社）。在全县发展建立9个分会（甘南、集贤、长山、中兴、兴隆、宝山、平阳、东阳、前大岗子），后发展为11个分会。

协和会的纲领、基本任务是：

一、建国精神之发扬；

二、民族协和之实现；

三、国民生活之向上；

四、宣德达情之彻底；

五、国民动员之完成。

由此可见协和会的机构性质乃是一个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它的使命是参与政治决策，组织动员，保证政府政策法令实施而进行宣传教化，实际上是在关东军的指使下，从不同角度维持日本侵略者利益，对东北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政治工具。自1934年（伪康德元年）以后，协和会的工作主要还从事反共活动，因此它又是个反动的政治组织。

1941年（伪康德8年）4月，协和会与伪政府实行了所谓“二位一体制”，各级协和会组织最高职官即由同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兼任。这实质是对协和会的权力与地位的加强，以期充分利用发挥协和会的组织力量与作用。从那时起，县里协和会本部长即由县长担任。

1941年4月至10月，协和会甘南县本部长为伪县长郭英麟。

1941年10月至1943年7月，协和会甘南县本部长为伪县长孙金城。

1943年7月以后至东北解放，协和会甘南县本部长为伪县长张士选，副本部长为江口义雄（日本副县长）。

协和会为扩大它的宣传阵地，还组织发展、吸收了许多外围组织、社会团体为它工作。

从1938年（伪康德5年）协和会在各省、市、县中小学中普遍建立起“协和青年团”、“协和少年团”。县里在协和会内部设“青少年团统监部”，由协和会本部长兼统监部长。在各学校举行授团旗仪式。甘南、宝山、平阳、东阳各小学都授有团旗。

开始把奴化教育重点放在青少年身上，妄图借此训练培养新一代忠于其殖民统治的顺民。

甘南道德会：讲仁义道德、信仰天命，提倡顺时听天，"忍为高和为贵"，大受协和会的喜欢，一开始就成为协和会的赞助团体，大加发扬。

1938年11月成立了"国防妇人会"，首任头头由伪县长林士魁的老婆、日本参事官新井清的老婆担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成立了"军人后援会"、"防空协会"等。此外还有"工商公会"。其它宗教团体，都必须依附协和会。

1939年，又成立了"勤劳俸仕队"，县设大队、村设中队，队长的人选都由协和会推荐或委派。

协和会自成立以来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伪政权垮台，在甘南地方搞了许多运动：

（一）征募"国防献金"，由协和会国防妇人会发动，实际上是由各村屯按户摊派，每年每户最低伪国币5元。群众有民谣曰："国防献金、国防献金，逼命坑人；左一茬，右一茬，聘裤当袄也得拿"。临灭亡之前还发动"畑粟鼠献纳"——挖"大眼贼"（一种草原鼠）、"金属献纳"、"血粉献纳"。

（二）农业增产出荷运动。即所谓粮谷出荷，全县及各村催粮谷，协和会都是主要成员，参加宣传训示与实地催搜。

（三）兴亚运动。主要宣扬"打倒英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作东亚霸主。

（四）储金奖励运动。主要鼓噪储金报国、支援大东亚圣战。名目有"通帐储金"、"必胜储金"、"国防储金"、"特别储金"（购买商品或到饭店吃饭时，在商品销售价格中按比例加收储金券）。此外还有种目繁多的其它储金等等。

（五）勤劳俸仕运动。主要搞无偿义务劳动。农民、市民、

学生、职员都规定有一定日数的劳动日，进行国防等工程施工劳动。学生修飞机场、擦炮弹、军粮包装、修路。从1943年（伪康德10年）凡征集国兵不合格青年都编为“勤劳俸仕队（着装），每年集中6个月，边军事训练边劳动。我县主要去查哈阳水利工地挖河渠。

这些运动都由协和会直接或间接参与主办或协办。直接为“大东亚战争”搜掠人力、物力，补偿它们进行侵略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

协和会的会员，在1937年（伪康德4年）以前，是实行所谓的严选主义的，一般入会为会员者，是要有点资格、身份的或对日占领满洲有某些功绩者。当时的会员分为：普通会员、正会员、赞助会员三种，会员人数不多：甘南县不完全统计是36名。1937年以后，实行了会员大众化，规定条件是相当松泛的。据敌档有关资料：“凡为达成本会目的迈进之满20岁以上，身心健全之满洲帝国人民得为本会会员，虽非满洲帝国人民，而准于前项者亦得为本会会员”。据此可见，凡满20岁以上身体无严重疾病、精神正常的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可成为协和会之会员。会员人数从此剧增，甘南县到1945年（伪康德12年）以前的会员人数达3 772人。入会会员发给一枚蓝色的“会徽”和铝制门牌（约3公分宽10公分长），上写“大满洲帝国协和会会员”字样，嵌在门楹上。

（摘自《甘南文史资料》）

我所知道的辽中县
伪“满洲帝国协和会”

王翔麟

我于1940年至1945年，被雇用担任“协和会”辽中县本部嘱托。“嘱托”是日本名词，近似于顾问之类的职务。于此期间，我曾先后参加过村（街）、县、市、省各级联合协议会。

各级联合协议会与县公署之间的磨擦、矛盾

各级联合协议会与县公署之间，由于争权夺利，经常发生磨擦。就我个人所知道的，就有好几起。比如：

1. 辽中县朱家房区联合协议会议长窦赓扬，曾任过数届县联合协议会议长。他多次在协议会开会时，对该区警察署署长包笑天提出指责，言词十分激烈。由于言之有据，使包笑天有口难辩，只能在心中暗暗叫苦，因此便怀恨在心。与此同时，窦赓扬也顶撞过县里的一些科、局长。长而久之，他便树敌过多，自己在同僚中越来越孤立。在1944年的县联合协议会开会结束那天夜里，他突然被包笑天派人抓了起来，挨了一顿捆绑毒打，并说他犯了“反满抗日”罪，送交到奉天市（沈阳）警察局。两个月后，终以“查无实据”被释放。从此，就更加深了县协和会本部与县公署之间的矛盾。

2. 协和会与县政府之间，不仅满系人同满系人有矛盾，日系人同日系人也有矛盾。1944年，日本部分在乡军人和在“满洲”的部分资本家，在县“协和会”事务长福田千义的支持下，

谋划在辽中成立“辽中开发株式会社”。事情已到开办前夕，遭到了县公署的恶视与阻挠。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协和会省本部不得不把事务长福田千义调转到台安县去，同时又把凌源县的总务科长中村健调到辽中县来接替福田千义的职务。因为当时的县长蔡景襄是从凌源转来的，他与中村私人关系密切。

上述两项矛盾的处理结果，都是以协和会一方被迫失势而告终。

协和会的附属机构

1. 青少年统监部——青少年科。青少年统监部附设于协和会县本部内，由部员和部员补主持工作。统监、副统监则由本部长（县长）、事务长兼任。在中、小学普遍建立“协和”青少年团组织。县统监部经常派工作人员到各学校检阅。

2. 国防妇人会。以“县长”、“副县长”的“夫人”任正、副会长，以职员家属、女职员及女教师为会员。在县本部设女书记一人。每逢庆典或开大会时，她们佩“职带”出席；在战时担任募捐、送慰问袋等工作。

3. 军人后援会。该会附设在县本部内，有主事一人，工作员一人（兼翻译）。其工作职责是专门收集会费。对热心“献纳”会费的人，根据他们出钱多少而分别授予“普通”、“优秀”、“特优”等“荣誉”称号，并发给金属证章以资鼓励。随着“献纳”人员的减少，会费的金额也在不断下降，到后来就有点没人“献纳”了，于是只好按照工商业资本的多少和农民土地拥有量的多少硬性摊派。收上来的钱就上交“协和会”县本部。就在辽中县本部收钱最多的1941年，这个本部的办公室，在一天夜间发生了火灾，烧毁了全部文书、档案，钱也没有了。同时在临街的墙上，发现了“焚毁媚外禽兽的巢穴”、“八路军

散在各地即将举事”、“中美英苏共伐日本”、“日本快完了”等标语。

事后，伪警宪便以辽中县协和会县本部的全体职员为怀疑对象，经过再三审讯，但毫无效果。后来发现军人后援会的收款员柳春阁失踪，便把另一名收款员宋春琪拘捕审讯，直到发现柳春阁已投河自杀，才算稀里糊涂了案。究竟这一案子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一直未查清楚。

4. 青年训练所，在协和会市、县本部统治下，普遍设置青年训练所，以各该市、县协和会本部长为所长，事务长为副所长，又以主任教导为主要负责人。其编制大致如下：

主任教导：负责拟定各期训练计划，并负贯彻、执行责任，同时担任讲授《国民常识》课。

辅导员：辅佐主任教导进行训练，并负责讲授《建国精神》课。

教导：负责发放或保管“建国杖”（器械体操用具，即木棒）。

军事教官：由军管区派现役军人中的中、少尉担任此职，负责军事教育，计有步兵操典、射击规范、阵中勤务等科目。其训练目的，起初是为“国兵”培训候补兵员，后来，就转为培训“青少年团”骨干、协和会分会职员、“勤劳俸仕队”队长等。1944年与奉天（沈阳）造兵所订立训练合同，由该所出经费，并派技术人员担任技术课，结业后全部去奉天（沈阳）造兵所当徒工。后因劳作过重、伙食低劣，大部分请假或逃回。

青年工作宣传队：该队任务是配合“讨伐队”赴外地进行宣传。“讨伐队”由县警务科特务股股长为领导，打着协和会的旗号，带着慰问品、宣传品，跟着“讨伐队”去“宣德达情”……

（摘自《辽中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回忆伪满鹤立县协和青年训练所

李哲伟

1937年1月18日，伪满民政部、军政部、蒙政部共同发布了《青年训练规定》。按照这个规定，青年训练由协和会负责进行。各级协和会都设青年训练机构，1941年后，伪满中央设青年训练部，省设青少年科、县成立青年训练所。鹤立县协和青年训练所于1940年成立，地址在协和会院内，当年开始训练，训练对象是在国民中挑选有文化、身体健康的16岁至19岁男青年。其目的是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妄图把青少年拖入青少年团，又到自卫团，再到军警的道路上，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服务。1943年7月到10月第7期协和青年训练所实况如下：

一、网罗青年

1943年8月20日，吉祥村（今吉祥乡）振兴屯（今振兴乡振兴村）公所赵小跑来到我家说：“庆庚，到屯公所去一趟，上边来人找你有事。”我心里格登一下子，不知啥大祸临头。到屯公所一看，除了屯长曾宪武以外，还有几个穿协和服戴眼镜的生人。屯长对那人说：“就是他。”戴眼镜的人从头到脚看了我一遍说：“行，这小子长的棒实，叫他去！”屯长还皮笑肉不笑地叫我准备行李，上鹤立县协和会青年训练所受训3个月。我一听到协和会，脑袋嗡地一下子天转地转眼发黑。那时民间多怕遇到官事。流传有“日本军、宪兵队、特务机关、协和会”，是伪满四大硬机关头，一听就毛骨悚然，弄到那里去，不死也扒

层皮。第二天一早到屯公所集合，本屯青年同去的还有夏明德、尚士环、刘宝珍和我4个人，都一个个愁眉苦脸心情不好，此行不知到那遭什么洋罪。

第二天坐着屯公所派的花轱辘官车上路。那时，从振兴屯到鹤立街（今鹤立镇）得绕到松花江边施家亮子（今德祥村）曲折38公里，太阳卡山前才赶到鹤立县协和会青年训练所。院里有一个大个子翻译（卢伯勋）正同一个日本人哩啦哇啦向一个伪军上尉示意什么，我们也听不懂，赶忙把行李放在宿舍，然后报名登记，又到西门里医院检查身体，回到训练所换上前几期已用过的旧黄色服装，西瓜皮式战斗帽、后开门黑色夹胶鞋，每人发1支老掉牙的“七九”式（套桶子）步枪，1根2厘米粗1米长的小柞木棍（日本起名曰建国杖），一整套准军事的东洋打扮。

青年训练所受训科目主要分政治、军事两项，附以勤劳奉公活动。

二、准军事生活

准军事生活，每天早晨5时起床，由助教李有山带队正步走出大门，跑步到街外阿凌达河边或北门里建国神社广场，跑动1圈返回，还得正步进入训练所大门。洗嗽后方能吃早饭。1天3顿高粱米饭、土豆酱，宿舍屋中摆上一排大条桌，开饭前各人按固定坐位腰板挺直地坐下，口笛一响，领头的喊一声“伊达达稽公司”，大伙也得随着复颂一遍才能吃饭。饭盆端上你争我抢，狼吞虎咽，饭里砂子多，合不上牙，顿顿吃不饱。再一齐翻一句“伊达达秸么夕达”，方能散食。夜间指派不寝番（值宿）每班两人，两小时一换班，负责看护枪支，安全守卫。记得有一天夜里得知厨房柜里有头目吃剩的狗肉，不寝番者班班

偷吃狗肉，一夜间把狗肉吃光。次日梁辅导气得破口大骂，把十几个不寝番叫到一起，用建国杖往头上痛击，边打边审问："看你他妈嘴还馋不"，"满洲人就是奴隶性，不打不行"，个个脑袋都打得肿了大包。

三、奴化教育

每天上午由训练所教导主任卢伯勋（鹤立协和会本部部员，长春建国大学生出身）讲政治课，中心内容是协和运动，包括协和会的诞生、宗旨等。卢伯勋常引用本庄繁对协和会的解释，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协和会是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一种国家团体，它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也不是与政府对立的机关，而是政府的精神母体"，"精神母体者，即建国精神也"，而"建国精神"则被植田解释为"以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圣德"。这就是说协和会首先是向广大中国群众灌输所谓"建国精神"的反动的政治思想。鹤立县协和会本部长由日本人副县长河口登兼任，偶尔到课堂进行时事演讲，鼓吹大东亚圣战战况，什么"皇军马尼拉登陆"、"德意志在苏联三千里战线攻击"，以及"民族协和"、"万邦协和"、"协和精神"等欺骗宣传来奴化青年。鼓动青年为大东亚圣战奉公。每天中午12时还得就地立正为"玉碎"阵亡皇军默悼1分钟，灌输武士道精神。训练生都在表面上佯作默悼，常常是假作低头，斜眼环视，暗里发笑。

四、军事训练

按照伪国兵训练模式，列队正步走出训练所大门，扛着破套桶子枪，这枪弹仓楞高，还硬叫模拟"三八式"步枪，扛在肩上一跑一颠达，梭子骨卡得红肿疼痛，在往返鹤立街行进中

唱《陆军歌》，用日语唱《爱马进军歌》。军训场地常在东门外阿凌达河套，北门外砂坑，北门里建国神社广场，西北山根等野外，多在广场学列队式，野甸子里学攻击战。由一个现役伪军上尉杨××充当军事教官，退役伪军梁××为辅导员，李有山为助教。半天一晌地在草塘里滚爬，伏击冲杀。杨教官是河北省乐亭人，他在公开场面按科目训练，见日本大龟准尉也敬举手军礼；背着日本人却常在野外发牢骚、议论泄愤："我他妈的才不学日语呢"，"现在战局吃紧"，"到时候都得长点心眼儿"，"不管到哪个朝代都得有点本领好"。不清不明的话语一讲就是个把钟头。有一天在野外他教唱"怒发冲冠……"旧时歌。天天弄一身泥土，做完军事科目到河边洗脸列队回归。不但白天训练，夜间也时常演习。在9月18日，日伪为纪念入侵中国的一天，训练所搞一次夜间演习，当夜晚10点钟，忽听电铃叮呤叮呤急响，梁辅导员大声疾呼："快起来，有紧急敌情!"这一突如其来举动可把大伙吓懵了，以为抗联打进鹤立街。又不准开灯，东一头西一头又摸裤子又划拉枪，跑到当院集合。教官查出有穿反鞋的，有把裤子前后穿倒的，一群狼狈洋相，免不了挨一顿腚跟脚。

五、古怪茶会

日本人的茶话会近似中国的座谈会。在9月的一天，协和会谋策全体训练生加入协和青年团为团员。头目把大伙领进会议室，桌上放两堆柿子，几碗茶水，两盘青梅糖球，正面挂红地黑风火轮协和青年团旗。先由协和会头目（日本人）训词，卢伯勋翻译。大意是"日满协和如弟兄，协和青年团要发扬建国精神，民族协和、万邦协和"等骗人鬼话。从1938年6月15日，协和会发布了《青少年组织大纲》，把青年全部统一在协和青年

团和协和少年团之中，并置于协和会控制之下，宣传协和青年团员要为大东亚圣战而奉公。

六、欢送伪军

从1940年4月11日起，伪满洲国公布并实行《国兵法》，从此伪满军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凡年满19岁男性青年，合格者服役三年，不合格的均编入勤劳奉公队（群众称国兵漏）义务劳动。1943年秋鹤立县应征入伍伪军百余人到协和会集中欢送。在头一天协和会从鹤立街弄来20来名青年姑娘，夜晚住在训练所大宿舍北炕，把训练生都哄到南炕挤。大伙都合衣挤着休息，要出外解手回屋就没地方，折腾一夜却都没睡好觉。训练生第二天列队在协和会院内集合欢送。那些青年妇女手托小红花，逐个给新伪军佩戴。洋戏匣子（留声机）里伴唱《爱马进军歌》和《大东亚决战》等日本歌曲。之后，从军官身后出来一名20上下岁女青年，身穿仁丹士林市长衫，浪里流丢地向伪军抿嘴一笑，行一鞠躬礼，唱起"我这心里一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怕相思偏偏又把相思害……"这首《卖相思》流行歌曲。当时我看到一些伪军心情不安，满脸愁容地低头苦思。事后得知，唱歌的女青年是北市场妓院歌妓。

七、日本部落割稻

有一天，站好队头目讲："今儿个外出不拿枪，协和青年嘛，要义务奉公，日满协和要与大日本一德一心，亲邦皇军上前线，我们在后方帮他们家秋收。"快步出北门到日本人一个部落寡妇户割水稻。一大片肥沃良田，因为男人都当兵去了，所以部落里多是妇女和老弱残疾。她们没力伺弄好庄稼，稻田荒芜，半天割出半垧地，临返前日本老妇点头致谢："阿力嘎斗勾杂一吗

司”（谢谢），看那老妇还怪可怜的。事后听说她一家男人都在前线“玉碎”（阵亡），扔下寡妇一人无依靠，可见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受害者。

八、“攻击”吉祥

“攻击”吉祥，是第七期军事训练的一次战斗演习，出发前，教官训示：“三个月的训练要毕业了，今天发给每人三发空包子弹（教练弹），假设敌人是‘胡子’（指抗联），攻击地点是离街东边十八里吉祥村。”又说“兵在神速，行军要快、冲锋要猛、定要凯旋归！”一声出发命令一气跑步9公里，到吉祥北门外就地散开，分三路从北门攻入，杨教官举起指挥刀喊：“哈牙哭（快）冲锋啊！”奴才洋相的日满协和话都用出来了。杀声四起。正在干活的村民都被这一急促枪声吓得四处奔跑，攻进村里不知是谁竟把枪口对准栓在木桩上的老黄牛肚子，把它打得哞哞怪叫，刹那间把一个平静的村庄搅得鸡飞狗跳墙。攻到村公所后，教官宣告攻击胜利，在村公所东面小广场列队，唱军歌走出北门，村民多以鄙视的眼光看他们的鬼洋相。

九、火车站装白菜

10月下旬，北风萧萧，初寒袭人。训练生列队后，梁辅导员说：“今天要勤劳奉公，支援大东亚圣战。”他一撅尾巴就知道拉几个粪蛋，什么奉公圣战，准又叫大伙给日本人效苦力。果然不出所料，到鹤立火车站一看，有几万斤冻白菜急待外运。现场还有十来个日本军看管，翻译说天冷了，白菜往佳木斯日本军大营装运，这是协和青年勤劳奉公之举。日军端着亮刺刀，头戴钢盔，在四周看护监视。梁辅导嘀咕着日满协和话，还奴颜卑膝地掏出伪军证给日军献媚。我们一个个手冻得拔凉才装毕，

列队唱军歌回营。

十、永发游动

10月末刚下过一场2寸厚的雪，训练生还穿着单衣鞋，个个冻得哆哆嗦嗦，举着协和青年团旗，去鹤立街西永发村游动。照例列队进入永发村小学校操场，转游两周，唱几个军歌、稍息、返回。这次游动头目没有训话，可能只作了一次耀武扬威(日本人惯用此伎俩)，一路冷冷清清，返回训练所，个个象没长毛、秋打摸鸡似地哆哆打战。

伪鹤立县协和青年训练所自1940年成立开始训练第一期后，每年训练两期、每期50名训练3个月，共训7期350人，这些人集训结束后，再没有集中活动过，其中除极少数人当了伪军、自卫团（棒子队）外，农村去的青年都回家务农，“协和精神”全扔到脑后，盼望祖国早日光复，不当亡国奴。

（摘自《汤原文史资料》第六辑）

伪满范家屯协和会的青年训练

滕先林

日伪时期，人们把“关东军、宪兵队、警察署、协和会”称之为“四大硬”。协和会所干的勾当，是宣传“日满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主要对象是青少年，灌输“建国精神”、“实现建国理想”。为了向青年进行奴化训练和教育，特意组织了“青年训练团”。所参加青年训练的人，都是范家屯街各商号的学徒工。协和会把指标拨给各商号，商号老板就叫

适龄的青年店员去参加训练。至于你个人愿不愿意，那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我就是这样硬逼着去受训练的。

1943年，全范家屯街各商号16至20岁的青年店员达200来人，都按时集中到协和会，接受这种非人道的奴化训练。当时青年训练团的团长由协和会的书记袁明述兼任，他是个恶霸地主，外号叫“袁大麻子”。副团长是郜桐。教官是杨俊德，为人凶恶狠毒，外号叫“杨大马棒”。范家屯协和会分会的主事是日本人，叫西泽正三郎，还有个翻译叫詹名扬，他俩亲自坐镇策划监督。当时，被编成一个大队，两个中队，四个小队。大队长先是鲍富国，后是张国良，他俩都是范家屯泰来烧锅的店员。因为泰来家财大势大，少东家还是留日的学生，经理范传九又是商会会长，真是“主多大奴多大”，他俩就“荣任”了大队长，尤其是张国良，有一身“效忠”日本天皇的“本领”，对上溜须拍马，对下吹胡子瞪眼，深受日本人的青睐。一中队长杨照忠是义德兴的店员，二中队长韩达三是韩家床子的，两个人会喊一口流利的日语口令。

青年训练团不光是为的训练，因为当时是1943年，也就是日本倒台子（1945年）的前两年。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渐处劣势，关内日本侵略军连连失利，日本人感到前景不妙，就把青年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四个小队各有特殊任务：

一小队为行动队，主要为协和会所稿各种活动服务。小队长叫杜春。

二小队为自卫队，主要是为警察署服务，也就是为警察当“帮凶”。小队长叫王恩沛。

三小队为消防队，为街公所服务。小队长叫周沧海。

四小队为护路队，为火车站警护队服务。小队长叫程文秀。

到训练的时候，都集中训练，不训练就分别到各自服务部门去“服务”。从各小队所担负的任务来看，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的险恶用心。凡是参加青年训练的，每人发给一套黄色的训练服，一个战斗帽，一付腿绑。发的服装只许训练时穿，平时还不许穿。每个人在上衣左兜盖上带一个“八紘一宇”的胸章，长5公分，宽2公分，红地，中间有蓝色的象葵花形状的图案。在胸章上还绣有阶级标志，正团长绣上两道黄杠，副团长是一道黄杠，大队长是两道白杠，中队长是两道黑杠，小队长是一道杠。每个人发给一根木棒，长1.2米，直径3公分，美其名曰“建国杖”。在训练时顶枪使用。训练的时间，开始是每周三、六的上午，后又增加为周一、周三、周六上午。训练的科目：立正、稍息、队形变换、战斗训练、建国体操、建国杖操，以后又增加了“铁锹操”，一个人拿一把大铁锹下操。有时发给木制枪，学刺杀，还有防空训练和消防训练。每天训练一开始，面向东南遥拜“日本天皇”，得行三个90度礼，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劲，又改为3分钟的“持枪礼”。这3分钟得象钉到地上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出。接着就是背“国民训”和“回銮训民诏书”。背完之后，西译正三郎、詹明扬、袁明述等人训话，大讲“日满协和”、“王道乐土”和“武士道精神”。天天如是地讲，你都得立正注目地听，稍一走神，就会被叫出来，问你：“我说什么啦?”要是回答不上来，上去就是一顿“嘴巴”，再不就是罚跪，另外还得让你用日本话背“国民训”和“回銮训民诏书”，背不下来就是一顿暴打。每逢他们训话的时候，不管心里怎么咒恨，表面上得规规矩矩，洗耳恭听。在背“国民训”的时候，不会也得装会，随大伙背。有一次新来的一个队员，他不会用日语背“国民训”，硬叫他背，背不对就打。把他气得背地里说：“日本话不用学，再呆二年用不着。”没成想竟然叫人告发了。杨

大马棒先是一顿毒打，接着就要以“反满抗日”论罪。商店老板急忙托人送礼才算拉倒。这个小伙子刚来东北谋生，不几天又被人家辞退回关里家了。

每逢一到训练日，大伙的心都砰砰直跳，简直象过“鬼门关”一样。日本人西泽正三郎在旁边进行监督。这个狠毒的日本人，会说几句日本式的中国话。大个子，因为有个罗锅总猫着腰，走起路来脖子一伸一伸的，他总想把腰板拔直了，显示“尚武精神”，可就是拔不起来。教官杨俊德，60岁左右，高个子，近视眼，一脸横肉，留着日本式的“八字胡”，说话有点秃舌头。因为日本话没学通，又想赶“时髦”，就把中日两种话混到一起说，大家叫它“协和语”。他下的口令，一会是日语口令，一会又是中国话口令，有时一个口令里一半日语一半中国语，简直叫人啼笑皆非。杨教官教练的本事并不高明，打骂人的本领却高人一筹。他“发明”一种“协和嘴巴”，在训练时，看谁因为没听懂他的口令，把动作做错了，立即找出两个人，让对面站着，一人一下轮换着打嘴巴，不使劲杨大马棒不让，结果你使劲打我，我就使劲打你，两人越打火劲越大，直打到鼻口流血，杨大马棒在一旁哈哈大笑。有一次“和兴厚”商店派来一个刚从山东来的年轻人，“冷丁”地听不懂杨大马棒的“协和语”口令，只好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学着做，这样一来动作就慢了一点，杨大马棒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暴打。杨大马棒这些人挖空心思遭践人，有时他怕打人累痛，就叫你拔正步，老半天才下一个口令，实际上就是罚你单腿站，这种损招真够人受的，没拔了几步就顺脑袋流汗，两条腿生哽哽。

受训练的青年除了被他们打骂以外，还得被他们“勒大脖子”。1944年春，黄瓜刚上市的时候，杨大马棒拿两角钱叫我给他去买1斤黄瓜。我当时也没明白他的意图，再说，我也没有钱

给他垫上，只买1根黄瓜拿回来啦。这一下子可惹来祸了，杨大马棒上来就给我几个耳光，接着就是几脚，还罚了1个小时的跪。当时我被打得懵头转向，不知道为啥挨打，事后才醒过腔来，不由得咬牙切齿地在心里恨骂："这些不长人心的豺狼，不能得好死。"

除了训练之外，还得进行"勤劳奉仕"、修国道、挖河渠。每逢防空日，就拿着"建国杖"到街头站岗放哨。一到冬天，就到粮栈给维持秩序。有的队员被警察署找去，帮着警察去堵截"经济犯"。在这些活动中，个别人由于品质恶劣，"帮虎吃食"，干些欺压和打骂百姓的事。因此，老百姓给编了个顺口溜："青年团协和会，人家拿枪他拿棍，吹胡子瞪眼唬一阵。"

因为这些受训的人员，都是各商号的学徒工，是所谓"义役训练"，参加训练期间，仍然由商号开工资。白天训练一结束，就急忙回商店，拼命地干活，好把训练时耽误的活补上，不然的话，就有被裁掉的危险。这真是去训练时惊心，回来时担心，从来没有安心的时候。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一个个自顾不暇，顾不得管青年训练了，我们才解脱了这种苦难的"奴化训练"。

国民党来了之后，袁明述、杨俊德俩人，摇身一变当上了国民党的"建军"头子，继续干着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解放后，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摘自《公主岭文史资料》第一辑）

七

伪满的“外交”

郑孝胥与儿玉右二
在美英之间的秘密外交活动

谷次亨供稿　张辅麟整理

1932年10月初，从日本东京来了两个人，一个叫儿玉右二，是日本政友会的顾问，曾任日本商工省政务次官，既是中国通，又是美国通。日本政界，特别是外务省对他十分重视，经常向他咨询有关对华、对欧美政策上的事情；另一个叫田边敏行，山口县人，儿玉同乡，任过"满铁"地方部长、理事，是我的老领导，我曾在他负责的地方部、地方课当过课员，与他很熟。

伪满洲国成立后，经"满铁"推荐，我到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任调查课长，这时正值日本人给郑孝胥配的日本秘书官兼翻译康井尚没到任，伪国务院临时派我顶了这个角色。当时郑孝胥还兼任伪文教部大臣，他因总理事情多，文教部的事多委托我联络。因此，我同郑孝胥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这位"国务总理"在伪国务院内除他儿子外，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想必田边敏行知道这一情况，所以他们下车伊始，就先找我联络，进行活动。

记得田边是从日本人经营的高级旅馆"名古屋"打电话约我晚饭后去会他。当晚我如约前往，彼此寒暄几句后，他就把我领到邻室儿玉右二那里，相互做了介绍。田边介绍我时，着重说到郑总理对我的信任，以及我对日满关系的忠诚。介绍到儿玉时，田边结合日本政党斗争，民政党与政友会之争讲了儿

玉的作用。田边说："儿玉先生继承了同乡先辈伊藤博文的'文装的武备论'思想，很想在开发满洲上做点贡献。儿玉先生来中国多次，又在美国搞过两次经济调查，对于如何建设'满洲国'很有些与众不同的想法……"话说到这，儿玉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接着又进来一个人，40岁上下。田边又把他介绍给我说："这位是村井坚二君，是小矶参谋长的私人秘书，负责财政经济方面问题的处理。他是东京帝大经济科毕业，有名的经济专家，同参谋长是莫逆之交。这次参谋长上任就把他带来，想在满洲的财政经济上做出一番事业，希望谷君与村井君能一见如故，密切合作！"村井也没多说什么，田边又说些别的闲话，已到10点了，儿玉才开口说："与谷君相识很高兴，我想明天晚上6点在'曙'料理店备点粗饭薄酒，特请谷君光临。届时还有田边、村井作陪，我要谈谈这次来满洲的任务和具体内容，还望谷君多多支持予以帮助。因此，务请您大驾光临。"我自然接受了他的盛情邀请，但不知到底他们要干什么，心中怀着大疑团，告辞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6点，我准时到"曙"料理店时，只见儿玉、田边和村井3人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呢！儿玉马上将我让入上座，并吩咐侍女送酒菜，一切安排妥当后，儿玉又告诉女侍不招呼先不用来。然后，他以主人身份起身举杯说："我是和谷先生初识，这杯酒先祝谷先生身体健康和前途有发展，我们干了这杯！"然后他又举杯祝田边、村井身体健康和事业成功，大家都一饮而尽。接下来儿玉就谈开了正题。原来这也是个侵华老手，他完全继承了伊藤博文那一套，也是"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鼓吹者，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满洲国"的成立，冲破了原来"满铁"附属地的狭小范围，在大陆政策上走完第一步。但是并没达到最后目的，最后目的是开发建设满洲，这是世界有名的大

粮库，又有丰富的资源。要实现这一切，需要大批资金，日本资本家有些人担心，不敢在这儿冒险，对军部的计划还有保留。儿玉接着又分析国际形势，认为美国一直提倡“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很希望向满洲进行资本输出，如果我们想方设法采取一定形式吸引美国人来投资，这样既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又可以缓解日美关系和美国对“满洲国”的攻击，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说到这里，儿玉抑制自己的兴奋情绪，把话又拉回来说：当然，我们允许美国人投资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遵从“满洲国”的方针，服从关东军的计划，一句话，就是要尊重“满洲国”的国策。当他发现我对如何吸引美国投资这一点有些不解时，他又具体解释了美国资金来源。原来，他的山口县老乡在美国加州一带做移民后，积蓄了一大笔资金，他准备通过交涉使美国政府允许美籍日人投资。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原来都是日本人，当然，会服从“国策”了。接着儿玉说：“这项计划，我酝酿一段时间了，但在日本国内财阀和政党多有反对，因此，不易张扬，需要秘密进行，请谷先生代为保密；更主要地需得‘满洲国’郑总理的支持和认可，我们知道谷先生深得总理信任，希望你能充当联络人。我们此行，很想拜见郑总理，请谷先生把上述我们的计划透露给总理，待正式拜会时，我们再具体面陈。并请谷先生充当翻译，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我们这一计划最理想的合作者！”

我接受了儿玉的委托，第二天晚间去郑公馆面见郑孝胥，把儿玉来满的目的，他们计划的内容，及儿玉的出身经历和他与日本军部、政党、财阀各方面的关系，据我所知详细地做了介绍。郑孝胥这位主张“共管说”的总理，对美国财政势力的介入，自然很感兴趣，但他对儿玉似乎有点不放心，又详细询问了有关儿玉的具体情况。我又补充说：“记得日本报纸刊登过，

儿玉在日本临时帝国议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极力主张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我接触的印象，他不象一般政客，只会夸夸其谈，是个有心计、干实事的人。”郑孝胥略一思索对我说：“那么我还是见一见他，你陪他于后天晚上7时来吧！”我看郑孝胥答应会见，心里很高兴，感到不负儿玉、田边的信任，回家后，马上给田边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一喜讯。

第四天晚饭后，我先去“名古屋”旅馆找儿玉等3人一起乘车来到东五马路郑孝胥的私邸，把他们引至西客厅。大家刚落座，不久，郑孝胥就来了，我出面将双方做了介绍。在介绍中，儿玉表示，应当去国务院拜访，但因特殊情况改在晚间来私宅拜见，有些不恭，请总理原谅。郑孝胥则说，谷次亨已向我说明了，彼此不用客气。

大家重又坐定后，儿玉开始恭维郑孝胥，说他是伟大的政治家，领导开辟满洲新天地，建设五族协和新国家，让人感佩。不过现在遇到麻烦，英、美在国际联盟里大造舆论攻击日本和“满洲国”，我们在东京商定一个办法，设法拉住美、英，这样国际联盟的孤立政策就不存在了，郑总理可以安心执行国务了。郑孝胥立即表示，能有这样的办法，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儿玉接着又说：“满洲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美、英早就了解，而且特别感兴趣。他们的调查比满铁调查部的调查还细，其中英国对冶金和煤矿经营还有丰富经验，‘满洲国’如果对外表示欢迎投资经营，英、美资本家肯定会响应，随之英、美政府也会承认‘满洲国’的。”

听儿玉说到这里，郑孝胥插嘴说：“对于欧美各国企图来投资的情况，我早就知道，我陪伴溥仪执政在北京、天津居住时，常同在华北的英国实业家来往，他们都表示愿在中国投资办企业。他还时时引用开滦煤矿的例子，认为办得成功，投资不大，

效益大。我在上海隐居时，也常有美国朋友去看我，他们也多次说起，美国出口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定位置，不比英、法逊色，但是投资办企业的却不多。不是美国人不想干，中国市场大，劳动力便宜，确是理想的投资环境，就是中国没有统一政权，总打内战，使美国人感到投资缺乏保障，不敢冒风险。我当时也只能听听而已，现在好了，'满洲国'成立，我们是应该欢迎美、英各国前来投资帮助开发，我想应该给他们以必要的保障条件，保证其最低利润指数，只是不知他们的政府是什么态度，他们会正式承认我们满洲国吗？对于这一点我还有些怀疑。"

儿玉说："总理阁下的担心和怀疑是很自然的。但那是过去由于中国不统一，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也不支持，在外国就不是这样，无论哪一国的政府，没有不关心他们资本家投资事业发展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日本在上海的'三井物产支店'以上海这一南北物资交汇地为中心，每年经营额不下十几亿美元，所获利润在日本财阀中是最高的，若没有日本外务省的支持，三井是不会顺利开展经营活动的。所以大家说，驻上海日本总领事与三井支店长是异体同心的关系。开滦煤矿，刚才阁下举例说过，它也是英国公使同北洋政府交涉的结果。由此推及，我们设法推动美、英民间交易，那么也就等于推动了美、英等国与满洲国的外交了。"

郑孝胥听了儿玉的解释后，沉吟一会儿说："你讲的有一定道理，只是不知你们对于推动英、美投资工作有什么具体方案，我愿闻其详！"

儿玉说："这正是我拜见阁下要面陈的主要内容。满洲物产丰富，人力也多，但是由于现代技术落后，要使满洲国强盛起来，必须积极进行开发，这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一致意见。若

开发，必须有资金，日本财阀只有三井是支持政友会和军部政策的，但它的资金有限，若真正把满洲开发起来，必须有美、英等国来投资。当然，他们若来必须遵守满洲国国策，服从关东军计划，既开发产业又从事军用物资生产，不然，我们是不允许的。”

郑孝胥问：“按这样的条件，美、英资本家肯干吗？”

儿玉马上兴致勃勃地说：“就是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我做过调查，那就是动员日本移民美国的资本家投资。我的家乡山口县在美国加州移民不少，他们在美国东海岸经营农场、果树园，积累不少资本，用来投资给我们是足够用了。问题是这笔资本受美国政府控制，不经政府同意，难以拿出。”

郑孝胥又问：“这笔资本款项，大体有多少呢？儿玉先生说说何妨？”

“据我所知，大约有19亿以上美元！”

“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呢！但是现在美国在国联一劲儿反日，又拼命反对满洲国，要使他们同意投资，怕不容易吧？”郑孝胥又试探着问。

儿玉摆着胸有成竹的架式，播播手说：“总理阁下，不要光看表面现象，那是一种外交辞令、威吓手段。美国越是在国联喊得凶，越证明他们对满洲感兴趣，投资的热情高。所以我们应该拉拢他们，满洲国政府给他们最优惠待遇按年5厘或6厘行息，使他们的投资决不亏本，同时提出交换条件，允许加州日本移民将积累也投入进来，这么一来问题不全解决了么？”儿玉越说越来劲儿，他看郑孝胥听得挺入神，就又接着说：“下面我再把投资设想的计划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们打算，开始让美国拿出20亿美元，加州移民拿19亿美元，日本军部再筹划一下，也搞成20亿美元，以这几十亿美元

为基础，在新京成立一个‘国际银行’总行，另在奉天、哈尔滨、牡丹江等地设立‘国际银行’分行，由分行直接向各地投资，总行统制管理，阁下领导的国务院对总行负有指挥监督权。总行设总经理，拟定由美国人充当，副总经理由日本人充当，总经理负责决定该行的投资经营方针，如果有分歧意见，由满洲国政府决定。平时该行决定的大的方针政策也必须经满洲政府认可，该行如有违背，满洲国政府有权命令其停业甚至冻结资金。

设立‘国际银行’想充分开发动力资源和军工企业，如把北满的鹤岗和东满的密山、穆棱、鸡宁、鸡西等地矿脉全连接起来，使其规模超过抚顺煤矿。

在东边道利用鸭绿江水，搞一个大型水力发电站，在安东建一个大型港口，以奉天、安东为中心形成军工企业生产地带。

在南满，要在以后开发热河的金、银、铜矿资源，也要把西安（今辽源市）煤矿和阜新煤矿加以扩建。

这些开发扩建计划由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相商决定，做为‘国策’确定后，阁下领导的国务院即按此计划指挥‘国际银行’来逐项投资，以上这是对美国说的。至于对英国方面的投资计划，我们打算在南满本溪湖附近‘官原’建立一个年产50万吨的冶金联合企业。同时在奉天省管内的松岗、杉山两个煤矿也要让英国投资开发，其监督管理形式和美国一样。

这个方案是我们在东京酝酿的，是从日满一方面考虑的，还不知对方英、美的想法呢！再说这是具体关系到满洲国的事情，请郑总理提出意见，我们共同研究。”

郑孝胥听到这里，才算明白儿玉的真正意图，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由于他在思想上一直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自然赞成让美、英投资。因此，他立即明确表态说：“这个方案

很具体、周到，我没有什么意见，反正他们只是投资的股东，在政治上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不知下一步准备怎么推行这一计划？”

儿玉说：“从东京来时，有关方面说，必须经郑总理认可，没有您的支持，我们不能走下一步！”

谈到这里，儿玉将了郑孝胥一军，而郑回答得也很干脆：“我是已经同意认可了，如果需要执政认可，我明天就去请示！”

儿玉见状，笑着摆手说：“不用给执政添麻烦了，只要阁下认可就可以了，您是满洲国的总理嘛！事情既然说到这种程度，我还可以告诉阁下，由于英、美在国联拼命反对日本，使日本在外交上很被动。为调整关系，也为了抓紧时间，没同满洲国打招呼，在7月间由日本有关方面根据上述方案和美、英等国秘密商量过。这种情况，请阁下原谅！”

闻听此情况，郑孝胥倒是没有什么不悦的表情，只是又问了一句：“那么说这个方案，是已经经过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的？”

儿玉说：“还没有拿到日本内阁会议上去，但参与这一方案的人都是有权威、有影响的人物，除我而外，有陆军省次官小矶国昭中将、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调查部长东条英机少将、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并兼支那课长喜多诚一少将、参谋本部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桓征四郎少将等。由这些陆军的中坚人物一起研究；然后又经日本陆军最高三长官：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槙崎大将、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大将，外加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和政友会顾问松冈洋右等要人研讨认可后，责成我和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一起将本方案向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文化部长冈田等人透露。他们表示赞成和支持这一方案，但作为外务省不便公开支持。然

后我们又和外务省有关方面选定美国财阀中与现今执政党关系密切的‘摩根金融集团’和英国工党有关系的‘伦敦冶金煤矿联合企业组合’做为合作对手，具体联络工作由外务省负责指定专人进行。

同美国进行联络的是由驻纽约泽田总领事和哥伦比亚大学东洋史教授赤十两人暗中进行；英国方面，则由日本驻英总领事进行，他们都是以满洲国政府郑孝胥总理委托人的身份从事活动的。”

听到这里，郑孝胥关切地问：“同英、美方面联络进行得怎么样了呢？”

儿玉踌躇满志地说：“进行十分顺利，就在7月份，摩根财团已答应投资，并说日本移民积累也可在美国以外地方动用，而且其亚洲营业部长很快就要经菲律宾去东京商谈投资细目。英国也答应投资。他们还都表示要敦促政府早日承认满洲国，以便投资更有保障。”

说到这里，儿玉停顿一下又接着说：“不瞒总理，在对满洲政策上，我们国内分歧很大。为保证上述方案实行，我们同陆军省研究，特别选调身份高、政治上强的武藤信义任司令官，和小矶国昭任参谋长，以保证我们方案的顺利推行。具体地说，这一方案的执行人由我、田边君和小矶参谋长，但小矶又不便公开活动，又特请村井君做他的代理人，由我们3人具体筹办。但事情没有落实之前，涉及国际外交，又必须保密，这就是我所以晚上来私邸拜访总理的原因。”

郑孝胥表示，完全理解，赞成保密，但是郑又追问一句：“这一方案，日本内阁当局谁也不知道吗？”儿玉承认除了陆军大臣之外，谁也不知道。儿玉怕郑担心这一方案在日本的影响不大，急忙又解释，方案是在陆军内酝酿的，这些人不仅决定

对内政策，也决定对外政策，是绝对影响政局的。他们决定的事情经陆军省提到内阁，没有否认的，使郑孝胥对“陆军至上主义”在日本的影响有所认识。儿玉又假惺惺地表示，这一方案关系满洲国国策，日本内阁不能代替讨论，只是代理满洲国，帮助斡旋罢了。这番解释说得郑孝胥既放心又舒心，特别是听到儿玉最后说：“日本政府对于本方案丝毫没有容喙之地，只有阁下有首肯权”更是感到称心。郑孝胥再一次表示，委托儿玉等人，他十分放心，请抓紧进行。

最后儿玉又小结式地说了几点，他说：“我虽然是在私邸访问，但我确为日本政府的一个代表，是郑重严肃地向阁下报告计划方案的。目前由于满洲国不便同美、英直接联络，只能委托日本有关人员代为进行，郑总理必须承认这一切，我们才好进行。”郑说：“你不用重复说了，我早已听明白了，我是承认和认可这个计划方案的，我授给你们代办的权利，请先生回去复命吧！”

儿玉见状马上站起来向郑孝胥伸手边握边说：“真是名不虚传，不愧为大政治家的气魄，我感谢阁下的承认和支持。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允许美、英投资，要有限制，必须遵守‘满洲国’法令，用法令来指挥监督。制定法令，是个技术和经验问题，日本一定推荐有名的立法专家帮助制定有关法令。”

这次谈话持续很长时间，田边和村井没有说什么，主要是郑孝胥和儿玉交谈，我在中间做翻译。接近夜深时才结束，我们4人乘车走的，郑让我把他们送到旅馆，之后我才回家。

过了一天，郑孝胥让我晚间7时去他那里，我按时到了郑公馆。郑见面后告诉我，昨天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来拜访谈了两小时，谈话中问到儿玉来拜访的事，很是夸奖了儿玉一番，并一再说儿玉言行不是个人所为，是代表日本有关方面的，陆军

支持儿玉，希望满洲国要绝对信任儿玉。郑孝胥对我说："看来儿玉右二这个人挺有来历，你熟悉的田边敏行也不简单，武藤也称赞了一番。儿玉刚访问我，武藤又来谈话，看来这个计划正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意思，我前天晚上说的话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吧？"我说："总理看的很对，说的很合适，态度也明确，我看没什么问题。"

就在我从郑公馆回来的第二天，田边给我打电话，让我同郑总理联系一下，他们晚间要来拜访，是否可以？我马上找郑，郑让他们晚7时来。晚7时，我们一块来到郑公馆，儿玉见了郑孝胥的面马上说明是来辞行的，他们定于明天起身回东京。郑挽留他们后天走，为的是想设家宴招待招待。儿玉表示心领总理好意，只是不能多留，东京来信说摩根代理人快来东京，不少事情需要准备，以后同总理联络的机会很多，不会少吃饭的。并最后决定联络的办法，是用带暗号的挂号信来回传递情况，由儿玉寄给我，我再译成中文给郑。因儿玉他们急着走，很快就告辞了，我陪他们回名古屋旅馆，到儿玉屋内小坐。儿玉拿出两个本子，是他和田边临时用日本字母编的暗号本，一本给我，以便他们来信时我按此本暗号翻译，我要代郑写信也用这一暗号。儿玉和田边嘱我，不管多急的事，千万不能用电话、电报，以免漏了出去。同时，儿玉还告诉我，他们访郑第二天，即将情况向武藤信义、小矶国昭做了报告，武藤和小矶对郑的慨然支持态度十分满意，希望我有机会把这意思转告给郑。当然，田边他们最后还向我表示了感谢，一再声称，决不能忘了我的辛苦……

儿玉等人回东京不到20天，就来了一封挂号密信。信中说，回去第五天就同摩根财团金融部亚洲营业部长劳巴特及其随员进行了谈判，他们希望在满投资额不限于20亿，越多越好。除

了允许英国在本溪投资外，再不要引进其它国家投资，自然，日本财阀要除外。劳巴特除对满洲政府计划搞投资有兴趣，还希望对民间企业也参与投资。对于国际银行的人事安排及待遇，希望满洲国政府不干预，至于满洲国政府对投资的监督法令希望早些公布。儿玉信中认为，劳巴特的要求是正当的，他已代表郑基本上答应了，至于监督法令，很快就要发表，基本和日本现行的一样，儿玉赠送一部日本的，让他们先做参考。劳巴特表示马上回国向摩根财团报告，更要向美国政府传达满洲国政府对美的诚意，交涉在美国日本移民投资以及催促政府改变对满政策，承认“满洲国”。信中还说劳巴特留下两名助手，随时联络，儿玉已在东京找了两名法律专家做监督法令的制定的准备工作。

以上这些信中的内容，我译好交给郑孝胥，郑看完信，很高兴，直说：“没想到，事情进展这么顺利，第一步就成功了。谷次亨，你快点写信，告诉儿玉我同意他的安排，我继续等他的好消息。”我急忙用暗号写成信给儿玉寄走了。

12 月末，儿玉从东京寄来第二封信。信中写道：“劳巴特转达美国政府方面愿望，一是希望知道，‘满洲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时代和外国所签条约及协定是否承认并承担义务；二是希望了解日本与‘满洲国’的特殊关系，请说明一下日‘满’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我们经研究后，代为答复说，‘满洲国’政府对于过去所签条约，不但承认，还承担义务。至于日‘满’议定书内容，不对其它国家公开，对中日两国人民也不公开。但美国政府如担心日‘满’议定书对美国投资有影响时，‘满洲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可以同美国政府签订一个保障投资的条约或协定。以上内容呈报总理，还有什么指示盼赐。”我将该信译文交给郑，郑看完后对我说：“美国对投资有些顾虑是正常的，

考虑问题很周到，儿玉的答复也很圆满，你代我回信鼓励鼓励他，特别是关于日满议定书的答复太好了。”我又按郑的吩咐给儿玉寄去了回信。

1933年1月末，接到儿玉第3封密信。信中讲到，劳巴特从美国来信言说，美国政府对于“满洲国”在世界上未来发展趋向及治安情况不大了解，也不好预测，没有什么把握。因此对于摩根财团投资，必须有一个前提，即由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签一条约，保证美国投资在“满洲国”如受到损失时，日本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并负责全部赔偿……不然，美国政府决不允许投资；承认“满洲国”也是不可能的。情况有了变化，在东京大家再三研究，感到按日本政府惯例，对外缔结条约，必须由法务省制定，再同外务省商定共同提交内阁审查，审议后才能正式与外国签订，之后还要经帝国议会批准才正式生效。所以法务省是关键，我们几次同法务省交涉。他们以内阁没有授权，不能根据军部单方面意见制定。为疏通关系，又特别找了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他是法务省官员出身，多年充当大臣，现任官员多是他的旧部。由铃木出面找法务省会好办些，铃木也答应了，并多次与法务省交涉，但法务省当局迫于民政党主政内阁的压力，反对军部的对“满”方针，拒绝了铃木的要求，因此，美国要求订约一事，只好暂先放下。但儿玉在信中继续说，让劳巴特向美国政府做工作，让美国直接到满洲来参观考察治安情况，估计他们看了“满洲国”实情之后，会坚定投资信心的。

我将这封情况有变的长信译好又送给了郑，郑边看边说：“没有想到，日本国内情况这么不一致，对‘满洲国’的方针还有分歧，这事暂先放放，不管进展如何，对儿玉他们的工作，我们还应感谢，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好事多磨嘛！没有一帆风顺

的事情。”

我仍及时按郑的意见，给儿玉复了信。

我的复信，寄走没几天，接到了田边给我个人的来信，信中提到铃木去法务省交涉未成，很损他的面子，政友会趁机活动，估计日本政局发展很快，就要更换内阁，上台的是政友会，政友会支持陆军的对满方针，届时与美国签订投资保障条约，不会有问题，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田边让我将这一情况告诉郑总理。我随即也向郑做了报告，郑也对政友会感兴趣，他说我们等待日本政局发展吧！

1933年4月，我调到伪民政部警务司任外事课长。因为伪满政府成立除日本外，当时没有承认的。可是一些国家侨民还在东北，有事情他们不愿找外交部交涉，都找警察厅交涉，于是伪满中央政府只好在警务司里设外事课，负责对外联络。也正在这个时候，又接到田边的挂号信，告诉我日本外务省以岗田文化部长名义请美国著名记者团来日观赏樱花，并安排他们去满洲参观，要好好接待。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郑，郑嘱我好好接待，并让给田边回信，我照办了。

不过十几天，关东军第四课长原田熊吉，告诉警务司长长尾吉五郎美国记者团来访接待之事。长尾把我找去交代说：“这事由你和关东军御厨外事科长、日本大使馆花轮二等书记官和外交部通商司加藤通商科长一起接待。美国记者避免同外交部门及政府通商部门接触，你是从民政部角度去的，所以你是主要代表，有关满洲治安及资源情况你都要做详细介绍，引起他们对满洲的好感和产生向往，激发他们的投资热情，这是你接待的主要目的。花轮、加藤都会说英文，你用日文讲，他们给你译。”

第二天午后，我从新京出发，第三天早抵安东。没过几小

时，从朝鲜开来一列车，其中一节专车坐的正是这48名美国记者团成员。他们在日本参谋本部高级参谋原已中佐的带领下，下了车，彼此做了介绍。于是我认识了他们的团长纽约时事新报主编威廉先生，并表示陪伴他们去新京，有什么事，一定效力。威廉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答是中国人，威廉说："中国人都会讲英语的"，我说："学过，忘了。"他又问我："在那儿读书？"我答："在东京读过书。"威廉似有所悟说："所以你会说日本话。"说话间，火车快到本溪湖车站了，威廉拿出地图看着说："本溪湖，不就是能产煤铁的那个地方吗？"我说："是的，就是那个地方！"威廉又说："谷先生能不能将本溪湖煤铁生产及企业情况介绍介绍呢？"我一听，宣传机会来了，马上说："当然可以！我曾在本溪湖煤铁公司做了8个月的主任秘书，了解不少情况，愿向诸位介绍。"我刚说到这里，四散的记者都围了过来，于是我就讲起本溪湖煤铁公司怎样由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投资与奉天省政府开办的过程，以及该地煤铁资源多么丰富，工人劳动力多么便宜，并当场算了笔帐，说明大仓财阀如何大赚。在场的记者不少人露出羡慕的神色，有的人就问我矿藏情况，我说都是富矿，品位在六成以上。并进而宣传说，类似本溪湖这样的矿藏，满洲还有很多，我们欢迎外国投资，象大仓那样既帮我们开发，又获高利……

有些记者被我的宣传打动了，又问我治安和交通情况，我都做了保证式的答复，总之一切都没问题。也有记者问了目前外国居留民在满生活情况。最后，我针对美国情况，强调了欢迎美国资本家投资开发，并保证说一定给予最惠待遇，贷款收取最低利率。他们边听边记，眼看到了奉天站，我也完成了任务，就将他们安顿在大和旅馆，由加藤具体照料。

这批记者在奉天参观了北陵、东陵，受到日本总领事蜂谷

的热情接待。第二天，他们一行48人来到新京，小矶参谋长设宴招待。在宴会上，小矶宣传了日满关系，以及欢迎美国投资，保证不能受损失等话。活动了两天以后，他们去哈尔滨，由哈去大连，走海路回日本，由日本回国了。

当年秋天，9月末，我又接到田边来信，内容是说英国伦敦冶金组合主任巴宾也应日本外务省岗田文化部长之约，由香港到东京。一行4人，其中还有组合的两名理事，他们将去满洲视察，请我接待。我将这一消息告诉郑孝胥以后，郑说，象上次一样，搞好接待。没几天，果然，关东军第四课通知我参加接待，还是上次那几个人一块去安东迎接。他们坐的是头等车，3个人年龄在50岁以上，寡言慎行，彼此做了介绍。他们偶尔谈点闲话外，基本不问也不说什么。在奉天，受到蜂谷领事接待，土肥原也出面举行宴会。第二天即来新京，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芳泽和新京特别市的交际处长马显异等人出面接待。

据说关东军小林中佐代表小矶参谋长同他们做了长时间会谈。他们出席了小矶的晚宴。以后他们也同美国记者团一样，由哈尔滨转大连，从海路去日本回国。

以后，儿玉、田边也不再来信，关于美国、英国投资的事，也就没有任何下文了。

一次赴中国内地视察的阴谋活动

古海忠之

1935年7月初旬，伪满洲国政府决定派遣由日本人官吏组成的赴中国视察团。此案的提议人是谁，又是谁决定的，我不

大了解。不过根据前后的情况来判断，我想，是由当时总务厅弘报处长宫胁襄治发起的。他原来是陆军省与报导部有关的军人，新设弘报处时，由于关东军的推荐担任了第一任弘报处长，精通中国的情况，第一次上海事变时曾到上海工作过。又经总务厅长长冈隆一郎、总务厅次长大达茂雄等政府首脑研究后决定，并得到关东军的承认。

被选定的视察团员如下：团长宫胁襄治（总务厅弘报处长）、毛里英菸免（主计处一般会计科长）、古海忠之（人事处给与科长）、椎名悦雄（产业部总务科长）、栗原实（民政部总务科长）、永井哲夫（财政部关税科长）、松崎健吉（财政部金融科长）、寺尾属官（中文翻译）等，此外还有驻“满”日本大使馆的筒井书记官，一共是9个人。出发前在一个准备会上，宫胁团长指示说：“鉴于目前中国抗日运动的情况，用满洲官吏的职名是不大妥当的，各人应适当地找一个伪装职业，姓名可以不动，要找些如大学教授、公司董事、公司理事等衔，并印制名片。”我用了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名义，筒井大使馆书记官使用了原来的职务没有变更。这样开始了由日本人组成的赴中国视察团的旅行。期间大致是40天，视察计划是由宫胁团长拟定后经大家同意的。有关领导、联络、手续等事务由团长负责，旅费及其他有关金钱的事务由我来负责。

起程前一天，全体人员在长冈总务厅长室集合，接受了大体如下的有关视察的指示：“满洲原来是中国的一部，因位置偏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低于中国内地，同时在各方面和关里有共同之点，受关里的影响。因此在满洲政府的日本人，无论怎样应该知道中国内地的情况。这次各位到中国去视察正是为了这个。希望很好地观察，加深对中国的认识，这对将来做好满洲工作一定会有帮助的。”

可见，中国视察团的目的是视察中国现状，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以便将来在伪满政府更好地执行各项行政职务。然而，现在回首正视我们视察中国之行的本质，其目的显然在于，掌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加深认识，将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以便根据这种认识，强化和调整伪满政府的各种政策，确保以至扩大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东北的侵略。

视察的路程：7月15日前后由新京出发往天津。在天津常盘旅馆住两宿，曾到日本华北驻屯军拜访参谋长酒井隆，并由池田参谋给我们讲解华北的一般情势，抗日运动的现状和各国在华北的投资情况及各种势力关系（主要为基督教的旧教和新教的势力）。在日本领事馆调查了天津市的人口、租界的情况特别是有关日本人的经济情况。又到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经理姓斋藤）调查了天津出入口货物的情况（特别着重了解同日本、满洲的贸易往来关系）、金融情况、日元流通状况、各国的经济状况（这时更加认清了对转运站——大连的地位，特别是从排斥日货的角度来看大连的重要性）。所有这些调查都认真记录下来了，同时也参观了天津市。

在北京住5宿。到日本大使馆由若杉参事官报告华北经济产业情况、有关同中国的经济往来情况，又搜集了关于北京的一些基本情况资料。在北京除若杉参事官招待我们以外，没有其他应酬，尽情地游逛了北京城。为了去山西太原，乘火车先到大同，在大同煤矿事务所住1宿，参观云岗石佛（往返全由傅作义军警卫）。第二天本来预定坐汽车到太原去，因下雨有危险回到北京。在北京扶桑饭店住1宿，第二天往石家庄，在石家庄稍微休息后赴太原。

在太原中国旅馆住两宿。招待我们的，我记得是大仓商事会社的驻在人员，听了关于山西省的生产状况，特别是煤和铁

的情况及山西门罗主义的报告，并领了有关资料。我们很为该地丰富的煤的资源而吃惊。参观了山西省经营的纺织工厂和烟草制造工厂，游逛太原市，晚间接受省公署秘书长（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军人）的招待。经石家庄赴济南。

在济南鹤屋住1宿。到日本总领事馆领取关于济南的人口、产业、经济等特别是与日本有关的资料，并听取了中国情况的报告。游逛了济南市。

在青岛大陆旅馆住1宿。在领事馆听取青岛出入口货物、经济、产业及其他必要事项介绍，知道该市的经济，有60%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乘船赴上海。

在上海大和旅馆住1个星期。拜访了日本大使馆有吉大使，同堀内书记官等人开座谈会。听取了中国的情况介绍，也介绍了满洲的情况，还谈到最近中国的动向，特别是第一次上海事变以后，中国对日本的动向以及介乎其中的英国的态度等。又从日本特务机关影佐中校那里听到了同样的介绍。并在上海日本居留民会召集了各种专门人士，请他们详细介绍上海的产业、金融、经济、贸易等情况，还有关于租界的情况，各国在上海的势力关系特别是日本人的势力等等，我们均作了记录。还访问了正金银行，调查了金融情况，特别是有关英国金融的情况，知道了英国在华中的金融势力是十分雄厚的。参观了上海各国租界，和以“上海事件”出名的闸北，以及日本租界里面的侵略战争的战迹、大上海建设的情况等等。“中国地面有危险不要去”，我们接到这种告诫，因此没敢接近，主要在租界地活动。在华北没有感觉到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气魄，但到了上海则相反，开始体会到这种反抗力量的强大。向南京去的途中路过苏州，参观了著名的寒山寺、豫园等，但没在苏州停留。

去南京，在南京旅馆住两宿。在日本总领事馆由须磨弥彦

总领事就国民党政府的施策，特别是“新生活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有名的秦淮热闹街被封闭，也看到了南京都市计划的情况。在参拜中山陵的路上，或游逛市街时，遇到几处抗日的演说，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在上海的体会。回到上海在大和旅馆住1宿，然后乘船赴香港。

在香港松原旅馆住两宿。访问了日本总领事馆，抄写了各种资料，如英国统治香港的情况，对中国输出和输入的货物，特别是关于香港“上海银行”的资料等，发现该行的银行券发行额特别多并且基础雄厚，我为此大吃一惊。华中、华南很多人认为储存香港、上海银行券是最可靠的储蓄方法，据说把数十万银行券密藏在家里的人，是不在少数的。我们更知道了英国在中国的金融侵略势力，感觉到对日本的威胁，是个强敌。

然后乘船赴广东，在松原旅馆住两宿。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白田中佐详细讲述了华南情况，排外、排日情况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五年计划并领到了相关资料，又请白田中校替我们联络到广西桂林去，预购了飞机票。又从驻广东的安村“满铁会社”社员那里得到有关广东方面的资源、出产、经济等资料。广东市内没有一个外国人居住着，所有的外国人全被赶到“沙面”，我看见进入沙面的桥口上有碉堡，有铁丝网。在街上游逛时，看到青年男女带着鲜花参拜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墓。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斗争气魄，形势迫使我们开始预料日本帝国主义今后的侵略路程，将遇到中国人民顽强的抵抗。晚间，广东省军参谋长招待我们吃晚饭，并给我们讲述了广东省的未来瞻望。因大雨飞机两三天内不能起飞，结果放弃了到广西去的打算，回到香港，第二天乘英国船回到上海。在上海住两宿又乘船回到大连。没回新京以前，在大连大和旅馆全体人员开了一个会，就这次视察旅行的收获和结论交换了意

见，统一了认识。综合各种资料和感想，全体一致的看法大致如下：

一、华北虽有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投资与企业，但力量不大；惟有日本势力最强，因此能够成为日本的经济圈。华中是日本同英国的势力竞争圈，特别是英国金融势力值得注意，将来可能在这上面发生日英间的纷争。华南只有英国金融势力，日本根本就不成对比，无法与之抗衡。

二、中国的抗日运动，今后愈益炽烈，其范围也要扩大，不久也许会席卷华北波及东北。因而排斥日货将越发激烈，日本经济势力可能要缩小。必须警惕英国的谋略活动，更要考虑利用大连和东北作为消化日货的市场。

三、"广西五年计划"、"新生活运动"等，虽然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不足以为范。如果满洲在日本控制下以自主的立场进行建设，相信能够越过中国内地的经济变化。

根据上面所谈的，我们的结论是迅速地培养、强化"满洲国"，使其成为具有实力的国家。这样才能成为日本的市场，成为日本势力圈的核心一环。另外，认为这种视察旅行帮助很大，决定给政府建议，今后固定为一种制度，年年实行。

回到新京不久，邀请政府首脑召开了一个报告会（我记得关东军第四课也参加了），把搜集来的资料再加上感想即上面谈的结论，由各部分负责人和团长作了详细的报告，与会者都很满意。我在出发前，就接到了关东军的临时召集令，经由申请后允许我暂缓应召。因此视察旅行结束后，立即赴郑家屯没能参加报告会。当然我回来以后，也立即向总务厅长、总务厅次长报告，更不难想象向所有认识的人谈论过旅行的情况。

这次到中国视察旅行行动的实质，可以这样说，我们到了中国各个地方，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情况，也

认识了这种侵略即将引起中国人民全面的反抗，其结果，将来必然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扩大侵略。处在这种情势下，更清楚了“满洲国”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在剥夺东北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迅速强化“满洲国”，以便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东北。基于这种认识，不仅激发、提高了我们建设满洲的积极性，同时也用这种认识影响了别人。此外，强化伪满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好地控制东北的结果，是打下了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基础。这样看起来，中国视察旅行有重要意义也有犯罪性质。而且更严重地是由于我们的建议，中国内地视察旅行和欧洲视察（每年约有两名）成了伪满洲国固定的日本人官吏的国外出差制度。我身为视察团的一员承认它具有情报谋略的犯罪性质。

伪财政部大臣
孙其昌两次朝鲜之行

王稔五

一、缔结“日、满税关协定”

1935年5月26日，伪财政部大臣孙其昌，代表伪满洲国政府，在朝鲜京城（汉城）同日本政府的朝鲜总督宇垣一成，举行一次“日、满税关协定细目”的签字式。细目的主要内容，是列车运转直通图们江、“满”、朝鲜国境时，关于如何使税关手续简捷化的协定，其中附带细则有：

1. 基于日、“满”条约的缔结，“满洲国”得在朝鲜北部的

三港——雄基、清津、罗津及上三峰等地，设立图们税关办事处，办理税关事务。

2. 凡依铁道经由三港——雄基、清津、罗津等地，向“满洲国”输出输入货物、小荷物、托送手荷物及旅客随带小荷物时，可以在各前记地点的日、“满”税关，进行办理关税的手续。

3. 凡依铁道经由图们、上三峰两地，向“满洲国”输出输入货物、小荷物、托送荷物及旅客随带小荷物时，须要在图们或上三峰的日、“满”税关，进行办理通关的手续。

按照这次的日、“满”税关协定，自然是方便了双方面旅客的通行，然而究其真正的目的，无非是更便于日寇对东北物资的尽情掠夺而已。当孙其昌新接任伪财政部大臣不过两三天，伪总务司长星野直树要求他到朝鲜，说什么能够借着这次的签定日、“满”税关协定的机会，同朝鲜总督宇垣见见面，想来也是大臣所喜欢的。孙其昌自然是很同意星野的意见，过了两天，孙其昌带伪财政部的关税科长永井哲夫、银行科长松崎建吾、秘书长胡宗瀛、秘书官王稔五和伪外交部的外间事务官等做随员，乘坐直通釜山的快车一路直奔朝鲜。当时同车的另有日本大使馆花轮参事官，他是日本政府派遣到朝鲜参加这次签字仪式的。午夜到京城，孙其昌等一行，受到朝鲜总督府政务长官的欢迎，下榻于京城旅馆。

次日上午，孙其昌及其随员到总督府面会总督宇垣及他的政务长官。下午，政务长官到旅馆来回访。晚间孙其昌等一行出席了政务长官的招待宴。第三日上午，在总督府举行了“日、‘满’税关协定”的签字仪式，宇垣、孙其昌各有简单的致词，历时不过30分钟而结束。这天晚上，宇垣为孙其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宴，在京城旅馆的大餐厅里，有驻京城的日本文武官员和日本、朝鲜工商各界二百多人来作陪。席间宇垣致词，对

孙其昌这位伪财政大臣大加赞许。说什么，孙其昌阁下不但是满洲国唯一无二的财政专家，而且是满洲国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又说什么，孙其昌阁下不但是对满洲的财政情形最为熟悉，而且是对世界的政治趋势更是清楚。还说，孙其昌阁下在满洲事变前主张实行亲日政策，在满洲建国后极力推行日、“满”合作，所以说，孙阁下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希望孙阁下在政治舞台上能够大显身手，为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事业努力奋斗等等的鬼话，令人头晕目眩。

继而孙其昌在答辞中，对于宇垣一成也是极尽恭维。讲了一套宇垣总督是日本军政界的元老，德高望众，是如何的早为自己所尊敬等等。一阵的互相吹捧，弄不清他们的真正用意何在。席散后，朝鲜银行总裁为了酬谢伪满政府对于在东北各地的朝鲜银行支行的关照情谊，要求为孙其昌一行再次举行宴会。在明月馆，宾主双方虽然不过二十几个人，但是准备得非常豪华，朝鲜料理每人1份，山珍海味俱全，每份菜谱二十多种。据说每份30元的席价，在朝鲜料理中向来没有这样豪华的。并且把京城有名的朝鲜妓生二十多名全部叫来入席劝酒，可以说一顿饭吃掉了劳动人民一年的血汗。这些妓生都能写能画，能歌善舞，她们在劝酒中间，要求孙其昌题字留念，孙其昌慨然应允，每人送给她们一把扇子，并且当场在扇子上面题字。这些妓生欢喜得如获珍宝。次日午车，当孙其昌一行就归途在京城车站上，这些妓生又来站欢送。

在归途的列车上，永井哲夫关税科长对我讲，孙大臣阁下这次的朝鲜旅行是很成功，宇垣总督对大臣的衷心赞扬是不可多得的，朝鲜银行总裁对大臣的热情招待也是最豪华的，朝鲜妓生对大臣的车站相送更表现出她们的至诚恭敬。接着他又说，这些妓生都拥有几万元以上的财产，其中有几名拥有十几万到

二十万元，一把扇子虽然不值几个钱，但是大臣能给她们在扇子上题几个字，这是她们最引以为珍贵的纪念品。我听了之后心中暗想，如果不是为虚荣观念所驱使的话，另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二、参加雄基、罗津开港式

伪满建国初年（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如愿以偿地开始修筑吉敦路的延长线——敦化至图们，整整一年的工夫修完。从此吉长线、吉敦线、敦图线三线连接一起，总称为京图线（伪满首都新京——图们）和伪满国境图们江对岸的南阳站（北部朝鲜的铁路）相连接。而另一条线，则接通了朝鲜北部的会宁、上三峰。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同东北军阀之间，多次交涉的所谓修建“吉会路”——吉林、会宁间，今天得以实现，于是朝鲜的东北部同伪满的国境延边之间，铁路相连畅通无阻。而日、伪满两国政府，把这双方面的铁路，都委托给“南满洲铁道会社”一手经营，完成了日寇所谓“满鲜一家”的初步计划。

接着日本政府为了其掠夺东北资源而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京图线输血路的作用起见，又委托满铁在朝鲜的东北部的罗津、雄基地区进行修筑港湾。从1932年5月至1935年11月，费时3年半的时间，满铁把罗津、雄基的第一期建港工程初步完成。日本政府对此（同清津连在一起），称之谓“北鲜三港”（清津、罗津、雄基），说什么这是日本海初步走向湖水化，给以很高的评价，并且说：随着“北鲜三港”的建立，缩短了日本同满洲的距离，开辟日本至满洲间的最捷途径。据其当时按4条路线列表说明：

伪满新京——大连——下关——日本东京，是3 000公里。

伪满新京——釜山——下关——日本东京，是2 860公里。

伪满新京——罗津——敦贺——日本东京，是2 404公里。

伪满新京——罗津——新滨——日本东京，是1 850公里。

可见日、伪满两国间经由罗津比经由大连缩短路程1/3，有1 000多公里。如再从满洲的东北部佳木斯、牡丹江来看，经由图佳线，进出罗津港湾，则比经由大连足以减少一半路程，无怪乎日、伪满两国对罗津新港的重视。

1935年11月，雄基、罗津线10公里的铁路开通，罗津港初步完成。满铁招待了日、伪政府有关方面，在现地举行罗津开港式。当时我曾随着伪财政部大臣孙其昌前往参加，记得一道同行的，还有伪实业部大臣丁鉴修、满铁副总裁大村卓一。从伪新京出发一上车，就有满铁派出的人员一路随行专门做接待，大村副总裁也不时地出面周旋，同伪大臣们做短时间的闲谈，看样子好象很亲切。听得孙其昌曾自言自语说过："大村这个人很和气，不象松冈洋右那一派似的。"可见他对于大村的印象是满够好的了。在满铁的款待下，丁鉴修、孙其昌两个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满意。

大村卓一亲自主持开港仪式，他报告了筑港工程，谈到了新港远景，说什么罗津港的将来会象大连港一样在世界上闻名，看起来这个朝鲜北部的贫寒渔村，将一跃而成为东亚的关门。驻朝鲜军和关东军的代表，在他的贺词中着重地提到了罗津建港在军事上的重大意义，说是罗津港面对苏联的东部海岸，在保卫满洲的安全上，将起到日、满共同防卫的绝对作用。孙其昌在他的祝词中，说什么罗津港在政治上、军事上、在经济贸易上，在日、"满"两国的国策推行上，都有不可估计的价值，它是满洲东部的门户，日本商品对满洲的输入和满洲资源对日本的输出，将发挥它最大的吞吐能力。5月间，在京城缔结的日、

"满"税关协定，正是标志着罗津新港在日、"满"两国间担负着紧密的联系作用，他祝贺满铁在建港工程中取得的成功，祝贺罗津港一定会完成它的光荣使命。

第二天，满铁招待大家沿着海边公路乘汽车游览清津，然后由铁路回转图们。连日来，大村副总裁一直是做陪伴。

一个伪满外交官的回忆

王替夫

出使苏联

193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我们出任苏联赤塔领事馆的全班人马登上了通往哈尔滨的火车。我们一行共有12人，领事李垣带着太太、一个男孩和厨子，另外就是日籍副领事山田七郎、书记官邓福山、长谷川、雇员北岛清次和我，还有两个差役和司机洼田正治。

赤塔位于苏维埃共和国东南方，距离中苏边境线约千里，在西伯利亚地区可谓第二大城市，是一个前临河、背靠山的大城镇。

那时，赤塔还没有专门的对外办事机构，市政府设有外事科。那天到车站迎接我们的有市长（名字忘了）。外事科长叫拉根丁，此外还有赤塔军区的司令官、警察局的局长等。这些人由拉根丁负责向我们介绍，我负责把我们一行的人员介绍给他们。

到赤塔的头半年，就在忙乎些琐碎的事务中过去了，等到

领事馆正式办公已是转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了。为庆祝开馆，我们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宴会。

宴会的气氛是融洽的。但实际上，苏联与伪满的外交关系是勉强的。日军侵占东北之前，苏联在哈尔滨、绥芬河、满洲里3处设有领事馆。伪满洲国成立后，如果苏方对其不予承认，则3个领事馆就要被撤掉，这对苏联很不利。所以，苏联对伪满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处处设防，时时监视。就在我们领事馆门前，设有1个岗楼，上有1个探照灯，昼夜通明。在满苏边界线，大小不等的冲突几乎每天都有，有关这些冲突事件的抗议照会，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不是口头抗议，就是长篇大论的文字材料，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有时为某个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但大多都没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领事馆正式开馆后，设有领事办公室、副领事办公室、书记官办公室。具体分工是：领事总揽馆务、对外交涉，副领事负责馆务，日本书记官负责财务、电报、机密文件等，伪满书记官负责对外交涉，我负责馆内杂务。

“保护”中国侨民

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侨民”。然而，伪满领事馆却在保护侨民的幌子下，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侨民。

当年，在赤塔的中国侨民有上万人，南京政府在苏联莫斯科设有大使馆，但要入伪满国境，必须经过伪满领事馆办理入境手续。

伪满领事馆设立初期，每天都有不少侨民涌到这里，探寻家乡、亲人的情况，还有许多办签证回国手续的。

开始时，我们办事是很热心的，不久就有几个人同家人通信联系上了，这我们是动了不少脑筋的。比方说信件，苏方是

不准侨民往外寄的，我们就利用每次到满洲里购置食品时带去，因为外交官的专用车厢是不受检查的。

时间不长，我们就发现，经常到领事馆的许多人突然不见了。有时在街上遇到侨民，只是用眼睛盯着我们，却没有上来搭话的了，从他们忧伤的眼神中我们似乎发现了什么。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不少侨民回到东北便被抓进了监狱，有的被强迫移入他乡……

有一次到满洲里办事，当地的一位与我要好的官员悄悄对我说：你们赤塔那里签的证，虽然放他们进来了，你知道有几个是活着从这里走的？刚到时，日本人都是好吃好喝地款待，然后就逼着问苏联给了他们什么好处，有什么情报网，不交待就上酷刑，有的实在受不了就顺口胡说，正好上了日本人的圈套，许多人就这样丧了命。

记得我曾经给两个留欧的青年学生办理过入境签证手续。他们的老家都是南京人，在法国巴黎学了3年绘画后，想取道苏联回国。这两位清秀的年轻人都不过25岁，他们在我们领事馆早晨刚开门时就到了。一进来，他俩就恳求我能否快些为他们办理手续。游子归乡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于是笑着让他们先坐下休息休息。等我把签证交给他们时，俩人都激动地涌出了泪花。一再说“谢谢”，还相约等回到家一定给我们寄信。但一去就渺无音讯。听说，刚一到满洲里，就被日本人扣押了，说他们是苏联间谍。

侨民说：“满洲国领事馆去不得，去了不是蹲监狱就是送命！”

事实是，我们在领事馆给要回国的人刚办了签证手续，领事馆的日本人早已把这个人的情况用电报打到了满洲里的特务机关，他们人还没到，可罗网已经设好了，这样，他们怎么能

逃脱了厄运呢！

南京领事馆

早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便设立了驻苏赤塔领事馆。伪满驻赤塔领事馆的馆舍就设在它附近，但他们与我们来往甚少。原因很清楚，他们鄙视我们这个为日本人所左右的傀儡领事馆。

南京领事馆当时仅有3人。领事耿匡及其夫人、书记官李晓兰。与伪满领事馆不同，他们与苏联有着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弱国无外交。他们开馆以来没做什么事，不少中国侨民说南京领事馆的人是饭桶，连领事耿匡自己也讲："我们大事办不了，小事不如侨民自己办的好。"南京领事馆的经费非常紧张，生活很艰难。交通工具只有1辆破马车。

在公开场合，苏联政府对这两个领事馆的态度是这样的：有什么大事小情请双方都到场，但分别接待，从不安排到一起坐。

收买梁秉堂

平时，南京领事馆的人见了我们都是远远避开，从不主动接触。山本副领事指示我们，主动同他们搭话，这样，不但可以了解那边的情况，也联络了感情。他还说，可以把这话递过去，如果他们愿意过来做事的话，我们可以给高薪水，都是加倍的。

领事耿匡中等个，四十多岁，他和书记官李晓兰很有民族气节，坚决反满，不理伪满洲国的人，更别提过来做事了。当时，他们有个差役叫梁秉堂的，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由于他和我们领事馆的勤务人员常见面，慢慢就熟了。我们的信差綦维俊曾多次让他到我们这，试探过他，让他回去做书记官和领事

的工作，还说，不管他俩是关里人还是关外的人，我们都愿意帮忙。但话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我们一直不死心，我们把从国内带来的牛肉、骆驼肉、马肉送去，这些东西在苏联是极少见的。可他们一直不搭茬。日本人的野心很大，想把他们都收买过来。后来，梁秉堂经常偷偷地过来坐坐，时间长了，便萌生了到这边干事的想法，我们一做工作，他便答应了。我同领事、副领事一说此事，他俩都同意。我先让梁填一个简历表，才得知，原来他是山东人，16 岁同舅舅来哈尔滨给白俄人当学徒，后做买卖来到苏联，结识在南京领事馆工作的一个姓刘的同乡，后来，同乡年纪大了，已取道新疆回国，把他介绍到领事馆当了差。梁被收买后，正好那时我们的信差綦维俊回国了，他就暂时顶替了他。还给他增加了一倍工资，每月 160 卢布。

升任书记官

日本书记官长谷川没进入苏联国境时就因吐血住进了医院，在这一职上的伪满书记官邓福山，当年五十多岁，过去是哈尔滨吉林道尹公署翻译官，因为常同俄国人打交道，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但不会日语。他有抽大烟的嗜好，到了苏联后，日甚一日。自然引起日本人的不满，特别看到他同赤塔市当地的中国人交往过密，更是放心不下。于是，给新京的伪满外交部拍了一封电报，两个月后，他就被调回了国内。

这样一来，书记官一职就成了空缺。由于我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办事，因而，大得山本副领事的赏识，他极力向伪满洲国外交部举荐我，很快，新京外交部发来电函，任命我为书记官。一天，山本拿着一份电报，高兴地用日语向我道喜，我很是不解，他递给了我电报，这才明白自己已被提升为赤塔领事馆的书记官。来时，我们同是雇员身份的日本人北岛，一听这

消息，非让我请客不可。于是我出去买了一些酒、菜，同大家一起乐和了一场。

我提升后，主要负责对外交涉和翻译。与此同时，我们领事馆又在当地采用了3位苏联人，马车夫1名，下女2名。均由苏政府介绍。

警觉的苏联人

在赤塔3年多，我总的感觉是苏联方面是很警惕的，国家设防的也很严。尤其是对侨民和外交官员，使你感到，哪里都有他们的暗哨，无处不在，我们领事馆更是时时处在苏方监视之下。门前的岗楼除有大探照灯外，还设有电话、暗号铃等设备，我们一出使馆，无论乘车还是步行，均有人跟踪。一旦我们同当地人士接触，走后对方必受追问。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被外面的大好春光所吸引，便独自步出馆外，沿街走去。那天，我还随身带着一架能自动拍照的相机，打算遇到好景致时照两张。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一座古俄罗斯建筑前，心里默默地赞叹着这个房屋的精致、典雅。手便支好了相机，把我和建筑一同收了进去。当我刚收拾好相机准备离去时，一位男士走到我跟前，有礼貌地说："知道吗，您刚才照的是我们军人宿舍，是不允许的。"

我这才意识到面前的人是位便衣，同时也很惊讶，军人营区，这一点我倒没考虑到。

他看我疑惑不解的样子，说："先跟我来一下。"

"怎么，要带我走？"我很是不满，抗议道："我是满洲国的外交官，为什么要把我押走？"

他见我动火了，安慰道："我只是检查一下相机，并没想限

制你的自由。”无奈，我只好跟着他去了。

到了军人区的一个办公室，他示意我坐下，然后把我的相机中的胶卷取出，把相机还给了我，说：“如果没有妨碍，我明天会派人把底片给你送去，否则就留下了。”

第二天，一个士兵把胶卷给我送了回来，并道了歉。

新领事上任

李垣领事同山本副领事不和，之间总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两人又都互不相让，因此，矛盾越积越深。

李领事同山本副领事之间的磨擦，还不是因为公事，几乎都是私事，互相瞧不起对方的生活作风。

李领事说山本什么也不是，连话都说不清，性格也不开朗，不够做副领事的资格。他常对我说，他同山本唠不到一起。特别是山本从满洲里弄来个“妓女”后，他更是瞧不起他了，常在背后说，他要是来个好人家的姑娘也行，把那样的女人弄来，真是不要个脸，也亏他做得出来。李领事的作派和为人也很让山本不满，山本到伪满外交部说了不少李垣领事的坏话，不久，一张调令就来了。

李垣走时很是不痛快，苏联方面也没有人去送，回到新京后外交部也不太看重他。不得已，他辞了职回了老家——北京。

没多久，山本也调回了国内。伪满洲国驻满洲里外交办事处的副处长石田调来赤塔，成为赤塔领事馆的副领事，代替了山本的角色。

新上任的领事叫李义顺，是个日本通。在到伪满外交部前是龙江县县长。当年，他只有三十二三岁。初见面，他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脸上那道深深的伤疤。据说，在他当县长时，由于同日本人交往甚密，得罪了省长程志远，后来日本人对程志

远有点疏远了，程省长以为是李义顺从中做的梗，便怀恨在心。正在这当口，省政府举行了一次宴会，日本人把李义顺也请来了，餐桌上程志远见李义顺得意忘形的样子，是越看越来气，火头上举起一支玻璃斧子撇向李义顺的脑袋，李义顺见势一偏头，砍在脸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去掉的伤疤。

后来，又增添了津田副领事，这是个脾气暴躁的典型日本人。没带家眷，孤身一人地生活。平时，他最大的嗜好是喝酒。

庆祝溥仪登基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的政体，从执政政治改为立宪君主制，溥仪摇身一变而成为伪皇帝，由一个所谓“全国人民推举就位”的伪政府首脑，一夜之间变成了世袭的君主。

在这之前，我们就从外交部得到了建国纪念章、溥仪像以及别的与庆典有关的东西。

溥仪登基那天，我们按着事先得到的钟点，在领事馆的悬关，把皇帝御影挂上，举行仪式，表示庆祝皇帝登基大典。

仪式是从9点钟开始的，领事馆的人员全都换上礼服，由领事带领，在御影前排列站好，由我当司仪，首先宣布开始，向御影三鞠躬，唱伪满国歌，领事读诏书，是我把木头盒的诏书递给李领事的，都戴着白手套，把绒线盒打开，宣读后又放了回去。

下午就是宴会了，苏方出席人员有赤塔市市长、副市长、外交科长、警察局长、地区的军区司令员等等。

间谍——外交官

赤塔3年，伪满领事馆暗中进行了大量间谍活动。当然，其中重要的勾当，日本人是不允许中国人插手的。我所参与和了

解的大多是一般性间谍活动。

津田原系日本关东军陆军少佐（少校），是隐藏身份来领事馆搜集苏联军事情报的。在他的卧室里有高级照相机和显像扩大机，还有一架精致的望远镜，相机和望远镜他是随身带着的。差不多他每天都要出去几次，在赤塔市内外游玩、巡访。还经常带我们去郊外打猎或钓鱼，每次他都东张西望，不时地拍着照。对什么事他都怀有一颗好奇心，我们常看到他随身带一个小本子，不时地写上几笔，什么事很难轻易地被他放过。每当火车过后，车厢里装的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为此，背地里大家给他起个“猎狗”的外号。

193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津田副领事与我们一同去赤塔公园。那是赤塔市唯一的公园。虽说面积不太大，但在那地方可算是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当吸引力了。公园里有一家雅致的餐厅和一个能同时容纳几十人的舞池。人们伴着优美的乐曲，跳一圈，坐下吃喝一顿，好不惬意。

我们几人在餐厅里找了一个空桌子，坐下后，来一位服务员，问我们要点什么，津田把手一挥说：“凡是你们这里好吃的都拿来。”我看到，他是故意放大嗓门说这句话的，说时还不时地用眼角瞟着邻桌的一位苏联现役军官。军官是个俄罗斯族人，黄头发，蓝眼睛，身材高大魁梧。他正一人坐在那里，要的一个菜已经吃的差不多了。看我们好酒、好菜冒着热气端上来，忍不住望几眼。这一切，都被津田看到眼里，等到菜快上齐了，他暗示了一下大石书记官，意思是让他把军官叫过来。大石会意，走到苏联军官身边，用俄语说：“伙计，过来凑个热闹吧！”早已有心的军官便顺势凑了过来。

津田给他斟了一杯葡萄酒，说：“来，为了我们的相识，干一杯。”

看他喝下去了，大石大为高兴，赞赏道："好酒量"，接着又问："是不是再来点白酒啊？"

军官点了点头。

大石忙叫服务员拿来白酒杯，趁势斟满一杯。

这时，军官已有几分醉意了，但又抗不过那一桌子香甜饭菜的诱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

这场面很快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人们都发觉有点不对劲。一个苏联现役军官和日本人坐在一起喝酒，很是乍眼。不久，军官就不行了，说话已连不成句子，手脚也不听指挥了……

津田站了起来，拍着苏联军官的肩膀说："走吧！"

醉泥般的军官已失去知觉，陷入昏睡之中。于是，津田让大家帮忙，把军官架到我们来时开的汽车上。到了领事馆，军官由司机洼田背着进了津田的寝室。

第2天，我见到洼田，随便问了一句："那个军人什么时候走的？"

洼田神秘地看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句"大约3点"就匆匆离去。

原来，那位军官喝的人事不省后，军人身份证和手枪全让津田收缴，并在深夜一二点钟时把他用车拉到郊外的山坡上推下去了。

一天，津田找到我说："王书记官，跟苏联政府联系一下，在我们领事馆院内给打口井。"我听了很不解，我们是有自来水的，为什么还要打井。后来才明白，在军事方面，这样可以探一下地质，看到了什么程度才有岩石。

我同拉根丁联系过后，苏方很快打发来四五个民工，他们换着班挖，一天收工后，我随便去看看，发现津田正用几个小瓶把不同层的土，分别放入瓶中。后来，挖深了，他就让大石

下去，津田仔细看看，那神情象是个地质专家似的。

1934年十月革命节，赤塔市政府举行隆重的阅兵式，邀请在赤塔的所有外交使节参加。

临行前，津田除了领事外给每人都分派了差事，每人发了记事本和铅笔头。他告诉我们把小记事本和小铅笔头放在大衣兜里，参观检阅时，手插在兜里，把应当记的暗暗记下来，回来后整理好交给他。记得当时交给我的任务记机械化部队，具体讲就是左边兜记坦克，右边兜记载兵车，一辆记一道；交给书记官大石的任务是记炮兵，什么类型的，数量多少。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搜集苏军情报，其中重要和急需的电传回去，一般的交信差专程送到伪满外交部驻满洲里外交办事处。

“满洲里会议”① 前后

1936年冬，我领事馆接到伪满外交部通知，说蒙古方面的代表将要通过赤塔参加满洲里会议，让我们到车站迎接。蒙古方面的3名代表，是乘苏联国际列车到达赤塔的，火车进站时间是早晨6点多钟。领事带着我们到车站做了应酬。他们在车站停留的时间大约有十几分钟。

在此期间，日本关东军通过伪满外交部授命我领事馆，派人监督苏联由西部通往远东的军事运输车辆，我领事馆派日本司机洼田，每天由早到晚到河边钓鱼进行观察。为了掩护其行动，我们每个星期天也都到河边去钓鱼。

粉饰侵略

苏联政府让售中东铁路之后，苏籍铁路员工全部撤回国内。

① 即“满蒙国境会议”。

这时，伪满外交部指示我们调查苏籍人员回国后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况。其真实意图在于说明在日本侵略下的伪满洲国比社会主义苏联好，以此来粉饰他们的侵略政策。

我单独一人执行这项任务，先到莫斯科，求助于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可呆了3天，什么情况也没有弄清楚。

而后，我又登上了到贝加尔湖地区伊尔库斯科的火车。最后，我又到了伊丽古斯克和乌兰乌德。一路上，我与所遇到的回国苏籍人员进行了一些交谈。

回来后，我拟就了调查报告上报伪满外交部，大意是：苏籍人员在满洲国生活得很好，回到苏联后，生活很艰苦，尽管都是俄国人，但穿戴、神色和当地人不一样……云云。实际上，这些粉饰侵略的言词，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累死也得不到主子的信任

记得那是到赤塔的第2年，也就是1934年夏七、八月份时，李领事的太太回国了，他寂寞无聊，想到离赤塔不远的“达拉松”温泉疗养地放松一下。正好那时馆内也没什么大事，是能走得开的，于是，李领事向苏联驻赤塔的外交办事处提出了外出疗养的申请，很快就下来了准行的批示。

李领事很高兴，接到介绍信后就打好行装匆匆上路了。

谁知，李领事的举动引起了津田副领事的猜疑，好象李领事是肩负着什么使命走的，他不好追回和亲自跟去，怎么办呢？津田很是不放心，在李领事走的第2天就把我叫了去，“王书记官，近来怎么样，看你好象很疲乏。”

听了这话倒把我弄懵了。因为那时我妻子、孩子刚到赤塔，生活顺心如意，还没有令我太费神的，我知道这话里好象蕴含着什么东西，又不能直说，只好用探寻的口气问：“副领事找我

有事吗？”

大概津田看出了我有些紧张，连忙改换面孔，微笑着说：“王书记官，别误会，我只是看你有些劳累，打算让你休息休息。”

这时，我已明白几分，但还是装着不懂，傻呼呼地看着他。津田接着说：“李领事不是已经走了吗，你也玩几天去吧。”

然后补充道：“达拉松是个好地方，一般人是去不了的，这可是个机会，李领事自己很寂寞，你去了可以陪一陪他。”

当时，我对疗养之事毫无兴趣，也没考虑过，但经津田一说，也只好应承下来了。在送我出来时，津田副领事说：“到了那，看看李领事生活的怎样，嗯！”

没办法，我开始回去收拾行装，并与苏方联系，说李领事去疗养，我有事同他联系。我清楚地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日本人让干什么是不能违背的，处在我们的位置上，日本人注意你，苏联人不放心你。

很快，苏联驻赤塔外事办批准了我赴达拉松疗养地的申请，我带着妻子、孩子一同坐上了火车，大石太太到车站送我们，这是过去没有的，我知道她来的用意，是津田派来监视我们，看是否真的走了。

在达拉松车站下车到疗养地还有二十多公里的汽车路，到时，天快黑了。李领事看到我们，显出很不解的样子：“你怎么有空来了？”

我回答：“津田副领事考虑你自己在这寂寞，让我来陪陪你。”

李领事听后说：“这里的温泉不错，你可以洗洗。”然后帮我安排好了住处。

达拉松确实是个好地方，苏方能到这里来的都是干部和先进工作者。

我们在达拉松呆了一天两夜，很无聊，全家就回来了。临走时，李领事送我很远，我看他脸色阴郁，就关心地询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告诉我："这里的伙食很合我的胃口，想再呆几天。"

回到赤塔，人们好是惊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真没意思。"

一到家，津田副领事就来问候，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于是就随便向他介绍了那里的自然状况，副领事以为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又问："都是些什么人在那疗养啊，有军人、军营吗？"

我说："没看到，人们都穿着统一的疗养服，看不出什么军人和机关干部。"

应付完津田副领事，我很疲惫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突然感到房屋的一切都和走时两样了，明显得很，家被搜查了。

李领事也有同样的遭遇，这是他回来后同我闲唠时说出来的。当时我们都深有感触。李领事道："王书记官，你看到没有，给日本人干事，就是累死也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

在大连伪满外交办事处

一般来说，外交人员在外驻扎的时间不能超过3年。

驻边境的外交办事处人员，一般很少再调回国内，而都派到国外去，原因是怕被外国人收买，回来当间谍。那时，驻满洲里外交办事处的书记官黄通，南方人，二十多岁，同办事处的一个打字员结了婚，呆了几年后，被日本人调到德国汉堡去了。驻绥芬河办事处的俄文翻译李芳林呆了两三年后，被调到驻波兰总领事馆了。我在赤塔呆了3年半，可仍没有让我回来的意思，心里很着急。我同妻子商量，打算深造，到日本留学，于是向津田副领事提了出来。半年后，伪满外交部批准了我的请

求，我带着妻子、儿女回到了国内，那是1936年夏天。

1936年9月，我由赤塔领事馆转到了大连市伪满外交办事处，处长叫陈道，副处长是日本人村上，我和一个叫张栋的做书记官，还有一个雇员陈原阴，仆役刘洪金，另外是个白俄。

办事处的任务是专对东西方出入伪满国境的外国人办理签证手续，此外我们有时也以外交官的身份出席关东州日本各机关的活动和大小宴会，当时的大连是属于日本关东州的附属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和市长都是日本人。

那时，我们有个固定的“业务”，就是每周一、三、五到码头迎、送日本的伤兵，也有骨灰盒。有来的，也有走的，我们办事处的任务是接待一下。

记得在大连近郊，有个叫“夏家河子”的地方，住着个白俄将军——阿达曼·谢苗诺夫，是个少将军衔。在伪满洲国的属地做反苏的工作，他网罗一些哈萨克人，在大连成立了“反苏骑兵团”，他任团长，约有百十个人。平时操练、习武，再不就摩拳擦掌，嚷嚷着要打回苏联去，恢复沙俄的统治。

记得有一次，阿达曼·谢苗诺夫派人送来一个请柬，是邀请我们办事处的人参加他们的一个什么“纪念日”，正好陈道处长不在家，张栋书记官非让我去不可，说我会俄语，去是最合适的，这样，我就作为伪满洲国驻大连办事处代表参加了。活动是在少将的官邸举行的，是个很古的二节楼，表面看上去，已经历了几番沧桑之变了。

那天，参加的人还有日本驻大连特务机关的、水上警察署的等。除了日本的官方代表外，民间的还有“三井”、“三菱”、“满铁”的代表。

会议是由白俄少将主持的，他的骑兵团成员都穿着沙俄时代的军服站在台上。少将又进行了一番鼓动宣传，如何与日本

协同，进行军事训练，又怎么打回俄国去等。

又到转年春天时，少将又举行了一次阅兵式，邀请了二百多日满人员参加。

还有一次，我们接待了一个来自上海、拿着法国护照的女人，在这之前，就已接到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的指令，遇到这样的人立即报告。她是来办查证手续的，我们告诉了日本特务，她自然没有逃脱掉。听说，她是个苏联特务。

出使德国

我在大连工作了1年半，当我第2次出国到欧洲任命时已是1938年底了。

8月15日，伪满洲国国务院发表人事变动的辞令，消息首先在大连的报纸上发表了。大意是：现在满洲国驻大连外交办事处的书记官王替夫，少年英俊，会4门外语，在任赤塔领事馆书记官时成绩显著，此次被派往德国，任驻德国公使馆书记官，成为满洲国驻欧洲的首批使者。同时任命公布的还有：公使吕宜文、参事官江原纲一、书记官伊吹辛隆、主事笠井、刘茂才。

8月末，我们一家来到新京伪满外交部。

大桥次长一见我就说："回来了！"我一再表示感谢，承蒙提拔，有机会到国外去工作等等。

大桥次长又说："还记得咱们头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吧?!"他说："那时我就说过，你有当大使的希望，虽说现在还不是大使，但进了公使馆，就是大使的接班人了。"说完哈哈大笑。

伪满外交部发给我们每人1.5万元旅费、1.2万元制装费和一些家属的津贴费。

1938年9月，我们将要赴德的全班人马准备上路了。

新京火车站，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李绍庚

及各部大臣都来送行，还有日本大使馆的、外交部各科的科长、日本商界的代表等都赶到了车站。我的父母也特意从哈尔滨赶来了。

沿途见闻

1938年9月上旬，我们一行及其家属，乘亚细亚号专列，由新京启程。

在大连作了短暂的逗留后，我们坐上日本的“吉林丸”客船取道神户来到大阪。

第2天，大阪市政府为我们派专车游览市容，一位小巧的日本姑娘做导游，沿途热心地为我们讲解。

然后，我们又坐车到了日本在华参战的伤兵医院。那是个由几栋平房组成的整洁的建筑，原先好象是个兵营。当时我想，这可真是个天大的讽刺，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而我们却来慰问……带队的日本人向伤兵们介绍说，满洲国首次派到欧洲的使者到这里来看你们了，伤重的仍躺在那里哼哼，伤轻的就欠起身子，向我们点头，还有的伸出手来同我们握手。吕宜文公使以伪满公使的名义对在中国负伤的军人们作了广播讲话，大意是说：你们是为皇国的重托，不惜千万里之遥到了中国，为国效劳，却身负重伤，在此我希望你们静心养伤，早日复原，重返战场。

说实话，我当时听了吕公使的话心里好不自在，因为我毕竟是个中国人。

9月18日下午两点，我们一行在大阪登上了远航船1.4万吨“靖国丸”号，继续我们的航程。

船从大阪起航后，首次停泊的港口是上海。船刚一靠岸，我们不少人都涌到甲板上了。

又踏上了中国国土，心里不自觉地溢出一种亲切感。

船还没靠岸时，日本人就有话在先，到了上海，不打招呼不能下船，因为上海反满的情绪很高，暗杀也很厉害，下了船说不定会回不来呢。

途经伦敦，我们又横渡大西洋，直赴德国汉堡港，日本驻汉堡的总领事馆人员都到码头迎接我们，稍作休息，当晚便坐上火车向我们这次旅行的终点——柏林进发。

车到柏林

1938年11月中旬，我们一行终于到达了这次长途旅行的终点站——德国首都柏林。

火车刚刚在柏林站停稳。只见戒备森严的月台上，已站满了前来迎接我们的人，他们中有德国政府外交部典礼司司长、日本驻德大使以及日本各会社驻柏林的人员。

由于公使馆没有修缮好，日本驻德大使馆便同德国外交部联系，暂时安排我们住进了柏林一家最大的，也是最豪华的旅馆，馆名忘了，只记得它坐落在柏林市的繁华地段。

至今回忆起在柏林6年的外交生涯，总觉得真正处理事务性活动太少了。因为我们到德国4个月后才正式开馆办公，那是1939年3月，而那时的纳粹德国，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1月份，我们正式迁入公使馆。

馆址位于柏林市中心地带的茶园附近，那是一座结构别致的西式小洋楼，共3层，院内被松柏、鲜花环绕，清新、淡雅，置身在其中，有一种爽心悦目之感。

洋楼的楼下全部是办公室，3楼上除公使用的外，其余大厅作餐厅、客厅等用。

公使馆还在当地招聘了一部分德国人，有两名女打字员，一名信差，一个司机，再加上两个女仆。

馆舍修缮好后，正赶上伪满洲国的建国节，公使决定，要好好地庆贺一番。

为此，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先同德国外交部联系，请他们拟定将要出席的人员名单，然后请他们负责帮着送请柬。再就是筹备我们将要举行的大型鸡尾酒会。

“建国节”那天，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及各部部长、柏林市长及地方、军队的官员都来表示祝贺。

各国公使馆、大使馆的外交官也来祝贺了，庆祝活动直到深夜才结束。

同时，我们也接到不少贺信、贺电，大多是欧洲一些刚建交的国家发来的。

向希特勒递交国书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要求递交国书，举行正式的建交仪式。于是照会德国外交部。

1939 年 2 月末的一天，我们得到德国方面的通知说第 2 天上午 10 点在总统府正式举行仪式。

那一天，我们全馆的人都起得很早，做好了一切准备。

按着事先约好的时间，公使吕宜文、参事官江原纲一及我和 1 位日本书记官等 4 人身着大礼服来到公使馆。

上午 9 时 45 分，1 辆德国外交部的迎接汽车停在公使馆门口。

公使、参事官在 1 位德国外交部人员陪同下乘坐 1 车，我，日本书记官和另 1 名德国迎接员坐着我们公使馆的车，很快就到了德国总统府门前。

德国外交部典礼司司长、总统府掌礼官等出来迎接我们。首先把我们4个人让到客厅，稍作休息。

德国总统府是1座水泥面高大建筑，威严、雄壮，门前的台阶很高，门口分立站着两位身穿青呢子军装、腰束白色武装带的护卫军。我们进门时，他俩举枪向我们敬礼。

约半个小时后，希特勒在外交部长的陪同下，由典礼司司长作引导来到大客厅。我们都起立敬礼，迎接这位当时叱咤欧洲、风云世界的大独裁者。

希特勒在正座前站好，德国外交部典礼司司长向他介绍说："满洲国的外交公使一行4人来谒见阁下。"说完，他退到一旁。我们4人上前一步，行了一个鞠躬礼。我把国书捧给公使，公使双手接过，用汉语念道："'大满洲帝国政府致德意志共和国希特勒总统阁下的国书'，特命敝国全权公使吕宜文为驻贵国柏林的全权公使。"

吕宜文公使念完后，便把国书用双手捧给希特勒，希特勒又交给典礼司司长。

然后，希特勒在外交部长陪同下，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离开了。

这时，侍从端上酒来，留下的外交部长等德方人士举杯向我们祝贺。

中午11点30分左右，希特勒在总统府餐厅设午宴招待我们。

大家围坐在1个大长条餐桌两旁，希特勒坐在最上方，他的左边是吕公使，右边是江原参事官。紧挨着公使的是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

这是我第1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着希特勒，不禁抬头望了他几眼。我看到，在希特勒的眼神中，有一种寻常人所没有的

东西，那么令人着魔——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看到我们公使吕宜文也在偷眼瞧着希特勒。

用的是西餐，四菜一汤再加酒。吃饭时，希特勒很关心地对我们说："满洲国土地肥沃，是世界上大豆的盛产地，虽然质量赶不上美国，但由于气候适宜，产量是相当高的。知道吗，如果我们德国也能那样，就不是现在这个样了，工业、经济都会有空前的发展。"他接着说："我们德国油料产品缺乏，同满洲国建交后，很希望你们在这方面给予大大支持。"希特勒顿了一下，环视了大家一眼，加了一句："假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也会同样做的。"

最后，希特勒站起身祝酒："祝德满两国建交、友好、通商、文化交流，共同协作，并祝贵国皇帝陛下万岁。"

吕宜文公使作了简短的答词，大意是敝公使今后一定会对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努力。

我们又回到客厅，喝了咖啡，又闲唠了一会就回来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礼节性的拜访、回拜。当初，由于德国首先承认了伪满洲国，西欧各国迫于德国的势力，也相继承认了伪满洲国。捷克、丹麦、挪威、芬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先后和伪满洲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伪满洲国无力再派使节出任，于是就让我们驻德国公使馆兼理这些国家的事宜。

我们给驻柏林的各外国大使馆、公使馆发了信函，同时，也陆续收到一些贺信，日本驻德的会社等也都前来表示祝贺，我们也到各个公使馆、大使馆拜访。

争夺东北大豆

我国东北的特产——大豆，是植物中出油率最高的，在我

国科学不发达的当时，只把大豆用来榨油或做豆腐，剩下的就被视为废料了。而在较先进的欧洲则不然，购去的大豆除少部分做人造奶油而外，大部分用于化学工业方面，用大豆可制出百种以上的产品，如呢绒绸缎、造革，工业上用的各种压缩盒、箱壳等模型，数不胜数。

德国一位名叫斯特劳斯的科学家，在1张大豆宣传画上，把1粒大豆画在当中并由此引出百种射线，每个射线都标明它的用处，因而把它称为“钻石”是当之无愧的。

1930年，德国农业科学家们为了在德国培种大豆，费尽心机。因德国土壤不适宜，他们用船将中国的土运往德国南部气温较好的地区试种，结果只长秧而不结角，失败了。

为了争夺我国的东北大豆，德国在1936年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开始互换驻两国首都的贸易代表，先搞通商，后换使节。到1938年两国公使馆正式开设后，德国更加紧了对我国大豆的争夺。所购去的大豆除了少部分做人奶造油外，大部分用于化学工业方面了。

当时丹麦政府之所以迫切承认伪满洲国，也是为了买中国的大豆。而实际上大豆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当伪满洲国和丹麦的大豆贸易正在双方考虑中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随之，海陆交通封锁，这场贸易也随之瓦解。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伪满驻华北大使馆琐记

韩篁洲口述　功良记录

日本侵占东北，扶植溥仪傀儡政权，组成伪“满洲帝国”以后。进一步实施其蚕食鲸吞政策，大举入关，又用老一套的手法，先后扶植以王克敏、王揖唐等为首的北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以汪精卫为头子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并促使其合流，以便双管齐下地榨取中国的人力和资源，企图实现其吞并全中国囊括东南亚的迷梦。

从1941年1月到1943年4月，我充任伪满洲国驻华北大使馆的秘书长。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多少还能回忆出一些片断，现在简述如下：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伪满跟着就在北京中南海卍字廊东首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块白地黑字的“满洲国通商代表部”的牌子。这个机构虽然以“通商”为名，实际上就是大使馆的性质。因为华北伪组织还称不上一个国家，在外交惯例上是无法派遣使节、成立大使馆的。然而，即使在通商方面，也只是日本从关外运进一些粮食之类而已，谈不上国与国之间的通商贸易。

这个机关的头子的职衔叫做“代表”，公然由日本人充任。我开始任职时的代表叫中根不羁雄，他是个中日混血儿，母亲是中国人。所以从小就会说中国话，对中国的风俗习惯很熟悉，生活腐化，经常打牌、酗酒、逛妓院。工作人员最初不过十几

个人，后来增加到二十多人。但其中只有六七个人是中国人，其余的都是日本人，他们分别掌握政务、秘书、庶务等方面的实际工作。

在政府工作方面，完全是由日本人干，只有一个中国人，而且还是台湾籍的。他们在干些什么勾当，是秘而不宣的，连我这个当秘书长的人也不知道，也不便过问。有一个名义上搞社会经济工作的，名叫井上，除了对外联络外，经常做调查报告和通讯联系的工作。那个台湾籍的中国人名叫黄清涂，年纪很轻，日本话说得同日本人一样，中国话说得也很流利，常常改换便衣外出，行动很神秘，看来不外是搞情报调查工作。

在秘书工作方面，主要是交际应酬，送往迎来。其次是办理签发护照，当时叫做查证。这项工作由两个人负责：一个专门办理由苏联流亡到东北的白俄的出关入关手续，一个专门办理东北人的出关入关手续。第三是办理学务，设法联系并安置"留学生"——到关内来上学的东北青年。这就需要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北京市政府联系。在这个部门中工作的大部分是中国人，我这个秘书长实际只是这个部门的秘书长。

1940年3月30日，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号称"还都"，汪精卫粉墨登场，自任代理主席，表面上统一了沦陷区的伪政权，成为一个"主权国"了。当然，日本首先予以承认，伪满也紧跟着派遣大使，在南京成立"满洲国驻华大使馆"，并且把北京的"满洲国通商代表部"也换成了同样的牌子。按常理说：绝没有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设立两个使馆的，伪满在北京的外交机构只能隶属于南京伪大使馆。但实际上是各行其是，各自与当地的伪政权打交道，各自直接受伪满外交部管辖和指挥。伪大使到北京时，华北大使馆也把他作为贵宾来招待。

北京伪满大使馆成立后，原通商代表部的日本籍代表撤回

了；但换回来的大使馆负责人竟仍然是日本人，名叫佐枝荣一，当时称为参事官。他出身于广岛高等师范学院，已六十多岁，不外骛，专致力于他的本位工作。

编制上有了增添，增加了政务处，处长（内部叫做理事官）是一个名叫孙错的中国人，下面有几个专门办理政务的日本人。从职权上说，这个“处”应当由孙来领导，但实际上他有职无权，只是一个牌位而已，我的秘书长的名义也改称为“秘书科长”。

既然是大使馆，当然就得有武官。这个武官倒是中国人，由伪满军政部派来的，他并不到大使馆来办公，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办公，只有在宴会时，他在坐着插有伪满五色国旗的使馆汽车到使馆来充主人，或者来参加外地的各种外交活动。

此外，大使馆里居然还有一个管理司法的单位，由两个日本人负责，是伪满司法部任命的。办公地址在北新桥附近，实际上，他们单干特务工作。

1943 年，在我脱离这个伪满外交机构以后，这个大使馆就由中南海迁到东交民巷。

1945 年日本投降时的最后一位大使是个日本人，原任安东市市长。他讲得一口纯粹的北京话，好排场，讲阔气，交游广泛，挥金如土。蒋政权接收北京后，他更大肆活动，同接收大员打得十分火热，最后由蒋政权派人护送他回国。

伪满驻南京大使馆武官的见闻

佟衡

一、伪满、汪伪大使馆互派武官的经过

我于1943年曾充伪满驻南京汪伪政府的大使馆少将武官，伪满、汪伪双方互派大使馆武官的经过是：1939年汪精卫声称国民政府还都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在南京成立伪政府，那时伪满就派王庆璋为通商代表驻在上海。1940年汪伪政府派外交部长徐良、陆军部长鲍文樾为访满亲善使节的正副使，到了伪满首都新京同伪满发生了外交上的联系，同年伪满政府又派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外务局长官韦焕章为亲善使节到南京答礼，构成了“日满华亲善提携”的格局。汪伪承认了伪满洲国，决定双方互派大使。伪满就派了吕荣寰为“满洲国”大使，驻在南京。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德国和意大利同时承认了汪伪政权，并派出大使（德）和公使（意）以及武官驻在南京，增强了轴心国家的“防共体势”。不久，日本又发动太平洋上的侵略战争，英、美等国也对日本宣战，于是汪伪外交方面成为了世界法西斯及其附属者们聚集的一个中心。为加强伪满大使馆机构，日本驻华总军和关东军协商，伪满、汪伪也应与“轴心国家”取一致行动，互派武官，因此伪满的日本军事顾问部指使伪军事部，派遣一名驻华大使馆武官，驻在南京。但是，伪满、汪伪同是在日本军方面控制之下，并且双方从来概不直接发生任何军事上的联系，所以军事部没有交代我以具体的任务。

武官处的组织只有武官、辅佐官及属官各1名，每月只具报武官行事表1份备查，概没有别的行动。我以伪满驻华大使馆机构内成员的资格，于1943年7月末赴南京着任。

二、我所看到的汪精卫

我于8月5日到达南京，按大使馆的行事预定，次日带同辅佐官西村喜寿少校，由汪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引导到主席官邸去谒见汪精卫。汪在接见后与我谈话，他问我伪满建军的情形和什么叫'国兵法'？我回答说："满洲国蒙友邦日本的援助，实现了共同防卫，使国家治安确立，国本得以奠定，军队统率大权归于皇帝，依照日满共同防卫的精神，日本关东军驻在满洲国，派有军事顾问部作军事上全盘的指导。军事部大臣对军令、军政有辅弼之责，军权统一于中央，随国家法制的确立，军队整备，废除以往的募兵制，实行义务兵制度，国民不仅服行兵役，且为选择优良壮丁，加以军事的训练教育，退役还乡后，即在地方上服务，遂行政府的各项法令，以收军民一体的实效，所以叫'国兵法'"。这是我根据伪满高级顾问花谷正在当伪满实施"国兵法"和颁布防卫令时对我们所讲的话，它露骨的表现出日寇奴役东北人民，搜罗炮灰，用以巩固其殖民统治的实质，且公开地把满洲国作为日本的仆从国家和一切不能自主的傀儡政权，作"冠冕堂皇"的虚伪宣传。汪伪去年曾访问了满洲国，伪满的情况他知道得很清楚。这种"军"当然瞒不住他，所以听我说完之后，微微地笑了一笑，有意"赞扬"地说："满洲国是有一些很好而又独特的办法，去年我到满洲国看到国务院内有总务厅的设置，这种组织就很适合满洲自己国家的情况，与一般不同的一个例子。"这话语中是意有所指的，却说得很含蓄，以后又说了几句应酬话，我就告辞了。我回到家后，寻思汪的

谈话在含蓄中又非常尖锐，每句话中都有意思在内，事情他是看得很清楚，可是我不了解他由重庆跑出来走“和运”，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现在南京政府不是已经同满洲国差不多了吗？一个曾从事辛亥革命的人物，难道自己愿意同满洲国站在一条线上吗？他可为的是什么呢？是“别有抱负”想出了好办法，暂为周旋呢？还是不幸陷在日本的泥坑里，拔不出腿来了呢？左想右想我看不透他们是怎么回事？事隔不久，我在汪伪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鲍文樾的家客厅里看到汪精卫在“还都”不久写的一个屏条上题的诗：“满院有苔未扫出，一庭芳秽有叶除，炉边爆得花生来，闻与儿童说与子虚”。当时在坐的都是旧时东北的同事，大家谈论说，上面的儿童系指的是小鬼子日本，老汪想办的事他们都要干扰，还得费唇舌敷衍他们，在日本刺刀下的处境很难，不屈从是不行的。当时我心里想，听他们自己方面人的谈话，老汪恐怕是已经陷在泥坑里，无法拔出腿来了吧！以后我同鲍文樾两人闲谈，问他怎么同汪精卫搞在一起去了呢？他说：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就住在天津，汪精卫到了上海之后，由陆大同学杨毓珣约他到上海与汪会见，他们就搞在一起了，直到现在。至于究竟为什么汪精卫由重庆跑出来，同蒋介石又是怎么个关系，他也摸不清楚，不过知道汪到河内时只有曾仲鸣等几个人，后来曾仲鸣被刺，汪到了上海陆续由重庆来了不少人。可是随汪跑出来的人又有跑回去的，如高崇武、陶希圣等到了上海之后，又由香港回到重庆，说他们把汪与日本定的和约带到重庆报告了蒋介石，究竟蒋汪之间到底怎么回事，也不清楚知道。不过据传说，汪由重庆出来搞“和运”，最初蒋介石对他尚不怎么反对，以后汪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对日谈和的经过，大概说，在南京陷落后，德国公使陶德曼出头为中日战争调停，其条件是恢复“七·七”事变当时的情况，中

国方面应禁止排日，参加防共，日本方面限期撤兵等，……当时蒋介石说过“这尚不算亡国条件，可以接受做具体商量”。以后陶德曼没有做回复，中日双方又继续打起来。汪说“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主张，现在进行的和平活动也不出这个范围，怎么蒋介石又不认帐了呢？自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以后，蒋介石很恨老汪，说他把秘密给泄露了，重庆和南京就对立起来。我又问他，现在内外这种纷乱的局势，汪主席的“和平救国”主张可怎么实现呢？他回答说：“一般人评论老汪，说他有领袖欲，可是这种内外关系交错起来支配着他，使其内心上产生很大的矛盾，现在的政府是七拼八凑的，找出这么一帮人，各人都作自己的打算，多数人是跟着整天鬼混，谁也想不出好办法，走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吧！”以上是我们两个人略去伪装和客套形迹作朋友关系的私人谈话，由此使我看到汪精卫的为人。以后，我也有一次直接听到汪精卫“和平救国”的谬论。那是在当年秋季南京军官学校学生毕业典礼上，汪对学生训话，大致同以前发表的一样，他着重说：“和平则中日两国共荣，抗战则中国必亡。而本人‘和平救国’的主张是依据广田三原则，为拯斯民于水火，并无损于中国的主权，独有蒋介石多方阻挠而给中国人民加剧灾难，背理弃信，国人共同愤慨，在重庆方面的人，很多同意南京方面的主张，不久必能相继归来，相共完成和平运动……”。事后他们私下谈论：“老汪的讲话使人听着肉麻”。同时他的内部中人有好多不愿意听他骂蒋介石，足见当时南京与重庆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我在南京只有两次接触到汪精卫的言论，至于他对伪满的关系，使我想到1942年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资格访问伪满。当他由伪满回到南京的时候，乘坐火车经过沈阳，那时我在伪满第一军管区充参谋长。受军事部命令，以对国家元首的礼节迎

接他，鸣礼炮21响，在车站上吹奏中华民国的国乐。当时，我感觉奇怪，按国家的体制，一国元首出国，何必用行政院长身份呢？这样他见溥仪就不能用平等礼节相待，现在可又以元首礼节相送，反而显得对他的元首身份不尊重，岂不是对他这个元首有些亵渎呢？以后汪精卫在伪满又做了一次广播演说。他说："过去我们是同胞，现在我们又是同胞，将来我们还是同胞"。这几句话在伪满轰动一时，在日本人方面大加赞赏说他说得巧妙。东北的人私下议论着，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居心断送东北，现在汪精卫承认了"满洲国"之后，还把中国拉在"满洲国"的一条线上，还来东北认同胞，这岂不是他们又葬送了全中国呢？汪精卫这几句"漂亮话"在东北并没有得到好评。我到南京，听伪满大使馆人说，上海某电影公司拍制一部名叫"西施"的古装片，用老汪说话的语调，把"过去我们是同胞，现在我们又是同胞，将来我们还是同胞"的话整个儿地给引用上了，汪精卫看了这影片，很是生气地说："这岂不是嘲笑我吗？"于是这部影片当时就被禁演了，足见汪精卫卑躬折节降身屈从访问伪满，在哪方面都是大不得人心的。

三、伪满南京驻华大使馆的罪恶活动

日本常驻汪伪政府的机关是：日本驻华总军司令部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来执行它的军事占领政策。伪满大使馆是日本的仆从机关，打着"日满华亲善提携"的旗号，给日本占领当局服务。在南京陷落后，日方所树植的维新政府时期，伪满就派出驻上海的通商的代表，利用特务和汉奸替日本盗运物资。以后汪伪承认了伪满洲国是国，设置了外交使节，通商代表王庆璋改为驻上海的总领事，"换汤不换药"，仍然给日寇盗运和收购军用物资。他是直接给日本方面办事的，概不经过伪满政府

和驻南京大使馆。

汪伪政府也是在日寇的军事控制之下，特别是宁沪地区为日本的军事占领区，它的陆、海军在该地任意搜刮、掠夺，概不理会正常的经济通商关系。伪满是日本军的附随者，尽全力以援助它的侵略战争。例如1944年10月，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携同日本关东军和驻满海军府的参谋各1名，到南京与日本驻华总军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协商决定，由伪满运来鸦片10万两到上海与汪伪方面交换生活物资棉布等项，供给日本陆海军方面的军事需用。实际上是日本陆海军方面为掠夺物资而分肥，海上和大陆它们各有侵略占领的势力范围，由伪满搜刮来鸦片毒物，陆海军两方面各派来参谋1名来监视其交易，双方因分肥不均时起磨擦，古海还得以中间人的身份居中调停。这种尖锐矛盾，更暴露了日本军方的丑恶面目。伪满大使馆只是为之奔走，招待供应，扮演仆从的角色而已。

伪满大使吕荣寰平时也不能主持外交上的事物，只是以傀儡身份登场。遇有典礼时，由他率领着参事官、武官等“衣冠楚楚”地参加外交行列，或出席宴会以“敦睦两国的交流”，这是唯一的使命。另外一种使命，是给汪伪方面以“示范”的作用，充当忠实走狗，服侍主人，对汪伪方面发生影响。由我所看到的一事足资证明。在1944年夏季，伪满的原军事部高级顾问由山西日军方面特务机关长、调赴缅甸作战军的师团长花谷正中将，路经南京，因伪满的关系，特别关心对汉奸们的控制，来拜访吕荣寰。我听到他对吕荣寰说：“大使您对日满华亲善负重大使命，请在与汪政府各要人谈话时告诉他们，日本军为完遂圣战责任重大，中国应和日本互相亲善提携，现在一切都服从于军事，从各方面加以援助，不要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同等的国家，自已想怎么做，就随便地做。如果日本总军加以干涉，就

说压制他们，这样就可能失去两方面的善邻友好关系，不利于大东亚战争，影响大局。”花谷这片话系有所指而发，当他到南京时，正值日本军方和汪伪政府发生磨擦，是日本军方面因补充战事的消耗，极力压榨沦陷区的物资。对于生活必需品实行征发，在传示汪伪上海当局要查收当地民间仓库的前夜，被汪伪方面泄露了消息。有关工商业界，在一夜之间秘密把物资运出境外，分散隐藏起来，使日本有关方面“摸了空”。仅查收了很小一部份，这与他们调查掌握的数目相差悬殊，日本总军以破坏军事行动为名，把汪伪方面当事者有数名予以枪决，这即为盛传一时的“后胡案件”。日军参谋大佐辻正信特把周佛海传到司令部，严加申斥，周当时并未申辩，回到财政部后，即求人向总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话并大发牢骚。他说：“狡兔未死，走狗先烹，将来谁敢再给日本方面办事，再说给日本军办这类事，要是得不到好处，谁肯去白效劳？何况现在又杀人了，这样严苛，我算办不动了，请总军另委别人吧！”周佛海这番话暴露出，他们这帮人充当出卖中国人民利益帮凶的实质，并且居然敢要挟日本有关方面，不怕触犯日本人的虎须，也暴露出汪伪与日本的矛盾。冈村也感到它的军事势力已日没西山，对这般汉奸控驭失灵，只好对周佛海安抚了事。花谷知道这场风波，闹得彼此矛盾更深，他让吕荣寰告诉汪伪方面，应以伪满作模范，学着怎么样做一个好走狗，要向汪伪传授伪满经验，这是他的另一个使命。

伪满大使馆是日本大使馆的附庸，由公使三浦武夫主持事务，参事官张荫棠只是个“招牌”，与汪伪方面接头办事——跑腿学舌，但是自己却不能做什么主张。此外，有两名参事官，日本方面叫办涉外的事：一个是日本人俊藤某，汪伪到河内时，他曾为之奔走联络，是个日本的“浪人”，和汪伪方面接上了头，

所以日本人在伪满大使馆给他挂个名，利用他与各方面熟悉，在汪伪官吏内部进行私人方面的政治活动。还有一个做特务工作的，朝鲜人朴正胤，他给日军在海外南洋方面搜集情报，除报领旅费之外，不在馆内办事，行动是很诡密的。总之一切都在日本操纵之下活动。其他科长、秘书、主事等办事的馆员只办些参观、访问，和出入国境等日常事务，伪满汪伪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外交事务，不过是耍弄一些傀儡登场表演而已。

四、我所看到的汪精卫的军队

汪精卫由重庆出来，以"反共和平"为号召，搞什么"和平运动"，破坏抗战，卖国投敌，受日本人的保护。到了南京，他自己宣称，此次还都系为"救国救民"，不组建自己派系的军队，相信尔后重庆方面必有人响应他的号召，相率归来，使"国统重光"。因此南京方面好些人说："蒋介石在重庆抗战，汪精卫在南京谈和，他们俩人虽然矛盾很深，然而目标是一致的，所谓异趋同归是也。"果然以后投到汪精卫旗帜之下的军队，都同蒋介石方面不断联系，日本人很清楚这一点，便也顺水推舟想用谋略来瓦解中国抗战体势，汪伪的"和平区"就是这种局面。

汪在河内因曾仲鸣被刺，感到自己专恃日本人的保护是不行的，所以他把戴笠军统方面的李士群拉拢过来，随他到了上海，做为保镖者。同时，又有日本军帮助他，在沪宁各地与蒋介石的特工人员进行斗争，总算扼止了蒋方的特务人员的攻击，一时当上国民政府主席。而李士群也作了江苏省长，并把他的特工人员组织成汪伪的军事统计调查局，与日军合作搞特务活动。

南京陷落之初，成立伪政权，以梁鸿志为首组织维新政府，与日本合作。当时南京附近有任援道的地方军，系地主、恶霸等地方势力与日本协力组织的武装力量，及汪精卫到了南京任命任援道为第一警备军司令，兼任海军部长，就地筹饷搜括地方。江南地区连接上海都是由任担任警备，也就是他的势力范围，给日寇作守门犬，破坏抗战的力量。

苏北一带蒋介石撤退后，有残留下来的李长江等人的地方军队，他们抢占地盘称霸一方，兼正赶上日本人也是“鞭长莫及”故尔李长江得以喘息，在苏北继续扰害人民，专门破坏在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的行动。汪伪政府成立后，因这里是新四军抗战活跃的地区，也是日本人感到最棘手的地区，故汪伪设置了苏北行营，汪逆自兼行营主任，实际是在日本军控制之下，进行破坏抗战活动。于是将李长江等人势力纳入，都参加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李仍为虎作伥，在苏北给日军扫荡抗日人民武装力量作前驱。

由上海至沿海一带的江西地区为经济枢纽地带。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伪军和地方武装，汪伪财政部周佛海为给日本军掠夺资源，设有伪税警团，担任巡逻、警备、监察物资入境出境等，为日寇效鹰犬之劳。

汪逆在日本保护之下，拱居南京，他自已也感到人民对他仇恨很深，为自卫起见，于是也编练了几个师的警卫军，并设立军官学校，培养初级干部，作为他的基干部队。武器、装备仰仗日本方面供给，并声扬说，这是将来建立新军的基础。但是，日方对汪并不放心，南京政府还是直接置于日本军控制之下，在南京城内、外各地都驻有日本军，他的警卫军不过是给主席官邸和国民政府守门。各城门口都由日军把守，不时地戒严和检查。城外出了警戒线，还有新四军的游击队不时地进行

活动。在1944年春季，汪伪接到地方报告，城乡附近发现了一股游击队，他就命令警卫军派一部队迎击。该警卫军约有一连被游击队诱至湖沼地带，全部缴械放回。汪逆认为太不够面子，气得他把部下大骂一顿了事。

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南京、武汉陷落后，在长江的沿海口岸，统归日军占领。皖赣南部及浙江西南部日军势力尚未能深入；在长江以北，津浦、陇海铁路沿线，作"总"线占领，以江南、苏北、徐海、武汉，构成了四个据点，与上海及广州、福建沿海一带相呼应，日本称为华中地区，交付与汪伪给他作守门犬，以防止抗日军的入侵。汪伪到南京后，以安福系的杨揆一，由参谋长转为武汉绥靖主任，以后杨病故，汪逆派他的陆军部长叶蓬接充。实际上，这一地区是日军直接占领，并没有汪伪的军队，主要是利用汉奸军队直接控制人民，为虎作伥，以作占领区的掩护。

在长江以北，由新乡到南阳的平汉铁路线尚有一段未沦陷于敌手。鄂东、豫南及河北平原新乡一带，除蒋军的卫立煌战区外，鲁豫一带的八路军尚坚持拒守，使日军未能进犯，蒋介石把何柱国、于学忠等旧东北军，留置在豫西、皖北，拒而不战，保存实力，并同汪伪保持联系，互不侵犯。日军在此地主要是为了保持它和其它占领区的背后连络线，故也未作扩大范围的占领，一时双方呈现胶着相持的状态。在河南省北部陇海路沿线及河北新乡地区，蒋介石把旧西北军孙良诚、孙殿英、庞炳勋等部队留置在这个地方，汪伪到了南京以后，这些部队逐次地参加了和平运动，其目的在于占领地盘，妨碍八路军的抗战行动。汪伪政府任孙良诚为河南省长，并收容了他们的军队，命其军队与日军配合共同保持占领区，以扼拒新四军的抗日行动。同时在和平、反共的旗号下，还不断地与蒋介石加强联系。

此外有由华北伪政权转移到汪伪方面来的胡毓坤的绥靖军，日本为便于统领，命令他驻任归德一带，其任务也是“反共”。绥靖军与孙良诚等军队是一丘之貉，所差别的是，它们不是由重庆方面反叛过来的军队。

徐州为日本华北驻屯军所属部队占领，因此由当地汉奸郝鹏举成立临时政权。汪伪到了南京把徐海及淮河地区划为淮海省制内而设治在徐州。在这里，蒋介石撤退后并没有残留的部队，所以也没有汪伪方面的“和平军”。这个伪省长给谁？一时间追逐者大有人在，投归汪逆的汉奸郝鹏举，走了夫人路线，运动陈璧君，经汪的任命当上了淮海省长。我在伪满大使馆听说，郝与陈约到任后即奉上贿款，不想事隔经年，并未如期交付，陈璧君急不可耐，亲到徐州坐索，方才到手。汪伪的卑污贪婪，也不亚于蒋的四大家族。

但是，苏鲁边区人民的抗日气势高昂，在青、兖一带，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军给日军以强大的打击。汪逆于是又想利用汉奸去残害人民，诱致于学忠部下荣子恒投降（他是伪河北省长荣臻的儿子），归附后补充枪械，编成独立师，开赴山东，协同日本军对抗日军进行“扫荡”。后在广州一带被人民抗日军包围击毙，伪军也被歼，人民的威势使日伪军丧胆。

总之，汪伪的“和平区”主要在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蒋汪两方面各不相犯，汪逆专收容由重庆方面来参加的军队。有人说，日本人想利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瓦解抗战，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军队，转化为“皇协军”。

五、日薄崦嵫的日寇侵华军事

我于1943年8月至1944年12月这一期间，驻在南京伪满大使馆。做为武官是随日本方面“亦步亦趋”的。在伪满时，我

们一切都得受关东军的指导，来到南京仍得同日本驻华总军保持联系。我的辅佐官西村喜寿是日本人，凡事由他给联络，到时候由我出场。记得1944年秋季，日军对重庆方面发动攻势，先攻克郑州，打通了平汉线，尔后陷长沙、取桂林，俘虏重庆方面的军长方某，把蒋介石压缩在四川、云南那一个角落里去了。南京方面猜想，日本此次大规模攻势，不久必下重庆。战局又有变化，不想日军进攻到此就中止了。我的辅佐官西村，请我到日本总军祝贺此次战役的胜利，总军的参谋副长兼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落合少将接待我。我说："总军此次的胜利，重庆指日可下，俾此大陆作战可竟全功"。他笑了一笑说："重庆并不是难攻不落，驱逐蒋介石出重庆，垂手可得，但是不能解决大陆的作战，所以总军就攻到这个地方，暂时停止"。我请他进一步说明，他回答我："在中国大陆作战，由满洲到现在战斗第一线，背后联络线有相当的长度。况且，西北、华北、华中的战场，也相当的广阔，现在还是处处遇到抵抗。强大的敌人并不在蒋介石方面，在西北方面就占用了相当的兵力，华北和汪先生的和平区虽然同日本军协力，但是还阻止不了游击队的'扰害'，日本军要是不以兵力支援，后方就不能巩固。山东、河北一带还是很麻烦的，攻陷重庆怎能够解决大陆的作战呢？再就太平洋战争全盘形势来说，中国大陆只能算作局部作战，兵力应如何分布也应考虑，所以今后的作战还得看看各方面的形势。"由日酋落合谈话中即可看出，它的侵华战争，已成为"强弩之末"了。日军这次攻势停顿后不久，积极侵华的总军司令官畑俊六调回国内，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充其后任。这时受军部反对、组阁未成的宇垣一成大将来华到了上海，据日本方面传出消息，他是与重庆方面来接洽，试探议和的。我听伪满大使馆的日本人说："宇垣此行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他

们谈论：中国方面对议和没有诚意，在战争开始，蒋介石只望日本能退出华北，而不限于满洲国。在近卫内阁时，中国要求退还东北，取消满洲国，这就使日本方面不能承认的了，可是到了现在，中国越吃口胃越高，说非恢复甲午战以前的状况不可，这样的“狂妄”，迫使日本人非打下去不可。我们听他们说的这片话，就感到日本已成强弩之末，日本军到了这时，士气非常低落，就连主战的人们也都失去了胜利的信心。日酋冈村为给内部人打气，召集军部及日本大使馆的人员，并请伪满大使馆人也来参加，开了个联欢会，由作战科长辻正信大佐讲演他在南洋作战的情况。他说，现在太平洋战争局势虽没有进展，然而日军能克服困难，美国海空军优势并不可怕，他们的军队只凭武器锐利，人的战斗能力，绝对不能跟日本军相比，反而中国军虽然武器不精，人的战斗要素武勇耐劳，意气旺盛，除日本军外，欧洲、美洲各国，俱是敌不过的。对中国军不可轻侮，希望大家对于这点要多留意。他虽然就战争局势鼓励大家，但就连最高指挥机关的中级干部也都意气消沉，感到无望。日薄崦嵫到了穷途末路了。

六、伪满汉奸在内地的罪恶活动

日本军国主义者，一贯执行田中奏折所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日寇南次郎居然倡言“满鲜一如”视东北如朝鲜是它所征服的奴隶。在伪满服务的汉奸，甘心为虎作伥，卖国求荣，造成滔天罪行。我所看到由伪满转到汪伪政府，给日寇作爪牙的有：

汪伪南京要港司令海军中将尹祚乾。他是伪满江防舰队司令官，1940年伪满取消海军，统归关东军统辖，海军的江防舰队改为陆军江上军，尹祚乾任司令官，但日本海军方面对他总

不忘情。汪伪成立南京政府，长沙沿岸及上海归日本海军占领的势力范围，于是尹祚乾被日本海军方面把他推荐给汪政府，委以南京要港司令，主要是监察长江各岸口抗日军的活动及物资的运行为日寇作番犬，并帮凶敌人对中国物资的掠夺。

广州警备副司令陆军中将郑洸薰。他的籍贯不明，自报广东籍，有人说他是台湾人，为日寇多年豢养系士官学校毕业，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时，曾给日军作间谍。1932年日本关东军第三科长原田雄吉，推荐他到伪满军政部任少校秘书，又送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41年原田雄吉充汪伪军事最高顾问，又把他推荐到汪伪军事委员会任上校科长。认陈壁君为同乡，由汪逆精卫任命他为广州警备副司令，实际是日本宪兵的特务，残害抗战人民，大事搜刮。1943年汪伪又任命他为驻伪满中将大使馆武官，他借机把搜刮的赃款汇往日本，携带日本籍的妻子，移居东京，然后又辞职回到广州，依然在日军驱使下活动。

武汉绥靖公署清乡局长王遇甲。他是湖北人，前清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辛亥革命时任陆军第二镇协统（旅长）率北军攻下龟山。光复后，居北京，不敢出头露面。“九·一八”后投入伪满，曾充延吉地区司令官、宪兵总团司令官、军官学校校长等职，于1943年退职。1944年日本眼见战争形势不利，为加强镇压占领区内人民的抗战行动，把王遇甲推荐到武汉绥靖公署，充清乡局长给日本人作刽子手，屠杀爱国人士。

总之，日寇利用这些驯服的汉奸，作为它侵略中国的工具。以上三人是伪满汉奸中的典型。此外各地供日寇驱使者也不在少数。

伪满与外蒙“满洲里会议”简况

金声整理

哈尔哈庙事件（即诺门罕战争）后，哈尔哈河沿岸哨所之间小冲突不断发生，日益加剧。为了解决二百年前就已留下的边界和领土问题，伪满洲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召开会议，重新划定边境线的建议。但是，当时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并没有被中国政府承认，仍坚决认为此“二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伪满和外蒙双方，也未承认对方的国际地位，于是由日本出头请苏联从中搭桥，通过日苏间数次交涉，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地点定在满洲里，简称满洲里会议。

伪满洲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是：

首席代表：凌升，伪兴安北省省长。

代　　表：斋藤正锐（日本海拉尔特务机关长中佐）、乌尔金（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官少将）、神吉正一（伪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长）。

随　　员：石田谋、正珠尔扎布、华林太、玉闻精一、猪口三藏。

服务员：宫本。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是：

首席代表：桑布（外交部副部长）、丹巴（军团长）、德格索尔（政务委员）、其木特道尔吉等。

蒙古代表团住地设在乘坐来的专车里。

伪满代表团部设在满洲里头道街苏联领事馆斜对面民房里。

会址设在铁道南的一所平房里。

满洲里会议共开了三次，三次会议都因为节外生枝不欢而散，边界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种下了恶因。

第一次满洲里会议是在1935年6月1日召开的，会议上，伪满洲国代表主张：诺门罕方面，双方的边界线应在哈拉哈河一线上，以哈拉哈河主流为两国的国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主张：哈拉哈河是蒙古的领河，双方边界线通过哈拉哈河东侧和北侧。会议的焦点是哈尔哈庙一带地区的归属问题，双方反复坚持，重复二百年前喀尔喀东臣汗部和呼伦贝尔新巴虎两个部族的意见，而且都拿出了古旧的地图和文据做为理由。

就在会议争论期间，关东军做了手脚，向哈拉哈河派出军事测绘队。在胡鲁斯台河边，被蒙军抓走两名，其余跑回。为此，关东军指使伪满洲国代表，在7月4日的会议上，向蒙方代表提出：惩处肇事者，承认满洲国代表常驻蒙古领内，如果蒙方不答应上述要求，“满洲国”（实际是关东军）将迫使塔木察格布拉克——斯梅一线以东的蒙古军队撤走。

蒙方代表没有理睬日满这个以军事进行要挟的讹诈，于8月26日回国。

第二次满洲里会议，是在苏联驻日大使就关东军指使伪满洲国代表在会上要挟蒙方代表一事，向日本广田外相提出抗议并发表了声明。在日本向苏联表示歉意后，于同年10月2日召开。但这次会议只举行了四次。由于双方重复第一次会议各自的观点，于11月25日再次休会。

1936年2月20日，苏联和蒙古修订了为期十年《苏蒙互助

条约》，3月29日，日军突袭蒙古境内的达乌兰战斗遭到失败后，日军又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交涉，于1936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三次满洲里会议。

第三次满洲里会议，伪满洲代表团成员有了更动，成员名单如下：

首席代表：凌升。

代　　表：矢野征记（“满洲国”外交部调查司长）、乌尔金、菊竹稻穗（兴安局次长）。

随　　员：石田谋、正珠尔扎布、获原长一郎、额尔钦巴雅尔、哈达、饭盛某。

这次代表团成员里，没有日本现役军人，关东军感到前次会议派了日本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参加，暴露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真相，没有得到好处，反而被蒙方代表看不起。但虽然明里没有军人，背后确是满洲里特务机关长樱井镣三少佐进行操纵。而会上，则是日人矢野独断专行。会议期间关东军参谋次长矶谷廉介少将和司令部第四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专门到满洲里听取会议情况。

第三次会议正在争议期间，11月25日传来日本和德国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这个针对苏联和蒙古的日德同盟，刺激了苏联政府，于是，在《日德防共协定》发表后，蒙方代表立即回国。

“满洲里会议”，由于新的恶因而彻底破裂了。

（摘自《满洲里文史资料》第四辑）

忆“满洲里会议”

正珠尔扎布

满（伪满洲国）蒙（外蒙）国境会议，因为是在满洲里举行的，所以通常叫做“满洲里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划定“满”蒙两国接壤地区哈拉哈河一带不明确的国境线而举行的会议。

一、日方对会议的真正企图

伪满洲国成立后，在哈拉哈河，特别是哈拉哈庙，也称将军庙附近，日蒙双方国境监视哨之间，不断发生小冲突。这种冲突愈演愈烈，愈来愈频繁，以至发展到双方出动军队互相袭击的程度。而日本帝国主义向来抱着相机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野心。由于他们用尽各种方法都得不到对方真正详细的各种情报，因而，想借举行会议机会，窥探一下对方之情形。日本人常说外蒙是一个谜，他们怀疑蒙古的独立，认为它是苏联的附属国，想试探一下蒙古对日满的态度和看法；苏蒙关系如何，能不能拉拢它。日本方面想通过满洲里会议来揭开这个谜底，所谓举行会议，划定国境线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二、交涉召开会议的经过

“满洲国”如何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一开始就成了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满蒙双方没有相互承认对方的国际地位，因而不能直接交涉。“满洲国”方面向苏联试探，

请苏方在其中斡旋。但苏联由于不承认“满洲国”，拒绝从中斡旋。最后，日本只得出头请苏联帮忙，苏联这才答应从中斡旋，通过日、苏间的多次交涉，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当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电答应开会时，伪满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说：“终于答应了，看看外蒙到底怎么样。”

伪满方面会议代表团的组成情况，最初的代表团成员和随员名单如下：

首席代表：凌升（伪兴安北省长）

代　　表：斋藤正锐（日本海拉尔特务机关长、中佐）、乌尔金（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官、少佐）、神吉正一（“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长）。

随　　员：石田谋（“满洲国”外交部驻满洲里副领事、会汉、俄语、担任会议记录）、正珠尔扎布（“满洲国”蒙政部事务官担任翻译、联络）、华林太（兴安北省秘书官）、玉闻精一（“满洲国”外交部雇员、伊犁人，会日、德、俄、法、英语）、猪口三藏（日本浪人，曾潜入乌兰巴托被捕入狱后逃海拉尔，会俄、蒙、汉语）。

服务员：宫本（兴安北省警备军雇员，会汉、蒙、俄语、专招待外蒙代表团）。

伪满洲国代表团是在满洲里头道街苏联领事馆斜对面民房设立了“满洲国外交部代表团部”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名单为：

首席代表：桑布（外交部次长）。

代　　表：丹巴（军团长）、德格索尔（政务委员）。

随　　员：其木特道尔吉（传书使，担任会议记录）。

随　　员：某（蒙语翻译）。

其他随员姓名忘记了。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住在乘坐来的专用列车里。车内服务人员都是蒙古人和苏联人，其中以苏联人为多。

他们到达满洲里车站时，受到了满洲国代表团的欢迎，彼此寒暄了一番。他们全部穿着西服，态度潇洒，出乎我的预料，尤其是正式开会那一天，他们全部穿上民族服装，表现出民族独立自豪的态度，令人钦佩和羡慕。

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监视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来以前，伪满洲国代表同当地日本特务机关樱井镣三少佐和国境警察队内田队长商定监视和保护蒙方代表的措施。特派一名叫太原的巡官（日本人，会蒙、俄语）专门随从保护（监视）。另派一名特务在车站附近潜伏，每天汇报他们的活动情况，如购买什么东西，走那条街道，几个人，对店员说了些什么话等等。借此推测蒙古人民共和国缺少什么物资、经济情况、蒙方想知道满洲国什么情况。

四、会议的表面情况

满蒙边界会议在1934年6月开始至8月下旬，历时约三个月，会场设在铁道南的一所平房里，这次会议由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而宣告无定期休会。

1935年1月，在满洲里二道街白俄中学复会。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员没有变动。伪满洲国代表团名单如下：

首席代表：凌升。

代　　表：矢野征记（满洲国外交部调查司长）、乌尔金、菊竹稻穗（曾任兴安局次长，所谓蒙古通）。

随　　员：石田谋、正珠尔扎布、获原长一郎、额尔钦巴

雅尔（满洲国兴安北省警备军官，担任会议记录）、哈达（兴安北省秘书官）、饭盛某（伪外交部属官）。

这次代表团里没有军人，因为日本关东军感到第一次会议派了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参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面前暴露了满洲国的傀儡真相，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叫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瞧不起。明里虽然没有军人，背后都是满洲里特务机关长樱井镣三少佐进行操纵。

第二次会议后半截，矢野独断专行，把持一切，因而代表团内部意见不统一。菊竹稻穗和正珠尔扎布以“妥协”为名被开除代表团，还因通蒙嫌疑把哈达也开除了。

会议期间，关东军军部派矶谷廉介参谋副长、第四课长河边虎四郎到满洲里听取会议情况，他们对会议的成功与否毫不在意，河边曾问我：“怎样？外蒙对你们有同族感情吗？”我说：“没有，他们瞧不起我们。”

会议期间相互开了几次招待会。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在餐车上招待我们，用苏式酒席；满洲国方面是在东亚旅馆举行的，用日本式酒席，此外还特别准备了肉类。

有一次，日本报纸刊登了满洲国招待会的情况，内容有：宴会非常融洽。桑布代表饮酒，脖红耳赤等语。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看报后，提出了抗议。认为满方违犯协议，没有取得蒙方同意而登报，并且使用“脖红耳赤”带污辱性的词句。满方为此向蒙方道歉。

此外，还举行过野游、打猎、看电影、看哥萨克舞蹈等。

会议上蒙方代表发言后，由蒙方译员翻成汉语；满方代表发言后，满方译员翻成哈拉哈语。满方主要发言人是凌升，蒙古主要发言人是桑布。其他代表间有发言。

会议的焦点是哈拉哈庙一带地区的归属问题。双方在前后两次会议上都是反复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第二次会议上，蒙方拿出一幅古色苍然的哈拉哈河一带的略图作为争辩的依据，但满方对那个地图连看都不看，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样，第二次会议也和第一次会议一样毫无进展。所谓满蒙国境划定会议自1934年6月至1935年3月下旬（中间休会五个月）遂以毫无结果而告终。

每次会议记录满方代表团都向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外交部、日本外务省、海拉尔、满洲里特务机关报送一份。

五、关于“哈达通蒙嫌疑”

有一次招待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观看电影，第二天桑布代表给凌升代表一张纸片，说：“这是昨夜晚黑暗中，你们代表团某人偷偷递交我这张纸片。我们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到此地开会的，不是为了搜集你们情报来的，这种行为对我是一种污辱。我们不需要这个。”态度非常严肃。凌升说：“我们查究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张纸片上用蒙文写着关于驻海拉尔和满洲里以及国境线上的日伪军的一些情况。

以后，伪满警务厅、日本宪兵队共同进行调查。结果认定是哈达笔迹，但哈达坚决不承认，由于警务厅长板水梧郎的庇护（板水对哈达特有感情）并在不扩大事态的情况下，把哈达开除代表团才了事。

六、日、满从满洲里会议得到的东西

满洲里会议以无结果而告终，但日满方面却有一些心得：

1. 蒙方代表里没有苏联人，而感到好象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他们却常到苏联领事馆联系。因此，还是认为外蒙不是

完全独立的国家，苏联是他的后台老板，苏、蒙关系如同日、满关系一样。

2. 蒙方代表对满洲国代表没有表示什么好的印象，无法拉拢。

3. 后来在新京（长春）日本料理八千代馆里武藤章（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被处绞刑）和神吉正一谈话，当时我在场。神吉说："满洲里会议虽无结果，但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满洲国也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了，怎么说也是一个国际会议啊。"

还有一次武藤问我："你看外蒙人怎样？"我说："他们有一种自豪感，认为自己是独立国家，瞧不起我们。公事公办。一概不说闲话。"武藤说："那是从苏联学来的，互相监督，心里有话也不敢说啊。"

七、其他活动

会议期间，我主要担任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联络事务，如开会日期、时间、送报等事，休会时，常去访问闲谈（别的任何人是都不许随便访问的），闲谈中不涉及会议、国情、民族等问题。有一次，我对桑布代表说："我们内外蒙古民族结成一国多好啊。"桑布代表听后，站起来说："休息休息吧。"径自走向卧室去了。

以上所写的内容不充实，也不系统。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了，很多事情想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不少地方与事实有出入，请知情人给予纠正补充。

（摘自《满洲里文史资料》第四辑）

哈尔滨日伪警察
有关外事方面的种种罪行

肖炳龙　王习文

伪外事警察的情报活动

哈尔滨自从成为中东铁路枢纽站之后，就是一个具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国际大都市。哈尔滨市居住有各国籍或无国籍（主要为白俄）的众多人口，语言、风俗、生活方式因国籍不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差异。据伪哈尔滨警察厅在1934年的调查统计：哈尔滨户口总数为99 233户、人口总数为482 452人。除中国人外，人口较多的有日本人14 773人、朝鲜人7 245人、苏联人25 521人、无国籍者32 073，其他国籍人2 501人，这五者相加总人数为82 122人。

除多国人口居住哈尔滨外，当时的哈尔滨还有一个特点。当时凡在伪满洲国设立过领事馆的国家，几乎都把自己的领事馆设在哈尔滨。在哈尔滨设立过领事馆的国家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荷兰、丹麦、葡萄牙、比利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在这些国家中，有日本的同盟国，如德国、意大利等国；也有日本的敌对国，如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这些国家都以哈尔滨为基地，以哈尔滨为中心展开角逐，从事外交战、情报战和间谍战，使哈尔滨成为当时远东国际情报战的中心之一。

日本在1918年前后，就建立了哈尔滨特务机关——日本关

东军情报部的前身。伪满时期，哈尔滨地区的所谓外事警察主要接受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指挥。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成立后，外事警察的活动由伪保安局统揽，在指挥系统方面同时直接受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第二课指挥。伪外事警察机构中绝少有中国人，外事警察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情报间谍方面的机密，绝对不准中国人伪警察插手，一些特别外事侦谍机构中都是清一色的日本人。据1939年在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任职的日本人警佐进藤静雄供称，他在外事科任职时，科内主要负责人多由日本人担任，特别是科、股两级官职均由日本人把持。当时的外事科长为日本人羽切正平理事官，外事股长为日本人泽田，执照股长竹内。科内有日本人平川、黑岩、河西、相泽、高桥、大薮等。除这些日本人警察外，有会日语的两名白俄警察担任翻译，另有10余名白俄警察充任内勤和外勤。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表面上是管理哈尔滨的外籍居住人口，办理户籍、居住、迁徙、旅行、出入境等项事务；骨子里，哈尔滨地区的伪外事警察，主要是对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及馆内工作人员进行监视和侦察，对其它各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也进行侦谍活动。另外，各国在哈尔滨设立的商务机构、社会宗教团体也是外事警察侦谍对象，他们在这些机构中进行特务活动，在外国侨民中网罗密侦、特务腿子，驱使这些人在侨民中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报，并通过这些人对外国侨民实行监控。

伪外事警察常装扮成绅士阔佬或平民百姓，活动于社会各个角落，与各种人打交道，将听到的或看到的事都可作为情报资料加以汇总归纳，上报伪警务机构。在这些情报中，甚至可以获得有某种重大价值的情报。1939年4月间，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日本人警察大薮武雄从哈尔滨的犹太人的传闻中，得

到了有关苏联与德国正在从事秘密谈判的消息，反映了当时苏联对德国外交的动向和态度。如果这一情报可靠，将影响日本的对苏、对德外交政策，日本必须对苏德两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大薮武雄获得这一情报后，甚感吃惊。当时一面倒的国际舆论是德国即将对苏联开战，各国报刊亦连篇累牍登载苏德关系紧张的消息，丝毫没有两国关系松动的迹象。自1935年3月，德军公然开进莱茵区，3月11日，吞并奥地利。1939年3月15日，德军又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在与英、法的莫斯科谈判破裂后，为打破英、法等国怂恿德国继续把侵略矛头东指进攻苏联的阴谋；德国为便于集中力量于西线对付英、法，避免东西两线作战，遂同苏联秘密接触，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于是，苏德两国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谈判。此情况与公开的舆论报道相去甚远。获得情报的大薮武雄虽感到作为社会传闻，没有什么根据，但又觉得这一情报关系重大，预感苏德谈判一旦成为事实，必对日本外交产生重大影响，遂立即向外事科通报了这一信息。当时的外事科长川手与九郎认为这条消息极为重要，并觉得犹太人的情报网比较可靠，有一定的根据，马上决定向上级警务机关报告。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迅即将此事以书面形式上报伪滨江省警务厅，伪警务厅也上报了伪满警察最高机构警务司。但伪警务厅与伪警务司都把此事当作例行公务，未作为重要情报予以重视。结果1939年8月间，苏联与德国之间突然公布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外交产生极大影响。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使日、德、意三国同盟的交涉被打断，日本外务省对此重大事件的突然发生，不知所措，使日本外交陷入窘境。日本军部和政府都为之茫然，日本的平沼内阁甚至发表了欧洲情

势“复杂离奇”，找不出应付方针的这一国际政治史上空前笨拙的声明而全体辞职。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还建立了固定的谍报联络网，设置秘密情报点，物色所需人物定期提供情报，这样的人即是密侦。外事科掌握的密侦，具体人数无法统计，仅为伪哈尔滨警察厅南岗警察署特务系主任兼外事系主任掌握的密侦数就有40余名。这些密侦一般都为上层人物、社会名流，有相当范围的社会关系。其中有白俄旧贵族、白俄高级将领。这些人交际广，消息来源自然较多。比如，马尔斯商行经理捷克曼、马迭尔饭店经理基依明、南岗秋林洋行职员瓦金。有些人甚至本人即在日伪警宪特机构中任职，比如秋林洋行职员中村，实际上是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嘱托。

为了从英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内获得情报，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日本人警察相泽雅一警尉，利用白俄警察，以英国驻哈尔滨领事馆为对象进行谍报活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收买了英国领事馆内一名中国杂役，指示这名杂役窃取英国领事馆内的机密文件。该杂役乘一次英国领事外出之机，盗出一本电报密码，经过摄影后，又送回原处。这事发生在1940年初，拍摄密码本时，除相泽警尉和白俄警察外，还有外事股长中根通助、河西警佐在场。盗拍的密码本是商业用的，并无政治军事价值，但也可从中搜集商业情报，对当时日本了解英国商业活动，有一定的价值。据当时外事科外事股日本人警佐进藤静雄讲，虽然盗拍的电报密码是商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是唯一的东西。因此，由于盗拍成功，相泽还获得了伪满政府的警察功劳奖赏。

1940年1月，日本、伪满、苏联、蒙古在哈尔滨举行有关诺门罕事件善后处理会议，即所谓在蒙古和伪满划定边界会议。

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是诺门罕事件时的朱可夫元帅麾下的兵团参谋长鲍格达诺夫少将。日方了解到鲍格达诺夫的哥哥谢廖沙住在哈尔滨郊外，希望与阔别30年的弟弟会面。为策反鲍格达诺夫首席代表流亡伪满洲国，日本人组织特务工作班并用尽了一切手段。谢廖沙追赶已踏上归途的苏联代表团一行直到满洲里，结果日本人唆使谢廖沙出面的策反活动以失败告终。

1940年8月，苏、蒙、日、伪满四方在哈尔滨召开所谓边界谈判会议。根据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的命令，伪滨江省警务厅指示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警务人员全力以赴对苏蒙代表进行监视、策反和防谍活动。由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长古谷负责对苏联代表下榻的哈尔滨大和旅馆的警戒，以及对苏蒙代表的尾随。为防止苏蒙与会者从事谍报活动，古谷指挥外事科在苏、美、英、法、德等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前设置监视哨所，调查各国领事馆进出人员，侦察、甄别谍报嫌疑者，每天汇集各领事馆前监视哨所的工作日报，于次日晨集中报告外事科负责人，再上报伪滨江省警务厅。另外，会议各方代表团举行联欢时，外事科派出人员，以警戒的名义监视苏蒙代表团成员。外事科日本人警察相泽雅一还利用南岗军官街凡达基雅舞场的白俄舞女做密侦，化装潜入苏联外交人员下榻的大和旅馆，以女招待的身份接近苏联代表，乘机从其兜内窃出秘密文件，翻拍成照片后，放回了原处。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设有无线电台，昼夜监听苏联远东各重要城市的广播电台播音。如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城市的电台播音，重点监听苏联有关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新闻广播。归纳总结一段时期内，政界、军界要人活动状况，人事变动情况，从中捕捉有关谍报资料。

利用白俄迫害白俄

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大量的俄国人涌入哈尔滨；俄国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俄国流亡者逋入哈尔滨，使得哈尔滨的俄侨激增。其中一部分加入了苏联国籍而成为苏联公民；还有不少人不满苏维埃政权，未加入苏联国籍，甚至也未取得其它国籍，这些人被称为无国籍的“白俄”或“白党”。“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境内居住有7万余俄国侨民，约有半数集中在哈尔滨。在哈尔滨的白俄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流亡东北的帝俄政府的官员、贵族、白军、商贾和中东铁路技职人员等。这些人之中的头面人物有白军高级军官谢苗诺夫、巴克谢耶夫、弗拉谢夫斯基、高尔察克反动政府的大臣米哈依洛夫等，他们素怀仇苏反共之心。流入东北后，秘密组建反动武装，从事反动宣传，干扰东北政局，一直伺机恢复失去的天堂。所以，待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以后，这些人纷纷投入日本新主子的怀抱。1932年2月5日，日本军队占领哈尔滨，白俄构成了欢迎日本侵略军进城的人群的主要部分。他们向日本侵略者欢呼“万岁！”，同日本人接吻、握手和拥抱，在这种下贱的表演背后，他们的动机就是想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白俄政府，这是旅居中国东北的白俄流亡者的梦幻，他们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企求日本人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梦想。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些白俄不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日本当权者对白俄也格外关注，利用其充当反苏、镇压东北人民的别动队。

1935年，在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征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后，在哈尔滨建立了白俄事务局，这是一个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组织，他们命令白俄军官弗拉谢夫斯基为局长，他的日常事务就是专门在日本人书就的公文上签字。1936年1月，伪哈尔

滨警察厅日本人副厅长根据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命令，在伪哈尔滨警察厅设立了募兵处，为所谓白俄部队招募士兵。这支以伪满洲国治安部名义成立的白俄军队，强行征招白俄人，欺骗他们说，为了实现你们的梦，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重建沙俄帝国，快去参加白俄部队，拿起枪来，去勇敢地战斗吧！

这支白俄部队的队部设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街，部队长为日本人浅野节，故名浅野部队，后来这支部队移至吉林德惠第二松花江，又称其为第二松花江部队。这支部队属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本部第三班兵事室指挥。伪哈尔滨警察厅还制作了大量苏联红军的军服，供这支白俄部队使用。这支白俄部队经常在日本人的指挥下，穿着伪哈尔滨警察厅提供的苏联红军的军服，在中苏边境地区干起抢劫的勾当，还假作退往苏联境内的模样，使当地人确信劫盗者千真万确是苏军士兵。

1935 年到1936 年，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科长川手与九郎，秉承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的旨意，与特务机关和日本宪兵队配合，利用白俄事务局的白俄，到中东铁路苏联籍员工中宣传，苏联是真正凶恶的魔鬼，回国要被当作日本间谍处死，并伪善地许诺给他们转为无国籍侨民。威胁那些不愿转为无国籍侨民的苏联籍员工，要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并且强制驱逐出境，甚至辱骂、胁迫、恫吓，无所不用其极，强行将许多苏联籍员工转为无国籍者，强迫他们留在东北不要回国。

反苏反共是白俄事务局的最高宗旨。1939 年4 月30 日，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根据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让白俄事务局煽动哈尔滨的无国籍白俄侨民举行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那些白俄呼喊反苏口号，演出了一场丑剧，在示威游行队伍旁是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派遣的所谓维持秩序的伪警察。

日本人还利用白俄事务局把几百个白俄家庭迁移到离海拉尔35公里靠近苏联边境的三岔河去。此后，这类移民活动从未停止过。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不遗余力，强行将哈尔滨市的白俄侨民转业，把他们送到日本特务机关在亚布力和安达等地设立的开拓团训练所，强制他们在那里一边务农，一边接受训练。

对于这些移民，日本人最先曾许诺供给经费、农具、牛羊和住宅，但他们得到的是痛苦和失望。他们在日本兵的监视下，从事农作，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所获被日本人无情地夺去，妻子、女儿被日本人污辱践踏。

伪警察机构参与的日伪当局强制白俄移民，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自1936年，由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组织白俄移民，至1943年，在大兴安岭绰尔河流域、嫩江以北的甘河流域、佳木斯北部的南岔、密山北部的十里洼等地设立了白俄移民村。这些白俄移民村的设立，把矛头直接指向苏联，白俄移民被强制从事各种反苏活动，甚至被派遣越境，窃取苏方情报。日本关东军还把这些白俄移民村作为选拔、贮备、训练特务的基地，对苏开展间谍战。许多白俄移民成了这场间谍战的牺牲品。

白俄曾对入侵东北的日本人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时间证明了一切，他们的幻想被日本人的铁拳击得粉碎，成千成万的俄国难民逃离了东北，很多人成了阶下囚，一些人被枪杀或谋害了，无数的白俄少女被日军奸淫了。他们的钱财和产业被无情地掠夺了，这就是热心为侵略者歌功颂德的白俄人，所得到的报酬。

“接待”李顿调查团

1932年5月，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由吉林来哈尔滨进

行所谓“满洲问题”的调查。日伪当局为掩盖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的真相，早在李顿调查团到哈尔滨之前就开始制造骗局，欺骗世界舆论，防止爱国人士接近李顿调查团；李顿调查团到哈尔滨后，监视甚至恐吓李顿调查团成员。日伪当局的这些卑劣行为，伪警察机构也在其中。

国联李顿调查团到哈尔滨视察前一个星期，各类警务机关都奉令逮捕和监禁所谓的一般不稳分子，以防他们向国联调查团有任何申诉。被拘捕者，必须要待国联调查团离开之后，方可释放。许多人在调查团走后三四十天，还被囚禁，不见天日。

日伪当局为了制造哈尔滨人民是拥护“满洲国”的骗局，印了成千上万张的“满洲国”小国旗和傀儡溥仪的小相片。不单是哈尔滨的居民，连住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所有中国人、俄国人及朝鲜人，每人都必须用一元钱来买伪满洲国旗和溥仪的小相片。为了推销这些东西，还组织了无数的推销队，他们挨家挨户强迫居民购买一套 并对居民恫吓说：如果在李顿调查团在哈期间，门窗上不好好挂出这些东西，全家就要遭到逮捕！那些不能立即拿出现钱的穷苦人，限15天内把钱送到警察所去。

哈尔滨的马迭尔饭店，是调查团重要代表的下榻之处。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派出大量的日探和俄探，并通过东省特警处的日本顾问派遣伪警察装做普通旅客，占据了代表卧室的邻近房间。三个伪警察冒充为饭店职员，扮作中国茶房、侍应生、房间侍役、大厅侍役和其他杂差。哈尔滨的日伪警察当局特别雇佣了三个日本女子扮作女侍监视代表卧室。其余几十个探员都分散在餐室、阅报室、会客室和饭店四周。至于其它各旅馆，象格兰德旅馆和新世界饭店都住着调查团的代表，也如法炮制，做了严密的布置，绝对阻止任何人接触调查团。

到哈尔滨的调查团团长、英国人李顿爵士不会想到，在调

查团下榻的马迭尔饭店二层楼上，一个工艺学校的俄国青年学生被日本杀死了。他的死是因为他想要递信给李顿爵士，抗议日本人查封了他求学的那所学校。在马迭尔附近有一百五十多个中国人和五十多个俄国人被捕。

作为国联调查团顾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随调查团到哈尔滨，在哈尔滨，这位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家顾维钧也领教了日伪当局是怎样“接待”他的。①

西门·开斯普绑架案

1933年4月，在哈尔滨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西门·开斯普绑架案”。

西门·开斯普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趁学院假期来到他父亲约瑟·开斯普的身边。约瑟·开斯普在日俄战争后，来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开了一个修理钟表的小店，几年后，这个小店变成了珠宝店和银楼。以后，他成了远东最著名的珠宝商，并做了哈尔滨最上等饭店——马迭尔饭店的股份老板。日本人侵占东北的时候，约瑟·开斯普经营着大珠宝店，并且是马迭尔饭店的独资老板，又是一家戏院公司的经理，这家戏院公司经营着一连串的戏院和影戏院。外界传说他的财产从五十万到数百万，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关于他敛财致富的手段和方法，社会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流言。

日本人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财产，开斯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担心财产被日本人巧取豪夺，设法努力避免如此的结局。他的两个儿子当时正在法国读书，当他的儿子成为法国公民之后，他立即实施了他的计划，以避免日本人侵夺他的财富，他把马

① 可参阅《“九·一八事变”》卷中顾维钧所著“我在国联调查团的一段经历”一文。

迭尔饭店以及他的戏院的产权转移到他的儿子的名下，产权转移手续一经完成，法国的三色旗就高挂在马迭尔饭店以及所有他的戏院的屋子上了。约瑟·开斯普的行动也极谨慎，他不大外出，偶而出门，也常带着武装的保镖。他在马迭尔饭店底层的居室象一所堡垒，门窗上都有很粗的钢条，而且里里外外有很多俄国卫士。

西门·开斯普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而且是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他的父亲为他骄傲，并为他安排了哈尔滨最上等的剧院举行独奏演出会。但这位父亲万万没想到，在他的儿子周围张开了一张可怕的网，并且要置他儿子于死地。

哈尔滨的日本宪兵已经在捕捉西门·开斯普的行踪，他们在马迭尔饭店布下了密探，侦察西门·开斯普的活动。执行这项罪恶的是日本宪兵队的秘书兼译员中村，伪满警察则成了帮凶。伪哈尔滨警察厅的督察长马丁诺夫和中村密谋，指使马丁诺夫手下的15名匪徒实施绑架西门·开斯普的行动计划。这些匪徒都是《我们的路》报主笔及法西斯俱乐部首领拉查伊夫斯基精心挑选的，避免了日本人直接出马带来的一些麻烦。中村手下的密探，很快就侦查到西门·开斯普的行动规律，并把一切都报告给中村。

1933年4月24日午夜，当西门·开斯普驾车来到一个少妇的门前时，一伙匪徒包围了他的车子，把他从车里拖出来，蒙上眼睛，塞进另一辆汽车里，被带到哈尔滨附近的一个藏匿地。约瑟·开斯普收到一封匿名信，要求他为他可怜的儿子付出30万元的赎金，以换回他的儿子。然而他坚决地拒绝了，老开斯普不肯支付这笔巨款。在匪徒威胁要杀死他儿子时，他也丝毫不动摇，他坚持必须在儿子平安回来之后，才肯付出几千块钱。一个月之后，他收到了匪徒寄给他的一只耳朵，那是他可怜的

儿子的。但这可怕的信息，也仅仅使老开斯普将赎金增加到了35 000元，而且必须在他儿子获释之后才能付钱。

当法国驻哈尔滨领事馆获悉西门·开斯普被绑案后，立即向哈尔滨日伪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迅速侦缉票匪，营救西门·开斯普。法国副领事晓邦是个精明的青年，他深知日伪当局的答复仅是隔靴搔痒，就雇了几个能干可靠的人员，开始了自己的侦察。他不久就得知了真相，但是他需要证据，就吩咐他的人，把绑架西门·开斯普的匪徒中最年轻的一个叫康密萨兰科的人捉到领事馆。康密萨兰科不仅供述了实情，并且写了供状签字画押。此后，他被释放了。第二天晓邦副领事亲自去见伪哈尔滨警察厅长，递上一张控告和绑案有关人员的呈文以及康密萨兰科的供状的副本。

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对此特大绑架案，经严密侦察，侦知此案原委。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把侦察到的案情连同法国副领事晓邦的呈文以及康密萨兰科供状副本都报告了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伪满警察又表演了一次是日本侵略军的帮凶的角色，殖民地的警察，绝不会去控诉殖民地的主子，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立即吩咐康密萨兰科躲避到远离哈尔滨六百多公里外的绥芬河，同时秘密逮捕晓邦雇佣的人员。日本人办的两份俄文报也对晓邦实施最为恶毒的攻击，侮骂他是卑鄙龌龊的犹太人、赤匪、共产党的雇佣者等等。侮辱性的攻击持续了几个星期，后来竟弄到有一个法西斯党徒要和这位法国副领事来一次决斗。

可是，西门·开斯普被绑架的新闻早已传到国外，英、美、法等国的报纸都注意到了这一暴行。所谓绑架实际上就是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务人员雇佣的匪徒所为。这是无法阻止的成千上万的人私下议论的事实。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在接到把绑架案告一结束的指令后，授意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依照法国副领

事晓邦所起诉的名单，于1933年10月9日，将马丁诺夫和山得尔拘捕入狱。但其他案犯仍逍遥法外，刑事科借口无从缉获，被捕的两人则矢口否认知道肉票的藏匿点。

在西门·开斯普被绑架期间，有关赎金的试探性接触仍在进行。绑匪们催促小开斯普写了很多信，由匪徒转交给他的父亲。可是那位老开斯普却不顾儿子的请求，对那些可怕的恫吓和威胁依然置若罔闻，丝毫不肯让步。他坚信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夸下海口，说他们将毫无所得地把他的儿子送回来，并向他表示道歉，在他儿子获释之前决不付出半个子儿。

当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知道了老开斯普的态度，他们表示：即使老开斯普肯出100万，他也永远不会看到他儿子生还了。日本人不让小开斯普生还的理由还有许多，因为小开斯普已和中村及日本宪兵军官谈过话，知道绑架他的俄匪后面，有日本人操纵，他会将此公布于世的。

逃匿在绥芬河的康密萨兰科被当地的警务机关拘捕，并被押回哈尔滨。他在绥芬河作了一次同样的供状，和在法国副领事前的供状完全一样。他的供状送到了哈尔滨，哈尔滨警方通过路警处得知4名绑架小开斯普的匪徒常在车站来去，1933年11月28日，当他们正想搭车去小岭时，警方将他们缉获，得知小岭正是小开斯普被藏匿地。

西门·开斯普被藏匿在小岭，由吉立正科和加拉斯科看守。到了交接时间，这两名匪徒仍不见换人看守，疑心出了岔子，感到不安。多心的吉立正科去车站好几次，打电话给中村，询问为何还不来人。中村有意隐瞒了被捕匪徒的消息，叫吉立正科耐心等待。当吉立正科去打电话的时候，另一名看守加拉斯科趁机和小开斯普做起交易来。他要求小开斯普写一封信告诉他父亲，让他父亲支付加拉斯科一万元钱，他就可以放了小开斯

普，而老开斯普也不必再付钱给日本人了。交易当然是做成了。当吉立正科打完电话回来时，察觉他们表情有异，知道他们肯定有某种勾当。加拉斯科坚决主张当晚就回哈尔滨，更加重了他的疑心。吉立正科把他的怀疑告诉了中村，中村让他转告加拉斯科，让他在5点钟到车站货场见面。

中村和一个日本宪兵以及重新获释的康密萨兰科到约会地把加拉斯科抓住，搜出了小开斯普写给他父亲的信。虽然他们不懂法文，但那10 000的数字却是认得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中村拔出手枪击毙加拉斯科，然后通知吉立正科打死西门·开斯普，迅速回哈尔滨领护照和金钱逃匿。然而警方按宪兵的指挥，在呼兰车站逮捕了吉立正科，并宣称加拉斯科在拘捕时，被捉他的警察枪杀了。一个匪徒在日本人利用之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警方宣布找到西门·开斯普的尸身时，已经是1933年12月3日了。尸身覆盖着泥土，在一个浅坑中，很惨的景象。几个月的禁锢，严酷的私刑，使这个24岁的青年只剩下一副骨架了，东北北部零下20多度的严寒，冻结了他的面颊、鼻子和双手，皮肉大片大片被冻脱落，肌肉内部已经腐败，双耳被割去……在长达几个月的监禁中，小开斯普不曾洗澡、修面和理发，尸身上积满尘埃和污垢……

然而惨剧并未结束，西门·开斯普的母亲拖着未痊的病体，从巴黎赶往哈尔滨。当她在上海惠中饭店进早餐时，从字林西报上获悉她儿子被害的新闻。她的一丝希望不复存在了，绝望地发出震颤的哀号，悲怆地诅咒这可恶的人世。小开斯普的遗体运回哈尔滨，老开斯普不顾友人的劝阻，坚决主张把棺木搬到他的屋子里，执意让仆人揭开棺盖，以便同他可怜的孩子再见上一面。这震惊是如此之大，竟使他发出疯狂的嚎泣。

整个哈尔滨愤怒了，不单是犹太人、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甚至有些日本人，都在诅咒这暴行。被害者出殡之日，整队整队的日本宪兵和一个联队的步兵从齐齐哈尔开来，以加强本地的兵力。在哈尔滨，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葬仪，尽管日伪当局禁止仪仗通过大街，尽管有大量的军警，全哈尔滨的居民都涌上街道，跟着柩车，直到犹太坟场。

法国领事、开斯普家族以及外国报纸的抗议越来越强烈，他们一致要求将谋杀西门·开斯普的凶犯移送法庭惩办。直到东京来了命令，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科长江口治才秉承宪兵队的旨意，草拟了一份公诉状。关在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警察监狱的6名绑匪，在公诉状中竟然被称为：最诚实最优等的公民，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真正俄国志士。即使他们绑架了西门·开斯普，其动机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筹集反共团体的经费。江口治宣称不能把他们视为盗匪，也不能把他们视为普通犯人。在开审的时候，应把他们当作政治犯。这些被告所犯的罪名是什么呢？公诉状上并未提及绑票。西门·开斯普的耳朵是加拉斯科割的，小开斯普也是加拉斯科杀害的，但加拉斯科已经死了，不能抵罪了。那么是勒索金钱吗？老开斯普并不曾付过分文。江口治的公诉状可加之于这6个被告的罪名仅仅是情有可原的“企图勒索”，而这又并非出自私利而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江口治的公诉状被哈尔滨整个领事团视为可憎的暴行。最后这6个人犯被交给高等法院，关入监狱。

绑架和谋杀西门·开斯普的案子摆在了伪满中国法官的面前，他们不满于日本人所作的偏颇之词的书面说明，试图弄清案情的真相。日本人对此大动肝火，特务机关吩咐所有的警务机关，如果法官来向他们探听消息，让他们一致咬定江口治所写的公诉状的事实。并派密探监视法官们的住宅，把访谒他们

的嫌疑分子加以逮捕和审讯。日本人不希望再出现一个晓邦事件。

但是，被日本特务机关雇佣的间谍万斯白却在一个星期后，把所有文件都交给了法官。证明这些被告和政治完全无关；割小开斯普耳朵的，是山得尔；杀死小开斯普的，是吉立正科，而不是加拉斯科。万斯白还向法官提供了绑匪被捕时，从他们衣袋里搜出的证件。这些证件足以表明这些绑匪都是日本宪兵的探员，没有这些证件，他们是不能在铁道线上任意行动的。

日本人对中国人法官从秘密渠道获得的消息，还蒙在鼓里。当中国人法官宣判，6个人犯以抢劫、绑架和谋杀罪，两个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四人被判处死刑。这一消息，使哈尔滨全城轰动。但两天之后，首席法官被秘密拘捕，日本人宣布判决无效。6个月后，由3个日本人法官结束了这一案件，借口这些绑匪是爱国行动，把犯人统统开释了。一起震惊国内外的“西门·开斯普绑架案”就这样结束了，伪满警察从所谓的侦察到提出公诉，都不过是殖民统治机器的一个部件，它的全部行动完全受日本军事占领当局的指挥。

劫夺中东铁路与秋林洋行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把掠夺的铁路、港口、水运和公路运输的经营权都交给“满铁”独家经营。东北境内仅剩下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还未被日本人为攫取。对于这条铁路，日本侵略者当然也是急不可耐地要夺到手，于是日本人夺取中东铁路采取了各种卑鄙手段，伪满警察也在其中施展了各式花样翻新的罪恶活动。

为夺取中东铁路，日本军部指使满铁修筑军用备战铁路，矛头指向边境，并与中东铁路交叉，把中东铁路截成数段；千方

百计破坏中东铁路的正常经营，制造事端，禁止中东铁路的国际直通货运，割断中东铁路同苏联铁路的联系，迫害和逮捕在中东铁路工作的苏籍职工等等。而中东铁路的中心地哈尔滨更是甚嚣尘上。伪满协和会哈尔滨地方事务局，在道里总商会召开所谓“北铁问题”座谈会，要求中东铁路管理局降低高率运费，并改用伪满国币；紧接着，哈尔滨一百多个伪经济团体代表千余人到中东路理事会和管理局“请愿”，要求运费减价和改用伪满币。日伪当局还出动警察，名为维持治安，实则支持纵容，对中东铁路管理局施加压力，扰乱中东铁路当局的正常工作秩序。

1935年3月23日，苏联政府置中国政府关于苏联单方面处理中东铁路无效的声明于不顾，正式出售中东铁路给日本侵略者。

在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日本陆军少将秦彦三郎的指挥下，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配合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日本外务省驻哈尔滨办事处制造了一系列迫害、污辱苏联铁路员工及侨民的事件。

1936年2月至3月间的2个月内，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长川手与九郎警正，动用了厅内特务科、外事科的全部警察，对中东铁路的苏联籍职员、工人进行所谓甄别。在苏联籍员工回国前，对一百二十多名员工的住所实施搜查，没收了他们保存的有关日本及中国的资料。同年4月至8月，中东铁路苏联籍员工撤离东北返回苏联时，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与伪哈尔滨铁路警护队又联合行动，对撤离人员实行非法检查，并以监护的名义，押送他们直至出境。

在哈尔滨，对苏联侨民的迫害并不因中东铁路所有权的易手而停止。1939年春，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科长羽切正平下

令，制作了大批圆形牌子，大小如一分铜币，分白色和黄色两种。白色牌由无国籍白俄人佩带，黄色牌由苏联侨民佩带。这种对无国籍白俄和苏联侨民的侮辱性措施得到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的许可，并命令让无国籍白俄人和苏联侨民强制佩带。他们出门，牌子被强制挂在胸前。这种污辱人格的暴行，遭到苏联侨民的强烈反对抵制。到年末，日伪当局不得不宣布取消。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哈尔滨日伪当局对苏联侨民的迫害和镇压急剧升级，达到了极点。在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长的阴谋策划下，直接指挥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协同日本宪兵队制造了一系列迫害苏联外交人员及侨民的罪恶事件。首先以战时有害分子为名逮捕了在哈尔滨的苏联人以及其他外国侨民共120名，对他们实施非法监禁，分别关押在哈尔滨市内各警察署拘留所。

其次，集中了全部警宪力量对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实行了全面大搜查，并予以查封。以战时非常法为由，没收领事馆所有动产不动产，并且将领事馆全体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80余人全部监禁在领事馆内。

另外，在全市大肆逮捕苏联侨民，逮捕了年龄在20岁左右的青年男女计200余名，把他们全部囚禁在道里苏联人中学校内，并对他们施以刑讯。

位于哈尔滨南岗大直街与义州街交叉处的秋林洋行百货部，是幢古朴典雅、庄重优美的“巴罗克”式建筑。1936年6月的一个早晨，数百名伪满警察和日本宪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严密把守住还在营业的百货部各个出入口。一名伪警官命令宪兵和伪警察，制止百货部里人群的骚动，保持安静。接着，他向趋于平静的人群宣布，警方获悉秋林洋行秘密收藏军火、隐匿共党谍报人员，私通苏联，图谋暴乱，奉哈尔滨日本宪兵队

本部和伪哈尔滨警察厅的命令，对秋林洋行百货部进行搜查，无关人员须保持安静，经检查退出现场。凡鼓动骚乱喧哗者格杀勿论。

原来，在这一天，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本部和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出动了全部宪兵和警察，以秋林洋行私藏军火为理由，对秋林洋行百货部和洋行经理、董事等高级职员的住宅大肆搜查。军火自然没有，但高级职员防身用的手枪和他们平时打猎使用的猎枪被没收了。日本人以所谓违反武器取缔法为理由，逮捕了秋林洋行总经理卡西安雅诺夫及大股东卡蒂亚叶夫、巴宾索夫与萨尔曼诺夫等人及其眷属，他们被监禁，受尽鞭笞桎梏，直至接受日本人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为止。日本人要他们做的，就是将秋林洋行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给日本人。这种价格在俄国人看来，简直是豪夺。如果这些俄国人拒绝日本人的要求，等待他们的将是无休止的刑讯拷打和无限期拘禁。日本人明确地暗示了这一点，假如他们胆敢那样做的话。

秋林洋行是一家俄商企业，这家洋行历史久远，最初设在俄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称“秋林公司”，后来遍布俄国远东各大城市，形成庞大的经营规模，在帝俄时代被称为“远东事业的先锋”。秋林公司进入中国东北始于中东铁路的修建。秋林公司于1900年5月14日在哈尔滨香坊开设了它的跨国公司，取名秋林洋行。1902年迁至南岗，不久在道里靠近江边码头附近增设一家商店。1904年秋林洋行在南岗大直街与义州街交叉处修建了商业大楼，于1908年9月竣工使用，哈尔滨第一家大型百货店的开业，轰动了哈尔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扩展到一面坡、吉林、沈阳、齐齐哈尔等地，形成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商业与工业一揽子经营模式。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秋林公司被收归国有，对设在

中国东北的秋林洋行仍保留私人资本所有权，在莫斯科的卡西安雅诺夫于1922年获准偕家属和有关股东到哈尔滨定居，继续经营秋林洋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秋林洋行的经营日趋衰落。秋林洋行因负汇丰银行500万元的债务，押与汇丰，故该洋行各商店全部悬挂英国国旗。

1936年6月间，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陆军少将秦彦三郎指示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和伪哈尔滨警察厅共同采取行动，策划制定强行剥夺俄侨经营秋林洋行的计划，图谋吞并俄侨的财产。当时，隐匿了自己身份以所谓顾问的名义打入秋林洋行进行侦探活动的日本宪兵队少佐高木，与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科长川手与九郎警正，共同谋划强制收买的阴谋。高木掌握了秋林洋行经理及高级职员都随身携带防身的武器，并拥有猎枪，以供假日到山林郊外打猎的情况，就提出以非法收藏武器，图谋暴动的名义对秋林洋行实施搜查，拘捕总经理及高级职员，然后提出收买的要求，迫使他们就范。于是，秋林洋行以及经理、董事等高级职员的宅第被搜查了，他们和他们的眷属被拘捕。事情就如此简单，日本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日本人最终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收买了秋林洋行在南岗义州街的总店，道里中央大街、国课街、松花江街、伪满首都新京等地的分店，安达的牧场以及亚细亚剧场。在东北历史上名声赫赫的“秋林洋行”变成了“秋林洋行株式会社”，秋林洋行换了主人。

警匪合谋

“哈尔滨，以前是愉快的，现在成了著名的人间地狱了……生命这样不安全的地方，恐怕是全世界所没有的，哈尔滨的居民……不论到哪里去，即使在白天，如果不带武装，就会发生生命的危险。拦劫、抢劫、谋命和绑票，是常有的事。

外国的领事不得不带着卫士。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同波士顿州的议员丁克汉君到松花江去，他那时正在游历满洲。我们去访问豁达的翰森君，一位到处最受敬爱的总领事。在翰森君的小屋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杆来福枪和自动手枪，两边就是警防盗匪的卫士。”

这是美国著名作家埃特加·斯诺在一篇日本建立新殖民地的论文中，对哈尔滨在日伪统治下的社会状况的叙述。面对这种社会状况，驻哈尔滨的外国领事团曾多次开会，讨论日伪警宪特机构操纵、唆使匪徒绑票和日本货独占市场的事。有几个外国领事甚至向哈尔滨日伪当局提出日本人参与这些暴行的书面证件。

恐怖笼罩着整个东北，哈尔滨更是如此，每个警务机构都豢养着一批掠人勒赎的匪徒，警匪一家，相互勾结，干着坑害百姓的勾当。有钱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被敲诈巨款，以求获释。有许多被绑的肉票，尤其是中国人和犹太人，他们被绑票付出赎金后，并不去报告伪警察厅，因为他们深知绑架他们的匪徒不是警方豢养的就是与警方合作的。如果他们去申诉，他们或许在已失去的赎款之外，还会遇到更大的麻烦，甚至有生命之虞。

有个叫王魏卿的富翁以25万元赎出了他的儿子，然后他又拿出50万元来赎他自己的自由；另一个叫张庆和的商人先后被绑架3次，共花了50万元的赎金；穆蔚堂是一家百货商店的老板，他被绑了2次，每次付出赎金10万元；商人吕泰，先用10万元赎金赎出了他的儿子，后又以5万元赎金换回自己的自由。

开设诊所的开森培克被日本宪兵唆使的匪徒绑架2次，每次都被敲去巨额的赎款；赫立森医生也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达拉先果是一个商人，他先被日本宪兵抓去，付出了15 000元，后来又被伪警察厅敲去5 000元；商人悌斯明尼斯基是以15 000

元赎买了他的性命；希来尔得福罗棱斯是在离开犹太人教堂时，被6个武装人员绑架的，在现场亲眼目睹者有二百多人，伪警察却视而不见，泰然处之决不干涉，希来尔得福罗棱斯在暗室中被关了105天，最后付出25 000元赎金之后，才恢复自由；3个受日本宪兵队长指使的匪徒，去绑架一个波兰学校的学生，匪徒错绑了一个天主教堂收养的孤儿，而宪兵队长却不肯将这小孩释放，竟然说天主教堂是有钱的，如果这孩子贫穷，就让教堂付钱好了，这孩子被囚禁2个月后，教堂终于被诈出2 000元钱，才把小孩赎了出来。

被绑架者如果被敲诈去金钱能赎回性命还算是幸运的，还有不少人在金钱被敲诈之后，竟连一具完整的尸首都未留下。

犹太人高福满，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大药房，外界传说他很有钱。1932年3月11日晚上11点钟，他被几个受日本宪兵队雇用的白俄匪徒绑架，关在南岗日本宪兵队本部的地下室里，12日又把他移到马家沟的一座中式小屋里。匪徒们要勒索高福满付出3万元的赎金，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完全能够负担。在讹诈赎款的时候，一个白俄匪徒竟活活地掐死了高福满。当人们发现高福满的尸体的时候，他的面部充满了很深的灼痕，几乎不能辨认原来的面貌。烧焦的皮肉已腐败发黑，散布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因为他的尸体太重，竟然将其分尸，割成四块，抛在沟壑之中。在高福满惨遭虐杀之后，绑匪们还在和高福满的家庭谈判赎金的数目，而高福满夫人在她丈夫遇害后的3个星期之后，还把18 000元赎金付给日本人，想赎回她的丈夫的自由。

日益猖獗的绑匪使社会治安极度恶化，疯狂的绑票害得人人自危。哈尔滨外国领事团对日伪当局的指斥日趋激烈，社会舆论也迫使日伪当局不得不注意。日伪当局召集伪警察界开了

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应付社会舆论。两天后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在哈尔滨各报登载告示说，警方已发现谁是真正的绑匪，谁使得哈尔滨和它的邻区发生许多恐怖事件。这两个凶恶的罪徒就是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警察厅现在正在密查之中，大约不出几天之内，或者仅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真相大白而使他们难逃法网。

这欺骗社会舆论的告示宣布数日后，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又以许多“事实”供给各埠各报，来罗织这两个“人狼”、“凶徒”的罪状，说他们曾绑过许多人的票，并在每次大肆渲染之后，都宣称他们不久将被捕入狱，予以严加惩处。但人们知道凡勒斯基是个什么东西，凡勒斯基因盗窃犯案被囚禁了3年，刚从狱中出来，许多凶案同他毫无关系。至于门特立卡，只不过是一个专事扒窃的小蟊贼。

一天下午，哈尔滨各报都出了一张“号外”，说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在哈尔滨沙曼屯的一间小屋子里被发现，警方当即奋勇围捕，经自动手枪射出150粒子弹之后，这2个凶徒终于被击毙了。以后几天的报纸上，登满了当时激烈战斗的详细描写，介绍警察如何的勇敢，又怎样在盗窟中抄获许多军火和武器。宣告哈尔滨和北满从此可以安宁度日了。

但事实是，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派人私下劝告凡勒斯基和门特立卡，让他们暂时到沙曼屯去躲避一下，待事过境迁，风声平息之后可出来。这两个笨蛋上了伪警察的圈套，当他们正在大嚼面包和腊肠的时候，被架在窗口上的机关枪送了命。凡勒斯基胸部中了31颗子弹，门特立卡背部穿了19个弹孔。在沙曼屯，留下了他们僵卧的尸首。

这场骗剧演过之后，绑票风却愈演愈烈。一个犹太富人却普佛斯基被绑架，拒绝写信用钱来赎他，受了3个星期的可怕折

磨，他仍坚持拒付赎金。最后，他被警宪机构的俄探谋杀在哈尔滨附近的庙台子，并抛尸于荒野。

伪警察也直接出面诈骗钱财。伪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有专门的侦探组织，打探人家的家庭聚会或宴餐。诸如寿辰、订婚、结婚、宴餐和其它聚会。一旦打探清楚，伪警察就会突然从天而降，以聚会超过10人以上，未被警方允许等各种名目，将聚会者逮捕。当然这类逮捕无非是为了敲诈钱财，被捕的人要缴纳很重的罚款才可出狱。还有各种别的骗钱方法，所谓户口调查即为一例。伪警察当局常在报上公布，借口某种原因，门牌号码又要变动。伪警察挨家挨户调换旧门牌，每个新门牌要征收1元钱。仅值几分钱的一块薄薄的马口铁做的门牌，并且又是一用再用的。随着此类事情的增多，伪警察的钱袋自然逐渐丰满，并更加乐此不疲。哈尔滨的环境也变得更加恶劣了。

迫害宗教界人士

哈尔滨地区不仅有佛教、道教，还有西方传入的基督、天主、东正教和阿拉伯传入的伊斯兰教，所以在哈尔滨地区有着众多的宗教团体和信教人士。由于东北的宗教与关内各有密切交往和联系，同时西方传教士的母国，如美、英、法等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敌对国，日本侵略者认为这些西方传教士持与母国同样的立场，有碍殖民统治政策的贯彻。因此，日伪当局格外注意和防范宗教界人士的政治动向。

为了把东北的宗教事业完全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轨道，日伪当局在实行宗教统治的过程中，始终把宗教界人士置于警察、特务、宪兵的严密监控之下。日伪宪兵、警察、特务以对宗教界人士实行监控的方法主要通过收买宗教界的僧侣做密探，搜集宗教界人士的思想动态，日常宗教事务活动的情

况，提供给日伪当局。据伪警察谢翰声说：哈尔滨极乐寺的某和尚充当了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密侦，负责收集和了解寺内僧侣的动向和其它政治经济情况。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和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侦谍班收买了清真寺某人，利用为密侦，对清真寺的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侦察，收集情况。

在哈尔滨，居住着大批白俄，他们信奉东正教。为侦察东正教的活动，由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选派受过训练的白俄侦探伪装教士或信徒，打进东正教会内部，或者收买白俄信徒收集情报，特别是白俄侨民同苏联的关系，以及苏联领事馆人员的活动情报。1934 年，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还操纵东正教大主教在哈尔滨建立一所弗拉基米尔学校，6 年多的时间里，培训神职人员172 人，其中有11 人被培养成日本宪兵队和特高科的专职特工人员，而日本特务中村辛一直操纵和控制这所学校。

除了收买密侦外，作为控制宗教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利用大批日籍宗教界人士充当特务，直接打入哈尔滨各宗教团体从事特务活动。这些人大多披着宗教外衣，奉行日本关东军监控东北宗教及宗教界人士的特殊使命。日本佛教总寺院先后派遣日僧一番濑顺证、释仁天（俗名今井昭庆）等人打入极乐寺把持了该寺的宗教事务。因极乐寺的慈云和尚追随朱子桥将军抗日，在该寺的日僧今井昭庆勾结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对寺内的僧人挨个盘查，搞得人心惶惶。居住在极乐寺的日本东本愿寺和尚高日则是一个接受了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秘密指令的特务，专门从事收集哈尔滨大同佛教会和极乐寺僧侣思想动向的特务活动。伪特务科还利用哈尔滨大同佛教会的某会长，在该会内收集一般情报。据日本人大谷湖峰对哈尔滨日籍宗教人士的调查，除极乐寺的日本僧侣外，当时（1936 年7 月）计有日本佛教各派人士（禅宗、真言宗、日莲宗等）吉田信教、和田

吉太郎、吉川定次郎、宫胁亮夫等10人，基督教士仓田俊丸、高桥良、吉持久雄等6人，神道、大本、天理等日本教教士八尾道之助、新泽伟惠等8人，分别安插大妙法寺、东清教会、本愿寺、基督教会、马家沟基督教会等场所，拥有信徒四千九百多人。在这些僧侣中，混有不少特务间谍，基本把持了哈尔滨各寺、院、庙、堂的实际宗教事务权力，并通过日本僧侣开始组织伪满官制化的宗教团体。

为了严密监视和控制中国佛教僧侣，日伪警察特务经常对佛教寺院进行搜查、盘问，甚至无故逮捕、刑讯中国僧侣。1943年4月，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协同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松花江北松浦镇马家船口极乐寺分院的部分僧侣，刑讯拷问一通后释放，连被捕僧侣也感到莫名其妙，无端遭受一场皮肉之苦。可见日伪警察对佛教僧侣的随意迫害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日伪警宪对哈尔滨的西方各宗教团体的神职人员，大多列入各级警察、特务、宪兵机构的重点监视对象，对他们严加监视，无端迫害。1936年5月，哈尔滨基督教浸信会牧师美国人查尔斯·莱昂纳多携夫人及同会牧师去东部边境地区传教。牡丹江宪兵分队立即派员跟踪盯梢，沿途伪警察部门也接连设卡盘查，直至莱昂纳多等人返回哈尔滨为止。对于中国神职人员也列为日伪警宪特机关的重点监控对象。如对哈尔滨基督教浸信会会长孔俊轩，日伪警宪特机关的调查材料中列有此人的原籍、出生年月日、社会经历及任职、家庭人口、资产和经济状况、入基督教动机、本人兴趣等等，翔实得令人吃惊。调查材料最后归纳称，此人“家境没落，加之年老，已没有往日的势力和威望，但由于和道外商务会长李明远、资本家羽子明、前市家务会长姚锡九、同记商场场主武伯祥等人均有深交，仍具

有潜在的势力。”可见，日伪当局对基督教人士久蓄戒备之心。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同美英等国的关系公开破裂，基督教外籍神职人员先后被强令驱逐或逮捕关押。如在哈尔滨市的浸信会的美籍传教士端礼宾，被冠以“间谍罪”拘押监禁。1942年的一天，哈尔滨浸信会牧师蔡约翰被捕，严刑拷打逼问口供，让他供出与美国人兰马丁的关系，折磨了半年多，才把他释放。当时重要神职人员几乎都被列入“要视察人”名单，日伪警察、特务、宪兵随时会登门找麻烦，甚至同神职人员有社会交往的局外人也遭到盘查、盯梢。

日伪当局为加强法西斯统治，强令伪满洲国境内信奉傀儡溥仪从日本捧回来的“天照大神”，任何教派不得以各自信仰为借口拒绝供奉。在日伪当局的淫威下，各教派不得不设立敬奉“天照大神”的神龛，按日伪当局的要求顶礼膜拜，稍有怠慢或不敬者便要招致惩治。1945年初，哈尔滨的东正教的一部分传教士和信徒拒绝参拜哈尔滨的日本神社及哈尔滨的建国神庙，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长影山善次郎亲自出马，大兴问罪之师，威胁东正教大司祭得米多力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将停止供应该教堂所用的蜡烛和灯油。甚至对日籍基督教牧师，也因不敬拜天照大神而遭逮捕。哈尔滨圣洁会兼职牧师原雄一认为敬拜天照大神是与自己的宗教信仰相违背的，因为基督教圣经中十条诫命的第一条是：“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原雄一和圣洁会日本东京总会会长采取一致态度，不敬拜天照大神，被抓起来，关押了两年。

日本侵略军占据东北后，急需物色可资利用的各种社会势力协助其建立和维持殖民统治秩序。

东北的家理教源于清康熙年间以长江、大运河漕运民工为主体组成的青帮。家理教传入东北后，在东北的军、政、绅商

各界都有人加入，连普通的平民百姓也有加入的。对于这样一个成员广泛、背景深远又同关内有密切联系的半公开结社团体，日伪当局是绝不会放过的。伪滨江省警务厅特高科的大黑股长，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说，家理教是一个“以搞暗杀、破坏活动为目的的秘密结社”，主张对其采取“断然的镇压政策，或者认其成为合法团体，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妥善的由国家引导、监督他们的行动。”日伪统治当局决计对家理教采取操纵、控制、利用的态度。日本关东军授意组成以冯谏民为头目的家理教代表团访日，并给予他们很高的接待规格，借以拉拢家理教。在拉拢的同时，一大批日本人，其中包括特务、浪人、工商界要人，伪满政府中日籍官吏等，加入了家理教，有的还成为辈份较高的成员。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特务警佐后藤令治便是受命加入家理教的日本特务。

后藤令治，中等身材，较肥胖，大脸盘，经常带浅黑色眼镜。粗通汉语，一般谈话，大致可以达意。后藤在日本时就当警察，以后又在朝鲜和旅大租借地当过多年警察。1941年前后，后藤在伪滨江省地方保安局任属官，在特务分室专门负责侦察家理教的工作。后藤加入家理教，并成为24辈徒，以此身份为掩护从事特务活动。后藤在家理教中的辈份很高，在自己家里摆香堂，收徒弟。他有很多中国人徒弟，当时哈尔滨一般家理教成员中，有许多人都同他有来往，关系极为密切。

后藤建立了“后藤工作班”，通过和家理教成员的往来，侦察家理教活动，并指示其徒弟收集各方面的特务情报。后藤在道里高士街哈尔滨汽船组合长平野的住宅中，以家理教师徒关系的名义做为活动据点，建立了情报网。平野的儿子在伪五常县公署工作，后藤派遣家理教日本人成员绢田康协助平野的儿子做家理教工作。在“后藤工作班”还有一个日本人，年龄稍

小于后藤，个头不高，身材较胖，也是近视眼，常戴眼镜，是个伪警尉，经常和后藤在一起活动。后藤工作班还有中国人董心文、李万库、穆义恺等人，充当密探和特务腿子。除此之外，后藤工作班也进行侦察逮捕。据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翻译周质彬说，他曾在"松花塾"秘密拘留所里，看见后藤工作班的董心文和日本人一起去过堂提审犯人。后藤还依仗职权包揽诉讼。哈尔滨家理教中的人，凡和后藤的密切交往的，常常找他说官司，他便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合同外事班与"光"工作

日伪当局为了被他们占领的东北铁道线的安全，也为了侦缉活动于铁道线上的抗日活动。伪满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中央干部会审议决定，在伪满中央和东北各地设立合同外事班，隶属于各级警务统制委员会。其具体活动受宪兵司令部警务部第二课及各地宪兵队特高课或特务课领导。在哈尔滨也设立了同样的合同外事班，它由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哈尔滨铁道警护队和伪哈尔滨警察厅抽调人员组成。伪哈尔滨警察厅主要由外事科派遣科员参加合同外事班。在哈尔滨火车站内设立合同外事班事务所，由主任和班员在那里执行勤务。

检查、监视过往满洲国境内地区车站的外国人是合同外事班的主要活动，而重点是侦察搜索苏联谍报人员，在伪满主要大中城市清查国民党及英、美、法等国的情报机关。合同外事班设有护照检查所，查验户照签证。哈尔滨地区的外国人出行时，包括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外交人员，事先须经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执照股审核批准后，签发旅行护照。然后由外事科将签证护照者的出发时间和前往目的地通知合同外事班，由合同外事班派遣班员跟踪，伪装同行旅客监视其行动。

跟踪者把被监视者的全部活动，甚至上便所及起动次数、途中接触人物、睡眠时间等，都记入尾行簿内，在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再移交给别人继续尾随。合同外事班对于机动的谍报人员，根据时间、地点及具体场合、采取机动的方法予以拘捕；对固定的谍报人员，较慎重地进行严密的侦察，采取蹲点、化装尾行、反间谍潜入等手段，摸清间谍组织机构的人员、谍报方法，然后秘密逮捕，力图一网打尽。逮捕后立即组织刑讯，对有价值的谍报人员，尽可能地采取收买政策，作为利用者让其从事反间谍活动；对无价值的谍报人员，经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批准，送往日军731部队充当细菌试验材料。

伪哈尔滨市警察厅在哈尔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轮船码头、国际旅行社等处都派有外事科警察，协同日本宪兵队及伪哈尔滨铁道警护队盘查外国旅行者，检查验证旅行护照证件。还每天写出日报交外事科作为情报资料，发现可疑人即尾随跟踪。据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警尉大薮武雄回忆：“1939年8月间，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接到电话，是牡丹江地方保安局事务官山田从哈尔滨车站打来的。由他尾随苏联谍报嫌疑者，跟踪到哈尔滨，来电话要求将该谍报嫌疑者移交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继续尾随侦察。当时外事科研究确定将尾随任务交给白俄警察，但又考虑到白俄警察同被尾随者民族及语言上的关系而有所顾虑，所以由我和白俄警察一同前往车站接收尾随移交任务。在哈尔滨车站，山田事务官把被尾随者移交给我，由我交待给白俄警察之后，我即陪同山田前往饭馆进餐。

据说被尾随者是苏联籍公民，名叫保古达诺夫。此后我就将此事淡忘了。然而时过半月左右，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来了一位白俄女子，说她丈夫保古达诺夫去牡丹江市，进入一家百货商店后再也未见其出来，此后即去向不明，要求外事科帮助

查找。我听说此事，即想起此人姓名同前次山田事务官移交的谍报嫌疑者姓名相同，当时即向牡丹江市警察厅发出照会公文，说明查找之人与前次被尾随的苏联间谍嫌疑者姓名相同，同时又在牡丹江市失踪，可能同为一人，希望牡丹江市警察厅迅速侦查此人。但牡丹江方面没有任何答复。以后失踪者家属多次来外事科督促。外事科又向牡丹江市发出几次公文，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我听外事科老科员们推测，说此人肯定在牡丹江被逮捕，监禁在牡丹江地方保安局，或者早已被秘密杀害了。”

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除对在哈尔滨的外国侨民进行特务活动，对各国在哈尔滨的商社、宗教团体、外交机构进行监视外，主要是对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馆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视和间谍活动。

对苏情报战，始终是哈尔滨日伪警察特务、宪兵机构的重要间谍活动。1940 年初，伪哈尔滨警察厅日本人副厅长园田莞尔根据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命令，与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共同派遣警宪人员组成特别外事班，组成秘密侦谍机构，专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为侦谍目标从事谍报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苏联的动向尤为关注。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为侦察苏联方面的情报，命令伪满各地日本宪兵队在苏联驻伪满各主要城市的领事馆周围的适当地点，配置固定监视哨所，并配备固定情报人员。根据这个命令，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为侦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活动，命令伪哈尔滨警察厅实施“光”工作计划。按照这项计划，该厅外事科于1942 年4 月设立了一个秘密侦察机构，代号为“光”的工作班。

“光”工作班在伪哈尔滨警察厅对面，日本外务省公馆（现为黑龙江省政府参事室址、吉林街60 号）内设立“光”工作班事务所，实际上是该工作班的秘密据点。“光”工作班班长为日

本人警佐松井，配备30余名秘密侦谍人员，包括特工、翻译、摄影、司机等，全部是日本人。还配有两台专门用于尾随跟踪用的汽车。

“光”工作班在南岗花园街与木介街（今耀景街）的拐角，位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右前方的日本军官宿舍（现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楼顶设立了秘密监视哨所。哨所配备紫外线探测仪、高倍望远镜、高速红外摄影机等仪器，不分昼夜地了望、监视苏联总领事馆内的活动。紫外线探测仪直对领事馆正门，每当有人进出领事馆时，人影就会遮断紫外线，顿时警铃大作，真是连一只蚂蚁都难以躲过警戒视线，而时刻准备着的配有高倍望远镜头的摄影机拍摄下出入人的照片，工作班的人员立即乘坐备用的小汽车尾随跟踪，侦察其行动。

“光”工作班成员除从事间谍活动外，还豢养了一批密侦和特务腿子，为他们效劳搜集情报。哈尔滨大道馆中学校教员管某就是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的密探，1943年至1945年间，受特务机关派遣打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充当该馆工作人员的日语教师。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系警佐、日本人相泽雅一同她联系，利用其可以自由出入苏联总领事馆的方便条件，让她搜集总领事馆内的情况。

伪哈尔滨南岗警察署白俄警官西亚努依金警佐是该署外事科主任，在日本人大薮武雄的指示下，收买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学校女教员得米多莉耶娃，利用她施美人计，接近苏联总领事巴乎尔依耶夫。搜集领事馆内的壁报、废弃文件，盗窃往来信件，领事馆工作人员工作日记等活动。并将其提供给伪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由日本人从中了解掌握苏联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第十六辑）